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 著

全譯本



三十年寫就宏篇巨著 系統闡述文革起源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作者的文革前史三部曲，開創了西方研究文革的新領域。完整的中譯本終於問世，必將推動對文革更深入的研究。

——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学社會科學部教授）

麥克法夸爾先生是美國知名的漢學家，五十年前就開始研究毛澤東和當代中國歷史。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他在哈佛大學主持費正清中心工作時，曾兩次邀請我到美國講學、座談毛澤東和當代中國的問題，可說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了。他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巨著內容非常詳細。現在，他的中國為什麼會出現文化大革命的有關歷史巨著又要在香港出版了。我們真要向他致敬和致謝！

真實的歷史不僅可以鑒往知來，而且能弄清理論和主義的基礎。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規律，同弄清楚歷史事實是分不開的。對歷史要有忠誠的態度。任何理論都不能離開真實的歷史。

——李銳（中共黨史專家；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據我的觀察，到目前為止，在國際學界（包括中國）關於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及其起源的研究中，麥克法夸爾教授的這套書是最優秀的著作。無論是從史料的梳理，史實的把握，還是從邏輯的分析，它都顯示出一位熟知中國歷史的外國史學家的功力。相信這套書會給中國讀者帶來一個全新的視野，並有助於他們瞭解和研究自己的歷史。

——沈志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麥克法夸爾的這套書，稱得上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史的開山之作，也是今人瞭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必讀書之一。

——楊奎松（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麥克法夸爾教授的文革史是研究中共高層政治的少有的傑出著作。它從毛澤東時代政治精英的意識形態與政策分歧和權力鬥爭來解釋文革的政治起源。由於麥克法夸爾教授對史料的嚴謹的研究和細膩與深刻的分析，這部文革三卷史已成為中國學的經典作品之一。

——裴敏欣（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封面照片：
1956年10月北京郊區農民代表向毛澤東報告關於農業合作社情況。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ISBN 978-988-15570-8-7

HK $ 128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人民內部矛盾 1956-1957年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著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新世纪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書名：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 1956-1957 年
作者：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
初稿：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譯（見全譯版前言）
全譯稿：　殷钟睿 譯校；莫懷遠 統校
封面設計：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www.newcenturymc.com
聯絡方式：editors@newcenturymc.com
國際統一書號：978-988-15570-8-7
定價：　　港幣 128 圓

香港印刷，2012 年 10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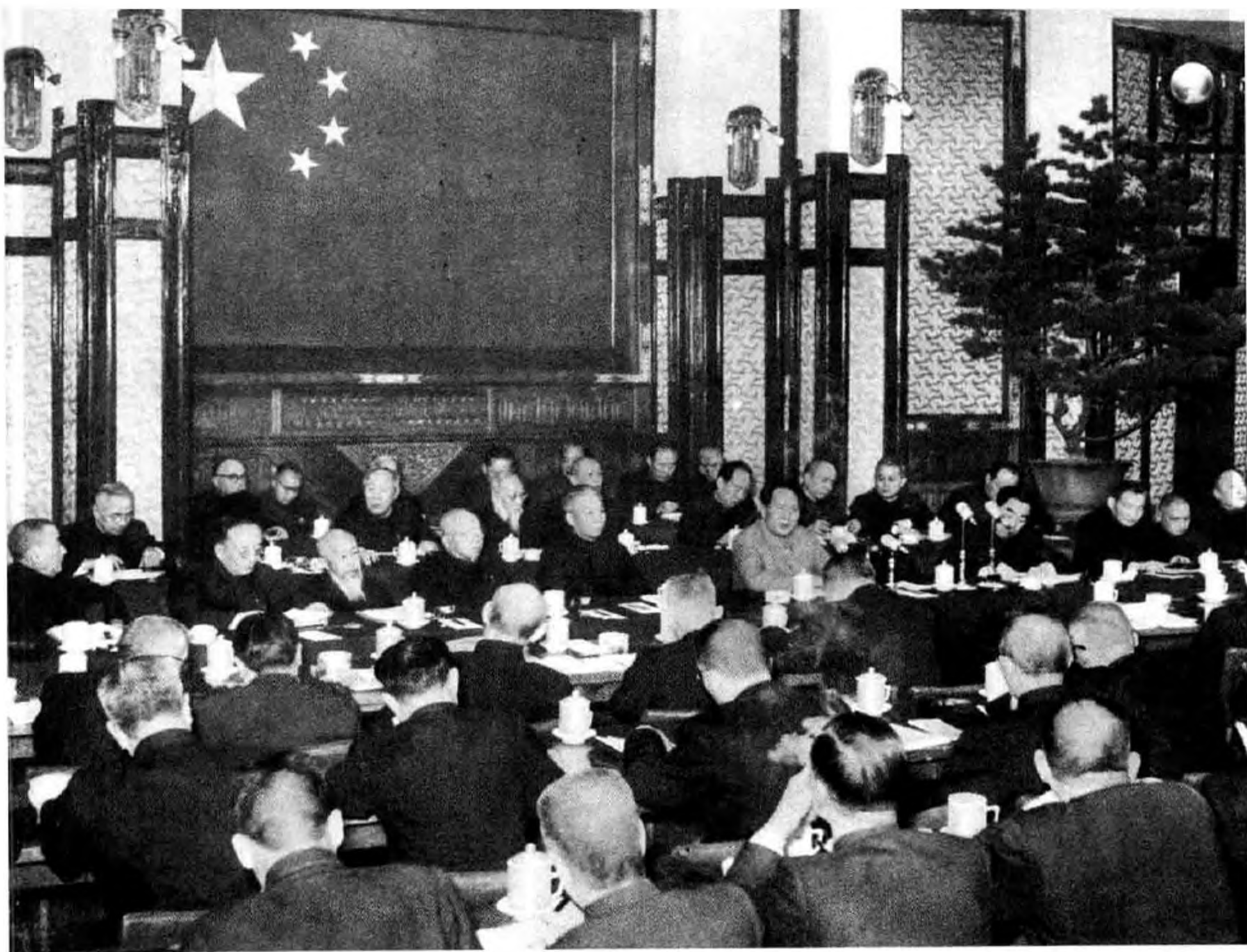
版權聲明
沒有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的書面同意，本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介中複製或傳播。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nglish Title: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Author: Roderick MacFarquhar
Translation Draft: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lation Group
Translation Editor: Yin Zhongrui
Chief Editor: Mo Huaiyuan
Design, Layout & Production: Renee Chiang
Publisher: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www.newcenturymc.com
editors@newcenturymc.com
ISBN: 978-988-15570-8-7
Price: HK $128

First printed in Hong Kong, October 2012.

©2012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Original English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4



毛澤東在 1956 年 1 月 25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再有 3 年的時間，社會主義革命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完成。他利用這次勝利來諷刺他曾經的反對者們：「過去有些人怕社會主義這一關難過，現在看來，這一關也還是容易過的。」



《人民日報》社論重申：「在 1956 年和 1957 年兩年內，將基本實現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位上海工商業者後來回憶說，毛同他和他的同伴們友善地交談剛過了幾個星期，市裏的領導人就通知工商業者，必須在 6 天之內完成改造。



毛說他的目標是將「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聯在一起。在本卷所論述的兩年中，毛強調的重點在於以上三個矛盾中的後一個。圖為 1956 年毛澤東在第二屆全國政協二次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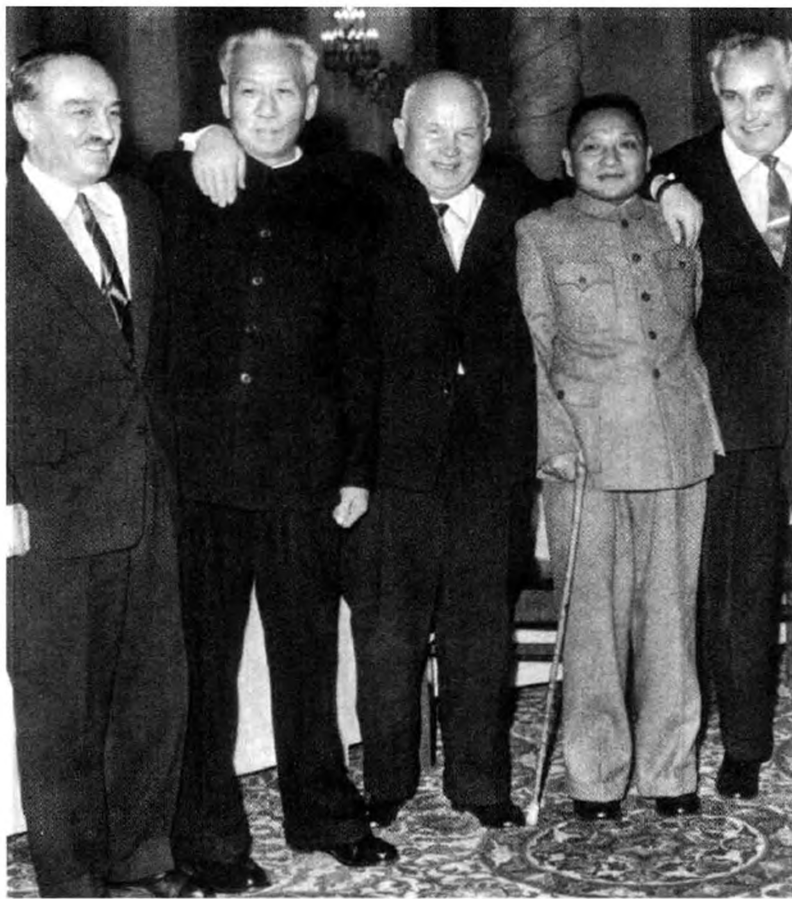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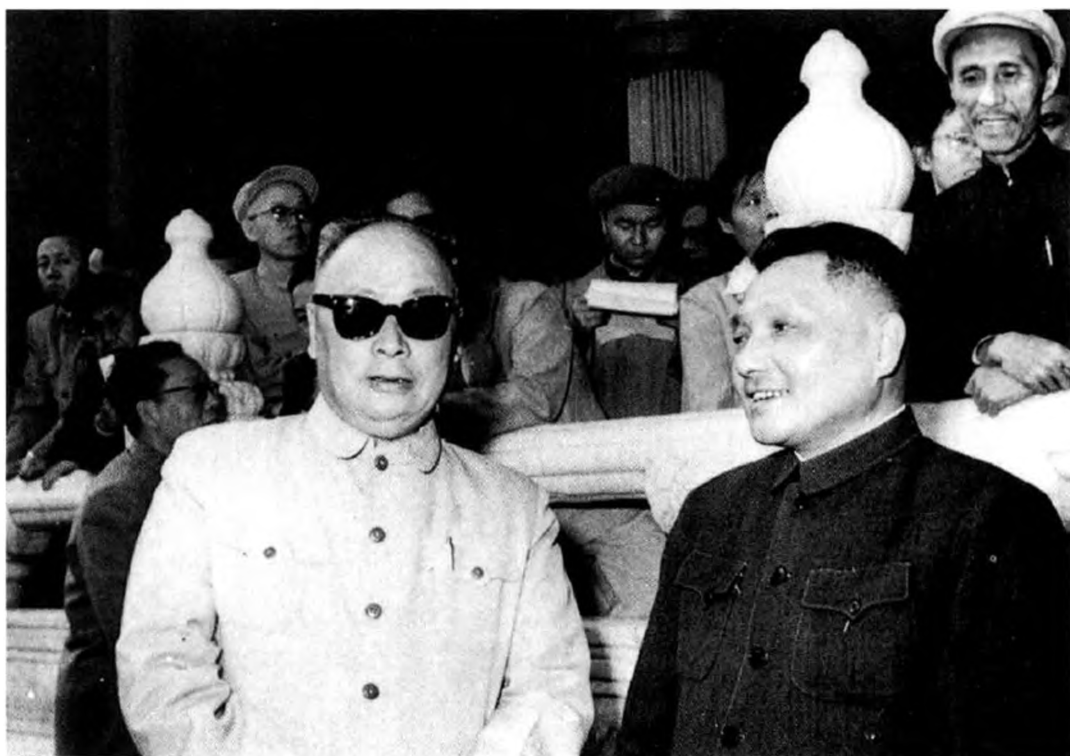

1956 年，八屆一中全會上選出了新的政治局，其中一些重要的提升和降職預示著今後的發展。毛澤東在大會僅致了一個很短的開幕詞，而把主要的政治報告留給劉少奇去作。但這並不能說明毛澤東在黨內的實際地位。最多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正在把劉少奇作為他的繼承人推到前台。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總書記：鄧小平。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承認：「1956 年的反冒進我是有責任的，我做過一個自我批評。」在 1956 年的許多時候，一些部門的官員都表示反對冒進。由於他們的職務，他們對冒進的影響是看得最清楚的。他們包括陳雲、李富春、李先念、鄧子恢、薄一波以及王首道。圖為 1956 年周恩來、李富春與聶榮臻。



官方把文化大革命解釋成兩條路線長期鬥爭的最後決戰：一方是毛的正確路線；另一方是修正主義路線，其代表是被稱為「中國的赫魯曉夫」、「中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國家主席、毛的繼承人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期，人們認為毛一直以來都堅持他的正確路線，而劉及被稱之為其追隨者的人則始終奉行他們的錯誤路線。



鄧小平把毛澤東同斯大林加以區別的方式，是宣稱「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這段話顯然是為對毛澤東的頌揚（對領袖的愛護）作辯護，並且把它與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個人的神化）區分開來。圖為 1956 年 10 月 1 日鄧小平與陳毅。



1956 年，中國高層領導中有周恩來、張聞天，他們在 1930 年代曾激烈反對過毛澤東。圖為 1956 年 10 月 4 日。張聞天、毛澤東、宋慶齡和周恩來。



在外表上，1956 年春，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領導感到在毛的個人崇拜問題上需要做什麼事，他們認為只要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提出辯解就行了。圖為 1957 年 6 月：「我一看見毛主席，心裏高興得不知說什麼好。毛主席握住我的手，我感覺我們的領袖是多麼健康！這真是我們全國青年和人民的幸福。」——徐建春（與毛握手者）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引起了毛澤東對改進無產階級專政的深深思索。圖為 1957 年，毛在莫斯科參加紀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會。



為主張謹慎地進行合作化，一些高級官員公開暗示他們犯了錯誤。這些人是：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國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副總理兼上海市市長陳毅。圖為 1957 年 11 月。

如果讓劉來決定，他肯定會選擇彭真作為總書記的人選。而鄧小平卻是一個與毛有關係的人。他的任命，將導致重要的政治後果，它的意義在於，從此以後劉少奇無法期望在之後與毛或者其他高級領導人發生爭執的時候獲得整個黨組織的支持了。



圖為 1957 年，毛澤東與鄧小平參加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



圖為 1960 年，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



在六中全會上鄧子恢受到毛的批評。鄧子恢後來在 1956 年 9 月召開的「八大」上作了自我批評，但這已為時太晚，這使他未能像別的副總理那樣進入政治局。他之所以能保留副總理和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領導職務，可能是由於過去與毛關係密切的緣故。

獻給艾米莉

For Emily

荷天地之蓋載，感日月之照臨，聚弟兄於梁山，結英雄於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數，下合人心。自今以後，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絕大義，萬望天地行誅，神人共戮，萬世不得人身，億載永沉未劫。

——宋江《水滸傳》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www.newcenturym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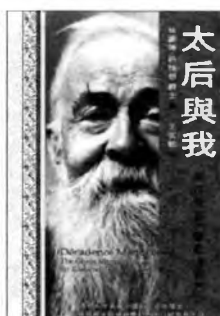












總經銷：田園書屋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56號2樓
電話: 852-2385-8031
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

目錄

全譯版前言......1

前言......3
導言......7

第一編 根本變化

第一章 社會主義「高潮」......21
第二章 發動第一次「躍進」......32
第三章 開始解凍......39
第四章 蘇共二十大與中國的反應......45
第五章 毛澤東同計劃制定者的對立......63
第六章 解凍在擴展......81
第七章 第一次「躍進」的結束......92
附錄一：陸定一對毛澤東百花齊放方針的解釋......98

第二編 中共八大

第八章 毛澤東的地位......105
第九章 關於自由化的爭論......117
第十章 第二個五年計劃......129
第十一章 新的中央領導人......145
附錄二：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對鄧小平報告的攻擊......155
附錄三：中國領導層的「一線」、「二線」......159
附錄四：提到毛澤東講話的情況......163
附錄五：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對劉少奇報告的攻擊......165
附錄六：政治局......170

第三編 整風運動

第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的影響......173
第十三章 一場整風運動成為共識......181
第十四章 毛分析人民內部矛盾......187
第十五章 發動整風運動......203
第十六章 鳴放......220
附錄七：1957 年 2 月 27 日劉少奇在哪裏？......252
附錄八：各省負責人對整風的態度......254

第四篇 反右運動

第十七章 關於矛盾問題講話的公開發表 261
第十八章 毛被與右派聯繫到了一起 271
第十九章 妥協 292

結論....311

註釋....321
對書目和方法的說明....399
書目....403

全譯版前言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英文原版全書共三卷。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 1956-1957 年》、第二卷《大躍進 1958-1960 年》以及第三卷《浩劫的來臨 1961-1966 年》分別於 1974 年、1983 年和 1997 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文版第三卷譯文 2005 年成稿以後在中國大陸未能發表。2011 年，作者麥克法夸爾（馬若德）教授本人將全部三冊中文譯文初稿及版權購回並授予本社發表。

初稿第一卷的譯者是：王紅續（第七章、附錄一、結語、第十六章註釋、索引的一部分）、趙麗江（第十二至十三章、第一至四章註釋）、宮力（前言、第二章第二節、第八章、第五至九章註釋、附錄一註釋）、馬陶（第二章第一節、第十九章、索引的一部分）、張沱生（第十六章第一至三節、第十四至十五章註釋）、李捷（第一章第一節、附錄二至附錄六、對書目和方法的說明、書目）、鄭謙（附錄七至附錄八、附錄七至附錄八註釋、第十七至十九章註釋、結語部分的註釋）、張霞（第十七至十八章）、招嘉熾（第四章第一節、第十至十三章註釋、附錄二至附錄六註釋）、呂虹（第十四章）、徐邦明（第十五章）、霍海丹（第十六章第四至五節）、譚一青（第一章第二節、第六章）、馬文倉（第五章）、黎青平（第九章）、謝偉民（第十章）、王雙梅（第十一章）、陳子光（導言）、傅鵬鵬（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節）、楊先文（第四章第二至五節）。校譯者是：何祚康、王澤槐。最後的中文統稿工作，由宮力、王紅續、馬陶、鄭謙四人合作完成。

初稿第二卷的譯者是：王紅續（第三章，導言、附錄 1 和第十章的註釋）、宮力（第七章和第八章，第七至第九章的註釋）、李捷（第

九章、關於書目的說明、書目，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的註釋)、趙麗江(第十章 13—15 節，第一至四章的註釋)、招嘉燉(第一章，第五、第六章的註釋)、呂虹(第六章第 1 節、索引)、馬文倉(第二章、第四章 1—3 節)、姚建平(第十章 1—4 節)、霍海丹(第十章 5—8 節)、譚一青(前言、導言、結語)、馬陶(第四章 4—7 節)、張平曄(第十章 9—12 節)、黎青平(第十一章 6—9 節)、傅鵬鵬(第五章)、邸文玉(第十二章 1—3 節、)苗彤(第十二章 4—7 節)、鄭謙(第十一章第 10 節、)孫建益(第六章 2—4 節)、張琦(第六章 5—6 節、附錄 1)、馬京波(第十一章 1—2 節)、李強(第十一章 3—5 節)、張霞(第十二章 8—10 節)。校譯者是：戴漢笠。最後的中文統稿工作，由鄭謙、霍海丹、李捷、姚建平四人合作完成。

初稿第三卷的譯者是：何祚康、章宏遠、陸晉瑋、江元譯；何祚康統校 。

本社的全譯稿補充了初稿中刪節的所有內容，並且對譯文進行了又一次校對。由殷钟睿以及王笑歌校譯；莫懷遠統校。

另外，全譯稿的最終出版得到了夏曉東先生不可或缺的幫助。

至此，完整的三卷中文全譯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終於和大家見面了。

新世紀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 1 日

前言

我第一次開始撰寫有關 1956-1957 年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是在他們發生之時。當時，我剛剛從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畢業，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中國問題觀察員」。在哈佛期間，我在費正清 (John Fairbank) 的精心指導下，開始了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我非常幸運地被倫敦《每日電訊報》已故副總編唐納德· 麥克拉克倫 (Donald McLachlan) 聘用，並在該報富有經驗的蘇聯問題專家大衛 · 弗勞伊德 (David Floyd) 手下工作。這使我從一開始就關注著中蘇之間相互關係的發展。1962 年，在杰拉爾德 · 弗羅德 (Gerald Freund) 安排下，我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贊助，對這一時期進行了更為詳盡的研究。1968 年，由於約瑟夫 · 斯萊特 (Joseph Slater) 和大衛 · 芬克爾斯坦 (David Finkelstein) 的安排，我得到了福特基金的支持，重新回到這一問題的研究上。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約翰 · 貝爾 (John Bell) 是一位有耐心的贊助者，當他聽到我的論著要從原來的一卷擴大到三卷的消息時，仍然顯得十分鎮定。

1969 年，我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和共產主義事務研究所的共同資助，作為高級研究員在紐約繼續進行我的工作。這兩個研究所的所長約翰 · 林德貝克 (John Lindbeck) 和茲比格紐 · 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給了我許多友好的鼓勵和研究上的啟發。後來，在約翰 · 林德貝克不幸早逝之後，馬丁 · 威爾伯 (Martin Wilbur) 又為我獲得了東亞研究所的繼續資助。我從與那些在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其它地方從事相關論題研究的學者們的談話中受益匪淺，這些學者是：鮑大可 (Doak Barnett)、帕里斯 · 張 (Parris Chang)、詹姆斯 · 哈里遜 (James Harrison)、唐納德 · 克萊因 (Donald Klein)、歐邁格 (Michel Oksenberg)、理查德 · 索里赫 (Richard Sorich)、泰偉斯 (Frederick Teiwes)、唐納德 ·

扎戈里亞 (Donald Zagoria)。在該大學現代東亞研討會上我做了一次論文報告，從中得到了到許多有益的反饋意見。帕里斯·張、保羅·哈珀 (Paul Harper)、歐邁格和泰偉斯讓我看了他們的博士論文，A·M·哈爾彭 (Halpern) 及 [通過白魯恂 (Lucian Pye) 和大衛·麥克依喬恩 (David MacEachron)] 對外關係委員會允許我從哈爾彭有關中國對外政策的文稿中做了大量的筆記。

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我開始意識到，由於文化大革命，我們可以得到大量新文獻。我斷定，把當時和文化大革命所透露的材料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從 1956-1965 年的歷史中追溯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理查德·索里赫讓我看了他的全套的大量卷宗，T·K·董 (Tong) 向我介紹了他為東亞圖書館獲得的紅衛兵小報，我的助手布魯斯·雅各布 (Bruce Jacobs) 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瀏覽並複印了這些小報。陳志讓和麥尼奧·耐克吉姆 (Mineo Nakajima) 慷慨地向我提供了我所要求的新材料。由於福特旅行基金的贊助，使我得以搜集更多的文件。我利用旅行基金去過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哈佛——燕京研究所，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和中國研究資料中心，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我還去過東京，去過台北的國際關係學院以及香港的美國總領事館和聯合研究院。在這些研究機構，我受到尤金·吳 (Eugene Wu)、王芨（音譯）、P·K·余 (Yu)、約赫·馬 (John Ma)、吳真哉（音譯）、郭華倫、海拉爾德·雅各布森 (Harald Jacobson) 以及威廉·許 (William Hsu) 的友好接待。當我返回英國之後，瓊·勒斯特培德 (Joan Lustbader) 向我提供了從香港得到的其他材料；與此同時，畢爾·布魯格 (Bill Brugger) 和肯尼恩·沃克 (Kenneth Walker) 讓我看了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收藏的微縮膠卷。

1971 年秋季，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肯尼思·楊格 (Kenneth Younger) 委任我做為研究員以完成我的研究工作，自那以後，我在該所課題負責人詹姆斯·福西特 (James Fawcett) 的指導下工作。1972 年秋季，該所的新負責人——安德魯·肖恩菲爾德 (Andrew Shonfield) 撥了一筆資金，贊助我對人民共和國進行第一次訪問。

在本卷最後階段的工作中，我從歐邁格和施拉姆 (Stuart Schram) 非常有見解的評論中受益匪淺，他們極為認真地讀完了書稿。我也從莫頓·亞伯賴姆維茲 (Morton Abramowitz) 和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對本卷一些部分的評論以及現代中國研究所的研討會成員們在聽了我關於我所研究的這一時期的一個方面的書稿之後發表的評論中受到很大啟示。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點，我也同霍華德·布曼 (Howard Boorman)、菲利普·布里格姆 (Philip Bridgham)、愛德華·弗里德曼 (Edward Friedman)、理查德·哈里斯 (Richard Harris)、謝蘭莉 (Alice Langley Hsieh)、埃麗斯·喬菲 (Ellis Joffe)、沃納·克拉特 (Werner Klatt)、保羅·克賴斯伯格 (Paul Kreisberg)、倫納德·夏皮羅 (Leonard Schapiro)、理查德·所羅門 (Richard Solomon) 以及艾倫·惠廷 (Allen Whiting) 就 1956-1957 年的歷史曾進行過長時間的、很有益處的思想交流。C·T·夏 (Hsia)、殷·C·劉夫人 (Mrs Yin C. Liu) 和 H·F·西蒙 (Simon) 使我不至於將蘇式用語過分地應用於中國語言上。

在查塔姆出版社，赫米亞·奧利弗 (Hermia Oliver) 是一位極為負責的編輯，她以認真負責的態度應對我多次修改原稿。對於單調乏味的最後定稿的打字任務諾拉·貝納姆 (Norah Benham) 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艾琳·孟席勒 (Eileen Menzies) 以極為巧妙的方式幫助我安排截止日期，使我得以按期交稿；莉蓮娜·布里斯比 (Liliana Brisby) 仔細閱讀了本書的導言，並提出了很有幫助的建議；圖書館和報刊書庫的工作人員極為迅速地為我提供了圖書和文獻。

當我從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得到了兩本非常有價值的毛澤東講話和文章的選集（我已在書目及方法的註釋中做了敘述）時，東方印刷廠馬上準確無誤、非常整齊地地製作了校樣。我已經吸收了所有有關的新資料（校樣可不是整齊地退回去的），但由於這兩本選集到得比較遲，所以我不得不將許多資料安排在註釋裏。

對於以上我所提到的諸位，我表示衷心地感謝；當然也要說明，他們是免責於我的所有錯誤的。這許多年來，我還受益於範圍更為廣

泛的同事們的聰明才智，我只能通過在註釋和書目中提及他們以部分地償還他們對我的支持。

我的妻子要我說明「沒有她這部著作也會寫完」，但事實恰恰相反。她在照顧孩子和新聞寫作的間隙，擠時間批判性地讀了書稿，並運用她自己在中國政治方面的許多知識，使我把這部著作改得更好。這第一卷書是獻給她的。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
倫敦
1973年8月

導言

1966年春天的中國，看起來是一個穩定的、有秩序的、團結的國家。她正由一群在長征、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及內戰中建立起同志友誼的人們領導著。他們進行了一場革命並大膽地改造了一個6億人口的社會。他們統治和建設的工具是世界上最為有效和富有朝氣的共產黨，雖然在這一點上，還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有250多萬人民解放軍的支持，除了西藏的特例外，從不需要大規模動用軍隊來支持國內政權。

但僅僅幾個月間，這種和平統一的景象就被擊碎了。在外國人和大多數中國人毫無察覺的情況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輪排炮就已經打響。1966年6月，在最高領導層中，第一批受迫害者被公開解除職務。在8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黨的領導層進行了另一次大的改組。隨後是天安門廣場上的一系列狂熱的群眾集會。在這些集會上，毛澤東被稱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受到群眾的歡呼。當對毛的崇拜極度高漲時，毛從前的戰友似乎注定要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共產黨的機構垮了，各地的領導人頭戴高帽由紅衛兵押解在大街上游鬥，紅衛兵的激情來自毛的令人震撼的「造反有理」的指示。在此之前，人民解放軍一直是黨的衛護者，這時卻受命支持那些傷害黨的人。只是在當那些得意洋洋的紅衛兵陷入激烈的、流血的自相殘殺的爭鬥時，軍隊才被允許介入以恢復秩序。它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唯一在全國範圍內有實權的組織。

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後果是一些毛認為核心的原則被否定。他一貫堅持共產黨在所有領域裏的領導權；文化大革命極大程度地使黨的幹部士氣低落，並摧毀了他們在群眾眼中的權威，而恢復這些權威則要

花費許多年的時間。毛特別注意黨對槍桿子的領導；但是經過文化大革命，軍人控制了新組建的黨的機構。毛反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卻在事實上被奉若神明。毛始終提倡「治病救人」，反對「一棍子把人打死」；[1]而文化大革命中，他卻迅速地清洗了他的許多從前的同事，隨之廢棄的是那種「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實踐。

所有這些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並不都是毛可以精確預料到的。但是，他所發動的這場運動的危險性，對他來說，從一開始就很明白。為了將中國政權建成到1966年春天那個樣子，他付出過很大努力，而現在為什麼下決心摧毀它再加以重建？本書的研究就是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官方把文化大革命解釋成兩條路線長期鬥爭的最後決戰：一方是毛的正確路線；另一方是修正主義路線，其代表是被稱為「中國的赫魯曉夫」、「中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國家主席、毛的繼承人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期，人們認為毛一直以來都堅持他的正確路線，而劉及被稱之為其追隨者的人則始終奉行他們的錯誤路線。這種說法被紅衛兵報紙上選擇性摘編的言論所印證。但是細心觀察那些證據的人將會注意到，毛和劉的意見並不都是貫徹始終的，毛和劉並不總是對立的，許多文化大革命的倖存者，尤其是周恩來總理，曾在關鍵的問題上反對過毛，而劉則支持過毛。而那些據說是劉的支持者的人，如著名的黨的總書記鄧小平，則經常站在毛的一邊而不是劉的一邊。總之，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幾年，在一些主要問題上，中國領導人之間的相互影響是複雜的。

使用「兩條路線」這個詞意味著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在大部分問題上也確是如此。中國領導層的分裂是由於對中國革命的目的，怎樣治理中國和發展中國等問題上的不同意見。要分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必定要涉及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外交和文化問題。但是正像人

類社會中總存在著對權力和地位的激烈爭鬥一樣，文化大革命根源於原則分歧和個人鬥爭。

本項研究不在於提供一部 1956-1965 年的中國的全面歷史，而是試圖審視這一階段所發生的主要事件對中國領導人的思想和行為以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影響。文化大革命真正是一場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其主要演員都獻身於中國革命。經過 15 年的錯誤和失敗——主要是第三國際干預的結果——他們終於聚集在毛的領導下，從而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他們後來又犯過不少錯誤，也遭到過不少的失敗，但是儘管如此，他們仍然目的明確，富有自信心，更重要的是團結一致。只要看一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命運，如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緬甸等，[2] 就可以看出這種凝聚力對中國的重要性。這些國家的領導者們沒有能夠保持住曾經把他們國家引向獨立的團結氣氛。由於文化大革命，中國似乎在走同他們一樣的道路。延安時代的「圓桌」(譯按：指團結一致，不分尊卑) 破碎了，一代領導人消失了。他們並不像斯大林時代受迫害者那樣被處以死刑，但他們受到譴責，不僅由於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年代所犯的錯誤，而且由於他們一生中的行為。他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被否認了，他們畢生的工作被認為毫無價值。

文化大革命充滿人性的一方面使我在這個研究中適當的地方簡略地敘述了中國最重要的領導人的性格特徵，以有助於解釋他們在這關鍵年代中的行為。可惜的是，能作為評價根據的可靠資料非常少。有三個領導人物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我想在正式敘述之前，先對他們作點描述。他們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被當作魔王拋棄了的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反覆運動中倖存的周恩來。

毛的性格在許多方面是三個人當中最容易描述的。他向世界提供了一份自述（通過埃德加·斯諾）[3]，他並且經常講話，寫了很多文章，[4] 還是許多研究和回憶錄中的主角。[5] 所有這些資料翔實地揭示了他人格的各個方面。許多特點被認為來自他的農民出身，單純但又機敏，性格和習慣中透著樸實，言談通俗易懂，生活艱苦。他的政

敵也承認他的魅力。特別是少數人在一起活動時。[6]他的推崇者承認當他被惹怒的時候脾氣大得驚人[7]。他博覽群書，似乎很喜歡用他廣博的中國歷史知識來使他的聽眾敬佩不已。他不是一個書獃子，他一生都致力於體育鍛煉；他是個詩人，崇尚英勇品德。他樹立的自我形象，在中年時是帝王英雄，[8]在70歲以後則是儒家導師。[9]也許他智力上的特徵在於「對這一代人的共同經歷能進行正確分析」的能力。[10]但是，不論何時，他突出的個人品質在於完全的自信，這種自信與忍耐相結合，曾支持著他承受失敗和退卻。

以上幾點是一般人都同意的。當人們考慮他個人品質中相互矛盾的一面時，困難就出現了。這些矛盾使得他在不同的時期——包括本書所研究的時期在內——採用不同的政策。這些矛盾最完全地體現在毛的關於理想政體的陳述中。1957年夏天，毛第一次對他的理想給予說明，並在12年後將其寫入黨章。毛說，他的目標是將「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聯在一起。在本卷所論述的兩年中，毛強調的重點在於以上三個矛盾中的後一個，在早期敘述這些矛盾時，民主和自由是放在前邊的。強調重點在最後敘述中發生了相反的變化，這表明毛在1957年下半年接受了那種需要更多紀律的觀點。[11]

這些矛盾也滲入了毛與他的同事們的關係之中。1939年，正值斯大林60壽辰之際，毛清楚的說明了他認為需要有強有力的個人領導。他說：

> 無論是革命或反革命陣線，必須有人當領袖，當他們的司令。誰是革命陣線的司令？是社會主義，是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領袖，由於他的存在，事情比較好辦，眾所周知，馬克思死了，恩格斯和列寧也死了，如果沒有斯大林，誰來下命令呢？[12]

這段講話與劉少奇所堅持的毛雖是全黨的領袖，「他也得服從於黨」[13]的言論形成鮮明對比。但是，還應把毛的理論與其實踐作一比

較。有證據證明，他有權發表綱領性意見，但並不堅持下屬的絕對服從。正如鄧小平在 1957 年告訴青年團幹部時所說的那樣：「毛主席從沒說過他不會犯錯誤。」[14] 在毛為首的政治局裏存在著爭論，這與斯大林不一樣；而且主席的意見可以被否決。在 60 年代，毛對此逐漸不滿起來，但是，這種情況首先正是由於他自己的民主領導方法才出現的。

毛總是試圖同樣強調他的矛盾目標中的正反兩面，但他從沒有成功過。在本卷後面所出現的毛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單向的「毛主義」的毛澤東，而是在不斷改變他自己的毛澤東，他的政策變化不僅是毛本人個性的不同方面的反映，而且也是他對國內外環境變化的反應。

劉少奇是本書研究的主要人物中特徵色彩最平淡的人物。一個地位顯赫的灰色人物。那些領導人物像周恩來、鄧小平及北京市長彭真，甚至和毛一樣，都有著強有力的個人色彩。但是劉似乎緘默到了靦腆，謙虛到了不出頭露面的地步，一個受到組織大於個人原則教育的人。以至他的個性消失了。他過去的上級張國燾（張在 30 年代中期與毛的鬥爭中失去了對黨的領導權）第一次見到他時，他才 23 或 24 歲。張察覺到，許多年青的共產主義者都是熱情而富於活力，而劉「很少表現出任何興奮」。張刻畫劉「有點書生氣，富於思考，有點沉默寡言，但是明顯的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他是一個性情淡泊的人，他的步步高陞「不是憑借天賦，而是憑借踏實的工作。」[15] 劉個人對工作和事業的態度——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常受到攻擊——可以由一句格言所歸納「吃小虧佔大便宜」，這是他在 1957 年對學生提出的，他解釋說：他們要做好參加長期艱苦和忘我的工作的準備，這樣他們就有可能最終得到承認和好處。[16] 他清楚地記得自己的經歷，當他把這種哲學講給他兒子聽時，他說：

> 如果你想出人頭地，就必須首先艱苦的工作，而不要首先想到要出名，因為你越想使自己成名，你就越不容易做到。如果你根本不想出名，你就大有希望成名成家。這是馬克思——

列寧主義的辯證法。……當我參加革命的時候，從沒想到有一天我會成為國家主席，我現在卻處在這個職位上，名揚全國甚至全世界。[17]

劉的最重要的特點是勤奮，不懈的努力把這個外表上毫不引人注目的人物送到了高層地位。但是他是應該獲得這種地位的，因為他很有天賦。印度駐北京大使告訴埃德加·斯諾：

劉少奇首先給人一個平凡的表面印象。5分鐘的談話展示了這個人具有極嚴格的邏輯思維能力，能很快的看出問題的核心並能作出有力和周密的簡練回答。[18]

劉主要是在敵占區長期從事城市工作，並長期與工人在一起，表現出並發展了他的組織才能，這一點他的政敵也是承認的。[19] 當毛在40年代要按自己的想法改造共產黨的時候，之所以會選擇他做為自己主要的副手，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劉對毛是很有用處的，因為劉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裏學習過6個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知識方面打下了較為正規的基礎。這使得他成為毛強有力的同盟者以反對當時毛的那些也在莫斯科受過訓練的主要政敵。[20] 如果對於局外人來說，劉少奇關於黨內鬥爭和黨員訓練方面的主要著作冗長和重複，充滿著雜亂無章、毫無重點的句子以及對於材料的過度組織和時不時的思想混亂，他們仍給予他作為一個理論家的獨立地位。[21] 60年代中期，在中國的資產階級中流傳著一種說法：毛主席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劉少奇[22]。

不管劉少奇多麼謙虛——他的一位推崇者說，他反對那種出版他的全集的意向，至少在毛活著的時候[23]——他似乎已經意識到他的優勢。[24] 我們還可以覺察出他對於毛能夠利用形勢和性格的力量獲得黨的領導權的些許不滿。這種看法又與他的一個認識相結合，即他對毛的支持是他鞏固他自己地位的一個重要的因素。顯然，劉不能及時地稱讚毛以及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貢獻。[25] 他對毛據有「主席」的稱號顯然有保留，1942年他對他的同事說：什麼是主席？我從未聽蘇聯

人管列寧叫列寧主席！他還斷言「中國的斯大林還沒有出現！」[26]甚至在劉少奇開始頌揚毛為領袖和理論家，[27]並因此使自己成為黨的第二號人物的時候，他也不把毛放在斯大林那樣的地位。1947 年劉在一次會議上說：

> 在世界上沒有完美的領袖，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樣的，無論是在中國或其它國家。如果有這樣一位領袖，他只不過是豬鼻子裏插蔥——裝象而已。[28]

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即使劉承認毛作為領袖，因為他承認毛具有那種廣闊的視野，領袖人物超凡的號召能力以及他不可動搖的自信心，劉一定也認為他自己具有做組織工作的那種把握具體工作的耐心和技巧。沒有這些，毛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計劃就無法取得成功。因此他願意作為毛的下屬，但劉並不打算放棄其批評的權利。[29]他一直保持著這一看法，甚至在他失寵時也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多次坦白交待是有理有據地回答對他的指控，而不是使自己蒙恥的自卑。這些坦白交待表明，劉在困境中仍有勇氣和自尊在支持他[30]。

45 年來，周恩來一直是政治局委員，創造了在共產黨領導層工作時間上的最高紀錄。無論是活著的人或是已死去的人，中國的和外國的，包括毛和斯大林在內，沒有人能與他相比。在革命的年月裏，他幾乎在每個重要的事件中都扮演主要角色。除了一個例外：那就是沒有參加建黨的會議，那時他在國外。自從 1949 年共產黨人取得勝利以來他一直擔任總理，他在本世紀任何大國中擔任政府首腦的時間最長。確實，他長時間在領導層工作使得他的地位不可動搖。[31]

周成功的秘密看來很簡單：他有巨大的能力，無限的魅力以及使不完的精力——在他 70 歲的時候，在那極為混亂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他似乎能夠連續地通宵達旦地工作。但是周與毛的關係也許同他那歷久的資格一樣同樣能解釋在這兩個人 38 年的共事中他始終處於顯赫地位的原因。毛周之間的密切關係似乎是在長征時建立起來的。在那

以前，兩個人在政治上是對手。在江西蘇區，周取代了毛負責軍事事務，而蘇維埃主要是由毛建立的。當國民黨的進攻再也難以抵抗時，據有些材料證實，正是周發佈了開始長征的命令。

1935 年 1 月，長征中的紅軍部隊在貴州遵義停了下來，在那裏召開了一次高級會議。在會議上，那些犯有軍事錯誤從而使蔣介石能夠把共產黨人趕出江西蘇區的人受到嚴厲的斥責。[32] 毛領導了這次批判，其主要目標是周恩來。從事後的情況來看，周在這場激烈爭論中採取了比其他被批評的人更為靈活的態度，周作了徹底的自我批評，可能提出辭去共產黨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在這次會議上，毛取得了主席的職位，但保留了周的副主席職位。在他的新崗位上，周顯然實際上執行著與從前一樣的職責。也許由於周是自願而無任何怨言地在毛的領導下工作，毛才感到他找到了一個忠實的助手。

這段插曲顯示了周的一個顯著的特徵——當自我批評能使他仍然保留職務時，他是不願把意見分歧上升到原則高度去撞牆的。無疑，這種態度能夠解釋周為什麼能夠在共產黨的每一位領導人領導下的政治局裏工作。這又是一個紀錄。這使他受到犯有機會主義錯誤的指責。但是，指導周的行動的動機更可能的似乎不僅是保存自己的地位，還有對革命的服務。他已經獻身於革命，也決不會因為考慮「面子」而阻礙他繼續獻身於那個事業。

毛周的關係中仍然存在著一個謎。在共產黨人取得勝利之前，周常常證明自己是很激烈的革命者，但是自從取得政權，特別是在這本著作中所涉及的那些年代裏，無論是在國內或國外，他總是與那些溫和而有節制的政策聯在一起。他與處於節制狀態的毛，或者說——用文化大革命的標準——「毛主義」色彩較淡的毛的關係較好。用傳統的中國術語來說，周是陰——性格至柔，而毛則是陽——魁梧熱烈而富有男性氣息。

周在政策問題上採取溫和立場的解釋，部分地可從他個性中明顯一面中找到。毛，像其他偉人一樣，是一個有點孤獨的人，一個與別

人保有一定距離的人，他的最親密的支持者並不總是能夠理解他。[33]而劉，雖然黨的機構內有一小批人支持他，看起來總是個孤獨的人。周恩來則在與人的交往中如魚得水，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接觸。甚至在 1958 年他不再兼任外交部長之後，即使無疑有很多其它的事在等著他去做，他仍然繼續會見許多外國代表團，雖然這些代表團在外交上常常是不重要的。從他當學生時起，周就顯示出是一個天生的領導者，但是他的忠誠多半來自他的個性而不是來自他的觀點——明顯的是他從未試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理論家」，哪怕是一點點——而這也正是他為什麼能一直是個高超的談判能手。無論談判或調解都要求相互間做些讓步，周在原則上的堅定性並不妨礙他在方式上的最大靈活性，可謂「外柔內剛」。[34]

不可避免的是，一個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的人會常常妥協，也許在周的善於用人才能與其偏愛溫和政策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常常由於這種偏愛使周與毛發生分歧，而毛總感到周一定會服從他的指示，甚至當他們兩人發生矛盾的時候。既忠誠又有能力是使周能與毛結成毛一周兩人政治合作關係的原因。

為什麼是 1956 年？

1956 年發生了兩個關鍵性的事件——中國合作化的完成和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它們隨後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最終明顯地，也許是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合作化被毛認為是鞏固共產主義政權的最後一步。當合作化的完成近在眼前時，毛宣佈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並以此作為一個機會開始發動中國的兩個經濟上的「大躍進」中的第一個。[35]此後 5 年毛及其同事們花了很大力量謀求經濟上的突破。大躍進在三年 " 困難時期 "（1959-1961 年）的災禍中毫無光彩地結束了。這引發了領導層中的分歧，它使人們重新評價發展戰略，從而把毛及

其同事們放到了對立面上。此外，災難在黨內給了毛的權威當頭一棒，從而引起了毛的疑慮：他的同事們正試圖剝奪他的權力。

毛在這方面的疑慮最初看上去有些荒謬，作為中國革命的列寧和斯大林，毛處於一種唯一的，不容置疑的地位。很難做到譴責毛或詆毀他的名譽而不嚴重影響共產主義革命本身。早在 1956 年非斯大林化時，毛就開始懷疑，儘管非毛化是不可能的。毛的一些同事傾向於將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的譴責作為削弱他的地位的機會。形勢的複雜化還在於毛親自決定他將逐漸地把權力交給他的同事們以避免蘇聯斯大林死後出現的那種拜占庭式的鬥爭在中國重演。這裏人們再次可以看到毛自身的矛盾——他的讓出權力的意願和對他的同事們急於掌權的怨恨。在本項研究所涉及的十年中，怨恨逐漸佔據了主導地位，而且成為導致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因素。

蘇共二十大對中國還產生了另外一個重要影響，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以及後來的匈牙利事件，引起了毛對黨群關係的重視。中國應如何統治，這是毛 1957 年試圖通過黨的整風加以解決的問題。但由於劉少奇、彭真及其他黨的幹部在方式方法上尚有不同意見，毛隨後停止了這種作法。但是，在 1960 年，越來越關心蘇聯演變的方向時，在他看來這個問題是越來越緊迫了。

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問題的處理及提出的一些新理論，在中國領導人中引起了對蘇聯領導人的能力以及領導共產黨集團的方法的疑慮。這些疑慮不安由於 1959 年赫魯曉夫準備與美國達成協議而加劇了。從 1960 年起，中國開始譴責蘇聯願與帝國主義妥協。但是當這些責難沒有能夠使得蘇聯領導人回心轉意時，毛開始重新審視蘇聯社會，試圖理解是什麼使蘇聯偏離了毛所認為的真正的列寧主義道路。50 年代初，中國的口號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在大躍進期間，中國放棄了蘇聯經濟模式；60 年代中期，毛完成了對蘇聯社會的分析，認為必須防止中國走蘇聯的修正主義道路。因此，黨和國家需要重新建造。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毛試圖為中國開創一條新的道路，在這個意義上，它代表了一生為了中國革命而思考和工作的毛的高峰時期。但是促使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醞釀過程是從 1956 年的事件開始的。

第一編

根本變化

第一章 社會主義「高潮」

「問題是在 1955 年的下半年，中國的情況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毛澤東在 1956 年 1 月 12 日出版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中這樣說。[1] 這冊厚書[2] 敘述了毛號召各省的領導人加速農業合作化前後的農村形勢。早在 1955 年 7 月 31 日的一個報告中（直到 10 月才發表），毛澤東批評那些謹慎的領導人「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3] 並為加快合作化的速度提出了一個新的指標：與中央農村工作部制定的大約增長 55%的計劃相比較，到 1956 年 10 月，農業生產合作社[4] 的數量要增長 100%。[5]

根據 1955 年下半年農業合作化發展的實際速度，毛的指標似乎是相當保守的。毛規定在 14 個月內完成，但實際上只用了 4 個月的時間，即到 1955 年 11 月底，這一指標就完成了。[6] 當毛在 7 月做報告時，還只有 1690 萬戶農民加入了合作社，但是到 12 月 27 日他在序言上簽字時，數字則超過了 7000 萬戶。[7] 中國 1.1 億農戶中有 60%以上的農戶帶著他們的土地、勞動力、牲畜和農具加入了合作社，將其交給集體經營。幾乎沒有發生蘇聯合作化期間所發生的暴力、抵抗和騷亂，[8] 延續了幾個世紀的中國農村所特有的以戶為單位的農業制度，在幾個月的時間裏就被掃蕩了。據毛說：「這一年過去，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9] 這就是他所指的「根本變化」。毛在 1 個月以後說明他指的是政治形勢的根本變化。他宣佈，只要再有 3 年的時間就可以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革命。[10] 1 月 30 日，周恩來總理再次強調了毛所做的估計的含義：「在兩條道路的鬥爭中，誰勝誰負的問題，即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勝利的問題已經確定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

說：『我們國家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11]（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在農村

為什麼毛認為這個變化是根本性的呢？這可以從他關於合作化形勢的講話的國內背景中找到答案。到 1955 年 7 月，共產主義制度已在整個國家牢牢確立。土改[12]和 1951-1952 年的鎮反運動已經有效地摧毀了舊的國民黨權力機構，中國共產黨已經把它的權力延伸到了整個農村。思想改造運動和五反運動使中國共產黨在 1952 年底在城市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中建立了統治。[13]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對遭受了 12 年國內外戰爭破壞的經濟恢復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儘管政府在兩年半的時間內不願意公佈五年計劃的確切項目，但是它是在准備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14]在 1954 年的秋天，新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憲法[15]建立了這個政權的正式機構，對毛澤東的許多或者說大多數高級同僚來說，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已經鞏固了。他們的態度也許正如劉少奇在 1954 年底所作的總結中說的那樣：「我們現在已經基本完成了社會改革的各種工作，而開始進入了一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16]在劉和其他領導人投身於合作化的長期目標時，他們顯然不相信合作化的加速完成是保證政權的穩定和取得其他成就所必不可少的條件。他們記取了在蘇聯集體化期間所發生的事情的教訓，他們擔心在中國加快合作化的進程會失去農民的支持，以及伴隨而來的分裂會破壞他們的經濟發展計劃。[17]

但是毛的想法卻不同，在 7 月講話中他預言如果私人農業被允許存在下去會引起的可怕後果：

> 現在農村中存在的是富農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樣的個體農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

> 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於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於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將對我們不滿，因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話，就永遠不能滿足這些農民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和農民的聯盟能夠繼續鞏固下去嗎？顯然是不能夠的。[18]

總之，如果現在的形勢繼續下去，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天然同盟軍就會不滿意，而其潛在的敵人將會增強力量。

這個政治問題是與控制剩餘糧食的需要密切相連的，這將是實現工業化計劃的關鍵——因為它是進口機械產品的支付手段，是輕工業的原料，也是日益增加的城市工人的食糧。俄國和中國兩個國家所提供的事實表明，集體化能夠使收購糧食的工作簡單得多，除此之外，它還證明被貧農控制的合作社將比個體經營的資本主義富農願意更多地上交剩餘糧食。[19]

在毛澤東作報告時，農業問題的另一個關鍵是生產。如果農業生產沒有很快地增長，那就沒有多餘的糧食可供上交。事實上，很低的農業產量已迫使計劃部門官員削減了他們原來制訂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標。[20] 毛用已經建立的80%的合作社的成果證明合作化能夠幫助生產增長（顯然他認為蘇聯的經驗太糟糕，不宜於引用）。他說，如果中國共產黨對自己和群眾會把合作化推向前去沒有信心，那末在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將是不可能的。如果在這段時間內不能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那麼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就不可能實現。換言之，毛認為合作化是完成這個政權初步目標的必要的先決條件。正如陳伯達後來對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體會議的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我們不能夠把一隻腳踩在社會主義工業的基礎上，而另一隻腳卻踩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21]。

雖然毛澤東確信合作化的重要性，但是沒有跡象表明在 7 月份他期望他的講話會使「根本變化」來得這樣快。當他 5 個月後寫他的前言時，他的設想仍然是保守的，他期望能在 1956 年完成把農業改變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轉變，而初級社向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本書中稱合作社））[22] 的轉變則要到 1959 年或 1960 年才開始。

甚至在序言發表兩星期後提出的《農業十二年發展綱要》也僅要求到 1958 年基本完成合作化，[23] 這已是再次把時間表提前了。實際情況是，1956 年 6 月，有 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到這一年的 12 月，則有 88%的農戶人了社。[24] 合作化是毛個人的勝利。他不顧他的一些最高級同僚的意見和黨的農村工作部的計劃，在 1955 年 7 月 31 日的講話中掀起了「高潮」。他越過中央官員，向各省的領導人呼籲，這些省的領導人再一次顯示黨的機構的極高的組織能力。為了保證省的領導人不受農村工作部思想保守的官員的制約，他在 1955 年夏派了兩個久經考驗的助手任這個部的副部長。他們是他的前任秘書陳伯達和陳正人。[25] 在毛對他的同事表示他決心加速合作化的意圖之前，[26] 可能已經就他們的任命作出安排了。1955 年 10 月，陳伯達向六中全會提出了政治局關於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

到這時，大家已明確「高潮」已出現了，雖然在之後幾個月的時間內，它的程度才慢慢開始變得明顯。其證明就是政治局做出推進毛 7 月份提出的目標的決定沒有被全會接受。[27] 毛自己感到有足夠的信心批准發表他的講話，並向全會說明：進行合作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最近取得的四個勝利之一。

> 在過去幾年裏我們在以下四個方面獲得了勝利：反對唯心主義，宣傳唯物主義；鎮壓反革命；統購統銷糧食；進行合作化運動。這些運動都帶有反對資產階級的特點，給資產階級以重大打擊。反對唯心主義的鬥爭要繼續進行一個很長的時間。[28]

面對這一勝利，那些在合作化問題上反對毛的人不得不承認錯誤。在全會的最後一天，劉少奇以如下的話作了自我批評：

> 幾年前，我沒有這種思想，在土改後除了廣泛地發展勞動互助組，要用一些時間普遍地發展合作社。結果，我沒有提倡和認真地研究這時出現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化運動，這是錯誤的。[29]

劉 1955 年在他主持的會議上接受副總理、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提出的把現存的 67 萬個農業合作社解散 20 萬個的建議，劉可能對此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樣，也作了自我批評。[30] 幾乎可以肯定，促使毛通過 7 月的講話介入此事，並給農業合作化運動一個新的推動力的就是這個決定。

劉少奇用「也」這個字暗示另外一些主要領導人也因他們對於合作化冷淡的態度而進行了自我批評。這些人可能包括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農業部長廖魯言。這兩個人在年初都主張謹慎地進行合作化。[31] 一些高級官員也公開暗示他們犯了錯誤。這些人是：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國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副總理兼上海市市長陳毅。[32] 這三個人和李富春在次年的「八大」上都被提升進入政治局。在六中全會上鄧子恢受到毛的批評，但他當時似乎沒有公開做自我批評。[33] 他沒有參加 1 月 25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這次會上是農業部長、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廖魯言提出了《農業十二年發展綱要》。[34] 鄧子恢後來在 1956 年 9 月召開的「八大」上作了自我批評，但這已為時太晚，這使他未能像別的副總理那樣進入政治局。[35] 他之所以能保留副總理和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領導職務，可能是由於過去與毛關係密切的緣故。[36]

在城市

毛的反對者在合作化問題上的自我批評，並不是唯一能夠證明到 1955 年 10 月，他的觀點已被公認為正確的。加速工商業的國有化是另一個跡象。在全會上已經討論了工商業應怎樣對農業合作化高潮做出

反應。不久，中共中央領導著手使中國的資本家有進行大規模合作化的思想准備，以與已經在農村興起的合作化高潮相適應。10 月 29 日，毛澤東邀請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成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一起討論這個問題；500 多人參加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周恩來總理以及第一副總理陳雲在會上講了話，全國工商聯的主席和一些知名人士也發了言。[37] 11 月 1 日，陳雲在中央統戰部召集的一個有 1000 多工商業者參加的座談會上講了話。[38]

可能是在這一次會議上，毛澤東 10 月 29 日的講話被作為「指示」向 174 名工商聯執行委員傳達了。同一天，他們召開了一個為期三周的會議，這是自 1953 年 10 月以來的第一次會議。在這個全國工商聯會議上，始終出席了會議的陳雲和陳毅副總理都發了言，後者可能是以中國主要的資本主義堡壘——上海市的市長的身份參加的。[39] 全國工商聯主席陳叔通告訴執行委員會說，新的合作化和生產高潮正在改變經濟面貌，並且和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國有化被稱之為社會主義改造）有重要的聯系。如果工商業者不去加緊這個改造，他們就不能夠適應新的形勢。他還說，在改造過程中，「必須改變資本主義的經營作風」，確立為生產和消費者服務的思想，雖然他這話的確切含義並不清楚。[40] 在這次會議結束的時候，一位副主席總結說，這次會議已完成了促進工商業者以積極態度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任務。[41] 一封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給全國工商界的公開信在最後一天被通過了。信中號召在接受改造方面要加快步伐。[42]《人民日報》的社論論述了這一信息。[43]

11 月 16 日至 24 日，中共召開了關於私營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會議，雖然當時未公佈舉行會議。[44] 劉少奇在會議的第一天講了話，他的講話描述了國家在毛澤東關於合作化的講話發表以後出現的不穩定狀況：

> 現在，有許多資本家的情緒很不安，小資產階級、農民的情緒也不安。在中國，6 億人民中有 5 億多正處在一種情緒不安的狀態中，他們不知道應做什麼，感到掌握不住自己的命

> 運，其原因就是我們現在要改變兩種所有制和廢除兩種私有制。要把農民的個體所有制改變為集體所有制；要把資本主義所有制改變為國家的全民所有制。這一要求引起了除工人階級以外的全國所有人的憂慮和不安。[45]

雖然這些話，像該次講話中的另外一些話一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用來攻擊劉少奇，但是，他只是描述了這樣一個盡人皆知的國內狀態，顯然他並沒有用他對這種狀態的估價去提倡放慢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相反他強調當前社會主義化運動的重要性——轉為公私合營將打斷資本家反抗國有化的脊樑骨，並且使轉變為國家所有制更易完成。因此，劉少奇提倡階級鬥爭以保證在現在的緊要關頭獲得勝利：

> 限制資產階級的決定因素是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它將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最後，當國有化宣佈的時候，所有的資本主義工業和有關的商業都要國有化。那時，幾乎可以說鬥爭將不存在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因此，到宣佈國有化的時候，將不再強調鬥爭。那時，我們將不再說有嚴重的鬥爭。但是，我們把現階段的鬥爭看作是一場嚴重的鬥爭。我們把公私合營看作一場決定性的鬥爭，看作一場淮海戰役……在我們和資本家鬥爭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誰勝誰負？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農業合作化和手工業合作化誰勝誰負的問題解決了。[46]

劉少奇還強調了工商業者的技能對國家的重要性，希望在這場社會主義改造的「淮海戰役」[47]中得到工商業者中進步人士的幫助：

> 一些資產階級分子是非常能幹的。他們能夠比我們共產黨員和我們的同志把事情辦得更好。他們相當一批人是精明強干的，並且擁有技術知識。當資產階級分子得到正確的監督和改造以後，他們管理我們的工廠會比我們共產黨人管得更好。這是完全可能的。[48]……在資產階級分子中，在他們的妻子兒女當中，有一批贊成和宣傳共產主義的積極分子。這些積極分子

是極其可貴的。在我們當前的鬥爭中，在我們目前所處的階級鬥爭形勢下，他們極為有用。他們的功績，可以同戰爭中參加一次大戰役相媲美，他們就像戰爭中的英雄。……為了奪取資產階級的堡壘，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首先是積極分子，會舉行支持共產主義的起義……資本家的妻子晚上回到家裏說的一席話，作用比兩位姓陳的副總理〔即陳雲和陳毅〕還大，必須看到她在這方面的作用。[49]

開過中央委員會會議之後，12 月初，毛澤東到上海作了一次不公開訪問。陳毅市長為他安排會見了大約 80 位上海實業界頭面人物。據其中一位回憶，毛對與會者說，他想聽聽他們的意見：

毛首先讚揚了過去幾年「民族資產階級朋友們」所做的巨大貢獻。他接著說：「現在我從北京來徵求你們的意見。」他說，許多工商業者一直在請求說，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應當加快進行，「他們怕民族資產階級在走社會主義道路上會落後」。

毛說：「我認為不能同意這種看法，但我對這個問題還不十分瞭解。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我只帶了兩個耳朵參加這個會，如果你們希望我講更多的話，那是會失望的。」[50]

會上，所有發言的工商業者都贊成加速國有化的轉變，一些人說，轉變可能只要 5 年時間。據報道，毛在聽取了兩小時的發言之後說，他會認真考慮這個意見；但他始終感到在下決心加速改造之前，必須仔細考慮如何妥善照顧「民族資產階級朋友們」的利益。[51]

在這個時期，在 1955 年 12 月，完成私營工商業改造、實現公私合營的預定期限是 1957 年。根據後來的（含有敵意的）一個記載，「表面謹慎」的陳雲「趕忙」召集全國省委書記會議，下達了這個期限。顯然，他是整個改造運動的負責人。然而，如果說這個活動有些匆忙的話，那很可能是由於沒有料到的農業集體化的發展速度造成的。因為儘管這個記載的作者暗示陳雲試圖推遲轉變，但實際上毛本人在 12 月 6 日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一次講話裏，也贊同把完成改造的期限定

在 1957 年。[52] 同合作化的情形一樣，毛的設想似乎被事實超過——確切些說，是被北京市委超過了。

12 月間，一些工業城市舉行會議，宣佈將於 1957 年完成所有制的轉變。這大概是陳雲把正式的日程表傳達給他們以後發生的。到了 1 月 3 日，《人民日報》社論重申：「在 1956 年和 1957 年兩年內，將基本實現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53] 這家報紙指出，12 月初，當工業中有 30 多個行業被批准按行業實行改造的時候，國有化的過程就加速了。這 30 多個行業包括了主要是在中國 6 個重要工業城市裏的 2000 多家企業。在這 6 個城市裏，擁有 3000 多家商店的十幾個商業系統也被批准改造。只有一個城市，北京，領悟了這些早期成功的教益。

早在 12 月 16 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告誡人們不要在加速改造的運動中盲目合併的文章。然而也就在同一天，北京市委的幹部會議在 5 天的討論之後，提出一個「初步」計劃，號召為在 1956 年底完成向公私合營的轉變而奮鬥。[54] 到了 1 月初，武漢也在考慮比陳雲規定的速度更快些的可能性，並且預言也要在 1956 年完成轉變。[55] 在北京，所有的工商業都在 1 月上旬改造了，緊接著，手工業在 11 日和 12 日完成了改造。公眾對於這種突然的改造毫無準備。起初，這大概只意味著換換招牌——僅僅是私營企業換上公私合營的招牌[56]——但也存在著「盲目合併」的情況。北京市立即於 15 日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慶祝改造勝利，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出席了集會。[57]

一位上海工商業者後來回憶說，毛同他和他的同伴們友善地交談剛過了幾個星期，市裏的領導人就通知工商業者，必須在 6 天之內完成改造。[58] 就在北京集會慶祝的同一天，上海工商業者開會討論北京的改造方式，並且同意在 20 日提交申請改造的報告。[59] 但在第二天，一位上海市委負責人在幹部會議上說，市委認為改造應該在 20 日完成。[60] 其他工業城市也受到北京所獲成就的鼓舞。這樣，到 1 月底，公私合營在中國主要的工業城市中已基本完成了。[61]

陳雲大概不欣賞彭真（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和第一書記）的高超組織能力，甚至毛澤東也在私下裏諷刺北京市那種做法。[62] 陳雲後來告知全國人民代表：「一下子批准轉為公私合營和合作化並不意味著改造的完成，而僅僅是開始。改造中還存在著必然解決的問題，有待我們一個一個去解決。」[63] 在北京，這些問題與工業化程度更高的城市上海比較，相對來說還簡單一些。[64] 但北京提出了挑戰，上海便不能不對此應戰。對已經發生的情況，陳雲在全國人大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 政府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原來是安排於兩年內分期分批按行業進行的，但在今年 1 月，社會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達到了高潮，政府改變了原來的計劃……這個改變對於跟上時代的要求是必要的。可如此之快的結果，使許多部門和地區沒有時間去總結引導整個行業參加公私合營的經驗，所以在慶賀改造的陣陣鑼鼓聲中，許多地區的一些工廠、手工業品商店、雜貨店和運輸業相繼合併。其中有一些是不該被併入的，一些可以合併，但規模太大了。[65]

規模過大不是加速公私合營改造的唯一結果。供應、生產、市場被打亂了，經過反覆考驗的管理方法一夜之間被拋棄了，產品種類下降了，商店營業時間縮短了，造成顧客的不方便。[66]

在全國工商聯主席告訴他的同事，改造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方法必須改變的 3 個月後，1 月 30 日，周總理在設法阻止進一步混亂的努力中，向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說，原來的生產管理方法，不得「輕易地」改變，好的方法必須作為「歷史遺產保留下來，並傳下去加以發展」[67]！2 月 8 日，經陳雲解釋後，國務院決定，「私人企業自批准合營後，一般應按原來方式繼續經營 6 個月」。[68] 當時，有秩序的改造過程已被打亂，但陳雲至少堅持了一種可獲喘息的餘地。

社會主義改造和合作化表明，高潮一旦開始，要控制它是不可能的，甚至毛澤東也無力去抑制下級的幹部。他們如毛澤東所理解的，

怕被指摘為右傾。[69]毛澤東曾在六中全會上說，他認為企圖在 1956 年內實現 80%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是「左」傾，[70]但最後，80%以上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於年底完成了。於是不管毛澤東怎樣在私下裏對在北京的那一套做法有所批評和不高興（他肯定對於一個政治局委員敢於超越中央指示的精神感到氣憤）但在公開場合，他卻必須喝采。當時對這兩種情況下唯一的選擇應是剎車，就如鄧子恢一年前在合作化問題上的那種做法，然而這對毛澤東來說，顯然是難以接受的。他後來在這年年底的生產高潮中也面臨著相同的困境。

第二章 發動第一次「躍進」

毛澤東提出合作化政策雖然是謹慎的，但是他很快就抓住了基本點，即戰鬥已取得了勝利。1955 年 12 月 27 日，當他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序言時，他打算向中國共產黨及全國宣佈，這個國家社會主義化已經不成問題了：

> 現在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也不是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按行業實行全面公私合營的速度方面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已經解決了。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問題，在 1956 年上半年應當談一談，這個問題也會容易解決的。[1]

毛澤東在 1956 年 1 月 25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再有 3 年的時間，社會主義革命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完成。他利用這次勝利來諷刺他曾經的反對者們：「過去有些人怕社會主義這一關難過，現在看來，這一關也還是容易過的。」[2]

解決社會主義化的問題看來使毛澤東如釋重負。現在政權的鞏固是有把握的了，他可以把精力轉到將中國發展為現代工業化國家的更艱苦、更長期的任務上，這個目標緊緊地困擾著他，這是可以理解的。[3] 正如他所說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4] 而解放生產力就必須提高生產，以此來證明社會主義改造的正確及其必要性。

毛澤東將生產問題擺在首位。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的突破

> 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5]

雖然毛處理這個問題時比較簡單和溫和，但他所寫的序言是號召經濟上來個突擊的號角。這個突擊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1956年的「冒進」，[6] 毛號召批評那些對加速生產的可能性認識不足的人：

> 現在的問題，不是在這些方面（即各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是在其他方面。這裏有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種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面。在這些方面，都是存在著對於情況估計不足的缺點的，都應當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適應整個情況的發展。人們的思想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當然，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7] 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8]（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這個序言發表兩天後，周恩來在一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講道，中共中央已經決定「把反對右傾保守思想作為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的中心問題，並要求全黨的工作部門都開展這個鬥爭」。[9] 正如序言所表明的那樣，毛澤東現在所擔心的右傾保守主義是在經濟發展問題上，而與後來在不同的條件下引起的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毫無關係。

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

1955年11月，毛澤東在天津同15個省委書記談了他的關於農業發展的「十一條」。在這個會議上，「十一條」又被改成了「十七條」。

1956 年 1 月在北京，毛在同這些官員又談了幾次以後，將「十七條」擴大到「四十條」——這就是農業發展十二年綱要的第一個草案。當時請技術專家小組和各民主黨派成員討論這草案，參加的總共有 1000 多人。人們提出一些修改意見，並得到採納。隨後，綱要的修改草案在 1 月 23 日被政治局正式通過，這個草案遞交給最高國務會議【10】的日期是 1 月 25 日。【11】

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12】《十二年農業綱要》計劃到第三個五年計劃結束時改變中國農村的面貌。這四十條包括從交通到水利等鄉村發展的各個方面。但是最明確的指標是規定到 12 年時間結束時糧食、棉花產量的驚人增長：不同地區的糧食產量計劃增長 100%—140% 不等，棉花 71%-185% 不等，而這兩者都取決於土地面積。對綱要的意見要在 4 月 1 日以前收集起來，以提交中共中央第七次全會討論，然後作為一個提議交給國家機關和全體人民。【13】這裏需要強調一下：這個如此雄心勃勃的綱要是由毛和省級官員指定的，而他們的長處在於管理人而非農業經濟。在合作化高潮的時候，他們很可能對可能取得的成就（特別是一個目標在十二年後的規劃）過分積極了。到 1 月份技術專家被召來討論時，再想做很多重大的壓低指標的修改，由於政治上的阻力和官僚主義，是不可能的了。

早在 1955 年 11 月，大概是在關於天津工作的十七條制定之後，一些省就決定要加快完成他們的生產指標。山西、江西和山東說他們 1956 年就將完成他們 1957 年的指標。【14】其它省在 12 月也都跟著這樣做。【15】浙江省委指定的稻穀每畝產量顯示了十二年綱要的巨大影響：【16】到 1962 年【17】提高到 800 斤。在計劃公佈時，已能證明要到 1967 年浙江才能達到這個產量。【18】也許浙江的熱情反映了它要彌補浙江在 1955 年曾經是「收縮」農業合作社最多的一個省這一過失的願望，雖然毛已經免除了省領導對保守主義的責任。【19】但是，為實現十二年綱要發

動的生產運動作準備的，不僅只有省領導。12 月召開的農學家會議起草了一個農業研究和蟲害控制的十二年計劃。[20] 電話會議保證「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規定的大約 7 年時間內」[21] 使每個縣有電話網，雖然十二年綱要公佈時它只要求在 7 至 12 年時間內實現。[22] 顯然，在一月的討論中綱要被做了一些修改，但這些修改並不能使它變得現實起來。北京的些許猶豫情緒也似乎沒有傳達到各省去。在一些新年宣佈他們將在 1956 年完成 1957 年的指標的省裏，廣東號召增加 400 萬噸糧食。[23] 這就是說要在 1955 年的數字上增加 18% 以上，[24] 但結果卻只增加了這個數字的一半左右。[25] 然而儘管這樣頭腦發熱，《人民日報》仍然感到有必要在最高國務會議前夕，在一篇題為「向前看，不要向後看」的社論中攻擊一下生產計劃上的保守主義。[26]

周恩來一方面避免肯定當時各省制定的更加極端的計劃，一方面卻又在 1956 年 1 月 30 日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作的政治報告[27] 中要求 1956 年糧食增加 9%，棉花增加 18%。這個指標假如實現的話，那將意味著在 1956 年提前一年輕易地超額完成五年計劃，但是周堅決反對那些認為目標過大的看法。[28]

北京的指標對各省的影響，1956 年在福建省反映出來了，據這個省的第一書記[29] 說，這年福建省糧食增產指標是 16%，幾乎是周的數字的一倍，但當它下達到鄉一級時已經提高到 40%。既然像周總理這樣負責的領導人和像陳伯達這樣接近毛的人都準備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講到農業十二年發展綱要可以提前完成，[30] 那麼，就不應完全責備省級以下幹部。的確，周把這個綱要說成是「最低」綱要。[31] 因此，當一個鼓舞農民的全國競賽運動由農民模範李順達發動時，出現增產幾乎達到 46% 的保證也就不值得奇怪了。[32]

「多、快、好、省」

推動農業戰線的做法被工業戰線所效仿。直到 1955 年 9 月 26 日，《人民日報》還曾發表文章對落後的基本建設計劃抱悲觀態度。一個月

後，在評論 1956 年計劃的準備時，《人民日報》也一直採取了一種清醒的方針。[33] 但是，在 12 月份，當城市裏採取了加速社會主義改造的最初幾步之後，情況就根本性地改變了。國家建委主任在 12 月 25 日告訴新華社說，該部門為 1956 年制定的最新計劃比原訂的指標增加了 26%，這將意味著，1956 年要做的工作量將是 1955 年的兩倍。煤炭部宣佈，在 1956 年將完成 1957 年計劃的 96%。第一機械部聲稱，1956 年該部主要產品諸如汽輪機和發電機，機車和車輛等的產量將達到或超過 1957 年的指標。[34] 其它的部也作出了類似的預測。鐵道部長在 7 月曾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說，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一半階段，原訂的鐵路建設項目僅完成了 40%[35]。但在 12 月 22 日，他告訴新華社，五年計劃的指標將在 1956 年底之前完成。[36] 同一天，重工業部宣稱，1956 年重工企業產品的產值將達到 [原訂]1957 年 [才實現] 的 99%。[37]

在 11 月和 12 月這兩個月期間，國家計劃委員會正在制定 1956 年計劃。這個計劃在 1956 年 1 月的後半月中被修改。[38] 計委主任李富春後來說，他的部門根據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鬥爭所帶來的「新形勢，重新調整了一些不適當的指標」。[39] 大概這是在 12 月到 1 月期間發生的事情。可是，沒有採取行動來修改全部的五年計劃指標，後來劉少奇批評了這個錯誤。[40]

像農業方面的情況一樣，生產者們自告奮勇地做保證和開展競賽運動，許多部門還決定召開先進工作者大會，以便鼓舞他們那些缺乏積極性和技術不高的同事。[41] 毛制定了一新口號來鞭策他們：「多、快、好、省」。[42] 但是，李富春和計劃工作者們似乎盡了全力對生產競賽加以某種控制。有兩個情況可以證明這點：由全國總工會動員全國工人參加的競賽開始得緩慢；而且，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將毛的口號公佈。這些計劃工作者大概是導致這些遲延現象的幕後人。

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在 1 月 13 日召開了全體會議，並且通過了一項決議，為提前完成五年計劃而開展社會主義競賽運動。2 月 9 日，全總執委會主席團通過決議，開展先進生產者運動。不過這兩個決議

在當時都沒有馬上公佈。關於社會主義競賽運動的決議，直到2月29日才在《人民日報》上公佈，這已是這個決議被通過的幾個星期之後了。第二個決議的公佈的時間甚至更長。3月10日，召集了一個委員會為召開全國先進生產者會議制定計劃。[43]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委員會不是由全總主席而是由李富春牽頭領導。兩天以後，中共中央非公開地發佈了一個通知，批准全總2月9日決議。但是直到3月30日，這個通知和原來的決議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這樣，自這個決議通過之日起，已經拖延了7個星期[44]。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央已經批准了這項決議之後，到最終公佈這個決議之時，又過了兩個半星期。

毛的口號在1月13日全總決議中出現的形式是「快、多、好、省」，而在2月9日的全總決議中，它纔以「多、快、好、省」這種正式的形式出現。這表明：這個口號被賦予最終的形式是在這段日期之間的某個時候。儘管在1956年初人們就清楚地知道了這個口號，但是經歷了一段時間它才作為一個全國的正式口號。值得注意的是，在公佈1月13日全總的決議時《人民日報》所發表的社論，沒有提到這個口號，雖然提到這個口號是比較恰當的做法。這個口號最終被官方認可是在3月1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之中，這篇社論寫道：

> 把群眾的積極性組織起來以後，還必須不斷給他們指出方向，這樣才能步調齊一，收效宏大。黨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們，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就是總的方向。[45]

看來在2月底3月初，在最高領導層中，就如何加快工業發展，以便同農業的運動協調一致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到爭論結束時，計劃制訂者們已同意開展全民競賽和先進生產者運動，並同意發表毛澤東提出的口號。但他們接過先進生產者運動的領導，在準備任何旨在加速工業發展的主要計劃之前，發動了一個大範圍的經濟調查。正是這兩個月的調查，成為4月底毛澤東的重要講話《論十大關

係》中關於經濟部分的基本。[46] 但他私下已講了他的最終目標：50 至 70 年內在經濟上超過美國，[47] 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48]

第三章 開始解凍

毛相信，社會主義高潮必然要反映在一個生產的高潮中。後來生產指標的全面提高，使得人們認真制定並於最近公佈的五年計劃顯得有些保守了。但幾乎可以肯定，毛澤東是要通過正常的渠道——即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委員會、部和其他經濟組織，來領導即將到來的「躍進」的。情況既然這樣，中國就需要所有的專業人才和熟練人才，需要所有的受過教育的人才。也需要像富農這種農村活躍分子的力量，雖然這些人以前是受到懷疑的。但隨著社會主義勝利在望，這些人可視為正在中立化。這兩方面的經濟攻勢導致一系列新的「自由化」政策，這些措施很可能比斯大林在相似情況下所許可的走得更遠。這可能是由於毛澤東堅定地認為可以說服全中國人民的各個階級來支持中國共產黨為國家確立的目標。[1]

關於知識分子 1955 年 12 月，各民主黨派舉行會議並通過決議。這些決議的主題是：社會主義高潮已帶來新的形勢。這種形勢要求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2] 1 月 12 日，《人民日報》開始登載一系列知識分子撰寫的文章。這些文章提出了兩個主題：首先，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大體上是正確的，但黨的許多幹部並不打算幫助解決知識分子的政治問題，除了工作之外，不與他們聯繫，不信任他們，看不起他們。其次，知識分子的許多工作和生活條件需要改進，特別需要較高的工資和較好的設備。

所有這些都是一個大型會議籌備的一部分。共產黨中央於 1956 年 1 月 14-20 日召開了一次由 1279 名黨的官員出席的討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大會。大會的主要講話是由周恩來總理作的。他強調，在國家經濟建設中缺乏受過教育的人，並提出了中共為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人才的

作用而準備採取的措施。[3] 周聲稱：「當前的根本問題，就是我們的知識分子的力量，無論在數量方面，業務水平方面，政治覺悟方面，都不足以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急速發展的需要……」[4] 他談到，需要改正在「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現象，特別是一部分同志對於黨外知識分子的某些宗派主義情緒……」[5] 它們妨礙對知識分子的充分使用。周估計，知識分子的總數有 384 萬，其中高級知識分子為 10 萬。這個數字包括從理工科到文科各個領域在內的知識分子。[6] 周聲稱，在知識分子中只有約 40% 的人是中共的積極支持者：在其餘的人中，約有 40% 的人對中共的工作給予一般的支持，而在政治上不夠進步；大約有 10% 稍多一點的人在意識形態上是社會主義的反對者；其餘占很少比例的人，按照周的說法是屬於反革命分子。[7] 中共應幫助知識分子重新教育自己。但是：

> 用粗暴的方法進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有的人雖然在思想上堅持自己的錯誤，但是只要他並不在言論和行動上反對人民，甚至還願意用自己的知識和精力為人民工作，那麼我們在批判他的錯誤思想的同時，就還要善於耐心地等待和幫助他逐步地覺悟起來。[8]

黨在動員知識分子時的三項任務是：更好地安排他們的工作；信任他們，「使他們能夠積極地進行工作」，並且能夠廣泛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學術討論」；確保他們有較好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這種「適當的待遇」應當包括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較好的服務，較高的薪水，較優越的職務和晉陞機會，學位和職稱的授予，鼓勵發明制度的創立。[9] 簡言之，周是在說，在發展經濟中黨需要知識分子，為了爭取他們中的大多數，必須正確對待他們。他不幻想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上百分之百地支持黨，但只要他們努力工作，黨準備容忍他們這樣做。

由周恩來講這些話是合適的。第一，作為政治局五人核心組織的成員之一，他有足夠的威望使黨的官員們接受新的路線，這些官員

們本來是可能懷疑或反對這些路線的。中央宣傳部部長沒有像周那樣高的權威。第二，幾乎同樣重要的是，在處於最高領導地位的五個人之中，周比其他人更熟悉非黨知識分子和他們的態度。在抗日戰爭時期，他作為中共的主要聯絡官員，長時間住在國民黨的首都重慶。在那裏，「和藹可親，循循善誘」的周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吸引非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支持他的事業。他獲得了顯著的成功。同情共產主義的政黨——中國民主同盟的創立，應歸功於他的工作。[10] 這樣，這項新政策由周宣佈，似乎更能獲得知識分子的信任。

此外，毛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講了話，可能是為了表示他對新政策的批准。他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團結黨外的知識分子，為早日達到世界先進科學水平而奮鬥」。[11] 幾天以後，毛告訴最高國務會議，在中國，「結束落後狀況達到先進科學水平」的決定性因素，是要有足夠數量的才能傑出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關於這一點他還說，必須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12]

周恩來講話以後，接著採取了一些實際措施。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改善了；工資增加了；政治的、社會的和行政的任務減少了；工作條件改進了。[13] 一些原來沒有工作的知識分子被找了出來，並且給他們找到了工作。[14] 知識分子甚至被鼓勵申請入黨。[15] 和毛關注科學相適應，一個科學發展的規劃委員會建立起來，並且在當年晚些時候制定了一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十二年規劃。[16]

在農村

農村中，新的自由主義意味著解除對富農的壓力，以便在生產運動中調動他們的主動性，使用他們的技術。對富農政策的變化可以通過一些文件的比較來把握。在 1955 年 11 月 9 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合作社章程草案中，關於「社員」的第 11 條第 3 部分說：

> 在合作社初成立的幾年之內，不接受過去的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入社。在合作社已經鞏固，並且本縣和本鄉的勞動農民已經有四分之三以上參加了合作社的時候，對於已經依照法律改變成分的過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經多年放棄剝削的富農分子，才可以經過社員大會審查通過，縣級人民委員會審查批准，個別地接受他們入社。[17]（着重號為作者所加）

但是，在不到3個月後發表的《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的第4條中說：

> 對於過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經放棄剝削的富農分子要求入社的問題，在1956年內應當開始着手解決。解決的辦法是：(1)表現較好，勤勞生產的，可以允許他們入社，作為社員，並且允許他們改變成分，稱為農民。(2)表現一般，不好不壞的，允許他們入社，作為候補社員，暫不改變成分……[18]

幾個月內排斥原地主富農的政策完全改變了。在11月份，即使表現最好的富農也要過幾年後才能入社；到1956年1月，就只有表現最差的富農不能馬上入社。雖然這時的新合作社還不能說是已「鞏固地建立」了。當正式的合作社章程在1956年6月的全國人大上得以通過時，後一個立場就被認可了。[19]農業部長廖魯言解釋這個變化說，過去的地主富農已經孤立了並認識到了這一點，這是合作化高潮的結果。[20]

甚至農村的反革命分子也從中共中央在合作化高潮勝利後的自信感中得到益處。11月合作社章程沒有提及社員身份問題。這些章程只是說不接受「被剝奪選舉權」的人[21]。但在《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中有一個類似的條款，把他們與富農一樣看待。真正惡劣的、不思悔改的反革命要繼續受拘留，而其餘的可允許按他們的罪行以不同身份入社——雖然在1955年，進行了這個政權建立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的打擊反革命運動[22]。周恩來在關於知識分子和概括反對右傾機會主義

的四項成就的講話中，把打擊反革命的勝利作為第一項成就，並且預計在今後兩年內可以在全國範圍內消滅反革命[23]。

吸收從前的地主富農和反革命進入合作社的政策，在農村幹部和鬥爭性更強的農民[24]中並不受歡迎。這些人有如下講法：

> 黨的政策是正確的，但對過去的地主富農和反革命的寬大，會讓他們太輕易地帶著錯誤被放過去了。
>
> 我們打天下，但他們想要坐天下。
>
> 我們辛辛苦苦地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即集體農莊），而他們卻一步就到了高級社了。其餘的人害怕吸收這些壞分子會帶來麻煩[25]。

為了消除這些擔心，宣傳機關首先強調社會主義「高潮」在政治形勢方面帶來的根本變化。這個變化破壞了過去地主富農和反革命的信念。採取寬大政策又進一步瓦解了他們的隊伍。但是他們也強調了原地主富農在絕對數字上的經濟重要性：他們總數為 4000 萬或稍低於農村人口的 10%。[26]很清楚，這個政權決不會讓如此眾多的、具有潛在力量的這一部分農民繼續留在集體制外面。

生活變得更豐富多彩

全國新的寬鬆氣氛的象徵，是一場使衣著更漂亮更豐富多彩的運動。2 月 1 日，青年團和婦聯召集的一次會議決定，現在衣服流行的樣式並不反映在新生活中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豐富多彩和幸福。漂亮的衣服與資產階級的墮落並非一回事。一個時裝展覽原定於三月中旬舉辦，但參展展品如此眾多，以至於展覽不得不延期到月底才得以舉行。[27] 5 月，劉少奇對廣播電台的官員說：「電台的廣播應當與人民的思想、生活和需要息息相通。例如最近北京有許多人熱衷於各式時裝，你們不要對這種情況及其它類似的情況毫無反應……」[28]在那年的晚些時候，一位訪問中國的西方作家參加了一個舞會，舞會上的姑

娘們穿上了繡著花的裙子，有些甚至穿上了開口一直到膝上一英吋的旗袍。[29] 他從中看到了新路線的結果。

第四章 蘇共二十大與中國的反應

到 1956 年 1 月底，中共已經在國內開展了自由化的政策。出現解凍的原因，在於領導人確信它的權力已經鞏固，還在於領導人對增產運動所提出的要求進行了分析。這種新氣候的特別受益者包括商人、知識分子、富農、甚至反革命。不過，在經歷了 6 年斯巴達式的嚴峻歲月以後，可能全中國的人都歡迎這種新的氣氛。[1] 但是，國家和諧和怡然自得的一池清水，卻被赫魯曉夫扔進了一塊大石頭——他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中譴責了斯大林。多年以後，中國指出：「事實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系列原則分歧，早在 7 年多以前就開始了。具體地說，這是從 1956 年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2]

朱德在蘇聯

在 1956 年 1 月 27-28 日（估計是在莫斯科）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蘇共把蘇聯領導人最近作出的直接批判斯大林的決定告訴了所有來自共產黨國家的代表。[3] 這些代表當中，不包括中國方面派出參加蘇共二十大的主要代表、國家副主席朱德元帥和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他們當時尚未到達莫斯科。不過，即使中國領導人當時在場，他們也不會知道赫魯曉夫在批判斯大林方面究竟要走多遠。因為作「秘密報告」的決定是在 2 月 14 日蘇共二十大開幕以後，並且可能是在 2 月 25 日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以前不超過 24 小時內作出的。[4]

當 2 月 15 日朱德元帥向蘇共二十大致賀詞的時候，他已經聽到了赫魯曉夫在大會上所作的、對斯大林委婉批判的政治報告。但是，他還沒有聽到米高揚將要在 2 月 16 日的會議上對個人迷信所作的更猛烈的批評，[5]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更是 10 天以後的事。在赫魯曉夫作秘

密報告之前，出席會議的大會代表都得到了列寧在 1922 年 12 月寫下的「遺囑」的文本，列寧在這個「遺囑」裏對斯大林作了嚴厲的批評；還有一份寫於 1923 年 1 月的提議撤銷斯大林的總書記的職務的附錄。[6] 如果這個文件在朱德講話以前就已經散發，而他又看到這個文件的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在大會的發言中沒有提到斯大林，而於 2 月 9 日由毛簽署發出的中共中央向大會的祝詞中卻提到了斯大林。[7] 這份祝詞可能是根據蘇共中央 1 月 27-28 日的會議所透露的情況寫的。大概是為了防止對已故獨裁者的批判，祝詞強調了蘇聯現領導人是參與了斯大林的行動的：「蘇聯共產黨的團結和蘇聯在許多方面所取得的光輝成就表明，由列寧締造、斯大林和他的親密戰友共同培育的蘇聯共產黨是堅強的和不可戰勝的。」[8] 在政治上更為敏銳的鄧小平之前到達莫斯科的朱德元帥，可能被赫魯曉夫說服不在大會的發言中再來強調斯大林的貢獻。[9] 據幾年後周恩來說，朱元帥同意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而鄧小平卻不同意，他正確地一直等到回國聽取指示。[10]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流傳，當朱德元帥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到蘇聯各地參觀來到斯大林的故鄉，並被問到他對斯大林問題的看法時，他對曾經同意赫魯曉夫的作法感到內疚，因而未曾回答就走了。[11] 當朱元帥到達格魯吉亞的時候，鄧小平有時間向北京的同僚作報告。[12] 如果朱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內容已經表示過同意的話，那麼鄧小平的報告可能使得北京發出電報，告誡朱元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決定它的態度以前，對斯大林問題不要發表任何意見。

那則流傳的故事沒有提到的是，不走運的朱德在 3 月 7 日到達格魯吉亞時，[13] 第比利斯市的學生中正發生嚴重的騷亂，因為他們對該市斯大林大學當局不允許在 3 月 5 日斯大林的忌日舉行任何紀念活動感到不滿。學生們在斯大林的雕像前舉行了示威，並和警察發生了衝突。這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同意在 3 月 9 日舉行紀念斯大林逝世的活動。當天，曾對斯大林的逝世紀念日毫無表示的當地黨組織的報紙《東方的曙光》，發表社論稱頌斯大林的成就。[14] 很有可能，一個

高級中國領導人在第比利斯和哥里（斯大林誕生地）的出現引起了一場示威，從而迫使格魯吉亞當局迅速將他轉移。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這又多了一個原因，使北京對蘇聯處理斯大林問題的愚蠢作法感到不安。[15]

和平過渡和戰爭不可避免問題

據中國後來說，他們主要在兩個問題上反對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以及赫魯曉夫提出的有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論。當時中國關注的是對斯大林的譴責。就毛個人來說，他似乎完全被這個問題所吸引，而把其它問題擱在一邊。[16]沒有材料表明中國在1956年對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感到擔憂，雖然在1960年他們開始公開批判蘇聯的理論和政策時，把這個問題作為他們關注的主要問題。[17]

2月19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把赫魯曉夫的報告稱為歷史性的文件。社論說：「『戰爭並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這一堅定的信念，將會鼓舞千千萬萬的和平保衛者為爭取國際局勢的普遍緩和而進行堅持不渝的鬥爭。」[18]當蘇共二十大閉幕的時候。《人民日報》的社論對赫魯曉夫在戰爭與和平這個問題上對列寧主義的修改，調子就低得多了，但還是同意赫魯曉夫的觀點：

> 代表大會的決議對當前的國際局勢作了全面的分析，強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只要存在著帝國主義，爆發戰爭的經濟基礎也就保持著」，但是決議同時指出：「戰爭的注定的不可避免性是沒有的」。因為「現在有著這樣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這種力量擁有重要的手段來阻止帝國主義發動戰爭；而如果帝國主義者企圖發動戰爭，這種力量就會給侵略者以殲滅性的反擊，粉碎他們的冒險計劃」，代表大會對於國際局勢這種深刻的分析，對於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是巨大的鼓舞。[19]

1956 年，在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問題上，中國並未向赫魯曉夫提出挑戰。這表明中國的政治局對二十大關於核時代和平共處的理論問題，是一致持支持態度的。[20] 這種作法與當時中國奉行的外交政策相吻合。中國強調了緩和緊張狀態是國際形勢的關鍵。[21] 中國後來追述說，中國曾在「內部討論」中對「和平過渡」這一概念有過爭論。在赫魯曉夫看來，這種爭執是他提出的「和平過渡」新概念的必然結果。[22] 然而，中國人在 1957 年 11 月前，並未向俄國人正式提出《關於和平過渡問題上的提綱》。[23]

中共沒有公開辯論「和平過渡」問題，甚至沒有像在斯大林問題上那樣發表自己的見解，這是可以理解的。自 1954 年以來，中國一直在發展與亞洲鄰國的密切關係。1954 年 6 月，周恩來訪問了新德里和仰光。同年稍後一些時間，吳努和尼赫魯總理回訪了中國。3 個國家彼此間正式制定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亞召開的萬隆亞非會議上，周恩來成為一顆明星，使得會議的發起人尼赫魯相形見絀[24]。周恩來和解的姿態，嫻熟的外交技巧和個人的魅力，給原先有敵意的亞洲許多領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5] 中國與尼泊爾（1955 年）、錫蘭（1957 年）、柬埔寨（1958 年）和與中東的敘利亞、也門、埃及建立了外交關係，周恩來在同這些國家建交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26]

中國對亞洲中立的或不中立的國家厲行友好政策，改變了以前曾一度指責尼赫魯、吳努和蘇加諾等人為帝國主義走狗幫兇的敵視政策。[27] 如果北京發表聲明，希望在新德里、仰光、雅加達的友好政府最終將被暴力推翻的話，那麼這將會嚴重毀壞中國新姿態的信譽。[28] 那時，中國唯一所能做的，只是反覆申言自己革命的經驗教訓，強調武裝鬥爭的不可避免性。[29] 言外之意是中國經歷的事情會在世界各地重現。後來他們說，劉少奇在 1956 年 9 月八大報告中正是這樣做的。[30]

中國對斯大林的評價

蘇共二十大的直接後果，大概是使中國人沉湎於斯大林問題中，以致未能關注似乎更帶學術性的有關中國外交政策的觀點。這是不奇怪的。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使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混亂，使中國面臨著將斯大林與毛澤東的作用加以區別的特殊問題。

自3月3日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從莫斯科返回中國後，中共領導人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作出了對斯大林問題的分析。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基礎上寫的。[31]劉少奇夫人曾透露，她的丈夫參與了該文章的起草，[32]半官方中共黨史的作者，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是主要起草人。[33]後來毛澤東表示完全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34]的確，這篇文章的理論和強調用矛盾論的方法解釋斯大林錯誤的根源，都帶有毛澤東本人的印記。不到一年後，毛澤東將親自作一次關於矛盾問題的演講。[35]除了以上這些而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任何人因寫這篇文章或反對這篇文章而受到攻擊表明，中國領導人在斯大林問題上是意見一致的。

用西方評論家的話說《人民日報》文章的主要任務在於「保護共產主義嬰兒，使之不致於和斯大林主義的洗澡水一起被潑掉」。[36]這篇文章試圖恢復對斯大林的客觀評價，指出了斯大林的功績，認為他仍有資格被稱為「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戰士」。但文章也承認斯大林犯了許多嚴重錯誤，這包括鎮反擴大化、對德國進攻蘇聯喪失警惕、不重視農業、忽視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共產主義運動的錯誤指導，尤其是對南斯拉夫的錯誤決定。[37]無疑中國希望他們這種平穩公正的方式，能使非斯大林化不致成為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面攻擊的根據。後來證明這是徒勞的。該文在理論上對斯大林錯誤根源的分析也同樣是為了提出一種思想觀點，以幫助各國共產黨能全面地看待斯大林問題，而這一點則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所缺乏的。中國必須再次告訴他們，雖然，無產階級專政存有不足之處，但「它遠比一切剝削階

級的專政優越得多」。[38] 對於共產黨來說，包括蘇聯在內，不管他們是否接受中共這些分析，但文章的本身似乎是北京企圖將自己作為理論指導的泉源的首次嘗試，至少要在莫斯科平坐平起。[39]

不論中國領導人怎樣擔心這種衝擊波會影響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但對他們來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所提出的嚴重的直接問題，是毛澤東的地位和他們能從斯大林錯誤中所吸取的教訓。為了捍衛毛澤東，這篇文章指出：早在 1943 年 6 月，中共中央就已經作出了有關領導問題的決定，這決定完全反對任何「拔高個人、個人英雄主義和個人崇拜」的錯誤傾向。[40] 文章暗示毛澤東（文章故意不在任何段落裏提毛澤東）曾領導中國共產黨抵制了斯大林現在被控所犯的過失、罪行。對中共全體成員來說，這種暗示是一清二楚的，因為他們可以從《毛澤東選集》裏看到，中共中央反對個人崇拜的決議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41] 4 月 5 日文章同時肯定了打擊和孤立中間路線勢力的斯大林式錯誤做法是由其他人製造的，而且完全是在毛成為中國黨的主要領導人以前時期犯的。[42] 中共領導人所犯的其他嚴重錯誤。也是在毛澤東時期以前犯的。抗日戰爭時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王明犯的，而且據說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就糾正了。[43]

這篇文章不僅認為毛澤東沒有犯斯大林的錯誤而且還講述了領袖的積極作用。文章說：

>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領導人物在歷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黨需要有能夠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歷史鬥爭的前列，而領導人民群眾的先進人物。否認個人的作用，否認先進人物和領導人物的作用，這是完全錯誤的。[44]

在討論吸取蘇共反「個人崇拜」的教訓時，中共既得出基本結論，又得出了具體結論。他們的基本理論觀點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矛盾——社會主義制度與個人崇拜之間的矛盾——任何與此相反的思想都是很天真幼稚的。[45] 對毛說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矛盾可能存在的理論不是個新理論。早在 1937 年毛澤東就已提出過了，1952 年再

次肯定了這一理論。[46] 但這些理論觀點是同斯大林及其後繼者的理論相反的。[47] 因此，蘇聯在轉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時，這些理論觀點被刪掉了。[48] 這些理論分歧以後一直存在著。（見第 176、316 頁）

中國人從赫魯曉夫的報告中，得出了有關領導方法的實際教訓。他們強調堅持群眾路線的重要性，以避免各種各樣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這些方法曾導致斯大林脫離人民。「群眾路線」的含義是：

> 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49]

這意味著要一再反覆這一過程。在共產黨掌權以後特別需要實行群眾路線，因為：

> 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人員，由於受到官僚主義的多方面襲擊，就面臨著有可能利用國家機關獨斷專行、脫離群眾、脫離集體領導、實行命令主義、破壞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的這樣一個很大的危險性。[50]

當然，這就是斯大林所作的事，並以其無數同胞生命為代價的。對中國人來說，關鍵的問題是採取什麼實際措施，保證其黨員忠實貫徹群眾路線，避免重犯斯大林的錯誤。這篇文章說「建立一定的制度」是非常必要的。[51] 在這以後的 12 個月中建立這些「制度」就成了毛澤東主要關心的事。但文章當時就警告在應用馬列主義時不要搞教條主義。這實際上是一個命令，旨在防止只講鬥爭，不講與中間派團結的左傾錯誤的出現。[52]

4 月 5 日文章關於重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官僚主義錯誤危險的警告，對於大多數老黨員來說並不新鮮，他們銘記 1942-1944 年和 1950 年的整風運動經驗。這些運動就是要整頓他們的工作作風。主觀主義（其重要表現之一是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黨八股），[53] 是毛澤東在

1942-1944 年的整風運動中所作的幾次演講中所說的三個壞作風中的兩個。所以，中共黨員們讀到《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後，很可能猜測，它是否預示著一場新的整風運動的到來。

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的地位

文章打消了毛澤東是另一個斯大林的任何疑慮，而這一觀點不難理解。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認為，斯大林最大的罪惡是以他個人獨裁取代黨的領導，在這一過程中，他處決或監禁千萬名黨的忠誠幹部。[54] 但不能指責毛澤東負有這些責任。毛澤東表現出他能夠團結以前反對過自己的人一道工作的姿態。多年後，外交部長陳毅[55] 曾讚揚毛澤東最優秀的品質是他的寬容。陳說：

> 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什麼他（毛澤東）成了全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領袖？其根本原因是他從不積怨記仇，從不算老賬。[56]
>
> 毛澤東思想最大的意義，可以用以下事例來說明：當別人反對他，他被搞錯了時，他決不復仇並不急於澄清情況[57]。
>
> 許多人曾攻擊毛澤東，他遭受過侮辱、虐待和誣陷……，他曾被誣告為機會主義者，被撤職，留黨察看，被送到後方休養。沒人敢與他接近。但他掌權後，同志們都消除了與他的分歧，而他卻不要求別人向他道歉。[58]

這些話是陳毅在1966年8月和9月，即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說的。他可能是想制止，至少減少當時已在最高領導層中進行的清洗。即令這是他說這話的動機，但毫無疑問，他對毛澤東寬容態度的描寫的確是符合實際情況的。1956 年，中國高層領導中有周恩來、張聞天，他們在 30 年代曾激烈反對過毛澤東。曾任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李立三、王明仍是中央委員。

在處理同事和反對者問題上，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照。毛澤東堅持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的而可以團結的人，這使得中

共的領導持續穩定了 20 年。建立政權後，政治局委員中唯一被清除的是高崗。他是他自己的野心的犧牲品。他企圖取代劉少奇和周恩來成為毛澤東的副手。[59] 恰恰就是由於長期以來毛澤東一直專心致力於維護中國領導人的團結，才需要解釋為什麼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摧毀這種團結。

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劉少奇及其他領導人的主要「罪名」之一，是他們力圖（在蘇共二十大後）貶低毛澤東的地位。[60] 毛分子特別注意這一問題，說明這確是毛澤東本人感興趣的重要問題，導致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清除了他許多同事的因素之一。1956 年，毛澤東關於音樂的講話，對奴隸式地借鑒外國經驗進行了譴責。毛澤東不用文化領域的例子，而用政治領域的例子來說明這種壞影響。他提醒人們，當中共盲目追隨外國（指俄國）時，中國革命就遭殃。這是對他的同事的一個強烈的暗示：不要模仿蘇聯最近的政治措施（非斯大林化）。[61]

在外表上，1956 年春，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領導感到在毛的個人崇拜問題上需要做什麼事，他們認為只要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提出辯解就行了。幾個星期後在慶祝「五一」節時，毛澤東的肖像還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人群仍然高舉紅旗，呼喊著祝願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口號。[62] 第二年，外國來訪者有許多報道表明了人們對毛的崇拜並未減弱。[63] 在蘇聯，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摧毀並沒有在中國發生明顯的影響，這使得一位商業界人士評論說：「個人崇拜曾使斯大林形象令人厭惡，為什麼中國領導人還要搞個人崇拜。」[64] 這個評論說明，中國的知名人士並沒有感到在個人崇拜問題上，中國最高領導層對是否要與蘇聯一致行動有過爭論。

更有甚者，《人民日報》文章發表一天後，即 4 月 6 日，米高揚到達北京。毛澤東感到自己地位穩固，以至於在與米高揚的會談中，批評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毛澤東再次強調了該文的觀點，即斯大林功大於過，並堅持「對斯大林必須作具體的分析和全面的評價」。[65]

可見，米高揚到北京簽訂對中國新的經濟援助協定，似乎未能阻止毛澤東對蘇聯進行批評。

「十大關係」

在中國的解凍首先是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大規模生產運動的結果。但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不得不把黨群關係當作問題作更多地研究。1956年秋匈牙利事件後，這個問題才成為毛澤東的頭等大事，而將其餘問題暫且擱在一邊。然而，早在4月底5月初，毛澤東就已經提出了最初的政策。其目的是防止斯大林統治下蘇聯濫用權力（如秘密報告中所說的那樣）的情況在中國重演。這體現在兩次重要講話中:4月25日的《論十大關係》和5月2日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66] 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67] 表明了他對國內團結與經濟發展的雙重關係。「十大關係」中的前五個關係論述了加速工業建設問題。這表明經濟發展仍是他主要興趣所在。（本書後面將論述到這問題〈第57頁〉）後五個關係，如劉少奇後來所說，[68] 表明了毛澤東開始抓住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後一年半內，這個問題成為他關注的基本點。

在政策問題上，毛澤東認為共產黨與非黨關係，是人民內部矛盾五種關係中最重要的關係。[69] 特別是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關係。[70] 民主黨派系指8個非共產黨政黨。它們的成員幾乎全部來自資產階級，但在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幾年內，它們反對蔣介石的統治，並與共產黨合作，於1949年組成「統一戰線」。[71] 中央人民政府（這個機構當時行使國家元首職務）的六個副主席中3個非共產黨人。4個政務院副總理有兩個非共產黨人，雖然它們也很少有實權。[72] 1954年，在通過憲法以後，改組政府時，非黨人士的空頭銜也取消了。國家副主席只有一名，即共產黨員朱德。而副總理中沒有一個是非共產黨人。

展開一場關於民主黨派作用問題的討論是適時的。因為，從理論上看，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即將完成，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應該即將消滅。[73] 如果資產階級即將消滅，那麼作為這一階級的代表——民主黨派也應隨之消亡。然而，毛澤東卻另有一種想法：

> 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74]

在 8 月召開的「八大」上，劉少奇作了報告，從理論上闡明毛澤東多黨制的論斷。劉說：

> 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成員將變成社會主義的勞動者的一部分。各民主黨派就將變成這部分勞動者的政黨。由於在這部分勞動者中，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還會拖得很長。各民主黨派還需要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繼續聯繫他們，代表他們，並且幫助他們改造。[75]

然而毛澤東注重實施政策甚於理論的闡明。毛澤東指出：民主黨派的成員有時也反對中共的政策，但後來出自愛國心而支持這些政策。很清楚，毛澤東很重視讓這些「反對」意見繼續發表出來，直到鄧小平在 9 月的「八大」講話中才闡述這樣做的各方面理由。當時毛澤東只是說：

> 必須進一步改善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我們必須允許民主黨派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只要它有道理，我們就要接受而不管是誰提的。這才是我們黨、國家人民和社會主義對待不同意見的正確態度。[76]（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他在結束這問題的討論時，勸告一般同志（特別是省委書記）要抓緊檢查、改進和促進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在這一段的講話中開始實行了一項重大的新政策——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如上面加著重點的引文所表明的那樣，毛澤東並不是說，這樣一來民主黨派可以把一切批評都傾倒在共產黨員頭上。在這次講話

的其他有關段落中，他也作了這樣的保留。在談到革命與反革命關係（第八個關係）時，他反對那些責備過去（或如有必要在今後還要）處決反革命的觀點。然而，他還主張一般應進行對反革命分子的勞動改造。論述是與非關係（第九個關係）時，毛澤東強調給人們以改正錯誤機會的重要性，並應幫助他們糾正自己的錯誤。[77]

在分析到國內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第六個關係）時，毛澤東強調漢族應肅清沙文主義。他同時指出地方民族主義的存在，但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毛澤東透露在近二三年在這方面曾做過檢查，並提出應該再次檢查。[78] 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領導幹部應該有所克制。這種溫和的態度是新的政治氣候的特徵。

最後，論述了中國與外國的關係（第十個關係）。毛澤東倡導更多地向外國學習，學習更多的外國語。由於中國一直在大量吸取蘇聯東歐國家的知識，所以，毛這一倡導實際上是提倡研究西方資本主義成果和學習西方語言。中國「一窮」（工農業不發達）「二白」（現代科學文化程度低）。但白紙沒有負擔，好畫好寫。換句話說，中國能夠利用世界提供的最好的經驗教訓和技術成果。[79] 在提出這一觀點時，毛澤東表現出了中國領導人由於取得社會主義勝利而具有的自信心。現在，他們不那麼顧慮學習西方將會腐蝕人心，因而實行學習西方政策，以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然而，毛的這一倡導，大概也反映了毛澤東對蘇聯的信心有所減弱，這是由秘密報告所透露的情況和蘇聯領導人處理斯大林問題所採用的方法不當造成的。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一星期後，毛澤東遵循「十大關係」中後五個關係的基本精神擬定了一個綱領性方案，鼓勵知識分子自由發表意見。這就是他於 5 月 2 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著名講話。毛的講話發表前，中共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貫徹由周恩來於 1 月份起草的、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對待作家的新方針。中共實行的對待知識分

子的新路線政策，也許是對蘇聯文藝政策的新潮流的一種反應。這一印象來自在全國作家協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許多講話，包括中央宣傳部負責文化的副部長周揚在會上作的題為《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的閉幕詞。[80] 會議閉幕前，劉少奇給周揚及其他同事一個關於發展文藝創作的指示。[81] 劉少奇強調中國作家必須有知識有經驗。劉少奇似乎對這一要求作出了比較寬容的解釋，要他們到工廠農村，「去獲得生活的『實際』經驗……時間可以或長或短。若作家、藝術家受不了那種艱苦，他們可以坐汽車去，吃睡在車裏。」[82] 劉少奇再次肯定，中共有權在政治領域裏干預文化。但同時他規定：今後的政治性批評必須有正式文件說明黨組織的批評意見。黨員個人的批評意見，不管他職務多高，中共文藝界黨組織和作家都可以抵制。很清楚，這指示給那些大膽的作家以較大的自由餘地。但劉少奇對作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所抱的幻想並不比周恩來大。周恩來兩個月前就說過：「現在工人、農民甚至資本家對社會主義都顯示出如此巨大的熱情，而作家，作為人類靈魂的塑造者，卻正落在他們的後面……。這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83] 更重要的是，在給作家以更多自由的幌子下，劉少奇也許試圖在毛澤東干預個別文化問題時，給像周揚這樣的人以更多的自信心。早些年毛就曾做過那樣的事。[84]

3 月 8 日，即在北京舉行的全國現代戲劇節開始後不久，[85] 劉少奇對文化部黨組就戲劇問題作了指示。他同意在百花齊放原則下給戲劇和電影的演出以較大的自由，並號召發揚中國繪畫的傳統：

> 戲改不要大改，有害則改，無害不改。有些老戲很有教育意義，不要亂去改。新文藝工作者到戲曲劇團搞戲改，不要犯急性病……
>
> 世界各國的電影都要搞進來，包括美國的。一種是進步的，一種是無害的。無害的，能幫助瞭解情況的，也可以進口。美國搞鐵幕，但我們不搞……
>
> 人們喜愛中國繪畫，但一些中國畫家還沒有妥善安排……

> 我們的政策是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我們不能因為一些藝術已經很古老就不要它。文化的改造需要持久全面的努力，不可能一天之內建成羅馬。「百花齊放」，允許共存……[86]

3 月 14 日周揚在一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重申了上述指示，認為需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文化和蘇聯文化，[87] 也讚揚了傳統文化：「如果我們想要百花齊放，首先應當保存和光大民族遺產」。[88]

劉少奇和周揚在三月初就使用『百花』這個字眼，說明中國領導人在政治局有時間完成它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評價之前一段時間，就已經在打算在文化領域實行自由化政策。在這點上，目的可能只限於恢復舊政策，因為劉少奇用的術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一般作為「百花齊放，除舊布新」) 是毛在 50 年代初為定義戲劇政策而首創的。[89] 到 5 月 2 日毛澤東在講話中將口號改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候，中國領導人更加關心的是制訂在蘇聯非斯大林化的背景下，知識界的自由化政策。按周揚的說法，5 月份口號的變動是根據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判而制定的。[90] 5 月 13 日，劉少奇在北京大學向歷史系學生描述口號的演變時說了這些話：

> 百家爭鳴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了。[91] 它作為口號是首先由陳伯達提出的。後來毛主席改進了它，並把它作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還有許多事並不是毛主席先想到的，他僅僅加工改造了它們。[92]

毛自己說「百家」思想是他提出來的，劉的表述再次顯示他想貶低毛的作用。[93]

據劉看來，「百家」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反對教條主義，以防一家獨鳴」[94]。確實，當 5 月 26 日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對一群學者、作家及專家公開宣佈新政策時，反對教條主義（或武斷主義）是一個主要的議題。由於毛澤東早時的講話沒有發表——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沒有發表，陸定一的這種闡明（只稱之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成為了當時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知道他們現在有較大自由的唯一指

針。[95] 陸定一的講話應該還是很好地表達了毛的觀點。雖然文化大革命時的說法與此相反。（參見：附錄一）

陸定一解釋說，「百花齊放」適用於作家和藝術家，「百家爭鳴」適用於科學家。[96] 他指出實行這種政策的原因是如果國家想要富強，就需要文學、藝術、科學的繁榮，而要使文學藝術科學走向繁榮，雙百方針就是必要的，因為它將促進獨立思考、爭論和創作。在階級社會裏，文藝和科學是階級鬥爭的武器，但：

> 我們認為必須嚴格區分人民內部的思想鬥爭和與反革命的鬥爭……，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任何人都可自由地為唯物主義或唯心主義辯護……。我們必須鎮壓和取締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我們也應開展反對人民中間的落後和唯心主義思想方法的鬥爭。這種鬥爭也是很尖銳的，但我們在進行這個鬥爭時強調團結的目的，克服落後，使人民更加團結對待思想問題，用行政措施是不行的。[97]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提出這樣的政策呢？陸定一沒有提到二十大。但他說有四個因素：社會主義改造的決定性勝利——幾年內所有剝削階級都將被消滅；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裏陸根據的是 1 月份周恩來的報告；雖然階級鬥爭還繼續存在，但國內階級敵人已沒有多大勢力了；人民的政治和思想團結已得到很大鞏固並日益增強。[98]「雙百」政策就是用來動員所有的積極因素的，因此，它是一種在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基礎上加強團結的政策。陸定一大段引用了 1942 年到 1944 年整風時毛的動員講話，指出一些共產黨員要學會增進團結，避免宗派主義和歧視非黨群眾。[99] 他指出，自然科學是沒有階級性的，因此，給生物學或其他科學理論貼上封建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標籤是錯誤的，這一點要作為黨員的行為準則。至於藝術和文化，黨只要求它們為工農兵及知識分子服務，在題材方面也沒有限制：

> 對於文學藝術工作，黨只有一個要求，就是「為工農兵服務」，今天來說，也就是為知識分子在內的一切勞動人民服務。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們認為是最好的創作方法，但並不是唯一的創作方法；在為工農兵服務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認為最好的方法來創作，互相競賽。題材問題，黨從未加以限制。只許寫工農兵題材，只許寫新社會，只許寫新人物等等，這種限制是不對的。文藝既然要為工農兵服務，當然要歌頌新社會和正面人物，同時也要批評舊社會和反面人物，要歌頌進步，同時要批評落後，所以，文藝題材應該非常寬廣。在文藝作品裏出現的，不但可以有世界上存在著的和歷史上存在過的東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會說話的禽獸等等世界上所沒有的東西。文藝作品可以寫正面人物和新社會，也可以寫反面人物和舊社會，而且，沒有舊社會就難以襯托出新社會，沒有反面人物也難以襯托出正面人物。因此，關於題材問題的清規戒律，只會把文藝工作窒息……至於藝術特徵問題，典型創造問題等，應該由文藝工作者自由討論。可以容許各種不同的見解，並在自由討論中逐漸達到一致。[100]

至於敏感的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陸定一則不那麼明確。他只是警告黨員不要壟斷這些領域，並指出中央不會出版官方的黨史。這個觀點的宣佈是用來糾正近代史研究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

> 近代史是社會科學中極其重要的部門，但是近年來成績不多。據說，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編出一本黨史教科書來，然後根據黨史教科書來寫各種近代史。現在請你們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準備編黨史教科書，只準備陸續出版黨的大事記和文件彙編。我們的近代史學工作者，應當獨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種問題。在近代史的研究中，也應該採取百家爭鳴的政策，不應該採取別的政策。[101]

可以肯定，這是對二十大的一個直接反應，因為甚至在開幕會上，就已經出現了對斯大林主義的編史工作的攻擊。[102]

最後，陸論及批評和學習問題。他反對過分的批評，也反對軟弱的批評，並將將毛澤東的三篇與 1942 到 1944 年整風有關的最重要的講話[103]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作為典範。在學習方面，顯然教條主義是主要危險。這裏陸建議閱讀毛的上述三個講話以及 1945 年中央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些文件能使人們區分教條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陸指出教條主義曾給中國黨造成很大的危害：

> 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工作中，也有許多缺點和錯誤，主要是教條主義的傾向……教條主義，在我國民主革命時期中幾乎斷送了我國的革命，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敵。這個痛苦的經驗我們要牢牢記住。[104]

從這一段人們可以看到中國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如何把自己的經驗與赫魯曉夫的指責聯繫起來。當中國黨的領導人是一批受莫斯科訓練的人，或者是按照共產國際指示行事，並對像毛這樣的反對者採取斯大林式的壓迫方法的人時，中國黨幾乎被斷送了。那樣的結果，陸定一指出，是接近災難性的。

中國領導人還記得斯大林主義（或教條主義）對他們的革命造成多大的危害，他們也一定認識到這種教條主義對於管理共產黨國家也會有同樣的危害。當 30 年代後期毛澤東取得黨的領導權時，他就開展一場整風運動來消除斯大林主義。現在由於赫魯曉夫的揭露——儘管他可能對這種揭露的方式感到很大遺憾——毛一定已開始考慮在管理中國時怎樣能最好地清除斯大林主義。

陸定一講話給人的印象最深的，除了他總體上溫和理性的語調外，就是反覆提到 1942-1944 年的整風運動。這也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特徵。但這篇文章中只提到整風中三大敵人的兩個——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在陸定一的講話裏，除了重新攻擊教條主義外，第三個敵人——宗派主義也受到譴責。

第二個月，一個中央通知指示：縣委書記以上的黨員、高中級黨校中的黨員和高等院校畢業班學生必須學習陸定一推薦的5個文獻——毛的3個整風講話、黨的歷史決議和4月5日對斯大林的評價。目的是為了提高黨和國家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以保證勝利地完成社會主義和建設改造。[105] 這樣，到1956年中，毛澤東已制定出兩項與由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問題有關的重要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黨已開始一個學習整風文獻的過程，毛澤東可能想將這些文獻作為以後開展一個新整風運動的基礎。

第五章 毛澤東同計劃制定者的對立

在 1956 年 4 月下旬起，經濟仍是毛澤東關心的主要問題。十大關係的前五個關係涉及經濟問題不是偶然的。而且，講話前討論的情況表明毛曾打算只涉及經濟。據毛說，中央政治局用了兩個月時間聽取了 34 個中央部門關於經濟、金融問題的工作匯報。在政治局幾次討論之後，這些匯報被總結為十大關係。[1] 但很難相信關於財經的匯報能夠對十大關係講話的後半部分產生重大影響。很大的可能是，後五個關係是毛澤東根據蘇共二十大的發展考慮應採取何種措施，並與他的同事討論後形成的。然後這些想法被加在了一個在工業方面相當於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的講話中。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論十大關係》讀起來不像 1957 年 2 月毛澤東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那樣連貫。後者也全面論述了全國事務，但它是接下來 10 個月思考的產物。

毛的十大關係講話中有關經濟的章節表明，他（從講話的起源來看，還包括政治局的大多數成員）不滿意經濟計劃者所推行的一些重要政策，這些不滿後面隱藏著對工業發展速度的不耐煩。計劃者沒有因工農業在社會主義化方面取得勝利而提高五年計劃指標，這使毛、劉惱火。毛在講話中試圖找到加快工業發展的道路。這個講話證明，4 月下旬生產運動明顯地還在開展，毛仍然認為可以對李富春等計劃制定者施加壓力。

很可能由於毛的不滿，5 月 12 日建立了國家經濟委員會，負責年度計劃的制定。這個委員會應該是模仿蘇聯的一個同樣組織（國家經濟委員會）建立的。後者是一年前建立、用以削弱蘇聯長期計劃者權力的一個組織。[2] 如果中國國家經委的組建完全是為了計劃的原因，那它在蘇聯同樣組織成立之後不久就建立是很自然的事。但在 1955 年

5 月，中共大概認為並不需要兩個計劃組織。一年後，由於長期計劃者的靈活性不夠，毛可能認為蘇聯將計劃者分成兩部分的做法是有好處的。很可能毛希望在兩方面繞過國家計劃委員會：在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這樣的長期計劃中樹立高指標；國家經委則為達到這些指標制定高的年度指標。這樣，五年計劃所制定的中等指標就可以被繞過。

如果這是毛的意見，那麼第一個被選作國家經濟委員會負責人的就不是一個適當的人。薄一波和劉少奇有很久的關係[3]，劉有可能因為薄是能受他影響而贊成加速經濟發展的少數高級經濟官員之一而舉薦了他。隨後一個時期，在不同的政治氣候裏，薄的確認為宣傳全面的經濟發展對自己是有利的。[4] 但在 1956 年，薄一直被認為是領導人中比較謹慎的，因為他的長期經濟工作經驗使他這樣認為。[5] 1956 年他在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揭露了由於經濟發展過快引起的基本建設問題，批判了冒險主義。[6] 這時，計劃者看來是團結一致的。雖然他們沒有能抵制毛澤東的所有要求，但他們確實成功地控制了工業形勢。

把十大關係講話中前半部分（關於經濟問題）的準備與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的準備相對照是有必要的。後者是毛和各省的官員設計出來的，專家只是在決策的後期才參加的。至於十大關係，則是政治局作為一個整體在與中央各經濟部門（雖然省的官員也提過意見）討論的基礎上提出的經濟建議，[7] 它遠沒有十二年綱要具體，它只涉及到原則問題而沒有詳細闡明確切的指標。這些不同表明毛澤東知道自己對於工業的知識遠比農業少。[8] 也可能是他認為：他必須在蘇聯工業化模式的框子裏活動，這種認識直到 1958 年大躍進時才最後被丟棄。

困難中的生產競賽

毛澤東為何對工業的指示比對農業的指示要一般化還有另一個原因。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制定於生產競賽開始之時，還沒有碰釘子。實際上，就是這個綱要的出現喚起了過分的熱情，而這些過分的熱情

又導致了後來的困難。毛向工業發指示的時候生產競賽已開展了 4 個月，此時問題已很明顯了，因而要制定一個有著具體和過於樂觀的高指標的工業綱領是不可能的。這些問題在經濟部門給政治局的匯報中大概已經提到，其中許多問題也在報刊披露過。

早在 3 月 13 日《人民日報》關於工業管理的緊急任務的社論中，已經談到生產部門之間失去平衡、原材料和半成品供應脫節、計劃有失誤、生產質量差、原材料積壓太多等。社論要求企業管理者正確引導群眾的生產熱情，用「保持生產穩定持久的發展以取代一陣風的作法」[9]。三天後報紙批評了負責輕工業的官員和管理者，因為他們只追求增加產量，忽視質量和種類。[10] 3 月 18 日報紙社論要求工業領導人「根據實際情況工作，不要簡單地提出形式主義的提高生產口號」。[11]

農業形勢看來更為嚴重，因為十二年綱要已經提供了一個額外的刺激。前已提到，綱要草案關於農業的意見必須在 4 月 1 日以前收齊，以便能在黨的七中全會上討論。收集的意見明顯表明綱要已經起了像一支腎上腺激素的作用。4 月 4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佈了一個勤儉辦社的聯合指示，其目的是為了解決由於誤以為十二年綱要只要「一揮手就可在二三年內完成」而造成的鋪張、浪費，以及濫用人力的現象。[12] 通知指出，當農民處在熱情中時，可能還不在意俱樂部、辦公室和新房子的建造，以及為文化娛樂目的購買大量貴重設備所造成的鋪張，但當秋後算賬發現收入因上述投資沒有增加甚至下降時，他們將會很不滿意，其生產熱情就要被挫傷。通知還全面地批評了在文化和福利方面花費過多的勞力財力，同時還批評忽視副業和制定不切實際的生產指標。關於這個聯合指示，4 月 6 日《人民日報》社論闡述道：

> 近幾個月，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反對保守主義的鬥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可是，一定要防止並且反對濫用和歪曲這個口號，防止和反對把它變成強迫命令的工具，變成某些個人主義者出風頭的手段。[13]

提出反對保守主義的口號已被歪曲，這是一種新的批評方式。那些要在生產中鋪張浪費的官員——如那些忽視質量和品種的官員——被指責為保守主義本身！[14] 顯然由於他們還沒有為這種不能令人心服的譴責所嚇倒，所以需要提出一種新的批評來影響他們。

儘管在農村有這些困難，毛還是不願意看到十二年綱要被擱置起來。在 4 月底 5 月初的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上，劉少奇稱這個綱要是「偉大的」[15]，甚至保守的鄧子恢也不得不加以讚許。[16]

在經濟部門給政治局作工作匯報時，毛一定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這些問題了。毛可能因為這些問題限制了發展而感到惱火，因而他在 4 月份在財經問題上與陳雲發生了矛盾。這也許發生在十大關係發表前的一次政治局討論會上。據說毛和陳雲在財政部的職能問題上意見不一致。負有監督財政部責任的陳不接受毛批評財政部只注意控制行政管理費用而忽視經濟投資的問題。陳說：「只強調小事忽視大事是錯誤的，但只注重大事不注意小事也是不對的。大小事都應注意。」[17] 這個引文含義並不完全明確，但似乎表明爭論是關於經濟競賽中需要緊縮金融的問題。陳雲爭辯說，不考慮具體的財政後果而只宣佈經濟指標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後來首先對急躁冒進發起公開攻擊的是財政部長李先念，這是很重要的。

這種攻擊直到 7 月中旬才發生。4 月下旬，在匯報和討論的基礎上，毛一直感到可以提出十大關係並向 4 月 25 日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建議如何加速工業發展。該講話經濟部分的主要目的就是改變投資政策。在李富春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煞費苦心地作長篇說明後 10 個月，毛在兩個關鍵問題上不同意他的論斷：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的投資比例和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投資比例。毛贊成對輕工業和沿海工業多投資，因為它們得益應該會更快。他也要求將資金從國防轉移到經濟發展上來，在這點上李富春可能是歡迎他的干預的。為刺激工人多生產，毛贊成提高工資。[18]

重工業和輕工業

在解釋五年計劃的講話中，李富春說將工業投資的 88.8% 分配給重工業、11.2% 給消費品工業，部分是由於重工業的基礎特別薄弱，而輕工業則有著很大的潛力。他堅持輕工業的發展應更多地依靠農業原材料供應的增長而不是依靠投資，原材料不足是輕工業能力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如果一個好收成能提供超出現有設備所使用的原材料，就可以考慮更大地發展輕工業。[19] 值得注意的是，李富春的報告（應該是與他的蘇聯經濟顧問商量的結果）是馬林科夫被解職幾個月之後的事，而馬的錯誤之一就是在損害重工業的情況下強調輕工業。[20]

對這一問題毛以和解的語氣說道：

> 重工業是重點，它的發展應放在優先地位，對此我們都同意。在重工業和輕工業、工業與農業之間的關係上，我們沒有犯原則的錯誤，我們沒有重複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失誤，他們在損害輕工業和農業的情況下過分強調重工業的重要性。[21]

他說，日常必需品不豐富，但也不是供應短缺。但他繼續說比以往更多地注意輕工業和農業並增加對它們的投資是必要的，這並不等於可以削弱重工業的關鍵地位。他爭論道，事實上，如果真正想發展重工業，就應增加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因為這些投資給重工業帶來的資金要比直接投在重工業所產生的更快更多，「因為日常必需品產量越多，資金積累就越多」。[22] 毛沒有涉及李富春提出的輕工業依靠農業收成的程度要大於依靠投資的程度，和輕工業還有潛力沒有發揮的問題。他大概已經假定合作化的完成定能保證更好的收成，而 1955 年的好收成無疑也使他受到了鼓舞。

沒有跡象表明毛的更多地投資於輕工業和農業的號召在會上引起了爭論。這個觀點也是對正統的斯大林式的工業化模式的第一個重要的抨擊，而到那時中國計劃者們還一直把它當作自己的模式。

這樣，毛的言論至少引起了一些混亂，雖然直到 18 個月後的大躍進中毛澤東才徹底地放棄蘇聯了的模式。總之，在 1956 年夏季，毛的

主張至少部分地得到了貫徹：在 6 月 18 日，李富春在全國人大上宣佈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例將從 8 ： 1 變為 7 ： 1。[23]

李向全國人大表示自己對五年計劃的變動不很滿意。在報告了計劃的當前執行情況之後，他轉而談到自己對三個問題的個人看法。[24]

他先談到了重工業與輕工業的問題。首先，他承認了毛的論點的正確性，即改善人民的生活是必要的，輕工業的確可以更快地積累資金，對此他甚至找出例子來論述。但他又回到他前一年關於原材料重要作用的觀點，舉出統計數字說明過去好的收成曾怎樣決定輕工業的增長率。[25] 在這樣論證五年計劃的原比例是合理的以後，他說，隨著合作化的完成，輕工業就可在農業生產加快發展的基礎上加速發展。然後，他又由個人身份轉為官員身份，宣佈國家決定當年和下一年要改變投資比例，「假如輕重工業的建設規模同時增長的話」。[26] 然而，他並沒有認可增加農業投資的必要性。

李的讓步看來並沒有足夠地說服他那些想必受蘇聯模式影響較深的下屬，使其很容易地接受增加輕工業投資的決定。三周後《人民日報》在解釋這個新方針時，提出了在計劃者頭腦中出現的疑問。它寫道：

> 既然社會主義工業化要求優先發展重工業，而我國目前，輕工業產值仍是全部工業總產值的一半以上；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不更多地增加重工業的投資比重，使它迅速佔優勢，反而把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例由 8:1 改變為 7:1 呢？為什麼說它是必要的和符合於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利益的呢？[27]（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社論用毛的話回答說：改善人民生活是必要的，對輕工業的投資也將為重工業更快更多地積累資金。

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

毛講的第二個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是與第一個關係有聯繫的。李富春 1955 年在他的關於五年計劃的講話中認為，過去工業的地理分佈很不合理，國家工業總產值 70% 來自沿海省份。他宣稱，按照原料、燃料的產地和消費地區的情況，根據加強國防和落後地區的需要，使工業分佈到全國是必要的。[28]

在這個問題上，毛再次採取和解態度。儘管沒有發生根本性錯誤，但是「最近幾年我們對沿海工業沒有給予足夠注意」。[29] 雖然毛並沒有要回到加強沿海工業的政策上去，但他的確要求把新建重工業的 10% 建在沿海地區。他認為，沿海工業的進一步發展，事實上會幫助內地工業發展得更快，正像輕工業的迅速發展會幫助重工業發展得更快一樣。這也和他前面講的關係有聯繫，因為大部分沿海工廠都屬輕工業，而計劃為內地修建的大工廠主要是重工業廠子。毛強調利用沿海積累的技術和經驗的必要——即利用企業剛被改造成公私合營的工商業中產階級。[30]

李富春在 6 月 18 日人大的講話中對此所作出的反應——工業地區是他談到他個人的意見時論及的第二個題目，——要尖銳得多。他首先糾正了毛的地理概念，並且對毛的統計數字也作了修正。毛認為「沿海」包含 10 個省，2 個直轄市，而李認為包含 7 個省，3 個直轄市。[31] 毛說國家的重工業 70% 分佈在沿海。李沒有直接反駁這個數字，但指出 80% 的鋼鐵工業分佈在沿海。這不是僅僅出於嘔氣的推托之辭。李的意思是，沿海地區比毛指出的要小，但佔有的主要重工業卻比毛提到的要多。[32] 必須強調這一點是因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兩項主要的重工業工程是處於內地的武漢和包頭兩個新的鋼鐵聯合企業。

李富春接著指出，毛所要的東西已經包含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之中了。他逐字逐句地援引一五計劃的條文來說明，下述一點已經作為一項「具體任務」在一五計劃中確定下來了，即在建立新的工業地帶的同時，「必須充分地合理地利用現有的工業企業，發揮它們潛在的生產

能力」。他還援引了一個要合理利用東北、上海等現有工業基地的特別指示。[33]

李然後轉而談到沿海地區的生產和建設問題。關於生產，他首先指出內地生產增長的速度相對要快些，因為內地開始的基礎比較低。他承認，沿海工業的潛力還沒有充分發揮。但是，他仍然把那裏最近幾年的低速度發展歸咎於1953-1954年的歉收，這次歉收特別影響到了沿海輕工業的發展；他也把這種低速度發展歸咎於隨著朝鮮戰爭的停戰，軍事加工和製造訂貨的縮減；歸咎於五年計劃實行以前沿海工業的盲目發展。將來，與新的輕工業企業在內地建設的同時，沿海工業將會被「充分利用」。[34]

關於建設，李強調了改建沿海工業的可能性。同時，在這個標題下，他也把幾處擴建的例子包括了進去。他完全不承認新建的必要性，更不必說毛主張的新建重工業了。似乎改建（李的主張）和新建（毛的主張，他不提改建）代表了兩種極端的態度，而擴建（毛曾談到擴建，但認為是次於新建）是雙方的妥協點[35]。

在這一點上，李富春似乎站穩了腳跟。《人民日報》7月8日的一篇社論尖銳地批評了計劃人員，但它的尖銳的言辭大概是基於這樣的事實：毛不得不承認一些實質性的問題。在列舉統計材料表明上海的工廠沒有很好地被利用（這一點李富春已承認了）之後，報紙指出，毛已經拒絕了李用第一個五年計劃條文中的摘錄來證明計劃人員是正確的說法：

> 所以發生上述缺點正如李富春副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所指出的那樣，不僅客觀的原因很多，而且還有主觀的原因，那就是對於沿海工業重視不夠，過去訂計劃的時候對於如何發展沿海的工業沒有提出積極的措施，或者有些措施也不全面。[36]（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事實上，李已經承認了某些「主觀」的錯誤，但不是像社論裏暗示的那樣。他曾說：

……過去，由於沒有足夠認識充分合理地利用沿海舊有的工業基礎，由於有好多顧慮，與內地建設的協調搞得不夠，甚至沒有更多的規劃和利用。[37]（著重點為筆者所加）

李富春的立場是，搞計劃的人對待沿海工業態度一直是很積極的，雖然他們可以做得更好些。他不承認原來的五年計劃有任何錯誤。對此，他特別摘引原文來加以維護。當他提到計劃時，他用「規劃」而不用「計劃」。使用「規劃」這個詞表明他的意思是指一般意義上的計劃，而不是特指「五年計劃」。

但是，即便計劃人員還沒能避免因為不曾為沿海工業的發展作充分準備而受到指責，他們似乎已成功地抵制住了在沿海地區進行新的建設。社論的題目──《發揮沿海工業的潛力》──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從社論所陳述的下述觀點中，可以看出它的宗旨，這就是在草擬發揮這些潛力的計劃中，基本的原則就是「充分利用現有生產基礎」（著重點為筆者所加）。社論繼續說：

如果某些企業只要稍加擴建或增添部分設備，就能增加大量產品或增加迫切需要的品種，那末，在力求供銷平衡的前提下，也可以考慮進行擴建。[38]

換句話說，甚至擴建都得在絕對有保障的情況下才被允許，而新建看來是不予考慮的。

工資

毛的第一、第二兩種關係中強調的重點是輕工業和沿海地區（輕工業主要分佈在那裏）。這樣做是為了使消費者得利。他的第四個題目[39]──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之間的關係──也是這樣。毛贊成增加工業工人的工資：

最近我們和各省的同志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都談了不少。他們談到工人，並說他們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每個

勞動日生產的產品價值也增加了，因此工資也應隨著調整。不注意這一點是不恰當的。[40]

談到農民的生活標準，毛對集體資金積累過多提出警告。此外，國家來自農業的積累應當通過稅收政策而不是通過消費品價格來完成，——這就是說，他贊成直接稅，而不贊成間接稅。消費品應以薄利賣給農民。[41]

在李富春6月18日人大講話對這一點的回答中（這是他三個個人意見中的第三個），這位計劃工作的領導人似乎主要關心的是使他的計劃委員會不受節儉過度的指責。他指出提留的積累比例比蘇聯低，工資和福利設施一直在增加，工農業產品的價格比率一直在合理地調整。說過這些之後，他列舉了一些做得還不夠的例子。[42]

但是，顯然在毛還沒有作報告以前，提工資這件事已經決定了，雖然他的干預可能使增加工資的幅度有所擴大。[43] 在人大會議上，勞動部長馬文瑞宣佈平均增長14.5%。[44] 除了增加工資外，北京還鼓勵地方當局和工廠經理們要更加關心工人的福利，特別要集中精力解決住房短缺的問題。[45] 6月28日，在波蘭波茲南發生了騷動，工人們抗議他們貧窮的經濟狀況，同武裝警察發生了衝突。這件事一定使毛確信他在這方面所採取的政策是正確的。[46] 7月12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一方面附和波蘭官方的分析，譴責這場騷動，說它起源於帝國主義者的挑撥，另一方面也從中吸取了教訓，即官員們必須經常密切注意群眾的困難。

給地方以更多的權力

毛的第五個經濟題目是關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毛大力支持擴大地方自主權：

現在幾十隻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辦。各部門向省市政府的各廳局發佈命令，雖然中央和國務院不知道，但都說是中央來的，給地方壓力很大。表報之多，鬧得氾濫成災。

> 這種情況必須糾正。我們必須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黨中央不同有關地方商量好，從來不冒下命令……省、市、地、縣、區、鄉應當有它們自己的積極性和適當的獨立性，中央不應當把它們束在一個狹窄的框子裏。[47]

他對中央的這種用公文進行指揮的官僚主義的抨擊，在他講話的後半部分即討論矛盾時加強了。在這一部分，他要求把黨和政府的現有機構砍掉 2/3。[48] 這個分權給地方的要求後來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得到了響應。劉少奇強調了它的重要性。[49] 周恩來也透露，在毛講話後，5 月至 8 月之間，國務院就這個問題召開了幾次全國會議。[50] 但是顯然，這種實行分權的嘗試直到 1957 年下半年才開始實行。

經濟發展和國防

毛的《論十大關係》講話只在一個問題上同計劃人員是一致的。他建議縮減防務開支以便增加經濟發展的資金份額。為了安撫軍隊，他說只有用這種方法，中國才能得到核武器：

> 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還是按老章程辦事。[51]

毛的論點可能（因為他沒有詳細說明）是核武器計劃只能建立在更加發達的經濟——還有技術和科學——的基礎之上。

這一段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它透露，在那時，毛已決定中國應當有核武器——和中國不得不自己製造這種武器。[52] 中國直到 1958 年 5 月，才由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第一次公開承認想要獲得核武器。這件事由當時的空軍司令在當月的一篇文章中證實。[53] 在隨後的幾年裏，由於中蘇論爭，中國人揭露說，他們曾同蘇聯人在 1957 年 10 月 15 日簽訂一個協議。他們暗示，這項協議中包括莫斯科承諾向中國提供一個原子彈樣品。[54]

很可能，製造核武器的決定是經過相當的討論才決定下來的。據別人引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話說：「中國有眾多的人口。如果將來戰爭打起來了，我們提供部隊，蘇聯提供原子彈。」[55] 沒有註明這段話是什麼時候說的，但由於它談到「將來的戰爭」似乎作這樣的推斷是合理的，即它必定是在朝鮮的敵對行動——在那裏，彭德懷曾指揮中國軍隊——停止後，或許是彭於 1953 年末或 1954 年初回到中國以後某個時候說的。[56] 同樣，這一點似乎也是確定的，即彭發表這個意見只能在中國作出核武器決定之前，或許就在關於這一問題進行辯論的過程中。

可能朝鮮戰爭的結束和彭德懷回到中國，引起了一場中國應當怎樣為將來的任何衝突作最好的準備的廣泛的討論。參加朝鮮戰爭的人民解放軍基本上就是打敗了國民黨的那支軍隊。它在組織上非常機動、靈活，士氣高昂。但是它缺乏現代軍隊所具有的一些專門性武器和集中指揮機構。[57] 在最初一些給人深刻印象的勝利之後，中國人民志願軍開始遭到來自聯合國軍優勢火力所造成的重大損失。[58] 從 1951 年中期，蘇聯開始供應志願軍大炮和飛機。中國人民解放軍系統的現代化就始於那時。[59] 朝鮮戰爭後，彭繼續推行軍隊現代化，但是如果他的意見是中國應有一支現代化軍隊但依靠蘇聯的核盾牌的話，那麼很顯然到毛作十大關係報告時，這個意見已被毛拒絕了。

很有可能的是，毛選擇中國走核武器道路，不是因為不信任蘇聯，而是因為他感到，中國要想成為一個世界大國，核武器是必備的先決條件。更直接地，他可能認為，對於保衛中國來說，核武器比種類繁多的現代化常規武器更便宜。[60] 確定的是，在 1956 年春天，北京有一場關於軍事預算份額大小的討論。這反過來又跟戰爭可能性的估計有密切關係，而 1956 年初的幾個月這個估計有了急劇的變化。

1955 年夏天，中國領導人已經取得一致意見，認為外來的威脅足夠達到應當增加軍事支出。對他們的考慮有重大影響的應該包括：1954 年 11 月美國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締結的防務條約；艾森豪威爾總統 1955 年 3 月所透露的美國軍隊可以用戰術核武器對台灣海峽施加壓

力的談話，和對金門馬祖防務的加強。但是這種形勢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以前的軍事活動和宣傳的反應（這種活動和宣傳使國民黨從大陳島撤退了）。但是，其真正的結果卻是，在 1955 年中期，中方感到他們的軍事地位已經惡化而需要加強。[61]

在 1955 年 7 月的人大會議上，財政部長李先念宣佈 1955 年財政預算中防務支出大幅度增長[62]，其理由是帝國主義者包圍中國，占領台灣，並以新的世界戰爭威脅中國。[63] 三位地位非常高的軍隊發言人在人大會議上強烈支持對國際形勢的這一認識，國防部長彭德懷 7 月 16 日聲稱：

> 我國人民和政府，對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消除戰爭威脅和保障世界和平，曾經作了而且在繼續作著不懈的努力。但是我們一時一刻也不能忘記美國侵略集團還在千方百計地阻撓著我國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台灣，用新的大規模侵略戰爭的計劃威脅著我們。戰爭叫囂者們正在以原子武器威脅著全人類，企圖借此來達到他們奴役全世界的目的。……我們決不能犧牲我國的領土和主權來換取和平。也正是因為這樣，我們就不能不堅決地迅速地實行義務兵役制，並且從各方面加強我國的國防。[64]

劉伯承元帥[65] 也對世界局勢作了類似的陰暗的描述。在 7 月 21 日的講話中他得出結論說：

> 我們尤應提高警惕，在集中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的同時，必須增強保衛社會主義的國防力量，以保衛我國獨立和世界和平。[66]（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無論彭德懷還是劉伯承都沒有提到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

然而，在人大會議進行期間，從 7 月 18-23 日，一次四強（美、蘇、英、法）最高級會議在日內瓦舉行，於是代表東西方關係緩和的新「日內瓦精神」的說法開始傳播開來。[67] 葉劍英元帥 7 月 27 日在人大會議的講話中沒有提到這次最高級會議，但是他承認國際局勢

「是向和平方面發展著」。[68] 然後他就著手抵消這種勉強的承認的效果。他歷數了美國的一長串侵略事實和目標之後，得出結論說：

> 為著保衛祖國和人民的安全，保衛祖國社會主義建設，解放我國領土台灣，一併准備應付侵略者突然襲擊，（中國人民）必須採取各種可能的措施，繼續加強中國人民解放軍。[69]

周恩來總理 7 月 30 日的講話對日內瓦會議的態度比葉元帥較少保留，說它已經「獲得積極的成功」和已經導致國際緊張局勢「一定程度的緩和」。[70] 但是，甚至他也表示了擔心，唯恐中國——因為它處於軍事基地和軍事同盟的包圍之中——會遭受意外攻擊。他的結論是：

> 在這種環境下，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必須增強我國必要的國防力量。只有這樣，才能保衛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保證我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並且對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有所幫助。[71]

像周恩來、李先念這樣的政府官員對中國正受到嚴重威脅有了一致的看法，對國防預算分配又有了增加，人們認為軍事領導人總會滿意的。但是，很明顯，這些人並不滿意。葉劍英元帥批評「有些人」時說：「他們認為現在只需要集中一切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而不需要注重國防建設。」[72] 按照葉元帥的意見，這些人不明白，對人民解放軍來說，獲得足夠數量的最現代化的裝備對於對付武裝精良的帝國主義者是多麼重要。[73] 劉伯承元帥顯然是同意葉的觀點的，他把工業化和防務放在同樣的地位。他說：「有了國家的工業化，才會有國防現代化的基礎。有了國防現代化，才能保衛國家的工業化。」[74] 彭德懷元帥援引國家憲法來支持他加強防務的要求：

> 我國的武裝力量目前不但擔負著巨大的保衛國家的任務，而且要求不斷[75] 提高自己的戰鬥力……為了擔負起全國人民賦予的為憲法所規定的這種神聖任務，我們必須迅速建立起強大的現代化的武裝力量；不但要有一支強大的陸軍，而且要有一支強大的空軍和一支強大的海軍。[76]（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彭德懷用「不斷」一詞，給人們提供了一個線索去認識這樣一個問題，即在剛剛宣佈增加軍費支出以後，為什麼軍隊方面的發言人感到還有必要同時強調這項支出的重要性。李先念的預算分配只是一年的預算分配，如果人民解放軍要「不斷」地加強，適當的規定就必須放到五年計劃中。研究一下李富春 1955 年在人大會議上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講話就會發現，他對軍費開支遠不如軍隊希望的那樣關心。為了證明五年計劃的高速度是正確的，李說：

> 我們在國內面對著國民經濟的落後狀態，在國外還有凶惡的帝國主義的包圍，不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就不僅不能使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且有使我國不能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略，不能保持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獨立的危險。[77]

這一段話的重要意義在於，雖然李富春接受有一個敵對的外部環境，但他不像其他發言者那樣，用這個事實去證明增加軍費是正確的，因為那樣的話，當然意味著從五年計劃的投資項目中轉移資金。的確，他沒有論及防務支出，雖然後來透露，防務支出（連同行政費用）共佔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總支出的 32%。[78]在他講話的結尾，李富春讚揚人民解放軍保衛了祖國，保衛了社會主義建設。[79]甚至稍往後，當他對破壞搗亂和戰爭威脅的危險發出警告的時候，他也僅僅要求提高警惕，並沒有用這種危險來證明把本來計劃用於經濟建設的錢再額外撥出來增加軍費是正確的。[80]很可能，李富春就是葉劍英元帥所批評的「有些人」中的一個主要目標。

必須假定，李富春在他的高級同事中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支持，否則他不可能以那樣的方式提出五年計劃。在 1956 年最初的幾個月內，有一點越來越明顯了，即不管毛和周恩來先前的觀點如何，他們肯定是支持李的。到周恩來在 1956 年 1 月 30 日向全國政協會議作政治報告的時候，中國和美國已經在日內瓦舉行了一系列大使級會談。直到當時，會談所取得的結果並沒有使他大幅度地改變他對美國的看法：侵略集團不能阻止國際局勢的緩和，但是他們仍然企圖這樣做。美國人

堅持他們的「實力地位」政策，正在走向擴軍備戰；美國的「戰爭冒險」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在私下，毛對美國的和平誠意要樂觀得多。除了其它事情以外，他列舉的例子是最近它縮減了武裝力量的規模。[81] 大約正是這種由中國領導人私下作出的比較樂觀的評價可以解釋為什麼雖然周的分析類似於 6 個月前的一次，這一次的提法會不大相同。

> 為此，我們必須繼續加強國防，壯大我們的力量，在這裏有決定性意義的就是加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提早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同時，我們要進一步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合作。[82]（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1955 年 7 月 30 日周純粹是從防務的意義上講的，而這時，他談到防務是從國家自我加強這樣一種更加廣泛的意義上來講的，強調的重點是經濟力量的極端重要性。這也是毛三個月後在他的論十大關係講話中採取的路線。

毛講話兩個月之後，周在 1956 年的人大會上對世界形勢作了一番較樂觀的描述，甚至當他談到美國「繼續用威脅在遠東製造緊張局勢」的時候，他也沒有用這一點來為增加防務支出辯護，而僅僅相當溫和地說：

> 同時，我們應該指出，如果美國有些人竟然認為它還可以在遠東發動一次突然事變，那末，可以斷言決不會替它帶來任何好處。中國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夠的力量，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戰勝從任何方面來的武裝干涉。」[83]（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周關於中國已有足夠強大的國防力量的認識的重要性，由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作了解放強調。他在同一天向人代會議指出，上年預算分配給國防的經費只用了 90.36%。但意味深長的是，雖然這個事實使這位將軍支持在 1956 年的預算中縮減 5.2% 國防支出[84]，他是軍隊在會議上發言的高級人員中唯一公開支持這一削減的人。這同上

次人代會是一個明顯的對比。上次會議三位元帥發言支持大量的軍費支出。[85]

很明顯，到1956年年中，應該是到毛作論十大關係報告的時候，國防費用的削減已經定下來了。[86]根據國際形勢，特別是認識到需要擠出更多的資金使經濟增長更快一些，毛和周決定防務可以放到稍微次要一些的地位。國防部長彭德懷不同意這樣做，我們將在關於中共八大的分析中談到這一點。

毛去游泳

對毛來說，1956年頭五個月是一個緊張的政治活動時期。他尋求從緊張的體力活動中得到休憩。在1956年5月和6月，他不顧同事的勸阻，[87]三次暢游揚子江。[88]那時他已62歲，他用一首詩來贊美自己的技藝：

才飲長沙水
又食武昌魚
萬里長江橫渡
極目楚天舒
不管風吹浪打
勝似閒庭信步
今日得寬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第二首詩透露，在5月，毛對經濟增長仍然信心十足，特別是在他想到將在第二年完成的橫跨揚子江的第一座大橋和揚子江流域的洪水被控制住的前景時，更是如此：

風檣動
龜蛇靜
起宏圖

一橋飛架南北
天塹變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斷巫山雲雨
高峽出平湖
神女應無恙
當驚世界殊[89]

第六章 解凍在擴展

解放報紙

與此同時，在北京，黨的領導人作報告、發指示支持毛發動的自由化運動。這些活動，大都像毛的兩次講話那樣，是秘密進行的。

加強百花齊放政策的一些最重要的措施的目的大概是解放新聞界。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措施可能反映了由於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所帶來的不再迷信蘇聯的傾向。當年夏天胡喬木——宣傳部副部長，草擬1956年4月5日對斯大林評價文章的主要負責人——在他家裏召開了一次新聞界領導人會議。會上，他批評塔斯社說：「塔斯社的新聞是簡單化、沉悶和呆板的，這是斯大林時期蘇聯政治生活的反映。」[1]但是由劉少奇在5月28日和6月19日向新華社發出的指示表明了這一政策更加積極的出發點。[2]主要目的是幫助促成一種普遍的、更加輕松的政治氣氛。劉認為，通過使報紙少一些官方性，鼓勵不帶偏向的報道政策和學習西方新聞的專業技巧，這個目的是能夠達到的。[3]新華社做國家通訊社好，還是當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國家通訊社，當老百姓好。[4]但劉明確指出他沒有把這件事本身看成一個重大問題，因而他的這個提議沒有什麼結果。真正的困難是如何從那樣一種情勢下解放出來，在這種情勢下，新聞工作者由於是國家的雇員而感到拘束。[5]不僅因為他們感到只報道官方路線是一種職責，而且，劉似乎已經感到，因為在等級系統中，他們的地位低下，因此，在向上級官員提問和報道他們的工作時感到拘謹。[6]劉似乎感到，如果新聞工作者脫離了官員的等級系統，他們就可以得到較高的薪水，甚至比毛的工資還

要高。如果讓他們署名和鼓勵他們建立自己的名聲，他們就可能有獨立性和責任感，就能說出真話。[7]

說真話是劉對新華社官員的指示中最關鍵之點：[8]

> 現在的新聞報道有偏向——只講好的，有片面性。應該好的要講，不好的也要講。……現在我們的國際新聞報道只有一面：一味罵美國壞，只說我們好等。這種片面性的報道，會造成假象，培養主觀主義……比如說，美國政府首腦人物罵了我們，這樣一項新聞，我看可以登……周恩來總理罵了美國，有的國家資產階級報紙就刊登出來。為什麼資產階級報紙敢於把我們罵他們的東西登在報紙上，而我們的報紙卻不敢發表人家罵我們的東西呢？這是我們的弱點，不是我們的優點。[9]

這種對客觀性的關心顯然是為什麼劉提倡研究非共產主義的新聞的一個理由：

> 外國記者強調他們的新聞報道是客觀的、真實的、公正的報道；客觀的、真實的、公正的報道，是他們的口號。我們如果不敢強調客觀的和真實的報道，只強調立場，那麼，我們的報道就有主觀主義、有片面性。[10]

劉責備新華社不能使它的報道像資本主義新聞通訊社那樣引起讀者的興趣，[11]他提倡研究他們的方法，反對「機械地照搬蘇聯塔斯社的經驗」。[12]早些時候，一個新華社代表團到蘇聯去向塔斯社學習。[13]由於劉少奇的指示，新華社社長吳冷西於 1957 年初往英國和法國向路透社和法新社探索堂奧去了。[14]

按吳冷西的說法，劉的指示給新華社的幹部「造成了空前的思想混亂」，而他自己感到這些指示走得太遠了。[15]雖然吳冷西這些批評是在旨在毀滅劉少奇政治聲譽的壓力下作出的，但這些話也許是真的，即便不是吳冷西所指的意思。吳說這番話時的意思是劉的修正主義使他吃驚。更大的可能似乎是他所說的混亂是由於要完全改變新聞實踐引起的。現有證據不能證明劉少奇提倡的新聞政策與毛當時所認

可的政策相悖。我們知道，在一個主要問題上——出版不利於中國共產黨人的材料——直到 1957 年 2 月，毛和劉還是一致的，因為他准備重印「美國之音」的廣播和蔣介石的講話。[16] 有充分證據證明新華社按照毛和劉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可能就是那張小心翼翼創辦起來的報紙——《參考消息》。這張報紙主要依賴非共產黨的消息來源，但是被嚴格限制在受信任的官員中閱讀。[17] 關於另一個主要問題——西方新聞技術研究——劉少奇不過是具體運用毛在他的《論十大關係》講話中提出向一切外國學習的總意見而已。當 1956 年 8 月 24 日，毛建議音樂工作者在發展當代民族音樂時，不但要學習中國傳統音樂，而且要學習西方音樂的時候，毛也是在具體運用這一總的意見。[18] 此外，甚至吳冷西，儘管是被迫給劉少奇抹黑時也承認，在他的指示中，劉首先說，新聞社的工作必須在人民利益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的基礎上來進行。[19]

《人民日報》根據這些指示立即採取行動。從 7 月 1 日起，儘管紙張缺少，報紙還是從四版擴大到了八版，並且向讀者解釋說，這是為了發表生活中更多重要和新的事物：

> 無論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或者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窮鄉僻壤的，或者是直接有關建設的或者是並不直接有關建設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並不令人愉快的。[20]

報紙新面貌的另一個方面是用較大的版面供自由討論和一種更好的文風。[21] 其他報紙也都倣傚。[22] 這種版面的改變，或者劉的原指示，都不像文化大革命中硬說的那樣，是「慫恿妖魔鬼怪出洞」[23]——即鼓勵反共分子攻擊黨——然而，從這時起答應給報紙的額外權力的確引出一個意外的結果，即允許它們於 1957 年初夏更自由地登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黨的批評——雖然這些批評是直接受到毛的論人民內部矛盾講話鼓勵的。

加強法制

在蘇聯和東歐，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出現了一個削弱警察權力，加強法制的行動。大赦、平反，並且撤掉一些犯錯誤的警察頭目[24]。在匈牙利叛亂期間，秘密警察甚至被私刑處死。[25]

在中國，1956 年 1 月期間，由於對整個政治形勢估計的全面改變，官方路線對反革命的態度有了急驟改變。首先的一個跡象就是《十二年農業規劃》的公佈。其中第五條規定，除了最壞的反革命分子外，其餘都允許加入合作社。幾天以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上說：「新」的規則適合「新」的農村形勢。但是，他繼續有些矛盾地說，這也符合於「我們長期實踐」的鎮壓和寬大相結合的方針。[26] 董強調了 1955 年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成績，並強調對社會主義高潮後的反革命分子應繼續保持警惕，而不能失之於放鬆和過分寬大。[27] 然而，他又說：即使犯了嚴重的罪行，只要真誠坦白和悔改就會得到寬大處理。他列舉了一系列不同類型的反革命分子的區別，這樣就可以使反革命分子明白如果他們自首，他們可以得到何種程度的寬大[28]。與解凍相符的是 1956 年 2 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直接向它的下屬部門發布的、關於重新全面審查 1955 年對反革命分子逮捕、起訴案件的命令。[29] 可能就在決定重新審查案件時，劉少奇強調了避免錯捕人和按憲法辦事的重要性：

> 要保證不錯捕人，不錯判人，必須提出這樣的口號……動員每一個人努力實現這個要求……必須為基本不作錯誤決定而戰鬥。[30]
>
> 這是因為，在憲法公佈以後，我們必須根據憲法條款處理事務。當案件是依據合法程序處理的時候，即使我們錯捕了人和錯判，這樣的錯誤也是合法的。[31]

從這兩段話中還不能概括劉的講話的全部內容，但似乎他用來說服檢察院官員的論點之一，是堅持合法方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無論用什麼論點，中國領導人可能是在知

道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內容以前，至少是在他們能夠領會這個報告，並在此基礎上作出了政策性的決定之前，就明顯地傾向於注意合法性了。[32]

因此，中國人 1956 年開始的加強法制不太可能是共產主義世界對秘密報告的反應的一部分。自從 1953 年以來，中國人一直在建立一種類似於蘇聯溫和的新經濟政策時期所創立的那樣一種法制。[33] 這個體制在 1955 年「幾乎」被鎮壓反革命運動所沖垮。[34] 1955 年底政治形勢的根本變化足以恢復一個建立全面法制的運動。當然，秘密報告可能使中國人在執行中受到了鼓勵。

1956 年 3 月初的第三次全國司法工作會議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召集的[35]。意味深長的是，董必武沒有在會上發言。而他所處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職位，又是與法律事務直接有關的老資格政治局成員，這些都表明他應該是一位發言者。或許，正像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上的演講所暗示的那樣，他對於新的方針沒有足夠的熱情，或者他已過深地捲入了舊方針的實施以致不能夠很好地為新的政策做宣傳。總而言之，主要的指示是由彭真和陳毅作的。彭真當時在政治局的地位稍高於董必武。[36] 所以選他們出來發言，也可能因為他們是最大量城市資本家的集中地——北京和上海的市長，而這些城市資本家則是法律官員揭露反革命罪行和鏟除腐化的主要目標。在會上發言的唯一的高級法律官員不是召集單位即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官員，而是檢察長。[37] 這是值得注意的。因為檢察院的職責包括審查警察局對逮捕的申請和起訴，並監督政府部門包括警察的行動的合法性。[38]

彭真 3 月 6 日在司法會議上發了言，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已經闡述過的當前政治形勢作了進一步分析。毛已宣稱政治形勢起了根本的變化。周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在中國，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毫無疑義的。劉少奇則在早些時候也作了同樣的論斷。彭真用階級鬥爭的術語詳細說明瞭這一點：

> 今年和過去比較，階級鬥爭不是更加激烈、尖銳了，而是正在緩和。地主、富農奉公守法，資本家已經接受改造，甚至反革命分子也比去年老實了……[39] 總的說來，情況已經變化了。富農已被剝奪了武裝，一半以上的資本家已進入公私合營企業。[40] 企業公私合營和農業合作化表明，我們已經打敗了資產階級……。去年，資產階級要和我們較量，我們挫敗了他們，孤立了反革命分子。其結果是高潮和資產階級尋求改造，並（作為一個階級）被消滅……讓我重申，階級鬥爭更加尖銳不再是事實了。這意味著甚至是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絕大多數都不是堅決地反對我們，而是放棄他們的反抗，或爭取主動。(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能說 (階級鬥爭) 正在尖銳起來嗎!?[41]

彭真一再強調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緩和了階級鬥爭，可能是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一個呼應。赫魯曉夫曾駁斥關於在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理論；斯大林曾創造這一理論來解釋進入社會主義後的大規模恐怖。[42] 但是，彭真堅持這一點不能歸因於讀了這個秘密報告所產生的震動。很清楚，彭真，可能還有他的同事，感到司法界的全體成員深深地捲入了前一年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去了，因此很難使他們確信幾乎是一夜之間政治形勢的變化。在他發言的另一部分，彭真諷刺了了對新路線的潛在的對抗：

>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已經改變和消滅了……如果農民要求監管反革命，[43] 資本家都在揭發他們的親屬，你能說這行不通？[44] 如果今年你還要反對對嚴重罪犯從輕處理，如果你今年還要嚴上加嚴，那麼你的唯物主義到哪兒去了？[45] 形勢已經改變了，群眾要求一個改變，如果你還要貫徹老一套，那麼你的唯物主義到那裏去了！……反革命分子不敢活動了，……他們正在投降，[46] 這些證明他們正在崩潰並且不敢反對革命了。[47]

在某種程度上，彭真迫使這些法律官員接受新路線還有其他的一些考慮在裏面。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麼彭真在北京強迫資本家進入

公私合營企業的成績就會被人質疑：「資產階級已經把他們的財物交給了國家，並且大多數敲鑼打鼓、張燈結彩地接受改造，——你真能說這個是假的嗎？」[48] 但是，彭真試圖在這個講話裏表達的基本意圖是和毛澤東的序言（新的最主要的任務是生產）是一致的。這個序言說：「現在群眾的要求不再在這個方面（指階級鬥爭）[49]，而是一心集中於積肥、挖井、抓生產。」[50]

這一段特別證明瞭這樣的論點：即中國的解凍始於社會主義勝利的 1955 年底和 1956 年初，而東歐各事件則促進了自由化。法律領域的新路線是改變總體政治氣氛所必需的，而不是在讀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後才突然感到法制的重要性。當彭真強調法制的重要性時，他是在中國政治形勢發展的框架內闡述的：

> 在恢復經濟的時期（1949-1952 年）結束以後，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良好的社會秩序建立起來了。公開反抗的敵人大多數被控制了起來，遺留下來的大多數是隱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們不加強法制，那是很容易犯錯誤的。[51]

4 月 25 日，毛澤東在他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首次對二十大作出了個人的反應。一個英國知名律師在北京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他聽到一個新的刑法不久將要完成，對此他很感興趣。這有助於建立一個每個公民都瞭解的全面法律准則。[52] 有另外一些公開的跡象也表明，政府打算建立一套成熟的法律體制。[53] 但在幕後，中國領袖們似乎還感到保證順利實施這個法律制度的決定性步驟是說服與之有關的官員認識採取新的態度，特別是鼓勵尊重檢察院。檢察院能成功地執行其職責對新方針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為用兩位西方學者的話說，它是「法律的當然衛士」。[54]

5 月 30 日，劉少奇對一個在檢察院工作的重要性問題上向他匯報的高級檢察官說：

> 必須保護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權利。人們對保護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權利不敢說什麼，害怕被當作右傾。最高法院和高級的

檢察長必須承擔這個責任……現在必須強調質量，根據法律處理事情。必須強調正確處理案件。檢察官必須警惕地反對和糾正錯誤。必須做好工作……現在著重於監察是必要的。……發現『缺點』，並對一些問題更多地進行考慮是必要的。目的是更加準確地打擊敵人。檢察機關必須更多地致力於防止錯誤和作出錯誤決定。[55]

一個月以後，在一個類似的場合，劉鼓勵那個匯報的檢察官員敢於對政府的其他機關提出不同意見，並指示應該怎麼做：

一個檢察官必須保證在提出控訴中不犯錯誤。他的職責就是瞭解每一件事是否處理正確。〔……〕從現在起，檢察院的方針就是監督法律工作，提高質量，掌握重點和經得起檢查。在你們的工作中必須有一個重點。你們應當研究問題，特別是緊緊抓住那些可能和容易發生錯誤的方面……你們可以告訴各個省和市作好準備讓民主人士和外國人視察你們的工作。這樣的視察可以發現一些問題，黨委應極端重視這些問題。知道還有相當多的錯誤，他們會注意檢察工作。必須使每個幹部懂得不能犯任何錯誤。這是檢察院的職責和任務……保持一般的監督是有用的。如果省的人民委員會犯錯誤，省委當然能糾正它，而有時候，也可以依靠檢察院來糾正它。[56]

同時，在6月5日一個公安部負責人的會議上，[57]彭真也試圖對官員們傳達了同樣的意見，這些官員是最不歡迎這種限制他們權力的前景的，特別因為過去他們一貫把檢察院作為在法律事務中的一個非常低級的夥伴：[58]「在這個時候，所謂健全的法制的關鍵因素就是一個健康的檢察機構。」[59]但是，像劉少奇在2月所作的那樣，彭真似乎感到說服執法官員尊重檢察院的最好方法，是使他們確信這樣做是保護他們自己的一種方法：

這有兩種情況。一種就是公安機關沒有經過檢察部門的允許就逮捕了人，那麼，即使逮捕是應該的，也是不合法的。例

如，如果一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沒有經過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委會的允許就被逮捕了，那麼，即使他實際上是一個特務，逮捕他仍然是非法的。另一種情況就是公安部門在取得檢察機構的允許以後逮捕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逮捕錯了，也是合法的。[60]

像劉少奇、彭真這樣的高級幹部都堅持遵守法律方式的重要性，在 6 月底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上，一些做法律工作的高級幹部在講話中承認他們的部門有越權的行為就不足為怪了。[61] 他們之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知道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仍然堅持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上是必要和正確的。[62] 但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是，在 2 月份由檢察院單獨對肅反運動所作的檢查工作，從 7 月份始由主要的法律部門——檢察院、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共同承擔了。[63] 這意味著調查組所發現的問題將會受到更加慎重的對待。

對緩和的反應

儘管毛提出了關於新方針的建議和在幕後進行了改善民主政治氣氛的步驟，然而這些措施所針對的主要得益者城市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反應都很遲緩。1956 年 6 月，[64] 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公佈後，中央統戰部召集民主黨派領導人開了三天會議，民主黨派也舉行了他們自己的會議，[65] 討論在新的政治氣候下他們應起的作用。[66] 在統戰部的會上，一致認為互相監督應當加強，並且為促進經濟發展，對於政府的工作應當有更多的監督。[67] 農工民主黨主席章伯鈞——他同時也是中國民盟的副主席、交通部長——在會上說，長期共存的方針代表了政治民主，百花齊放代表了思想民主。[68] 但是他和其他民主黨派的領袖們可能已經知道，他們必須小心謹慎，因為共產黨的官員們將會不願意給他們以更多的尊重。9 個月以後，章伯鈞不得不告訴他民盟的同事說，他從一個高級幹部處得到消息說長期共存的方

針很難付諸實行。他建議集中於百花齊放，以便創造長期共存的適當條件。[69]

但是，在 1956 年夏天，似乎百花齊放的方針也不會取得更大的成功。的確，一名叫王蒙的青年作家發表的一篇短篇小說[70]引起了文學上的轟動，這篇小說批評黨的中層幹部的犬儒哲學、道德敗壞和官僚主義。但是，從總體上說，知識分子並沒有急於投入到開花和爭鳴中，而是小心翼翼地去適應這個新方針。少數幾個敢大膽說話的人通常是知名作家。氣氛比較輕松，文學活動和知識分子的活動漸漸增加了。新雜志出現了，在各種論壇上也出現了獨立的觀點。文學權威們試圖重現 30 年代繁榮的文學氣氛，使那些年代的著名作家再度寫作。[71]但是，當時畢竟只是作家胡風和他的朋友由於向黨要求更大的自由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後一年。[72]知識分子在他們確信有真正永久的解凍前，需要聽到更多的保證。[73]

起初，對新路線最明顯的反應來自省的黨組織，顯然它們是奉上面的命令作出這種反應的。到 9 月中旬第八次黨代會前夕，有了一些關於一個反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運動的報道，據說領導幹部正在檢查自己的驕傲自滿的情緒。[74]重要的是，在這些早期的報道中，沒有談到宗派主義——歧視非黨群眾——的錯誤。顯然，這些民主人士對待他們的新作用採取小心翼翼的態度是有道理的。

由於這些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了近 7 年之久的人表現出那樣多的顧慮，因此毫不奇怪，國民黨對大陸的解凍沒有產生多少好感。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新方針在對台廣播裏得到了解釋。[75]更重要的是，當時北京政府對它在大陸的控制充滿信心，於是正式向蔣介石伸出了橄欖枝。在 1 月的政治協商會上，周恩來重申了政府一年來要求和平解放台灣的號召，並且提出有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可能性。[76]6 月 28 日，在人民代表大會上，他進一步說：

> 現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

> 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我願意在這裏再一次宣佈，我們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列的先後，也不論他過去犯了多大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77]

顯然，結束內戰完成統一國家的任務是這個新的自由路線的另一個重要的動機。但是，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沒有對此作出反應。

第七章 第一次「躍進」的結束

對冒進的批評

1956年6月初，當毛澤東回到北京的時候，他還來不及注意到人們對他的自由化傾向的小心翼翼的反應。使他擔心的一定是經濟形勢。當時形勢非常嚴峻，以致在北戴河的高級幹部會上決定把生產的速度減慢。[1] 1956年6月15日，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第一天，財政部長李先念概括了經濟問題。在農村，合作社企圖用二至三年的時間超速完成十二年農業綱要，因而投資過多；在工業上，不顧質量和經濟性地追求數量和速度，結果是忽視安全，造成工業事故的猛增。重工業部所屬八種主要產品，有五個在1956年初在質量上下降了。[2]

這些是熟悉的問題，但現在形勢非常嚴重，必須採取更有力的行動。把那些因為急於求成而忽視質量和節約的官員們說成是保守，時間已經證明，這並不能制止他們的行動。而現在很清楚，譴責他們歪曲反對保守主義的口號也無濟於事。這種批評的方法使人們繼續堅持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口號。周恩來也在1月提出這是即將召開的黨的八大的一個中心議題。[3] 然而，口號有時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反對右傾保守主義已成為全部生產的口號。把忽視質量和經濟性說成是歪曲那個口號，這種說法不可能說服那些正在數量和速度方面創記錄的官員們。因此，如果要將政府要求剎車的意圖貫徹下去，就必須提出一個新的口號。這個口號在李先念的講話中提了出來：「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4] 第二天，《人民日

報》用社論的形式加以評述，以保證它的讀者不忽略李先念講話的重要性：「今年的預算報告的另一個特點，也可以說是報告的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反對保守主義的同時，提出了反對急躁冒進的口號。」[5]（著重號為作者所加）。這個報紙繼續說，這個新口號是在前6個月貫徹計劃的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並反覆強調由李先念提出的問題。在那段時期內在報紙各專欄裏一直反覆討論這些問題。

四天以後《人民日報》專門寫了一篇既反對保守主義又反對冒進的社論。[6] 社論解釋道：急躁冒進問題是特別嚴重的，因為它存在於高級幹部之中。這些幹部在十二年農業綱要公佈後，為了避免被譴責為右傾保守主義而驅使他們的下屬這樣做。批判保守主義、公佈規劃，加上使用了「多、快、好、省」口號，導致了許多幹部思想的片面性。「他們以為，既然要反對保守主義，既然方針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執行四十條，於是一切工作，不分緩急輕重，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俱興，齊頭並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即把一切事情辦好」（著重號為作者所加）[7]。社論的意圖很清楚，即在繼續批判保守主義的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

> 總的方針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在具體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哪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現在就可以又多又快的，哪些是將來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樣才算省得恰當，怎樣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達到好的目的，這些都要根據具體情況仔細地、實事求是地去加以考慮。[8]

這個重要的社論是由《人民日報》的主編鄧拓起草，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和副部長胡喬木修改，最後由劉少奇審查並通過。劉少奇命令把這篇社論送給毛澤東批准[9]。毛在草稿上寫了「不看了」三字。18個月以後，在猛烈批評財政部官員的時候，毛說出了他的原因：「為什麼我要讀那些說我的東西呢？」社論似乎是平衡的，但事實上它的真正目標是反對盲目冒進。毛透露說，社論發表以後他非常憤怒，

以致抵制了任何來自財政部的文件。毛還批評財政部沒有給政治局以適當的機會去討論它的建議。[10] 但是他並沒有說他在 1956 年 6 月就對劉少奇不滿，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對這一小事件的敘述肯定含有這個意義。[11] 可能一般的慣例是，當一篇《人民日報》社論預示重要方針改變的時候，劉少奇的任務就是保證社論的起草者沒有曲解最高領導層內部已經一致的東西。在毛的眼中，真正的「元兇」一定是那些迫使最高領導進行剎車的人。看來很清楚，劉少奇不在他們中間。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在這個問題上舉出證據來指責他。一位文化大革命時的宣傳負責人要劉少奇解釋的許多問題中，也沒有這一點；[12] 劉少奇本人被迫作的三份交待中也沒有這一點。[13] 或許在阻止 1956 年躍進的爭論的問題上能夠說明劉的態度的最重要表白，是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他直言不諱地譴責那些負有責任的人，他的用語說明他不可能也是其中之一。[14]

計劃制定者的勝利

我們甚至有更好的理由來開脫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承認：「1956 年的反冒進我是有責任的，我做過一個自我批評。」[15] 周的承認是不奇怪的。作為總理，他總體負責全國的經濟部門。在 1956 年的許多時候，特別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的助手，即那些部門的官員都表示反對冒進。由於他們的職務，他們對冒進的影響是看得最清楚的。他們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第一副總理和政治局五個常委之一的陳雲；[16] 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17]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18] 副總理兼國務院負責農業口的主任鄧子恢；[19] 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20] 國務院負責運輸和交通的主任王首道。[21] 如果這些人全部，或大多數反對盲目冒進（有證據證明他們都是反對冒進的），那麼毛澤東即使得到劉少奇的支持也很難拒絕他們的意見。而且，毛本身對於經濟事務需要現實主義並不是不敏感的，也很清楚地知道生產所遇到的嚴重困難。有意思的是，毛似乎對 1 月份

運動發動後出現的不現實的計劃和指標，採取了事後為自己開脫責任的態度。文化大革命期間，毛在 1956 年 1 月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被流傳了出來：

> 各部門計劃指標也要放在可靠的基礎上。本來可以做的不做，是不好的，但無充分根據的行不通的就叫盲目性，就是「左」傾冒險，雖然目前這還不是主要傾向，但已經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的頭腦不那麼清醒，不敢於實事求是，怕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難聽。凡是經過調查研究，辦不到的，要敢於說辦不到，敢於停下來，把計劃放在可靠的基礎上。[22]

沒有理由懷疑毛在那時說過這樣的話，這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周恩來起初準備支持十二年綱要。在有效發動生產運動的著名《序言》中，毛還警告人們不要「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23] 事實上，6 月 20 日的社論——據說使毛生氣的那篇——正是引了這段話，譴責冒進的同志不聽毛主席的話。[24] 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一個講話中，毛一定花了許多時間講周恩來在同一會議上講的那些問題。但是，在「文革」期間那個講話唯一透露出來的部分，不是針對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數不是黨員），而是針對可能犯了急躁毛病的黨內同志。[25] 這段話頗有使毛從 1956 年上半年的經濟冒進中解脫出來的味道，而冒進都是他的政策的直接後果，雖然他也曾反對過冒進。

毛澤東像他的同事一樣，已經從過去幾年的經驗中認識到，生產競賽帶有很大的冒進性質。他也許可以接受在持續生產競賽的框架中限制冒進主義，這就是 4 月中央和國務院關於節約辦社的指示。但是，他反對的是對躍進本身的剎車。如果因為他自己對蘇聯工業化模式的複雜性的相對無知而感到無能為力時，他也許特別煩惱過。他的「十大關係」講話，是根據許多經濟部門的一系列匯報作出的。這些匯報必然揭露了許多工業上的問題。這個講話不應只被看作關於資源分配的綱領性文件，也應被視為一個要在蘇聯式計劃的背景內找到保持工

業躍進方法的努力。但是在六個星期內，他不得不接受了周恩來和制定計劃者們反對冒進的要求。

十二年農業綱要的放棄

使毛澤東最終不能堅決反對對生產運動剎車的，是農村中的發展情況。對這種發展的意義，他是能容易地意識到的。6 月 20 日，社論選擇登載了一個盲目發展的例子，這就是，儘管在南方雙輪雙鏵犁被積壓[26]（因為那兒的水田不宜使用它），但仍有生產雙輪雙鏵犁的高指標。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是鄧子恢的辦公室不得不發了一個命令「毀犁還鐵」，一下子大約有 70 萬張犁被毀掉。[27]

糟糕的事還沒完。按照一位西方專家所說，「農業的災難就在於計劃混亂和管理不善，這將導致危機。如果不採取果斷行動的話，這種危機將很快地影響整個經濟」。[28] 十二年綱要所倡導的各種技術改革，都被性急的幹部們不顧當地情況強制地推行。對穀物生產的過分強調，導致對那些輕工業原料作物生產的忽視。[29] 對自留地面積的限制和好鬥的幹部強制地將樹、生產工具和家畜集體化（有時無償或予以很低的價格），導致農民屠宰豬和家禽，並讓他們的役畜因無人照管而死去。[30] 結果農民的收入下降。[31] 而且壞天氣使政府更難以實現它讓 90% 的合作社農民在 1956 年增加收入的保證。在「八大」召開前，《人民日報》社論向與會代表報道了令人沮喪的消息：重要的小麥生產省份吉林和黑龍江遭受了中共執政以來最嚴重的水災，而河北、河南的水災比 1954 年的最大水災更嚴重。報紙唯一可以提供的安慰是，自從 5 月底以來全國各地遭受的洪水、風暴、旱災，就全國而言，沒有達到 1954 年的程度。[32] 即使這樣，據後來透露，全國 7.1% 的可耕地受到了影響。[33]

共產黨甚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形勢綜述之前就採取了措施。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了關於合作社生產和組織問題的指示。[34] 這個指示在開頭尊敬但簡明地提到了《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

但指示的整個意圖明顯地是要糾正由綱要引起的農業經濟發展的不正常現象——忽視副業，給合作社規定不切實際的生產指標，硬性引進未經試驗的技術發明，建立規模過大的合作社等。實際上，《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已被放棄了。沒有什麼證據能夠表明中央七中全會(8月22日、9月8日和13日舉行)曾按原計劃討論過這一指示，更不要說批准它了。因為這個規劃曾是1956年「躍進」的核心部分，因此，它被放棄，以及對冒進的批判，就象徵著這次躍進本身被放棄了。[35] 毛的以較快步伐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次努力失敗了。

附錄一：陸定一對毛澤東百花齊放方針的解釋

在文化大革命中，陸定一對百花方針的解釋被攻擊為對黨的政策，也自然就是對毛的 5 月 2 日講話[1]的「擅自修正」。弄清這個指責是否公正很重要。如果指責是對的，那將表明那時政治局以外很高級的官員願意在何種程度上反抗毛。它也可以用來支持文化大革命中對 1966 年以前的大多數歷史研究的總體思想，即認為毛的思想總是前後一致的，而任何偏差則是他的反對者的修正主義行為的結果。

遺憾的是，由於手頭沒有毛 5 月 2 日講話，直接的對比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根據毛 1957 年 2 月 27 日發表了同一思想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的有關部分進行對比。但是，這在原則上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有關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最後版本是在修改之後才發表的，並且政治環境完全不同於最初講話時的政治環境，也與毛和陸定一發表他們的百花講話時的政治環境相差很大。雖然如此，如果在這些情況下，陸的講話沒有與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根本不同的觀點，那麼，就應該可以假設：陸的講話也會同毛的百花講話一致。

對陸的論述的攻擊聲稱，陸定一認為雙百方針的四條根據，概括起來就是：矛盾消失了，階級消滅了，階級鬥爭結束了。讓我們考察一下他這四條根據。

陸首先說，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各方面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以後幾年內，國家就會變為「一個沒有剝削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2]毛在 1956 年 1 月 25 日最高國務會議上說過，社會主義在 3 年內將基本上建立起來。[3]在他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毛進一步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 1956 年「基本上已經建立了」（著重號為作者所加）。[4]陸的說法和毛的說法的一個不同點就是，陸在他們共同假設的基礎上對未來作出了正統意義上的結論。通過研究蘇聯人怎樣寫他們在 1936 年建立的社會主義，就可以看出陸定一沒講任何非正統的話。蘇聯人寫道：「社會主義已經勝利了……人口中的階級結構改變了。所有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了」。（著重號為原文所有）[5]

陸的第二條根據是，「知識界的政治思想狀況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並且正在發生更進一步的根本變化」。[6] 他指的是周恩來 1 月份關於這個問題的長篇講話。周的有關的話就是：「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我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7]（著重號為作者所加）次年，毛說：

> 我們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在過去七年中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他們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正在用功學習馬克思主義，有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者……當然，知識分子中間有一些人現在仍然懷疑或者不同意社會主義，這部分人只佔少數。[8]

毛的話也許可以被認為不太明確，但這三個人基本上對知識分子政治狀況表示了十分樂觀的態度。同樣重要的是，陸的話並沒超出周在毛在場的情況下講的那些，然而，周的講話從來沒受到批判。

陸的第三個論點是：

> 我們還有敵人，國內也還有階級鬥爭，但是敵人特別是國內的敵人已經大大削弱了……仍然必須繼續堅持鬥爭，不能鬆懈。[9]

毛論述反革命問題時，用了相似的話語：

> 目前關於反革命分子的情況可以用這樣兩句話來說明：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還有反革命，有人說，已經沒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頭塞得高高地睡覺了。這是不合事實的……如果我們放鬆警惕性，那就會上大當，吃大虧……如果說現在全國還有很多反革命分子，這個意見也是錯誤的。如果接受這種估計，結果也會搞亂。[10]

最後，陸說，「全國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強，而且還在繼續增強之中」。[11] 幾乎在毛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的第一句，肯定是實質性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12]

毛接著繼續討論仍然存在於社會中的矛盾。但當時這是他講話的主題，並且這是針對百花講話後發生的匈牙利事件時講的。

總之，如果像「文革」所攻擊的那樣，陸暗示（因他的確沒有明確地講）階級鬥爭結束了，那麼陸也不比毛自己走得更遠。而且如果陸的話可以被解釋為，他認為這種方針的目的「只是使文學藝術繁榮，使科學趕上世界先進水平」[13]，那麼陸可以在毛的講話中引一段類似的論述來為他自己辯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14]

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陸定一的講話視為對毛的觀點的完全歪曲的說法，根本沒有說服力。[15] 甚至，即使陸曾打算做一個同毛的政策的基本主張相悖的解釋，那麼毛也一定會有機會在他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或別處糾正這種歪曲。[16] 可能的是，在最初講話時，陸也許有些激動，說得過頭了，以致講話的部分內容在發表前不得不被刪去或修改。例如，據說他講到：「必須有兩個傳下去——馬列主義世世代代傳下去，資產階級思想也要世世代代傳下去。馬列主義萬歲！資產階級思想也萬歲！」[17] 在他發表的文章中沒有這一段。也許，最接近這一段的是：

> 在人民內部，不但有宣傳唯物主義的自由，也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傳唯物主義，或者是宣傳唯心主義，都是有自由的。兩者之間的辯論，也是有自由的……對於思想問題，想用行政命令的辦法來解決，是不會有效的。只有經過公開辯論，唯物主義的思想才能一步步克服唯心主義的思想。[18]

早些時候，他說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將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它甚至在階級消滅後還將繼續存在下去。所有這些都是正統的毛主義的思想。從這個觀點來講，我們可以看到那段未被發表的段落的第一句，僅僅是另一種表達唯心主義可能長時間存在的方式。他的

「唯心主義萬歲」甚至在 1956 年的寬鬆氣氛中也可能會被看作是過分的。但是，假設陸的講話中那一整段話是這樣的：

> 必須有兩個傳下去——馬列主義要世世代代傳下去，資產階級思想也要世世代代傳下去。馬列主義萬歲！資產階級思想也萬歲！(因為) 馬克思主義只能通過鬥爭來發展——這不但在過去和現在是對的，在將來也必然是這樣的。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的鬥爭中發展的……同錯誤思想鬥爭就像種牛痘——一個人在種了牛痘後就有了更強的抵抗疾病的力量。溫室裏的植物是不會強壯的。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會削弱而只會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思想領域的領導地位。

在這樣的語境中來看，陸的「唯心主義萬歲」就是相當無害的。這樣來構建這段話也很可能和他的原話相近，因為它表達了之前所引用的那段話的同一思想。更重要的是，在「因為」後面的每一句話，都來自毛的人民內部矛盾講話。[19] 甚至「資產階級思想萬歲！」也可能是直接引用毛的話。證據就是：1956 年下半年，毛說過，「所有政黨萬歲」。這樣來看，如果他想要資產階級政黨萬歲，那麼他也會贊成他們的思想萬歲的。[20]

總之，根據現在所能看到的證據來看，陸定一並沒有歪曲毛 1956 年 5 月的思想。如果這個結論正確，那麼就要注意陸的講話中後來被修改的一個方面。劉少奇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主要目的是同教條主義作鬥爭。這同毛在討論是與非關係 (4 月 25 日《論十大關係》講話的第九個關係) 的論述是一致的。在這一段裏，毛只是攻擊了教條主義者。它也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對斯大林的評價是一致的。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論反對教條主義的必要性。陸定一的話是：「但是，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工作中，也有許多缺點和錯誤，主要的是教條主義傾向。」[21] 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個估計在後來幾年裏，隨著毛對修正主義的日益增長的擔憂而逐漸被修改了。

第二編

中共八大

第八章 毛澤東的地位

儘管前幾個月經濟遭受挫折，1956年9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還是在一種勝利的喜悅氣氛中召開了。自從中共第七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來，在過去的11年中，共產黨人戰勝了國民黨，奪取了全中國，建立了強有力的政府，給中國帶來了過去一百年中明顯缺乏的和平和統一。他們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大體上實現了農業合作化——但沒有造成像蘇聯那樣嚴重的後果——並且把私人工商業改造成國營或公私合營的性質。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朝鮮戰爭中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使國際社會對中國新政權刮目相看。近年來，特別是1955年萬隆會議以來，中國外交在亞洲贏得了新的朋友。毛澤東在1949年曾經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到了1956年，人們都明顯地認識到中國的確是站起來了。

不過，中共八大的代表們還不能沉湎於自我祝賀的情緒當中，他們面臨著一系列實質性的方針問題。其中包括，根據蘇共二十大精神，以及從那時起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開展反對個人崇拜斗爭所帶來的毛澤東的地位問題；[1] 由毛提出的政治自由化的方針問題；在剛剛放棄1956年的躍進之後，對於經濟發展的指導路線問題。有關這些問題的決定在年初就已作出來了，但對代表大會來說，認可這些決定，並且指出今後的發展道路仍然是重要的。後來的結果表明，儘管決定早已作出，但代表大會的情況說明甚至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層，對這些問題仍然存在實質性的不同意見，自那以後，這些不同意見持續了很長時間並日趨嚴重，也正是在這些不同意見中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許多種子。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選出了新的政治局，其中一些重要的提升和降職預示著今後的發展。

刪去「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公開場合扮演了一個配角，他僅致了一個很短的開幕詞，而把主要的政治報告留給劉少奇去作。但這並不能說明毛澤東在黨內的實際地位。斯大林在 1952 年也曾讓馬林科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主要的報告；那時或那時以後，沒有任何人認為這表明斯大林的地位下降。如果人們用蘇聯的這個先例作為指南，最多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正在把劉少奇作為他的繼承人推到前台。

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對毛澤東的威信的真正打擊是從新黨章中刪節了兩處涉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而這曾寫在 1945 年的黨章中。[2]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個刪節成為譴責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主要理由之一，因為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也沒有提到毛澤東思想，而鄧小平則作了關於新黨章的報告。事實表明，劉少奇可能的確試圖減少毛澤東的作用——雖然不是像人們所指責的那樣——但是，鄧小平在他的報告中談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時，卻捍衛了毛澤東的地位。

> 把涉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從新黨章中刪去的提議，最初來自彭德懷。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審查時，彭德懷承認：1956 年，當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是我建議把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刪去的；我一提出這個建議，劉少奇就贊成說，「刪去它可能更好一些」。我是反對個人崇拜的。[3]

彭德懷的交待澄清的第一點是，刪去毛澤東思想是由一個並沒有參與起草新黨章和劉少奇的報告中有關「國家的政治生活」那一重要部分的人提議的，這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強烈反對。劉的報告中有關「國家的政治生活」部分是由彭真起草的；[4] 而新黨章則據說是由劉少奇指定的一個班子起草的，成員有鄧小平、安子文（那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代部長，後來作部長）和劉瀾濤（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代表大會之後，任書記處候補書記）。[5]

彭德懷的交待還證實，刪去「毛澤東思想」是在很晚的階段才決定下來的。[6] 而且有另外一個論據表明，主要的報告是在非常倉促、最後一分鐘的情況下定下來的。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後來宣稱：

> 「八大」的報告有缺點，但這不是他（劉少奇）個人的問題。「八大」的決議似乎也有錯誤……主席看過這個文件嗎？……每件事情都是在匆忙中做出的，劉少奇也好像是匆忙地看過它。不管怎樣，這個文件已經公佈很長時間了。毛主席和黨中央並沒有說什麼。[7]

劉少奇夫人認為文件是在倉促中制定的說法已經被周恩來總理所確認，他曾經說，代表大會關於劉少奇政治報告的決議在廣為傳播之前沒有給毛看過。[8] 劉少奇在一份交待中說，雖然毛澤東反對決議中的某些句子，但已「沒有時間去修改了」。[9]

為代表大會做準備的中共中央七屆七中全會斷斷續續地於 8 月 22 日、9 月 8 日和 13 日舉行，這進一步證明代表大會前夕缺乏一定的組織性，儘管從 1955 年 3 月就開始為大會做準備了。[10] 在代表大會的前幾個星期，幾位最高領導可能由於自然災害和農業問題分散了注意力，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曾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加強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領導和組織建設的指示。

不過，即便決議是在最後一分鐘的倉促情況下制定出來，彭德懷和劉少奇如果沒有同事們的支持也是不可能刪去有關毛澤東思想的內容的。實際上，似乎毛澤東本人也對此給予了批准。陳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說：

> 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在他的報告中沒有提毛澤東思想，這種刪節被認為是劉少奇所犯下的一百多條罪狀中的一條。但這個報告是經毛主席和政治局批准的，而且我出席了那次會議。[11]

毛澤東實際上證實了陳毅的說法，在一次討論對於劉少奇報告的其他指控的談話中，毛澤東說：「我們看了這個報告，這是代表大會通過的；不能僅僅由這兩個人（劉少奇和鄧小平）負責。」[12]

似乎有足夠理由認為，把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刪除，這樣一個非常正式和重要的改動，大概是在陳毅提到的那次會議上，經過毛澤東和政治局同意的。如果這個假定成立，那麼毛澤東和陳毅的陳述就意味著，劉少奇和鄧小平都不能因為在「八大」上作了令人不愉快的報告而被指責為想要降低毛澤東的威信。[13] 如果有人試圖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以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持續進行的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的大背景下來估價劉、鄧等人對毛澤東地位的態度，則需要尋找其它的論據。

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態度

首要的論據是彭德懷的交待，這個交待顯示劉少奇希望看到毛澤東思想的地位下降。顯然，當彭德懷在文化大革命的頭一年作這個交待時，他很可能是在壓力下不得不指控當時受批判的同事們。但是有意思的是彭僅僅點了劉少奇的名卻沒有提鄧小平，雖然這兩個人在這時在這個問題上都受到了攻擊。這就清楚地表明，在那次關鍵的會上，在促成同意刪去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劉少奇扮演了一個積極和重要的角色，而鄧小平卻不是這樣。劉少奇這時的行為與他年初時想要削弱毛澤東地位的嘗試是一致的。這還與「八大」會議上，劉少奇所作的講話中的一些評論相吻合，這些評論即便是在讚美毛時也聽起來有雙關意義。

劉少奇在一段關鍵性的話中，向自黨的「七大」以來入黨的黨員們——占黨員總數的 90%——闡明，在 1935 年，中國共產黨怎樣以正確路線取代了錯誤路線。每一個「八大」代表都知道，正是在 1935 年 1 月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在政治局取得了領導地位。[14] 劉的大部分聽

眾無疑都已經讀過胡喬木在其中共簡史小冊子中關於遵義會議重要意義的評價：

> 在多數同志的覺悟和擁護之下，遵義會議撤換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職務，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就一直在這位傑出的、偉大的、完全可以信賴的領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之下，而這就使革命的勝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證。[15]

在蘇共「二十大」的影響下，劉少奇沒有像這本小冊子那樣熱情洋溢地重複他在「七大」時對毛澤東進行的讚頌。[16] 這是可以理解的。對於劉少奇來說，他提到自從遵義會議以來，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下」，沒有犯過路線錯誤，這就足夠了。[17] 代表們會把這看作是慎重地重新肯定了中央的正式立場，即在中共中央決議中寫道的，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新的中央領導——這在中國黨的歷史上是一個最重要的歷史性變化」。[18] 但劉少奇卻未能善始善終。當回答應如何解釋黨從錯誤路線轉到正確路線時，他駁回了那種簡單地認為黨只是更有經驗了的說法，說：

> 也不能僅僅用某個時期黨的領導者個人情況如何去解釋，因為大多數犯過錯誤的領導者在後來也為黨做了很好的工作。從我們黨的歷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黨的經驗多少和黨的領導人選對於黨是否犯錯誤有重要的關係，但是關係更重要的，是各個時期廣大黨員首先是黨的高級幹部是否善於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總結鬥爭中的經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19]

這段話顯然對毛澤東地位的上升的重要性打了折扣，[20] 而且的確可以被認為是違反了上述中央決議。劉少奇在這個報告中也沒有提到他曾在「七大」提出的「毛澤東道路」[21] 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的說法；因而沒有把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歸因於毛澤東。

劉少奇對毛澤東的大部分讚揚之詞，是在他談到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時提到的：

> 大家知道，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所以在我們的革命事業中起了偉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為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而且是因為他堅決地信任群眾的力量和智慧，倡導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堅持黨的民主原則和集體領導原則。[22]

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時，劉少奇曾著重強調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能力，而沒有提到他對集體領導的尊重。[23] 這種強調重點的變化，完全可以歸因於要把毛澤東同斯大林區別開來。但從劉少奇對遵義會議的評論來看，敏感的毛澤東很可能把這段話看作是暗示：他願意與同事們商量是與他的正確思想一樣重要的。[24] 由於毛澤東曾在 1955 年越過他的同事們直接去證明他關於農業合作化的觀點是正確的，所以毛肯定不會欣賞這樣的暗示。

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捍衛

劉少奇對毛澤東的作用所持的矛盾態度，在把他的評論和鄧小平的評論進行對比時顯得愈加突出。鄧小平在他關於新黨章的報告中沒有試圖去說明為什麼要刪去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這顯然是個太敏感的問題，不宜公開討論。但他正視了個人崇拜問題並盡力去為毛澤東開脫。他用了兩種方式。首先，他指出，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所述，中國共產黨早在許多年前就已經採取措施，以保證集體領導。他全文引證了中共中央 1948 年 9 月制定的《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人民大會的代表們無疑全部知道這個決定（就像《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引證 1943 年 6 月中共中央作出的《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那樣）是由毛澤東本人親自起

草的。[25]鄧小平實際上在告訴大會代表，在中國沒有個人崇拜問題，而且採取了一系列步驟來預防這一點的正是毛澤東。[26]

鄧小平把毛澤東同斯大林加以區別的第二個方式，是宣稱「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27]這段話顯然是為對毛澤東的頌揚（對領袖的愛護）作辯護，並且把它與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個人的神化）區分開來。[28]鄧小平繼續透露，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前不久，正是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提議，中共中央曾作出決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29]

鄧小平並不滿足於對可能出現的批評毛澤東搞個人崇拜的指責作這樣有力的捍衛。他還多次在講話中正面提到毛澤東。在報告的開頭部分，鄧小平簡要地回顧了中共「七大」以來的歷史，他談到「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之下」[30]打敗了國民黨。相比之下，劉少奇在他的簡要的回顧中，僅指出：「在 1949 年，我們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31]等等。鄧小平在他的報告行將結束的一段中，說得更明確：「我們黨的勝利，也要歸功於黨的各級組織的領導者，特別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32]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鑒於從新黨章中刪去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鄧小平要求各級黨組織「要認真地加強對於廣大的新黨員的教育，切實地組織和指導他們進行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對於毛澤東同志著作的學習，對於黨的歷史和黨的政策的學習……」[33]這種提法與大約同一時間由劉少奇和彭真給宣傳部門發出的一個黨內指示的精神是一致的，這個指示要求宣傳部門不要再提毛澤東思想，只提毛澤東著作。[34]但在劉少奇的政治報告裏卻沒有如此地繼續重申毛澤東著作的重要性，在毛澤東著作中當然包含著毛澤東思想。這樣的一個遺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人們注意到了。

毛澤東的引退計劃

我們可以設想，毛澤東本人對於任何一個認為他是或可能成為另一個斯大林的暗示都是很敏感的。但如果認為他本人只關心他個人的威信，那是錯誤的。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引起了毛澤東對改進無產階級專政的深深思索。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後的幾個月內，毛澤東已經開始為中國指出新的方向。這也促使毛澤東考慮最高領導人的作用以及接班人問題。他自己的陳述表明，他決定退出眾人注目的中心，以便讓他的資深同事們不依靠他，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獨立政治形象。

毛澤東這一計劃的關鍵是把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分成「一線」和「二線」(參見附錄三)。毛澤東將退居第二線，讓出一些職責和職權，這樣就能使常務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增加他們自己的經驗及威信——這是為了保證在毛澤東去世後，他的位置將由一些有自信心、經常作出決策並負得起責任的人所接替，而不是像斯大林的接班人那樣出現麻煩。另外，劉少奇將接替毛澤東的官方職責。這樣，在黨的高層領導之間，不公開的[35]、非正式的和實際上是不合憲法的分工之後，是正式的、公開的權力移交。

幾乎可以肯定，1959 年 4 月，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中已退居第二線了，大約在那時，劉少奇接替他成為國家主席。但是，有跡象表明，早在 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之前，毛澤東就作出決定，逐漸地將權力移交給劉少奇和其他同事。

我們知道，早在 1957 年 2 月，毛澤東就準備好向黨外廣大群眾暗示他這一決定。他在論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把自己比作一個著名的劇中的主角，但他說，他現在太老了，不能再很好地演主角了；他暗示他可能很快就要退到配角地位」。[36] 這意味著，在早些時候，他已在黨內同他的高級同事們談了這一想法。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某些方面顯示這個決定是在大會之前就作出了。

一個重大的跡像是，在 1956 年的新黨章中，規定了一個黨中央名譽主席的職位，而這個職位看起來是為毛澤東量身定做的的，如果毛澤東有一天移交了實權和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的話。在 1956 年，毛澤東可能已經設想了一個五年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他將放棄他的權力和職務。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的確完成了這一計劃的第一步，即在 1959 年 4 月將國家主席職務移交給劉少奇，並在政治局常委會中退到第二線。合乎邏輯的第二步將是在預期的 1961 年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由黨中央主席改任黨中央名譽主席。但結果，第九次代表大會直到 1969 年才舉行，而毛澤東在 1969 年之前很久，就對他當初退居第二線的決定極為後悔。

改革的另一個跡像是在 1956 年的黨章中，規定要設立一個其性質與原來不同的書記處。原來的書記處一直由毛澤東擔任主席，其成員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這樣的成員表明，迄今為止，書記處不僅負責行政和組織工作，而且同時負責制定方針政策，甚至更注重後者。這一結論，從明確公佈的說法中得到了證實，即以書記處制定方針的職責將由新產生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承擔[37]，而政治局常委會則由原來的書記處成員再加上鄧小平組成，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擔任了新設立的總書記職務。新的書記處雖然很有權力，但僅有一個人——鄧小平進入制定政策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據鄧小平說，改組書記處是必要的，因為「由於黨和國家的工作的繁重，原有的中央機構已經不夠適應需要了」。[38]這是容易理解的，中共的黨員總數已從第七次代表大會時的 120 萬人增長到第八次代表大會時的 1070 萬人。[39]但毛澤東本人後來把新的書記處的組成同黨的最高領導層分為一線、二線聯繫起來。這表明，毛澤東也認為他所建議的新的書記處[40]是逐步使他本人在中國的領導層中不那麼重要的計劃的一部分；書記處有助於加強黨的組織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獨立於黨的主席之外的機構。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斯大林曾經迫使黨的機構變成他個人意志的附屬品。

毛澤東在第八次代表大會時的意向的第三個跡像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事實，即劉少奇作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這個跡象表明，毛澤東在把他的接班人推到前台。

但即使第八次代表大會的這三個方面都被證明是毛澤東開始有計劃地、逐漸地從最高領導地位上退下來的信號，我們也仍不能確定，毛澤東本人會熱心於把他的思想從政治報告和新黨章中刪去。顯然，正如我們所看的，他接受了這個建議，而且這個建議也適合他少拋頭露面的計劃，但他本人沒有提出這個建議。特別是由於他正準備交出實權，他可能對刪去對其指導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的思想體系的頌詞懷有個人的不滿。毛的如果持有這一態度，就不難解釋為什麼他的支持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一問題上。

毛澤東的地位問題在代表中引起混亂

從文化大革命中的論戰來看，顯然毛主義者認為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權威受到了打擊。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看法是對的。當然，在代表大會以後，毛的位置沒有變動，他的聲望也沒有失去光澤。但從黨章中刪去有關他的思想的提法，劉少奇對他的雙重態度，甚至毛澤東本人希望逐漸隱退的良好意圖，這些事情混合在一起，擾亂了大會代表們對毛澤東地位的理解。如果他們當時希望根據對個人崇拜的抨擊，由中央提供一個對毛澤東應採取的明確態度，那他們是失望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不同態度肯定使他們不安。

代表大會期間，代表們在私下裏曾聽過關於刪去毛澤東思想的問題的解釋。據稱劉少奇說過：

> 毛主席對全黨的領導是在（黨的）「七大」上確立的；現在，即使我們不談它（大概指毛澤東思想），每個人也都清楚。此外，一個人如果總是重複某些事想要人們經常聽到它，這實際上不會有任何效果。[41]

中共中央組織部代部長安子文說了類似的話：在1945年，必須盡力建立毛澤東的威望，但是現在「毛主席威信很高，沒有必要再去樹立他的威信了」[42]。這樣的解釋——可能是反映了政治局同意的路線——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它們是否能使一些閱歷更為豐富的代表們信服，是大有疑問的。從會上發言者對毛澤東的開幕詞所採取的態度中，可以看到出現了混亂。

除了這三個報告人自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幾乎所有在大會上發言的黨員都在他們各自講話的開頭表示贊成中央的這三個主要報告。從形式上看，可能沒有必要去表示對毛澤東的開幕詞的贊同，因為它並不是一個正式的黨中央報告，不過，還是有35位代表在他們的發言中表示贊成毛澤東那簡短的開幕詞，與此同時，有53位代表在發言時沒有這樣做。[43] 在當時的情形下，即便在發言中提及毛澤東純粹是一種形式，但也能明顯地反映出對主席的態度。那53位代表中有一位高級幹部，由於在會上的發言中沒有提到毛澤東，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了特別的攻擊。[44] 根據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八屆中央委員中，在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曾提到毛澤東並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在中央工作的人，有半數以上仍然倖存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之中。[45] 相反，那些沒有提到毛澤東的中共八屆中央委員，只有三分之一多一點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時保住了他們的位置。[46]

當焦距進一步縮小時，這裏的相互關係甚至更為有趣。文化大革命前，由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47] 除了三個主要的報告人之外，有12個人曾在代表大會上發過言。他們當中有二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經去世，剩下的10人中，有四人——陳雲、陳毅、李富春和李先念在發言中表示贊同毛澤東的講話；這四人全都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雖然僅有一人——李先念仍保留在政治局內。六個在發言中沒有提到毛澤東的講話的人中，有一人（彭德懷）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經遭到清洗，有三人

（李井泉、烏蘭夫和薄一波）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清洗，其餘兩個「老資格」的人物（朱德、董必武）則作為政治局成員倖存下來。

這些並不意味著在 1966 年，贊成文化大革命的人僅僅因為這些黨的領導人在十年前怠慢了毛澤東，就想除掉他們。[48] 如果一個高級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那是由他多年以來在許多問題上的行為和態度所決定的，當然在對斯大林的抨擊開始以後他的行為也是政治收支平衡表上的一項。對於毛澤東來說，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可能就像一張石蕊試紙，使他的同事們顯出真實的顏色。在成功地領導了革命 21 年之後，毛澤東可能非常失望，因為對他本人持肯定態度的人被證明並不是那麼多。

第九章 關於自由化的爭論

對毛講話的反映

毛澤東最近的一些政策建議明顯地不受歡迎，這可能增加了他地位不穩固的因素。這種不受歡迎的程度，在分析他向大會作的簡短的開幕詞所得到的反應上能感覺得到。講話的主題是為了發展團結起來：「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1] 這裏沒有提階級鬥爭。

毛的講話是會上唯一一個官方報刊標明了鼓掌的分貝值的講話，蘇聯新聞機構喜歡刊登這種鼓掌的熱烈程度。中國人可能想表明：儘管反對個人崇拜，他們的領導人仍然得到了他們的尊敬。但這個鼓掌的熱烈程度也清楚地表明[2] 毛的講話的不同部分是受到了什麼樣的歡迎。

有四類鼓掌，我隨意給它們訂了一個計分法：

全體起立，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4 分
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3 分
熱烈鼓掌	2 分
鼓掌	1 分

用鼓掌計分法把毛的講話初步分類如下：

論題	字數所佔篇幅的百分比	分數	占總分的百分比
套話	11.1	22	34.3
國際問題	45.7	33	51.5
國內問題	42.9	9	14.06

換句話說，毛的講話中國際和國內論題所佔篇幅大略相等，然而根據鼓掌的情況來看，國際部分要受歡迎得多，——這實在是中共在全國勝利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

對毛講話中國內部分所作的分類，也有意思地說明了問題。

論題	字數所佔篇幅的百分比（國內部分）	分數	占總分的百分比（國內部分）
八大的任務	6.7	2	22.2
1945 年以來的成就	19.2	6	66.6
要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11	0	0
與非黨人士一起工作	29.7	0	0
要反對「三害」（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	33	1	11.1

從這個分類中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中國共產黨和常人一樣，願聽成績而不願聽錯誤。

但是，當考慮毛提出的重大政策建議時，可以得出一個更加深刻的結論。這些政策建議包含在最後兩項中。這裏的反「三害」和與非黨人士一起工作有密切聯繫。宗派主義的表現就是歧視外面的人，尤其是非黨人士；但主觀主義（盲目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官僚主義（不考慮可行性就下命令）也都與非黨人士問題有關。很顯然，一個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黨員往往是自以為是、不易接受非黨人士的意見的，因而也就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換言之，毛對國內事務所作評論的後兩部分實際是一個政策，即毛自年初以來所推行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兩個方面。中共要首先爭取在全國生產運動中得到非黨知識分子的合作，然後參照蘇共二十大精神，爭取在「互相監督」中與他們聯繫。但是，儘管他把論述國內事務篇幅的 62.7% 是放在統一戰線上，統一戰線的內容所得到的鼓掌只佔他講話中國內部分的 11.1%，沒有什麼能比這更清楚地表明黨員對統一戰線政策缺乏熱情，而這又使得貫徹統一戰線政策越發緊迫了。[3]

對毛講話國際部分的研究提供不了很多看法。總的來說，鼓掌與這些字數所佔的篇幅相一致，雖然代表們對毛的反帝的評論（字數篇

幅 8.7%，分數 15%）比對他關於世界形勢有利於和平的論述（文字 12.5%，分數 3%。）更為熱情。很有意思的是，鑒於他後來對蘇共和其他外國黨的譴責，他在這部分中用了一多半的文字強調俄國和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友好、支持、和榜樣作用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稱讚蘇聯上。關於二十大，他是這樣說的：「蘇聯共產黨在不久以前召開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又制定了許多正確的方針，批判了黨內存在的缺點。可以斷定，他們的工作，在今後將有極其偉大的發展。」[4] 在這樣一個公開和講究儀式的場合，毛沒對二十大某些方面的不明智表示懷疑是不奇怪的，但它使得人們感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劉少奇和其他人在相似的場合說了相似的話是沒有根據的。[5]

對中共的監督問題

必須記住，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不僅譴責了對斯大林的神化，而且也暴露了由斯大林下令的大量的逮捕、放逐和處決。這樣就提出了共產黨與其統治下的人民關係問題。這個問題在 1956 年 10-11 月匈牙利事件後對中國說來變得更加密切相關了，雖然甚至在中共八大以前，波蘭波茲南 6 月 28-29 日的暴亂已經表明了東歐群眾對斯大林主義的普遍敵視。[6]

雖然在中國似乎沒有發生這樣嚴重的事情，但毛後來承認（在他 1957 年 2 月 27 日《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有過鬧事：

> 1956 年，在個別地方發生了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的事件。這些人鬧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要求，有些是應當和可能解決的，有些是不適當的和要求過高、一時還不能解決的。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鬧事的另一個原因是對於工人、學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1956 年，還有少數合作社社員鬧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對於群眾缺乏教育。[7]

毛提到的罷工至少有一部分很可能發生在八大以前，即使不是這樣，到這時中共也肯定意識到需要消除不穩定的因素，或者（用中共的話來說）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8] 1956 年 6 月，中央委員會命令黨的縣委書記以上的幹部學習整風文件。7 月，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命令高級軍官同樣學習這五個文件。[9] 9 月初，山東省開始貫徹中央委員會的指示。[10]

這些措施以及劉少奇、彭真這年夏天的活動表明，在高級領導層中間對於改進政治氣氛沒有明顯的分歧 . 所有的人都承認中共幹部已犯過而且還會犯錯誤，對這些錯誤應當糾正。但是，對於錯誤的原因的看法明顯不同，這種不同的看法對應該採取的補救措施有重要影響。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講話使與會代表看到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二人的分歧主要在於對「三害」（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中哪個最嚴重的判定上。

劉強調奪取政權後幹部面臨的新的條件和新的任務以及隨之而來的主觀主義的危險。在討論了 1949 年以前黨在克服錯誤方面取得的成績之後，他指出這個歷史經驗表明：

> 克服思想認識上的主觀主義，是保證黨的工作順利發展，避免重大錯誤的根本關鍵。主觀主義的錯誤在目前我們許多幹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然嚴重地存在著，使我們的工作受到許多不應有的損失。我們現在面對著新的條件和新的任務，我們必須解決許多比過去更為複雜的和不熟悉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不努力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覺悟水平，不努力學習新的知識，鑽研新的業務，而滿足於對勝利的一片讚揚，主觀主義的錯誤就必然會發展起來。（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劉也指出大批新黨員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馬列主義的鍛煉，容易受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影響。[11]

鄧小平則不是強調黨的新的任務，而是強調黨的新的地位和由此而來的官僚主義危險。

> 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過去 7 年，一般說來，我們黨經受了這種考驗……。但是，7 年的經驗同樣告訴我們，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而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結果，必然發展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這種錯誤在我們黨內也不是比前幾年減少而是比前幾年增加了。[12]（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在中共的分析中，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三害」如此密切相連，以致人們可能設想這只是強調的重點不同而已。但是事實上，重點不同導致了政策制定上的特別重要的不同。

劉強調主觀主義，認為反對它的辦法是進行「系統的努力來提高我們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13] 這主要意味著更加緊張的理論學習。他也強調實地調查研究對於糾正黨的幹部的「驕傲自滿」的重要性。[14] 這個錯誤很明顯是官僚主義的反映，但劉在敘述黨員的錯誤時從沒提到這個詞。

然而，鄧對改變局勢的辦法卻不同，這與他選擇官僚主義而不是主觀主義為「三害」中最危險的一害是一致的。

> 為此，黨除了應該加強對於黨員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從各方面加強黨的領導作風，並且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我們需要實行黨的內部的監督，也需要來自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對於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15]（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劉和鄧的政策建議的關鍵性區別在於批評應當來自何處。劉強調黨組織和黨員自己學習和改正缺點的重要性。對於他來說，勝利的保證是重新強調集體領導和擴大黨內民主生活。[16] 鄧則是從另一方面強調監督特別是黨外監督的必要性。

而且，這些差異不僅僅是一件事情的兩個不同方面。劉還把黨的幹部的驕傲自滿與某些政府官員的驕傲自滿進行比較。就後者來說，劉把官僚主義作為其主要錯誤並詳細論述了在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應當怎樣加強對政府機關的監督。然而，劉沒提到黨的幹部的官僚主義和提出對他們的監督。而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鄧特別指出不論是政府還是黨的幹部都需要監督。

這種不同在劉討論毛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首次闡明的中共和民主黨派之間需要「長期合作，互相監督」的政策時，更加著重地體現了。乍看起來，似乎只要在討論這個政策時持贊成態度，就意味著接受黨外人士監督共產黨的原則。但是對劉來說，似乎並不是這樣。他是在國家政治生活部分而不是在黨的領導部分中討論這個政策的。他在說了共產黨員是應當「善於從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和批評中得到幫助」之後，立即接著指出這些民主人士在國家機關中佔據著重要職位。然後他又進而討論了改進這些機關的各種辦法。很清楚，劉贊同監督的不是以黨員身份而是以國家官員身份出現的黨員。或者以另外的方式說，劉願意看到民主人士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批評周政府中恰好是中共黨員的官員的錯誤[17]。的確，在隨後幾個月的時間裏，劉和彭真制訂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設立八個常設委員會（在地方上均有分會）的計劃。這些常設委員會將組成監督政府工作的全國最高監督系統[18]。但劉對民主人士批評黨的專職幹部一點也沒表示贊同[19]。而正是這樣的願望，促使毛在9個月後發動了整風運動。

劉少奇的觀點反映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這個決議——很可能是彭真起草的，因為劉的報告中關於國家政治生活部分是他負責的——強調對國家機關監督的重要性，包括「更積極地鼓勵人民群眾和國家機關中的下級人員批評和監督國家機關」的方法（著重點為作者所加）。[20] 但是，在承認黨員也可能滑向官僚主義的同時（和劉不同），決議只說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善於向人民群眾學習、善於傾聽

人民群眾的批評和建議」[21]（著重點為作者所加）。很清楚，在黨的體系中，不像在國家體系中，官員有權保持主動性。毛和鄧使中共幹部受非黨人士批評和監督的努力受到了挫折。

加強群眾路線

毛在政治決議中關於監督問題上所受的挫折由於在新黨章中規定加強「群眾路線」作用而部分地得到了補償。毫無疑問，對 1945 年黨章所作的這個特別顯著的擴展是出於對黨的官僚主義的憂慮。鄧小平在關於新黨章的報告中指出：

> 由於我們黨現在已經是在全國執政的黨，脫離群眾的危險，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脫離群眾對於人民可能產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黨認真地宣傳和貫徹執行群眾路線，也就有特別重大的意義。[22]

鄧也明確加強「群眾路線」與對實行黨外監督問題有著密切聯繫。

> 在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密切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廣泛地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這一鬥爭……這些黨外的民主人士能夠對於我們黨提供一種單靠黨員所不容易提供的監督，能夠發現我們工作中的一些我們沒有發現的錯誤和缺點，能夠對於我們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幫助。[23]

什麼是群眾路線？按照鄧的說法，它有兩個方面，即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在他們自己解放自己時給他們指導的責任——人們可以稱之為「無私服務」方面；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人們可以稱之為「領導方法」方面[24]。鄧引用毛 1943 年起草的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25]，把這種方法解釋為將群眾的各種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然後又回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自己的意見[26]。

鄧說明沒有正確的「領導方法」，「無私服務」是無效的：

> 實踐證明，許多人並非主觀上沒有為人民服務的願望，但是他們仍然把工作做壞了，使群眾受到重大的損失。這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是先進分子，是領導者，比群眾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眾學習，因此他們出的主意，經常在群眾中行不通。[27]

鄧在他的講話中用了很大篇幅講群眾路線。他指出七大以後新黨員大量湧入，1945 年以來多年的鬥爭又使得群眾路線具有更加豐富、更加深刻的內容。他以這兩個理由來論證他的長篇解釋是必要的[28]。第一個理由無可爭辯，但第二個理由看來是在掩飾新黨章中群眾路線的「無私服務」和「領導方法」兩個方面強調重點的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反映出以毛、鄧為一方和以劉少奇為另一方的不同觀點。

劉少奇在「七大」關於新黨章的講話中，也以大量篇幅論述了群眾路線，但他更著重於「無私服務」方面。他指出，為了徹底貫徹群眾路線，某些「群眾觀點」必須被灌輸到每個黨員的腦子裏[29]。這些觀點有四個：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向人民群眾完全負責；相信群眾能自己解放自己；向群眾學習。只有第四條與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方面有關。[30]

在劉少奇為之作過起草報告的 1945 年的黨章中，沒有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來描述領導方法。在論述與人民關係的總綱中，——這裏面沒有出現「群眾路線」這個詞[31]——絕大部分是講「無私服務」方面的。領導方法只是簡短地被提到，而且只是在說明教育群眾是和向他們學習一樣重要時提到的：「每一個黨員必須下決心向人民群眾學習，同時要不斷地用革命精神教育他們以喚起和提高他們的覺悟。」[32]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 1956 年黨章中詳細論述「群眾路線」的段落。像鄧小平強調的那樣[33]，這一段已經大大地被擴大了。它開始是討論「領導方法」，只是後來用與 1945 年黨章相似的措詞講到「無私服務」的重要性。而且「領導方法」被說成是中共勝利的關鍵。

黨的領導能否保持正確，決定於黨能否在分析和研究之後系統地總結群眾的經驗和意見，變成黨的意見，然後又回到群眾中去宣傳推廣，化為群眾的意見。[34]

是什麼促使1945年和1956年的黨章對群眾路線有不同的觀點呢？為什麼毛1943年提出的，劉1945年報告中又準確論述了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方面沒有寫進1945年的黨章？回答似乎是二人對先進政黨作用的看法的根本不同。對劉來說，重點是黨員應當無私地致力於人民的事業，這種純潔的獻身是它能正確地代表人民行動的最好保證。對毛來說，光有獻身是不夠的，特別是當黨掌握了政權的時候。他要求不斷地向正確思想的源泉——人民群眾學習。認為這是正確行為的最可靠的保證。劉的態度有點精英統治論的味道，毛則有點民粹主義的味道。

這些對立的態度說明了兩人在對監督中共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劉顯然感到一個無私的黨的精英們應該置於外部監督之上；黨員可能犯錯誤，但是最好的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是通過像學習馬列主義這樣的黨內措施；對於毛來說，監督卻是深入群眾的另一種方法。

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鄧小平在他主持制定的黨章中如此強調地重申毛的群眾路線的觀點？[35]他的地位本來應當使他像劉少奇一樣成為先進政黨的捍衛者。這個問題將在後面關於八大選舉新的領導的一章中談到。

毛對政治決議不滿意

文革期間，劉少奇在一份交待材料中透露毛對八大通過的政治決議中的某些句子不滿意，但「沒時間來修改，因而被這樣通過了……」。[36]劉談到的句子在下面這段中（不滿的句子打了著重號）：

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

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

但是，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37]

劉沒具體說出毛反對的是哪些句子，但不可能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看法。毛在八大自己的講話中就說，在上一次代表大會以來的 11 年中，中共「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的勝利」。[38] 在 1957 年 10 月第三次全會的講話中，毛又重申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的論述。但他指出，「基本」不等於「完全」。政權問題已經解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但這些問題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沒有完全解決。所以他否認現在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雖然這樣說是符合蘇聯正統理論的。[39]

斯大林在 1936 年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講話中提出，社會主義的勝利意味著剝削階級的消滅和階級結構的變化。[40]

這些變化說明什麼呢？第一，這些變化說明，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以及這兩個階級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界線正在消除，而從前的階級特殊性也在消失。……第二，這些變化說明，這些社會集團間的經濟矛盾在縮小，在消失。最後，這些變化說明，這些社會集團間的政治矛盾在縮小，也在消失。[41]

問題是斯大林主義者的正統不是毛主義者的正統。不到六個月前，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中國人重申社會主義社會仍有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個基本矛盾始終存在。[42] 換句

話說，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關係、上層建築中的缺點仍能阻礙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生產力的發展。在毛所批評的政治決議的那段話中，卻作了相反的論述：落後的經濟基礎阻礙了先進的社會制度。

毛的不滿不是由於愛好教條地吹毛求疵引起的。兩個提法的不同有重要的政策含義，政治決議明確指出中共現在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政治結構不需要作進一步的改正。這反過來暗示中共不需要整風，毛完全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在那篇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中指出：

>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43]（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正是這些矛盾的存在——特別是領導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44]——為毛要求中共進行整風提供了理論依據。既然到八大時已有跡象表明毛已在考慮用開展全黨整風運動的形式來防止中共走斯大林的道路，那麼在一種相反的理論寫進像政治決議這樣重要的文件時他感到惱火是可以理解的。[45]

可以想像（雖然說這並不）政治決議中這段令人討厭的段落是理論幼稚的產物。毛畢竟在 10 個月前在他的序言中就把生產問題放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他在八大開幕詞中重申了它，甚至在他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中又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46]（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但是他沒有在任何場合說過基本矛盾已改變了，只是說它的性質已從對抗性變為非對抗性。雖然在八大時，毛還沒有詳細闡述他的非對抗性矛盾的理論，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為毛主義的基本觀點提供了清楚的準則。

周恩來 1973 年 8 月在中共十大報告中把八大政治決議中的那段令毛討厭的段落歸咎於劉和陳伯達。假如王光美的話是可信的，即劉只是匆匆瀏覽了一下決議，那麼他所負的責任純粹是形式上的，雖然他無疑也會歡迎上層建築不要進一步改革的理論提法。假如陳伯達實際上對此負有責任，那它有助於說明毛在決議公佈之前不堅持審查決議。但是，一個在理論上和個人關係上這樣接近毛的人怎能犯這樣的錯誤呢？肯定不是出於惡意，因為顯然在其後多年陳還得到了毛的信任。我們只能設想，受過莫斯科培養的陳在這個重要場合感到有責任來描繪中國正在沿著蘇聯革命的道路走下去。

不管誰對此負有責任，很清楚，在這兩個重要方面——即不強調對黨的官員的監督和與毛關於國內基本矛盾觀點的否認，政治決議似乎打算阻止毛關於中共整風的任何要求。還是一個匈牙利的暴動促成了黨的主席能夠在這個問題貫徹其意圖。

第十章 第二個五年計劃

發展速度問題

毛澤東在八大遭受的第二個挫折是在經濟政策領域裏，「躍進」式的發展被堅決拒絕了。這是周恩來和他的內閣成員在夏季成功地反對冒進的必然結果。周恩來在會上作的關於二五計劃的報告，在速度問題上的唯一妥協是作了不冷不熱的承諾，即「速度」應是「積極的」。周的報告充滿了溫和的，甚至謹慎的精神，這是吸取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教訓的結果。按照周的說法，一共吸取了四個方面的主要教訓：

> 第一，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應該把長期計劃的指標定得比較可能，而由年度計劃加以調整。[1]（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周指出，1955 年的基本建設計劃由於前兩年農業歉收而縮減過多，因而導致鋼材、木材、水泥的過剩。由於沒有儲備規劃，鋼材、水泥的剩餘被出口，這就導致 1956 年這些材料的短缺。1956 年的建設規模由於 1955 年農業豐收「定得過大」，而且急於求成，搞得各個經濟部門很緊張。[2] 今後必須一方面警惕急躁冒進，[3] 另方面警惕裹足不前。[4] 急躁冒進放在裹足不前之前當然不是偶然的。周概括他的觀點說：

> 我們應當對客觀情況作全面的分析，同時盡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標作統一的安排，以便使每個年度都能互相銜接和比較均衡地向前發展。[5]（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周在論述從經驗中得來的第二個教訓時，再次批評了冒進：重要的是使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以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按比例

地發展，有些部門和地方想要「到處鋪開，百廢俱興，不顧條件，盲目冒進」，從而犯了錯誤[6]。這影響了國家的重點建設，造成了財政上的困難和人力、物力的浪費。他舊事重提地強調了被擱置在一邊的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的有害後果：

>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 公佈以後，又一次發生了這樣的偏向。有些部門和有些地方，急於求成，企圖把在七年或者 12 年內才能夠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到一年、二年內做完。[7]

周以 1956 年上半年的一個例子來批評另一傾向——過分強調某些重要工作，以致於損害了其它工作。他引證這年初對雙輪雙鏵犁和鍋駝機的過高指標為例，雖然指標一再修改降低，但仍然太高。結果導致其它工程鋼鐵缺少。[8]

第三，周強調增加後備力量，健全儲備制度的重要性，在國民經濟發展中，不平衡的現象是經常會出現的，這樣保持必要的儲備對於補救平衡是必不可少的。[9]

最後，周認為雖然必須首先考慮經濟發展，但正確的財政計劃也是重要的。在這裏他似乎是給毛和陳雲年初的爭論作定論。雖然他企圖調和這兩種對立的觀點，但他明顯是倒向陳雲一邊的。

> 同志們常常喜歡爭論應該不應該有「財政框框」的問題。我們的意見是，不考慮經濟發展的需要，主觀地定出一個「財政框框」來限制經濟的發展，這當然是錯誤的，應該反對這樣的「財政框框」，但是，如果財政計劃符合於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體現著積累和消費之間、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之間的正確關係，那末這樣的財政計劃，無疑地應該嚴格執行，決不能夠當作「財政框框」盲目反對[10]。(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周恩來有計劃制定者們支持他。副總理李富春同樣穩重，他說計劃制定者的基本職責是：

> 多瞭解些情況，看法要客觀和全面，研究事物的內在聯繫，掌握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全面完成我們綜合平衡和全面安排的工作。[11]（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新任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在發表關於投資和消費兩者關係的個人意見時[12]，支持他的同事。他提出了一個他認為適當的二者的比例，這個比例將使經濟發展低於1956年的速度。[13]

很清楚，毛澤東這時必須承認這個形勢。在他唯一的涉及經濟發展速度的開幕詞中，他講要「一步步地把中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國家[14]。劉少奇政治報告中經濟部分也反映了取得勝利的計劃制定者們的觀點。但他對周恩來的觀點作了意義重大的修改，這表明劉少奇同毛澤東一樣，不滿意計劃制定者們提出的速度。

對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周恩來除了轉彎抹角地說了那一次以外，只談到一次。在透露第二個五年計劃中農業的主要指標後，他指出，它們的提出是建立在以下考慮的基礎上的：

> 一方面，除了個別的地區以外，農業將會完成高級形式的合作化，這樣我們就能夠進一步按照《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規定，廣泛地採取各種增產的措施和推廣各種增產的經驗。同時，灌溉面積和耕地面積將會有所擴大，化學肥料的供應將會有所增加，生產工具和耕作技術將會有所進步，這些，都將促進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15]

總之，周把綱要看成了一個列人了各種可以提高產量的技術手段的文件。然而他接著警告，難以避免的自然災害，懇荒的艱難，以及低水平的農業機械化程度，「又使我們對農業生產的發展，不能要求有更高的速度」。[16]

但劉少奇仍然認為十二年綱要是一個直接明確產量目標的文件。[17]他指出：

> 為了適應整個國民經濟的需要，第二個五年計劃應當按照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所指出的方向，

> 把農業提到更高的水平。在 1962 年，要求生產糧食 5000 億斤左右……[18]

換句話說，劉少奇認為計劃指標應被視為完成十二年綱要規定產量的努力的一部分。言外之意是，雖然綱要可能已被擱置，但他，想必還有毛澤東，也應該還有別的領導人並不願意將它徹底埋葬。

此外，周恩來和劉少奇在提法上的分歧也發生在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進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規劃的表述上。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兩人都認為已取得「巨大的」成功。[19] 但劉少奇與周恩來不同，沒有立即強調挫折。

> **周說：**「我們的成功是巨大的，但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有一些不足和缺點，我們必須堅決改正。」[20]
>
> **劉說：**「我們已經取得了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巨大勝利，甚至我們的敵人都不能否認它……」。[21]

周的提法強調需要避免由於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過於自滿，言外之意是：起草第二個五年計劃必須謹慎從事。劉少奇的提法不那麼小心翼翼，暗示同志們不要成為懷疑論者。

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周恩來提出的，並寫在草案中的是：計劃必須「是積極的和穩妥可靠的」[22]，它規劃的發展速度是「比較高」的[23]。另一方面，劉少奇不溫不火地把發展的速度說成是「積極和穩妥可靠的」，但他在前面的一個段落裏則把計劃規定的發展速度說成是「巨大的和迅速的」。[24] 在劉少奇的提法與計劃制定者不同的背後，看來還存在著他對規劃的發展速度太慢的批評，以及對他所喜歡看到那一種增長（巨大的和迅速的）的暗示。周的看法是，計劃既是合理的，又是有雄心的。

周和劉在對十二年發展綱要，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評價以及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描述上的每一個分歧，如果孤立地看，可能僅僅只有細微的差別，但綜合起來看，並聯繫已知的對 1956 年冒進和 1958 年大躍進的爭論，它很可能意味著劉正在表露他對計劃制定者們在 1956 年夏天

放慢發展速度的不滿[25]。換句話說，劉少奇似乎在經濟發展速度問題上是和毛澤東站在一起的，雖然他和毛澤東一樣，在這個階段不得不接受了周恩來和計劃制定者們的聯合建議[26]。

各省關於 1956 年冒進的報告

周恩來和計劃制定者們當時如果沒有大量的證據使毛澤東和劉少奇確信他們是對的，就不可能在結束 1956 年冒進的問題上獲勝。計劃制定者們的根據從各省黨委書記們在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透露了出來。這些報告詳述了經濟冒進的影響。

受 1956 年整個生產高潮、特別是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影響的最明顯的例子、可能是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舉出來的。他指出，制定計劃時，有層層盲目地提高糧食增產指標的情況。當時在省裏糧食增產指標定為 16%，到了區鄉普遍提高到 40% 左右。[27] 代替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出席會議的譚啟龍指出，由於他們省在 1953 年犯了右傾保守的錯誤，1956 年省裏領導要求農業增長幅度過高和過快，因而導致了非常大的浪費和損失。增長產量的運動使基層幹部依靠命令主義。[28] 依據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的說法，他所在省的一些幹部感到，合作化以後「社員的小辮子抓在我們手裏，今後的事情好辦了」。他們不想去和群眾一起商量事情，生怕捲入各類矛盾觀點的漩渦中。「百姓百條心」是他們的習慣用語[29]。

江渭清舉了急躁冒進的例子。生產計劃訂得過高，耕作制度改革要求過急，推廣雙輪雙鏵犁，掃除文盲等項工作，不從群眾的實際需要與可能出發。領導機關把太多的責任壓到合作社身上，使得幹部們只能求助於命令主義。在一個村裏，這些做法已引起了一起自殺事件，這樣一來引起了全省對方法的討論，結果是拋棄了亂戴帽子和濫扣工分的做法[30]。

在湖南，幹部的合作化熱情也急劇地高漲起來。按周小舟第一書記的說法，一些幹部認為，既然合作社是一種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組

織，那麼，「一切都要公有化」才行，甚至如織草鞋和捕蝦等零星的家庭副業經營都統一歸集體經營，社員的時間被非常嚴格地控制和完全由集體支配，以至他們中有一些人抱怨，入了社一點自由也沒有了。[31]

在河北，第一書記林鐵在報告中說，領導被生產高潮所鼓舞，企圖很快地實現穀物自給自足，計劃把糧食產量比過去提高 36.39%，這導致了掘井太快，而後，很多井被證明是廢品；不恰當的密植在玉米生產中已產生不良後果；另外還在不適當的地區種植了種種高產作物。[32]

陝西是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高指標的制定，使幹部們忽視社員的健康和休息，一些幹部甚至要社員「把月亮當電燈，把黑夜當白天」。按第一書記張德生的說法，合作化戰役勝利以後，幹部中滋長了盲目樂觀和急躁情緒，過高估計農民的熱情，他們認為「只要想得到，便能做得到」。[33]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山東譚啟龍這樣的共產黨領導人，在指出過分熱情的危險性時，也感到必須在他同級面前作較高的產量估計。直到 9 月 29 日，他還在預告，1956 年穀物生產要增長 11%、棉花生產要增長 19%，而後來的情況證明，真正增長率只有 8.8% 和 3%。[34]

但其他省的書記們就已經吸取了教訓。陝西張德生說：「我們認為：越是勝利就越需要謙虛謹慎，就越需要發揚民主，群眾的勞動積極性越高，就越需要十分愛護和正確地發揚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張還批評了輕視農民經驗的幹部。[35]河北的林鐵感到，應從省內那種過分熱情的生產高潮中總結四個教訓，人們不能在主觀願望的基礎上過高估計客觀情況，當然人們也不應犯保守主義的錯誤。冒進的計劃如同右傾保守主義一樣，同樣影響農民增產的熱情。上級的計劃必須同下級結合，並允許下級留有迴旋的餘地。技術改造應是逐步前進，不能一步求成，先進的經驗必須在推廣前與當時的經驗相結合[36]。

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對 1956 年「冒進」不良後果的討論可能是最全面的了。這些批評中有一些已被引證過。周的建議有：凡是不適合集體管理的全部回到個體經營；對社員自留土地要適當放寬一些；要改善勞動管理，使每個都有機動的餘地；合理使用勞動力，避免工作負擔增加太大；對婦女和體弱的社員尤其要注意照顧；指標要因地因時制宜，充分考慮農村自然條件和習慣的差異。[37]

第一書記們注意到的 1956 年生產熱潮中的一個主要缺點是過分注重了糧食或經濟作物的種植。周小舟把它稱之為「簡單化的傾向」，而它已經嚴重影響了一部分農民的收入。在湖南，糧食緊張兩年後，農民因食品而產生的憂慮使這種傾向增長了。周舉了一個合作社的例子，他們的收入主要依賴苧麻生產，但那裏勞力和肥料都被集中於糧食生產上，導致苧麻減產了 20%。周說這種例子是很多的，並強調了其重要性。他指出，在湖南山區，農民收入的 40%-50% 是靠經濟作物和副業生產取得的，在省內別的地方，這種比例也高達 30%。[38]

在福建，按第一書記葉飛的說法，勞動、土地、肥料和資金都集中到增加糧食生產上去了，為完成糧食增產指標，對經濟作物和副業生產進行了限制。一些地區甚至宣傳這樣的口號「種什麼吃什麼，種糧吃糧，燒磚吃磚」批評想搞副業是「資本主義思想」。結果果樹、茶樹砍掉去種地瓜，把磚窯平掉種糧食，福建的「建蓮」蓮田被改為稻田。因為忽視了山區情況，某些特產的產量還沒恢復到戰前的水平。農村副業減產的情況在 1956 年上半年特別突出。生豬產量比 1955 年同期下降了 20%，磚瓦減產了 27%，雞、鴨、蛋產量也下降了。

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在一些地方達到這樣的程度（在福建，糧食收入佔全部農業收入的 48%，經濟作物占 28%，副業生產占 24%）：合作社農民沒有零花錢，買黃煙都要向合作社借錢。副食品和燃料價格的自然上漲又影響了城市人民生活。葉飛引用了一些農民的牢騷：「去年是有錢買不到糧，今年是有糧沒有錢買。」[39]

在四川，合作化引起了生豬以及中藥原料等地方特產產量下降。但在討論副業生產倒退時，李井泉還責備了商業政策。不合理的價格，商業管理按照行政區劃進行，對小販活動的限制，打亂了商品過去的自然流通路線。[40]

但有一個領導人，山東的譚啟龍，則為他的省沒能集中力量抓糧食生產而憂慮。他指出，山東每年每人消費180公斤糧食是低於全國水平的。他強調，增產糧食是山東黨組織面臨的重大任務之一[41]。

各省對中央的經濟要求

由各省黨的書記們提供的有關經濟問題的證據支持了計劃制定者們反對冒進的做法，但它並不意味著這些書記們都從中央經濟當局的行動中得到了完全滿足。他們的講話中，很多都是要求關心他們省的建設問題的，看來書記們都已很清楚地知道，隨著周恩來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這是地方公開地向國家要資源來滿足地方要求的適宜時機和場合。

一個重要的理由是需要更多的錢興修水利。譚啟龍在論述了增加單位產量以解決山東糧食問題以後（1955年山東糧食畝產量為241斤），接著就強調水庫和肥料的重要性。他說，省裏能夠發動群眾去改進灌溉，但在同時，我們「希望中央水利部門對治理以上幾條主要河流有關省與省間的統盤規劃以及在技術、投資等問題上給我們以支援」。[42]楊尚奎，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提出相同的要求，請求中央撥款修建水庫。[43]當林鐵在總結河北的海河問題時說：「我們迫切希望、也深信會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44]黑龍江省有特別的理由強調治水問題，因為年初松花江氾濫的災害剛剛過去。由於第一書記歐陽欽集中談了黨的領導問題，另一個書記強曉初代表該省提出，他的省在災後，已擬定了一個建設11個大小水庫的計劃，其中四個應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完成，他總結說：

為了作好根治松花江的工作，我們建議在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下，組織有關部門和有關省、區共同研究，全面規劃，並設立專門機構從事此項工作。[45]

中央要求山東省大量生產棉花、油料作物和煙葉，這引起了山東糧食生產的不景氣。譚啟龍為自己省說話：

我們認為，目前不宜過多過猛地擴大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而應積極從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著手……，因此，希望中央有關部門在規定種植計劃時，不要限制過死，使我們能夠根據國家需要與當地的具體情況，進行合理的安排。[46]

一些書記對幫助的要求則更為全面。海南區委第一書記張雲在代表大會上說，每個人都同意開發島上資源的必要性。他繼續說：

不過問題還在於開發的時間，也就是大規模開發，遲些好，還是早些好。根據我們的看法，是早些開發的好。因為，很多特種經濟作物，都是多年生的植物……因此，我們要求中央把大規模開發海南島農業資源列入第二個五年計劃。[47]

楊尚奎以感情和實際需要為理由，呼籲幫助江西。他指出，佔全省2/3面積的老根據地和佔全省1700萬人口一半以上的老根據地人口，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曾橫遭蹂躪，他們經常感到勞動力不足。他指出全省人口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下降了1/4，單被屠殺的就達100萬人。因而，江西鰥夫、寡婦、孤兒和孤老在人口中的比例很高。總的說來，他們的生活水平相當低，在老根據地的首府瑞金，一年的實際收入僅有42元。烈、軍屬和鰥寡孤獨以前「依靠國家的救濟維持生活，在實現了高級合作化以後，應該主要從發展生產方面來解決他們的困難。但是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就是五保戶太多，社員背不起來。因此這類地方在今後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仍然需要國家給予必要的救濟補助」。楊承認，國家對江西已給予了特殊的照顧，但他提出，江西某些負擔雖然減輕了，但另外一些負擔又加重了。自1951年以來，江西的公糧負擔每年都超過全國的平均負擔率，「總的說來，老根據地群眾的負擔

是重了一些，以致引起了某些群眾的不滿，並影響了他們生產積極性的發揮」。[48]

楊尚奎以及別的邊遠和交通不便省份的共產黨負責人，如四川的李井泉[49]，福建的葉飛一起，要求中央重新考慮價格政策，要求對交通不便地區的人民降低物價，以及提高對他們產品的收購價。

葉飛在考慮第二個五年計劃時，試圖將一些已列入規劃的工業發展項目爭取到福建去。他指出，1949 年以前，福建現代工業還不到全部工農業生產總值的 1%，全省甚至沒有一個像樣的工廠，福州造紙廠就算是唯一的現代工業了。1949 年以後，雖然發展了一些小型的搾油、制糖、鋸木和食品加工業，現代工業的比重已經發展到 11.32%，但福建相當多的木材、煤、鐵、水和漁業等資源相對來說還沒有開發出來。由於本地工業基礎薄弱，地方發展工業的能力受到了限制，需要國家大力的支援。一些年來，中央有關各部已關心這些問題，但仍嫌不夠，基本建設計劃和財政預算上控制得太嚴太死，強調消極限制而沒有給予積極的指導。他舉了南平造紙廠的例子，由於對設計文件反覆的審核，建廠規模經歷了八次重大的改變，廠址已經遷移了三次，前後為時六年，直到 1955 年第四季度才正式施工。現在如果古田水利發電站第一期工程（現在還不能滿足福州和南平地區用電的需要）不能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完工，那麼計劃中的福建工業計劃也將不能實現。

> 為此，我們要求中央有關工業部門，對福建應採取支持落後地區的辦法給予幫助，能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在福建辦幾個大型輕工業，完成古田第一期水力發電站的建設工程，以便逐步地改變福建的經濟落後面貌。[50]

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與葉飛不同，他主要從自己的優勢而不是從弱勢出發要求發展工業。雖然他也指出：「我們覺得，作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北京不僅應該是政治中心和文化科學的中心，同時，也應該建設成為一個有相當的近代工業的城市。」劉列舉了

北京的優勢，樣子就像美國南部城市的市長想要吸引北部的工業家那樣。他指出，在首都有中國科學院，有中央各部的許多研究和設計機構，一些新的科技研究部門的建立將使更多的專家進入北京。除此之外，在各類高等院校中還有約 10 萬名在校學生和教師，充分發揮首都科學技術力量，必定會大大地有利於提高國家工業技術的水平和加快工業發展速度。「我們認為，北京可以著重建設一部分精密機器和儀器工業」。劉仁指出，這些工廠可以在研究部門的幫助下，迅速掌握新技術和不斷地進行技術改革，而後者也能從理論聯繫實際中得到好處。劉還說，北京在附近的資源方面，在工業基礎、交通運輸方面，在氣候、地質等自然條件方面，也都有比較適宜的條件。如果劉在發言之初不曾詳細說明首都面臨的困難問題，劉的論據可能會更有力些。北京自 1949 年以來，人口比原來增長了 90%，另外政府部門無法下決心去決定工廠廠址和進行有關項目的互相協調。但他企圖反駁建立更多的工廠會增加首都服務業緊張的意見。他說，如果想控制北京的人口，那就必須靠有計劃的工業佈局，而不是靠限制工業人口的增長。[51]

讀了這些省委書記們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們對地方對中央當局無力很快地滿足他們的要求而感到的不耐煩，有一種深刻的印象。當然這不是中國特有的一種現象，甚至也不是一些嚴重缺乏自然資源，使得分配問題格外嚴重的發展中國家所特有的現象。但在像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中，這些問題會因行政系統的規模大和辦事低效率而更為複雜。

正是由於毛澤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才在當年早些時候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提出了分權的要求。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劉少奇迫切要求分權[52]。周恩來透露，已提出了一個關於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的決議草案，現正在傳閱，徵求意見。[53]但直到大躍進大大地削弱了計劃制定者的權力，各省書記們放手大幹時，分權才真正地實行了。

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問題

可能是為挽救毛澤東的面子，當年早些時候計劃制定者們贏得的一個勝利在代表大會上被沖淡了。這就是沿海和內地工業發展的問題。李富春在他向代表的報告中談及國家計委的錯誤時，僅承認：「對沿海工業的充分、合理的利用注意得不夠」，[54] 這也是年初他在全國人大的一次會上所最多願意承認的。劉少奇輕描淡寫地提及這個問題，僅宣佈「現在必須把注意力放在沿海與內地工業的協調上」，[55] 周恩來也強調需要合理使用沿海工業，並在這個講話中給合理性作了限定：

> 改建那些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建的企業；而不是改建一切的原有企業；在工業企業已經比較多的城市，一般地應該少建新的企業；新建和改建的企業，必須注意到原料來源、產品銷售、生產技術和運輸方便等條件，並且注意同其他地區的合理分工。[56]

周的提法很聰明，它沒有主張在沿海城市新建項目。實際上，從他提出必須考慮的諸因素來看，他是指沿海地區（例如已有許多工業企業的上海）不是新建企業最理想的地方。不過，他也沒有排除在這裏新建企業的可能性。

從在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有關計劃的決議的提法看，周可能僅僅是挽回了毛澤東的面子而沒有改變政策。決議指出：「但是在內地進行大規模工業建設的同時，還必須積極地、充分地利用並且適當地發展沿海各地原有的工業……」[57]（著重號為作者所加）。很清楚，「發展」既指擴建又指新建。《人民日報》7 月 8 日的社論指出，應該進行一些擴建。由於使用了「原有工業」這個詞，決議的制定者表明他們僅考慮擴建，雖然這裏仍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但這可能只是為了給毛留面子。如果毛澤東成功使得他的同事接受他關於在沿海地區搞新建項目的話，幾乎可以肯定，周和決議會更詳細說明那個觀點，李富春

的自我批評中，也肯定會批評自己沒有推進新建項目，而不僅僅是沒有充分利用沿海原有的企業。[58]

國防費用

如果說毛澤東在沿海工業問題上是失敗了的話，那麼他在論十大關係講話中提到的另一個問題上則取得了勝利。毛澤東關於減少軍費的意見，得到了計劃制定者們的擁護。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總理提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軍政費用從預算支出的 32% 減少到 20%。[59] 正如毛澤東所要求的那樣，國防的位置看來肯定比經濟建設要低。計劃內五項主要任務中的第五項是，「在增加工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加強國防和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60]（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削減軍費的背景是對國際形勢的持續樂觀態度。陳毅元帥在代表大會上作了關於外交政策的主要講話（陳在 1958 年成為外交部長）他指出：「世界上爭取和維護和平的力量不斷地發展壯大，執行侵略和戰爭政策的國際反動勢力處於日益削弱和孤立的地位。」[61] 他承認，美國「侵略集團」決不會自動放棄他們進行戰爭和侵略的陰謀，但他沒因此作出必須進一步加強中國國防的結論，僅僅說必須保持警惕，聯合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作出更大的努力。[62] 陳毅在另外的場合論及中美過去七年的關係時指出，中國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堅決反抗侵略，才能保衛和平」。但同樣他並沒有繼續說這意味著必須加強國防。[63]

在會上發言的惟一另一名元帥（除去國防部長彭德懷）是國家副主席朱德。他支持陳毅的分析。美國正暴露自己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並正日益走向孤立。

> 這些情況就使得國際緊張局勢有了緩和，當然，我們不能喪失對於戰爭危險的警惕性，但是，只要我們社會主義各國和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繼續加強團結，並且為維護

世界和平和人類正義事業而繼續進行堅定的鬥爭，那麼，目前已經出現的國際形勢的緩和，就有可能轉變為持久的和平。[64]

那兩位曾在 1955 年全國人大的會議上支持過彭德懷的元帥（他們在黨的八大後被提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沒有在大會上發言。彭德懷在大會上幾乎是在荒野中獨自呼籲，他以人們熟悉的帝國主義可能背信棄義等為理由，要求大力加強國防：

為著保證實現我軍戰略防禦的方針，抵抗帝國主義可能的突然襲擊，幾年來我軍在國防前線和縱深戰略要點進行了現代的國防工程建設。如果帝國主義侵略集團一天不肯放棄侵略計劃，我們的國防工程就要不斷地加強和改進。我們堅信，這種國防工程與掌握現代武器的人民軍隊相結合，任何敵人對我國發動的侵略，都不可能達到他們幻想的目的。[65]

彭在黨減少國防開支的決議面前，不能提出要求更多的經費。但很清楚，如果中國人民解放軍要放棄游擊作戰而使用陣地和現代武器來保衛國家，那麼在有把握可以抵抗美國人侵以前，更多的投資是必要的。毫不奇怪，彭德懷對國防支出和國家建設的關係的看法與計劃制定者們的看法有些不同，後者認為國防是有賴於建設的。彭德懷則說：

我國人民需要一個持久和平的環境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也需要一支現代化的革命軍隊，應付可能突然發生的事變，保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的責任就在於把這兩方面的需要恰當地統一起來。因而我們既要抓緊軍隊的現代化建設，又要在軍隊的建設中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要求，盡量節約，反對在軍事建設上的浪費。[66]

彭在講話裏認為，軍隊的現代化應放在經濟發展之前，而不是依賴於經濟建設。

彭的講話幾乎是孤掌難鳴，但也並不完全如此。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談到國際形勢時所作的分析類似於陳毅，可能陳的講話和劉報告

中的國際問題部分都是由周恩來的外交部起草的。[67] 關於台灣問題，劉和陳都譴責美國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但重申中國願意在外長級進行和平談判。[68] 陳和劉在這時都沒說美國在台灣駐軍是對大陸安全的威脅。但劉在由彭真起草的「國家政治生活」的段落中談到了台灣問題，在這一段話裏，劉的確把美國駐兵台灣說成是對中國最嚴重的威脅。就在這個論斷之前，劉還談到了人民解放軍，而他的語氣與彭德懷相似而與陳毅不同：

> 進一步說，為了保衛我們國家，我們必須繼續加強國防，我們必須繼續加強我們的國防軍——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戰鬥力，以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警惕地保衛我們的邊疆和沿海，保衛我們的領土完整。[69]

劉少奇講話的用詞看來是經過謹慎選擇的，暗示他同情彭德懷對削減防務經費的不滿以及對和平共處的懷疑[70]，而又不偏離黨的正式路線。把劉加強防務的要求和美軍駐台是嚴重威脅的說法並列在一起，代表們很容易看出其因果聯繫。但劉少奇自己沒提到這種聯繫。重要的是，雖然劉少奇在談到要加強防務問題時的語氣與彭德懷類似，但他沒提「現代武器」，即尖端常規武器的問題。實際上，兩個月以後，他已在支持毛澤東關於核武器相對重要的觀點。同年 11 月 16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增設第三機械工業部，這一被人們認為是負責核計劃的政府部門。[71]劉少奇懷疑常規武器的重要性:

> 我們現在已有了相當的國防工業，但它們是否有用是可以懷疑的，我們已經製造了許多飛機和大炮，花了許多經費，作了大量努力，但如將來它們絲毫無用，那我們今天是否在犯錯誤？[72]

劉被說成是表現了對核武器的盲目信任，但既然引不出任何劉的話來支持這種說法，我們可以假設，他可能只是重複毛澤東在他《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支持核武器的論述。總而言之，劉少奇在防禦

政策上是同意正式的毛澤東路線的，但是看起來他想對彭德懷表示同情，也許是出於對彭要求從黨章中刪去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的感謝。

第十一章 新的中央領導人

八大會議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選舉新的中央領導人。自從七大以來，黨員從 120 萬增至八大的 1070 萬，因此，新的中央委員會最明顯的特點就是規模大就毫不奇怪了。它由 97 名正式中央委員（七大是 44 名）和 73 名候補中央委員（七大是 33 名）組成。新的中央委員會在代表大會之後立即舉行了第一次全會，選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

1945 年政治局的確切組成從未披露過，自從那時以來又有新的成員被選入。然而到八大召開時，當時的 13 名成員還是眾所周知。八大後政治局擴大到 17 名正式委員和 6 名候補委員。[1]

新的政治局反映了某些主要政治現實，即人民解放軍在中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和當時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 1955 年任命的 10 名元帥中，有三名在七大時已經是政治局成員，[2] 四名在八大後召開的新的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全會上被增補進中央政治局，[3] 這意味著四個野戰軍的所有指揮員現在都成了黨的最高機構的正式成員。[4] 二名老資格的負責經濟計劃的官員在七大時已是政治局的成員，[5] 這次代表大會之後又有三名進入了政治局，二名是正式委員，一名是候補委員。[6]

這樣的黨的機構並沒有大量增加其政治局成員，僅僅增加了一名候補委員。[7] 這也許是由於七大政治局已經基本上包含了那些被主要認為是黨的官員中的大部分，雖然他們還兼有其它職務。不管怎樣，八大後的政治局看起來是想在黨、政府和人民解放軍之間保持一個大致的平衡。（參見附錄六）在這個平衡之下，人們從它的每個成員的位置高低上可以發現這是當時政治趨勢的一種反映。

鄧小平的上升

最引人注目的是，鄧小平從上屆政治局的最後一名上升到這屆政治局的第六名。他還在新設立的六人政治局常委會中被給予了一席之地。從這時開始這個常委會是黨的最高決策機構。但是鄧小平的提升，其具有最重要意義的也許是他的頭銜從秘書長變為總書記。

在毛澤東上升以前，總書記一職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的最高職位。當毛澤東在 1935 年 1 月遵義會議上戰勝了他的對手時，他似乎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獲得總書記的職位。這個位置由張聞天擔任，[8] 毛澤東不得不滿足於取代周恩來而成為黨的軍事委員會主席。[9] 據一份材料說，張聞天的位置是在 1937 年的晚些時候，共產國際因懷疑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與托洛茨基分子有聯繫之後受到削弱的。共產國際宣佈張聞天不應該再繼續擔任總書記。[10] 據說毛澤東也就利用此機會廢除了總書記這個職位。書記處從此開始向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而不是總書記——負責。[11]

不管這個過程是怎樣進行的，下面這兩件事情看來是確鑿無疑的：在遵義，那時被認為是黨內最重要職位的「總書記」被毛澤東的一個潛在的對手擔任了；而在隨後幾年的某個時候，這個位置消失了。即使毛澤東還不是黨的主席，但是那時，在組織上就再也沒有任何位置能夠控制他了。

到八大時，毛澤東從中央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上對全黨的領導比 20 世紀 30 年代末期時強大了不知多少。但是，如果恢復了總書記職位，並把它交給一個像劉少奇那樣老資格的人來擔任，這裏顯然仍存在著潛在的危險，任職者可能成為和黨的主席一樣重要的人物。雖然，這時毛澤東意識到有必要建立起他的同僚的獨立地位，但在他這時或以後的行為中，沒有任何跡象表示他希望樹立對手。他的設計似乎是在他逐漸隱退時，劉少奇會繼他之後走上高位的。

這樣，由於毛對總書記職位的不愉快回憶，可以肯定處在這個重新設置的位置上的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就必然要比繼承人低，一個不

可能向毛澤東挑戰的人。問題於是提出來了——為什麼在 1954 年選鄧小平為秘書長，[12] 並在兩年之後升上總書記的位置？更自然的候選人本來應是彭真。彭當時已是政治局成員之一，並且在黨的組織工作中更有經驗，[13] 關於彭真的問題下面將要更充分地討論，這裏我只集中論述毛為什麼可能更對鄧懷有好感。

鄧小平於 1904 年出生於四川，這個省產生的第七屆和第八屆中央委員人數在全國僅次於湖南（毛和劉少奇出生的省）。鄧是 20 世紀 20 年代一群為數不少的赴法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中的一員。從這群人中間——包括周恩來、李富春和陳毅——誕生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鄧參加了這個組織。他負責出版團的刊物的技術工作。他的工作效率很高，結果得了「油印博士」的綽號。在法國的六年期間（1920-1925 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後又在莫斯科呆了幾個月。在返回中國後，他在全國各地為黨工作，最後於 1930 年最終進入毛的江西根據地。鄧參加了 1934-1935 年的長征，並在 30 年代末期擔任了劉伯承部隊的政治委員，在整個抗日戰爭和後來的國內戰爭期間，他一直和劉伯承在一起，參加了對於戰勝國民黨具有重要意義的淮海戰役。劉的第二野戰軍最終接管了中國的西南，鄧成為了以他的家鄉為基地的西南局黨委第一書記。在 1952 年年中，鄧調到北京出任副總理。從 1949 年中央人民政府原任命了四名副總理，直至 1954 年根據新憲法重新調整政府，鄧小平是這段期間內唯一被增補者[14]。1953 年 9 月鄧代替薄一波而擔任了財政部長，但九個月之後，即在被任命為秘書長不久後他離開了這一職位。以秘書長的身份，他在 1955 年 3 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會議上作關於清除高崗和饒漱石出黨的報告。在接著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他（和林彪）被選入政治局。[15]

鄧的能力看來是毫無疑問的。他性格果斷精幹。有一次，一個欽佩他的省級領導幹部說他「真聰明」，解決大的問題往往只用幾個字。[16] 這個特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陳伯達攻擊為沒有恰當的調查就武斷決定。[17] 一個美國人伊萬斯·卡爾遜在延安時期曾會見過鄧，他把

鄧描繪為「矮胖結實，思維敏捷。一天下午，我們就整個國際政治領域的問題在一起交談，他的消息靈通使我感到吃驚」[18]。甚至陳伯達也不得不承認鄧給人的印象像是一部百科全書一樣。[19] 有趣的是，在鄧當了總書記之後，那些在西方觀察家中已經傳播的關於鄧小平的看法十年之後大部分被陳伯達所證實。英國劇場指揮邁克爾·克拉福特在 1956 年 11 月會見了鄧小平，他得出了和卡爾遜相似的看法。克拉福特說鄧是一個矮小、堅定、口才極好的人，他的個子即使按照中國人的標準來說也是矮的，人們估計他是 60 歲，但他看起來要年輕 20 歲。[20]

克拉福特報道說：「雖然據說他好爭論，並且他有些傲慢的性格使得他在同事中間不太受歡迎，但西方觀察家認為，他的影響現在已經甚至超過了周恩來。」[21]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陳伯達指責「鄧小平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自己的主張，他想讓總理聽他的。和鄧小平討論問題真和登天一樣難」[22]。

顯然，鄧是一個強有力的人，但是在勝利了的中國共產黨中有許多強有力的人，值得考慮的是，鄧小平為什麼能夠在 50 年代中期如此突然和如此絕對地超過他的同時代人。

鄧在 30 年代中期曾和毛有過密切的聯繫。他那時是少數真正可以算是在毛的私人小圈子裏的人之一——他們是哪些人，研究那個時期的作者們的意見是一致的。他們中間包括毛的兄弟毛澤覃，古柏（這二人在共產黨勝利的時候已經去世了），林彪，譚震林，陳正人，鄧子恢和鄧小平。[23] 1933 年，當毛的戰略思想被他的反對者在與「羅明路線」作鬥爭的幌子下批判時，鄧小平和毛澤覃一起，也遭到了批判。[24] 鄧小平和毛的兄弟關係是如此密切，以至於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想盡辦法來把他倆說成毫無關係。[25] 但是周恩來證實了他們的密切聯繫，並且證明了鄧小平在這個時期的卓越功績。[26]

我們已經看到，當毛的親信之一鄧子恢在合作化問題上與他意見相悖時，毛轉過來求助於另外二人——另一個江西同事陳正人和在延安時期跟隨了他的陳伯達。在下面我們將看到譚震林被提拔主管 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彭德懷在 1959 年對毛的批評被擊退後，他的國防部長職位被毛的另一個密友林彪代替了。而當文化大革命發生時，它的主要受惠者是林彪、陳伯達和毛的妻子江青。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說毛永遠不會和他所最信任的合作者鬧翻。從 1955 年的鄧子恢到 1971 年的林彪，許多這樣的人，包括鄧小平，都被打倒在一邊。但是儘管毛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於他願意既往不咎，並能和各種各樣的人一道工作，包括從前的敵人，但上面的事實證明，他像其他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一樣，還是喜歡讓經過長期考驗的同事來擔任特別重要的責任。

因此，下面這種假設看起來是合乎情理的，即那時任命鄧小平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這一具有很大潛在力量的職位與鄧小平和毛澤東過去的老交情很有關係。這個假設可以解釋其它許多事情——為什麼鄧小平在八大上對毛澤東的評價比劉少奇對毛的評價高得多？為什麼在 1957 年，是劉和彭真，而不是鄧小平，在毛的批評面前為黨的幹部辯護？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對鄧的批評主要是個人方面的，即對他個人的反叛，[27] 而對劉少奇的批評卻是一個同僚犯錯誤；為什麼鄧小平被官方指責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二號當權派（劉是第一號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的攻擊不僅比劉少奇少得多，而且甚至比級別更低的人也少得多？[28] 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鄧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中第一個被平反的。

假設毛確實對鄧的提升有責任，還是沒有證據表明毛此舉是在接班人問題上保留了另一張牌。[29] 但是至少鄧小平也許會把這個黨機器領導的位置看成是一個爭取更高職位的機會。肯定的是，新聞界出版的黨的重要會議的照片似乎是為了強調甚至誇大鄧的位置。[30] 還有一點也值得注意：從 1954 年鄧任秘書長到八大召開時為止的兩年零三個月期間，全國有 15 個省委的高層領導作了明顯的變動。可以作為對照的是從 1956 年八大召開後到 50 年代末期的三年零三個月中只有五個省委有變動，而在 60 年代開始直到文化大革命發動時的隨後六年中有

13 個省委發生了變動。[31] 鄧肯定明白，他所得到的黨組織事實上是劉少奇和彭真，以及他們的親密同僚，已被打倒的饒漱石[32]和安子文[33]的；也許他希望建立新的忠於他自己的關係網。然而，在 1956 年九月他還沒有強大到安排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地步。第八屆中央委員的名單看來是彭真和安子文準備的，據說他們是偏袒劉少奇的追隨者的。[34]

還值得注意的是，在八大上鄧小平批評了劉少奇和他的同事主持的吸收黨員的工作。劉沒有批評吸收政策，而強調了「絕大多數黨員在偉大的革命鬥爭中經受了鍛煉」，即使是在 1949 年後被吸收入黨的黨員也同樣如此。[35] 他僅僅承認大多數新黨員還沒有獲得足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36] 鄧承認大多數黨員是在完備的手續下被接收的，也承認在群眾革命鬥爭中吸收的黨員的質量是有保證的。然而他激烈批評了吸收方法，認為在「許多場合」造成了錯誤。[37] 他繼續指出：

> 在全國解放前後的兩年內，黨的組織發展過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區，這種發展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劃的，甚至有些地區，在群眾還沒有發動的條件下，就忙於大量徵收黨員，建立支部，因而使黨的組織一度產生了嚴重不純的現象。[38]

這段時間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彭真（在安子文的協助和劉少奇的指導下）在管理組織工作。

鄧還批評了黨的機構一度沒有看到從產業工人中吸收新黨員的重要性。[39]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披露出，毛在 1950 年 6 月即已指示吸收更多的產業工人入黨，而劉少奇和安子文卻有違毛的這個目標。[40] 鄧在他的八大報告裏對這件事的批評為此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提出）的真實性提供了依據，也支持了鄧是毛任命的這一假設。[41]

彭真遭受挫折

彭真是在八大後作為書記處中鄧小平之下的第二號人物出現的，顯然，這是擁有極大權力的職位。不過他本來可以有理由期望得到更

多的東西。大概鄧小平在 1954 年被任命為秘書長後，彭就失去了出任總書記職位的希望。但是他還可能被任命為副總書記，據劉少奇（這點是可以理解的）和鄧（這點不那麼可靠）認為他應被授予那個頭銜。[42]彭之後被指對毛主席懷有不滿情緒，因為他在八大時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43]

但是彭不僅沒有實現這些目標，它的位置反而下降了。在 1955 年的秋天，他從政治局的第 11 號位上（緊靠於兩個新成員林彪和鄧小平之上）升到第七位（僅在五個大人物之下——毛、劉、周、朱德和陳雲，康生是第六）。在 1956 年初的一個短時間內，他被排在康生之上，居第六位。[44]在八大主席團名單上——這個名單與八大前政治局人選一樣，——他仍然是在第七位上，但是在八大的政治局中他下降到第十位，以前比他地位低的鄧小平和林彪上升到了他之上，黨的兩個老資格人物劉伯承、董必武恢復了在他之上的地位。為什麼顯然完全有希望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彭降了下來？（他又為什麼沒有在代表大會上講話？[45]他肯定不是在忙著運行這次代表大會，因為他既不是秘書處成員，也不是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

有可能彭的下降是對他之前一年看起來過於積極地想爬上去的態度的懲罰。[46]可以想像他是由於與林彪的持續十年之久的爭執而遭受此挫折的。[47]據說，彭和安子文在八大上試圖以林彪不活躍為理由而把他排除出中央的領導。[48]更有可能的是，彭因為他起草的劉少奇報告中的政治決議不盡如人意而遭受了批評。另一個因素也許是毛和鄧想通過在書記處總書記和他的主要副手之間建立一個地位上的明顯的差距，來鞏固鄧新取得的位置。

再進一步的可能是毛生氣了，因為彭過於希望毛退居二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引證彭在 1956 年 8 月舉行的北京市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總有一天老演員應該退出舞台。[49]這非常可能是影射毛的；但是鑒於幾個月以後，毛也使用了同樣的比喻，彭也許僅僅是要他的官員做好毛隱退的思想準備。

但即使彭真沒有在八大之前向毛放冷箭，還是又證據顯示他對於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而感到不平。有人引用了彭真在八大閉幕後不到一個月的一次講話：「主席的話不是絕對的最後結論……。」[50] 然而在這裏，記住這一點是重要的，即 1956 年的氣氛不是 1966 年的氣氛，1966 年時，主席的每一個字都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彭的評論可能是毛批准的一個運動的一部分，而這個運動的目的就是想使中共逐漸減少對他的創始人物的依賴。

毫無疑問的是劉少奇在彭受打擊的事件中也收到了牽連。劉和彭二人在一起工作，密切配合已有 20 年了，在文化大革命的爭論中也總是彭而不是鄧小平被人說成是劉的集團中的主要追隨者的頭目。一則評論說：「劉少奇和彭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每次他出國前，總要通過電話和彭談話，或派人找彭來商議，或者他自己親自乘車去彭的家中。」如果讓劉來決定，他肯定會選擇彭真作為總書記的人選。[51] 而鄧小平卻是一個與毛有關係的人。他的任命，將導致重要的政治後果，尤其是在 1957 年，也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簡短地說，它的意義在於，從此以後劉少奇無法期望在之後與毛或者其他高級領導人發生爭執的時候獲得整個黨組織的支持了。

彭德懷、康生和張聞天的降級

另外三位八大前的政治局成員的地位遭受了比彭真更嚴重的打擊。在當時最具有最重大政治意義的是國防部長彭德懷蒙受的打擊。林彪元帥提升得比他高得多，這證實了 1954 年 9 月在政府任命副總理的名單中林彪的地位比彭德懷高的印象：也就是說，有人（可能是毛）認為公開建立這個印象是重要的，儘管林彪看起來並不活躍，但是他的地位比彭德懷高。

但是擔任政治局委員應該有 11 年，也許是 21 年[52] 的彭德懷遭受到了更大的羞辱。三名政治局新成員都高居於他之上。其中兩名是元帥——羅榮桓和陳毅，他們像林彪一樣，都曾經是他的部下。第三名

是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考慮到1955-1956年關於國防費用的爭論，這一任命的意義是更大的。這些變動的直接結果是破壞了彭德懷作為國家軍隊中第二號人物（僅在朱德之後）的地位，並且突出強調了經濟發展比國防更重要。

彭德懷遭受的挫折可能不僅是因為他與毛、周和李富春關於國防費用的意見不一致，而且由於是他建議從黨章上刪掉「毛澤東思想」——雖然毛不可能把這一點公開化。公開的、更正當的理由也許是彭在指揮朝鮮戰爭中所犯的錯誤。另一個個人方面的原因也許是毛把自己兒子的死亡歸咎於彭[53]。彭德懷似乎確信他和毛的關係在他從朝鮮返回後已經變壞了。據說，他在1953年之後的某個時候曾說：

> 我老了，失去了主席的喜愛，我對主席再不重要了。年輕的人已經上來，我不能擋住他們的路。我已經推翻了蔣介石和帝國主義，已經實現了我畢生的願望。我可以解甲歸田了。如果我不受喜歡，那就隨便吧。[54]

「年輕的」，彭大概指的是林彪，1954年底到1955年初，林彪在政府和黨組織內提升很快。同樣，林的提升部分地也許是由於毛不滿意彭的結果。特別是如果像後來所指控的那樣，彭在1953年與高崗有所接觸。[55] 彭與毛另一個意見分歧之點可能是，彭強調在現代化武器方面中國需要依靠蘇聯的援助。[56] 不管這種種原因怎樣，很清楚的是，彭德懷這顆星是從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始殞落的。對自己地位下降的不滿也許是彭德懷在大躍進之後對毛的政策的攻擊的一個原因。[57]

儘管受到挫折，彭德懷仍能夠以黨在國防方面的首席發言人的身份在大會上發言。他畢竟不只是國防部長，而且負責中央軍委的工作。[58] 但是受到更嚴厲的降職處分的康生和張聞天則沒有在大會上發言。這兩件事肯定是相關的[59]。康生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原因不詳。自共產黨執政以來，他顯然扮演的是沒有以前重要的角色。不過導致他降職的直接原因可能是由於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之後在共產黨陣營中普遍掀起的對秘密警察的反感。[60] 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以毛

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忠誠者的面目出現，這一事實說明，他和陳伯達一樣，同主席有長期的私人關係。如果的確如此，那麼很可能在八大上毛已經盡力使康生不致受到更大的屈辱了。毛與康生之間究竟有什麼緊密關係是難以弄清的。可能性之一是作為中央社會部（黨的保衛部門）首腦的康生，在 40 年代初整風運動期間向毛提供了藉以鑒別幹部忠實程度的材料。在同「留學生」（康生的同學）中像王明那樣的對手的鬥爭裏，康生作為一個從蘇聯回來的留學生，對毛也許極其有用。

至於張聞天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沒有明顯的直接原因。不過儘管張聞天曾一度（1935 年在遵義會議上）[61] 對毛有用，卻也一直是毛的對手，而且大概從未取得主席的充分信任。實際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地位誇大了張聞天的實際權力和影響。他雖然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卻未獲准向代表大會作的外交政策報告。當 1958 年初周恩來放棄外長職務時，繼任的是陳毅，而不是張聞天。有可能張聞天在政治局被保留下來，只是由於承認他在遵義曾幫助過毛的歷史作用。也許張聞天會覺得他應當受到更好的待遇，尤其是在外交部被陳毅超過後。若確是如此，那麼在 1959 年批評大躍進的時候，他和彭德懷一樣，可能也部分地是出於個人的不滿。[62]

附錄二：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對鄧小平報告的攻擊

如上所述，我確信，鄧小平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是真心捍衛毛，而且讚譽毛的。因此，考察一下文化大革命中對與此相反的說法，尤其是那些鄧本人似乎證明了這些說法的交待，可能是有意思的。

鄧在交待裏說，他從黨章裏刪掉了「毛澤東思想」一詞。[1] 從他負責起草委員會這個意義上說這也許是實話，但就我們所知，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鄧在這件事上不是在貫徹毛和政治局的指示。

鄧還從報告裏找出三條引文，說明他是怎樣讚許蘇共對個人崇拜的攻擊的。事實上，正如下面的對比表明的那樣，他的言論並沒有超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的評價，而大家知道，後者是經毛認可的。

> **鄧**：「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2]
>
>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我們也還必須從蘇聯共產黨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中吸取教訓，繼續展開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3]
>
> **鄧**：「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4]
>
>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二十次代表大會非常尖銳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流行，這種現象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的蘇聯生活中，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錯誤和不良的後果。蘇聯共產黨對於自己有過的錯誤所進行的這一個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5]

鄧：「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6]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國共產黨過去在革命隊伍中曾經不斷地反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毫無疑義，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這一類現象還是會長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還會再出現。」[7]

這些引自鄧小平報告中被認為是指摘性的話，其原來的上下文和摘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相應引文的上下文一樣，顯然是想表明，在中國有個人崇拜，但是發生在下層領導人之中，正是毛本人一貫同它作鬥爭。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鄧在交待中用了上述引文，但他既不想分析自己的「罪責」，也不坦白其動機。他只簡單地承認曾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說過這些話，就好像他知道別人指責他的是什麼，於是便羅列成大段引文來使交待能過關。[8]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談到鄧的報告所說的話。他只是說，報告反映了赫魯曉夫對個人崇拜的反對態度（這是實話，算不上是譴責），而沒有打算確定鄧的個人責任。[9]

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們不僅列舉鄧關於個人崇拜的言論來攻擊他，還覺得有必要貶低他肯定毛的那些話。一份「批判」材料絕口不提鄧提倡學習毛的著作，卻只說他「基本不提『毛澤東思想』」[10]。同一材料表現出，為了給鄧的報告抹黑，歪曲是多麼地必不可缺少。它說，鄧「有四次極為勉強地提到毛主席，但卻三次宣揚和讚美劉少奇」。[11] 事實上，鄧七次提到毛（包括提到他的著作），而且是像上面所說那樣，以肯定的、有時是高度頌揚的字眼提到的。另一方面，鄧提到劉時所用的卻不是像人們所說的那種頌揚的語言。

鄧第一次提到劉是這樣講的：「關於這個時期黨的工作的各個方面和黨在目前的任務，劉少奇同志已經作了詳細的報告。」[12] 這次提

到劉少奇，是要說明鄧的報告的主題與劉涉及的範圍有何不同。在稍後，鄧說：「關於〔新黨章的〕總綱的政治部分，在大家聽了劉少奇同志的報告以後，我以為可以不再作什麼說明了。」[13]同樣，這又只是在避免重複。鄧提到劉少奇，只有一次可算作是對他的頌揚。話是這樣的：「毛澤東同志在第七次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關於黨的作風的部分，劉少奇同志在第七次大會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關於黨章的總綱部分，對於群眾路線都作了精闢的解釋。」[14]這段文字對毛和劉的讚美是相同的，要說這頭半句是「極為勉強」地講出來的，後半句才有「宣揚和讚美」的意圖，這要有怎樣精準的分辨力才看得出來啊！

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們在企圖證明，鄧的報告是反毛的，所遇到的困難還可以由其公然改寫報告的行為來說明。據說鄧的報告的開頭是：

> 毛澤東同志領導全國人民從 1945 年起，只是在三年多一點的時間裏，打敗了蔣介石几百萬軍隊。……從 1953 年起，是劉少奇同志在黨的工作和任務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示。[15]（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這段話實際上是這樣的：

> 從我們黨在 1945 年 4 月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已經過去 11 年多的時間了。在這個期間，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黨都已經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在這個期間，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團結了全國人民，在不過三年多一點的時間裏，打敗了蔣介石的 800 萬軍隊，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 1953 年起，黨和人民政府又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並且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所有這些一個接一個的光輝的勝利，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規定的組織路線和七大以後黨中央的組織領

導的正確性。關於這個時期黨的工作的各個方面和黨在目前的任務，劉少奇同志已經作了詳細的報告。[16]

附錄三：中國領導層的「一線」、「二線」

中國最高領導層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由毛透露出來的。

> 依我看來，有件事17年來一直沒有妥善解決。起初，為了國家安全並且鑒於蘇聯在斯大林的繼承人問題上的教訓，我們提出了第一線和第二線。我處於第二線，其他同志在第一線。[1]

在另一次講話裏，毛詳述了設立一、二線的第二個原因：

> 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沒有當權，每次會議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沒有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沒想到走向反面。（陶鑄同志說：大權旁落。）主席說：這是我故意大權旁落的。[2]

很顯然，毛的講話裏有一個矛盾。他一方面說一、二線從1949年（如他所說，在說此話之前的17年）一直存在；另方面又表示，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聯發生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使他深信，有分為一、二線的必要。此外，他談到馬林科夫表明，正是馬林科夫未能保住一把手地位（經過長時間黨內鬥爭，1955年2月，他丟掉了部長會議主席職位）的結局，可能還有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威嚇政治局的行徑的揭發[3]，使毛著手把接班人問題作為迫切的問題來考慮。

> 毛的另一段談話為一、二線並非始於1949年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進城後〔即1949年〕就分散了，各搞一攤。特別是搞一、二線就更分散了。1953年財經會議以後，就打過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氣，向中央通氣，向地方通氣。」[4]（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這裏，毛把早期的「各搞一攤」同後來的一、二線時期區分開。所謂「各搞一攤」的時期，應該是1949年至1954年的那段時間，大批高級領導人遍佈全國，掌管著全國劃分成的各個大區。根據毛的敘述，1953年財經會議好像是屬於「各搞一攤」的時期；因為，一、二

線的問題不是這些領導人互不通氣的問題，而是他們不同毛通氣的問題。[5]

證明一、二線並非始於1949年的最有力的材料也是毛提供的：

為什麼說我〔對領導層分一、二線〕有責任呢？第一，〔政治局〕常委分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提議的……[6]

設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有更多職權的書記處，都是從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始的；它們都是新黨章規定的調整組織工作的一部分。這樣，最高領導層分為一、二線的時間不可能早於1956年9月。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後來還有林彪[7]，在第一線，毛在第二線。毛把常委分成一、二線同設立書記處聯繫起來談，並不意味著這兩件事是同時發生的。儘管如此，這個舉動強烈暗示兩者是有聯繫的。的確，一個有更大權力的書記處的設立，會使黨更好地自立。

還有一個證據表明，第八次代表大會期間毛就著手準備退居二線，這就是這次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裏關於名譽主席的規定。不言而喻，唯一能擔任這一職務的，只能是毛。退到這個位置上，定會既使繼承人得以接過中國共產黨主席那令人敬畏的職務，又不致正式地和徹底地剝奪毛在領導層裏的最高位置。

翌年初，毛對一大批聽眾明白地暗示了他的打算。毛這次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是在1957年2月27日講的，據一位聽過原講話錄音的中國工商業者說[8]，毛「把自己比作一個相當著名的戲劇裏的主角，但是他說他現在年事已高，不能勝任這個主角了；他暗示，他也許會很快卸任，去做一個配角」。[9]

就在這個月，似乎在彭真主持下起草了國家憲法的一個修改草案，它包括這樣一個規定：任何人擔任國家主席職務不得超過一屆。[10]這個修改草案從來沒通過，甚至也未公佈過。1958年2月，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裏正式透露他要從國家主席職位上退下來的打算時，曾指出放棄這次修改草案的原因：黨希望為在緊急情況下使毛有可能重新出任該職留有餘地。「六十條」指出：

> 今年9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先在各級幹部中間，然後在工廠和合作社中間，組織一次鳴放辯論，徵求幹部和群眾的意見，取得多數人的同意。這是因為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於我的身體狀況也較為適宜。如果在辯論中群眾發生牴觸情緒，不贊成這個建議，可以向他們說明，在將來國家有緊急需要的時候，只要黨有決定，我還是可以出任這種國家領導職務的。現在和平時期，以去掉一個主席職務較為有利。關於這個請求，已經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許多同志的同意，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11]

似乎這樣的情況不大可能實際發生了：在狂熱的「大躍進」[12]的頭一年，全國就毛即將去職展開廣泛的討論。但顯然，毛堅持了自己的打算。195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六中全會同意在1959年毛的任期屆滿時，不再提名由毛擔任國家主席。提出的理由是這使他得以集中精力通盤考慮政策和理論問題；對他的健康狀況隻字未提。[13]

在1959年4月召開的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劉少奇繼任國家主席。他在略先於這次人大會議舉行的黨的七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國家主席候選人。我認為，正是在這時或在此前後，毛正式退居二線。

毛本人提供了一條證據。文化大革命中，他說：「鄧小平從不找我商量。從1959年起，他沒找我商量過一件事。」[14]這個抱怨不為鄧提出理由，但可能鄧這樣做是由於他認為毛從此不再要人和他商量，因為他已退居二線了。

文化大革命中一篇批判劉少奇的文章提供了更為明確的日期：

> 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利用毛主席退居二線的機會，一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兼國防委員會主席。成為國家主席以後，劉少奇經常說，他非常忙，他的責任很重，他被責成掌管國家的全部事務。王光美甚至對她的孩子們

說：「爸爸很忙，沒時間休息。毛主席現在已經不管國家的具體事務了，把這些事全交給你們的父親了。你們不要打攪他。」[15]

這清楚地證明，毛是 1959 年 4 月退居二線的。為了強調劉的地位的上升，中宣部發出指示，從這年起，每年國慶節，報紙上應當並排刊登同樣大小的毛、劉畫像。[16]

可能毛這時也打算在第九次代表大會（按照 1956 年修改的黨章規定，應於 1961 年召開）上，從黨的主席退任名譽主席。結果，第九次代表大會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 1969 年才舉行。但有一個重要的證據表明，毛的地位的確在 60 年代初曾發生過進一步變化。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說：

> 1963 年，一線和二線的問題提了出來，主席退到二線。這是一項組織措施，可是，鄧以為現在他有了全部權力。在全黨占統治地位的還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然而，劉、鄧二人利用毛主席休養之機，在下層推行錯誤路線。[17]（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這是否就是計劃中的毛的最後隱退過程的開始，最終結果是他任名譽主席？如果確是如此，那麼上面提到鄧誤解了隱退的含義，這句話是否是說，原來的意圖是把毛之後的最高領導權一分為二，由劉擔任國家主席，而由鄧擔任更有權利的黨領導？這個問題將在本書的第三卷裏予以更為充分地討論。不過有可能在 1962 年初劉在七千人大會的表現之後，毛就對劉作為接班人不那麼熱情了。有一些來自蘇聯的證據表明，1962 年秋中共十中全會以後，更多權力從劉流向了鄧。[18]不過不管原來的計劃如何，結果卻大相逕庭。

附錄四：提到毛澤東講話的情況

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發言的該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在其講話開頭提到毛的講話者，列入「＋毛」一欄；未提及者，列入「－毛」一欄。字母「C」和「P」表示這些委員截至文化大革命開始，或截至其因政治或健康原因下台時，是在中央任職，還是在各省任職。

「1」表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2」表示非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3」表示文化大革命前已被清洗的中央委員；「4」表示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選出前去世的中央委員，在八大一次會議和二次會議後不久召開的八次中央全會上選入政治局的委員，姓名用大寫標出（此處暫以△代替——譯者）。

瀏覽一下這兩列名單，就會看出第八章所作結論有一些問題。例如，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提出的證據和說法表明，柯慶施自 1957 年整風運動的艱難之時直至逝世，一直是毛的積極支持者。他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沒有提到毛，這是否意味著毛在當時還沒有把他完全爭取過來？或者還有其他什麼解釋？董必武至少從 30 年代中期起就跟隨著毛，為什麼他在講話開頭也不提毛？對於蔡暢，也可以提出類似問題。她是李富春（他倒是提到了毛）的夫人，也是毛的密友之一、革命烈士蔡和森的妹妹。

儘管有這些疑問，數字肯定還是有意義的。在提到毛的 12 位中央官員中，7 名（占 58.3%）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裏復出；在沒有提到毛的 18 位中央官員裏，也有 7 名保留下來，但只佔 38.8%。合計，22 名中央和各省官員提到毛，9 名留任（占 40.9%）；32 名中央和各省官員未提到毛，10 名留任，只佔 31.2%。結論必然是：未在八大上表態贊同毛的講話，這一失策很可能被主席，當然還有某些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1]看作是比較要緊的一次怠慢，因為它正好發生在毛的地位問題有些敏感的時期。

	+毛				一毛		
	張德生	P4			張仲良		
△	陳毅	C1			章蘊	C2	
△	陳雲	C1			陳漫遠	C2	
	江華	P2			賈拓夫	C3	
	蔣南翔	C2			周小舟	P3	
	江渭清	P2			周揚	C2	
	錢瑛	P2		△	朱德	C1	
△	李富春	C1			謝覺哉	C1	
△	李先念	C1			謝富治	C1	
	李立三	P2			黃敬	C4	
	李維漢	C3			黃火青	P2	
	林鐵	P2		△	柯慶施	P4	
	歐陽欽	P2			奎璧	P2	
	賽福鼎	P1			賴若愚	C4	
	譚政	C3		△	李井泉	P2	
	陶鑄	C2	(1)		李雪峰	C1	(1)
	陶魯笳	P2			林楓	C2	
	滕代遠	C1		△	林伯渠	C4	
	鄧穎超（周恩來夫人）	C1			劉仁	C2	
					劉瀾濤	P2	
	曾山	C1			羅瑞卿	C3	(2)
	王恩茂	P1		△	彭德懷	C3	
	王鶴壽	P2		△	薄一波	C2	
	王任重	C2	(1)		宋任窮	P2	
	吳玉章	C4			譚啟龍	P1	
					鄧子恢	C1	
					蔡暢（李富春夫人）	C1	
					曾希聖	P2	
				△	董必武	C1	
				△	烏蘭夫	P2	
					王首道	P1	
					吳芝圃	P1	
					吳德	C1	(1)
					姚依林	C2	
					葉季壯	C4	
					葉飛	P2	

(1) 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即調入中央工作。

(2) 對羅瑞卿的清洗，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還是在其開始，還值得商榷。在同一篇講話裏，毛既提到文化大革命始於1966年1月之前（大約是從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發表算起），又說它開始於5、6月間（即在他的1966年10月25日講話前5個月，大約是從1966年6月4日《人民日報》透露彭真下台時算起）。（見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現狀背景》891號，76頁）

附錄五：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對劉少奇報告的攻擊

文化大革命中加給劉少奇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報告的最嚴重的罪名，大概就是他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並為國內資本家「塗脂抹粉」。其實，這些指控是站不住腳的。下面的話是紅衛兵小報經常引用的：

> 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已經在中國大陸上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除個別地區以外，也已經消滅了。富農階級也正在消滅中。……民族資產階級分子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1]
>
> ……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極其複雜和困難的歷史任務，現在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2]
>
> 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因此，鬥爭的方法也就必須跟著改變，完備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3]

上述引文被同毛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話裏的若干段落對照。被引用的一個段落是：

> 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4]

這兩段文字裏有一個主要的區別：劉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毛說還沒有解決。這也許代表了毛在 1956 年 9 月的看法，但也不能完全肯定這一點。在 1956 年毛的講話裏，沒有任何話表明他當時是這樣認為的。相反，1955 年 12 月，毛斷言社會主義的勝利「實際上已經得到了保證」。一個月之後，周恩來也

確認這仍然是他的觀點。若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時毛已改變了看法，他的開幕詞是向在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後感到極其喜悅的幹部們發出警告的一個適當時機：即使是現在，最後的勝利屬誰的問題仍未解決。

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直到 1957 年 6 月才發表，這時的政治形勢已有了急劇的變化。如上所述，一般說來，拿這篇講話同 1956 年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氣候下所作的報告相比較，這個方法在原則上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 1957 年初夏的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發生以後（見本書第三編），劉少奇也很可能會同意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最重要的是，應當始終記住，毛本人也承認他曾批准過劉的報告。如果說親自修改報告中涉及主席本人地位的部分對他來有些為難的話，他要是想提出不能過分樂觀地估計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鬥爭形勢，則是輕而易舉的。

劉說，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除個別地區外）作為階級已被消滅；毛說，這些階級的「殘餘」還存在。要說兩種提法有重大的區別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毛也說這些階級本身是「已被推翻了的」。

從劉的報告裏，可以引出一些話證明他對國內政局並不滿意；而從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也能引出另一些話說明他對國內政局感到樂觀。

例如，劉少奇在講了誰勝誰負的問題已經解決的話之後，又以謹慎的措辭補充說：「這不是說，我們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的任務已經全部完成。」[5] 在這段話之前，他還強調過階級鬥爭會繼續下去：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們〔指民族資產階級〕表示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共同綱領和憲法，表示願意繼續反對帝國主義，贊成土地改革；但是，他們又有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願望。因此，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同過去一樣，仍然是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6]

劉也預見到在工商業國有化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會長期繼續下去：「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前，階級鬥爭仍然繼續存在。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之間的鬥爭，還會繼續一個很長的時間。」[7] 劉還告誡大會代表，不能以為同反革命的鬥爭結束了：

> ……成批的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這個事實說明，一方面，反革命分子確實是存在著，認為可以放鬆警惕性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另一方面，只要我們的政策正確，反革命分子是可以肅清的，認為反革命活動會愈來愈嚴重的想法也是沒有根據的。[8]

相比之下，即使在資產階級右派進攻之後，毛還是顯然對國內形勢抱樂觀態度的。他在關於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第一部分的開頭就強調已經取得的勝利：

> 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變了舊中國的面貌……我國的 6 億人民正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進行著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9]（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就在毛發出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警告之前的一段話裏，還肯定了階級鬥爭形勢的好轉：

> 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10]

文化大革命中，劉為其 1956 年報告辯護時，引用了一段話，想證明他的確提到了階級鬥爭：

> 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是近幾年來我國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它反映著我國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進行「三反」和

> 「五反」鬥爭，是因為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進行了有害於國計民生的非法活動，不能不堅決地加以制止。[11]

劉的辯護中奇怪的是，引文有一部分不準確，而最主要的是，他竟漏掉了能給他以強有力的證明的一段話。正確的原文如下：

> 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是近幾年來我國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它反映著我國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從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同資本主義的經濟……經常地反覆地進行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其中主要的是 1950 年春天為了穩定物價而反對投機活動的鬥爭，和 1952 年反對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鬥爭。進行這些鬥爭，是因為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進行了有害於國計民生的非法活動，不能不堅決地加以制止。[12]（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除了詞句上一些不大重要的改變外，交待裏這段引文最主要的錯誤是把 1950 年反對資產階級投機倒把活動的運動同 1951 年 8 月開始的、在黨政幹部中進行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13]明顯等同起來。劉在原來的報告並未把「三反」運動列為反對資產階級的運動，這是正確的。

在交待中漏掉了用著重號標出的文字，這卻是很要緊的，因為就在那段辯護的引文之後，劉在交待中承認，他在報告中宣稱「我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已經解決」。[14]顯然，這樣的說法是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的論述的否定。如果要譴責劉少奇的話，就必須略去去報告中對國內主要階級矛盾的分析，而且也確是這樣做了。但是，劉為什麼要在原先的報告裏說這樣相互矛盾的話呢？答案是，他沒有前後矛盾。我在劉的八大報告裏始終未找到斷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解決的話。[15]相反，他指出，這種矛盾至少將存在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16]依照國家的贖買政策，這種改造至少在 12 年內不會完成。

劉在 1967 年的交待裏為什麼出現上述錯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他記錯了。雖然乍看起來，在 11 年之後，這也並不是不可能（如果他沒有得到報告的文本），但要說劉竟忘記了「三反」運動[17]的性質，似乎是難以置信的。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劉會忘記 1956 年國內的主要階級矛盾是什麼。

如果劉對這份交待確實能完全負責的話，他有可能是在故意地誤引自己的話，間接地來嘲弄那些強加於他的罪名[18]。另一種可能是，他被迫在一份由紅衛兵授意寫成的交待上簽名，這些人年紀太輕，不記得「三反」運動不是直接反對資產階級的。或者劉寫出的引文本來都是準確的，卻被散發交待的人篡改了。

有件事是顯而易見的：在能指控劉在 1956 年曾作出基本的階級矛盾已經解決的論斷之前，不對事實進行嚴重的曲解是不行的。

附錄六：政治局

八大以前			主要任職機關〔1〕	八大以後				主要任職機關〔1〕	文化大革命後〔2〕
1.	毛澤東	中共中央主席		1.	毛澤東	中共中央主席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psc
2.	劉少奇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P	2.	劉少奇	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P	o
3.	周恩來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G	3.	周恩來	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G	psc
4.	朱德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A	4.	朱德	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A	p
5.	陳雲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G	5.	陳雲	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G	cc
6.	康生		P	6.	鄧小平	總書記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P	o
7.	彭真		P	7.	林彪			A	psc
8.	董必武		G/P	8.	林伯渠			G	—
9.	林伯渠		G	9.	董必武			G/P	p
10.	張聞天		G	10.	彭真			P	o
11.	彭德懷		A	11.	羅榮桓			A	—
12.	林彪		A	12.	陳毅			A	cc
13.	鄧小平	秘書長	P	13.	李富春			G	cc
				14.	彭德懷			A	φ
				15.	劉伯承			A	p
				16.	賀龍			A	o
				17.	李先念			G	p
				1.	烏蘭夫		候補委員	P	o
				2.	張聞天		候補委員	G	φ
				3.	陸定一		候補委員	P	o
				4.	陳伯達		候補委員	P	psc
				5.	康生		候補委員	P	psc
				6.	薄一波		候補委員	G	o

〔1〕 A 代表解放軍；
G 代表政府；
P 代表黨。許多政治局委員有不少兼職；大多數元帥不再擔任實際軍事指揮工作。這張表僅作為權力結構組成部分的粗略指南，政治局委員們或在這些部門任職，或可估計他們同情這些部門。請注意：在這一時期，所有的副總理都是政治局成員，唯有鄧子恢是個例外，估計他是因為合作化問題上的保守主義受到了處分。

〔2〕 psc 代表政治局常委會；
p 代表政治局；
cc 代表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產生的中央委員會；
—表示文化大革命前已逝世；
φ 表示文化大革命前被清洗；
o 表示文化大革命中被清洗。

第三編

整風運動

第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的影響

東歐的危機

怎樣改造黨？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暴政和波茲南暴亂後面臨的問題。這個問題被提出的時機很合適，因為他們進入了一個由於多種原因需要改善黨和人民關係的時期。的確，1957 年整風前的形勢與 1942-1944 年[1]整風前的形勢有明顯相似的地方。廣義地說，兩者都是處在統一戰線時期，即中共在尋求非共產黨力量的支持。在 1942 年是為了反對日本人和國民黨，在 1956 年是為了發展國家。為了得到這種支持，有必要整頓幹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2]簡言之，教育他們更好地對待非黨人士。在這一點上，中國領導人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八大表明，在方式上他們存在著分歧。是僅限於黨內的積極思想教育，還是邀請黨外人士對黨的幹部的行為進行監督和批評呢？東歐形勢的進一步發展，使得這個決定的需要更為關鍵，但也加劇了中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

1956 年，當波蘭和匈牙利在非斯大林化的影響下，開始大膽說話時，中國人是同情他們希望擺脫蘇聯控制的要求的。中共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受到共產國際干涉的經歷使他們確信蘇共在處理外國革命的事務中是無能的。他們獲得政權後與斯大林打交道的經驗也能幫助他們理解東歐各國政府的怨恨。[3]

在八大時，毛把蘇聯的米高揚和波蘭的愛德華·奧哈布這些兄弟代表團放在一起來會見，並清楚地表明他支持波蘭的民族獨立要求。毛是如此故意怠慢米高揚，以致蘇聯代表團當天就飛離中國，而不是按慣例等到代表大會結束再走。[4]毛在與奧哈布的談話中，也表示同

情哥穆爾卡，這位波蘭領導人在 1949 年被開除出黨，1956 年 8 月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起的波瀾中恢復了黨籍。[5]

10 月 19 日早晨波蘭共產黨在華沙召開全會。哥穆爾卡和別的被清洗掉的領導人被吸收參加會議。波蘭的主要斯大林主義者和哥穆爾卡的長期對手希拉里·明克這時已被解除了職務。同時宣佈蘇聯任命的元帥羅科索夫斯基將不再被選人政治局。[6] 這些事件驚動了蘇聯領導層，使其於 10 月 19 日派出由赫魯曉夫率領的強大的代表團到達華沙，試圖阻止波蘭選出新的鼓吹擺脫蘇聯控制的自由主義領導人。代表團的干預失敗，於 20 日清早離開波蘭。在這一天晚些時候哥穆爾卡在全會上發表演說，21 日在會議的最後一天裏他當選為第一書記。在波蘭和平的「十月革命」後不久，10 月 23 日，匈牙利暴亂開始，學生和知識分子舉行大規模的示威，要求蘇聯軍隊撤走和舉行自由選舉。當示威的領導者試圖要求廣播他們的要求時，發生了布達佩斯廣播電台外的流血事件。[7]

當第一批匈牙利人死去時，劉少奇幾乎肯定在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就波蘭事件交換意見。[8] 10 月 23 日，毛與蘇駐華大使交換意見，大概主要又是談波蘭事件。[9] 中國領導人希望阻止蘇聯採取輕率的行為對付波蘭，特別是防止蘇聯的武裝干涉，如果蘇聯是這樣考慮的話。[10] 蘇聯領導人起草蘇聯政府 10 月 30 日聲明中關於鞏固蘇聯與別的共產主義國家之間關係的諸原則時，一定與劉少奇商量過。[11] 中國在 11 月 1 日就發表一個政府聲明表示他們贊成蘇聯的聲明，這個速度顯示他們事先是知道蘇聯人要說些什麼的。[12]

中國人支持波蘭，因為他們認為所有共產黨都有權進行自己的革命，如果取得了政權，就有權管理自己的國家。但是雖然他們贊成獨立，中國人卻不同意破壞共產主義體系或者是分裂陣營的團結。當在匈牙利所發生的事情，特別是納吉宣佈他的政府希望離開華沙條約組織表明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時，中國人就放棄了他們謹慎支持匈牙利人的態度，而支持蘇聯干涉鎮壓反抗了。[13]

匈牙利反抗和它的被蘇軍鎮壓，使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陷入混亂，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員退黨。[14] 11 月 11 日鐵托在普拉發表的一次講話中，支持蘇聯第二次入侵，認為這是保衛匈牙利社會主義制度的唯一方法。但他激烈地批評蘇聯對形勢處理的不當，這種處理方式使入侵成為必要。[15] 更重要的是，他把波蘭、匈牙利事件歸罪於斯大林主義的惡劣影響，說「個人崇拜的根源是官僚機構、領導方法中的所謂個人決斷及無視勞動群眾作用和願望」。[16]

11 月 10-15 日八屆中央委員會開了第二次全體會議。大會聽取了劉少奇關於當前形勢和中國對於蘇伊士運河、波蘭、匈牙利的政策的報告。劉應該談到了最近他與蘇聯領導人的會談，他強調在蘇聯領導下，加強陣營團結的重要性，以便更好地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顛覆。[17] 不能肯定是否在這時中國領導人有更深捲入東歐事件的意圖。[18] 但在全會期間，毛告訴中國領導層中的大部分，[19] 他日益關心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上所做所為的後果，毛說：

> 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20]（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這時毛大概還未向蘇聯領導人表示他不同意和平過渡理論。中國人後來說他們曾「在與蘇共同志內部討論」中對這個問題提出過不同意見，但是他們沒有給出討論的日期。鑒於中國人用「同志」和「領導同志」兩稱呼的特意區別，我們應該假定他們還沒有直接把這個問題向蘇共政治局成員提出過。[21] 中國人後來也聲稱他們沒有公開批評蘇共二十大的錯誤，因為面對著帝國主義企圖利用共產主義陣營中的困難，需要團結。他們也希望蘇聯領導人會看到自己道路的錯誤。但

中國人解釋說，劉少奇在八大講話中討論中國革命教訓就是表明，「和平過渡」的理論是錯誤的，行不通的。[22] 事實上，仔細閱讀劉少奇講話的有關段落表明，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並不是像他們後來所說的那樣有決然的態度。[23] 當然，即使劉談論中共奪取政權道路是對赫魯曉夫和平過渡的理論的謹慎指責，這也不能說明為什麼中國人在與蘇共「領導同志」的私下討論中沒有提出這件事。

但是在二中全會後的幾周裏，中國領導人一定感到他們最緊迫的責任不是批評蘇共已經犯的錯誤，而是使錯誤的後果不再進一步惡化。因此，在 12 月 29 日，他們發表了反駁鐵托普拉講話的文章，題目是《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24] 在 1 月初，周恩來中斷了他對亞洲的訪問，出訪蘇聯、波蘭、匈牙利，這成為中國「維護蘇共威信所做的巨大努力的一部分」。[25]

中國對鐵托的反駁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的任務之一，就是重申《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論點，即斯大林功大於過。但這時有一個更迫切的問題需要處理。自從《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 9 個月以來，一種認為不能把一切都歸罪於斯大林的觀點，在鐵托的鼓勵下，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流行。這種觀點認為，應該重新評價斯大林所處的社會制度。中國人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用這樣一種思想來反駁這個觀點，即共產主義國家裏可能存在著矛盾，可能會因為某個領袖，如斯大林這樣的人，忽視這些矛盾或是處理不當，而使之激化。中國人認為，共產主義國家裏的矛盾基本上是非對抗性的，但是處理不當能夠使之激化為對抗性的矛盾。文章說：

> 有了正確的制度以後，主要的問題就在於能否正確地運用這種制度，就在於是否有正確的政策，正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沒有這些，人們仍然可以在正確的制度下犯嚴重的錯誤，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國家機關做出不良好的事件。[26]

中國人堅持認為，缺點不在制度本身而在制度的「某些環節」。[27]

文章總結了蘇聯的經驗為其它共產黨提供的基本教訓。這些教訓中的第二條是，無產階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革命鬥爭」的方法奪取政權，[28]即使中國人還沒有對蘇聯領導人提出他們不相信「和平過渡」的理論，這篇文章終於做出了一個明確的公開表示。

在文章中提出了另外三個重要問題，這些都與中國下一年政策的發展有關。第一，在文章的開頭討論矛盾時，中國人清楚地提出了「非對抗性」矛盾可能產生於「人民內部」。[29]他們認為這些矛盾中有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和共產黨之間的矛盾。這是重申，以蘇聯為一邊和波蘭、匈牙利及別的共產黨國家為另一邊的分歧不是根本性的。更重要的是在馬列主義理論史上第一次斷言：「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政府和人民之間可能存在著矛盾。」[30]這個概念後來成為1957年整風的基礎，並遭到了赫魯曉夫的反對。[31]

文章的第二個重要方面是，它沒有告誡人們只反對教條主義，這是不同於前一篇文章的。在鐵托和別的一些人對蘇聯體制提出疑問以後，中國人指出相反的危險，即修正主義的危險，文章說：

> 但是一部分共產主義者由於對斯大林採取了否定一切的態度，由於提出了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口號，因而幫助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潮的發展。這種修正主義的思潮無疑是有利於帝國主義對於共產主義運動的進攻的，而事實上，帝國主義也正在積極利用這種思潮。我們在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堅決反對修正主義。[32]（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但是雖然中國人在這時對修正主義的危險有了警惕，他們仍然認為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33]的確，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教條主義仍然明顯被認為是比修正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雖然後來有人試圖更改這段歷史，提出整風是為了反對修正主義。

第三方面，文章重申了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中國後來幾年尖銳抨擊蘇聯共產黨的一個原因。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純說明性的開頭之後，文章直率地說「在觀察現代國際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首先從這樣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出發，就是帝國主義侵略集團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間的對立」。接著說：

> 飽受帝國主義侵略痛苦的中國人民永遠也不會忘記：帝國主義從來就反對各國人民的解放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從來就把最堅決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產主義運動看作眼中釘。[34]

鄧小平解釋中國的立場

1957年元月某日，鄧小平在清華大學解釋《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35] 他必須為這篇文章作辯護，以反駁那種認為文章沒有批評蘇聯的看法。鄧說：「我們對蘇聯基本上是滿意的。」[36] 況且，已經有了很多對於蘇聯的批評了，中國人來增加更多的批評就不合適了。共產主義陣營需要一個領導者，只有蘇聯，憑借它的巨大經濟實力和軍事優勢，才能勝任這個角色。[37] 關於斯大林，鄧只簡單重複了中國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的公開批評——斯大林在國內搞階級鬥爭擴大化，而這種階級鬥爭本來應該是被弱化的。[38]

儘管《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抨擊鐵托的，但是鄧依然認為南斯拉夫是符合社會主義國家標準的[39]。他甚至願意容忍那些認為鐵托的觀點比《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的觀點更正確的人，只要鐵托的觀點不被用作反對社會主義的武器。[40]

有趣的是，鄧小平似乎並不認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會有太大的影響。他告誡清華的聽眾：

> 不要絕對地相信和誇大《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的作用，你們不能指望每個人心悅誠服，不要指望這篇文章一發表，它的影響就遍及整個國際社會。[41]

周恩來的東歐之行

即使鄧小平對中國聲明影響力的懷疑是正確的，但是 1957 年元月周恩來訪問東歐還是具有歷史性意義。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在純歐洲的事務中扮演重要的外交角色。俄國人可能對必須邀請中國介入歐洲的事務感到不快，但是因為他們的威信低落，不得不依靠中國人的威信來支持他們的立場。

周中斷了他對亞洲國家的訪問，去訪問兩個發生問題的國家，波蘭和匈牙利。他的目的想必是用他靈活的外交手腕和個人魅力來貫徹《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提出的主張。但是他的成功是很有限的。元月 11 日周到達華沙機場，他說到蘇聯時，仍將它看成是共產主義陣營的領導者【42】，但是在最後他與西倫凱維茨總理簽署的聯合公報中沒有提到蘇聯領導的問題【43】。公報甚至沒有提到蘇聯干涉匈牙利，更不用說支持這次干涉了。公報僅僅表示反對帝國主義在那裏的干涉，支持新的卡達爾政府【44】。公報並沒有像《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那樣，暗示帝國主義干涉是暴亂的原因。

周樂意在中國人認為是關鍵的問題上妥協，這想必是部分由於中國相信新任的波蘭領導人是忠於共產主義事業的。波蘭人肯定對他說，在當前波蘭的氣候下，正式表示對蘇聯的服從並不可取。但是更重要是，中波聯合公報表明，毛並不認為來自修正主義的危險已經大到不能在原則問題上妥協的程度。

周對波蘭的訪問持續了大半個星期，但對匈牙利只做了一個倉促短暫的訪問，頭天到達，次日離開。這表明他的主要任務是調解波蘇之間的矛盾，在匈牙利他只是表示支持卡達爾的政權，這通過短暫的停留就可以完成。非常可能中國人對波蘭新領導人的支持超過對匈牙利新領導人的支持，可能僅僅因為波蘭人更會處理他們國內的事務和他們與蘇聯的關係。卡達爾畢竟是完全依靠蘇軍支持的，而這種政權中國人是不喜歡的。【45】

周在他彌合關係的訪問的最後與蘇共進行了又一次會談。在會談中，他再一次批評了赫魯曉夫和他的同僚處理斯大林問題的方式[46]。在他訪問結束後發表的公報顯示，俄國人儘管感謝他在東歐的調解，但是並不願意接受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提出的對集團內分歧的理論解釋。這篇文章主張毛的非對抗性矛盾的理論中包括共產黨國家之間及各黨之間的矛盾。公報的提法是完全不同的。

> 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中，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和利益的衝突。即使在過去這些關係中存在著錯誤和缺點，那麼在當前他們也正在改進和消除。[47]

這就進一步表明，蘇聯不喜歡毛在二十大後提出的關於內部矛盾的理論。

第十三章　一場整風運動成為共識

整風原定安排在 1958 年

周恩來結束東歐之行後，又繼續他原定的訪問亞洲的行程。同時在中國由於波匈事件，黨的領導不僅限於做意識形態上的聲明，而且採取一些實際的措施。八大之後，各地省委指示縣級以上幹部學習八大文件，反對三害——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1] 有一個省選擇主觀主義為主要敵人，[2] 另一個省根據整風原則提倡自我檢查和自我教育[3]，還有一個省甚至開展了自己的整風運動。[4] 這種不同方式的做法表明，即便北京繼續提倡反對三害，但是中央還沒有發出全面整風的指示。[5]

同時，北京方面重提黨要向非黨人士學習[6]。1956 年 11 月，毛以公開發表紀念孫中山誕辰 90 週年頌詞的方法，間接地鼓勵這種作法。在這篇文章中中，他提出共產黨員不應過於嚴厲地看待孫中山的錯誤。[7] 推而廣之，毛的這種讚賞和寬宏大量的態度可以應用於所有非共產黨的政治家、官員和學者，他們許多人是受孫中山思想培育的。

11 月 15 日，他在八屆二中全會的總結中號召全體幹部要用整風的方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但全會公報的用詞表明，這是他個人的呼籲而不是官方的指示。[8] 但是，在 11 月中旬至 1 月中旬期間某時，中國領導人取得了一致，決定開展整風運動。1 月 16 日，半月刊雜誌《中國青年》發表文章披露：「黨中央最近決定從 1958 年起全黨將開展一個改進工作作風的整風。」[9] 這個決定以前沒有召開全會，人們可以得出結論：該決定可能是在政治局擴大會上作出

的。也是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的要點。[10]

作出這個整風決定可能是因為黨日益關心黨與群眾的關係，怕東歐式的危機在中國重演。[11] 中國領導人採取了一些步驟以表示他們想要使黨的領導更溫和些。12 月，劉少奇在黨的組織部門負責人會議上說：隨著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反革命分子越來越少，專政的機構在量上要減少，在質上要改進。[12] 1 月，他宣佈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他贊成「小民主」，並且也同意「搞點大民主」，即為了反對一些嚴重的官僚主義的個例可以開大規模的鬥爭會。[13] 同時，毛在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也極力主張，不要怕罷工和騷亂。[14]

鄧小平 1 月在清華的報告中也承認在近幾年，專政在一些地方有些過分，雖然他很快地補充說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就是建立在這種專政的基礎上的。在當前，如果不放寬一點就是一個錯誤。[15] 但是他也反對大民主，大民主的結果是在整個社會上使紀律渙散和影響生產，在黨內破壞民主集中制，使一個領導集團被另一個領導集團推翻。[16] 鄧堅決地支持毛的「百花」方針，認為顯然文學藝術已從這方針中受益許多。他繼續說：「在這個時候提出這個口號是使唯心主義自由說話，其目的是為了宣傳唯物主義，因為真理越辯越明。[17]

抵制百花齊放方針

儘管中央總書記提倡百花齊放的方針，但是在宣傳幹部中還是有相當大的牴觸情緒。這種抵制無疑反映了共產黨員較為普遍的擔心，即在最近寬鬆的政治氣氛中，他們相對於非黨人士的優越地位已經被削弱。這種擔心在對待毛八大講話的態度中已顯示出來。現在，隨著匈牙利暴亂的發生，中國人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攻擊了那些動搖的共產黨知識分子，並且警告要反對修正主義[18]。這些顯然鼓勵了一群軍隊的宣傳幹部，他們不滿意百花齊放的方針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影響。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陳其

通為首的一些官員，元月 7 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抱怨說：對公式化的批評是必要的，但是這已被一些反對文學藝術服務於政治的人所利用。[19] 而且，人們熱心於恢復舊的文學，而不願創造社會主義的新文學。

文章引起了人們巨大興趣，受到了多方面的評論，大部分評論是支持作者的。[20] 上層宣傳機構顯然同情這種強硬觀點，因為《人民日報》兩個月內沒有發表任何有份量的反駁這篇攻擊毛的政策的文章。[21] 結果，毛不得不親自捲入這場鬥爭，以暗示他的不愉快。

僅在陳其通的文章發表 5 天之後，元月 12 日，毛就寫信給《詩刊》的編輯們。這一刊物的第一期很快將出版，它將發表所有毛能回憶起的自己寫的詩。

> 惠書早已收到，遲復為歉！……這些東西（即他的詩——作者注）我歷來不願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22]

這封信的第一句話表明，雖然《詩刊》的編輯找毛索詩已有多日，但是在這之前，毛並不打算費心去答覆他們。看來很可能是陳其通等人攻擊百花齊放的政策，促使了毛採取行動。因為毛的信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他表示喜歡新詩，承認他擔心他的詩可能起鼓勵相反趨向的作用，然而他又批准他的舊體詩出版，而沒有說出克服了這種擔心的原因。結論似乎必然是：毛希望表明他雖然支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原則，但是他依然贊同百花齊放的政策的寬容態度，特別是針對老作家。今後那些希望恢復傳統文學的人（就是陳其通等人所特別擔心的）就可以提出這樣一個事實，毛本人也是使用舊形式的。[23]

儘管毛介入了古典形式問題，但是教條主義者的反攻還在繼續。他們集中火力攻擊王蒙的《組織部新來了個年輕人》，指控這位青年作家譴責整個共產主義制度。批評者有上百個，他們肯定是被同一時

期在蘇聯發起的對弗拉基米爾·杜丁采夫的批判所鼓勵，杜丁采夫在《不僅是麵包》中描寫理想主義官員和玩世不恭的官僚們之間類似的鬥爭。[24]

周恩來的報告和整風的提前

周恩來訪問了錫蘭，從而完成了他的亞洲之行，並返回中國。他於2月6日到達雲南的昆明。5天前人大秘書長彭真率領人大代表團，在對東歐進行了一個長期訪問後回到北京。周恩來在3月5日就向政協報告了他的訪問，但是彭真直到3月31日的人大常委會召開，才有機會做他的報告。[25]這個報告的延遲的重要性很快顯現出來。

2月7日，周在昆明接見了人民解放軍戰士，[26]之後幾天他不見了蹤影，直到12日才到達北京。他和代表團可能在昆明休息，但是看起來更可能的是他們在向毛澤東，可能還有別的領導人匯報（大概在浙江杭州）。[27]

不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周向毛匯報，他所匯報的內容都出現在他的政協講話中。他對他訪問的3個國家得出同樣結論：「共產黨的領導層開展糾正錯誤的運動是有利的。當他談到蘇聯時說：通過接觸蘇聯的領導人和各方面人士，我們認識到，他們批評他們工作上的錯誤和缺點是有利於蘇聯社會各方面工作和社會生活的發展的。」[28]在他對波蘭和匈牙利做出類似評價後，他談到帝國主義利用共產黨錯誤的問題：

> 世界上一切反動勢力都喜歡社會主義國家遇到困難和犯錯誤，他們徒勞的利用我們的困難和錯誤，以分裂我們。但這一切都是完全沒有用的。通過不斷克服困難和改正錯誤，我們的事業將不是被削弱，而是肯定將變得更強大，更繁榮。[29]（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周顯然是要解除一部分人的疑慮，他們害怕整風和揭露錯誤會被帝國主義利用從而導致可怕的後果。這些憂慮可能由《再論無產階

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文章的論點而產生。在那篇文章中，中國人接受了匈牙利官方的分析：國際帝國主義在暴亂中起了「主要和決定性的作用」。[30] 周在對他同僚的私下報告中，可能勸他們丟棄這種令人寬慰的說明。因為只有他認為國內因素是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他才會確信，帝國主義不能趁別的國家糾正錯誤之機達到類似的目的了。[31]

彭真的觀點則相反。從 1956 年 11 月到 1957 年 2 月 1 日，彭真和他的人大代表團在東歐進行了兩個半月的訪問，訪問了蘇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這些國家除了南斯拉夫之外都是陣營中保守領導者當政的國家，他們堅決地支持蘇聯在匈牙利的立場。與周不一樣，彭沒有聽到波蘭人高度批判性的意見（在中國人看來，波蘭人的觀點比特立獨行的南斯拉夫人的觀點更有份量）。彭也沒有親自訪問匈牙利。所以，個人因素除外，彭真對東歐教訓的理解與中國總理有所不同，也是不奇怪的。

只有一個國家是彭、周都訪問過的，這就是蘇聯。但是彭對這次訪問的評論與周的評論有所不同。彭真並沒有提到蘇聯糾正錯誤的問題。甚至，雖然周提到在匈牙利和波蘭的糾正錯誤運動，彭似乎沒有發現其他兄弟國家在糾正錯誤，他反而強調這些國家的巨大成功。[32] 雖然他沒有訪問匈牙利，但當彭講述在羅馬尼亞偶然遇到匈牙利少數民族時，他順便提到了帝國主義在暴亂中起的作用：

> 在匈牙利事件爆發之後，匈牙利族人民集會，譴責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在匈牙利的顛覆活動，堅決支持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的立場和指示。[33]

在總結他的訪問的收穫時，彭真說，帝國主義國家知道他們將是任何新的大戰的失敗者，所以，他們試圖利用各共產主義國家內和各國家之間的分歧意見和分裂，他補充說：

> 匈牙利事件和他們（帝國主義）挑撥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矛盾的行為，是這種犯罪行為的鐵證，帝國主義國家這種犯罪行為

清楚地告訴各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根本問題是加強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和國內的團結，根本問題是提高我們的警惕和消除一切反革命分子。[34]（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如果聽取了彭真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內部分歧的警告，就會妨礙整風運動的開展，因為整風將會不可避免地公開一些社會黑暗面。但是毛顯然贊成周的分析，並且在這個觀點的基礎上決定提前一年開展整風運動。[35] 直到毛關於整風運動的主題講話後很久並且新的整風時間表公開發表後，彭真才得以發表他的反對觀點。以下是相關事件大概的時間表（括號表示推測的事件）：

2月1日	彭真從東歐返回北京。
2月6日	周恩來到達昆明。
2月9-11日	（周恩來在杭州向毛和其他領導人匯報）
2月9-26日	（大概在杭州開會，在這些天裏的某一個時候，決定提前整風）
2月12日	周恩來返回北京。
2月12-26日	（毛準備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
2月27日	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
2月27日-3月1日	最高國務會議聽取和討論毛的講話。
3月5日	周恩來向政協報告他的東歐之行，強調共產黨糾正錯誤的重要性，同一天，宣傳部長陸定一發表文章紀念延安整風15週年，披露一個新的運動「即將開展」。[36]
3月6-13日	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討論毛的人民內部矛盾講話和即將來臨的整風運動。
3月12日	毛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對最廣泛鳴放給予個人支持。
3月31日	彭真在他回國兩個月後，報告了他的東歐之行。

第十四章 毛分析人民內部矛盾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2 月 27 日，毛澤東以國家主席的身份，召集了 1800 名黨內外負責人士參加最高國務會議。聽取了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這篇講話醞釀了幾乎整整一年。[1] 1956 年 2 月 25 日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促使中共中央委員會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論述了毛關於在共產主義國家中可能存在矛盾的學說。毛澤東在他的十大關係和雙百方針的講話中，也已開始設法解決如何處理這些矛盾的問題。匈牙利事件後，中國共產黨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繼續分析並斷言人民與政府的矛盾是共產黨國家內所可能存在的矛盾之一。這時，在周恩來的報告之後，毛澤東已經準備好了來詳細地闡述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闡明在中國特定的情況下，如何發現這些矛盾，並且提出消除這些矛盾的方法。

毛澤東把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人民」解釋為「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2]對被列入「人民」行列之內的人，似乎並不明確要求他們擁護社會主義革命，雖然說如果一個人反抗社會主義革命，或者敵視社會主義建設，就可能被劃入人民的敵人行列。換句話說，只要他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工作，毛似乎就願意容忍不贊成社會主義的人。

在人民中，勞動人民（即工農）之間的內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的；而勞動人民和資產階級之間（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有對抗性一面，也有非對抗性一面。如果處理得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基本上是對抗的矛盾，都能夠轉化為非對抗性的矛盾。[3] 處理

這些非對抗性的矛盾與處理敵我矛盾必須有所不同。甚至對工人罷工或學生罷課，也不值得大驚小怪。應當細緻地處理這些問題，並把它當作清除該單位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的一個機會。[4]

換句話說，毛認為在共產主義國家內，政府或人民不用訴諸暴力，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和爭論。「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痺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5]就像在匈牙利所發生的情況那樣。

儘管講話內容在公佈前被作了種種限制性改動，但這顯然是一種更加人道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這種共產主義將使所有爭論都可以通過討論和說服加以解決，避免斯大林主義，並使所有人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工作。這最後一方面是至關重要的。構成整個講話基礎的設想是，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即人民）是可以一起協作的。這篇講話的實質部分，是以一曲對國家團結所作的激動人心的讚歌開始的：

> 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變了舊中國的面貌。祖國的更加美好的將來，正擺在我們的面前。人民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國的六億人民正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進行著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6]

這種團結能保證即將開始的整風運動以正確的精神開展：

> 在這裏，首先需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因為如果在主觀上沒有團結的願望，一斗勢必把事情斗亂，不可收拾，那還不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還有什麼黨的團結？從這個經驗裏，我們找到了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或者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全國解放以後，我們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也採取了「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

法，要求所有的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機關、團體，總之，六億人口，都採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7]

毛總結他的理論說，社會主義制度，意即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在中國已經建立起來了。儘管這個制度適合於生產力的發展，但是還很不完善，因此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之間有矛盾。同樣地，上層建築，即國家制度，和經濟基礎之間也又相適應又相矛盾。這種矛盾的存在，應歸因於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官僚主義作風和國家制度的某些環節還有缺陷。激烈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某些階級鬥爭還會繼續。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人們對它感到習慣，還需要時間。[8] 毛結束其理論時說：

> 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線，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9]
> (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這裏，再一次地體現了毛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一文的主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極其重要的任務是發展國家的經濟。解決這些矛盾的重要性在於，它能使這個任務得以順利進行。當毛作這篇講話的時候，對他來說，向自然界開戰顯然要比階級鬥爭更為重要。在當時，劉少奇和其他領導人也是這樣的看法。[10]

1957 年 3 月 12 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對非黨聽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據說有一個人聽了毛的講話後，激動得一夜沒有睡覺。[11] 一位已經做了周密的計劃準備要逃離這個國家的商人羅伯特·羅，也對自己不留在中國產生了懷疑：「我當時感到茫然。毛講話以後，似乎一切都有了可能。這些年來，我第一次有了希望。」[12] 然而，由於後來刪去

了對錯誤的承認並增加了對過分自由的言論的警告，就不可能完全體現這篇講話原來的精神了。儘管如此，在 3 月 12 日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對將近 500 名有關部門的黨內外幹部就整風運動做了第二篇專題講話。這篇講話的文本，看起來與講話原意大致接近，它能使人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為什麼像羅伯特·羅那樣的人聽後會感到震驚。[13]

毛澤東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非黨聽眾相信他真誠的意圖。因此，他坦率地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些嚴重錯誤。[14] 他在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的目的，則是要說服在宣傳和文教部門工作的基本上是共產黨員的官員們同意讓人們更自由地發表意見。因此他必須使這些官員相信，這樣做不僅沒有危險，而且大有裨益。[15] 特別是他必須使這些官員對在即將開始的整風運動中鼓勵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所產生的後果放心。為了馬上解決這個必然是黨員思想中最主要的問題，他重申了僅在一個星期前周恩來所使用過的論點。所不同的是，周是用東歐的例子來論證他的觀點，而毛用的是國內的例子：「我們自己來批評自己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這會不會使我們的黨喪失威信呢？我看不會。相反的，會增加黨的威信。抗日戰爭時期的整風就是證明。」[16]

正像一年前周恩來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中所做的那樣，毛詳細地闡述了非黨人士對於經濟發展的極端重要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中國共產黨改善同這些人關係的必要性。他的這些話是值得大段引用的，因為它們是從 1956 年 1 月以來毛就一直設法灌輸到那些持懷疑態度的黨員幹部頭腦中的那種思想的實質，而 1956 年下半年東歐局勢的發展更是證明了他這一思想的重要性。還值得強調的，是這一段話比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對同一問題的論述更長，更堅定，這或許是因為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在發表前作了修改：[17]

> 為了達到建設新中國的目的，對於什麼困難我們共產黨人也是無所畏懼的。但是僅僅依靠我們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

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鬥，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苦的任務。我們所以要整風，現在要整風，將來還要整風，要不斷地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這項任務，更好地同黨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18]

毛接著在引人注目的一段裏，鼓勵非黨人士通過批評來幫助黨：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們希望一切同我們共同奮鬥的人能夠勇敢地負起責任，克服困難，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共產黨人方面，我們要給這些合作者創造有利的條件，要同他們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關係，要團結他們一起奮鬥。[19]（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毛顯然預見到了潛在批評者可能的猶豫和中共黨員對批評的敵視。鑒於這種情況，如果此時他提出一些標準來引導批評者和使幹部放心，那將會是有益的。然而，他卻是只設法鼓勵批評者：

不敢寫文章怎麼辦？有的人說，有文章不敢寫，寫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評。我看這種顧慮可以消除……如果你寫得對，就不用怕什麼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正確的意見。如果你寫錯了，那麼，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並沒有什麼不好。[20]

他不僅完全沒有給批評提出任何標準，而且在講話的八個部分中明顯最長的一部分裏，繼續提出，在提意見時，方針應該是「放」，而不是「收」。[21] 根據毛的解釋，放的意思是：

> 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們採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於我們國家鞏固和文化發展的方針。[22]

毛在這段所說的和他在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中所概括的觀點，在原則上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在語氣上有很大的不同。在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毛對黨的批評者更為寬容和更加鼓勵。毫無疑問，這種語氣上的不同，部分是由於在發表對矛盾問題的講話前加以修改的必要性。但是，毛在主要對黨的宣傳幹部（他們都是正統觀念的維護者）的講話中關心的可能是確立批評的正當性，即使有過分強調的危險。

的確，毛把他講話的一部分專門用於要求批評者不要有片面性，不要只看到壞的方面。然後，他談到了提倡避免片面性自然會引起的批評者的憂慮：

> 有人說，既然要整風，要大家提意見，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讓人講話。[23]（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毛承認「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帶一點片面性，這是困難的」[24]，但要求批評者盡量用全面的方法。然而，最終，為了促進批評，他顯然願意容忍片面性。正像他所說的那樣：「片面性往往是難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問題都必須很全面，這樣就會阻礙批評的發展。」[25]

關於整風運動形式的不同意見

黨整風的必要性，已為中國所有主要領導人所承認。但彭真，也許還有其他人，由於怕匈牙利事件後政治氣氛太反覆無常，據說反對提前時間表。毛拒絕接受這種看法並要求提前，但不同意見仍然存在。這些意見主要涉及到整風運動將採取何種形式。但是，似乎毛的一些同僚也反對他通過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為全國整風做準備的方法。

毛的打算，是使整風運動面向所有人，而不是只局限於黨內。他在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曾說，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不願意的就不參加。[26]他還說在整風中要求「每個人」都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是，黨的幹部卻對黨外人士參加整風的想法表示不滿。宣傳部長陸定一3月5日為《人民日報》寫的紀念第一次整風運動15週年的文章（大概是為第二天開始的宣傳會議提出指導方針）中，沒有提到非黨人士參加整風。陸定一在對20世紀40年代的整風運動作了很長的歷史敘述的基礎上，論證了整風運動是「黨內的一次偉大的思想革命。毛澤東同志創造了整風運動這種適合於黨內鬥爭的運動形式，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學說的一個偉大貢獻。」[27]（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陸定一把整風方法的創造者說成是黨而不是毛，這就表明黨對這個運動的接受的限度：「我們的黨創造了整風運動這種方法來解決黨內矛盾，並且從這裏開始，逐步地發展了一套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工作方法。」[28]（著重點為作者所加）這後一段話含義是明確的，首先黨自我整頓，然後逐步形成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這兩個時期的方法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但是，1957年毛把黨的整風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看作是同一過程中的一部分。毛要非黨人士參加，儘管他允許他們自行選擇是否參加，但陸定一卻不客氣地對非黨人士與整風運動的關係不太在乎，他只為「對研究整風運動有興趣的人「[29]列舉了一些適當的文件。甚至在他的總結中，也沒有向毛這種新式整風運動的想法讓步：

> 這些情況要求我們安排一次全黨範圍的新的整風運動，以達到端正全黨幹部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的目的。[30]（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陸定一對黨內整風的偏愛，顯示在他更多地強調了劉少奇，而不是鄧小平在八大的論點。像劉一樣，陸強調了研究（這顯然不需要黨外人的幫助）對於糾正主觀主義的重要性，同時也首先把黨不熟悉社會主義建設新任務作為犯錯誤的一個理由。在更為詳細地論述鄧小平關於權力腐蝕作用的觀點之前，他相當簡要地論述了需要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然而，甚至在這裏陸也與鄧不同，他強調對這些任務沒有經驗；而只是在他的論述快要結束時，才談到鄧的主要觀點，即執政導致官僚主義。[31]

陸定一對各種論點的強調或弱化表明，毛和他的主要盟友，周恩來和鄧小平，正在對政治局同事們施加很大的壓力，以便確保整風運動按照他們設想的形式進行。儘管陸不能置毛的觀點於不顧，但是在最高層，對毛的反對足夠大，讓他能夠堅持己見。[32]像陸這樣級別的人是會特別受到劉少奇這時的行為的鼓勵的。

劉少奇不同意毛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

如果黨員們懷疑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整風運動是否明智的話，那麼他們對關於矛盾問題講話的語氣一定會更感到不安了。他們的憂愁很可能與毛的非黨聽眾的歡快成正比；後者自信心和主動性的增長必定意味著前者的權力和特權相應的減少。毛的一些最接近的同事對這件事情關心的程度，由劉少奇所採取的行動表現出來了。劉明顯地抵制，或者令人看起來他抵制了毛發表關於矛盾問題講話的最高國務會議。《人民日報》3月3日發表的會議照片上，劉少奇引人注目地不在毛的右邊。

劉這種態度顯然是做給全國看的。毛在發表自共產黨政權產生以來他或其他人關於政治問題所作的最重要的講話時，劉卻不願意在這

個場合出現在他的旁邊。沒有一位《人民日報》的讀者不會得出結論，這是因為劉不同意毛所說的意見（參見附錄七）。

而且，更老練的幹部也會注意到，另外五位政治局成員朱德、林彪、林伯渠、羅榮桓和彭德懷不在台上他們應在的位置上；這些缺席者中只有林彪確實是因為病了（參見附錄七）。

關於政治局的分歧還有一些線索。這個主要政策在公佈前看來沒有在中央委員會中進行廣泛的討論。在這方面，它完全不同於 1955 年秋季關於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政策和 1956 年 1 月關於知識分子的新政策，而更像 1955 年夏季毛個人發動的合作化政策。這也許說明了為什麼陸定一在他的文章中沒像毛在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33】那樣，明確宣佈中央委員會已經決定發動整風運動，而是帶些歉意地寫道，形勢「迫使我們」開始整風。【34】

確實，到毛在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時，還不十分清楚，像劉少奇和彭真這樣的人已經同意到什麼程度。大概毛已經使劉勉強在原則上同意提前開展整風運動。【35】但是，劉的態度和陸定一的文章表明，毛還沒有使劉接受整風的形式或者開始的確切日期。似乎沒有別的原因能夠解釋為什麼彭真，甚至相對地位較低的宣傳幹部，在 3 月和 4 月初還繼續反對整風了。

對整風的反抗

對毛的主張的持續反對的一個跡象，是黨的宣傳人員沒有堅決壓制雙百方針的反對者，比如陳其通等人。對於這個問題，毛本人在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比在 1 月份更為明確地表示了他的態度。他說：

> 我們主張放的方針，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評，也不要怕毒草……最近一個時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這個情況，心裏很著急。我說，有一點也可以，過幾十年，現在舞台上這樣的牛

鬼蛇神都沒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當然我並不提倡發展牛鬼蛇神，我是說「有一點也可以」。[36]

儘管毛堅定地重申了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目的，但是黨的主要宣傳機構《人民日報》仍然沒有立即支持毛。只是在毛關於矛盾問題講話後，這家報紙才在 3 月 1 日發表了一位級別較低的官員陳遼的文章，批評了陳其通等人採取的路線。只是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更有力地贊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含蓄地批評了陳其通及其同夥後，《人民日報》才於 3 月 18 日刊登了文化部長茅盾寫的文章，真正有份量地抨擊了他們。但是，這還不能看作是對這夥人的最後處理，因為茅盾雖有部長的頭銜和作家的聲望，但他不是中共黨員。[37]

中央報紙對不同意毛政策的低級官員沒有施加官方壓力，是一個更嚴重情況的徵兆。這個情況就是官方沒有宣傳毛在 2 月 27 日和 3 月 12 日的兩篇重要講話中的觀點和方針。直到 4 月 13 日，《人民日報》都沒有就此問題發表社論。如果之前已經知道中央將發出指示，在兩個星期後，即於 4 月 27 日[38]開始整風的話，這就是一次巨大的宣傳延時。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機構歷來都是高效率的，因此只能推測，如果到 3 月 12 日毛已獲得同事們同意在 1957 年發動整風運動的話，由於最高層仍存在著的爭論阻止了對整風何時開始的問題作出決定。即使如此，毛對《人民日報》遲遲不討論他的主張而大發雷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 4 月某個時候，幾乎可以肯定就在這個月的前 10 天，毛嚴厲地痛斥了黨報：

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及時宣傳。宣傳工作會議未登消息，是個錯誤。這次會議是黨內外人士合開的，為什麼不登消息？最高國務會議為什麼不發社論？為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這裏有鬼，鬼在什麼地方？過去說是書生辦報，現在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牴觸的，反對中央的方針的，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39]

1968 年 9 月，當這連珠炮式的譴責公諸於世的時候，從當時情況看，這譴責最初是抨擊鄧拓這位 1957 年上半年的《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如果要把責任歸於鄧這樣一位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官員，那麼幾乎可以肯定在 3 月前或 3 月裏還沒有最後決定發動整風運動的日期。不然這樣一位級別相對來說比較低的官員居然無視中央的方針，這確實是難以想像的。[40]結論必定是這樣，即至少鄧拓不認為要急於對發動日期還沒有確定的整風寫社論；而且，可能性很大的是，鄧認為整風的日期還沒確定和對整風的形式存在的不同意見能夠做為他為自己辯護的理由。鑒於鄧拓後來在北京市黨的機關裏有較高的地位和他這時一定已是市委成員，那麼他受到彭真觀點的強烈影響就不是不可能的。彭真的觀點很可能是那時首都黨員幹部們普遍都知道的。[41]

黨的官方機構不就毛的講話發表社論，想必就會影響到下級官員們的行動。4 月 13 日的《人民日報》在首次就矛盾問題發表社論的同時，第一次報道了省級黨組織對毛的講話的反應。一篇報道表明，3 月 7 日遼寧省委已向全省高級幹部傳達了毛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也許，其它省的黨組織至少也已向高級幹部傳達了毛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但是由於《人民日報》沒有報道，因此我們只能設想其它省採取的行動相對來說是非正式的。似乎到了 3 月的最後 10 天，才有省級組織採取行動。據《人民日報》的同一篇文章報道，在此期間，雲南省的黨組織開始組織傳達毛的講話。[42] 3 月 25 日，北京市委就毛的講話召開了為期 8 天的宣傳工作會議；[43]第二天，彭真出生的山西省也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44]

北京市宣傳工作會議的召開，很可能是對毛本人的一個命令的反應。3 月的後半個月和 4 月的第一個星期，毛和大多數政治局常委都不在北京。毛 4 月 3 日在杭州。[45]從 3 月 12 日他在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到 4 月 8 日他設宴招待來訪的波蘭總理這段時間裏，也沒有他在首都的報導。如果毛這期間的大多數時間在杭州，那麼 3 月 21 日周恩來在杭州的出現就具有特殊的意義了。顯然，周是毛推行 1956-1957 年的

「自由」方針的主要支持者，[46] 他到杭州很可能是與毛磋商關於北京和其他地方的黨組織沒有對毛的講話作出反應的問題，[47] 然後他帶著毛的意見返回了北京。因此，周從杭州返回北京不久，北京黨就召開宣傳工作會議，這應該不是巧合。

鑒於彭真對整風運動持不同意見，因此北京市宣傳工作會議似乎是一個轉折點。但是，有明顯的跡象表明，這次會議的召開並不意味著彭已經最後放棄自己的意見。3 月 31 日，在北京黨的會議期間，彭發表了他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的東歐之行的報告，對允許國內不團結和不一致的危險提出了警告。更意味深長的是，彭本人沒有在他自己市的黨的會議上講話，新華社在對這個會議的長篇報道中也沒有提到他的名字，儘管這次會議有 1400 多名黨內外人士參加，並且它的重要性也足以讓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出席。，與這有關的是毛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第八點。毛在直截了當地要求省一級的黨委必須管思想問題之後，接著又指出：

> 各地黨委的第一書記應該親自出馬來抓思想問題，只有重視了和研究了這個問題，才能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各地方要召開像這次宣傳會議一樣的會議，討論當地的思想工作和有關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問題。[48]（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周從杭州返回以後，彭顯然認為他有必要市委召開宣傳會議，但他並沒有退讓到服從毛關於第一書記責任的指示的地步。[49]

劉少奇巡視各省

對 3 月份和 4 月初的空隙最可能的解釋是毛不得不同意把發動整風運動的日期推遲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摸清楚了省級幹部的想法，使他們作好思想準備之後。[50] 這就使得像鄧拓那樣對整風態度勉強的幹部能夠放慢他們的步伐。劉自己行程 2400 英里，巡視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東。[51] 3 月 5 日，他到達河南許昌。[52] 並在 3 月的某一天在省會鄭州作了一次講話。[53] 3 月 24 日，

他在湖南省會長沙市的幹部會議上作了講話。[54]4 月 6 日，他在廣東，因為這天他在廣州迎接了波蘭總理，4 月 10 日他又就矛盾問題向當地幹部講了話。[55] 12 日，他正在返回首都的途中，因為那天他到了他在湖北省漢口的故居，當天又乘火車離去。[56] 4 月 15 日劉在北京迎接蘇聯國家首腦伏羅希洛夫元帥。為了應酬與這次訪問有關的各種禮儀，劉一直呆在那裏，直到 4 月 18 日，伏羅希洛夫該日前往東北開始訪問中國的第一段旅程。後來，這個月中又有幾天劉在上海，應該是從 4 月 22 日起，因為那天他在上海迎接了伏羅希洛夫，直到 4 月 27 日他在上海幹部會議上作了講話。[57] 第二天，他向河北幹部講了話（應該是在當時河北的省會保定）。[58] 這似乎是劉整風前巡視的最後一站，因為 4 月 28 日那天晚上，他返回北京參加了一個宴會。[59]

令人遺憾的是，劉巡視六省的講話現在只有隻言片語可供引用。唯一的一段很長的摘錄[60] 是摘自他在上海的講話，而正如我們將會談到的那樣，這時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然而，他在河南講的一段講話，在他上海講話中幾乎一字不變地被重複，這表明劉可能有一篇標準講話，在各省時就各地的特殊情況稍作改變。[61]

儘管與劉巡視有關的材料很少，但是現有的材料足以斷定，他此行也許還有其他領導人巡視其它地方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個目的，是解釋人民內部矛盾的非對抗性質和應該如何處理這些矛盾，這是 4 月 27 日上海講話那段摘錄的主題，它很值得與同一天制定的整風指示相比較（見 210 頁）。第二個目的，是在所巡視的地方討論這些矛盾的具體表現形式。劉在 3 月選擇討論的一些實用問題，有助於說明為什麼他和彭真以及其他人對開門整風的前途擔心。

在鄭州和許昌，劉試圖說服教師和學生把當第一代受過教育的農民看成是光榮的。缺乏教育設備將使他們中許多人不能繼續學習。劉引用他自己為例來減輕他們的失望，以證明不繼續受教育並不一定意味著在當代中國就沒有出路。[62] 這個問題是當時人們所關心的。4 月 8 日《人民日報》社論就以此為內容。上海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1957

年，中學入學增長率急劇下降，大學入學人數絕對下降。從1953年以來，第一次出現了大學入學數低於高中畢業數這樣的情況。[63] 一位西方記者從北京報道，毛在關於矛盾講話中提到的學生罷課，[64] 就是由於對工作前途不滿而引起的。[65] 毛1957年3月親自寫信給周恩來，要求加強大中學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在這些學校，政治課實際上已經被取消了。[66] 正如毛在最高國務會議指出的那樣，他的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不能發表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同僚害怕那樣會引起更嚴重的學生騷動和工廠工人的罷工。[67]

罷工是劉在巡視中論述的另一個主要問題。儘管劉表面上輕鬆的態度與毛的態度很協調，卻掩蓋了幕後的激烈爭論。但是劉關於工會和黨的幹部為了保持工人的信任應該參加罷工的建議，[68] 表明了他的憂慮。劉向工會和黨的幹部作的這個非正統的建議，突出說明了他對黨掌握工人的能力遭到削弱很關切。1956年寬鬆的政治環境已經損害了工廠的紀律。上海和其它地方的報道，引用青年工人在舞會上已用盡了精力而致使他們的產量下降為例，以顯示道德的淪喪。政治教育的放鬆導致工人把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換句話說，就是要求更好的生活條件。[69] 如果鼓勵人們發洩他們的不滿，那麼要維持紀律，是多麼地困難，[70] 尤其是在經濟危機的時候。1956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已經影響到了食物供應。再加上1956年投資大規模的增加，超過1955年投資的60%，這就造成工人人數增加量比原計劃多3倍。還有由於1956年普遍增加工資和銀行向農村、手工業和公私合營企業加倍的貸款，進一步加劇了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壓力。結果，1956年底和1957年初，消費品嚴重缺乏。這些最後迫使政府拿出了大概10%的庫存，削減了布匹和城市糧食定量，並號召政府機關、部隊和學校減少15%-25%的取暖與炊事用煤。[71]

許多官員同劉少奇一樣，對在這樣一種形勢下進行整風感到擔憂；劉在廣州時，廣州召開了1600人參加的宣傳工作會議，報紙對這次會議的報道明顯地使人感到了這種擔憂：

> 人民內部矛盾一定不能當作敵我矛盾來對待。在這一點上，會議中有激烈的爭論。許多幹部思想混亂，不能嚴格地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有些人認為，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整風」的方法比僅僅說服教育更有效。有的人則進一步提倡用「說服與壓服兩種方法」，即除了「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之外，再加上一點「壓力」。[72]（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大多數」幹部反對運用「整風」或「壓服」的方法，因為他們認為緊張的內部矛盾往往是由領導的官僚主義引起的，甚至當群眾的要求過分時，「整風」或「壓制」只能使形勢暫時緩和，而從長遠來看是會使非對抗性矛盾進一步惡化，並可能轉化成對抗性矛盾。[73]顯然毛的觀點最後佔了上風，但是這篇新聞報道卻表明毛的路線在廣東的黨員幹部中是多麼地不受歡迎。[74]

但是，毛與劉的分歧並不僅僅源於在國家面臨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時進行整風的危險性的看法不同。從劉 3 月至 5 月的講話來看，他認為匈牙利式的起義這個潛在威脅可以用經濟手段來驅除，而毛卻堅持要用政治措施。在這幾個月裏，劉認為國內的主要矛盾與分配有關。[75]從現在能得到的劉對這個問題最長的討論中，他談到了工農之間，工人和幹部之間，以及新老工人之間的工資差別造成的破壞作用，談到了工資等級的評級制度，不能按個人的專長工作（即工作分配）和不能進一步登上教育的階梯（即教育機會的分配）所引起的不滿。一個特別的問題給領導幹部分配的更多的物品和特權。[76]真正使群眾感興趣的是工資、住房、食物和交通工具這樣一些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就意味著能夠大膽地談論這些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劉建議搞一點「平均主義」，[77]換句話說，就是更公平地分配經濟資源。毫無疑問，毛不會否認這些存在的問題，或者反對有一點平均主義。[78]但是對他來說，光是經濟平均主義還不夠，要消除領導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以及帶來更大的政治平等，還需要開門整風。而另一方面，劉卻

把黨群「關係」(不是矛盾)只是說成是「政治思想領域中最重要的問題」。[79]

這兩個人之間的根本區別似乎是，劉把中國的問題主要地歸結為是國家經濟落後的反映，而在匈牙利事件後，毛更堅信根本問題是黨和人民的關係。劉主要是通過改變人與商品的關係來尋求解決的辦法，而毛儘管完全認識到了經濟的重要性，但更為關注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80]

第十五章 發動整風運動

《人民日報》歸隊

在廣東對毛方針的抵制引起了當地知識分子的關注。據報道，在廣州宣傳工作會議上談到「百花齊放」方針的人都認為，如果要很好地執行這個方針，「首先必須消除為數不少的幹部對這個方針的懷疑，其次，必須正確理解這個方針。」[1] 耐人尋味的是，「百花齊放」方針已實行了一年，廣東的知識分子還要求「正確理解」這個方針。但感到憂慮的不僅是他們。用著名的社會學家、非黨人士費孝通的話來說，全國的知識分子都畏懼政治「早春」，費的意思是，這將意味天氣逐漸轉暖，但隨時會突然發生霜凍，摧殘過早開放的鮮花。[2] 知識分子顯然特別注意到《人民日報》沒有對毛最近的觀點表示贊同。該報 4 月初的兩篇社論更增加了他們的疑慮，社論倒是論及了毛的兩個講話中提及的問題，但毛在這些問題上是為黨作辯護的。[3]

毛在杭州譴責了《人民日報》，問它是誰家的報紙，主張必須對它進行改組。他召開了許多會，但對會議的情況未作過報道。是《人民日報》還是《國民日報》？這是毛在上海市委常委會上講的話，毛召集這個會可能是認為上海市委是可以信賴的少數黨委之一，他的坦率發言顯示了這一點。毛承認在百花齊放的問題上他是孤立的，估計陳其通等人代表了 90%的中共黨員的意見，還說：「我沒有群眾基礎。」儘管他缺少支持，毛還是再次堅持他的「自由」方針。即使遭受幾個月的辱罵，黨也必須「放」。毛有點自我辯護地說：「我不是鼓勵群眾造成混亂；我不是開促亂會議。」——這一定是心懷不滿的黨員對最高國務會議的形容。能聽到反對意見很重要（這在俄國不可能），因此民主

黨派必須存在下去。認為百花齊放的方針不合時宜和它與政治思想相牴觸的觀點是不正確的。正如八大所斷定的，大規模的政治鬥爭時期已經結束，黨必須填平與非黨人士之間的鴻溝。[4]

毛的下一步行動計劃可能是在杭州討論的，因為4月9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記者與周揚談話的文章，這位負責文化界的高級宣傳官員攻擊了陳其通等人。被人厭恨的周揚對毛這次運動的忠誠是引人注目的，[5] 但並不牢固；比他的講話更顯著的是，這個講話是登載在一個非黨的上海報紙上，而不是在官方的《人民日報》上。[6] 似乎可以肯定，需要毛的親自干涉才能轉變黨報的態度。4月10日，毛重新在北京露面後兩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批評了陳其通和其他反對「百花齊放」方針的人，也對自己未能較早批評他們作了自我批評。[7] 文章公開說有的人害怕鳴放會使文化界陷入混亂。文章把這種誤解歸咎於那些不同意這個方針的同志，他們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極的現象，加以渲染和誇大，企圖由此來證明這一方針的「危害」，由此來「勸告」黨趕快改變自己的方針。[8] 在文章的結尾，《人民日報》指斥陳其通等人是教條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並說他們的批評只能造成而且實際上已經造成了思想混亂。接著又說：「應該承認，本報在發表了他們的文章之後，長期間沒有加以評論，是造成這種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9] 第二天，《人民日報》轉載了《文匯報》關於周揚談話的文章。

很難避免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毛從杭州返回後，譴責了《人民日報》編輯，這促使鄧拓行動起來。因此，這家報紙不僅為「百花齊放」方針辯護，並且為時已晚地開始宣傳毛關於矛盾問題的主要論點和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4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它們的五篇社論中的第一篇。[10]

第一篇社論尤其有意思，因為它主要針對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在5月和6月初的迫使他修改關於矛盾問題講話的事件以前，毛大概認為這是政權面臨的主要問題。社論斷言：「目前我國人民群眾和

領導者之間的矛盾，主要是由於領導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義作風。」[11]毛在這年較早的兩個講話中，還按通常順序把主觀主義排在「三害」之首。而現在，在中央的宣傳中，官僚主義第一次上升為主要的危害。社論明顯地反映了鄧小平在八大上闡述的毛澤東的思想。社論也像鄧一樣認為1949年以來黨員所犯的錯誤是由於中共獲得政權的結果。劉強調的主觀主義和黨員不熟悉他們面臨的新任務的提法已明顯地被置於一旁。社論和鄧一樣，提倡群眾向官僚主義鬥爭，認真監督領導者；同時，提出必須對群眾進行不斷的思想教育，因為他們常常難於掌握國家的整體情況。

彭真的讓步

《人民日報》4月13日的社論反映了毛的意見，其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宣佈思想教育是黨委第一書記的責任。社論按照毛的宣傳工作會議講話寫道：

> 為了加強對群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領導，各級黨委，特別是黨委第一書記，必須把這一工作抓起來，經常瞭解群眾中的思想情況，解決群眾中的思想問題。要推動黨和國家機關各個部門的領導人都這樣作，而不要把這一工作僅僅委託給黨委的宣傳部門和政府的教育部門。[12]（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之前就已經服從命令，因為他正在主持4月6日開幕的省的宣傳工作會議。陶可能是按劉的建議行事的，劉至少在廣州呆到4月6日，但陶願意遵從毛指示的情況直到後來才被公開。確實，查一下4月13-22日《人民日報》的出版方針，可看出編輯部決定不提及黨委第一書記的這類行動。有證據表明，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是想要避免凸顯這樣一個情況：書記處常務書記、北京的彭真至今仍持保留意見。這可能是想保護彭，或是給毛留面子，或僅僅是不願公開黨內最高層之間的分歧。同時，這家報紙似乎是在向彭真呼籲——「要推動領導人」——結束他的抵抗。

彭是一個難啃的骨頭。雖然在公眾場合他似乎總是帶愉快的笑容（在文革中他被稱為「笑面虎」），他據說是一個很霸道的人，[13] 也不喜歡非黨知識分子。[14] 彭是一個身材魁梧的北方人，[15] 通過艱辛的經歷而鍛煉了組織才能，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他在中國北方國民黨或是軍閥統治的城市發動過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這使他坐了大約 6 年監獄。1937 年，他到延安，這時他已是一個堅強的革命者，並在黨的系統中迅速上升。具有諷刺意義的是，40 年代初，他是毛進行第一次整風運動的主要助手之一，因此而成為中央黨校的校長。[16] 西方記者根捨·斯坦因當時曾會晤過他，彭的廣博知識和充沛精力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形容彭是一個「高大壯實的 42 歲的人，在延安的那些人中，很難說清他主要的個性特徵是農民還是知識分子」。斯坦因正確地意識到彭是黨的「最重要的未來負責人」[17] 之一，但是過高地估計了他的知識水平。他在同事眼中是一個不看書報的人。[18] 彭似乎厭煩他同事們的這種看法；他認為他能作理論工作，但必須有人來應付日常工作。[19] 但是，他津津樂道的話無意中證實了他的同事們的看法：

> 個人不要讀太多的書，只要讀通一本就行了。我以前在監獄時，找到一本費爾巴哈的書，讀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到現在，這本書仍是我的理論依據。[20]

彭意志堅強、作風踏實。一個與彭長期共事搞組織工作的人認為他「有很強的能力。他的工作作風很好。他站得高看得遠」。[21] 他管理著一個嚴密的組織。十年後，毛抱怨彭管轄的北京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22] 在 1957 年這可能就是事實。55 歲的彭已經管理這個城市達 8 年之久。在這個首都要做違反他的意志的事顯然是不容易的。例如，4 月 14 日《人民日報》召開一個知識分子座談會，一個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從 1895 年起就已停滯不前。[23] 但是，比提出這種觀點本身更耐人尋味的是，座談會不是在出版《人民日報》的北京，而是在天津舉行的。座談會的詳情也沒有馬上發表，因為這樣

就會暴露這家報紙沒有在北京召開座談會，想必是由於彭真的反對的緣故。

可以回想到，彭真沒有正式出席3月15日-4月1日北京市委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但是，因為《人民日報》上未報道這次會議，所以他的挑戰不廣為人知。4月14日，該報刊登了一篇在彭的家鄉山西召開的，顯然是不那麼重要的宣傳工作會議的報道。會議3月26日就已開始，但報道沒有提到第一書記參加會議的情況。[24]同一天《人民日報》的另一篇報道披露中央和中央政府機關正在學習毛關於矛盾問題的觀點。這些機關的成員（他們也是北京市黨組織的成員）就能將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領導與彭真不積極態度加以比較。

4月16日，《人民日報》對彭真作了一個更大的暗示，要他歸順。該報說4月10日關於鳴放的社論和周揚的談話（轉載在4月11日的報紙上）已經極大地加深了首都知識分子對毛關於矛盾問題講話的理解。那些瞭解北京黨的宣傳工作會議情況的讀者理當奇怪，這次會議為何沒有因加深當地知識分子的理解而得到公開的表揚。第二天，這家報紙關於矛盾問題的第二篇主要社論——《從團結的願望出發》——論及了彭真在東歐之行報告中不贊成毛方針的主要觀點：

> 批評是否有利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有些同志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害怕批評會使內部矛盾尖銳起來複雜起來，會使黨和政府或領導方面處於被動地位。[25]

報紙承認這種害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敦促這些領導在處於被動地位之後要爭取更大的主動，如果矛盾不能解決，領導將處於更被動更困難的境地。社論再次對彭真和與他類似的人呼籲：黨組織、國家機關和區縣的領導者，今天首先需要鼓勵和幫助群眾充分地使用批評武器。[26]

《人民日報》4月18日的報道宣稱，北京工廠的數千名幹部熱烈擁護毛講話中的觀點。但如果首都的知識分子和工人都支持毛，顯然第一書記落在群眾後面了，這就陷入了一個最危險的境地。他也落後於

中國其它大城市的第一書記。上海的第一書記柯慶施已召開了一系列的關於矛盾問題的討論會；天津的第一書記主持召開了一個為期 9 天的宣傳工作會議。[27] 但是，《人民日報》再次庇護彭真，它在報道這兩個情況以及廣東的宣傳工作會議時，或是壓著不報，或是不提第一書記的作用。例如，不刊載新華社 4 月 17 日訊，該訊報道了柯慶施在上海的作用。[28] 新華社 4 月 18 日訊也遭到同樣的命運，該訊不僅報道了當地第一書記的作用，還報道了康生在市的宣傳工作會議上講過話。[29]《人民日報》4 月 19 日關於廣東宣傳工作會議的報道表明，這並不是記者的疏忽，這篇報道未提到第一書記陶鑄的作用和劉少奇的講話。新華社 4 月 19 日訊提到了這兩個人，但《人民日報》未刊登這條電訊。[30]

然而，到 4 月 19 日，彭真大概已被人規勸讓步。在前一天，他的市報《北京日報》終於發表了一篇關於該市的宣傳工作會議的報道。[31] 報道表明彭未在會議上起到應起的作用，所以透露這一情況大概是因為第一書記已決定讓步，彭真的決定一定是在 4 月 15 日劉少奇和鄧小平返回北京迎接伏羅希洛夫主席之後作出的。[32] 在此後幾天的歡迎儀式間隙，最高領導層有可能開了會，並決定在最近開展整風運動——雖然此時他們可能還未商定發動整風運動的日期。劉的報告可能對彭真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如果劉認為在他視察的 5 個省可以冒險發動整風運動的話，彭就不可能繼續堅持到底。根據 4 月最後一周所發生的帶有神秘色彩的情況來看，還有一個可能就是，當領導者們重新在北京彙集時，毛仍然未能在發動運動的日期上與他們取得一致意見，但毛使他們認可，有必要宣傳他的觀點。4 月 20 日，就是伏羅希洛夫離京到外地訪問後的第一天（這使首都的市長得以從照應貴賓的工作中解脫出來），彭真主持召開了第二次北京宣傳工作會議——規模比第一次會議大一倍[33]——並在會上作了主要報告。

彭不得不取消以前說的很多話，歡迎黨外人士參加整風。他降低了內亂的危險。他強調允許人民鳴放的重要性。但是，在一個重要的

方面，他顯然仍不接受毛澤東的分析，堅持認為黨和黨外人士的關係基本上是好的，關鍵的問題是在黨內。[34]

彭的讓步的重要行立即在《人民日報》上反映了出來。該報剛在4月19日登載了關於北京第一次宣傳工作會議的報道（這篇報道發表在前一天的《北京日報》）。4月21日，《人民日報》再次隨《北京日報》之後刊登了新華社4月18日電，該電報道了天津的宣傳工作會議和第一書記的活動情況——《北京日報》在前一天刊載了這一電訊。在另一個版面，《人民日報》發表了它4月14日在天津召開的知識分子座談會上的幾個發言。然後，4月22日的《人民日報》第一版在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通欄大字標題下，刊登了彭真在北京市第二次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35]和對4月16-19日上海會議的報道，第一次向讀者公開了上海第一書記的領導作用。

如果這個大標題還未足夠引起讀者對彭真退卻的重要性的注意的話，那麼，第二天關於矛盾問題的主要社論一定能達到了這個目的。社論以《全黨必須認真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第一次引用了陸定一3月5日文章中的觀點：一個全國範圍的整風運動即將開始。而且，社論用威脅的口吻向頑固不化的黨的官員暗示，由於彭的讓步，中央感到力量強大，足以對地位更低的人採取強硬態度：

> 領導工作人員看不到人民內部的矛盾，或者雖然看到了而沒有能力加以正確的處理，在政治上無疑是一種危險。危險不僅是由於他們落到了歷史的後面，而且是由於革命的勝利把他們擁上了人民領導者的行列，他們的地位還可能沖昏他們的頭腦。[36]（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社論在前面重複了要黨委第一書記加強帶頭作用的號召，接著批評了包括自己在內的黨報的消極態度。

> 現在有許多黨組織已經這樣作了，但是也還有不少黨組織的動作還很遲緩，勁頭不足。黨的報刊（從本報起）在這一方面也是落後的，現在也還有不少報刊沒有重視關於這個問題的

討論。這是因為，黨內除了有一些同志對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還有懷疑以外，有更多的同志還沒有認識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今天的國內生活中，究竟有什麼重大的意義。[37]（重點為作者所加）

要說《人民日報》的編輯（或者彭真）不知道處理矛盾的「重大的意義」，這完全令人難以置信。這段自我批評的話證實，編輯（以及彭真）曾對這個方針抱「懷疑」態度，因為社論沒有對這種落後行為作任何其他解釋。

迅速進入整風

在彭真退卻以後，毛迅速行動發動整風運動。在《人民日報》說要開展整風運動後的第四天，起草了一個整風運動的指示，並於 3 天以後的 4 月 30 日發表，5 月 1 日整風運動開始。即使全國從上到下的成千上萬幹部聽了毛在 4 月講話的報告或錄音，公眾對整風運動的思想準備也是不多的。確有證據表明，領導層 4 月中旬開會時通過的計劃預想的留給做思想準備工作的時間要長得多。

很清楚，《人民日報》4 月 23 日社論發表的同時，發佈了一個給黨的書記們的不公開指示，也許是因為毛對前面兩個主要社論的所產生的反應不滿意[38]。上海和江西的報道表明，這個指示是以「檢查貫徹執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情況」為題，也許於 4 月 22 日或 23 日下發[39]。

從各省的反應判斷，這個指示可能像《人民日報》4 月 23 日社論一樣帶有威脅的口吻。山東省委在 23 日下午兩點匆忙召開了一個高級幹部會議。[40] 同一天，江西省委發出一個通知，題為「繼續深入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41]。四川儘管行動較早，4 月 19 日就召開宣傳工作會議，到 4 月 24 日，省委也感到壓力，發出了一個「通知」，停止正常的理論學習一個月，以便學習毛的講話[42]。4 月 25 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召開了一個黨委書記的電話會議，並計劃 5

月 3 日召開宣傳工作會議[43]。其他省也開始發表報道，公佈他們此時已做了的，可以被合理地看作是追隨毛的方針路線的事情[44]。

毛想對拖後腿的省的書記們施加壓力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不清楚的是，如果中央打算在 4 月 30 日發佈整風運動的指示，為什麼它要在 4 月 22 日或 23 日下發一個指示。至少，它可以給各省的領導打個招呼，告訴他們整風運動的指示即將發佈，這樣，就能使他們避免更大的混亂。例如，江西省委於 4 月 27 日下發了一個詳細的通知，提出了處理矛盾問題的方法，這使它自己陷於窘境，不到 10 天，它不得不宣佈：它正在根據中央的整風運動的指示考慮一個新的計劃，在它有時間組織全省的整風運動之前，幹部仍以省的通知為辦事依據[45]。廣東的黨委在 4 月 27 日也發出一個關於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指示，但是，3 個多星期以後，也不得不發佈一個關於整風運動的新指示。[46]

毛在 4 月下旬突然決定要立即開展整風運動，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知識界的對他的意圖的持續不確定的態度。4 月 20 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翦伯讚的文章，他認為知識分子之所以有「早春」之感，是因為領導幹部只是在口頭上喊「百花齊放」的口號。因此，知識分子就說這是：「雷聲大，雨點小！」他們不得不猜測，鳴放的號召是否真有誠意，是不是一個領導發現錯誤思想的手段。[47] 這篇文章顯然觸怒了毛，其原因也顯而易見[48]。與費孝通關於「早春」之感的文章不同，翦文寫於毛的矛盾問題和宣傳工作會議講話之後，而翦竟對鳴放方針的誠意表示懷疑。這些懷疑清楚地表現出對毛的誠意，或者至少對他貫徹政策的能力的不信任。[49]

4 月 21 日，《光明日報》發表一篇報道，報道非黨知識分子對毛的矛盾問題講話的含義的爭論。鄧初民是其中之一。他認為對「放」應該有限制——而毛在宣傳工作會議講話中特別反對這種限制——並建議「放」應該遵守四個標準[50]。鄧初民顯然沒有聽過宣傳工作會議講話，他的講話表明，如果宣傳當局沒有宣傳毛的講話精神，知識分子就會

採取自我限制的方針。毛察覺到這種情緒，並擔心他講話的影響已經消失了，因此他感到必須迅速採取行動。

4 月中旬，毛可能僅在兩點上獲得了同事們的同意，即不久將要開展整風運動和開展全國性的學習活動使人民做好整風的思想準備；這使得他能夠在 4 月 22-23 日發出指示。決定立即發動整風運動的決定可能是由毛在這以後下的，這時，他政治局裏主要的反對者劉少奇和彭真正在外地陪同伏羅希洛夫主席。如果指示的日期——4 月 27 日——有什麼含義的話，那就是表明它是當劉少奇和彭真不在北京時通過的（也應該是在他們不在的時候起草的）[51]，雖然它到 4 月 30 日才發表這一事實表明毛感到有必要在發佈前讓他們過目。即使這樣，他們也只得面對既成事實。國家機關黨委早在 4 月 28 日就決定開展整風運動，雖然他們這時還沒有看到中央的整風運動的指示[52]。當劉和彭返回北京時，毛可能已經著手要在 4 月 30 日秘密召開最高國務會議了[53]。雖然這第十二次會議是宣佈整風運動的會議，但對它從未作過任何官方報道，這表明黨的一些高級官員對這種突然行動的方式感到嚴重不滿。

整風運動的指示和劉少奇的上海講話

把整風運動的指示與劉少奇對上海黨的幹部的講話作一對照，就可看出，在整風運動前夕，毛沒有通知他的高級同事。劉講話是在 4 月 27 日，與整風運動的指示同日，如果較早就已取得一致的意見，應該在基本的觀點上是一致的。而劉在最關鍵的問題上與這個指示相左，即黨必須與之進行鬥爭的各種有害作風的相對重要性。

指示指出，社會關係已發生根本變化了，為了新的任務，黨和工人階級必須改造自己，但是，許多幹部並不瞭解這一點。同時，因為黨處於執政的地位，幹部就容易採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辦法去處理問題，「……而有一部分立場不堅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舊社會國民黨作風的殘餘，形成一種特權思想，甚至用打擊壓迫的辦法對待群眾」

[54]。這個對執政地位帶來的腐化作用的影響的強調顯然就是反映了鄧小平在八大的分析。因此，毫不奇怪，指示繼續指出最近幾年「三害」有了新的滋長，並將它們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順序排列，並以此作為發動新的整風運動的理由。[55]

在這之前，毛和鄧都一直把主觀主義排在首位，在 1942 年整風運動批判三害時，它就處於首位。[56] 但是他們講話的重點——鄧在八大，毛在蘇共二十大以來的所有講話中——都認為執政地位（官僚主義的來源）比思想落後（主觀主義的來源）更危險。甚至《人民日報》在它 4 月 13 日的社論裏也已開始強調官僚主義。

相反，劉仍繼續聲稱，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工作中，主觀主義是主要的危險。在八大上，他僅承認黨的幹部一直沒有為迎接革命後的新任務作思想上的準備。從他的上海講話可看出，當整風運動開始時，他仍堅持這個立場，因為他在什麼是中國的重要矛盾的長篇講話中，把「三害」排列為：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57] 他首先講思想上的錯誤，篇幅比講官僚主義長得多，他對官僚主義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又巧妙地轉回到思想問題。[58] 並且，當說到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時（進行整風的主要理由），只是把它作為諸矛盾中的一個。[59]

劉不把官僚主義作為最主要的有害作風，證明他繼續不同意毛對整風運動的目的的看法。而且，劉強調思想上的矛盾屬於黨內矛盾，認為要用黨內方法來解決，關於這一點，陸定一 3 月的文章也提到過。[60] 他的講話也表明他甚至對整風運動即將開始一無所知。由於我們只能看到他這次講話中的一段，所以不能妄下斷言，但是，他講話開頭時未提到整風運動。如果他已知道整風運動的指示就在那天通過，並於 3 天後發佈，那麼，這是就一個奇怪的失誤。[61] 而相反，周恩來 4 月 24 日在杭州與幹部談話時卻談到了即將到來的整風運動。[62] 確實，從劉講話較長的第一部分分析，他的講話是遵循未公佈的 4 月 22-23 日的指示精神的。他宣傳了毛在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和宣傳工作

會議上的講話的觀點，向黨的幹部說明為什麼現在要用更溫和的態度對待人民。然而，整風運動的指示已超出這種觀點，並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指示側重說明整風運動之所以必要是為了保證黨的幹部能更溫和地對待人民。

這個講話和整風運動的指示內容的不同之處表現在，這二者要採取「和風細雨」方針的側重點不一樣。指示提出整風運動應該是：

> 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開會應該只限於人數不多的座談會和小組會，應該多採用同志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談，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63]

這顯然是毛的意圖，再次向黨員保證，一定不採用過去對待資產階級的那種群眾鬥爭運動。劉少奇也提倡採取「和風細雨」的方法，但是，他講的是黨員應該對待人民的態度：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提倡少鬥爭；我們提倡和風細雨和強調小民主，因為它們（即這些矛盾）是非對抗性的。[64]

以上的講話再次說明，劉和毛在必須改善中共統治中國的方法這個問題上是沒有不同意見的。劉關於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上海講話，雖然是冗長乏味的重複，似乎忠實地反映了毛的觀點。[65] 有分歧的問題在於，哪一個有害作風——官僚主義還是主觀主義——是中共犯錯誤的原因；整風運動的形式——黨內整風還是開門整風；以及發動的時間——早些還是遲些。

《人民日報》再次改變立場

由於整風運動指示反映了毛澤東的分析，所以它提出，關於矛盾的講話和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整風運動的指導思想就不足為怪了。並且，指示把這些講話稱之為毛代表中央作的報告，而原先宣佈召開毛發表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的最高國務會議時並未這樣說過[66]。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學習這些講話和其他有關文件，並要按此精神改進

工作，檢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情況。也許是為了籠絡劉少奇，它提出，為克服知識分子幹部的主觀主義，在今後的適當時期會要求他們進行唯物辯證法的學習。但這個學習計劃在以後才會制定出來。毛顯然不把這事放在首位。

向黨員承諾不他們不會被鬥爭大會批鬥以後，指示說，那些被批評的人不應為自己的一切辯護，拒絕任何批評。但他又進一步提出保證，在運動中檢查出來犯了錯誤的人，除嚴重違法亂紀者外，一概不給處分。

指示規定了其他四個要點。第一，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毛堅持開門整風）。第二，強調領導幹部要參加體力勞動，聯繫群眾（指示說，關於這個問題不久將作專門指示）。第三，強調第一書記必須親自負責領導整風運動，並指出黨委要組織領導小組。最後，指示規定:「整風計劃應該貫徹整風和工作兩不誤的原則……。」[67]要注意，這個指示將整風運動放在正常工作之前。

4 月 30 日，新華社公佈了整風運動的指示 5 月 1 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68] 同天，黨報沒有發表任何解釋性的社論，這可能很容易忽視，但是 5 月 2 日的社論《為什麼要整風》[69]與整風指示有嚴重分歧。它表明毛的某些同僚繼續不贊同毛，甚至很憤怒，也表明《人民日報》已再次改變立場。

分歧首先是關於開展整風運動的理由。指示將社會關係的改變和執政黨的地位作為理由；社論僅指出社會關係發生了變化是開展整風運動的理由，雖然它也提到指示中所說的某些有害作風來源於黨的執政地位。並且，在說到這些有害作風時——例如不能分辨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社論繼續強調主觀主義因素的作用，個別幹部不瞭解情況或沒有知識——這是它與 4 月 13 日的社論的顯著不同之處。[70] 劉堅持這種分析（因為社論反映的是他的觀點），表明他最為憂慮的是毛和鄧對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矛盾來源的分析。一旦承認執政黨的地位是官僚主義的根本根源以及官僚主義導致人民與黨危險的疏遠，那麼，

就可以要求不僅改善黨的工作方法，而且要改變黨的地位。毛在 1957 年沒有走得那麼遠。但是，劉的憂慮也許是對的，9 年以後，在文化革命中，毛的矛頭指向了執政黨的地位。

指示與社論的第二個重大的分歧是關於整風運動的指導方針。社論說：

>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無產階級的內部的團結和國際團結、關於工農聯盟、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關於反對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官僚主義等等問題上的理論，都是我們今天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指針。[71]

社論斷言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當然」並不是現在才出現的問題，以此為上述論述辯護。[72] 毛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在社論的後面被提到，但沒有被專門作為整風運動的指導方針。所有這些都是對毛的公開怠慢，也許反映了他的某些同僚對他迫使黨發動整風的方式的憤慨。對於那些曾聽過毛關於矛盾問題講話原文的上千個中國人來說，這種怠慢更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毛在講話中曾斷言：

> 這些問題在馬列主義來說都是新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顯然不知道這些問題。列寧提到過，但未作詳細論述，因為在他所處的時代，由於外因干涉，要只講內部矛盾是困難的。致於斯大林，只能批判地對待他的觀點。[73]

社論還進一步企圖要剝奪毛在分析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上獨創性的榮譽。它認為整風運動的指示是在執行黨的八大的決議。[74] 就決議談過國內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一點來說，社論是對的，但決議形成於匈牙利事件之前，而這個事件是促成開展整風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社論的作者不得不把《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75] 一文作為權威。如果社論在這裏也給毛的講話以應有的地位的話，就不會有什麼不適當的了。但它卻較長地引用了毛寫於 1949 年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以說明主席注重要用溫和態度對待人民，然後繼續寫道：「毛

澤東同志今年 2 月間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觀點，同這裏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76] 這樣說是對的，卻毫無新意。而提出毛一貫如此的結果，卻是再次貶低了毛關於矛盾的講話的獨創性和重要性。然而指示卻規定毛的兩個講話是整風的指導方針，並宣佈它們表明整風運動實際上的開始。[77]

社論這樣分析的動機也許不完全是為了報復。劉和他的支持者可能堅定地認為，如果要開展整風運動，它應該看上去是根據一致通過的黨的決議，而不是由黨的主席擅自宣佈。這個猜測是根據這樣一個事實的：社論沒有摘錄指示，也沒有將毛的講話作為代表中央作的報告，而是繼續把毛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作為個人講話看。[78]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為了找出整風運動和八大決議之間的聯繫，社論作者不得又重新解釋了決議中的惹怒過毛的一段話，以使這位黨的主席更能夠接受。人們應該記得這個政治決議曾斷言，由於 1955-1956 年所有制的改造完成，中國的基本矛盾已變為落後的經濟基礎和先進的社會制度之間的矛盾。毛不同意這種觀點，在他的矛盾問題的講話中，他認為，基本矛盾仍然是不完善的上層建築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兩種提法差異的重要性在於，決議認為當前中共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而毛的講話卻認為還需要進一步改革上層建築，例如黨的整風。如果要把決議作為整風運動的依據，就必須對它作重新解釋。因此，《人民日報》5 月 2 日的社論寫道：

> 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既不復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黨在國內問題上的主要任務，就成為團結全體人民來發展生產，也可以說，來同自然界作鬥爭。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新形勢下的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變為人同自然界的矛盾。人類同自然界的鬥爭從來是而且永遠是通過社會來進行的，通過一定的生產關係來進行的。因此，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必然仍然表現為人同人之間的矛

盾，只是這種矛盾由敵對階級間的矛盾變成了人民內部的矛盾罷了。[79]

整風運動是為了改造犯錯誤的黨員。然而5月2日的社論微妙地指出，他們並不都是那麼壞。對毛1949年提出要溫和地對待人民的語錄暗示，從那時起，黨就是這樣做的，因為社論並沒有說不是這樣。社論對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究竟是什麼導致內部矛盾的分析加強了人們這個印象。社論認為首先是對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再教育不夠，其次才是黨的幹部的錯誤——並且是指經濟建設上的錯誤，而不是聯繫人民方面的錯誤。[80] 甚至在論及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時，社論作了一些修正，以緩和對黨員的攻擊。指示說「一部分」立場不堅定分子甚至沾染上了國民黨作風；[81] 社論只把這種分子算作「少數」，並用含義較廣的詞「一部分」來形容有一般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傾向的幹部。[82]

5月2日的社論表明，《人民日報》在反映了毛澤東的觀點大約3周後，又轉回到了它從前的不贊成毛澤東的立場。在5月和6月初的整個鳴放時期，它仍堅持這一立場。這是怎麼可能的呢？這個報紙是怎樣被控制的呢？

以我們目前所知道的情況，只能做一番猜測。我的猜測如下：《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首先對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胡喬木是這個部主管新聞的副部長。[83] 胡又要對部長陸定一負責，陸是八大以來黨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按理說，陸應該對鄧小平負責，鄧作為總書記是總管中央各部的。但有證據表明，在共產黨執政後，劉少奇就一直掌握著宣傳和新聞的大權，宣傳部官員通常直接向他報告。[84] 我想，毛一般不會干涉這個指揮體系，但是，當4月初劉不在北京時，毛進行了干涉。4月中旬劉從外地巡視各省歸來時，他與毛達成一個協議，同意發佈中共中央4月22-23日的指示，並繼續在《人民日報》上宣傳毛的觀點。由於決定迅速發動整風運動，毛違反了這個協定。毛這樣急於從事可能是瞭解到政治局的大多數人支持他。如果是這樣，劉就不能阻

止整風運動的發動。但是，劉能保證《人民日報》對待運動的態度，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說是正確的，卻能反映他本人的懷疑。事實證明，他就是這樣做的。正是由於毛對只能斷斷續續地控制《人民日報》而感到憤怒，使得他在 4 月初提出過一個激進的建議，建議每省應有一個非黨的報紙與省的黨報競爭。[85]

第十六章 鳴放

五個星期的自由批評

從5月1日到6月7日整風運動有效地開展著。在這一期間，許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由於確信「早春」終已離去，夏天業已到來，因而傾訴了他們過去積攢的對黨的不滿。[1]他們的批評證明了毛澤東關於必須迅速地行動起來，進行整黨和糾正黨的濫用權力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是，許多批評者所持的尖銳態度也證實了劉少奇和彭真的擔心：允許開門整風是危險的。6月8日，《人民日報》敲起了警鐘，受到圍攻的黨的幹部急不可待地開始反擊批評他們的人。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運動開始了。

沒有必要在這裏記述那些發生在允許自由批評的、動亂的五個星期中的全部事件，或者去考查批評者所指責的具體內容。但是，為了對最高層領導在整風問題上的持續分歧提供背景和瞭解為什麼毛澤東最終不得不同意放棄他發動的整風運動所採取的形式，對整風的發展過程畫出一個大致的輪廓是必要的。

5月1日，整風指示發表在《人民日報》的頭版，同時此報在下面刊登一條新聞，報道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已經決定立即發動整風運動。第二天該報又報道說，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已經開始為自身的整風進行緊急部署。周恩來、鄧小平顯然正在敦促他們所管轄的單位採取行動。然而，劉少奇和彭真在他們管轄的那一部分中央政府機構——人大常委會，似乎壓制了對整風的任何熱情：5月6日《人民日報》的一條具有啟迪意義的新聞報道說，周恩來的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召集國務院和人大常委會所屬部門的黨委書記開會，決定怎樣開展整風。

會議商定了關於整風的若干方面的一些問題，但是，當討論到如何進行運動時，會議決定成立一個以習仲勳為首的僅僅負責國務院各部委運動的領導小組。對人大常委會各個機構的運動，卻未做任何安排。看來，周恩來這次意在使他那些持反對意見的同事開始行動的努力是不成功的。[2]

整風的反對者們所關注的是在運動期間要解決的三個主要問題，即保證執行「和風細雨」的政策，關於領導幹部參加體力勞動和整風如何（不）妨礙正常工作。[3]《人民日報》雖然在表面上支持整風，但在闡述這三個問題上很關鍵地站在了反對派這一邊。然而，可能是由於毛的堅持，該報也轉載了上海黨報發表的堅決支持整風的社論。[4]

但是，支持整風的一方採取的最主要的步驟是讓黨外人士參加整風。從5月8日起，中共中央統戰部（應該是在它的主管，總書記鄧小平的指示下）邀請主要的黨外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在北京開了一系列座談會，聽取他們對黨的批評。[5]接著，在中國所有的主要城市，在各類組織的主持下，舉行了類似的座談會。5月13日，文藝界主管宣傳的首腦周揚在中國作協發表了重要講話。他鼓勵批評者說，甚至「那些講了反革命話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6]開門整風搞起來了。但是毛也不得不同意讓對批評者不予反駁的狀況只持續一個月；一個秘密的黨內指示把6月7日作為截止日期。[7]

到5月中，支持整風的一方在領導幹部參加體力勞動問題上贏得了勝利。但他們的對手通過提供整風有害於工作的證據正在開闢一條新的戰線。然而一直到5月19日，毛似乎仍感到運動還是在按計劃進行。當天，《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鼓勵繼續辯論，並指責那些憂心忡忡的黨員。該報還宣佈人大常委會已決定於6月3日舉行人大年會。在5月19日到25日之前，最高領導層，也許包括毛在內，開始有了新的想法。5月25日做出決定，人大會議推遲到6月20日召開。[8]與此同時，毛對批評者發出了警告。他對出席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一組代表們說：

> 你們的會議開得很好。希望你們團結起來作為全國青年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你們這個會議是一個團結的會議，對全國青年會有很大的影響。我對你們表示祝賀。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都是完全錯誤的。[9]（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後來證明，這段話中的最後一句話是意味深長的。[10] 但是毛為什麼發出這個警告，並且又是針對誰發出的這個警告呢？

毛選擇青年團的領導來講這番話表明青年是最令他擔憂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 5 月 15 日會議開始時，毛在與青年團的代表們談話時並沒有講過類似具有份量的話。[11] 在隨後一段時間裏發生的情況是：以北京大學這個最高學府開始的鳴放已擴展到其他大學，並正在像滾雪球般地迅速發展。5 月 19 日，北大學生受到統戰部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的激勵，[12] 開始在後來被稱之為「民主牆」的地方貼出大字報。[13] 據一個在場觀察者說，「長期受壓抑的感情、要求、不滿和挫折感如暴風雨般爆發出來。每日貼出成百張的大字報。運動的目標不斷擴大，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受到抨擊。」[14] 在這些大字報中，鎮反、肅反運動造成的冤案、黨對教育機構的管理、照搬蘇聯的教育模式、高等院校課程的過度政治化、黨的官員對黨外教師和學生的宗派主義態度等問題都被提了出來。[15] 不久，學生開始討論那些和他們並非直接有關的問題：黨和人民的關係以及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生活水平是否真正有了提高。[16] 5 月 23 日，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女學生林希翎在北大的「民主廣場」發表了演說。[17] 她是那些持不同政見的學生中最直言不諱的之一。林小姐提出了作家胡風的案子，此人在 1955 年被指控為反革命。林斷言他沒有嚴重的錯誤，說他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在講到胡風問題時，林聲稱毛 1942 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

講話已經過時。[18]她還指責黨員想要壓迫人民並採用目的在於欺騙人民的政策。[19]

在講演快要結束的時候，林希翎說：「北大已經行動起來了，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現在，西北、武漢、南京以及其他許多地方的學生都正在行動起來。」[20]如同後來文化大革命中一次重要的披露所證實的那樣，正是這種前景使最高領導層感到擔憂。5月25日，劉少奇在人大常委會宣佈人大年會不得不推遲召開的時候，他警告說：

> ……使整風運動搞得更好是每個人都應注意的問題。如果指導得不好，就可能出問題，人民會走上街頭……大學和中學已經在活動中，如果工人群眾行動得慢些就再好不過了。如果工人、中小學的教員和其他群眾組織也開始動員起來，我們將無法堅守陣地……如果我們不能控制事態，那麼很快成百萬的人將會起來，使我們處於無能為力的地步，這對我們將是不利的。[21]

劉少奇表示出來的憂慮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因為直到5月25日他講話的時候，各地學生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因缺少相互瞭解而受到約束。林小姐在兩天前的演講中曾抱怨說：「我們無法相互聯繫，瞭解不到情況，存在著新聞封鎖。」[22]

5月26日、27日《光明日報》、《文匯報》先後報道了北大開展整風運動的情況。這些報道立刻對中國其他地方的學生發生了影響，[23]形勢迅速起了變化。北大的一些學生也自己行動起來。6月2日，他們跑到天津去煽動那裏的大學生。[24]這些持不同政見的學生懂得他們是在玩火，[25]但他們卻選擇無視毛對青年團的代表們講過的「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這句話很快地被用白色的大字刷在了北大的「民主廣場」上。[26]

學生的鳴放之所以迅速高漲以及鳴放在許多情況下表現出反黨的傾向，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整風運動初期的關鍵時刻，那些最有經驗的團幹部都去參加青年團的代表大會了，[27]否則他們有可能能將

辯論引導到較溫和無害的境地上的。當參加會議的代表回到他們的校園時，他們也許發現形勢已無法控制。[28] 5 月 27 日之前，[29] 赫魯曉夫攻擊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的部分章節已在北大張貼出來。這是從《紐約工人日報》發表的節譯本譯過來的。[30] 儘管北大黨委在一兩天內揭掉了張貼物，但有關這一報告內容的新聞肯定已在北京高等院校不脛而走，廣為流傳。[31]

看到騷動在發展，毛和他的同僚必定想到了兩個前例而感到不安。儘管 1957 年中國的國內形勢與 1956 年匈牙利的國內形勢有很大不同，但匈牙利的叛亂是個樣板，[32] 表明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能夠對黨發動強有力的攻擊。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感到他們正在模仿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其中有些人後來而因此受到非難。[33] 在中國自己的歷史上，則有 1919 年五四運動的先例。[34] 1957 年 5 月，隨著學生運動的發展，沒有一個中國領導人會忘記，將近 40 年前，他和他的同伴們通過示威遊行取得了多麼大的成就。周恩來就肯定不會忘記。[35] 5 月 30 日毛對法國前總理富爾說：「對待這樣一個民族，遵守某種界限是必要的。」[36]

> 匈牙利事件和五四運動的先例在 6 月 6 日一些高級的黨外民主人士和學者開會討論形勢的時候都被引用到了。高教部副部長曾昭掄（他想必是消息靈通的）當時曾說道：「當前學生有很多問題，事情已經發展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一旦他們走上街頭，市民將與他們彙集到一起，情況就將更糟。因為目前群眾也對黨不滿……黨脫離群眾已到了嚴重的程度。由於這一原因，再加上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影響，形勢已非常緊急。目前的形勢已與波蘭統一工人黨召開八中全會前夕的形勢極為相似。黨可能錯誤地估計了當前整風的形勢。很可能黨一直認為高級知識分子會提出許多問題而青年學生則肯定不會，結果卻恰恰相反，這已使黨處於被動的局面……上海的形勢可能比北京還要嚴重。」[37]（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曾昭掄對於黨對整風形勢的發展感到意外這一點所作的這番評價聽起來是有道理的。後來被指責為兩個主要右派領袖之一的交通部長章伯鈞同意曾的評價，並指出了另一點：

> 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人士提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向來是客客氣氣的，但估計不足；沒有想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38]

另外一位教育家、首都主要高等院校之一的清華大學的副校長在會上說，他收到農民的來信，要他勸告他們的孩子不要鬧事，「我這樣做了，但是學生們決心已下。這看起來真像五四前夕的情況。他們不願意聽他們父母親的勸告，就像我們當學生時不願聽我們父母親的勸告一樣……」另外一位會議的參加者，根據北京師範大學正在發生的情況指出：「有些人說，當前的形勢是五四運動以來未有先例的。」[39]

很可能，這次會議的參加者，如同後來批判他們的人所說的，從這次危機中看到了在政治上有機可乘。章伯鈞似乎已經感到，如果他們幫助中國共產黨把局勢平息下去的話，他和他的黨——民盟是可以擴大影響的。[40]但是，他們似乎並沒有如同後來有人斷言的那樣，被事態的發展沖昏了頭腦，以致過高估計當時形勢所具有的爆發力。當然6月12日和13日發生的湖北漢陽學生鬧事（被其煽動者說成是「匈牙利事件的縮影」）顯然很快又證實了章等人的看法。[41]當章伯鈞和其他人試圖向周恩來表示願助一臂之力時，總理不願做出評論。[42]但是，許多政治局委員私下裏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贊成6月6日的會議對形勢做出的估計的。

這一假設不僅可以從5月25日毛、劉各自所做的公開的或秘密的警告中得到支持，[43]而且可以從劉少奇所作的關於學者對公共秩序不構成威脅的估計得到說明。劉否認來自這方面的危險，他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44]然而，在下述兩個方面卻存在著鮮明的對比：一方面中共漫不經心地，還讓林業部部長羅隆基——他和章伯鈞一起，被說成是一個反黨集團的頭目——於6月3日，即反右即將開始之前，

出國訪問[45]；另一方面中共在進行反擊時對持不同政見的學生卻大加撻伐，其中包括處決漢陽鬧事的學生領袖。[46] 處決是在 1957-1958 年學年開始的時候執行的。1 個月以後，1000 多名重要的黨的官員被調到大學工作，其中 200 名被委以校長、副校長這類高級職務。[47] 而還在此之前就做出一項決定，要求高等院校的每個畢業生在分配工作前參加一次政治考試。[48]

擔心又一次五四運動的爆發使政治局的多數人確信有必要進行反擊，毛可能認為這樣的擔憂是不必要的。陳伯達參觀了北大校園，之後認為新華社關於那裏的騷亂的秘密報道是言過其實的。[49] 此外，毛曾公開宣稱他對騷亂毫不在乎。[50] 然而，由於他未能實現他對黨作出的搞「和風細雨」的整風的諾言，他的威信收到了打擊。同時，中共的幹部因在整風中受到嚴厲的譴責，士氣已低落到危險的地步。[51] 這樣，毛不得不同意實行反擊。這一逆轉使毛十分惱火，他把他的憤慨發洩到了那些促使整風激烈程度逐步升級的報紙身上。5 月中，他已經秘密寫下了一篇關於新聞報道中的修正主義的文章，他寫道：

> 我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否認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他們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原則區別，他們混同反映社會主義國家集體經濟的新聞事業與反映資本主義國家無政府狀態和集團競爭的經濟的新聞事業。他們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黨的領導。他們贊成民主，反對集中。他們反對為了實現計劃經濟所必需的對於文化教育事業(包括新聞事業在內的)必要的但不是過分集中的領導、計劃和控制。[52]

值得注意的是，毛在反擊開始之後感情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公開的表露（儘管使用了匿名）是通過譴責一份報紙——《文匯報》的方式表現出來的。[53]

也許難免的是，黨必須斷言有一個反共產主義的集團存在，以解釋整風中出現的反黨潮流。但是之所以選擇非黨的部長章伯鈞和羅隆基作為這一集團的領袖，很可能是由於他們與那些在鳴放中起了領導作用的非黨報紙的關係。章伯鈞是《光明日報》的社長。[54] 該報的總編輯因派記者到 9 個城市去召開提批評意見的座談會而受到攻擊。[55] 羅隆基通過他的老朋友浦熙修小姐（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小姨子）對《文匯報》有巨大影響。浦小姐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的實際負責人。[56]

「和風細雨」問題

當整風運動開始的時候，它的反對者沒有料到在 5 月底之前他們會得到藉以要求停止整風的有力論據。因而當時他們找出了一些問題，至少可以據此使整風運動受到限制。當中的第一個問題，「和風細雨」問題，事後證明是最重要的。

兩個月之前，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已經提到過「和風細雨」。[57] 他把「和風細雨」與「小民主」，即整風指示中提倡的同志式的談心活動聯繫在一起。但是，像劉一樣，毛也設想了「大民主」——大的鬥爭會的不可避免性。不過整風指示規定，除非官僚主義已經發展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一概禁止採取這樣的方法。[58] 顯然，毛為了使整風更易於為黨員接受而做了重要的讓步。但是，黨員的憂慮可能一直存在，因為毛暗示中共對待資產階級也歷來採取「和風細雨」的態度。從理論上講也許是這樣，但是從 5 月份裏聽到的批評表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毛後來自己指出，中共對待知識分子要比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的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59]

5 月 7 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為什麼要用和風細雨的方法來整風》反映了黨員的憂慮。在解釋為什麼整風指示強調這一方法時，社論說：如果黨不行動起來糾正不好的工作作風：

> 這對於一個以服務於人民為自己的天職的工人階級政黨來說，自然是非常危險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的黨為要整

> 頓自己的作風，就片面地強調給予所有犯錯誤的同志以紀律處分，甚至用紀律處分代替了思想教育，形成了懲辦主義，這對於我們黨也是極其危險的。

在這裏，社論實際上是把粗暴地對待人民的嚴重後果與粗暴地對待犯錯誤的黨員的嚴重後果等同起來了。但是毛澤東發動整風卻是出於對前者而非後者的關注。

社論接下去引用了劉少奇在八大報告中的話，強調指出那種對幹部的錯誤不是從思想上根本解決問題的過於粗暴的政策是毫無意義的。然後，為了讓心存疑慮的黨員放心，社論在談到毛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時指出：「我們黨 1935 年 1 月遵義會議以後，就確立了對待黨內錯誤的正確方針。」正是在遵義會議上毛開始了對中共的領導。提到這一點意味著毛和劉在怎樣對待犯錯誤的幹部的問題上是一致的。儘管他們在整風問題上存在著分歧。[60]

在一次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彭真講整風問題時突出地論述了毛的反對者強調的「和風細雨」方法的重要性。《人民日報》報道了彭的講話，其中一半以上篇幅論述了這個問題。報道援引彭真的話說：「和風細雨」的方法是這次整風運動的「特點」。[61] 這話是針對著黨員的憂慮而說的。只要黨員們被告知「和風細雨」的方法一直是先前思想教育運動的特點，他們就不可能安寧。彭好像是正在做出個人的保證，說「和風細雨」是一種新的方法。當然他不會明確地承認這一點，因為那將意味著指責以前歷次運動的作法。

關於彭真講話的報道登在《人民日報》的頭版。在它的第二版，這份報紙再次強調了「和風細雨」方法對幹部的重要性。這一版的「黨員來信」欄中登了一封信，要求澄清這一政策。信的題目是：《應當怎樣理解和運用和風細雨的原則》，作者曾志問道：按照這一原則行動究竟意味著什麼？它在任何情況下適合於任何人嗎？這封信的重要性並不只是在於它概述了幹部的憂慮，而在於它的作者的身份。報上沒有

透露這位作者的身份——她不僅是廣州市委的一個高級官員，而且還是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的夫人——這一點才是更值得注意的。

與廣東的黨組織在體力勞動問題（將在下一節論討）上的態度聯繫起來看，這封信表明4月底彭真陪同伏羅希洛夫訪問廣州具有重要的政治影響，甚至可以說是有政治考慮的。如同已經表明的，彭陪同伏羅希洛夫去廣州可能是盡力使自己不公開參與整風運動的準備工作。如果他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他也可能想要與陶鑄商討。陶鑄對於整風的態度彭可能已從劉少奇那裏得知了。[62]

看起來，劉少奇和彭真已在黨員面前被精心地描繪成為「和風細雨」政策的保證者，而廣東的黨組織的干預（通過陶鑄夫人的信）強調了這一政策是如何的重要。然而，如果把劉，可能還有彭看作是對犯錯誤的黨的幹部不加疑問的保護者那就過於簡單化了。5月7日，劉少奇對高級黨校的校長楊獻珍和楊的一個同事說：

> 必須把原則性的問題搞清楚，但要採取正確的方式，決不應傷害人們的感情或者傷害他們的自尊心。當然，我們也決不應因為正在採取這種和風細雨的方法解決問題，就對原則性的問題漫不經心。這種用來解決思想問題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是既要團結同志又要分清是非。在執行中經常出現的偏差是片面地強調一個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既分清是非又團結同志——這是很高明的藝術，僅強調一方面是不行的。[63]（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如果以為陶鑄與劉、彭在所有與整風有關的問題上看法都一致，那也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4月陶在廣東省宣傳工作會議上總結講話的精神比劉的觀點更接近毛。此外，陶像鄧小平而不像劉，他明確地承認中共執政黨的地位是產生官僚主義的根源。[64]劉、彭與陶是在反對可能使黨陷於混亂的過火的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團結起來的。當「和風細雨」的政策未能實現的時候，毛只好同意停止運動。

體力勞動問題

整風指示的另一個基本點是堅持領導幹部以部分時間參加體力勞動，目的在於「加強黨同廣大勞動人民的聯繫，徹底改變許多領導人員脫離群眾的現象」。[65] 整風指示指出關於這個問題將另做專門指示，這充分證明這個問題對於毛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在這個問題上黨的主席再次意外地遇到了來自劉少奇、彭真、陶鑄等人不同意見。

5 月 3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同群眾共甘苦》的社論。[66] 社論指出，領導幹部參加體力勞動是避免脫離群眾的重要途徑。在提到延安時期領導者們參加體力勞動的情況時，社論問道：「如果有時間有機會，他們（指領導者）有什麼理由不能直接參加生產勞動呢？」[67] 接著社論詳盡地闡述了與群眾同甘苦的重要性，並引用了劉少奇在八大報告中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

> 一個好黨員，一個好領導者的重要標誌，在於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狀況和勞動狀況，關心人民的痛癢，懂得人民的心；他堅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能夠接受人民的批評監督，不在人民面前擺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眾商量，群眾有話也願意同他說。只要我們的黨是由這樣的黨員組成的，我們就永遠有無窮無盡的、不可征服的力量。[68]

這段引文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根本未提到體力勞動。劉少奇勾畫的是一個具有無限的自我犧牲精神和善於瞭解群眾願望的領導者的形象，但是這個領導者並不必須是一個實際參加體力勞動的人。實際上，我在上述引文中重點劃出的第二句暗示劉所列舉的黨員應有的種種品質已足以保證一個領導者具有美德，不必參加體力勞動。當然，劉的話是在黨的領導層不在考慮這個問題時講的，他不必為沒有提到體力勞動而負責。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 1957 年 5 月形勢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下，《人民日報》卻仍從劉的報告中選引了這一段顯然絲毫沒有涉及到社論主題的話。緊接著這段引文，在社論的最後一段裏，社論的題目和劉的語錄的含義已清晰可見：

> 每個領導人員一定要做到關心群眾的痛癢，同群眾共甘苦，並且盡一切努力幫助群眾克服困難。把自己同群眾之間的一切人為的障礙都打破吧！把階級社會遺留的影響盡快地像清除垃圾那樣掃除掉吧！放下「官架子」，走到群眾中間去吧！[69]

這些確實都是令人欽佩的情操，但卻又一次隻字未提要參加體力勞動。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篇社論中舉的幹部參加體力勞動的例子都只涉及下層官員。

這個社論表明存在著爭論，即對於有獻身精神的黨員來說參加體力勞動到底有多大的必要。社論還表明，那些認為參加體力勞動是不必要的人正在強調領導幹部工作的極其繁重，他們可能希望在中央關於體力勞動的指示中能加上一條：如果誰能說明自己沒有「時間和機會」的話，他們可以被允許免除體力勞動。

在整風指示公佈以後，這一爭論持續了兩個星期。5 月 4 日，上述社論發表之後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報道了河北省（環繞著北京的省）和天津市的第一書記參加體力勞動的消息；又過了一天，他們勞動的照片登出來了。[70] 這條新聞似乎已使全國各地的第一書記確信，他們不可能再逃避體力勞動了。隨後，《人民日報》關於 10 省的一個綜合報道把 5 月 5 日作為其他省委第一書記參加體力勞動的最早日期。[71] 5 月 7 日，北京軍區司令員楊成武將軍、政治委員朱良才將軍參加了體力勞動，然而他們的照片未出現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已經知道，彭真沒有鄰省的河北和天津第一書記們那樣積極；但他讓自己和本地軍隊官員之間的不一致如此明顯，這似乎也有些過於魯莽了。直到 5 月 9 日，彭真自己終於參加體力勞動時，《人民日報》才發表了兩位將軍的照片。彭和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及其他官員參加了修路的勞動。5 月 10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參加勞動的照片，同時用醒目的字體刊登了他勞動時的講話：「我對體力活還很熟悉，從小幹過 10 多年的莊稼活。在延安的時候，很多中央負責幹部都下地勞動，現在應該發揚這個好的傳統。」[72]

僅僅是到這時候《人民日報》才登了關於 10 省情況的綜述。這一報道使人發現，這 10 個省的第一書記幾乎都比彭先參加了勞動，有些早了好幾天。[73] 但是從這個綜述中可以得出一個更重要的結論，這就是，即使到了那個時候，中國半數以上的省和直轄市的第一書記在這個問題上仍在觀測風向。

彭真對這一政策的支持可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中央關於體力勞動的指示所標明的日期是 5 月 10 日，正好是彭真參加修路的第二天。但是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這可以由這一指示直到 14 日才公佈這一事實看得出來。在這段時間裏，廣東省則是我行我素。

廣東是那些在體力勞動問題上一直堅持自己觀點的省份之一。那裏的黨的領導官員直到 5 月 11 日才開始參加體力勞動，比《人民日報》報道彭真參加勞動還要晚一天。[74] 5 月 13 日，廣東省委常委會開會制定了自己關於參加體力勞動的計劃，儘管中央的整風指示已明確地指出中央將隨即下發一個關於這個問題的指示。看來廣東省委是在企圖用自己的計劃對中央即將做出的指示施加影響。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新華社關於廣東這方面活動的一條長長的電訊中根本沒有提到陶鑄的名字。[75] 這與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簡短地報道 9 個省的活動時每一篇都突出地提到第一書記的名字的情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5 月 14 日，就在中央關於體力勞動的指示在北京下發的同一天，廣東省在《南方日報》上發表了關於體力勞動的計劃，[76] 該計劃規定，所有 60 歲以下適於參加體力勞動的領導幹部每月平均勞動兩個半天。[77] 在中央的指示中則沒有這樣的年齡限制，它規定所有身體條件允許的人都要參加體力勞動。中央的指示指出了幕後爭論中反對者所持意見的主要依據：「一些同志仍然對縣、區、鄉以及縣以上的機關幹部直接參加生產勞動顧慮重重，他們認為這樣做會影響領導工作。」[78] 中央的指示認為這些反對意見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指示中沒有提到「時間和機會」的限制條件，並把中央委員也要參加勞動明確地寫在條款裏。儘管如此，5 月 15 日，中央的指示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當天，

劉少奇還是表示同意這一計劃。他對共青團的一個官員說：「如果你不參加體力勞動，那麼你就做不好青年工作。」[79]

兩位黨的幹部利益的保衛者現在都支持體力勞動的政策了。5 月 17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有關這個問題的第二篇社論。這次社論的題目本身（《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重大意義》）就強調了體力勞動。社論進一步確定了只有那些身體不行的人才可以不參加勞動。[80] 我一直未能發現廣東的黨組織有因此而取消它的 60 歲的限制的任何跡象，陶鑄也明顯未對中央的整個政策公開做出任何服從的表示。[81] 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他本人以拒絕參加體力勞動來違背中央的指示，因為在劉和彭已表示同意的情況下，這樣做是冒險的。但是這說明陶鑄要表明他對這一政策仍然持不贊成的態度。

整風與工作的對立

通過提出「和風細雨」和領導幹部參加體力勞動的問題，毛的反對者試圖緩和整風的衝擊力。在這兩方面的努力都未成功的情況下，他們又做出新的嘗試，提出整風正在損害重要的經濟工作，想以這一理由來削弱整風的基礎。整風指示曾經指出：「整風計劃應該貫徹整風和工作兩不誤的原則，並且必須使整風運動的進行同工作的改進結合起來，同人民內部矛盾的具體解決結合起來。」[82] 應該注意的是，雖然目標很清楚，是要使整風、工作兩不誤，都取得最好的效果，但實際上整風運動一直是佔居首位的。

5 月 4 日，《人民日報》報道了中央國家機關開展整風運動的情況。這些機關的行動表明它們希望在整風運動中帶頭，這很可能是周恩來督促的結果。報道指出，仍然有一些單位對整風和工作兩不誤的原則不甚明白。接著，報道暗示，由於一般幹部對於整風由 1958 年提前到 1957 年 5 月進行沒有思想準備，混亂的現象普遍存在。這可能是對毛堅持要把整風提前的狡猾的挖苦。一個星期以後《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關於既不要忽視整風也不要忽視工作的評論員文章。儘管文章的

題目對整風和工作二者前後次序的排列是正確的，文章中卻不正確地說，在整風指示中中央委員會已經規定了「工作和整風兩不誤」的原則，這一排列次序在文章中出現幾次顛倒，顯然絕非偶然，因為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要指出許多中央國家機關過分突出了整風。雖然中央政府的機關黨委規定每週學習兩或三個下午，有些單位卻佔用了三個整天或五個下午。學習時工作完全停頓，沒有人接電話，沒有任何高級幹部值班。「評論員」說，這種現象必須制止。[83] 國家機關對於整風的過分熱情不大可能是「評論員」虛構出來的，但是《人民日報》應該是很高興有機會強調整風的危險和批評周恩來的下屬的。

這一假設可以從以下的事實得到證實。在同一天的《人民日報》中，總編輯鄧拓用筆名發表了一篇嚴厲指責「庸人政治」的文章。[84] 他用這幾個字眼批評一些幹部的愛管閒事，插手一切，結果卻往往使事情辦得更糟糕。鄧指出，現在有這樣一些幹部，他們僅僅強調思想政治工作。他們無休止地召開會議，發表講話，寫各種報告，忙得簡直喘不過氣來。很清楚，鄧拓下筆的時候一定是想到了中央國家機關的狀況。他建議人們等待這些庸人冷靜下來，然而他又承認，實行符合情理的政策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們身旁的庸人眾多，他們又有權發號施令」。他提倡對不瞭解的問題要取謹慎態度，但是他又承認，在當前「我們的領導者要求我們放手、放手、再放手」的時候，是難以採取這樣的態度的。因為這樣的態度易於被指責為放棄領導。這些話無疑是對毛的有意尖銳挖苦。

這兩篇文章的重要性在於對幹部指出了不應允許整風干擾日常工作。但是除了在廣東，這一信息沒有任何發生了作用的跡象。根據可以得到的證據，廣東倒有可能在私下與《人民日報》聯合了起來，試圖把反對整風支持工作的意圖貫徹下去。5 月 20 日《人民日報》報道了新華社發自廣州的消息。這則消息說廣東黨已決定支持整風和工作兩不誤的原則，力求避免「狂風暴雨」(「和風細雨」的反面)和「趕任務」。這兩種現象已經出現。為了糾正這兩種現象，5 月 17 日(即

在《人民日報》發表那些文章一星期內）廣東省委決定整風計劃規定的時間應延長。原規定6月開始9月結束的單位重新規定為5月20日開始11月結束。這一報道令人尋味的是，廣東省透露的是還沒有公佈的一個整風計劃的修改細節。廣東的整風計劃註明的日期是5月15日，但是直到5月20日才發表在《南方日報》上。[85]假設新華社的消息是準確的，假設在判定出最初的整風計劃的兩天裏廣東省委常委會決定修改這一計劃，常委會選擇發表計劃的修改案而非原案就意味深長了。這些改動是用來討毛在北京的反對者的歡心的。另一點令人尋味的是，這個計劃本身並沒有提到導致這些修改的理由，也沒有對「狂風暴雨」或者「趕任務」的作法提出警告。這只能說明有人事先有意對新華社的記者透露了廣東省委對於能否保證「和風細雨」和整風是否影響工作的憂慮。在廣東的整風計劃中關於體力勞動的那一部分裏，第一書記陶鑄的態度進一步表露了出來。這一部分涉及到關於體力勞動的兩個有關的指示。儘管中央指示的態度是相對嚴肅的，但在這一部分裏，看不出一點跡象，要放棄對60歲以上的幹部所採取的讓步。

從《人民日報》的報道來看，其它省並沒有倣傚廣東省的做法。一星期後，《人民日報》又邁出了一步，發了一篇題為《怎樣保證整風和工作兩不誤》的社論。[86]這一次，它沒有大膽到顛倒整風和工作兩者的先後順序——即把工作列在整風之前——的地步，但也非常清楚地表達了它的看法。《人民日報》主要關心的顯然是工作而不是整風，它從廣東省那裏接過接力棒，主張延長整風，使之不致影響工作。它再次批評了國家機關，甚至譴責了每週僅僅拿出兩個下午進行整風的大多數單位，理由是：如果這些單位按其計劃在兩三個月內搞完運動，他們將收效甚微，只能走過場。其次，《人民日報》還倡議，在遇到防洪一類的緊迫任務時，整風必須停止或者至少減少時間。

由於一篇社論比一篇「評論員」的文章具有權威，這個倡議獲得了更加迅速的響應。據新華社報道，第二天，即5月28日，河北省委

鑒於夏收夏播季節已經開始，決定推遲整風檢查。[87] 5月29日，河南省委通過了類似的決定[88]。5月30日，《人民日報》披露：出於類似的原因，新疆也正在採取類似的措施。

《人民日報》所倡導的，當然是一種切合實際的政策。就連毛也並非願意讓整風影響夏收。當然，一個省委第一書記實際上也不大可能允許整風耽誤極端重要的農業工作。不過《人民日報》在這個問題上發一篇社論，就用自己的權威賦予了那些當初就對整風持懷疑態度的省一級領導人以逃避整風的接口。整風生產兩不誤的原則雖未被正式放棄或更改，但社論已經指出了怎樣就可以在實踐中限制整風。人們一定記得，中國式「運動」的關鍵之處，在於它總是把人們捲入狂熱的行動之中，以使參與者認識到運動目標的急迫。[89]在城市裏，這往往意味著停止日常工作，不過這一直被看作是一種值得付出的代價。通過鼓勵官員們拖延整風運動，《人民日報》顯然是在倡議採取一些必將使這場運動的影響有所削弱的措施，儘管這些措施就常理而言是多麼的正當。也許身為總編輯的鄧拓認為可以這麼做，因為他知道，毛當時正擔心著整風運動的進程，儘管這種擔心是由於其它原因。

但是，毛的支持者們對於《人民日報》日益強烈的攻擊顯然並不打算認輸。6月3日，周恩來簽署了一份關於增產節約問題的國務院指示，從而在工作和整風的關係問題上激起了最尖銳的衝突。[90]

由於黨報始終認為整風普遍影響了工作，尤其是長時間地使國家機關的工作停頓下來，人們當然會指望國務院的指示會針對著這個問題。然而，指示不但明顯地忽視了這個問題，反而把周恩來的相反觀點表述得十分明確。

首先，國務院的這份指示宣稱，增產節約運動已經「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並且「取得了初步成果」。(著重號為作者所加)它承認整風運動發展不平衡，並列舉了一些缺點，但這些缺點並不包括政府部門因過分強調整風而影響了日常工作這一點。接著它反而以有力的語氣斷言，整風是促進增產節約的一個先決條件：

> 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主要關鍵，是各級領導幹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積極地開展整風運動，堅決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我們工作中的鋪張浪費和效率不高的現象，固然與經驗不足有關，（但是）同時也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作風所造成的。因此，整風運動的開展，就必將為貫徹執行勤儉建國、增產節約的方針造成順利的條件；同時，增產節約運動的進一步深入，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的繼續發揚，又可以充分發動群眾的積極性，使整風運動得到更大的收穫。[91]（著重號和括號內的話是我加的）

周恩來在這裏拒絕承認整風對生產造成了任何有害的影響；恰恰相反，他斷言整風運動必然會給經濟的發展創造適宜的環境。他的論點是：經濟工作中的挫折是「三害」所造成的，儘管也與經驗不足有關。

《人民日報》並不就此服輸。它在登載國務院這份指示的同時，在相鄰的版面上從不同角度發表了一篇題為《整風運動應該同增產節約運動相協調》的社論。這與國務院指示僅僅提出「進一步發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標題不同。《人民日報》社論的標題在暗示：國務院指示的意圖是要對整風運動加以約束，使之有利於增產節約運動的開展。其實，如我們所知，國務院的這份指示本身並沒有這樣的含義。《人民日報》這篇社論的開頭文筆犀利，說國務院的指示「非常及時」。隨後，它撇開了傳統的套話，沒有列舉增產節約運動自發動以來所取得的成果，也沒有對國務院指示中關於增產節約運動已經「大規模地開展起來」了的說法表示支持，而是簡短地說：「今年的增產節約運動已經有了初步成果，但是運動的發展仍然是不平衡的」。[92]（著重號為作者所加）這樣，社論不僅只援引了整風指示中兩個說法中較為低調的那個說法，而且甚至還通過「有了」成果而不是「獲得了」成果這樣的措辭來削弱這個看法的份量。在這用語吝嗇的開頭部分之後，社論再次

引用了上文曾引用過的國務院指示的這一段，認為它闡明了增產節約運動的新的意義。但隨後，社論又立即含蓄地反駁了這段話中的要點。

與著意強調整風對於增產節約運動具有重要意義的國務院指示不同，社論指出，國務院負責的各個部門已經因整風而忽略了增產節約運動：

> 經驗告訴我們，當我們需要同時進行兩種以上重要工作的時候，決不要把兩種工作對立起來，借口進行這種工作而放鬆那種工作。最近有些國家機關、事業和企業單位就只顧了討論人民內部矛盾和整風，而把增產節約運動擱在一旁了；有些只制定了增產節約的方案，還沒有充分發動群眾，有些連方案還沒有制定。這種情況應該馬上加以改變。[93]（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接著，《人民日報》社論批評政府部門破壞了增產節約運動和整風運動——該報以這樣的先後順序來排列——之間原有的緊密聯繫，並且強調，經濟部門的職責是抓好經濟工作。這一指責含蓄地暗示，自1957年5月發起的整風運動是沒有必要的：

> 其實，增產節約運動和整風運動原來就是緊密聯繫的。黨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規定要檢查「勤儉建國」方針的執行情況，就是要反對鋪張浪費，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整風指示確定了「整風和工作兩不誤」的原則。對於經濟部門來說，最重要的工作莫過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94]（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但是，對於國務院指示中關於鋪張浪費和低效率產生於官僚主義的工作作風，所以發起整風運動必將有利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提法，應當作出什麼樣的解釋呢？《人民日報》社論沒有迴避這個問題，但也僅僅把缺乏經驗與「三害」這兩點的相對重要性顛倒了過來：

> 經濟工作中的鋪張浪費等缺點和錯誤，固然有很多原因，特別是同經驗不足有很大的關係；但是如果從領導思想來檢查，

也同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有不同程度的聯繫。[95](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不足為怪，社論沒有像國務院的指示那樣去論證整風對於增產節約運動的極端重要性，而只是勉強承認了這一點，即在當前，「為進一步發展增產節約運動……應該幫助領導幹部們反對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96]

《人民日報》6 月 4 日社論的要旨，是指出國家的基本問題是經濟問題，黨的首要任務是促進經濟的發展。它引用了黨的八大的政治決議的有關內容——包括曾經激怒過毛的那一段文字——來加強自己的論點。它暗示：根據這樣的論點，整風與其說像周恩來斷言的那樣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還不如說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人民日報》的這個論點，很快得到了北京市委的支持。

6 月 5 日，北京市委召開了常委會議。這次會議形式上是貫徹國務院指示，實質上卻是要強調《人民日報》社論的精神。北京市委承認了自己在增產節約運動中的缺點，並指出「最近有些部門因為忙於整風而忽略了對生產的領導」。[97] 國務院指示所強調的整風有益於增產節約運動的發展的觀點，在這裏沒有引起共鳴。根據《人民日報》的報道，在會議僅有的另一處提到整風運動的地方，北京市委談到了要「認真地」貫徹整風生產兩不誤的原則。該報道的主要用意是，這種「認真」只有那些不允許整風影響到工作的那些單位才能最好地予以體現。

在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會議的同一天，《人民日報》試圖暗示，那些熱心於整風的省份是在不負責任地蠻幹。於是，該報轉載了江蘇省省報(《新華日報》)6 月 1 日的社論，並同時發了一篇關於江蘇省面臨的經濟問題的本報報道。[98] 這篇題為《繼續深入開展整風運動》的省報社論，一開頭便熱情洋溢地號召採取行動：

> 現在，我們要集中力量把這一偉大運動繼續深入開展下去，決不允許滿足現狀，決不允許遲疑不前，更不允許退縮，後退。[99]（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這篇省報社論以大量的篇幅不斷地用這種語調來表示對鳴放和辯論的擁護。僅僅在最後的一段，它才談到當前沉重的工作負擔。在交待完那些務必要在最近幾周內完成的農村和其他方面的任務後，社論說：「各級黨組織和有關部門，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整風和工作兩不誤的原則，在整風過程中牢牢抓住上述任務……」[100]（著重號為作者所加）接下來，社論一方面承認，為了完成經濟任務，有的單位只好暫時停止整風，但另一方面，它顯然又把這種做法視為一種特殊情況，認為省委無需為此而發佈一項全面減慢整風步伐的指示。社論指出：

> 暫不進行整風的單位一定要集中全力搞好當前生產和工作，加強對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教育，解決迫切需要而又可能解決的問題。這樣做，一方面為本地區本單位的整風運動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另一方面也保證了正在進行整風的單位，能夠順利地把運動繼續深入下去。[101]（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顯然，這並不是要江蘇省的所有單位都暫時停止整風。

《人民日報》把關於江蘇省的經濟問題的報道，正好登載在這篇社論的上方版面上。《新華日報》這篇社論把緊迫的農業任務僅僅說成是「十分繁重」，而《人民日報》的報道則認為這個省的局勢「十分緊張」：

> 江蘇省的農業生產進入了十分緊張的階段，夏收、夏種、夏插等工作幾乎是在同時期內進行，已經出現了一些突出的問題，如不及時解決，誤了農時，將會造成極大損失。[102]（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人民日報》報道接著詳細談到了存在的問題。任何一個讀過這篇報道的開頭這一段，又讀過那篇轉載的社論的人，都不會看不出來這個意思，即儘管江蘇省面臨經濟危機的前景，省委卻被整風搞得暈頭轉向，耽擱了極端重要的農業生產。

可是，周恩來仍給那些贊成整風的省一級領導人以支持。6 月 10 日，國務院發佈了有關領導工作和農業生產問題的另一份指示，指出農業生產的大忙季節已經迫近，並承認上半年出現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但是，這一指示雖然承認有的幹部不得不把全部時間用來抓農業生產，但絕沒有要把整風運動擱置起來的意思，指示說：

> 搞好農業生產，增加農作物的產量，是調節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為了爭取今年農業大豐收，各地在整風運動的同時，必須抓緊對農業生產的領導，切實做到整風、生產兩不誤。省級領導機關必須保證有一定的力量領導農業生產。縣級整風推遲到省級整風以後進行，更應該用全力領導當前的農業生產。[103]（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人民日報》就國務院的這個指示又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整風不能〔被允許〕誤了生產》，[104] 這個多少有點模稜兩可的標題，又一次觸及了問題的要害。社論談到，「整風和奪取農業豐收的任務的高度協調，是當前的重大問題，必須很好解決」。[105] 該報強調大幅度增加農業產量的重要性，認為農業生產是「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物質基礎」，從而改變了國務院指示的提法。接下去，社論談到：「因此，必須十分注意使整風與農業生產密切結合，不要因為整風而貽誤了農業生產的千金一刻的緊要時機。」[106] 社論讚許地提到了河南省領導的做法，允許在必要時中斷或者推遲整風會議。

國務院 6 月 10 日的指示曾經暗示形勢並沒有這麼嚴重，因為整風還沒有在農業生產基層領導集中的縣級和縣級以下的單位中開始；僅僅需要保證的是讓一些些主要的省裏的高級領導仍能騰出手來對下級單位進行監督。《人民日報》社論的觀點更為悲觀，它指出：

> 過去的經驗還告訴我們，在運動進展期間，下邊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往往因為有關部門的領導人員忙於運動，而被擱置或積壓起來……在這次整風運動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避免這

> 種傾向，堅決貫徹執行整風和工作兩不誤的原則，凡是涉及當前生產的問題，都要及時加以解決。[107]

到這時爭論已經主要是學術性的了。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社論——這是它為反擊右派而撰寫的一系列社論中的第一篇。事情很快趨於明朗：毛和周原先設想的整風運動將要被拋棄。但是，圍繞著工作與整風的關係問題而展開的這場爭論的持續不休——它一直持續到反右鬥爭開始，甚至更晚的時候。這本身就足以表明：這件事情不是導致改變方向的原因。

政治局內的力量對比

黨的領導人在整風是否影響生產的問題上發生意見分歧，並不會帶來對提出了種種批評意見的非黨批評者們的反擊。反擊是由學生中出現騷動引起的。黨或許能夠渡過校園裏的風波，但它的士氣和權威正在被持異議的學生們放縱的譴責所損害。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甚至那些一直支持整風的政治局委員——包括毛本人，都可能改變初衷。並且，即便毛像有些情況所表明的那樣，不為情勢所動，但不需要多少人對整風開始失望，就能使他處於少數派的地位。

當時政治局有17名委員和6名候補委員——其中6名常委。常委當中，毛、周恩來和鄧小平是贊成整風政策的。陳雲作為一個在對私有工商業實行國有化的最初階段就關心與工商業者保持良好關係的人，想必會贊同對資本家採取寬鬆的政策。在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主席台上，陳雲坐在周和鄧之間，這是表明他當時的態度的另一個例子。

劉少奇在整風問題上同毛的分歧，已有材料根據。整風運動開始後，他的這種態度又有了進一步的材料。他在中央高級黨校同楊獻珍討論工作與整風的關係時說，學生應當既讀書（做他們本職的理論工作），又整頓自己的工作作風。[108]據說文化大革命時，劉支持楊獻珍拒絕康生提出的學校應當停課、以便集中精力學習毛關於矛盾問題的

講話的建議。[109]可以肯定的是，在同楊獻珍的談話中，劉兩次把人民內部矛盾與同志之間的矛盾加以區分，這意味著甚至在整風運動發起之後，劉仍然不願讓局外人參與整頓黨的幹部的工作——就像此前的陸定一那樣。[110]

在 5 月份劉對北京地質學院畢業班的演講中，有一段話從學生的騷動對終止整風運動起了作用的觀點來看，是極富啟示意義的。

> 人們說，「好極了，你們是黨員。但是你們誇耀自己是老戰士，並且還受到了官僚主義的影響」。這種評論並非不真實。然而你們呢。你們不是黨員，你們生來就居住在城市，你們是否也受到了官僚主義的影響呢？我的文化水平沒有你們那麼高——我僅僅是一個中學畢業生。我昔日的同學有些已經是大學畢業生了，他們有沒有一點官僚主義呢？我認為，那些從不是黨員、從未在山區呆過的人，可能受官僚主義的影響更深——並且不僅僅是官僚主義，還有資本主義的影響。而我們呢？僅僅是受到一點官僚主義的影響。資本主義對我們的影響，即便有，也非常少。[111]

從這些話裏，人們可以感覺到一種對學生們無禮行為的強烈不滿，一種感到知識分子不可靠而產生的不滿，因為他們批評了那些曾經幫助共產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老幹部。共產黨內部從上到下無疑都有這種情緒。[112]

還未曾談到的最後一個政治局常委是朱德。他沒有在 2 月 27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的照片上出現，也許不能根據這一點作出定論。但需要補充的是，5 月 7 日他對黨中央機關的青年積極分子講話時，壓根兒沒有提到整風或者矛盾的問題。[113]這樣，在整風運動的開始階段，政治局常委們對這場運動的態度是:4 人讚成，至少 1 人，很可能 2 人反對。

在其餘 11 名政治局委員中，林彪和陳毅似乎在患病。[114]他倆可能沒有怎麼參加圍繞整風運動進行的那些討論。但陳毅曾公開表示，毛提出矛盾問題和為整風做準備是「完全正確的」。[115]至於林彪，自

30 年代初期直至文化大革命，他與毛的關係密切，並且在重要場合都是毛的支持者，由此看來，他在整風問題上站在毛的一邊幾乎是毫無疑問的。

從新聞照片上看，最高國務會議的缺席者除了劉少奇、朱德和林彪，還有彭德懷。看來，彭是整風的反對者。5 月 29 日在軍隊的一次會議上他有個講話，談到了矛盾問題，但沒有提整風。[116] 更為重要的是，沒有任何報告說他對人民解放軍的整風進行了指導；至少在表面上這項工作完全由他的下屬在主持。人們一定還記得，正是軍隊宣傳部門的官員在 1957 年 2 月攻擊了毛的百花齊放政策。如果說這些官員事先就已知道國防部長站在他們一邊，那麼，人們對他們敢於冒險的舉動將更容易理解。黨的元老、72 歲的林伯渠的情況不那麼容易確知，但他似乎也對整風持保留態度。他在接受《中國青年》雜誌社的一次採訪時，[117] 強調了「和風細雨」政策，認為它「非常重要」，很適宜，因為「許多同志能夠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這番話，像是在否定整風運動的必要性。[118] 他贊成這種說法，即由於黨處於執政地位，問題要比以往的整風多得多，但他沒有明確表示這就需要非黨人士參與。[119] 看來，林是要減低對非黨人士歧視的宗派主義「病害」的嚴重性。他僅一次按照整風指示的提法來排列「三害」的順序，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在所有其它的場合，他或者把宗派主義排在最後；或者乾脆把宗派主義省略掉，而僅僅提另外兩個病害。如此隨意地對待黨的指示中的標準提法是不多見的。

從照片上看，第三個缺席者羅榮桓元帥也沒有參加最高國務會議。似乎沒有線索來發現他對整風的態度。從 1956 年 9 月黨的八大，直到 1957 年 4 月 15 日伏羅希洛夫來訪，他看來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過面，這可能說明他患病在身，尤其是由於從 50 年代中期直到 1963 年在 61 歲上去世時為止，他僅僅是扮演著一個禮儀上的角色。當時可能

也患病的另一個元帥是劉伯承，他也很少露面。和林彪一樣，直到伏羅希洛夫到了上海，劉才出來迎接他。[120]

在其他的政治局委員中，彭真明顯地在整風問題上反對毛。70 歲的最高法院院長董必武大概處在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中，但他對毛是忠誠的。董親自領導了最高法院的整風。不過，像林伯渠一樣，他也按錯誤的順序排列「三害」，他的排法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121] 董似乎願意強調思想問題（主觀主義），而降低無禮對待非黨群眾的錯誤（宗派主義）。由於對黨的批評者要求對肅反運動作重新審查，董的這種排列可能表示了一種對其下屬司法人員的命運的關心。根據學生領袖林希翎的說法，法院非常擔心受到調查：

> 全國的公安局和法院開始更改過去的案卷，怕它們受到人大代表的檢查。這使我感到忿怒。法院裏過去的案卷是黨委成員擬寫的，它們正在被撕毀。有許多指控是虛假的。[122]

這種說法如果多少具有一點真實性，那麼董必武當時必定已意識到什麼事情正在發生、原因是什麼，並且無疑要保護他的下屬。但同時，董與毛的聯繫似乎十分牢固，使他願意公開表明自己樂於貫徹整風指示的態度。[123]

賀龍元帥出席了最高國務會議。在拿不出其它證據的情況下，他應當被視為整風的支持者。[124] 還有兩個負責財經工作的政治局委員，他們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和財政部長李先念。在 5 月 31 日開幕的國家計劃會議上，李富春鼓勵進行整風，並按準確的順序列舉了「三害」，但他似乎把工作中的缺點既歸因於「三害」，又歸因於缺乏經驗。這樣一來，他就在 6 月 3 日的國務院指示和 6 月 4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之間奉行了一條中間路線。[125]

在整風期間，財政部長李先念只是在代表中央政府出席內蒙古自治區成立 10 週年慶祝活動時作過一次公開講話。[126] 他的講話與中央整風指示的發表都在同一天，因此，他在講話中未提到整風運動可能並無特定含義，特別是考慮到毛從起草到發出指示中間的時間很短，

就更是這樣。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李先念在講話中扼要地談了如何處理矛盾的問題：

> 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思想工作，對於自治區的進一步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必須進一步提高全體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幫助他們學會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大民族主義、地區民族主義，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密切地聯繫群眾，全心全意地為各族人民服務。[127]（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正如毛希望的那樣，他把官僚主義排在首位。然而，排在第二位的是主觀主義。也許是在自治區黨的領導人、政治局候補委員烏蘭夫的要求下，李對宗派主義——即「大民族沙文主義」，例如漢人對蒙古人的歧視——只是輕描淡寫了一番。

表明李先念的態度的另一個例子，是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的預算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認真地插進了對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意義表示贊同的詞句。[128]但是報告沒有談整風運動，他也不像周恩來那樣懷著滿腔熱情。在同一次會議上，周發表講話說：

> 我國人民根據毛澤東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光輝指示，正在通過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通過揭露和批判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的勝利鬥爭，達到更鞏固的團結。[129]

總的說來，李先念可以被視為整風的支持者，但並非充滿熱情。可以這樣假定，當整風是為著改善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知識分子、技術人員以及工商業者的關係——與這些人的合作對成功地實施五年計劃至關重要——從而促進經濟建設時，李先念和李富春都是贊成整風的總目標的。但是，正如《人民日報》所說的這樣，運動容易引起工作混亂，特別在經濟面臨困難時更是如此，對此，他們是不會感到特別高興的。[130]儘管如此，如果把二李的有關言論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

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另一個重要的經濟籌劃人薄一波的有關言論相比，就可以看出二李畢竟還是對整風表現出了較為積極的態度。

5 月 9 日，薄一波在四川省有個講話，題目是「在基本建設工作中如何進行整風」。兩天以後，它成為《人民日報》頭版的重要消息。薄號召所有同志：

> 特別是在經濟戰線上工作的同志，學會勤儉建國的本領，克服基本建設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薄一波說：勤儉建國是黨中央提出的關於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總方針中的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問題處理得不好，就會擴大人民內部的矛盾，影響國家的建設。[131]（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接下來，薄談到了大量的實際問題和缺點，並且斷定這「主要是由缺乏經驗、官僚主義、主觀主義以及在我們的工作中存在著的教條主義等因素造成的」。[132] 他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除了要深入開展整風運動之外」，還要有一系列具體的措施。

薄的這個講話，其目的看來是要強調把整風當作解決工作中實際問題的手段的重要性——整風指示確實也提到了這一點——而對改善黨和群眾的關係這個實際上是整風的主要意圖卻加以貶低。這是談論生產比整風更為重要的一種微妙方式。僅在薄的講話見報以前兩天，《人民日報》曾刊載過一封「黨員來信」，恰好也談到了同樣的問題。[133] 那封「黨員來信」的作者、一個看來不為人知的署名郭軍的黨員提出，在按照整風指示的規定檢查內部矛盾的時候，有兩種可供選擇的方式。一個單位既可以檢查自己在貫徹政策方面的情況，也可以檢查自己在處理黨與非黨群眾的關係方面的情況。作者表示自己贊同前一種方式。《人民日報》加的按語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意見」，並希望有人繼續提出意見。兩天後出現的薄的講話，定會被許多讀者視為黨的最高層的一個領導人對於郭軍意見的支持。

在李富春 5 月 16 日重慶講話之後，薄又作了一些補充。他再次錯誤地排列了「三害」，據報道，他認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徹底

貫徹勤儉建國的方針的關鍵，在於反對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34] 他在此略去了「三害」當中最重要的一害，即官僚主義，並且把宗派主義置於特別為劉少奇所重視的主觀主義之後。他提出，增產節約的「基本關鍵」，在於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一說法，同6月3日國務院指示的有關段落，有著有意思的相似之處。國務院的指示說：增產節約運動的「重要關鍵」，是「積極開展整風運動和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兩種提法的重要區別是：薄認為提整風運動是不適當的。

6月初，薄更直白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多半是由於獲悉了黨決心要對批評者們進行反擊而變得大膽起來，薄在李富春主持的計劃會議上駁斥了批評者們，並把工作中的缺點全部歸因於缺乏經驗；而在一個月前，他也曾經譴責過「三害」。和李富春不同，薄據說是緘口不談整風運動或者人民內部矛盾；[135] 他和李先念也不同，7月1日，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講話的時候，仍然沒有涉及整風運動或者人民內部的矛盾。[136]

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因為同彭真關係密切而受到了攻擊。[137] 這個罪名也許是頗有根據的，因為他們來自同一個省，30年代都在華北地區工作，而且又是政治局裏僅有的兩個山西籍委員。

在政治局的其他候補委員中，應該有兩人是毛的支持者。陳伯達與毛的特殊關係前面已有敘述，這種關係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康生，這個也得益於文化大革命的人，1957年春天在天津和在高級黨校介入了爭端並且支持了毛。另一方面，宣傳部長陸定一在1957年3月就已經表露出了對毛式的整風的不滿，他沒有促使鄧拓宣傳毛當時的講話。並且，和副手周揚相比，他在整個運動期間表現出的沉默簡直是振聾發聵的。

內蒙古自治區的領導人、國家民族委員會主席烏蘭夫副總理按理應該是對整風表示支持的人，因為改善同少數民族的關係是整風運動的一個重點。4月30日，他在為慶祝內蒙古自治區成立10週年而撰寫

的文章中確曾談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當前的任務之一。[138] 同一天，他在呼和浩特講話時說道：

> 為了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進一步加強人民團結，必須執行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必須克服領導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139]（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但是，和李先念一樣，在這同一個場合，烏蘭夫也弄亂了「三害」的順序，只是排列形式和李先念有不同。和劉少奇一樣，他突出主觀主義的危害，把注意力放在了幹部的思想問題上。有關烏蘭夫對整風的態度的另一個例證，可見於 5 月 20 日《人民日報》的一篇新聞報道。這篇報道談到，兩天以前，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已經就一項「新」的整風工作計劃取得了一致意見。報道透露，之所以用這個「新」字，是因為從 1956 年 12 月到 1957 年 3 月末，內蒙古的黨組織以增產節約運動和機構的合理化為核心目標，已經進行了一場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這篇報道是在暗示：新的整風運動是多餘的，這個觀點後來被《人民日報》6 月 3 日的社論採納。它還進一步暗示：整風的實質與其說是改善黨和群眾的關係，倒不如說是直接促進經濟的增長。揭示烏蘭夫對整風的態度的最後一個例子是在反擊右派的鬥爭開始以後，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講話時沒有提到矛盾或者整風。[140]

還有一個政治局候補委員張聞天，他對整風的態度，看來尚無明確的證據加以說明。但是，在 30 年代，他是毛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他被降級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大躍進開始以後，他又成為黨主席最尖銳的批評者之一。因此，作出這樣的假定是合乎情理的：他在任何問題上都不可能是毛的熱情支持者，他在整風期間的沉默，大概就是一種不贊同的態度。

在所有這些顯然不太完全的證據的基礎上，我們試著把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們對整風運動的態度列表如下：

贊成，或者大概贊成的	含糊，但忠於毛的	反對，或者大概反對的	不能確定其態度的
委員			
毛澤東 周恩來 陳雲 鄧小平 （林彪—病？）* （陳毅—病？）* 李富春 賀龍	董必武 李先念	劉少奇 朱德 林伯渠 彭真 彭德懷	（羅榮桓—病？）* （劉伯承—病？）*
候補委員			
陳伯達 康生		烏蘭夫 張聞天 陸定一 薄一波	

* 可能未參與政治局關於整風的辯論。

這種排列，如果說大致還準確的話，毛地位的不穩固就一目瞭然了。在整風問題上，政治局委員中支持他的有 9 人，但其中堅決支持他並積極參與辯論的只有 5 人；而他的反對者也能湊夠 5 人。如果政治局要進行表決，候補委員大概不能參加，但他們的意見顯然會起作用。[141] 這樣，把候補委員計算在內，站在毛一邊贊成整風的 12 人，9 人反對，還有兩個人不確定。在這種情況下，只要董必武、李先念這類人有所動搖，毛的微弱多數的地位將不復存在。因此，對於繼續整風是否明智，毛可能產生的懷疑都會由於意識到自己缺乏充分的支持者而增加。在 1955 年夏秋，毛曾經不顧同事們的反對獨自推行合作化，現在，形勢正好倒轉過來了。當時，由於在執行中獲得了成功，他的大膽創舉很快就被大家接受；而現在，就像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一樣。當時，他曾得到黨的省一級領導人的支持；而現在，他們當中許多人支持他的反對者。據說，一個黨內的「右傾分子」曾經講過:「毛主席承受巨大的壓力。在這場內部危機中，電報雪片般地〔從黨內『鳴放』的反對者那裏〕飛來，所有的電報都要求〔對整風〕加以限制。」[142] 無疑，一部分電報出自省一級領導人之手，他們擔心批評的迸發會使自己的下屬官員們威信掃地。有證據表明：至少有 9 個省的第一書記

反對毛（參見附錄八）。這 9 個省擁有 2.5 億人口，佔全國人口總數的 40% 以上。在這些省份中形成的反對派，業已成為毛在政治局裏的反對者的後盾。在這樣的背景下，難怪當大學裏的形勢從 5 月末、6 月初開始失去控制的時候，毛不得不放棄整風運動。

附錄七：1957 年 2 月 27 日劉少奇在哪裏？

劉是否沒有出席毛發表論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的最高國務會議？還是說他授意報紙發表一張恰好是在他離開會場期間拍攝的照片？自 2 月 14 日以後，劉的確沒有在北京露面，很可能在那以後，劉便開始了長達 2400 英里的外省視察。即使如此，劉只在 3 月才到了河南省，只要有必要，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在 2 月 27 日從那裏返回北京[1]，而且，如果他的確開始了視察，就必須知道他為什麼在知道毛已經決定做這次重要報告情況下還要離京。

更有可能的是，劉的確出席了這次會議，但阻止了反映這一情況的照片的發表。跡象之一是彭真坐在毛的右邊，這個位置本應是劉的。這類場合的慣例是在 1956 年 2 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定的：國家主席的一側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及其副手們依次就座，另一側則由總理及若干副手同樣按照順序就座。當時，彭真在副委員長裏僅排第八位，應當坐在離開毛幾個座位的地方。在 1956 年 2 月，他甚至沒有能在前排就座（見 1956 年 2 月 26 日《人民日報》刊登的照片）。很可能是劉暫時離開會場，而要彭（以他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的身份）代替他坐在那裏。要是劉根本沒有到會的話，宋慶齡夫人肯定會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首席的副委員長在毛的右側就座。

這一假設，即當拍那幅照片時劉只是離開了會場，隨後有了一些證據。這是由一位據說消息很靈通[2]的學生領袖林希翎提供的。1957 年 5 月 23 日，她寫道：

> 據說當毛主席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時，有 80% 的高級幹部不贊同，一些人甚至起身離開會場。[3]（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林小姐的評論引來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後果。就在林小姐聲稱高級幹部離開會場的北大校園裏，北京大學校長立即採取否認態度。不過即使是校長馬寅初教授（他出席了最高國務會議）也沒有被輕易放過。貼出的一張大字報上向他質問下列問題：「1. 馬先生是否坐在後排？2. 馬

先生是否在全力觀察有沒有人離開會場？」大字報還為馬寅初提供了答案：「1. 馬先生肯定沒有坐在後排，而且他也必定沒有時不時地回頭看。2. 馬先生肯定不能分清那些走出會場的人，究竟是離開會場，還是去上廁所。」[4]

馬寅初教授也許是在被迫否認黨內不一致的跡象。不然，也有可能那些離開會場的幹部沒有坐在主席台上（在那裏馬寅初是可以看見他們離開的），他們是那些在會堂後排就座的職務較低者。更有可能的是，劉少奇（也許還有其他人）確實暫時離開了會場，並在那張照片拍過之後回到會場，於是給在場的非黨人士以恰好上廁所的印象。

另一個有意義的跡像是，這張最高國務會議的照片是從一個非典型性的低角度拍照的，因此前排之後人物的面孔都十分模糊。[5]這樣做的目的，有可能是為了防止讀者知道這次會議有大量的重要缺席者，從而注意到黨內有廣泛的不一致；但更可能是由反對毛的人所謀劃，以象徵性地顯示出只有主席台前排的人（如上所說，除了彭真）是真正支持毛的講話的。即便如此，前排的人物裏除了劉少奇，還有一些政治局的重要成員缺席。[6]他們是朱德、林彪、林伯渠、羅榮桓和彭德懷。其中，林彪肯定是由於健康原因缺席的，[7]不過，這還是意味著仍有 5 位政治局委員（包括劉）沒有明顯的原因而缺席。[8]

同樣明顯的是，《人民日報》像它在 1956 年 1 月曾經做過的那樣，在這幅最高國務會議的照片後列出與會者的名字。綜上所述，要是劉露了面並且希望以反對者的姿態出現，那麼一旦他的名字被列入出席者名單中，他的計劃就失敗了。這對於其他「象徵性的」缺席者也是一樣的。

附錄八：各省負責人對整風的態度

各省負責人對整風的態度，可以通過對他們參加與整風相關的活動的報道看出來，是否進行報道是由他們自己選擇的。整風指示規定，第一書記要掛帥，並成立領導小組指導這場運動。想必所有的省級領導人都服從了這個指示。不這樣做就等於無組織無紀律而會受到嚴厲處罰；只有一個省的第一書記在整風運動中被撤職，這似乎也不是因為違背了上述指示。[1]

然而，各省負責人可以執行指示，但是仍然表現出牴觸情緒。指示公佈不久，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組報道，公佈各省整風的組織計劃。這些報道肯定是以省政府負責新聞發佈的幹部向記者提供的情況為依據的。這些幹部可以公開強調，他們的第一書記在執行這個指示，並且讓記者報道，他們的上司領導了專門成立的小組來指導這次運動，以此響應中央的指示。但是，在 25 個省級單位的報告裏（見本書第 255 頁的表格），[2] 只有 11 份報告[3] 毫無疑問地說第一書記發出過指示。在這 11 份報告裏，有 10 份提到領導小組已經成立。[4] 另外 3 份報道[5] 很有可能是要表明第一書記試圖公開表示贊成整風，而還有兩份[6] 這樣的可能性稍小些。這樣還剩下 9 個[7] 省級領導人沒有使其名字在這次報道中露面。其中，有 6 個[8] 沒有提到其專門領導小組，5 個沒有將其領導人的體力勞動寫入這次報道。[9] 鑒於指示關於整頓領導的指令和 11 個新聞報道按部就班地表示服從這個指令，因此不難斷定，未見諸報端的這 9 個領導者是故意用這種方式來表示不贊成。

不贊同的省份包括全國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如果 2 月 27 日最高國務會議上朱德的缺席表明了他對毛的想法的態度，那末他很有可能利用這年早春逗留家鄉四川的機會去爭取第一書記李井泉。劉少奇三四月間訪問過的 5 個省中，有兩個[10] 屬於上述 9 個省份之列（第三個省份[11] 是屬於有疑問的）。彭真的北京也屬於此列，還有彭的家鄉

省級領導人對整風運動的反應

省別〔1〕	第一書〔2〕	記領導成立〔3〕	小組三害順序〔4〕	出處〔5〕	第一書記參加體力勞動〔6〕	出處
安徽	是	（是）〔7〕	官僚主義 主觀主義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37 號 第 10 頁		
浙江	——	——〔8〕	——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7 號 第 26 頁		
福建	是？〔9〕	？〔9〕	正確的 （順序）	《人民日報》5 月 8 日、11 日		
黑龍江	是	是	——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7 號 第 24～25 頁	是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
河南	——	是	——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7 號 第 25 頁	是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
河北	是	是	——	5 月 3 日《人民日報》	是	5 月 5 日《人民日報》
湖南	？〔10〕	？〔10〕	正確的	5 月 8 日《人民日報》		
湖北	是	是	——	5 月 9 日《人民日報》	是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
內蒙古	——〔11〕	——	正確的	5 月 20 日《人民日報》		
甘肅	——〔12〕	——〔12〕	——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37 號 第 11 頁	是	5 月 7 日《人民日報》
江西	？〔13〕	是〔13〕	官僚主義	5 月 4 日《人民日報》		
江蘇	？〔14〕	是〔15〕	正確的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7 號 第 16～17 頁		
吉林	是	是	——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7 號 第 27 頁	是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
廣西〔16〕						
廣東	——	——	正確的	5 月 3 日《人民日報》		
貴州	是〔17〕	——〔17〕	正確的	5 月 9 日《人民日報》	是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
遼寧	是	是	官僚主義 教條主義 宗派主義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7 號 第 22～23 頁		
山西	——	——〔8〕	——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7 號 第 20～21 頁	是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
山東	是	是	正確的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7 號 第 14～16 頁		
陝西	是	是	正確的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7 號 第 14～16 頁		
新疆	是	是	正確的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7 號 第 14～16 頁	是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
四川	——	——	正確的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7 號 第 26～27 頁		
青海	是	是	——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7 號 第 20 頁	是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
雲南	是？〔18〕	？〔18〕	官僚主義 主觀主義 宗派主義 官僚主義 宗派主義 〔19〕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	是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
北京	——〔20〕	是〔20〕	正確的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7 號 第 21～22 頁 《人民日報》5 月 10 日	是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
上海	是〔21〕	？	官僚主義	5 月 11 日、6 日《人民日報》		
天津〔22〕					是	5 月 5 日《人民日報》

山西省。總共加起來，「遺漏」下的 9 省負責人，領導著約 2.5 億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 40% 以上。

列表註釋：

〔1〕 寧夏回族自治區尚未成立。鑒於毛在關於矛盾的演說中說西藏當時還不能進行民主改革，故未包括在內。

〔2〕 「是」表示報告明確說明第一書記領導整風。「——」表示沒有提及第一書記領導。必要的細節做了腳注。

〔3〕 「是」表示報告明確說明成立了專門小組領導整風運動。「——」表示沒有提及成立這樣的小組。第二和第三欄中的「是」，表示可以認為報告提及第一書記負責領導該小組。

〔4〕 整風運動旨在反對的「三害」的正確順序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正確的」表示報告以正確的順序提到這三者；「——」表示沒有提到它們。在以不正確的順序或不完全地提到它們的地方；我用縮寫 B 代表官僚主義，Se 代表宗派主義，Su 代表主觀主義。有一處用 D 代表教條主義。

〔5〕 在可能的情況下，我盡量採用新華社報道而不是《人民日報》，雖然二者都經過了核對。因為《人民日報》有時滿足於對若干省運動發展的綜述，沒有提供個別省份的具體細節。在全部採用《人民日報》的報道又無腳注加以說明的地方：這意味著《人民日報》報道充分，提到了第一書記和領導小組。（當然，如果省裏的官員希望公佈他們的活動的話。）至於新華社的報道，我僅採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轉載了的。

〔6〕 「是」表示某個第一書記參加體力勞動的具體報道。關於這個方面通常都是專題報道，而非一般地談論整風的大塊文章中的一部分。因此在沒有發現報道的地方就僅僅留了空白，而不是「——」。

〔7〕 沒有成立專門小組，由省委常委領導運動。

〔8〕 浙江和山西包括在 5 月 4 日《人民日報》的綜合報道中。該報道談到，8 個省開始了整風運動。它還報道了哪 6 個省成立了領導小組，浙江和山西不在其中，這證實了新華社從這兩個省發來的報道，該報道沒有提及它們成立領導小組的事。

〔9〕 5 月 8 日的報道是關於若干省份的摘要報道的一部分，沒有提到福建第一書記或許不是結論性的。（報道中也談到了黑龍江但未提到第一書記，但在某些時候新華社的報道中提到他領導了整風。）對福建省，我以「是？」來表示，在新華社的報道中也可能同樣地提到了第一書記。我的依據是，在 3 月 11 日《人民日報》的報道中，據稱該第一書記在一次省的黨代會上認真地做過整風報告。也可參見 5 月 16 日《人民日報》。我僅在「已成立小組」一欄中以「?」標出，因為在 5 月 11 日報告中沒有提到這樣的小組，但也沒有理由要在該報告中提到它。

〔10〕 一個「?」表示湖南，因為我所能找到的關於該省的報道是 5 月 8 日《人民日報》的摘要。

〔11〕 內蒙古黨的會議於 5 月 18 日召開。它向中央報告整風計劃的兩個星期的期限——整風指示規定的期限——早已超過，但是這個委員會或許是由於 4 月底開始的自治區成立 10 週年紀念活動的壓力而得到了特別的照顧。

〔12〕 在新華社的有關報道中沒有提到第一書記或小組。可是 5 月 25 日《人民日報》的報道中，已經指名提到從 4 月中旬以來第一書記主持了各種會議並要求展開批評。是不是第一書記又有了另外一些想法，使自己的名字不出現在全國性的報刊上？

〔13〕 在早些時候《人民日報》另一摘要報道中，談到了江西，所以，沒有提到該省的第一書記也許不能以此下結論。（山東包括在摘要中，也沒有提到第一書記。

但是新華社的電訊報道了他的領導。）可是，這個摘要並沒有具體說明，文中談到的 8 個省——其中包括江西省——究竟哪個省成立了領導小組。

〔14〕 據悉，江蘇省第一書記江渭清在夏天的晚些時候生了病，參見「聯合研究所」（香港）名人錄中他的條目第 1 卷第 138 頁。這次生病可以說明在發動整風時為什麼沒有提到他的名字，也沒有提到他參加體力勞動。的確，6 月 1 日《新華日報》社論暗示，當時江蘇省黨組織肯定在整風運動中落後了。見上文第 218 ～ 219 頁。

〔15〕 按照譯文，江蘇決心組織幾個領導小組，而不只是一個。

〔16〕 我未能找到關於廣西整風運動的任何報道，也許該省正忙於建立廣西壯族自治區。更可能的是，當北京制訂出關於廣西饑荒問題的最後決定時，省裏的官僚機構已經癱瘓。由於饑荒，當地黨的第一書記和其他兩個省委書記被解職。（關於此事的一些報道，出自 1957 年 6 月 18 日的《人民日報》，轉載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62 號第 13 ～ 20 頁。）

〔17〕 《人民日報》就貴州省如何進行整風采訪了該省第一書記周林。我由此推斷周林對在全國公佈他對貴州運動的領導是很關心的。周沒有說到任何有關成立小組的事。

〔18〕 我沒有發現雲南省的黨組織關於進行整風運動的深思熟慮的報道。可這裏有《人民日報》關於第一書記謝富治在一次省政治協商會議上就這個問題的講話的報道，所以我再次有把握地推斷：謝富治用這種方式表明他願意投身到整風運動中去。

〔19〕 在省政治協商會議的講話中，謝富治兩次提到「三害」，一次（順序）不正確，另一次內容減少。

〔20〕 報道上沒有提到彭真在 5 月 3 日、4 日北京市委常委第一次會議上發言，甚至沒有提他出席。這次會上成立領導小組，報道說這個小組將由書記處書記彭真領導。彭真的確 5 月 5 日向北京市委黨委擴大會議作了報告，但沒有提到他要領導這次運動。看來彭真試圖兩方面都兼顧到：作為全國最強有力的省級領導人，他不能在整風運動中迴避向全市黨員（市委）發表演講而破壞黨的紀律；同時，他通過公佈他沒參加（領導）小組的事實提出他對整風的不同意見。

〔21〕 我未能找到有關上海市委對整風采取具體措施的任何報道。然而，《人民日報》刊登了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在市委常委擴大會上兩次報告的報道。與北京的情況不同，這裏沒有提到成立沒有第一書記掛帥的領導小組的事。因此，我認為柯急於表明他對整風運動的支持。跡象無疑表明，上海比北京對整風運動更熱心。

〔22〕 我未能找到任何有關天津開始整風運動的報道，只有該市第一書記參加體力勞動的報道。

第四篇

反右運動

第十七章 關於矛盾問題講話的公開發表

《事情正在起變化》

在5月11日到20日之間，大概更靠近這段時間的後期，毛澤東談了對大鳴大放的看法。講話的題目叫做《事情正在起變化》，表明他內心及外部世界所發生的變化。[1] 表明他開始更多地擔心修正主義：

> 幾個月以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教條主義應當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條主義，許多錯事不能改正。現在應當開始注意批判修正主義。[2]

在這裏，毛澤東重申了1956年12月底《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所制定的路線。文中說，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一樣都應當受到反對。[3] 在12月文件裏，教條主義仍然被看作主要危險。到5月中，毛澤東似乎快要改變他對這兩種傾向危險性的主次關係的看法，他準備提出黨內的修正主義者比教條主義者有更大的危險是因為修正主義者是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和自由主義的產物，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聯繫密切。但是，顯然他還不大願意說修正主義本身比教條主義更危險。這一方面是由於他認為，——這多少有點矛盾——左傾給革命帶來的損失並不比右傾的小；另一方面他覺得，在黨內，修正主義只是個別現象。[4] 顯然，毛澤東這時的思想正處於不斷變化的階段，但他仍然沒有下決心向修正主義發動全面進攻，因為在1957年夏季的形勢下，這樣做勢必使黨的批評家也受到攻擊。事實上，在這個階段，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仍然寄予希望。毛承認，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留戀舊社會，需要花很長的時間進行再教育，但是，發展經濟需要他們的幫助。所以黨「必須進一步改善同他們的關係」。[5]

在毛澤東與他的同事們交換了這些想法以後，最多不過5天，毛澤東覺得有必要告誡青年人：所有背離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都是「完全錯誤的」。另一個較為含蓄的警告是在同一天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召開的座談會上發出的。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在座談會上說，有一種說法說共產黨不會駁斥錯誤的批評，那是不對的，接著他代表黨駁斥了一種錯誤觀點。他說，在非黨人士高級座談會上有人反覆提出非黨幹部沒有行使他們與其職務相應的權力，究其原因，是由於他們不勝任。[6] 似乎若不是得到周恩來的認可，處於盧郁文這種地位的人是不會作出如此直率的表示的。中國總理對他的辯護應該感到高興，這使他不用親自去指責他的那些非黨官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盧郁文的講話實質上是總理對非黨人士的一個警告，即他們很可能會遭到反擊。如果真是這樣，那總理的這一著棋的結局是令人不快的。因為盧郁文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說他是個馬屁精，如不悔改，將不會「有好下場」。6月6日，盧郁文在一次國務院座談會上公開了這封信。[7] 6月8日，《人民日報》便以此為緣由，發表了第一篇反擊黨的批評者的社論。

批評標準的演變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文中說盧郁文收到恐嚇信，這是一起重大事件，因為它標誌著某些人想利用整風運動來搞階級鬥爭。文章接著寫道：「這封信告訴我們：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如此。」這些話是不祥的兆頭，同一天，大膽鼓勵批評者們暢所欲言而自己又直言不諱的《光明日報》[8] 總編輯儲安平提出辭職。[9]

儲安平認為，儘管《人民日報》的文章已預示著情勢緊迫，但有跡象表明，黨的領導人在反擊的範圍問題上，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另一名政治嗅覺靈敏的高級記者浦熙修女士，6月8日打電話給宣傳部

長陸定一詢問，《人民日報》當天的社論是不是意味著大鳴大放要結束了。陸定一說不是這樣。[10]看起來，陸定一應該不是在說謊，因為他滿可以像周恩來在兩天前那樣，拒絕評論。再說，在這個時候他沒有理由去引導浦熙修女士和她的《文匯報》犯錯誤，因為《文匯報》已經犯了很多錯誤，他不需要再讓他們隨意行事，以便事後算賬。[11]而陸定一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消息的來源也不應該會有錯，因此，結論就是政治局還沒有最後形成決議。

從6月8日至6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系列社論，進一步證實，到6月8日為止，政治局還沒有確定反右鬥爭的方向，關鍵的問題是批評標準的確定和給被批評者定什麼樣的罪名。而制定這些政策需要時間。

6月8日的社論採用了「右派分子」這個詞（它出自非共產黨的婦女領導人何香凝之口）。[12]社論贊同她的看法，認為這些人錯誤地利用整風運動開歷史的倒車、企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事業。第二天的社論題為《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很清楚，其目的在於防止整風運動完全停止。社論為確立正確的批評標準作了初次嘗試。它說，那些「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破壞人民民主專政，破壞黨和人民團結」的人，違背了人民和整風運動的利益。前兩點與10天後公開發表的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六條標準的第二條和第三條是一致的。但是在後者中的範圍更廣，含義也因此更嚴峻，第三點——黨和人民的團結，不和六條標準中的任何一點雷同，但它可以被看作是第一和第五條標準演變的基礎。第一條標準是要團結各族人民，第五條是要擁護共產黨的領導。

6月1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13]對批評的標準問題有了進一步的闡述。社論提到了一些企圖「使人民離開社會主義的方向，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削弱黨的領導」的錯誤觀點[14]，再一次地預示了毛澤東的第二和第三條標準，但這一次的標準比前一天提

到的涉及面更大。很清楚，可以被合理地指責為「削弱」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批評言論，要比實際上「破壞」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批評言論多得多。社論還預示了毛澤東的第五條標準——黨的領導，提法上比前一天更確切。同時還介紹了第四條標準——民主集中制，但在這裏將它與第三條標準裹在一起，不像在之後公開發表的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把它單列起來。6月10日的社論還在為那些犯了錯誤的黨的批評家們尋找一個合適的名稱上前進了一大步。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毛澤東曾使用過「右翼知識分子」[15]這一提法，6月8日的社論則用了何香凝女士的「右派分子」提法。6月10日的社論批判了某些「資產階級分子」，要求給被沒收財產的工商業者延長支付定息的期限。這是後兩種提法的合二而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通常被簡略成「資產階級右派」，後來在毛澤東的講話公開發表後在6月22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不平常的春天》一文中，這一名稱被固定下來。

6月11日的社論標誌著這六條標準的進一步發展。社論的題目為《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暗示人們尤其要強調社會主義道路。社論稱，廣大人民群眾「擁護社會主義，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這些提法完全符合毛澤東的第二、第三和第五條標準。但由於使用了「擁護」這一詞（大概就是毛澤東在講話中所用的「有利於」的先行詞），就又一次擴大了標準的範圍。對這六條標準僅僅不反對還是不夠的，而必需有一種積極態度對待它。6月11日的社論對什麼是毛澤東第一條標準最關心的一點再次作了暗示：

> 要不要社會主義？要不要人民民主專政？要不要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我們的國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問題。中國人民的大團結就是建立在對這樣的問題的共同認識上面。（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6月12日的第五篇反擊社論以《正確地對待善意的批評》為標題，譴責「右派分子」利用批評運動「削弱社會主義事業，削弱人民民主

專政，削弱黨的領導」，又一次喻示了批評標準的第二、第三和第五條。兩天以後，在毛澤東的講話公開發表前夕，《人民日報》的最後一篇反右社論第一次明確地表示，批評要有標準，而且選出了一條最重要的標準：

> 在「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中，團結要有一個標準，批評也要有一個標準。根本的標準就是社會主義。不從社會主義的立場進行批評，也就不會達到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團結。[16]

簡而言之，這就是從6月8日反右鬥爭開始到6月18日毛澤東的講話公開發表這10天裏批評標準逐步形成的全過程：

6月8日　沒有提到標準。

6月9日　預示了第二、三條標準，暗示了第一、五條標準，使用了「破壞」這個詞。

6月10日　預示了第二、三、四、五條標準，使用了「削弱」一詞。

6月11日　預示了標準的第二、第三和第五條，暗示了標準的第一條，暗示了標準第二條（社會主義）的特別重要性，使用了「擁護」一詞。

6月12日　預示了標準的第二、第三和第五條。

6月14日　第一次使用「標準」一詞，確定堅持社會主義是進行批評的基礎。

6月18日，由新華通訊社公開發表的毛的講話稿中，確定的批評標準如下：

> 我們以為，根據我國的憲法的原則，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我國各黨派歷次宣佈的共同的政治主張，這種標準可以大致規定如下：（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

> 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17]

這最終定下來的標準比原先提出的任何標準都要全面得多。它們包括一個新的正面的提法（「有利於」）和兩個程度不同的反面提法（「破壞」和「削弱」）。其次，一個迄今從未暗示過的新的標準作為第六條標準。第三，現在單獨列為特別重要的標準有兩個，而 4 天以前只有一個。再者，這兩條特別重要的標準分別列為第二條和第五條，而不是第一條和第二條，這也許是由於決定公開發表毛澤東的講話時過分倉促而造成的。還有一點能說明六條標準的形成過程：毛澤東在第二條標準中使用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一詞，而 6 月 9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用的是「社會主義事業」，6 月 14 日《人民日報》社論用的是「社會主義方向」。另一個類似情況是，第四條標準曾在 6 月 10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出現過，後來不提了，這次在毛澤東的講話中又出現了。

這些情況表明在 6 月 14 日的社論發表以前，還沒有人擬定過一套正式的標準，也沒有人從中確定最重要的標準，這證實了毛澤東在發表這篇講話時，裏面沒有這六條標準。更重要的是，這些情況表明，公佈毛的講話的決定——這才導致需要系統地制定標準——是在 6 月 14 日社論發表之後才作出的。可是，是什麼原因導致作出這樣的決定呢？

關於公開發表矛盾問題講話的決定

可以想像，政治局可能在 6 月 14 日至 18 日之間作出決定，把經過修改的講話稿記錄在案，將毛澤東在《人民日報》後來稱之為「不平常的春天」之後的關於矛盾的思考狀態通報給幹部和批評者們。政治局認為這樣做是有好處的。幾乎可以肯定，這一點在政治局討論發

表這些條文是否適宜時必然成為理由之一。但是毛肯定會反對這種理由。把塞進了這六條標準的講話公開發表必然會引起人們懷疑他不講信用，也會損害他同非黨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的關係。事實上，毛澤東在他為《人民日報》寫的七一社論中，不得不設法做出解釋，來消除人們對他的這種疑慮。（參見原書 279 頁）

看來，更可能的是毛澤東這樣做是被迫的——劉少奇和彭真應該會暗暗感到高興——因為《紐約時報》在 6 月 13 日報道了有大量引語的毛澤東的講話摘要。[18] 這一則長篇報道甚至包括了毛之後公開發表的文本中被刪節了的段落，[19] 這上則消息傳到北京已為時太晚，已不可能對 6 月 14 日的社論作任何改動。但是，《紐約時報》的特約稿還是引起了中國領導層的重新思考。從 6 月 8 日到 6 月 14 日，除了其中的一天以外，《人民日報》每天都發表一篇反擊社論。但是從 6 月 15 日到 6 月 19 日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公開發表，便再沒有出現關於這個問題的社論。[20]

當中國的領導人在理解和討論《紐約時報》的報道時，有一點他們的意見大概是一致的，即最差的結果是這篇報道被外界看作是真實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經驗告訴他們，只要不公佈正式的文本，任何官方的否認都無法使被洩露的文本成為不可信的東西。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發表原始講話的正式修訂本，刪去一些在華沙洩露給《紐約時報》的文本中的不那麼令人愉快的內容，加進毛澤東在 2 月份時認為不那麼重要的有關政治行為的準則，還有一個不大的，但需要考慮的問題，便是面子問題。毛主席大概不願意讓他的一次重要講話僅由一位「資產階級」的美國記者公佈於世。他的講話由一個波蘭的消息源洩露出去這一事實，可能是毛澤東對波蘭共產黨冷淡的原因之一，甚至是主要原因。他無疑地把洩露講話這件事看作是對兄弟友好關係的破壞，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波蘭安全部門的無能。

關於矛盾問題講話的正式文本

與華沙的文本以及與羅伯特等人的報道作比較，可以看出 6 月 18 日新華社發佈的、第二天由《人民日報》刊登的講話文本，刪去了一些極為坦率的東西。2 月份，據報道，毛透露了在鎮反運動中被處決的人數，按照華沙版本是 80 萬人；按照羅伯特 * 羅的報道是「不超過 70 萬人」；[21] 按照一位學生領導人林希翎的說法是「77 萬人」；[22] 而另一位學生說是「70 多萬人」。[23] 毛披露這個情況的目的可能是為了表明他的真誠態度，同時如羅所說的，為了讓那些非黨知識分子不要再去相信他們聽到的西方的估計（西方估計為 2000 萬人）[24]，在 2 月份的講話中，毛澤東同樣十分坦率地談了中共在西藏所犯的錯誤，並說那裏的改革不得不推遲幾年。[25]

然而，上述刪除的部分遠不如增加的部分那樣使鳴放者感到興趣和關切。加進的部分中主要的是關於批評的六條標準。這些標準改變了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鼓勵批評者的作法。如果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始講話中就有這六條標準的話，那就會阻礙任何真正的鳴放。[26]

加進這六條標準是為了採取緊急行動的需要，另一些增加和改動的部分則反映了經過大鳴大放後毛的觀念的變化。這些變化使得講話的各不同部分所強調的內容形成鮮明的對照。例如，毛澤東一方面斷言「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27] 可接著他又這樣說：

>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地解決。[28]（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的最後勝負問題的看法是不確定的。這既不符合他前一年的講法，特別是不符合由周恩來闡述過的那些講話，甚至也不符合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的發表稿中所作的判斷，即國家從未像今天這樣統一，[29] 大多數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30]

表明這段話是後來加上的另一個事實是，這段中的第一句是對 6 月 8 日社論中相似的一段話的闡述。那一段認為：盧郁文收到的恐嚇信「告訴」我們，儘管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但階級鬥爭沒有熄滅。如果毛澤東早在 2 月份就這麼說，那麼很明顯，這封信就不會告訴人們任何新的東西。

再一個相關的變化就是把修正主義看得「比教條主義更危險」。[31] 這個看法在 12 月底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還沒有，在那裏，這兩個危險是並列著的。因此，毛不可能在 2 月份以前改變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甚至在 5 月份，他僅僅只是準備提出修正主義者比教條主義者更危險，而不是教條主義本身。此外，如果他在 2 月份就認為修正主義比教條主義更危險的話，那麼在 1957 年[32] 3、4 月間，毛澤東對波蘭總理西倫凱維茲的態度就不大可能比對更為保守的（即教條主義者）捷克總理西羅基更親熱，也不會對波蘭總理作出思想上的讓步。直到 1957 年夏季，當毛澤東取消了訪問華沙的計劃時，他對這兩者的相對危險性的看法才有了明顯的改變。[33]

儘管毛的講話在語氣和內容上的變化使中國的資產階級感到驚慌，[34] 但是，無論把它看成是共產主義國家「對斯大林主義最徹底的背棄」，[35] 還是把它看成一個「人民同意的極權主義社會的願景」，[36] 他的這篇講話仍然是一篇給人以新的希望的文獻。這篇講話仍然強調說服，而不是壓服；[37] 仍然提倡對罷工要持克制態度；[38] 仍然答應給那些在鎮反中被整錯了的人恢復名譽；[39] 仍然譴責官僚主義。[40] 講話重申了百花齊放以及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

政策。[41] 毛澤東對國內形勢的看法也許已經改變，但他還是願意把他的這些觀點公開表達，記錄在案。

第十八章 毛被與右派聯繫到了一起

彭真的復仇

毛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在國外受到了報界的好評，但是它的發表在國內代表著主席的讓步。這時，幾千，甚至幾百萬[1]的中國人都知道了毛是被迫讓步，徹底糾正他在不到4個月之前充滿自信的主張。對黨的批評者的猛烈反擊，對於在3月份曾主張「放」的這位領導者來說是一次失敗。他被迫承認劉少奇和彭真的懷疑得到了證實。

如果說劉和彭沒有因為毛的失利而高興，那他們就不是正常人了。彭真在6月7日召集了一次北京黨的高級幹部會議，想必是對第二天的反擊作出全面安排；彭告訴與會者，沒有一個人會是絕對或永遠正確的。

> 斯大林自己認為他永遠絕對正確，結果他在二十大上被譴責並被擊得粉碎，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他的畫像被摘下來，甚至被撕碎。由此可見，所有的人都會犯錯誤；區別只是，錯誤的程度和性質不同而已。[2]

彭還利用毛地位被削弱這一機會反覆強調：黨的主席不能凌駕於黨之上或把自己擺在黨的對立面。「我黨的幹部都是黨的工具，問題在於像毛澤東同志這樣的工具怎樣才能運用的<u>更好</u>。」[3]（重點為作者所加）

局勢的發展證明了彭真正確之後，他似乎積極地參與到了反擊的準備工作中去。在6月8日社論即將發表之前，據說他與當時任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和任《人民日報》主編的鄧拓頻繁電話聯繫，顯然他二人將在反右運動的舞台上扮演主角。[4]

但是彭真並不滿足於僅僅看到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方針被放棄。事實表明，他還組織對毛在前幾個月中提出的建議進行了反駁。反駁的方式是指責那些接受了建議的「資產階級右派」。引人注目的是，第一個作這種重要指責的是北京市一個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晗。儘管吳晗不是中共黨員——他是民盟北京支部的主席——他似乎與共產黨的同事們，如彭真和北京黨委第二書記劉仁，[5] 都有著密切的聯繫。8 年之後，當毛在文革初期想摧毀北京黨委的組織時，對吳晗的突然襲擊預示著即將到來的大清洗。[6] 確實，在 1957 年夏季，在沒有得到高層人物的支持和保證下，吳晗肯定不會有膽量對毛進行哪怕是間接的批評。[7]

吳晗的批評是針對成立一個有關肅反的調查委員會的建議。非常明顯，他的目標是毛。毛在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中建議成立這個委員會，並允許這個建議公諸於眾：

> 建議在今年或明年，對於鎮反工作進行全面的檢查，以利於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不健康傾向。從全國來講，這個工作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來抓。地方上由省市人大和政協來抓。[8]

吳晗以反駁羅隆基為手段來抨擊這個建議，羅曾在 5 月 22 日對非黨上層人士的講話中接受了毛的建議。羅主要關注的實際上不在於對過去失誤的糾正；在毛的建議之後，他對此自然深信不疑。他更關心的是利用這個委員會來消除那些仍對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持懷疑態度的人們的疑慮。《人民日報》的評論說：

> 他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方案，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共產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方面的人士。[9]

羅認為這個委員會具有三個優點：它的存在會鼓勵人們去表達自己的看法；它會給錯判的人平反（進一步鼓勵人們講話）；它會制止那些可能想對批評者進行打擊的具有報復心理的幹部。[10]

6 月 10 日，也就是反擊開始兩天後，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專門採訪中，吳晗較完全地回憶了羅的建議，並告訴記者：

> 這個意見牽涉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他對黨領導的「三反」、「五反」、「肅反」等機構是不信任的。一個是他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一個最高權力的立法機關，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這樣一個協商機關，下降或者改變為司法行政機關，這和這兩個機關的性質是不符合的。[11]

吳晗的第二個反對理由充其量只是一個憲法上的吹毛求疵——只是一個討論的觀點，而不是一種嚴肅的批評。很清楚的是，由人大和政協組成一個委員會並不會改變這些組織本身的性質。也許吳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讓自己的評論聽起來更體面一些，不然這些話就只是對毛不信任黨內同志的做法的不加修飾的批評。

6 月 19 日，吳晗在《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中又回到了這個問題上。可能是由於他的文章是與毛的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在同一天的同一張報紙上出現，而這個講話中正包括了最初的建議，吳晗感到有必要對他批評的理由稍加改變。這次他只是批評羅隆基要「在黨和政府組織之外建立一個平反委員會」[12]的想法。這個批評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幾天後周恩來在人大提出的批評。

在周恩來講話的前一天，6 月 25 日，羅隆基試圖在民盟的一次整風會上把自己講的話加以澄清。

> 羅隆基對他曾提出的「平反委員會」的問題，作了一番術語上的辯解。他說：『我沒有用過「平反委員會」這個名詞。我說的是由人大常委會、政協、各民主黨派共同組織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有三個作用，其中有平反作用，領導黨也要參

加。』他又說，這話是錯誤的，他不否認。據他說，他所以說這樣的話，是因為對毛主席的指示體會不深刻。[13]

《人民日報》通過印發羅的解釋，再次讓人們注意羅和毛的提議的相同之處。為了使人們不致於忽視這一點，該報後來長篇披露羅在森林工業部的活動。據說在此期間，他的助手趙文璧曾：

反覆指出，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建議，是在毛主席最高國務會議講話的基礎上引申出來的，與毛主席的講話沒有什麼矛盾之處。[14]

《人民日報》也明確告訴讀者關於對這個建議應採取的正確態度是什麼。在 7 月 15 日刊登的右派葉篤義在人大悔過的講話中，他說：

自從他（羅隆基）提出成立所謂平反委員會的反動主張後，他遭到一切愛國人士的憤怒指責，但卻獲得少數國內反動分子和右派的喝彩。

面對羅隆基所謂的「平反委員會」的建議遭到反覆攻擊和羅與毛的建議之間這種顯而易見的聯繫，連周恩來這樣幹練的政治家也只能為他的首長做最軟弱無力的辯護。在 6 月 26 日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周說：「他們（指右派）企圖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外，另外成立某種其他國家權力機關，例如所謂『政治設計院』和『平反委員會』……」[15] 嚴格說來，周的話是正確的，但是他沒有正視這樣一個尷尬的事實，即如果毛的建議被實施的話，人大和政協常委會的某種形式的聯合委員會，就必須在人大之外建立起來。在這年後期，毛不得不暗示支持批判羅隆基的提議，或許是由於他自己和劉少奇所作的妥協。因此毛自己的建議看來沒有在中央實施是毫不足怪的。[16]

毛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

在報刊文章中，在記者採訪中，在民主黨派的座談中以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發言中，都對羅隆基發起進攻。大會的召開對劉少奇

和彭真來說是一次方便的機會。作為大會委員長和秘書長，他們可以組織和監督反右運動在全國的開展，[17]並有權得到最大限度的宣傳。

1957年的人大會議原訂6月3日召開，[18]但5月25日決定將其延期到6月20日[19]。大概是擔心學生會利用人大的機會鬧事，因此決定將會議推遲到能使學生平息的時候。6月19日，即毛的矛盾問題講話在《人民日報》刊登的那一天，人大常委會開會決定將會議推遲到6月26日，會前這段期間召開一些籌備會議。[20]

從《人民日報》的報道中可以看出，籌備會議似乎主要是對已經發表的毛的講話進行研討。因為許多或大多數人大代表都可能聆聽過毛本人的報告，或聽過錄音，所以無疑有必要向他們解釋「講話」為什麼要增補和修改。像宋慶齡這樣的一些主要非黨人士，從6月21日開始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以鼓勵與會代表要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即將來臨的鬥爭中，批評他們那些犯了錯誤的朋友們和同事們。最重要的是，劉少奇和彭真肯定利用了這些籌備會議來確定如何更好地開展批判的方針。

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想必是如何稱呼批判的對象。因此有理由設想，《人民日報》6月22日社論出現「資產階級右派」這個詞，是由於需要確定一個稱呼以便提交人大會議討論。事實表明，如果人大會議不是即將召開，中國領導人在一段時間也許不會一致同意這個詞。彭真，應該還有其他的一些和他一樣懷疑整風運動的領導人，似乎在確定「右派分子」的稱呼後還嘗試過要求換一個更嚴厲的稱呼。

周恩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是人大會議第一天的中心議題。總理花費大量時間來保護他的政府，駁斥從5月初以來那些對政府的最激烈的指控。他說一旦右派被孤立，大多數人就會接受思想上的再教育。這句話也是在為毛辯護，對那些懷疑毛犯錯誤的言論進行抨擊，說毛對矛盾問題的分析是「偉大的論斷」（不僅是一般講話和報告）。周還說在此基礎上，「我們正在通過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以及通過我們在揭露和打倒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

勝利鬥爭，形成我們更強大的隊伍。」[21] 在這一段中，周恩來以正確的順序提到了三害。但在此之前，他曾使用了更適合劉少奇口味的提法，把思想上的改造置於行動上的改造之前，這似乎是對劉等人表示出的一種和解：

> 一方面要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嚴肅認真地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思想和作風；另一方面要徹底批判右派分子反對社會主義……[22]

如果周恩來希望與毛的主要對手進行妥協，他必然失望了。他自己說話就是很有節制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他提到批判者時，只說是「某些人」，而不隨意濫扣「資產階級右派」的帽子。但是周的和緩態度，並未被普遍採用，7 月 1 日之後，在人大會上的反右講話變得更嚴厲。[23] 右派繼續被批評，說他們支持一些（明顯來自毛的）提議，或說他們從毛的講話中獲得鼓勵來做一些惡毒的事情。有一些毛的支持者也成為了類似攻擊的受害者。這些攻擊是如何做到的，可以從章伯鈞（他被指為羅隆基的同盟者）的案例中看出來。

章伯鈞曾在 5 月的講話中建議成立一個「政治設計院」。他的目標似乎是使全國政協和人大常委會起到更大的作用。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在討論重要問題和政策時應該邀請這兩個機構。[24] 該建議所遭受的抨擊比羅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員會」要少些，這也許是因為共產黨的幹部認為，他們更擔心重新審查鎮反運動，而不必擔心這個從憲法上講多少有些含糊並可以以無害的方式實施的建議。畢竟劉少奇在 1956 年 11 月曾把全國政協說成是一定意義上的人大的「上議院」[25]。但是，章的建議卻被作為攻擊毛的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政策的借口。[26] 例如，在一份給人大的聯合聲明中，中國農工民主黨（章是這個黨的主席）的 4 名成員宣稱：「在蘇共二十大之後，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全會上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之後，他意識到可以放縱他的反對態度和勃勃的野心了。」[27]

吳晗在人大會議上的發言，更尖銳地描繪了當時的形勢。他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同從1956年開始在共產黨國家內出現的一切重大災難聯繫起來：

> 一年多以前，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28] 在匈牙利事件之後，在世界各國反共高潮之後，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提出之後，他們（章伯鈞和羅隆基）對國際和國內形勢的估計，以為要變天了，共產黨站不長了，民主黨派大有可為了。[29]

另一個清楚地表明共產黨內有人反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的例子是右派分子馬哲民的自我檢查。他引用了章伯鈞在3月民盟全會上的講話說：

> 我從習仲勳那兒探聽了一下口風，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很不易搞，所以我在這次會議中，極力主張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中心任務，有了這，則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創造了條件，否則只是空談，兌不了現。[30]

在這裏，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由於暗示黨內有不一致而受到了指責。劉和彭有理由不喜歡他對中央國家機關整風的熱情，以及他試圖把整風轉移到人大常委機關的努力。在人大上攻擊章伯鈞的另一個理由使更多的高級官員了受到牽連。有人說，在抗戰時，儘管章伯鈞打著虛偽的社會主義者的旗號，但當時在國民黨首都重慶的共產黨辦事處仍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支持章伯鈞，辦事處的領導人周恩來和董必武甚至經常與他討論國事。[31] 言下之意是周和董曾經如此姑息養奸至少是很愚蠢的。由於周在整風問題上對毛的堅定支持，有些人對他政治上污點的詆毀能被理解；董必武也受到牽連，也許因為他身為最高法院院長，本應在鎮反問題上成為黨的堅定維護者。[32]

周恩來還因另一件事被同毛聯繫在一起，這表示黨的幹部認為，對出現的錯誤他幾乎與主席負有同等責任。被劃成右派的人類學家費孝通宣稱，羅隆基經常引用毛和周講的話來嚇唬人。[33]

民盟一位成員對章伯鈞的攻擊，提供了一個詆毀毛關於十大關係講話的機會，並附帶地有力證明這類責備不是偶然產生的。胡愈之人大常委會發言時，援引章對農工民主黨成員傳達毛關於十大關係的講話時說的話：「儘管許多人說資本主義壞，但事實上資本主義仍有生命力……。」[34] 除了影射毛的講話能夠喚起資本主義的新的希望外，這句話更有意思的一點是，胡愈之並不是農工民主黨的成員，[35] 因此他不可能參加了章伯鈞發表了這一言論的會議。看來是有人有意告訴了胡愈之這句話，以便曉諸於眾。[36]

章伯鈞和羅隆基是因為「曲解」了毛關於中共中央要控制高等院校的講話而雙雙受到攻擊的。在無限制地開展批評的那段時期的後期，這一點肯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由於學生情緒的高漲，解除黨對學校的控制就可能失控而引起暴亂。6 月初一份關於上海復旦大學黨委系統已經解散的報道被匆忙否認了。[37] 如果事態這樣發展是因為毛某種方式的鼓勵的話，那麼黨的幹部們的憤懣情緒會是特別強烈的。

吳晗似乎再一次暗示應該受到責備的是毛。在人大的講話中吳晗說，章羅在 4 月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散佈要黨委退出學校的觀點：

> 根據是假借傳達毛主席的一次講話，主席說學校黨委制可以研究。章羅傳達時變成「毛主席說，我建議，首先撤銷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產黨包辦！」[38]

幾天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在鐵道學院批判章伯鈞的報道；據說他在 5 月 18 日，曾在那裏發表一通所謂毛主席也不知道在高等院校實行了黨委制的談話。[39] 章伯鈞這段話的意思是不很清楚，但是明顯地暗示毛對黨委制是反感的。最後，另一份在人大的發言指出，章伯鈞從兩方面曲解了毛 4 月 30 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一方面是所謂毛建議黨委制應在學校撤銷。[40] 唯一能表明毛在這方面觀點的是他 4 月初在上海黨委會上的講話，當時他倡議從根本上改組大學黨委制，其中包括重新分配一些幹部的職務。在 4 月底他是否採取

了進一步的行動呢？[41] 總體來看，毛很可能講了一些類似於章和羅講過的話，而劉少奇和彭真是不會忘記這一點的。

毛左右為難的困難處境

毛對中國共產黨在整風期間受到的大量譴責負有主要責任，這一點本身就足以使他的對手們有足夠的理由公開揭他的底。但是毛在反右運動中的作法更加重了他們的憤恨。毛的困境是，他製造了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信用差距，要想消除兩個差距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不得不爭取。一方面，他作為能洞察一切的中國革命舵手的聲望，由於整風運動，在黨員中間受到了嚴重衝擊；另一方面，由於反右運動，黨外人士對他的真誠，至少是對他在中國共產黨中的權威，產生了懷疑。在 6 月 14 日《文匯報》對自己在整風中所起的作用發表了一篇社論進行自我批評，基本上暗示了它的錯誤是由於對毛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所倡議的「鳴放」當真了：

> 我們片面地錯誤地理解了黨的鳴放政策，以為只要無條件地鼓勵鳴放，就是幫助黨進行整風；多登正面的意見或者對錯誤的意見進行反批評，就會影響鳴放。[42]

這段話刺痛了毛，他在他為《人民日報》寫的（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披露的）7 月 1 日社論抨擊《文匯報》時引用了這段話。[43] 他拒絕了《文匯報》檢查中的辯解，譴責這張報紙對無產階級發動了瘋狂進攻，對幫助黨整風沒有絲毫誠意。接著毛試圖來彌補兩個信用差距。他向黨員解釋道，在整風開始的時候沒有反擊是有意引蛇出洞；對非黨人士他多少有點自相矛盾地說，根本就沒有什麼陰謀，黨的意圖從一開始就說的十分清楚：

> 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及一切黨報，在 5 月 8 日至 6 月 7 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

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麼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麼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44]

聽過毛最初的兩次講話中任何一次的非黨人士，都太不可能接受他這個版本的說法。4 年之後，當中國共產黨試圖重提百花齊放方針時，周揚在一次講話中承認：「如果爭論是讓毒草放出來以便可以把它鋤掉，如果舉行鬥爭會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那麼，它是與百家爭鳴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馳的。」（重點為作者所加）[45]

毛是迫於事態而否認他最初的意圖，並同意進行反右運動的。的確，所謂章伯鈞和羅隆基領導了一個全國範圍的運動的說法也許不過是他的策略，旨在解釋自己的失算。首次官方提到章羅反黨聯盟是 7 月 1 日毛撰寫的社論。不過毛仍然試圖緩和這場風暴。他堅決提出要適當地處理右派。表面上，毛與某些強硬派（如彭真）的爭論是詞義上的，即給右派分子定一個什麼樣的恰當的稱謂；但是，這種稱謂的選擇決定了對被宣佈為有罪的人的懲辦程度。這一點從毛 7 月 1 日社論的另一段話中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又回到「資產階級右派」這個名稱。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這是科學的合乎實際情況的說明。這是一小撮人，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學生裏都有，共產黨、青年團裏面也有，在這次大風大浪中表現出來了。他們人數極少，在民主黨派中，

特別在某幾個民主黨派中卻有力量，不可輕視。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辦罪呢？現在看來，可以不必。因為人民的國家很鞏固，他們中許多又是一些頭面人物。可以寬大為懷，不予辦罪。一般稱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稱為反動派。只在一種情況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繼續進行破壞活動，觸犯刑律，那就要辦罪。

在毛的解釋中的基本矛盾是，當他同意將資產階級右派的言行說成是「反動的」的時候，他卻不將資產階級右派劃為「反動分子」，這樣做將會把他們同蔣介石及其一夥同等看待，使他們受到嚴厲的懲處。這個矛盾突出地表現在毛在這篇社論中所談的與毛已發表的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中的兩種不同的說法上。他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說：「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還不完全鞏固」，[46]後面又說：「無產階級的目的是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是如此。在這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47]但是，在他7月1日社論中，毛提出要實行寬大政策，理由又恰恰是人民的國家已經鞏固，認為右派分子不能把它推翻，即他們不能取勝。

毛沒有能夠使持不同意見者信服。宣傳部長陸定一在7月11日人大的講話中，把周恩來關於先講整風運動和後講反右鬥爭這種按重要性排列的順序給顛倒過來，並且否定了毛的溫和態度：「一定要無情地批判右派，堅定地將整風運動繼續下去。」[48]彭真也回到這個問題的爭論裏來，可以看出，如果不是為開人大，對於右派的稱謂是沒有一個統一意見的。

毛對他的對手進行挑釁

就在毛的社論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當天，舉行了一個慶祝大會，應該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36週年。鄧小平在會上致詞，也許是想通

過說幾句比較緩和的話來彌合毛與劉之間的鴻溝。[49] 如果這是他的意圖的話，那毛後來的行動卻使它毫無用處。

毛在定性問題上堅決地堅持自己的看法肯定已經觸怒了他的反對者，但在他的社論發表一個星期後，他真正地向持不同意見者挑戰了。也許是在人大會上批判右派的那種日益強烈的聲音激怒了毛，他便告退到更有同情氣候的上海去了。[50] 7月7日，他在第一書記柯慶施和其他當地官員的陪同下，在一個由36位上海優秀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參加的內部會議上講了話。[51] 他從數量和影響兩方面，貶低了右派的嚴重性，他還嘲笑「某某同志」擔心右派會鬧翻天。儘管7月的反右鬥爭猶如狂風暴雨，然而，8月將會重新回到「和風細雨」。整風是對的，並將在每個五年計劃中進行兩次。包括毛自己在內的所有領導人都有缺點，都需要經常清洗。毛再次向中間路線的動搖分子保證，願意把他們作為同盟者，但他批評知識分子，說他們無知，生活上依靠無產階級卻又拒絕接受無產階級的觀點。[52]

《人民日報》7月9日的報道沒有反映毛在這次會上的講話——只提到兩小時的「親密的談話」——會議的照片耽誤了兩天才登報。這種耽誤說明了什麼呢？我們可以想像，對於忙於監督人大反右進攻的劉少奇和彭真來說，他們肯定對毛向上海知識分子展現的團結感到氣憤。也許劉向《人民日報》的總編發出了指示，不讓他刊登照片，以降低毛的行為的影響。如果的確是這樣，那麼照片最後被登出來想必是由於毛本人的干預。[53] 不管確切的解釋是什麼，對吳冷西來說，這件事應該是一次不舒服的戰火洗禮，吳當時任新華通訊社的社長，7月3日或4日他接替鄧拓任《人民日報》總編輯。[54] 鄧拓也並沒有被打倒——他繼續任報社社長，並負責社論工作，後來他又進了了北京市委——但他明顯是一個因最高層爭端而受打擊的重要人物；他是第一個，但不是最後一個。[55]

毛決心阻擋對右派的全面政治迫害的進一步表示，同時也是對於右派性質的文字爭論的實質的反映，在人大會上當著劉少奇和彭真

的面表現出來了。在人大會議上對幾個主要右派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之後，看來，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周恩來將撤銷章伯鈞、羅隆基和章乃器的政府部長職務。[56] 至少羅隆基肯定是準備好了人大會作出關於自己的某種決議。[57] 當他得知在 7 月 15 日下午的閉幕會議上不會對他作出決定時，他受到極大的鼓舞，立即給劉少奇寫信強烈抗議人大江西省代表團和民盟中央對他的無禮對待。[58] 也許羅隆基精明地意識到，對他的問題暫緩處理是由於上層發生了爭論。對他和他的同夥的問題不能很快作出處理的結果是在 6 個多月的時間內，政府裏有 3 位被定為「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反黨」右派分子的部長任職。[59] 黨的幹部們對於在自己的組織內如何對待右派肯定會感到迷惑不解，無所適從，雖然鄧小平在 7 月 8 日給全國的省委書記專門召開的「電話會議」就這個問題作了指示。[60]

正在這個階段，由於這兩個重要情況的發展，《人民日報》開始刊印對毛的直接攻擊。直到此時，這份報紙還維持了對毛的體面做法，即責怪右派曲解了毛的政策（雖然事實不是這樣）。而現在則公開印發了右派直接責備毛的言論。公開宣佈的目的，當然是要暴露右派的罪行；但很難令人相信，引用右派的這些話不是為了表明在整風之後黨的幹部對毛的看法。

看起來最早出現的對毛的直接批評是在 7 月 11 日，就是《人民日報》刊登毛在上海的照片的同一天。該報談到了毛在農業合作化中的作用。引用了章伯鈞的話說：「合作化的工作做的很不好；農民在咒罵毛主席。」[61] 毛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確實是頂著許多同僚們的反對而取得了勝利，例如劉少奇不得不對在這個問題上的過於謹慎作自我批評。1955 年 7 月 31 日毛講話的強硬語氣使合作化搞得很快，這無疑導致了許多有關如何組織和適應的問題。[62] 章伯鈞的話暗示，這些問題使農民感到不滿，他們不責怪那些具體實施合作化的黨的官員，而是責怪那個讓合作化搞得過快的鼓動者。言外之意是，如果毛按照劉所主張的速度行事，那麼，與農民的關係也許會好些。

7月15日，當右派部長們得知不會被撤職時，《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對毛個人的無疑是最集中和最有損害的批評。這篇攻擊文章的標題是：「陳銘樞公開污蔑毛主席」[63]。陳污蔑毛性情暴燥，把他比作俾斯麥首相。他譴責他蔑視黨的高級幹部（指的是否是劉少奇和彭真？），還偏袒溜鬚拍馬屁的黨外人士——這個來自一個非黨人士的批評是很不尋常的。但卻是被毛在上海的那張照片激怒了的幹部們極為欣賞的。[64]

陳銘樞還批評了對毛的個人崇拜，特別是批評在歌詞中把他描繪成「紅太陽」和「救星」。在《人民日報》發表章乃器在人大上作自我批評的第二天，這種指責出現了一個有趣的轉折。章承認他與另一些黨外人士未能執行共產黨的反對個人崇拜的路線，據說，政協曾經建議成立一所毛澤東大學，但這個建議被毛拒絕。儘管毛的拒絕應該使他贏得黨的幹部們的好感，但是章的交代，加上陳銘樞對拍馬屁的黨外人士的攻擊，無疑給人們這樣的印象：毛主席與那些不誠實的非黨人士交往太密，正是他們以助長他的個人崇拜來獻媚。言外之意是，毛的同事們在助長個人崇拜上是相對無罪的，黨的幹部們不能責備他們把毛推到如此至高無上的地位，以致不能對他進行批判。幾天以後，對一個右派黨員記者劉賓雁的批判中，毛又被與壞分子聯繫了起來。[65]據說，劉賓雁譴責了所有的黨員，只有毛免遭抨擊，因為只有主席堅決主張整風，而一些高級幹部則是反對整風的保守勢力。[66]

右派的這種言論起了雙重作用，既誹謗了毛，又突出了其他高層領導人反對他政策（尤其是整風）的堅定態度。有些右派言論特別顯示了某些領導人對整風的反對，尤其突出了彭真作為黨員幹部保護者的作用。據說，清華大學的右派副校長錢偉長曾說，由於彭真和該校校長和黨委書記蔣南翔的私交，北京的學生問題很難解決。[67]另一個右派承認他曾污蔑過北京黨委，批評其把「團結、教育、改造」的官方方針在實踐中變為「利用、限制、改造」。[68]幾天後一個戲劇界人士批評北京戲劇界的鳴放落後於上海的鳴放情況。[69]雖然所有這些引

用的言論都在表面上批評彭真，但對於那些忙於反擊批評者的黨員幹部來說，這些言論表明，彭真一直都在試圖限制知識分子的鳴放，並且在如大學之類的危險區支持了現有領導者。

另一個重要的表明劉少奇和彭真態度的一篇文章發表在 7 月 17 日的《人民日報》上。這篇文章是對陸定一寫的一篇關於紀念整風運動 30 週年的文章的更正。人們會想起，陸的這篇文章發表於 1957 年 3 月 5 日。第二天的報紙上對看來是印刷上的錯誤進行了更正。那麼，4 個月之後又作進一步的更改，只能說是有政治目的的，而不是作者耽擱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重讀這篇文章時作出的更改。更改只有三處，而且內容相同，即在下面一段中把「階級」改成了「剝削階級」。

> 資本主義社會裏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剝削階級已經消滅，只有剝削階級的殘餘，即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
>
>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第一，我們的國家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剝削階級已經基本消滅……[70]

新的修改的意義是暗指階級並沒有從中國消滅，因此，階級鬥爭仍可能存在。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工商人士的觀點來看，這明顯地是一個不祥的徵兆。[71]

甚至更直接揭示劉少奇和彭真態度的是，他們在同一天，甚至同一頁——這也許是為了強調——的《人民日報》被提到，這就是在這裏引用的清華大學右派副校長錢偉長所說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貫徹下去是因為劉少奇彭真不支持鳴放。[72] 這張報紙能夠，也許是奉命，發表這樣一篇揭示高層領導不團結、損害極大的文章，充分表明，到 7 月中他們仍然是不一致的，劉少奇和彭真對毛和周不願意對右派予以嚴懲極為不滿。如果有中國幹部懷疑中共是否要向蘇聯共產黨學習，就不足為怪了。蘇共剛清洗了 4 位領導人：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73]

青島會議

在7月的某個時候，大概是16日至22日[74]，「在青島召開的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毛對整風運動和反右鬥爭的性質和條件作了全面的估計，並提出了運動發展的明確政策」，[75]不清楚的是，其他政治局委員是否參加了這個會議。鄧小平也許參加了；從他在兩個月後召開的三中全會上作有關整風運動的報告時提到青島會議時的語氣來看，說明他到會了。我們確實知道周恩來和烏蘭夫在8月早些時候呆在山東這個避暑城市裏，烏蘭夫可能從7月20日開始就在那裏參加一個少數民族會議。[76]烏蘭夫雖然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由於他的職務是內蒙古第一書記，[77]他具有省級領導人的資格，因此他在青島的出現，不能認為這是其他政治局委員也參加了會議的跡象。如果有很多其他政治局委員也到場了，這次會議就很可能被定為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但假如劉少奇和彭真在青島確實見到了毛、周和鄧，那麼很清楚，這次會議沒有解決他們之間所有的重大分歧。鄧即使在回顧時也沒有說毛在青島作了指示，只是「提出」了一個政策；鄧也沒有說毛作了報告，只是作了一個「估計」。[78]毛在三中全會上也是含糊其辭地提到青島「文件」——這說明他也許散發一個政策草案而不是發表講話。毛在青島的聲明看來包括了某種形式的自我批評，因為在三中全會上，主席說：「『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沒有錯誤，但沒有青島文件，它就不完整。」[79]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缺失的，並在青島會議上補充的一部分，顯然是對在資產階級中的反黨傾向比當時估計的要強烈得多的認識。然而，毛把這種對錯誤的承認變成武器；他爭辯說，這表明在八大作出的關於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的決議是不正確的。[80]這一點，儘管他的反對者認為這一點在反右鬥爭的背景下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他們對毛堅持認為這也可以用來支持對黨員的鬥爭感到極為不滿。

毛在青島以《1957 年夏季的形勢》為題所作的講話，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見到，而且還只能見到摘要。[81] 摘要之一包括關於「我們的目標」的概括性的陳述和兩個有關共產黨員必備條件的要點。

> 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82]

儘管這段話作為表述毛的基本目標是極為重要的，但它仍然是一種也許是強加給他的妥協。他在 7 月初列舉其中一些目標時，把民主置於集中前面、自由置於紀律前面。[83] 在第二段摘錄中，毛分析了反右鬥爭的重要性，稱之為「一場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社會主義革命」，並預言反右鬥爭也許會再進行 10 年或 15 年，也許更長些，同時階級鬥爭本身會繼續存在下去，只要在世界上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還依然存在。[84] 毛對 10 年或 15 年反右鬥爭的估計，可能是基於另一個估計，這個估計包括在他的講話的第三段摘錄中，即工人階級必須利用這段時間來培養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85]

雖然這些摘要在當時沒有公開發表，但從 7 月底開始，各種渠道引用了其中一些詞句或段落。[86] 首次引用看來是在 7 月 28 日《人民日報》社論《反右派鬥爭是對於每個黨員的重大考驗》中出現的，這表明了那個講話是在社論發表幾天前某個時候所作的。在開頭和結尾的兩段中，社論呼應了毛在青島講話的一些部分。它一開頭便強調了當前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重要性，指出經濟方面的所有制的革命是不足以鞏固革命的。[87] 在最後一段，它列舉了一些毛在青島講話中所要求的黨員應具備的條件。毛說的是：

> 共產黨員一定要有朝氣，一定要有堅強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難和用百折不撓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難的精神，

> 一定要克服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絕對平均主義和自由主義，否則就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員要善於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黨群關係好比魚水關係。如果黨群關係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也不可能鞏固。[88]

《人民日報》7月28日社論的最後一段呼應了其中的一些論點：

> 共產黨員一定堅持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立場，密切聯繫人民群眾，一定要克服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永遠保持朝氣，永遠具有堅強的革命意志，否則就不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共產黨員。

這一段反映了毛講話的精神，並使用了毛講話中的用語。看來下述的推論是合理的，社論的主體部分反映了毛對黨員中存在的右派觀點所要說的話，尤其是它重複了毛早在5月所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的某些觀點。

社論所傳達的基本信息是黨員中存在著右傾思想——儘管有「一些善意的同志」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黨內右派分子比非黨右派更危險，因為他們能從內部進攻，因此必須像對待其他右派那樣毫不留情地對待他們。毛後來解釋說青島「文件」討論了「保護幹部」問題，它說大多數幹部的錯誤都是小錯誤，應給予寬大處理。[89] 儘管如此，這篇社論仍然是對劉少奇和彭真的反擊。首先，它將問題的焦點從那些在最近在他們組織的人大會議上受到攻擊的非黨右派，轉到黨員右派上，並且強調後者更危險。第二，這是對像劉和彭之類的人的一個含蓄的批評；直到兩三年之前鄧接替這項工作，正是他們一直負責吸收黨員和黨員的思想教育工作。因此它是重申了鄧小平在八大會議上所作的含蓄的批評。同樣重要的是，這篇肯定是根據毛的明確指示而寫的社論，被要求突出毛在青島講話中涉及黨內右派的那一部分。

毛劉分歧仍在繼續

不管劉少奇等人是否參加了青島會議，他們顯然對毛在那裏所採取的立場不滿。鄧小平後來提到這次會議時很謹慎，表明了這一點。更富有意味的是，以毛為一方、以劉和彭為另一方的意見不一致再次被公開化。7月29日，也就是以毛青島講話為基調的社論發表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個黨內右派的一段言論。

> 對右派分子發動了反擊可能是毛主席的方針受到了黨內有宗派主義的高級幹部的反對，因而有了轉變，毛主席妥協了，這是老幹部想報復；太不道德了……中央分裂了。劉少奇彭真壓制毛主席。[90]

這一段引語大部分在8月3日再次披露，該報再次對這個右派的批評語言作了報道。[91]

再次披露上層意見不一致的重要意義在於這種披露是不必要的。通過在7月17日公佈的一個右派的言論，公眾已經知道中央某些高層領導是反對整風的。因此下述看法是合乎邏輯的，即第二次披露的意圖——也正是第一次披露的部分原因——是為了表明意見不一致仍在繼續。在7月中旬的時候，這麼做似乎是由於毛對資產階級右派的保護；但到了七月末，像以上引文所顯示的那樣，雖然「老黨員」仍然渴望對右派復仇，但劉和彭真應該被毛對黨內右派的攻擊而更加激怒了。8月4日，在《人民日報》再次登載7月29日關於揭發了上層領導意見不一致的另一篇報道的第二天，彭真在北京市人大會上講話時，對資產階級右派大加斥責：

>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92]等反共、反革命的「英雄」在「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以前，甚至在大規模地公開地屠殺共產黨和革命人民以後，不也是說他們只是反對共產黨嗎？[93]

後來，他不僅再次將右派分子與蔣介石和汪精衛相比較，為了加重份量，又把他們比作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接著他又引用了一段歷史來作比較：

> 我們應該同陳獨秀「寬宏大量」地「包容」蔣介石、汪精衛等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一樣，容忍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麼？絕對不能。[94]

這一番激昂慷慨的話，也許是對毛在 7 月 1 日社論中懇求寬大的一種諷刺，他接著又作了一些補充，但聽起來極不協調，反而增加了這種諷刺意味。他說：

> 當然，這並不是說現在我們要把所有右派分子當蔣介石、汪精衛對待，而是說右派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惡劣，以及手段的毒辣。[95]

簡言之，他將資產階級右派比作蔣，並且警告不要模仿從前那些曾原諒過這些罪人的共產黨領導人。然而，他說了這一番充滿火藥味的話之後，接著又說什麼沒有必要像對待蔣那樣對待右派。通過這段歷史的比較，他指出毛在 7 月 1 日社論中所持的立場本身就有矛盾，並說毛的寬大政策是不合實際的。剛剛被第三遍提醒彭真對毛的反對態度的《人民日報》的讀者們應該會意識到，彭本人對寬大政策的接受也是不真誠的。

彭的報告中沒有任何地方提到了毛或他的那些講話。[96] 但是，有證據顯示他聽到或看到過毛的青島發言。在兩處地方，彭用到了「朝氣」一詞，有一次還是在和毛相近的語境中。[97] 彭願意同意，這一點很好；但是，他總體上忽略了毛的青島講話。彭的態度和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對毛的講話所表現出來的贊同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柯慶施在 8 月 15 日上海市人大會上發表講話。[98] 他援引了毛提出的共產黨員標準，並加進一些了與 7 月 28 日社論的結束語相呼應的話：

> 共產黨員一定要有朝氣，一定要密切聯繫群眾，一定要有堅強的革命意志，百折不撓地去克服任何困難……一個共產黨員，要永遠是朝氣蓬勃地為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堅持奮鬥。[99]

柯接著強調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他列舉了一些需要知識分子的領域，這些與毛所列舉的幾乎完全一樣。[100]但是柯在傳達毛的青島講話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了毛關於政治目標的概述。[101]有意義的是，柯在引用了這段話之後，接著重新肯定了毛的「自由」政策的正確性：

> 這是我們黨總結了許多歷史經驗得出的結論。我們的黨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是為了造成這種政治局面。這是我們的國家政治生活的總方面。因此，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總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等等各項政策，必須也將會繼續貫徹執行，絕不因為反右派鬥爭半途而廢。反右派鬥爭，正是為造成這種政治局面創造條件，因為我們人民同資產階級右派沒有共同語言，不取得反右派鬥爭的勝利，這種政治局面是不可能造成的。因此，懷疑不再整風了，不再鳴放了，是沒有根據的。[102]

我們不能肯定，緊接著政治目標概述的下面這段話是否也是引用的毛的話。但是有理由設想，毛也是在確認有必要採取他在前 18 個月內提出的各種政策的情況下，才作出這些概述的。如果確實如此，則彭真不同意毛關於政治目標的提法，可看作是他不欣賞為達到這些目標而制定的政策。在以毛周為一方、劉彭為另一方的這種分歧沒有得到解決之前，反對整風的這兩位領導人都不可能接受這個目標。

在資產階級右派這一點上，柯慶施緊緊跟隨毛氏路線，以長篇引用毛 7 月 1 日社論的方式來證明應該對他們寬大。[103]他沒有像彭真那樣，把他們比作蔣介石和汪精衛。由於柯和彭都對寬大政策表示了支持（不管彭是多麼的不真心），青島會議的一點是清楚的：毛成功地抵制了黨員幹部保護者們的要求，使得對右派的懲罰與他們的罪名相匹配。

第十九章 妥協

在 1957 年 8 月初，毛澤東和他的反對者看來仍在激烈地爭吵著。然而，到了 9 月的第四個星期，他們明顯地彌合了他們的分歧。迄今為止，也不能確切地斷言這次和解的來龍去脈，但是可以說它的最根本的基礎好像是：劉少奇和彭真接受了毛澤東進行反擊的主張，認為黨的幹部確實犯了一些錯誤，而毛澤東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人群當中排除了出去。由於這一雙方妥協的結果，農村黨員幹部們不得不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是後來又在 1958 年的「大躍進」運動中被給予重任。這種和解，肯定是基於雙方都認識到農業的形勢已經非常危急，到了需要有一個團結的領導班子加以重視的程度了。

糧食危機

自然災害使 1956 年成為全國農業歉收的一年。雖然 1957 年的氣候好了一些，但 3.5% 與之前一年的 4.9% 相比，增長反而更慢了，而且集體農場的體制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蝕；[1] 棉花的產量比 1956 年提高了 11.4%，但是，由於受前一年產量減產的影響，8 月份仍不得不削減了棉布的定量;[2] 更嚴重的是，糧食產量在 1957 年僅增長了 1%，[3] 比當年的人口增長速度的一半還少[4]。這些問題加起來就形成了 1957 年夏末出現的糧食供應的危機。國家糧食收購在過去的 18 個月急劇減少，但國家糧食銷售卻在增加，，這個差額只能由國家調撥儲備糧來彌補。[5] 毛澤東成功地利用了這一形勢來回擊他的反對者。

《人民日報》8 月 5 日關於糧食局勢的社論中，把農業危機歸罪於農民的「個人主義」和農村幹部中存在著的「本位主義」[6]。農民中

的「個人主義」認為在合作化之後，國家應給予個人更好的生活，農村幹部中的「本位主義」則意味著只關心其本地區農民的直接利益，而不顧國家的長遠利益。「本位主義」的幹部為了必須讓國家對糧食少購多銷，企圖隱瞞糧食產量，少報糧食收入，誇大糧食不足，此外，基層黨的幹部的這些行動得到了所在地區縣級幹部的寬恕，他們覺得以國家的利益來限制糧食消耗是「對不起農民」的錯誤作法。[7]

這個欺騙中央的作法是容易解釋的。因為在農村幹部中廣泛地確信為了工人的利益農民正受到歧視，而農村中的生活水平比城市裏低得多。這並不是一個新問題，[8] 但農村幹部也許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對斯大林不顧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批評發表之後，更加有勇氣去這樣做。黨的領導們試圖批駁那種認為他們也不顧農民利益的觀點，劉少奇在他視察地方工作的過程中曾談到這一點。[9] 當時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譚震林在 5 月的《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一些事實和數字；[10] 周恩來總理在 6 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說明了在收入上應該存在一種合理的差別，因為工人的生產率比農民高得多。他辯解說，同樣，由於存在著不同工作的合理分工，高、低級職工的待遇也是不同的；並且，由於存在著簡單工作、複雜工作和體力勞動、腦力勞動的差別，其待遇也是不同的，否認這點就是平均主義。[11] 也就是說，那些否認工人與農民之間應存在合理待遇差別的人，正是犯了平均主義的錯誤。

總之，農村中的「平均主義」、「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的三個錯誤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存在平均主義思想的幹部認為，農民與工人比起來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這就導致他們去犯「本位主義」的錯誤，去支持和慫恿農民少報糧食產量，並寬恕農民中存在的漠視國家利益的「個人主義」。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毛澤東在青島的講話中指出，這些偏差是有聯繫的，他號召黨員制止「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嚴重的平均主義和自由主義」，《人民日報》7月28日的社論引用了一些毛澤東要求幹部注意「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偏差的告誡，但是，沒有談到幹部「本位主義」的嚴重錯誤(它是糧食危機問題的關鍵所在)。直到8月5日社論才開始抨擊「本位主義」。五天以後，《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共中央8月8日的指示，並發表了一篇社論，要求在整個農村發動一場廣泛深入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運動中，所要批判的是富裕中農中的資產階級傾向和「那種無視國家和集體利益、集中表現在個人和集體關係問題上的思想」。[12] 與這篇中共中央指示一起發表的社論重新提到了農村黨員幹部中存在著的一些錯誤：

> 可是，有一部分農村黨員和幹部，包括一部分縣級工作人員在內，沒有認清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形勢，沒有堅決維護社會主義的原則，這些同志在像糧食問題這樣同社會主義的命運有極密切關係的重大問題上，錯誤地站到了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的立場上。有些同志，對於壞分子危害農村秩序，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行為，採取了放任的態度，沒有及時地給予應有的打擊。[13]

這篇社論繼續描寫了這場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最重要的一些方面：

> 批判黨內右傾思想和個人主義、本位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打擊企圖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地主富農分子和別的壞分子的反革命行為。[14]

在這裏，《人民日報》社論清楚地指出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第一個目標是要消除黨員中的錯誤。為了說明這些錯誤是如何與糧食問題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社論又重申：

目前在農村裏發生的一個最尖銳的問題，正是一部分落後分子把個人利益放到了同全體人民的利益對立的地位，他們為了個人的利益，要求國家對糧食少購多銷。[15]

在後來的 3 周裏，《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另外 6 篇社論，極力宣傳所面臨的嚴峻的糧食危機問題。[16]

糧食危機給毛澤東提供了向與他持不同意見的人進行反擊的時機，使他毫不客氣地指出黨的幹部中的非常嚴重的偏差，即使這不是整風運動中所要批判的主要內容。我們可以斷定，毛澤東在 7 月 28 日和 8 月 5 日之間的這段時間裏，成功地說服了他的反對者們，讓他們同意同「本位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正如他在青島發言中所提出的那樣。而一旦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這一點能取得一致的意見，就有可能擬訂出中共中央 8 月 8 日的關於一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

在整風運動中，城裏黨員幹部成為主要目標，他們由於以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粗暴態度對待資產階級而受到批判。現在，農村幹部則是因為他們對農民的過分寬容及「本位主義」的錯誤而受到抨擊。按照分配一定人數限額的作法開除黨內組織中的異己分子，這足以說明第二場鬥爭的嚴重性。如在廣東，就有 3% 的黨員和 8% 的團員被開除黨籍、團籍。[17]

可是，農村幹部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幾乎沒有像他們城裏的那些同事在 3 個月前那樣容易受到攻擊。在整風運動中要求幹部無奈地、逆來順受地接受批評；相比之下，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非黨人士和黨員的要求是一樣的。而且，運動由共產黨操縱，幹部們有著絕對的控制權，而不需要無可奈何地聽取對他們的批判。毛澤東也許希望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可以作為說服農民確信只有走向共產主義才是正確道路的大辯論，但基層討論卻常常變成了黨員幹部的說教和他們重拾信心和重樹威望的機會。[18] 劉少奇和彭真很可能已經預見到這一點，所以他們還願意與毛澤東進行妥協。[19]

國家在農村所採取的另外一條措施重新樹立了幹部對農村的管理權，這就是國務院 8 月 17 日公佈的取締自由市場的決定。[20] 到目前為止，很多農村幹部難以說服農民參加集體勞動，因為他們可以把私人生產的作物在自由市場上販賣。[21] 現在幹部們能夠更輕鬆地管理農業生產合作社了。

如果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關閉農村自由市場是對農村採取的強硬措施的話，那末，給予農村的獎勵就是在農業上進行更大的投資，這也等於默認了農村幹部抱怨對農業的忽視是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的。[22] 在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被通過後，8 月 9 日，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在天津的一次講話中透露，已經決定在 1958 年的國民生產計劃中進一步增加農業投資。[23] 就在一個月前，他還曾提出要節約，並支持其他制訂經濟計劃的人提出的節約路線。[24] 然而現在，他主張需要「對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同樣給予重視，[25] 強調必須提高農業投資，並要在這樣一種認識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即「農業的發展不僅有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可以有利地促進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26] 最後決定把農業的投資在整個國家總投資中的比重由第一個五年計劃的 8% 提高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的 10%。[27]

薄一波的講話代表政策部分地回歸到了了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以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所闡述的觀點和思想。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主張在輕工業和農業上更多地投資，這可以更快地積累資金來幫助重工業，也有益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雖然薄一波重複了這一對農業投資問題的主張，但他並不打算給輕工業更多的投資。相反，他提出：「由於原材料有限的供應，1958 年輕工業的投資將在某種程度上被削減」[28]。儘管如此，毛澤東在關於內部矛盾講話中所闡述的關於在大力發展工業生產的同時要發展農業的觀點，現在看來已被那些計劃制訂者和黨的領導所接受下來。[29]

毛澤東對資產階級幻想的破滅

在6月份發表的毛澤東關於內部矛盾的講話裏，他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抱有樂觀的態度，堅持認為他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能發揮重要作用：

> 過去為舊社會服務的幾百萬知識分子，現在轉到為新社會服務……我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在過去七年中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他們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正在用功學習馬克思主義，有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者，這部分人目前雖然還是少數，但是正在逐漸增多。當然，知識分子中間有一些人現在仍然懷疑或者不同意社會主義，這部分人只是少數。我國的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盡可能多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凡是真正願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30]

這段話重新表示了周恩來在1956年1月關於知識分子問題講話時所持的態度。毛澤東和周恩來一樣，並沒有幻想知識分子在世界觀經歷了一個深刻變化，；他仍然不認為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但是，他期望知識分子繼續進步，逐漸與工農相結合。[31]毛澤東似乎設想那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能夠逐步無產階級化。這是基於這樣一種假設的，即只要學生和現有知識分子之間潛在的思想和政治矛盾能被整風化解，新訓練出來的知識分子就將是在無產階級中成長起來的。

在一個月左右後的青島會議上，毛澤東明顯改變了他原先對知識分子的期望，「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情願地信服共產黨。他們中的右派分子準備同我們進行較量。從現在開始，這場鬥爭也許可能延續10年、15年或更長的時間。」[32]毛澤東還尖銳地指出，黨對知識分子的中間派的領導力量是較弱的。[33]正是基於這個原因他強調說，（這在他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未提到）只有建立起宏大的

新型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才能全面地鞏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34]

事實表明，雖然毛澤東並未打算把因知識分子參與他號召的整風而把他們定為反革命分子或反動分子，但發生在 5 月和 6 月初的事情迫使他改變了對資產階級政治可靠性的估計。可能他的關於知識分子的觀點，也是由於受到了蘇聯的影響而變得強硬起來。在同一時期，赫魯曉夫在蘇聯取消了前段時間給予作家的許多自由。[35] 所有這些意味著毛不得不重新考慮他的關於知識分子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觀點。他在青島會議期間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提出的結論為他後來在 1958 年發動大躍進提出了理論依據。

中國關於台灣問題的「溫和」路線的失敗

毛澤東對資產階級幻想的破滅肯定由於中共勸說蔣介石捐棄前嫌，使台灣與大陸重新統一談判的失敗而增長了。在中共政權早期強調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時期，一個主張中華民族和解的政策是不可能實施的；畢竟國民黨的領導人是從資產階級中產生的。但是 1956 年毛澤東一定曾經希望國內政治的趨於和緩以及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為標誌的統一戰線政策能減少蔣介石的憂慮。可是，在周恩來正式提出進行新的國共談判後的那一年，沒有任何公開的跡象表明國民黨有接受和談的意圖。在 1957 年中，在台灣發生的一次反美暴動表明，蔣介石決不會同意與共產黨達成什麼協議。

5 月 20 日，在國民政府首都台北美軍軍事法庭上開庭審判了一位美軍上士雷諾。[36] 他被指控有意開槍打死了一位他看見在他住宅外面徘徊的年僅 33 歲的中國工人。[37] 雷諾申辯他打死徘徊者是出於自衛，他是無罪的。[38] 5 月 23 日，由 5 名上校和 3 名上士組成的軍事法庭陪審團宣佈將美軍上士雷諾無罪釋放。據台灣報紙報道，當天就出現了中國人痛罵美國兵的事件，[39] 第二天，這位被害者的妻子在美國駐台灣「大使館」外示威，手裏高舉著一張標語牌，上面寫著：「兇手

雷諾無罪嗎？我向不公正的軍事法庭抗議！」她堅持要見美國駐台灣大使，此刻，這位大使正從香港度假後返回台北。[40] 人們開始在街頭聚集起來。據後來對這次事件的分析，當一個國民黨電台的廣播團將採訪這位被害者家屬的錄音，通過一個擴音器向周圍聚集的群眾重新播放時，反美暴動真正開始了。[41] 大約 12 點 30 分，人們向美國「大使館」投擲石塊。2 點 30 分，人群已湧入「大使館」院內，憤怒的人們把汽車推翻，並到處搜查使館建築。美國國旗也被扯了下來，換上了國民黨旗。美國新聞處圖書館也沒有倖免於難，遭到洗劫。當天晚些時候，聚集起來的大約 2 萬到 3 萬人的示威者企圖襲擊警察局，要求釋放之前被關押的嫌疑犯。警察開了槍，據報道至少有 8 名示威者被打死，或被打傷。[42]

夜裏，蔣介石抽調 3.3 萬部隊開進台北，並且實行了軍事管制，局勢才被控制住了。[43] 蔣介石以此還撤銷了國民黨軍台北衛戍司令、憲兵司令和台灣省警備司令的職務。[44] 但是，他拒絕接受國民黨立法委員的集體辭職。5 月 26 日，蔣介石向美國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杜勒斯國務卿表示「深深的歉意」。兩天以後，有消息說，國民黨政府正準備開展一次群眾教育運動，來彌補因軍事法庭的裁決所引起的對美國威信的損害。[45]

據報道，蔣介石痛切感到這次暴動是自義和團起義以來「中國歷史上最糟的污點」，[46] 6 月 1 日，蔣介石在台灣電台發表講話，就這次反美暴動承擔了責任。但他警告他的手下說：

> 今天我必須向我的人民再一次講清楚，在進行反共和反對蘇俄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我們必須站在美國一邊。因為美國是我們民主國家的領導，我們不允許在內部或外部違反這一方針。

無疑是針對在大陸進行的對共產黨政權的批評聲稱：共產主義制度已經處在土崩瓦解的邊緣，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鼓動起在台北的人民群眾進行反美暴亂。[47]

同時，在大陸，中國當局深受台灣反美情緒鼓舞。《人民日報》就此發表的第一篇社論就號召台灣人民下定決心，加倍努力，解放台灣。[48] 社論指出，想出賣中華民族的利益的蔣介石及其走狗處於危險的境地。這可能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可能接受這次反美暴動的教訓與美國斷絕關係抱有一線希望。3 天以後，報紙再一次號召台灣人民把美帝國主義從台灣趕出去。但是，它還指出，這個目標的實現仍不是輕而易舉的，因為從這次暴動中僅僅能看出：「美國雖然用它的軍事力量佔領了台灣，但是它絕對征服不了台灣同胞們的心。」這篇社論還譴責國民黨當局奴顏婢膝，向美國道歉。[49]

在這個階段裏，大陸新聞工具對在軍事法庭的判決和暴亂中台灣人民的反美浪潮作了大量報道。但是，特別是在蔣介石 6 月 1 日發表了廣播講話後，有兩件事情已經趨於明朗：國民黨當局已經控制了局勢，他們並沒有因為所發生的反美暴動事件而重新考慮他們對整個局勢的態度。在周恩來總理 6 月 26 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裏，簡要地表達了對當前台灣局勢的看法：

>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美國侵略者嚴密控制下的中國領土台灣，也發生了大規模的人民反美運動，而這次反美運動正是發生在美國在台灣建立了導彈基地以後。[50]

周恩來這段簡短的評論正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現實。在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後不久，出現呼籲中華民族和解的勢頭是很自然的。可是正當進行反右運動之時，再次提出民族和解的呼籲是也不會有什麼結果。[51] 但是，同樣可以得出結論，國民黨官方對反美暴動的反應表明，即使是在大陸開展反右運動之前，共產黨對自己昔日仇敵的和解姿態也沒有取得任何效果。當毛澤東對 1957 年夏季形勢重新估計時，統一戰線政策沒能把台灣爭取回到國共和談的桌前這一現實必然促使毛澤東決定要消滅右派。

妥協的產生

8 月初的關於發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決定代表著毛澤東和他的反對者在糧食危機面前開始的初次和解。證據顯示，中央政治局在 8 月份其餘時間裏已逐步重新建立了一個正常的工作關係。在中共中央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人民日報》所發表的一系列社論就標誌著中央最高領導層重新恢復了團結。

在 8 月，有許多跡象證明，即使和解正在形成，但是毛澤東的反對者仍然不願放他一馬。在彭真大罵右派來嘲笑毛澤東的寬大的主張的一周內，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發動起來了。《人民日報》8 月 16 日的社論試圖（有些不成功地）把兩種對立的觀點結合起來。它以《使鬥爭深入、再深入！》為題的社論，突出強調要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社論堅持了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所作的分析：反右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並重申堅持在整個知識分子界加強黨的領導的重要性。[52] 社論也扼要地提到了黨內右派分子的問題，雖然沒有像毛澤東所希望的那樣，強調他們比其他右派更危險。並且，為了支持對右派應進行更猛烈的鬥爭的觀點，社論引用了兩條精心挑選，和毛澤東在提倡對犯了錯誤的人要採取寬容態度時說過的話背道而馳的警句。毛澤東在宣傳會議的講話中，曾強調對犯錯誤的人要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避免「把人一棍子打死」。[53] 這篇社論卻反其道而行之，它告誡右派分子不要「姑息養奸」、「養癰遺患」。[54]

顯示在中央政治局內仍有一定的分歧的證據，以及這些爭論的措辭，從這篇社論的最後一段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段提出反右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同樣是我們國家當前的任務」，[55] 而社論中全篇隻字未提整風。但在社論的下一句話中，第一次提到國務院 7 月 26 日的決議。這個決議指示國家機關幹部要在參加反右鬥爭的同時繼續參加整風運動。不久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全部重點都放在了強調反右鬥爭上，周恩來也許想在國務院決定中，提出整風運動的重要性大於反右

鬥爭。8月16日社論認可了這個決定，但它仍避免了使用整風運動這個詞：

> 全體國家工作人員應該認識（反右）鬥爭的重大意義，認真執行國務院7月26日所通過的決議「把參加這一運動（整風）和鬥爭（反右）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義務和應有的責任」。[56]

彭真在8月中旬也開始促進妥協。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的邀請陸定一（站在劉少奇和彭真一邊）和康生（站在毛澤東的一邊）在5600名宣傳幹部參加的會議上講話，陸定一在8月16日講了關於反右鬥爭和整風運動問題。他雖然使用了一些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講話的語言，但是他把右派同蔣介石和汪精衛相提並論（想彭真一樣），卻幾乎根本就沒有提到整風運動（不管怎樣說，他演說的標題是把整風放在第二位的）。[57]康生8月17日講的是在這年下半年如何在全國高等學校中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他與陸定一正相反，多次提到整風運動，總把它放在比反右鬥爭優先的地位上。[58]

但是，在8月中旬出現了一個領導層和解的重要徵兆。《人民日報》8月16日社論指出，許多高等院校第一階段的反右鬥爭已經基本上告一段落。[59]用康生談到北京那些高等院校時的話說，，這顯然意味著「大規模的反右群眾鬥爭高潮過去了」。[60]也就是說，大學已被控制住，學生鬧事的危險亦已消除。這樣，中央領導層之間在緩和的氣氛中尋找著妥協。

9月初達成了這一和解，並由《人民日報》向全黨進行說明，以9月5日的社論開始。和解的實質，無論是真正的，還是名義上的，在社論第一句中便指明了。社論是這樣寫的：黨的整風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群眾鬥爭……現在正發展為全民整風運動。」[61]這就是說，整風運動和反右鬥爭要合併為一體。運動的目的一方面要使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的教育和改造，另一方面，要整頓黨的作風，消除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把宗派主義降至第三位，可能意味著對資產階級思想感情的關心的減少）。雖然社論承認這兩個問題（反右

鬥爭和整風運動）是不同的，但它又提到群眾辯論的方法對兩者都適用，並且它還抨擊那些擔心在農村和工廠實行大鳴大放的群眾路線的幹部。社論進一步清楚地指出，將不會讓5月所發生的批評者隨意批評，而黨不進行反擊的情況重演：

> 依靠群眾的力量和通過群眾的辯論解決問題，這當然不是說可以放棄領導，可以放棄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放棄勞動紀律和行政紀律。相反，辯論的目的正是為了加強領導，加強應有的集中和紀律，而不是為了削弱它們。[62]

報紙所傳遞的信息在第二天被重申了。這一天，報紙報道了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宣佈處決6月漢陽學生暴亂的首惡分子的消息。

然而，和解的實質是什麼呢？雖然劉少奇和彭真已明確地贊成繼續改正官僚主義濫用職權的行為，但是卻主張要在堅持黨的強有力的領導下繼續進行。並且，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已經或將要在整個社會各行各業中開展，這勢必意味著重新恢復黨的權威。不能肯定毛澤東是否願意在這些條件下開展整風運動，但毛澤東已挽回了面子，並且與他有分歧的人現在已經願意贊成他的青島發言。《人民日報》第一次引用了（雖然沒有明確註明出處）毛澤東青島發言所制定的總的政治目標；[63]幾乎可以肯定地講，這是這篇社論中最重要的一段，而且，在13年後它將出現在文化大革命後的國家憲法草案裏。[64]它在9月5日社論中的被引用是政治局分歧在癒合的重要標誌。

9月11日的社論重新轉到黨內右派這個問題上。這個問題在六個星期前似乎使彭真非常地氣憤。它提到《人民日報》7月28日的社論，並提出需要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實際上，它真正的意圖是重申毛澤東關於黨內右派比資產階級右派更危險的警告，防止出現在感情上對黨內右派的寬容態度。看來，這篇社論的目的所在是要表明領導層在黨內右派問題上現在已經統一認識了。

> 在黨中央肯定了右派的性質和對黨內右派分子同黨外右派分子採取一視同仁的方針以後，他們對於同黨外右派分子的政

> 治面貌完全相同的『黨員』，往往姑息寬容，不願意把這些人劃為右派分子。[65]

這篇社論被黨的組織部長安子文的一篇同樣主題的文章加強了。[66]安子文能夠寫這篇文章，說明了黨的官僚們現在已經站在了毛的一邊。而安子文的一些材料都是根據北京市委的調查寫的，這也表明，彭真現在正在配合反對黨內右派的鬥爭。

4 天之後，《人民日報》又轉到關於資產階級右派的反動本質問題的爭論中。報紙又一次提到之前的社論，這次是毛澤東在 7 月 1 日寫的那篇。[67]報紙又一次看起來只不過是再一次重申原來的論點，再次證明把右派的行為定性為反動的是正確的。之所以重新提出這個話題，社論給出的蹩腳的借口說，是因為有的人至今不明白。這篇社論的真正目的應該是要向黨的忠誠幹部們表明，毛澤東和彭真已經在這個問題上解決了他們的分歧。在社論的最後兩段仍然提到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但是沒有把他們與蔣介石聯繫在一起（也暗示他們不能被像彭真所做的那樣，與蔣介石聯繫起來）。不過，社論還談到：「當然，這些人裏也還會有同美蔣有組織聯繫的反革命分子，但是那樣就不只是資產階級右派，而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了」。[68]這也就是說彭真完全有把右派同國民黨相比較的自由，甚至可以發現他們之間確鑿的聯繫，但是，在那種情況下，那些人就不是右派了，而是特務。為了有助於解決分歧，社論在措辭上再一次作了一些變動。[69]社論在結束語中拒絕了彭真要嚴懲右派的要求，說：

> 最後，或許有人問：既然右派是反動派，為什麼一般地不這麼稱呼。並且一般地不辦罪？這是因為我們國家的鞏固程度足夠允許這樣做，而且這也給右派分子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70]

這裏重申了毛澤東在 7 月 1 日社論中的立場，除了一點對右派應寬容的理由，即很多右派都擔任重要的職務。對於這位主張平等的共產黨領導人來說，提出這個論點本來就有些站不住腳。毛澤東也許沒有需要太多的說服就刪除了這一觀點。

在文化大革命中披露出，當時規定（也許是毛下發的？）對右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劉少奇在 1962 年曾評論到：「這是正確的規定，但在實際執行上太寬容了。」[71] 這個評論表明，劉，像彭真一樣，對於被迫同意緩和反右運動而感到反感。

在三中全會召開前兩天，《人民日報》9 月 18 日發表了最後一篇有關的政治性社論。它旨在解釋為什麼在 1956 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很大成績之後，仍然需要在政治思想戰線進一步革命。[72] 它再次肯定對大多數右派不需要採取嚴厲措施的政策，並且提出，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要有 10 年至 15 年的時間，以此來證明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講的時間表的重要性。[73] 令人好奇的是，社論表明，在是否應該給右派戴上反動派帽子的問題上，在措辭上再一次作了折衷的處理。在社論第一段結尾把右派稱為「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74]，在社論的其它地方也都稱為「右派」或「資產階級右派」。在現有的毛澤東在青島發言的摘要中，毛澤東曾把右派稱作「資產階級反動右派」[75]。在鄧小平三中全會上關於整風的報告裏，他恰恰也把右派叫作「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僅提及一次）。[76] 劉少奇在紀念蘇聯社會主義革命 40 週年的講話中，也採用了同樣的說法（也只提及一次）。[77] 所以，看來形成了下面這樣的和解：資產階級右派的確是反動派，而且為了證明我們在這一問題上的一致，在講話中可以把他們叫做「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但僅說一次）；但是，我們必須採用的常用說法是「資產階級右派」，以此來表示我們不像對待其它反動派那樣不客氣地對待他們。

最後一篇向與會代表介紹情況的文章是在三中全會召開那天發表的安子文寫給會議代表的最後一篇重要的政治性文章，[78] 文章與黨的幹部政策有關，似乎試圖向黨員們保證他們的作用和安全。安子文否認了右派對共產黨以德取人而不是以才取人，過分強調政治資歷的批評。[79] 實際上，他在捍衛黨的幹部政策時其實預演了將在 1958 年反覆講的「紅」比「專」有更大的重要性的觀點。然而，有趣的是，安

子文在提到這一點時，引用了中國三位領導人的話：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80]這好像是說，在黨的幹部這個重要問題上，黨的領導人是步調一致的。這篇文章一定在三中全會的召開時，使與會代表們心裏感到更加踏實。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

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於9月20日在北京召開，會議歷時約三個星期。除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外，還有416名更低層的幹部參加了會議。這是截止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所召開的最長的一次會議。可以推斷，這表明會議所討論的問題的重要性。它也是文化大革命前規模最大的一次會議，這意味著黨的上層領導人已經消除了分歧，並希望向最廣泛的人群展示這一點。[81]

陳雲和周恩來都做了報告，在會議結束前兩天，毛澤東就八大決議的錯誤講了話，但主要的、也是唯一發表的會議報告是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82]它反映出兩個月以來達成的各種和解，毛澤東取得了許多表面上的勝利和兩個具體勝利——對右派的寬容政策和繼續開展的整風運動。而作為補償，劉少奇和彭真將黨從夏初所處的被動地位中擺脫出來，並重新恢復了它在政治上的領導作用。

鄧小平報告的題目，正與一個月前陸定一報告的題目相反，只提到整風運動而沒有提到反右鬥爭。這是劉少奇和彭真在語言上的讓步的反映。只要黨能夠恢復它的領導地位，二人就可以允許反右鬥爭在毛澤東倡導的整風運動的總的前提下進行。鄧小平強調說只要反右鬥爭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勝利結束，整風運動就一定要開展起來。[83]但是，重要的是反右鬥爭應優先於繼續整風。儘管鄧指出整個整風運動的勝利「不只決定於反右派的（第二）階段，而尤其決定於著重整改的第三階段和每個人研究文件、批評反省、提高自己的第四階段」，[84]但黨的幹部對在這種狀況下的整風運動則無需擔心。並且，鄧小平在提到整風時，在不同段落按不同順序列舉了「三害」。這種隨意的態度

表明，當整風重新開始時，不會像以前那樣目的堅定了。[85]關於鄧小平和劉少奇在八大會議的講話中明確顯示出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嚴重性的爭論，現在已經毫無意義了。領導人已一致同意這三種錯誤都要反對，但不再提出哪一點需要優先對待。

鄧小平重新肯定了在這幾個月裏採取的種種措施是正確的，把它們稱為「中央的方針」，這也許意味著這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妥協的產物。最後同意的措施是：反右鬥爭；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改造；城鄉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黨內外幹部中的整風運動；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與群眾充分地開誠佈公地進行的討論。[86]

可能正是基於毛澤東、劉少奇的妥協，鄧小平在自己的報告中才能夠贊同並加進了很多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的講話內容。鄧小平還在幾處重複了柯慶施一個月前的觀點，這表明這些觀點可能主要也是來自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的講話。

在鄧小平的報告開頭講到運動總的形勢時，對毛澤東在青島會議的講話中的估計和政策意見給予很高的評價。[87]接著，鄧小平用毛澤東的話說明反右派運動的重要性，[88]他宣稱，只有黨能夠取得政治思想戰線上大辯論的勝利，才有可能繼續前進。[89]鄧小平認為整風運動和反右鬥爭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矛盾。他又引用毛澤東的話，把人民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的矛盾看成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90]

鄧小平繼續講到，要區別人民中的不同類型的人，並採取不同的整風方法：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必須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對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則是整頓作風的問題。[91]整風運動的目的是「把鬥爭方向引導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點，團結廣大群眾，孤立和分化資產階級右派和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92]。對敵人一定要進行堅決鬥爭，但在人民內部主要用說服教育的辦法。[93]

正是在時鄧小平明確地指出，運動的發展在過去的4個月裏，是完全符合中央和毛澤東的估計的。這很可能表明，所有鄧講話中在此之前的分析（也是以對毛青島發言的肯定而開始的）其實代表了一個與毛七月份的評價相近的分析。這裏還有一個證據可用來說明這點。鄧小平對這點的大部分分析雖不能直接跟毛澤東的講話聯繫在一起，但是卻與柯慶施一個月前所作的分析有很大的相同之處。[94]然而在方法問題上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區別。柯慶施主張在反右鬥爭和整風運動中，都應採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95]鄧小平接受了他的關於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但是在對待敵人方面鄧小平談到應採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96]這個差別可能反映出毛澤東在如何進行反右鬥爭上的讓步。

在鄧小平報告的第二部分關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問題上，他又在一些部分依照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的估計。這暗示著，整個這部分很可能都是受到毛澤東的影響。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認為大部分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不願意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只有取得了反右鬥爭的決定性勝利，才能使中間分子和右派中的一部分轉到無產階級這邊來。[97]在9月下旬，鄧小平便能宣佈在許多地方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並且預言，現階段的反右鬥爭將發展成為運動的第三階段，重新整風。[98]後來，毛澤東在11月17日對在莫斯科學習的中國留學生講話時肯定了這個評價；他說已經取得了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勝利，右派已經被「打垮了」。[99]

儘管宣佈取得了這些勝利，但當鄧小平在9月下旬講到勝利具體意味著什麼時，也像毛澤東兩個月前那樣謹慎。毛澤東曾說過戰勝右派和爭取中間分子的鬥爭也許還要10年到15年。[100]儘管右派被「打垮」了，鄧小平的報告卻表明，他，或許還有毛澤東在9月份仍堅持這一評價：

> 當我們說反右運動到達了一個階段的時候，我們的意思是所有的右派都已經被揭露、批判、和孤立了，並且大部分右派

> 已經被迫使在群眾面前低頭認罪。我們並不是說對右派的審查和認罪已經完全結束。會有一部分右派不知悔改，帶著他們的反動觀點進棺墳墓。[101] 大部分右派也不會在短期內改變他們自己。但是，只要他們和群眾隔絕，我們的鬥爭就成功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可能還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102]

鑒於這個長遠預見，並不奇怪，鄧小平必然也要像毛澤東那樣認為極其重要的是無產階級需要在各方面培養出自己的知識分子。[103] 但是鄧小平也一樣感到（想必毛也同意這一點），要實現這個任務，老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必不可少的：

> 工人階級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的計劃，必須把他們包括在內，必須看到，他們是國家的重要財富，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建設，新生力量的培養，都需要他們努力。因此要大力團結、爭取和教育他們，糾正他們的錯誤觀點，幫助他們實行自我改造，用妥善的而不是粗暴的方法使他們逐步脫離中間狀態，站到工人階級方面來。……
>
> 我們必須同他們多談話，多交朋友，傾聽他們對工作的建議，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中的困難。過去我們在這些方面的缺點必須克服。知識分子在鳴放期間所提的意見絕大部分是正確的，應該認真研究處理。
>
> 在學術文化工作中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必須採取一系列具體措施加以貫徹。當然，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方針，實行這個方針必須按照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六條標準，為了繁榮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學術文化。[104]

鄧小平確信，統一戰線，也就是政治界的「百花齊放」，仍然是存在的的，如果它符合這些性質：

> 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需要一個新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統一戰線，應該在六條標準的基礎上在各黨派之間貫徹執行長

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認為各民主黨派再無作用的意見是錯誤的。[105]（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所有這些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前 18 個月的「自由政策」，事實上，鄧小平試圖在說：整風運動已死，整風運動萬歲！但是，反右鬥爭（和六條標準的公式）使得毛澤東的政策幾乎不可能像當初預想的那樣在實際上得到執行。[106] 毛澤東的大膽試驗到此結束了。

結論

毛在自由化方面試驗的失敗，是對這位主席的聲望和權威的巨大打擊。他使黨遭受了無禮的對待，引起了一些高級同事的反感，也損害了他自己的信譽。雖然他正確地認識到了改善黨和人民關係的必要，但他嚴重地低估了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怨恨。這是毛在其政權建立後犯的第一個大錯，並且他的失算可以十分簡單地解釋為：因為事先沒有讓不同意見發表出來，因此，毛無法知道人們真實的想法。

毛關於通過整風對黨員行為產生長期影響的設想，是不切合實際的。正如鄧小平在八大講話中所透露的那樣，毛和他的支持者們清楚地意識到，正是執政黨的地位導致了幹部的官僚作風和宗派行為。因此，只有通過改變黨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才能改造幹部的行為。這一點毛在 1957 年是不願意實行的。一方面是因為他一生所相信的黨的領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是因為他那時的黨所締造的新社會總體感到滿意。只是當他在 60 年代中期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發展完全失去信心時，他才願意打擊黨的本身，而不僅僅打擊犯錯誤的幹部。並且，他用自己在 1957 年同意壓制的同一部分人——學生——來當先鋒隊。

所有政治局成員都一致認為，中共中央在國家和社會中的領導地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種觀點上的一致，使 1957 年秋天的妥協成為可能。政治局的長期團結傳統，也一定起了重要的作用。1957 年仲夏，蘇共清洗「反黨集團」的運動，成了一個對不進行遏制的黨內鬥爭所可能帶來的危險的明確而適時的暗示。如同劉少奇 1957 年 12 月同一些印度共產黨人的談話中所說的：

> 不管黨的路線是正確還是錯誤的，黨都必須維護自己的統一……對革命來說，黨的分裂比失敗破壞性還大，所以人們必須忍耐，甚至忍受痛苦……我們黨始終維護自己的統一，一直沒有分裂，黨的紀律一直被執行；沒有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1]

到此時，劉已經可以顯得寬宏大量。第二個月，毛就對幹部透露說，他將在 1959 年他的國家主席任期滿時不再擔任此職。這個決定很可能是在三中全會前後做出的。這也許是說明毛為何能取得劉對他青島講話支持的另一個理由。[2] 作為中共中央的第二號人物，劉明顯地有著最大的可能性作毛的繼承人，並且私下也許得到過毛的支持。毛決定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幾乎肯定是他逐步從權力第一線退下來的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消息公佈的時機是在毛退下來一年多以前，在他整風受到挫折幾個月之後，這很可能被幹部們認為是主席一種含蓄的自我批評的。

劉在權利等級上的地位又由於周恩來總理在 1958 年 2 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辭去外長的兼職而更加提高了。因為周此後仍像過去一樣關注外事，那麼這次辭職無疑是被迫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他在整風運動中作用的象徵性的批評。雖然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周的地位也因經濟狀況不佳而受到損害。

毫不奇怪的是，毛甚至在打擊地位較低的反對者時，也處於軟弱的地位。鄧拓在夏天被解除了《人民日報》主編的職務，但他仍像以前一樣繼續主管此報。廣東第一書記陶鑄在 1957 年 8 月辭去他所兼的省長職務，也可能是在毛的堅持下作出的。他是 6 個兼雙職的省級官員此時被解除一職的唯一一人。[3] 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透露，1957 年又重新調查了陶鑄同高崗的聯繫。為了說明自己的清白，陶不得不做了兩個聲明。[4] 有可能毛為打擊陶支持劉和彭真而企圖給他加上一個很重的罪名。如果是這樣的話，這顯然是不成功的，因為陶直到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才被打倒。[5]

毛劉經濟上的聯盟

毛和劉1957年秋的妥協也存在有關經濟的一方面。在開始時，即在蘇共二十大前，毛決定實行自由化是為了調動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給予熱情的支持，以加快經濟發展。但經濟變得過熱——投資增長60%造成了「強烈的通貨膨脹的壓力、供應困難和嚴重的消費品短缺」——[6]導致1956年的「冒進」被取消了。但經濟形勢繼續惡化，部分是由於1956年的嚴重自然災害和1957年稍微減輕的災害，部分地是由於1956年冒進的持續影響。在1957年仲夏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決定把投資比前一年下降20%，1956年的財政赤字將通過年支出減少4%和收入增加2%來消除，[7]到了夏末，報紙開始談論嚴重的糧食供應危機。雖然第一個計劃的各項指標都已超額完成，但經濟仍處於不佳的境地。

過錯不完全在計劃制定者，但他們是明顯的替罪羊。他們堅持遏制1956年的躍進，但那以後的12個月中，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了。不光計劃制定者被問罪，他們在其中工作的體制也成了問題。在中國人口和資源結構完全不同於蘇聯的情況下，中國人全盤採取蘇聯的發展戰略是正確的嗎？毛在他的《論十大關係》中暗示了他對蘇聯體制許多方面的不滿。1957年中，劉少奇指出，他也深深地懷疑蘇聯發展方法，甚至於它在蘇聯本國的運用。同黨校校長討論分配問題時，他說：

> 同這些問題相聯繫，人們從蘇聯教科書中學不到任何東西，我們必須調查、總結我們自己的經驗，在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我們也必須特別強調一個問題，那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是計劃經濟，同時它又是多方面的、靈活的。在這方面，蘇聯的經驗是沒有價值的。他們只有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方面，只完善計劃經濟，是僵化死板的，不是多方面、靈活的。一位負責經濟部門的蘇聯同志告訴我：「實行計劃經濟使蘇聯付出的代價太大。計劃減少了經濟的活力，導致經濟生活的

死板。」當蘇聯同志到資本主義國家或到中國，看到人們可以買到任何東西時，他們很感興趣。[8]

由於 1957 年秋的兩個其他因素，對蘇聯發展模式的不滿無疑地增長了。中國領導人一定會已經清楚很久，蘇聯不能以中期貿易信貸的形式提供給中國大量的經濟援助，而這正是第二個五年計劃所將需要的。蘇聯迫於東歐的動盪形勢，把大約 10 億美元以短期貸款形式轉給像匈牙利、波蘭這樣的國家。這是 1957 年 9 月促使蘇聯放棄第六個五年計劃的一個主要因素。[9] 這也促使中國人在 1958 年掀起「大躍進」運動時決定完全放棄蘇聯式計劃。

放棄蘇聯模式的另一個因素是「反叛信號」，即學生和知識分子對毛號召批評的反應非常強烈，並常是帶反黨性質的。1956 年 1 月後，知識分子曾被重視，因為他們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力量。但如果他們中這樣一大批人感到不滿 (1959 年建國 10 週年大慶大赦中給 2.6 萬人摘掉右派帽子，毛 1958 年 4 月講總數 30 萬人，[10] 在文化大革命中陳毅說 1957 年定了 40 萬右派)，[11] 那麼，把國家經濟的未來放在這些人的技能上就極端危險。但沒有忠實的知識分子，蘇聯經濟模式的沉重的上層建築能維持得了嗎？況且，蘇聯人不也認為他們的經濟體制甚至還不適於他們自己嗎？1957 年 5 月赫魯曉夫進行了急劇的改革，包括撤銷 25 個中央經濟部門，把它們的權力交給稱為 sovnarkhozy[12] 的新的區域性經濟委員會。

所有這些因素——經濟不景氣、對蘇聯模式幻想的破滅、暗淡的獲援前景、對技術官員的不信任、蘇聯經濟改革——這一切都使計劃制定者處於防禦地位，也使毛和劉聯合起來。1956 年，兩人都贊成加快經濟發展，都對《農業十二年發展綱要》深信不疑。1957 年秋，當農業的停滯成為國家最大的經濟問題時，他們堅持主張恢復「十二年綱要」，作為發動新的躍進的信號。在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宣稱：「只有通過生產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加來顯示合作化的巨大優越性，才能取得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的可靠保證。」[13] 接著，他又

重新介紹《農業十二年發展綱要》，認為這個綱要鼓舞了農民，發揮了有益的作用。中共中央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修改了這個綱要，並要求全會批准它。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辯論後，將要把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十二年綱要的農業生產問題上，以帶來當年冬季農村生產和建設的高潮。接著，中共中央將再次修改這個綱要，並將在年底黨的大會上討論後[14]交國務院，最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頒布。然而，綱要只有在同保守主義進行鬥爭後才能通過。「1956 年生產高漲的巨大成就必須肯定下來」。[15]全會結束一個星期後，譚震林（他像鄧小平一樣，也是 30 年代毛澤東「集團」的一個成員）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關於十二年綱要的報告。正如兩年前的合作化運動時一樣，在這個關鍵的節骨眼上，毛轉向了一個他認為肯定能依靠的人。

不可避免地，毛和劉企圖發動第二個躍進的決心嚴重影響了周恩來和計劃制定者們的地位。周恩來這一年來都不安地明白：他對 1956 年冒進的反對，即使在整風運動中毛重用過他的情況下，也使自己同毛的關係變得緊張了起來[16]。大概就在此時，他對自己一年前攻擊急躁冒進作了自我批評。周在整風和經濟兩方面都處於不利地位。這肯定是為什麼他會以被撤銷外交部長的職務而丟面子。大躍進開始時，周和他的主要經濟計劃制定者陳雲[17]退到了後面，他倆在三中全會上的報告沒有發表。

打擊的不僅是他倆的威望。整個中央經濟機構因為毛和劉受赫魯曉夫榜樣的鼓勵，推行他們的下放權力計劃而吃到了苦頭[18]。1958 年 5 月，兩個計劃制定者李富春和李先念被選進書記處。很明顯，從那時起，任何中央經濟計劃都將通過黨的機構進行，而不是通過政府機構，[19]中國開始放棄了蘇聯模式。

中蘇關係

1957 年秋，蘇聯人幾乎還不會意識到中國人已放棄了蘇聯的發展戰略。毛和劉在那時也應該並不清楚他們正在做這件事。他們僅僅在

開始制定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於赫魯曉夫來說，很清楚和使他高興的是，毛已停止了他的整風運動。這已經造成了中蘇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因為，雖然蘇駐華大使尤金曾告訴周恩來，他的國家也有人民內部的矛盾存在，[20] 但後來赫魯曉夫明確地否定了這種異端邪說。[21] 由於整風的取消，毛的內部矛盾思想就不再具短期實踐意義，甚至在一段時間裏幾乎被遺忘了。這樣一來，中蘇思想分歧暫時被彌合了。

然而，赫魯曉夫如果沒有對毛澤東整風運動慘敗而感到幸災樂禍，他就不是正常人了。他應該被中國人的自信態度激怒了。中國人在共產主義集團為非穩定化下了定論，鼓勵波蘭要求更大的獨立性，並創造了一個吸引東歐知識分子的「自由」共產主義模式。[22] 但現在百花已經凋謝，毛不再能夠容忍波蘭不肯承認蘇聯在共產主義集團中領導地位的行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對自己關於矛盾的講話在華沙被洩露而生氣，但主要是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

中國已經對能夠通過和國民黨建立新的統一戰線來收復台灣的設想失望了。甚至在反右運動前，北京就一定很清楚，蔣介石將不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示好有所反應。反右運動開始後，向國民黨呼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重新合作的觀點便是無的放矢了。在日內瓦與美國人的會談也沒有能夠幫助解決台灣問題。中國人已得到美國的同意，允許中國公民在他們要求時回到中國。但所有試圖說服國務卿杜勒斯同意雙方放棄使用武力的建議都遇到了相反要求，即中國不能在台灣地區使用武力。[23] 1957 年 5 月，美國人和國民黨簽訂了一個協定，規定允許在台灣安置美國鬥牛士地對地導彈，這種導彈能把核彈頭打入中國大陸幾百英里遠的地方。這個協定似乎是在東亞地區用更現代武器全面加強美國力量的一個部分。1957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講話中，周感歎在韓國也在進行著類似的發展。6 月 28 日，杜勒斯在一個關於中國政策的重要演講中，重新肯定了他的強硬路線：不承認中國，不同中國搞貿易，繼續反對中國在聯合國擁有席位。受中國國內批評共

產黨浪潮的影響，他確信共產主義在中國只是暫時的。[24] 到 1957 年仲夏，很明顯，北京對美國和台灣的緩和路線失敗了。

鑒於這些情況，中國領導人一定極大地受到蘇聯火箭技術巨大進步消息的鼓舞。8 月 26 日塔斯社宣佈，蘇聯第一個洲際導彈試驗成功。6 周後的 10 月 4 日，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一個月後的 11 月 3 日，第二顆人造地球衛星又發射了，這顆衛星上面帶了一隻狗。美國接到這個消息後非常震驚。因為它表明，蘇聯在火箭技術上先進得多。中國人則很吃驚但很高興。[25]

毛在第二顆衛星發射的前一天到達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 40 週年紀念活動。他對蘇聯導彈優勢的重要意義的估計被證實了。他形象地稱之為東風壓倒西風。[26] 他號召對西方採取更強硬的路線，也不再打算容忍共產主義陣營內的不團結現象了。吃驚的波蘭人被要求同大夥一致。現在毛強調的是紀律而不是自由，強調目的一致而不強調個人心情舒暢。同國內政策一樣，在外交政策上主席也改變了路線。[27]

毛在國內外兩方面都具有的新的戰鬥精神，使 1957 年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在百花方針的樂觀態度和幻想破滅後，毛在下一個十年裏日益關注的問題出現了：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性質、共產黨的作用、經濟發展的步子、蘇聯模式妥當與否、他本人地位的含糊不清。接下來將要發生的是大躍進的狂熱和沮喪、三年困難時期、中蘇論戰（在這期間，中國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被尖銳化了）。這些將是本書第二卷研究的問題。在第三卷中，我試圖說明：所有這一切的發展，是如何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的。

註釋

導言

【1】 參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 13 頁；此講話發生於 1957 年，1965 年公開發表。
【2】 詳見麥克法夸爾：《在共產黨中國和不發達的亞洲國家中領導人的內聚力》，引自《分裂的世界中的新國家》，第 222 ～ 235 頁。
【3】 斯諾：《紅星照耀下的中國》，第 125 ～ 180 頁。
【4】 《毛澤東選集》（下稱《毛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或是《毛澤東選集》英譯本（北京：外文出版社，第 1、2、3 卷，1965 年版；第 4 卷，1961 年版）。以上是毛 1949 年以前的文章的主要資料來源。本文引用的毛 1949 年以後文章的重要資料來源請參見著作目錄註釋。
【5】 施拉姆：《毛澤東》（1967 年修訂本），《毛澤東的政治思想》（1967 年修訂本），陳志讓：《毛和中國革命》；蕭瑜：《我和毛澤東曾是乞丐》；米歇爾·奧克林伯格：《1949-1968 年毛澤東的政策》，引自《比較政治》，1971 年 4 月。
【6】 參見羅和伊文斯：《逃出紅色中國》，第 135 ～ 137 頁；周恩來：《偉大的十年》，第 81 頁。
【7】 斯諾：《紅星照耀下的中國》，第 84 頁。
【8】 參見陳志讓：《毛和中國革命》，第 340 頁。
【9】 1970 年底在和埃德加·斯諾的會談中，毛把自己形容為「一個撐著破傘在世間行走的孤僧」（出版者註：毛用的是一句中國的歇後語“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但斯諾沒能把其準確地譯為英文。），並要求僅把他稱作一個導師；參見斯諾：《和毛澤東會談》，載 1971 年 4 月 30 日《生活》第 46 ～ 48 頁。
【10】 斯諾：《今日紅色中國：大河彼岸》，第 165 頁。
【11】 首次講話（7 月 7 日）參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118 頁。（這本資料的第 109 頁，日期錯寫為 7 月 8 日；確切的日期參見上文第 281 ～ 282 頁），後一次講話（7 月下旬）參見《1957 年夏季的形勢》，引自《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 4 月未註明出版者）；另見《當代背景》861 號，第 25 頁。
【12】 引自斯圖爾特·R·施拉姆：《毛澤東和劉少奇，1939-1969 年》，載《亞洲概覽》1972 年 4 月，第 278 頁。
【13】 同上。
【14】 《鄧小平的交待》（廣東省上山下鄉「打虎」青年戰鬥隊重印，未註明出版日期），第 6 頁。（這一資料由華盛頓中國研究資料中心複製，歸入文化大革命縮微資料第 10 類，第 1 卷，第 1 部分。）
【15】 參見張國燾為聯合研究院出版的 3 卷本的《劉選》作的序言。每卷的第一部分。
【16】 例如他對地質學院學生的講話。同上，第 2 卷，第 423 頁。
【17】 《劉少奇 1899-1967 年生平大事記》，載《當代背景》834 號，第 23 頁。
【18】 斯諾：《今日紅色中國：大河彼岸》，第 336 頁。
【19】 參見《「狂熱」的新時代》，引自《中國大陸雜誌選》603 號，第 28 頁。
【20】 毛劉聯盟的形成和發展歷史依然是一個謎。根據一個資料，在遵義會議的爭論中，劉是站在毛一邊的（第 8 頁、第 140 頁），只是理由不盡相同（郭華倫：《中共史論》，第 3 卷，第 17 頁）。根據同一資料，在 1937 年 5 月中國共產黨全國

代表會議上，劉少奇在報告中激烈地批評了前 16 年黨的領導。他是在毛的鼓勵下發表這一報告的，雖然這一報告最後被否決了，但毛使劉得以免於貶黜（同上，第 251—261 頁）。根據張國燾的回憶，1937 年 6 月劉曾寫信給黨的領導人，批評前 16 年的政策。雖然這封信沒有提到毛的名字，但批評了他曾擁護過的政策。當毛通過調解人發現劉少奇沒有與張國燾聯名寫信來撵走自己而擁護張國燾時，毛決定盡力與劉少奇交往，使他進入政治局，作為反對別的政治局委員的同盟者（《劉少奇選集，1945-1957》，第 6 ～ 8 頁）。

這些事情在文革中沒有被過多揭露，但有人指控劉 1937 年 3 月 4 日寫信給中央，誣蔑毛而讚揚王明——毛的一個受過蘇聯訓練的對手。這份資料說劉出席了 1937 年 5 月的全國代表會議和 8 月的政治局會議（《劉少奇 1899-1967 年生平大事記》，《當代背景》834 號，第 4 ～ 5 頁。）

【21】 康普頓：《毛的中國：黨的整風文獻》，第 9 ～ 10 頁。

【22】 引自《中國大陸雜誌》603 號，第 28 頁。在文中，劉少奇對革命理論的貢獻得到了承認。雖然攻擊劉少奇的作者是一個職位低的黨員，但他所稱讚的劉在組織和理論上的貢獻應該是反映了目前中共的一般說法。

【23】 《打倒三反分子劉賓雁》，引自 1967 年 5 月 29 日《飛鳴鏑》。見《中國大陸雜誌選》209 號，第 32 頁。

【24】 劉的一個兄弟（他可能知道劉的想法）曾說：「劉少奇是從蘇聯馬列主義學院畢業的。是劉少奇把他的位置給了毛主席；第一個被選的是劉少奇。」（參見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小報：《紅旗》1967 年 2 月 10 日第 6 頁，第 1 欄）在劉的兄弟的後一句話的第二部分的意思裏並沒有清楚地說明：是劉少奇組織籌劃了毛第一次被選為黨主席的選舉（在七大？——在這以前毛澤東可能僅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還是劉在某次選舉中擊敗了毛。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916 號第 6 頁中從另一種紅衛兵資料中翻譯的同一篇文章中，這句話是這樣寫的：「劉少奇是有可能贏得了第一次選舉的。」而《紅旗》的原文則為：「本來都一致選舉劉少奇的。」

【25】 參見《亞洲概覽》1972 年 4 月，第 279 頁上施拉姆的文章。

【26】 《劉少奇三次奪取我國新聞界權力的反革命滔天罪行》，1967 年 5 月 11 日《人大三紅》，《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201 號，第 26 頁。

【27】 參見施拉姆上述引文，第 279 ～ 280 頁，劉對毛的第一次頌揚是 1943 年 7 月。

【28】 《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選編》（《中國大陸雜誌選》651 號，第 20 頁）。

【29】 施拉姆上引書第 280 頁。

【30】 劉的交待包括在《劉少奇選集，1958-1967 年》，第 351 ～ 377 頁。

【31】 周恩來（以及別的中共領導人）的生平詳見科林和克拉克的《中國共產黨傳記詞典，1921-1965 年》。另可見許芥煜：《周恩來：中國的卓越人物》；湯姆斯・W・魯濱遜：《周恩來與毛澤東、林彪政治風格之比較》（聖莫尼卡，蘭德公司，P.4474，1970 年 10 月）。

【32】 這個重建是基於以下對遵義會議的回憶（作者之間有分歧）：見郭華倫上引書第 3 卷，第 16 ～ 27 頁。陳志讓：《遵義會議的決議》，載《中國季刊》1969 年 10-11 月，第 1 ～ 38 頁；迪特爾・海因茨格：《論奧托・布勞恩和遵義會議》，同上，1970 年 4-6 月，第 131 ～ 135 頁。

【33】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周恩來都如此承認。林的講話在奧克森伯格《比較政治》1971 年 4 月，第 347 頁中被引用；周的講話參見《周總理接見工交、財貿、農林戰線和國家直屬機關代表的講話》，1968 年 2 月 2 日（未註明出版者）。

【34】 赫米耳・歐利沃曾向我指出，勞德・切斯特菲爾德說過：外柔內剛這句話可能很適合周恩來。

【35】 更詳細的研究參見麥克法夸爾：《共產黨中國二十年：一個週期》，載《中國季刊》1969 年 7-9 月，第 55 ～ 63 頁。

第一編 根本變化

第一章 社會主義「高潮」

【1】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中共中央辦公廳編輯；序言英譯文載《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17 ～ 119 頁，這段話在第 118 頁。

【2】 3 卷本，共計 178 篇文章，1360 頁，90 萬字。為了普及，出版了 27 萬字的節略本，並出版了 505 頁的英譯本。毛在六中全會上說：10 月份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選出 1200 篇文章，他自己閉門讀了 11 天，共讀了其中的 120 篇。(《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1969 年)) 第 20 頁；這個講話註明的日期是 9 月，但這個講話是全會的總結，而全會是在 10 月 4-11 日舉行的，因此正確的日期大約是 10 月 11 日。

【3】 官方翻譯毛的講話題為《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收入《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94 ～ 105 頁。這個引語在第 94 頁。

【4】 土地改革之後，中國共產黨通過三個階段走向合作化，第一階段是互助組，分臨時和常年；這一名稱顯示，在互助中的農民主要是在農忙時互相幫忙。在許多地區，這種互助組只是把幾個世紀以來農民經常的活動方式固定化。第二階段是半社會主義階段或農業合作社的初級階段。初級社是完全的集體化組織，土地、農具、勞動力安排都是集中經營管理。但是農民的報酬不僅取決於所付出勞動，而且取決於所貢獻土地數量。第三階段是完全的社會主義階段，或高級農業合作社階段（我稱之為合作社），土地分紅（即集體付給農民的地租，這顯然對比較富裕的農民有利）被取消。關於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農業合作化的各種形式的不同之處，參見趙國春《中國共產黨的農業政策》一書中的一覽表。更詳盡的論述和表格，參見肯尼思・K・沃克：《中國農業規劃：社會主義成份和私有成份：1956-1962 年》，第 3 ～ 19 頁。

【5】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95 ～ 96 頁。

【6】 《當代背景》373 號，第 23 頁。

【7】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18 頁。

【8】 伯恩斯坦：《蘇聯 1929-1930 年和中國 1955-1956 年集體化運動中領導者和群眾動機之比較》，載《中國季刊》，1967 年 7-9 月，第 47 頁。在蘇聯，危機形勢變得非常嚴峻，以至於斯大林不得不讓他的集體化倒退。在十年內才完成農業集體化（參見范索德：《如何統治俄國》，第 531 頁）

【9】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節略英譯本），第 159 ～ 160 頁。

【10】 1 月 25 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6 年 1 月 26 日《人民日報》）。

【11】 他對中共中央的報告（《人民中國》1956 年第 4 期增刊，第 12 頁）。據 1956 年《人民手冊》中譯本記載，周的說明贏得了長時間的暴風雨般的掌聲。

【12】 土改的情況參見克魯克：《一個中國村莊——十里店的變革》；韓丁：《翻身》。這兩本書都是基於第一手的見聞；它們記載了人民共和國誕生前，40 年代後期共產黨控制地區的土改。1949 年以后土改計劃的實施情況參見趙國春上引書第 94—146 頁。

【13】 「三反」「五反」的簡況參見附錄 5，另可參見鮑大可：《共產黨中國：初創時代 1949-1955 年》，第 125 ～ 171 頁；陳錫恩:《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第 1 ～ 71 頁。

【14】 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會議上關於「一五」計劃的說明，譯文見《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2 ～ 91 頁。

【15】 憲法的譯文見唐：《今日共產黨中國》第 2 卷，第 90 ～ 110 頁。

【16】 《徹底揭露劉少奇在政法工作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政法公社》，1967 年 4 月 16 日；《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68 年春，第 70 頁。

【17】 毛在 1955 年 7 月 31 日講話中談論了吸取蘇聯教訓的問題。（參見《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01 ～ 103 頁）
【18】 同上，第 103 頁。
【19】 伯恩斯坦已經證明早在普遍合作化之前的 1954 年，政權通過統購統銷的政策，對餘糧實現了嚴密的控制。但是，他所引證的 1955 年 6 月 26 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顯示，在管理個體農戶方面存在著巨大的行政上的問題。社論說：「徹底地調查清楚全國一億農戶的糧食產量、消費和餘糧的貯存是一項很複雜和困難的任務。」顯然 100 萬個合作社將比較容易管理。參見《在不安和被剝奪情況下幹部和農民的態度：1955 年春的糧食供應危機》，引自鮑大可主編：《實踐中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引文見第 371 頁。
【20】 參見沃克：《回顧合作化：1955 年秋 1956 年春的糧食供應危機》，載《中國季刊》，第 26 期，第 22 ～ 26 頁。
【21】 10 月 4 日陳伯達為政治局起草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決議草案的說明（《人民手冊》，1956 年，第 92 頁）。他與毛的關係見下面第 25 條注釋。
【22】 參見注釋第 4 條關於合作化發展階段的簡要敘述。
【23】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20 頁。
【24】 沃克：《中國的農業規劃》，第 12 頁。
【25】 參見《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 1 卷中他們的傳記第 77 和 95 條；另見《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 1 卷第 80 和 104 條。關於 30 年代初陳正人和毛在江西蘇維埃時的關係，參見郭華倫上引書，第 2 卷，第 43 條。陳伯達 30 年代後期在延安成為毛的政治秘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他成為第四號人物時，他對毛的重要作用就顯示出來了。本書下文將顯示，這兩人在本書所涉及的時期內，給毛以巨大幫助。
【26】 毛在 7 月 35 日做了關於合作化的講話。陳伯達在 7 月成為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在 6 月成為副部長。但這二人在這一部門發揮了多大作用尚不清楚。有意思的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不是農村工作部編輯的，而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編輯的。
【27】 基本完成半社會主義的農業合作化的日程定在 1958 年春，而毛的原訂目標是 1960 年。這一目標和別的目標一樣，迅速地被「高潮」突破（這個決議草案參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151 號，第 9 ～ 23 頁）。
【28】 引自《毛主席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以來的關於文藝的重要指示》，1967 年 5 月 30 日，《文藝紅旗》第 5 期（《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00 號，第 16 頁）。
【29】 引自《徹底清算中國的赫魯曉夫和同夥破壞農業機械化的嚴重罪行》，《農業機械技術》第 5 期，1967 年 8 月 8 日（《中國大陸雜志選》610 號，第 18 頁）。
【30】 在「文革」期間他為此作了兩次自我批評；參見《劉少奇選集，1958-1967》，第 360 和 366 頁。劉在自我批評中承認農業合作社被削減 20 萬個，但根據毛 1955 年 7 月 31 日的講話（《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95 頁），實際數字是 2 萬個。公佈劉自我批評的人兩次犯同一個錯誤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不是毛分子把數字故意擴大 10 倍，以誇大劉錯誤的嚴重性，就是劉的記憶誤差，或者就是他故意說錯，希望人們不把他這篇自我批評當真。在他的兩次坦白中，他認為他的錯誤是一個疏忽——沒有批評鄧子恢的建議——而不是失誤。無論是哪一種解釋，毛主義者還是十分得意利用那個錯誤的數字，並登在 1967 年 11 月 23 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的題為《中國農村的兩條道路鬥爭》的社論中（參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68 號，第 6 頁）。
【31】 沃克：《中國農業規劃》第 9 頁。
【32】 張書成（音）:《中國共產黨決策的方式和程序，1955-1962 年：三個案例的研究》第 2 章。
【33】 這一時期鄧的態度見同上出處。關於毛對鄧的批評參見《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1969 年），第 21 頁。
【34】 1956 年 6 月 26 日《人民日報》所列出席最高國務會議的名單中沒有包括鄧子恢。

【35】 鄧子恢在八大上的講話譯文，見《當代背景》421 號，第 1 ～ 9 頁。他的自我批評在第 3 頁。鄧本來早應該在全國先進工作者大會上和人民代表大會上做自我批評，但他在這兩次會上都只提到反對右傾保守主義鬥爭的成功，並沒有確認他自己的偏差。也許他僅僅願意在黨內會議上做自我批評（參見新華社 1957 年 5 月 7 日電，《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86 號，第 7 ～ 10 頁；他 5 月講話的不同譯本見 1957 年 5 月 8 日《人民日報》。他在人大會議的講話見《當代背景》393 號，第 22 ～ 30 頁）。

【36】 鄧子恢 30 年代初在江西蘇維埃時期與毛的緊密關係參見郭華倫上引書第 2 卷，第 486 ～ 493 頁。肖祚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權力關係，1930-1934 年》，第 231 ～ 233 頁，第 242 ～ 243 頁。陳志讓:《毛和中國革命》第 178 頁；約翰·E·魯：《處在反對派地位的毛澤東，1927-1935 年》，第 259 頁。這些著作記載了 1933 年對「羅明路線」的批評是如何被用來反對毛的支持者的，而鄧子恢是其中受害者之一。在魯著作的第 249 頁寫到鄧子恢是「毛的一位老朋友」。當六中全會批評鄧時，毛仍承認他長期以來的工作成績〔參見《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1969）第 21 頁〕。值得補充的是，雖然鄧在大躍進時期對農村政策明顯地堅持保守立場，但他依然倖免於「文革」之害，再次當選為九大中央委員。

【37】 《人民手冊》，1952 年，第 104 頁。

【38】 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507 號，第 11 頁。

【39】 《人民手冊》，1956 年，第 104 ～ 106 頁。

【40】 陳叔通講話出處同上，第 106 ～ 109 頁；在第 108 頁上提及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

【41】 同上，第 105 頁。

【42】 同上，第 109 頁。

【43】 《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附錄，192 號，第 7 ～ 12 頁。

【44】 黨的總書記鄧小平在 1956 年 9 月八大關於新黨章的報告中列舉了一系列會議，其中也提到這次會議（參見《當代背景》417 號，第 14 頁）。

【45】 引自《資本主義經濟的辯護士——徹底清算中國的赫魯曉夫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上的階級投降主義》，1967 年 7 月 21 日《光明日報》（《當代背景》836 號，第 34 頁）。這一講話的準確日期來自《光明日報》的另一段引語，該引語出現在《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劉少奇的黑語錄》中，1967 年 4 月 16 日《進軍報》（《聯合出版研究中心》41889 號，1967 年 7 月 19 日，第 55 頁）。

【46】 引自《劉少奇的反動言論》（北京：批判劉少奇聯絡站「紅旗公社」，北京鐵道研究院「紅代會」1967 年 8 月），（《中國大陸雜志選》，附錄 25 號，第 6 頁）。

【47】 1948-1949 年的淮海戰役是中國內戰的幾次決定性戰役之一。參見查辛：《共產黨征服中國》，第 192 ～ 199 頁。多少世紀以來，當中國被分裂為敵對的南北兩方時，淮河流域都曾是重要征戰之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要地》，第 104 ～ 107 頁。

【48】 引自《在對資改造中劉少奇在人民商場推行投降主義路線》（天津：天津市人民商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和河北財經學院劉少奇罪行的「東方紅」調查小組，1967 年 6 月），（《中國大陸雜志選》，619 號，第 66 頁）。

【49】 引自《徹底摧毀劉少奇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1967 年 4 月 21 日《八·八戰報》，第 4 頁，第 2 欄。一段相同的引文，提到兩個副總理，但省略「提陳的名」，參見《中國大陸雜志選》645 號，第 8 頁。

【50】 參見羅和伊文斯上引書第 136 頁。

【51】 同上。一個丹麥人 1956 年和他的中國妻子（她的一些親屬還在北京）返回中國訪問後轉述了坊間流傳的毛、劉少奇、周恩來總理處理問題不同方法的一件軼事：毛問劉、周：你們怎樣使一隻貓吃辣椒。劉少奇回答：「這很容易。」「叫人抓住貓，把辣椒塞到它的嘴裏，然後用筷子捅下去。」「不，不」毛嫌惡地揮了揮手：「決不能用強力——這不民主，一切事情都要自願。你將怎麼辦？」他轉向周恩來。「我將餓一餓這隻貓。」總理答到：「然後我在辣椒上包一塊肉，一旦貓餓得耐不住了，就會全部吞下去。」毛再一次搖了搖頭，「也不能用欺騙

的方法，」他說：「決不能愚弄人民。」兩個人疑惑地看著他，看他如何辦。「這很容易」，毛回答。「把辣椒抹在貓的整個背上，開始發熱時，貓就舔掉它，而且貓很樂意被允許這樣做。」（參見卡爾·埃斯克倫德：《紅色官員》，第 150 ～ 151 頁。埃斯克倫德先生的妻子聽說了這段軼事，並用它來說明上海的一位資本家「吃了辣椒」後表現了對社會主義改造的熱情。這則軼事很可能在工商界流傳。

【52】 對陳雲的行動的有敵意的描述，參見《看陳雲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的罪行》，1967 年 2 月 15 日《財貿紅旗》（《中國大陸雜志選》附錄，175 號第 25 頁）。毛的批示見《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1969 年）第 25 ～ 26 頁。

【53】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10 號，第 7 頁。

【54】 《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經濟附錄，196 號〕第 1 頁。

【55】 北京廣播，1956 年 6 月 6 日，〔《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經濟附錄，198 號，第 12 頁〕。

【56】 參見《商業工作》中的一篇社論，1956 年 6 月 19 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26 號，第 16 ～ 18 頁）。

【57】 新華社 1956 年 6 月 15 日訊〔《世界廣播概覽》（第五部分：遠東，527 號，第 14 ～ 15 頁〕。根據陳叔通 1956 年 1 月 6 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北京方面不是靠國家官員而是靠讓資本家自己清理、估算資產的簡單方法加速了改造的進程（《當代背景》，377 號，第 24 頁）。

【58】 羅和伊文斯上引書，第 137 頁。一個瑞士作家這時正在中國，他報道：1 月 13 日毛與一群元帥到了上海督促工作。（施密特：《中國新貌》，第 93 頁）但羅沒有提及此事。如果真有此事，羅一定是會知道的。也許出訪日期是 12 月 13 日，那一群元帥可能只是上海市市長陳毅，他也是一個元帥。

【59】 1956 年 1 月《人民日報》。

【60】 同上。

【61】 新華社 1956 年 2 月 2 日電。

【62】 在 3 月的一次工商界人士的會議上，陳雲說，錯誤合併的事情，「北京的高級幹部應負最後的責任」（見《打倒反對毛主席的老手陳雲》，1967 年 2 月 15 日《財貿紅旗》，《中國大陸報刊概覽》附錄 177 號，第 9 頁）。這大概是對彭真和他的市委同事們的批評，但也有可能是對黨的幹部的總體指責（也包括他自己）：這些幹部對改造負有責任。

毛在參加天安門廣場慶祝集會後不到一星期，在一次談知識分子問題的中共會議上，嘲弄了某些地方的黨組織放棄領導權，而讓資本家自己負責大量的改造工作的情況——這顯然是為了加快工作速度（參見《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1969）第 30 ～ 31 頁，也可參見注釋 57）。

【63】 《當代背景》393 號，第 14 頁。

【64】 根據 1954 年的統計，上海私營企業的產值佔全國私營企業的總產值的 41.8%。1955 年 8 月，上海資本家對商業的投資佔全國資本家商業投資的 13.9%〔新華社 1956 年 2 月 2 日電，《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經濟附錄 201 號，第 9 頁〕。

【65】 《當代背景》393 號，第 10 頁。

【66】 根據 2 月 8 日國務院決定（《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32 號，第 16 頁）。

【67】 《政治報告》引自《人民中國》，1956 年第 4 期附錄，第 11 頁。在「文革」期間，劉少奇曾被公開嘲弄，因為他在 1956 年對外貿部說，資本家、專家和對外貿易人員的管理方法是一筆「遺產」（《徹底肅清劉少奇在外貿戰線的滔天罪行》，《北京公社》1967 年 5 月 27 日，第 1 ～ 2 卷）。

【68】 這個決定的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16 ～ 18 頁；引語見第 17 頁。顯而易見，如果彭真是加速改造的倡導者，「文革」中的毛主義者是不會承認的，因為彭真是他們清洗的主要受害者。這也許就是陳雲的「謹慎」為什麼沒有被徹底揭露，而倖免於「文革」之害的原因。

【69】 《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1969），第 30 頁。

【70】 同上，第 23 頁。在這一點上，毛打了個粗俗的比喻：好像婦女生娃娃，七個月就壓出來，是「左」了；過了 9 個月不准出來，是右了。

第二章 發動第一次「躍進」

【1】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18 頁。
【2】 1956 年 1 月 26 日《人民日報》。
【3】 1957 年毛告訴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你已經親眼看到了這個國家的現狀，我們多麼落後，任務很艱巨。」（《蛇與龜》，第 28 頁）。很可能，毛就是埃德加・斯諾提到的「最高官員」，在 1960 年告訴斯諾：「中國還是個落後國家……在我們稱我們是先進國家之前，要克服巨大的困難。」（斯諾：《大河彼岸》，第 15 頁，著重號是原文就有的）
【4】 1956 年 1 月 26 日《人民日報》。
【5】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18 頁，毛發表了他的序言僅八天之後，就對序言中這一段話所作的過分熱情的解釋感到不滿。〔參見《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1969 年）第 31 頁〕
【6】 劉少奇用語見 1959 年 5 月在八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手冊》1959 年，第 21 頁。
【7】 官方的譯文收入《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18 頁，其中省略了關鍵的字眼「但是」。這一詞在中文中用在轉折的地方，表明下文提到的才是重要的問題或方針；即使在排列上與前面提到的是平等的，下文也是被優先考慮的。在這裏，「但是」意味著，真正的問題是「右傾保守主義」而不是「去做不可能的事」。
【8】 同上。
【9】 同上，第 129 頁。
【10】 根據憲法第 4 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必要時」召開最高國務會議，並擔任會議主席。這是黨和非黨人士高級首腦參加的全國性論壇，毛利用它來提出討論重大的新政策。
【11】 農業部長廖魯言在他對最高國務會議說明這個綱要時，講述了討論的過程（1956 年 6 月 26 日《人民日報》）。在 1 月 14 日至 20 日中共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也討論了這個綱要。（同上，1956 年 1 月 30 日）我根據毛 1958 年 1 月在南寧會議上的一次講話，對廖的說明補充了一些細節。廖沒有提到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據毛所說的在杭州擬定的「11 條」是先於「17 條」而提出的。假設這「11 條」像那「17 條」一樣也是黨的某次正式會議的產物，廖肯定會提到。所以我認為：這「11 條」是毛提出來的，是他隱居在他喜歡的杭州時，可能與陳伯達和另外一兩個顧問商量之後擬訂的。〔毛關於十二年發展綱要的說明，參見《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1969），第 150 頁，關於毛喜歡杭州見下面第 370 頁的註釋 27】
【12】 1956 年 1 月 26 日《人民日報》。
【13】 綱要的譯文見《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19 ～ 126 頁。
【14】 新華社 1955 年 11 月 28 日電。
【15】 來源於北京廣播電台的多方面消息。
【16】 1 斤等於半公斤或 1.1 磅；1 畝約 1/6 英畝。
【17】 新華社 1956 年 1 月 3 日電。
【18】 見第 6 條規定（參見《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21 頁）。
【19】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97 頁。
【20】 新華社 1955 年 12 月 8 日電。
【21】 北京廣播電台 1955 年 12 月 17 日電，著重號是後加的。
【22】 見第 31 條規定（見《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25 頁）。
【23】 新華社 1956 年 1 月 18 日電。
【24】 1955 年的統計是 1090 萬噸。參見陳潤：《中國經濟統計》，第 359 頁。

【25】 根據 1956 年 12 月 2 日新華社電，估計是 20 億斤（100 萬噸）。
【26】 1956 年 1 月 24 日《人民日報》。
【27】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它是建立在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聯盟基礎上的。在 1956 年選舉出人民代表大會和 1954 年通過憲法之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議會和國家最高代表。那些小的非共產黨政黨在其中占 1/3 的席位（參見范•斯萊克：《敵與友：中共歷史上的統一戰線》，第 208 ～ 210 頁）。
【28】 周恩來：《政治報告》，載《人民中國》1956 年第 4 期，附錄，第 12 ～ 13 頁。
【29】 見他在黨的「八大」上的講話（1956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報》）。
【30】 周：《政治報告》，第 9 頁；陳伯達的講話見《當代背景》377 號，第 36 頁、第 42 頁。
【31】 周：《政治報告》，第 9 頁。
【32】 新華社 1956 年 2 月 5 日電。
【33】 《1956 年的年度計劃必須編好》，1955 年 10 月 24 日《人民日報》社論。
【34】 《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經濟附錄 197 號，第 3 ～ 4 頁。
【35】 同上，176 號，第 22 頁。
【36】 同上，196 號，第 24 頁。
【37】 同上，第 23 頁。
【38】 參見：陳潤和蓋倫森：《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經濟》，第 160 頁，註釋 21。
【39】 他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的關於五年計劃的報告（參見《當代背景》393 號，第 4 頁）。
【40】 1958 年 5 月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25 頁）。李富春在他 1956 年人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處於防禦地位，在講話中他承認低估了人民群眾主動性並因此而制定了低指標，但是他聲稱：「在貫徹這一計劃的過程中，我們決沒有受舊指標的限制。」（《當代背景》393 號，第 4 頁）
【41】 參見各種報道〔《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經濟附錄 197 號，第 4 ～ 5 頁，經濟附錄 201 號，第 12 ～ 14 頁〕。
【42】 劉少奇在 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說：多、快、好、省，或是越多、越快、越好、越省的口號，是毛提出來的。但是，毛在 1955 年秋，中共六中全會最初正式提出的僅僅是「越多、越快、越好」〔《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1969 年），第 19 頁〕。可能「越省」是計劃人員建議後加上的。
【43】 新華社 1956 年 5 月 10 日電。
【44】 《開展社會主義競賽，提前完成五年計劃》，1956 年 2 月 29 日《人民日報》。
【45】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66 號，第 8 頁。
【46】 參見陳志讓編輯的《毛和中國革命》第 60 頁有關毛本人對這篇講話產生情況的說明。關於這個講話的研究參見第 5 章。
【47】 《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1969 年），第 24 頁。
【48】 同上，第 34 頁。

第三章 開始解凍

【1】 研究中蘇在 50 年代初期關於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不同階級的作用問題的不同理論觀點，參見史華慈:《共產主義與中國：變動中的意識形態》，第 80 ～ 89 頁。
【2】 《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516 號，第 15 ～ 16 頁；517 號，第 14 頁；518 號，第 26 頁。
【3】 周講話的題目是《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發表在 1956 年 7 月 30 日《人民日報》，譯文見《當代背景》376 號（一些段落引自新華社的官方譯文）。《當代背景》中的譯文轉載在《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28 ～ 144 頁。有幾處錯誤應引起注意：在 129 頁倒數最末一段漏掉了一個句子；第 130 頁倒數第 4 行不應是 45%，而應是 40%；第 131 頁第 4 段和第 6 段中應該用「教育」一詞而不應是「文化」；第 133 頁第 8 段中不是 4 個單位，而應是 5 個單位。

【4】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29 頁。
【5】 同上。
【6】 同上，第 131 頁。根據周恩來的說法「所謂高級知識分子和一般知識分子，中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周清楚地說明：高級知識分子並不包括一切從大學中畢業出來的人，雖然想必大多數「高級知識分子」來自大學生的行列。「高級知識分子」大概的含義是大學講師和講師以上的人及別的高等職業中與之平級的人。
【7】 同上，第 130 ～ 131 頁。
【8】 同上，第 138 頁。
【9】 同上，第 133 ～ 135 頁。
【10】 包華德主編：《中華民國人物傳記辭典》，第 396 頁。
【11】 1956 年 1 月 30 日《人民日報》。
【12】 1956 年 1 月 26 日《人民日報》。（最高國務會議雖然是在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之後舉行，但它卻先被公佈了。）
【13】 參見西奥多上引書第 105 ～ 107 頁。
【14】 1956 年上半年，各省市領導調查了知識分子失業的情況。在 1956 年 9 月 5 日《光明日報》報道中提到：失業或使用不當的知識分子是少數。9 月 1 日上海成立了一個錄用失業知識分子的辦公室，在頭 12 天裏，有 6800 多人前去登記。北京也成立了一個類似的辦公室，到 10 月 4 日這個辦公室結束工作時，有 2900 多名失業知識分子前去登記，並被分配了工作。來自新華社的這後一則報道中，特別提到獲得哥倫比亞文學碩士的唐毛玉（音）已賦閒六年。
【15】 這個報道見《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548 號，第 13 頁；569 頁，第 10 頁；561 號，第 17 頁。這個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的運動緊跟在合作化運動中大量吸收農民入黨的計劃之後。參見 1956 年 7 月 1 日中共成立 35 週年之際公佈的關於黨員人數的各種統計，同上，575 號，第 13 ～ 14 頁。「文革」期間，劉少奇和組織部長安子文被批評在吸收知識分子黨員時沒有徹底調查他們的背景。在那時看起來存在著抵制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傾向。安子文聲稱這種傾向來自於那些無知的黨員，這些黨員希望別的黨員也是無知的。參見《三反分子劉少奇的罪惡史》。（北京：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 1967 年 5 月紅代會主編的《換新天》，第 31 頁。）
【16】 參見林德貝克：《科學的組織和發展》，《中國季刊》1961 年 4-6 月，第 98 ～ 99 頁。蘇聯方面審查這個計劃時所遇到的困難和這個計劃本身的命運，參見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 6 ～ 9 頁。根據科羅契科的記載，計劃中的近 600 個科技項目裏，僅有少數保留下來。
【17】 參見 1956 年 4 月 1 日《人民中國》附錄第 5 頁。
【18】 《政治文件和分析》，第 121 頁。
【19】 參見第 8 條（《時代背景》第 399 期，第 2 ～ 3 頁）。
【20】 同上，第 23 頁。
【21】 參見 1956 年 4 月 1 日《人民中國》附錄 11(3)，第 5 頁。
【22】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21 頁。
【23】 同上，第 128 頁。幾個月前，毛還提出了鎮壓反革命是中共的主要成績之一。同上，第 18 頁。
【24】 參見楊清：《我們為什麼應該吸收以前的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加入合作社》，《時事手冊》第 17 期，1956 年 6 月 25 日。《中國大陸雜誌摘要》49 號，第 31 ～ 34 頁。
【25】 同上，第 32 頁。
【26】 同上。
【27】 參見新華社 1956 年 2 月 2 日電、新華社 1956 年 3 月 10 日電、新華社 1956 年 3 月 31 日電。一位西方記者對這一時期服裝的統一極不讚賞，並創造了一個新詞來形容中國人，參見吉勒恩：《藍蟻》，第 104 ～ 107 頁。
【28】 《劉少奇在文藝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紅色宣傳兵》1967 年 5 月 10 日，第 4 期，（《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205 號，第 32 頁。）

【29】 樂隊演奏了施特勞斯的圓舞曲和格什溫的兩首曲子。參見克羅夫特：《紅地毯通向中國》，第 111 頁。

第四章 蘇共二十大與中國的反應

【1】 有關中國 1956 年春季的政治氣氛，參見伯特倫：《重返中國》。30 年代伯特倫曾是駐中國的記者，他與毛的會晤已載入《毛選》。

【2】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59 頁。這兩句引語摘自 1963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

【3】 倫納德：《斯大林以後的克里姆林宮》，第 122 頁。

【4】 在《赫魯曉夫回憶錄》一書中記載，這個決定是在會議開始後做出的；參見 1970 年 12 月 14 日《泰晤士報》的摘要。西方分析家對講話最後一刻性質的認識，參見拉什：《赫魯曉夫的崛起》，第 57 ～ 58 頁，60 頁；康庫斯特：《蘇聯的權力和政治》，第 277 ～ 283 頁；倫納德上引書第 184 ～ 187 頁。中國人說他們 1956 年批評俄國人時，責備他們事先沒有與兄弟黨商量（《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論戰》，第 64 頁）。

【5】 米高揚的講話的重要意義，見拉什上引書第 50 ～ 55 頁，60 ～ 61 頁，65 ～ 70 頁；康庫斯特上引書第 281 頁；哈德遜：《中國和共產主義的「解凍」》；參見麥克法夸爾的《百花齊放運動和中國知識分子》第 298 ～ 299 頁。愛德華・克蘭克肖在評論《赫魯曉夫回憶錄》一書時指出：前蘇聯領導人沒有提到米高揚的重要調解；相反赫魯曉夫把自己描繪成鼓動蘇共政治局接受他提議的秘密報告的角色。參見 1970 年 12 月 14 日《泰晤士報》的摘要。

【6】 康庫斯特上引書第 282 頁。這份遺囑國外知道了幾十年，但在國內斯大林始終不將它公諸於眾。參見夏皮羅：《蘇聯共產黨》，第 271 ～ 272 頁、288 頁、296 頁、302 頁；另參見卡爾：《蘇俄史》，第 4 卷：《空缺時期，1923-1924 年》，第 258 ～ 263 頁、360 頁、361 頁。

【7】 兩篇文章的譯文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31 號，第 33 ～ 37 頁。

【8】 同上，第 36 頁。

【9】 朱是 2 月 4 日抵達，鄧是 2 月 11 日抵達。

【10】 參見西克關於一張紅衛兵牆報的報道。該牆報報道了登在 1967 年 4 月 16 日《讀賣新聞》上關於周恩來 1967 年 4 月 6 日的講話要點。但在「文革」有一段關於證明朱德是同意赫魯曉夫的引文，暗示他所持的批評態度不是針對斯大林，而是赫魯曉夫的。朱德稱赫魯曉夫是如此「過硬」，他要批判某些人的錯誤，即令是他已經死了。（參見《打倒朱德》，載 1967 年 2 月 7 日《東方紅》，並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72 號，第 23 頁）朱德元帥這些議論沒有日期，可能是中蘇論戰開始後的 60 年代。

【11】 《打倒朱德》，載 1967 年 2 月 11 日《東方紅》。

【12】 鄧抵達北京是 3 月 3 日；朱到達第比利斯是 3 月 7 日。

【13】 1956 年 3 月 10 日《人民日報》。

【14】 格魯吉亞事件的概要，參見《基辛檔案》，第 10 卷（1955-1956 年），第 14817 頁。

【15】 3 月 10 日和 13 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新華社報道中沒有提到參觀哥里，塔斯社或莫斯科廣播電台也沒有提及這次參觀，雖然中蘇雙方的消息都提到離開第比利斯去參觀處於相反方向的魯斯塔維的冶金工廠，（新華社說是「斯大林」冶金工廠）。

【16】 在《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文中列舉了 1956 年時，毛數次告訴俄國人，他不同意二十大的結論，但在每次談話中，他具體提到的只是關於對斯大林的攻擊。（《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64 頁。）

【17】 1960 年中國人的主要攻擊在《列寧主義萬歲》一文中提出，該文轉載在赫德遜、羅文哈爾、麥克法夸爾合著的：《中蘇論戰》，第 82 ～ 112 頁。哈爾彭所強調的主要是二十大以後人們對斯大林問題專注的關切。
【18】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37 號，第 27 頁。
【19】 同上，1239 號，第 30 頁。
【20】 在我所看到的「文革」資料中，沒有任何顯示中國領導層存在過有關這個問題的爭論。
【21】 見哈爾彭的原稿。
【22】 赫魯曉夫報告的有關部分包括在赫德遜、羅文哈爾、麥克法夸爾合著的上引書，第 42 ～ 46 頁。
【23】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65 頁。
【24】 邀請中國是尼赫魯的主張，參見卡欣：《亞非會議：1955 年 4 月印度尼西亞的萬隆》，第 2 頁。
【25】 同上，第 14 ～ 15 頁，第 31 頁，第 37 ～ 38 頁。
【26】 見哈爾彭原稿第 4 章。
【27】 參見卡欣上引書第 7 頁。哈爾彭（原稿第 4 章）把中國放棄對第三世界各獨立國家所持的強硬態度看成是於 1951 年中期開始的，它的外交政策全面而逐漸的轉變的一部分。哈羅德・欣頓在《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一書中說中國對其亞洲鄰國採取新路線是從 1952 年開始的。
【28】 1957 年 11 月 10 日中國的機密文件《關於和平過渡的提綱》中說，「然而，我們不要因為有了這個願望（即和平過渡）而束縛自己的手腳。資產階級不會自願退出歷史舞台。這是階級鬥爭的普遍法則。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無論如何都不應放鬆進行革命的準備。他們必須隨時準備擊退反革命的進攻，在工人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革命重要轉折關頭，如果資產階級用武力鎮壓人民革命（一般說來，資產階級是肯定會這樣做的），那麼就要用武力推翻資產階級」（《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105 ～ 106 頁。著重號為作者所加）。而後，這個文件又強調指出：「據我們所知，還沒有一個國家存在這種現實可能性（即和平過渡）。（同上，第 106 頁。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29】 雖然北京方面關於和平過渡的觀點起草於 1957 年 11 月，但直到 1963 年 9 月才發表。（同上，第 55 頁）
【30】 同上，第 66 頁。劉報告的有關內容在第一編裏（參見《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66 ～ 167 頁）。
【31】 同上，第 144 ～ 151 頁，官方的英譯本。
【32】 紅衛兵對她的一次訊問（參見《當代背景》848 號，第 16 頁、22 頁）。
【33】 《跳樑小丑的黑話》，1967 年 5 月 4 日《新聞戰線》，第 4 期，第 4 頁第 1 欄。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在「文革」期間他本人和這本書都受到指摘。
【34】 埃德加・斯諾證實毛同意這篇文章和 1956 年 12 月發表的續篇《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斯諾說：我能肯定，毛曾被直截了當地問過：他本人從赫魯曉夫指摘斯大林主義的個人崇拜中吸取什麼教訓。毛回答說《人民日報》的兩篇文章確切地表達了他的看法。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兩篇文章，是在 1956 年 4 月和 12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基礎上撰寫的。（斯諾：《今日紅色中國》，第 331 頁，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35】 1957 年 2 月最高國務會議；見下面第三編。
【36】 扎戈里亞：《中蘇論戰 1956-1961 年》，第 44 頁。
【37】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47 頁。
【38】 同上，第 146 頁。
【39】 這一段分析主要依據扎戈里亞上引書第 45 ～ 49 頁。
【40】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48 頁。
【41】 《毛澤東選集》，第 3 卷，第 899 ～ 904 頁，（北京官方的譯文見《毛澤東選集》，第 3 卷，第 117 ～ 122 頁。）根據 1960 年底的版本提供的情況，這一卷於 1953 年第一次出版。喜歡研究的外國共產黨人很容易確認 1943 年的決斷是毛作出

的，因為這一卷的英譯本 1956 年由勞倫斯和威沙特在倫敦以《毛澤東選集》第 4 卷為書名出版。（中文版第 2 卷，在譯成英文時，由於太長被分成兩卷（2、3 兩卷），參見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 312 頁。）

【42】 毛在 1935 年 1 月遵義會議上成為黨的軍事委員會主席。同時，總書記由張聞天擔任。雖然毛尚不是無可爭議的黨的最高領導，但是共產黨的歷史學家確定從這時起毛佔據了領導地位而沒有明確說他擔任什麼職務。（參見胡喬木上引書第 39 頁）《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指出：對中間勢力的攻擊發生在中國 1927 年至 1936 年之間（《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49 ～ 150 頁）。

【43】 同上，第 150 頁。

【44】 同上，第 147 頁。

【45】 同上，第 147 ～ 148 頁。

【46】 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重印版，第 84 ～ 89 頁（以下這本書的引文都引自重印版）。

【47】 同上，第 89 頁。

【48】 扎戈里亞上引書，第 45 頁。

【49】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48 頁。這段引文來自毛 1943 年撰寫的關於領導方法的文件。

【50】 同上，第 149 頁。

【51】 同上。

【52】 同上，第 149 ～ 150 頁。

【53】 這兩次講話和別的大多數 1942-1944 年的整風文件一起在康普頓翻譯出版。

【54】 參見倫納德上引書第 168 ～ 169 頁。

【55】 1958 年 2 月陳毅擔任外交部長，在 1958 年 9 月辭去上海市市長一職（參見香港：聯合研究院編《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 1 卷，第 107 頁）。

【56】 引自《打倒陳毅，解放外交系統》，載造反小冊子《文革風雲》（北京：紅旗革命造反團，北京外語學院，首都紅代會，1967 年第 4 期），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35 號第 12 頁）。

【57】 同上，第 14 頁。

【58】 同上，第 12 頁。

【59】 毛 1959 年 2 月對各省黨的負責人的講話中是這樣暗示的。參見《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1969 年），第 276 頁。毛在這裏提到「某人」和「周」，特別提到某人是高攻擊的重要目標。某人只可能是劉（少奇），他是毛唯一能排列在「周」前面的人（這個「周」一定指的是周恩來）。（在這一卷中，通常只提到「文革」中的倖免者，如周、林彪和康生的名字；犧牲者都用某、某某、某某某，大概因為編輯者不願意公開毛在任何時候說這些人好話這一事實。）1955 年 3 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於高崗事件的決議中有如下的段落：「他甚至企圖煽動在軍隊中工作的黨員支持他反對黨中央的陰謀，並為此而鼓吹一種極端荒謬的『理論』，說我們的黨分為兩個：一個是所謂『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另一個是所謂『白區的黨』，說黨是軍隊創造的，他自認為是所謂『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並自認為應當掌握主要的權力，因此黨中央和政府都應當按照他的計劃改組，他自己在現時應當擔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副主席，並擔任國務院總理。」劉周二人都是來自白區的人；劉負責過國統區和日本佔領區的地下工作；周曾在國民黨戰時司令部當過首席聯絡官員。

【60】 例如：周揚被攻擊就是因為他要劇作家節制他們對毛的頌揚。參見《周揚瘋狂反對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罪行》，載 1967 年 5 月 6 日《進軍報》。

【61】 毛對音樂工作者的講話轉載在《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勝利萬歲》（北京：北京電影製片廠革命造反聯絡部 1967 年 7 月），第 6 ～ 9 頁。

【62】 參見 1956 年 5 月 2 日有關慶祝活動的報告和圖片。

【63】 參見埃斯克蘭德上引書第 29 頁，記載他在一位老人的家裏，在毛澤東和斯大林的肖像下喝酒；也可參見卡梅倫：《中國在微笑》，第 50 ～ 51 頁，他記敘了

1957 年 5 月 1 日對毛的「諂媚」；在第 219 頁記載了他碰到一位傣族人的情形。當新建的發電廠送來電時，這位傣族人把電說成是：「毛主席送來的光芒」。這種比喻並不是僅僅出現在中國的傣族人中，在蘇聯諾貝爾獎獲得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短篇小說中，也有類似的描寫：早在 20 年代沙圖裏把電輸送到一個村子時，報紙用「伊里奇（列寧）的小馬燈」來加以描繪，但是農民睜大眼睛談論「沙皇的火」（參見H・T・威利茨翻譯的《遭遇》，1963 年 5 月版，第 30 頁）。

【64】 引自《劉少奇在人民商場對資改造中推行投降主義路線的罪行》，《中國大陸雜誌選》617 號，第 61 頁）。這一評論沒有註明日期，但聽起來像是在「二十大」以後得出的；此外，這一評論是同劉少奇在 1956 年 9 月在中共「八大」上對「二十大」所作的評論一併引用的。在同一篇文章中，還引了另一個資本家的話：「新華書店的廣告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這是個人崇拜。」（同上）

【65】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64 頁。

【66】 官方沒有出版毛的講話。官方第一次提到它，看來是在 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的報告中。劉少奇陳述了什麼是十大關係，並概述了其重要性。（參見《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26 頁）一個依據聽眾筆記寫成的文本，在「文革」期間傳到了西方國家。這篇文章收入一本沒有書名的毛的講話集。（沒有出版者，沒有日期，但似乎是真實的。此後成了毛的無題選集）

這篇文章第一個譯文見陳譯毛選，第 65 ～ 85 頁。該文連同集子中的其他文章一併譯出登在《當代背景》892 號第 21 ～ 34 頁中。據說這個重要講話於 1966 年 12 月由北京經濟學院一再刊印；其來源似乎是中共 1965 年 12 月發給地方黨委的講話稿。

在這個集子裏把講話日期僅註明為 1956 年 4 月。在 1967 年 5 月 30 日《文藝紅旗》第 5 期中登載的《毛主席自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關於文藝工作的重要指示》中提到確切日期是 4 月 25 日。（《中國大陸雜誌選》4000 號，第 16 頁）

【67】 劉少奇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26 頁）。不清楚這次會議與 4 月 25-28 日鄧小平在八大一次會議的報告中提到的省市黨委書記是什麼關係。如果同一個會議叫兩個不同的名稱，那是很不尋常的。但是，由於毛作了這次講話的會議被說成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可能有些省委書記參加，特別考慮到會上要討論如何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關係中的第五個）則這種可能性就更大。兩個會議都在 4 月 25 日舉行這一事實也不會使這一假設無效；毛可能上午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講話，而書記會在下午開幕。

【68】 劉對八大二次會議說：剩下來的議題（第 6 ～ 10 個關係）主要圍繞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觀點後來作了詳盡闡述（《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26 頁）。1957 年 4 月，陶鑄告訴廣東幹部：毛第一次提出內部矛盾問題是在 1956 年 4 月（參見 1957 年 5 月 4 日《南方日報》）。

【69】 這五個關係是：（6）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7）黨和非黨的關係；（8）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9）是非關係。（10）中國和外國的關係（陳譯毛選第 66 ～ 67 頁）。

【70】 同上，第 77 頁。

【71】 參見范・斯萊克上引書，第 190 ～ 210 頁。

【72】 同上，第 210 頁。

【73】 當 1936 年斯大林宣佈蘇聯已取得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時，他說，這意味著一切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只剩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參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 564 ～ 565 頁）。

【74】 陳譯毛選第 77 頁．毛用了「所有的」一詞，就暗示他期望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能長期共存。

【75】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88 頁。

【76】 陳譯毛選，第 28 頁。

【77】 同上，第 78 ～ 82 頁。
【78】 同上，第 76 ～ 77 頁。陳用了「Pan-Hanism」一詞，翻譯為大漢族主義。一般譯作「大漢族沙文主義」(「Great Han Chauvinism」)。
【79】 同上，第 82 ～ 85 頁。
【80】 關於作協會議的詳述和蘇聯文學發展對它可能產生的影響，參見福克瑪：《中國的文學理論與蘇聯的影響：1956-1960 年》，第 59 ～ 67 頁、70 ～ 81 頁。
【81】 1967 年 5 月 10 日《紅色宣傳兵》刊出的《劉少奇文藝方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論調》一文中摘錄了大段劉的指示。(《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205 號，第 27 ～ 28 頁)
【82】 同上，第 27 頁。
【83】 同上，第 28 頁。
【84】 在 1951 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4 年批判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研究和 1955 年揭發胡風等文藝鬥爭中，毛看來起了決定性作用。參見 1967 年 5 月 24 日新華社電；另見戚本禹紀念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 25 週年作的講話。關於這一鬥爭的詳述，參見西奧多·陳上引書第 38 ～ 42 頁、81 ～ 83 頁、85 ～ 90 頁。戈德曼著《共產黨中國的文學分歧》第 91 ～ 93 頁、115 ～ 119 頁、129 ～ 157 頁。
【85】 戲劇節從 3 月 1 日持續到 4 月 5 日（參見福克瑪上引書，第 67 ～ 70 頁）。
【86】 1967 年 5 月 10 日《紅色宣傳兵》(《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205 號，第 28 ～ 30 頁)。劉少奇的指示可能在全國戲曲調演會上引起反響（參見福克瑪上引書第 70 頁）。關於劉少奇 3 月 5 日和 8 日指示的部分中文本，參見《劉少奇文藝黑線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一百例》，1967 年 5 月上旬《毛澤東主義戰報》第 3 ～ 6 頁，33 ～ 35 條、38 條、40 ～ 41 條、45 條、54 條、61 ～ 62 條、69 ～ 71 條、73 ～ 74 條、76 ～ 77 條。33 條、35 條、41 條是 3 月 5 日的指示，其餘有 3 月 8 日的指示。3 月 8 日指示的大段摘要見《徹底清除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總根子劉少奇》一文中，1967 年 4 月 5 日《文藝風雷》，第 3 ～ 4 頁。
【87】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根除八一廠的文藝黑線》，見 1967 年 5 月 10 日《電影革命》，第 4 頁。這一資料標明這一評論是 3 月在一次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但沒有寫明日期。該座談會的精確日期見下一個腳注引用的資料，並且我假定在 1956 年 3 月只召開過一次這樣的座談會。
【88】 在這裏周揚是要指的戲劇問題。參見《看劉少奇、彭真、周揚如何反對京劇改革》，1967 年 5 月 24 日《紅色批判者》，第 4 頁，第 4 欄。
【89】 關於這一口號的起源和發展的研究，參見李芝（音）《比喻性語言在共產黨中國的運用》1958 年 12 月 5 日第 5 期第 32 ～ 37 頁。李小姐說毛提出這一口號是在 1951 年，但沒有給出證據。「文革」中由上海戲劇學院「革命燈塔」編輯的《毛主席論文藝》第 94 頁，也包括這一口號，並提出其出自 1952 年 9 月 26 日《天津日報》。
【90】 周揚是在 1956 年 8 月 1 日在作協文學研究室的談話中如是說的。參見《周揚瘋狂反對毛主席文藝路線的證據》，1967 年 5 月 6 日《進軍報》，第 3 頁，第 1 欄。
【91】 春秋時期習慣上是指公元前 722- 前 481 年，戰國是指公元前 403- 前 221 年，參見賴肖爾和費爾班克：《東亞：偉大的傳統》，第 54 頁。這一時期是在孔子學說成為官方教條之前，期間出現了哲學的繁榮（同上，第 69 ～ 84 頁）。
【92】 1967 年 5 月 10 日《紅色宣傳兵》(《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205 號，第 31 頁)。想必劉和其他官員被指派向經過挑選的少數人說明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方針。
【93】 劉的這個言論集的編輯說，劉發表這個講話有不正當的動機。另一個毛主義者的編輯顯然摘錄了同樣的段落，其目的是使對劉的控告罪加一等。在 1967 年 5 月 10 日《光明日報》登載的《徹底清除文藝黑線的後台老闆》一文中，這一段話僅僅是說：「允許百家爭鳴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毛主席是在這個基

礎上總結提高的。」關於劉「詆毀」毛的可能動機將在第二編進行研究。關於毛對百家爭鳴起源的論述，參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38 頁。

【94】 1967 年 5 月 10 日《紅色宣傳兵》。劉側重於這一方針的百家爭鳴，大概這與對歷史的研究有更多的關係。同年晚些時候周揚在《文學》雜誌編輯會議上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目的就是想衝破思想上的教條主義和組織上的管理方法。1967 年 5 月 6 日《進軍報》，第 3 頁，第 1 版。

【95】 陸定一的講話經過修改發表在 1956 年 6 月 13 日《人民日報》上，官方的譯文轉載在《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51 ～ 163 頁。

【96】 他說的科學家是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的，並不僅僅是指自然科學家。

【97】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53 ～ 154 頁。

【98】 關於「文革」中攻擊這四個因素，參見附錄 1。

【99】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56 頁。毛講話的題目是《整頓黨的作風》。1942 年，毛更關注黨內的宗派主義（參見康普頓上引書，第 22 ～ 28 頁）。

【100】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和分析》，第 157 頁。在 5 月 14 日中共宣傳部門的一次會議上，陸定一大概是大致勾畫了他打算在當月晚些時候公開講話的要點。他說：關於主題方面的限制必須取消，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中國的還是外國的主題都是可以的。在文藝界……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只有一個原則「為工農兵服務」，其他如描寫「工農兵」原則必須破除。《徹底粉碎反革命文藝黑線》，1967 年 4 月《漫山紅遍》第 1 期，(《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 33 號，第 5 頁)。除用了「破除」這一強硬措詞外，關於主題問題的這種提法與陸定一公開講的沒有什麼不同。

【101】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58 頁。

【102】 參見倫納德上引書，第 127 ～ 130 頁。

【103】 這三篇講話是《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參見《毛澤東選集》第 3 卷）。

【104】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60 頁。

【105】 參見 1957 年 2 月 17 日《人民日報》，強曉初的文章《發揚黨的整風學習的經驗》。

第五章 毛澤東同計劃制定者的對立

【1】 陳譯毛選，第 66 頁。

【2】 康庫斯特上引書，第 258 頁。

【3】 30 年代薄一波在劉少奇領導下在華北工作。對他們這一時期的關係所作的懷有敵意的描述，參見《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叛徒集團的大老闆——劉少奇》、《劉少奇、安子文和薄一波叛徒集團的內幕》，選自《徹底埋葬劉少奇叛徒集團》（天津：天津市工人、農民、學生、幹部代表大會批判劉、鄧、陶聯絡站 1967 年 4 月 17 日），第 11 ～ 21 頁。

【4】 這是在 1960 年。參見《打倒三反分子和大叛徒、工交戰線的壞頭頭薄一波》，1967 年 2 月 15 日《東方紅》(《當代背景》878 號，第 7 頁）。

【5】 薄 1949—1953 年任財政部長，1954-1956 年任國家建委主任，從 1956 年直到「文革」任國家經委主任。

【6】 《當代背景》407 號，第 5 ～ 6 頁。

【7】 陳譯毛選，第 66 頁。各省負責人在工資問題上被詢問看法，參見同頁。

【8】 毛在 1959 年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的講話（參見《彭德懷案件》第 25 頁）和 1962 年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都承認這一點（參見《毛主席文選》第 72 頁）。

【9】 《企業幹部的緊急任務》，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66 號，第 7 ～ 10 頁。

【10】 3 月 16 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改進質量、增加品種》。

【11】 譯文參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59 號，第 3 ～ 5 頁。

【12】 這一指示翻譯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68 頁，第 3 ～ 7 頁。這段引文在第 3 頁上。

【13】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73 號，第 8 頁。

【14】 見 1956 年 3 月 16 日《人民日報》社論。3 月 30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對那些沒有把先進工作者運動變為群眾運動的幹部提出了類似的指責（《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74 號，第 7 ～ 9 頁）。
【15】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84 號，第 13 頁。劉少奇提到「多、快、好、省」的口號時表示讚許，但他把好放在快之前，這似乎是為了強調質量的重要，但是我發現沒有別的像這樣修改的例子，即使是那些明顯地反對 1956 年「冒進」的人也不曾這樣修改過。但我在假設這不是中國報紙的一個印刷錯誤的前提下對這一順序的變化作不出任何結論性的解釋。
【16】 1956 年 5 月明 8 日《人民日報》。
【17】 引文參見《徹底清算陳雲反對毛主席的滔天罪行》，北京公社，1967 年 3 月 14 日。我非常感謝查爾斯・紐豪斯爾先生允許我用他為一本文獻集准備的這篇譯文。
【18】 陳譯毛選，第 65 ～ 76 頁。
【19】 1955 年 7 月 5 日和 6 日，李富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了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這個報告轉載在《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2 ～ 91 頁。輕、重工業比例問題在第 59 頁提到。
【20】 參見康庫斯特上引書第 249 ～ 256 頁；倫納德上引書第 79 ～ 92 頁。
【21】 陳譯毛選，第 67 頁。
【22】 同上，第 68 頁。從康庫斯特和倫納德所著書中的敘述來看，馬林科夫並沒有用這一論點為他 1953 年到 1954 年的消費品政策辯護。也許他認為，在重工業在蘇聯如此發達的情況下，僅以消費者需求旺盛為理由已經足夠了。但是有趣的是，在經歷了國內戰爭的破壞之後，列寧以同樣的理由開始實行旨在恢復蘇聯經濟的新經濟政策。為了保衛新經濟政策，反覆駁那些認為新經濟政策會破壞大工業的論調，列寧說：沒有更豐富的消費品和原料的供應，大工業將不能復興；要得到這些消費品和原料，只能通過交換過程，而鼓勵發展小工業就是這個過程的開端。列寧接著說：「為了慎重和有步驟地恢復大工業，我們需要恢復小工業。」列寧當時所處的情況是不同的，但也許是毛（或者更可能是陳伯達）注意到了列寧曾經對批評者的反戈一擊：如果你們要認真對待工業，你們就必須採取先發展消費品的方針。說到底，兩方面說的都是一個意思：對消費者有益的就是對重工業有益的。（列寧強調「小」的消費品工業，是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也和重工業一樣在一戰和內戰中遭到破壞。）卡爾:《蘇俄歷史》第 2 卷，布爾什維克革命 1917-1923 年，第 297 ～ 299 頁。）
【23】 《當代背景》393 號，第 6 頁。
【24】 同上，第 5 頁。1956 年 6 月 19 日《人民日報》。
【25】 《當代背景》393 號，第 5 ～ 6 頁。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 1957 年宣佈：1958 年的輕工業投資由於農業原料短缺而不得不減少。
【26】 這個修訂表明，李富春的如下意見獲是認可，即如果生產下降，投資比率可以重新考慮。這一段引文在《當代背景》393 號，第 6 頁的譯文中被省略（參見 1956 年 6 月 19 日《人民日報》）。所指的期限「這一年和次年」也略去，這就暗示這種改變只是一種試驗；第二個五年計劃中是否這樣做還未最終確定。
【27】 《為什麼要增加輕工業的投資比重》，1956 年 7 月 9 日《人民日報》社論。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334 號，第 7 ～ 9 頁；但是這段引文在開頭用了「也許可以向……」這些詞，這同原文的「有人問……」相比語氣就不那麼武斷了。
【28】 《共產黨中國：1955 ～ 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60 頁。
【29】 陳譯毛選，第 69 頁。
【30】 同上，第 70 頁。
【31】 《當代背景》393 號，第 7 頁。毛提到的其他省份是內地的省份：安徽、河南東部、廣西，他沒有提到天津市。
【32】 同上。

【33】 原有引文可在1956年《人民手冊》第16頁、第19頁上的（五年）計劃正文中找到。在《當代背景》393號，第7頁，李1956年6月講話的譯文用的引語是報告的原話。
【34】《當代背景》393號，第7～8頁。
【35】 1956年6月19日《人民日報》。在《當代背景》393號中的譯文（第9頁第3欄）裏，把李的總標題「改建」翻譯成「修復和擴展」，從而忽略了二者的差別。
【36】 1956年7月8日《人民日報》。
【37】 同上。1956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當代背景》393號將這一段的末尾譯成：「……沒有採取積極的措施來規劃和利用……」這比社論中承認錯誤的程度嚴重得多。
【38】 1956年7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有關工業佈局的社論，第二天又發表了一篇關於輕重工業投資比例的社論（見前文63頁），這表明在7月初也許舉行了一次高級首腦會議來解決了這些問題及其它問題。另一個證實這一假定的事情是，7月6日（《人民日報》7月7日），新華社宣佈了八大召開的日期，而且7月6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一篇社論，論述與毛的「十大關係」講話相關連的另一個問題——工資改革（關係四）。
【39】 毛的十大關係中的第三大關係——國防和經濟發展的關係一我會在下文涉及。
【40】 這一段我是從最初收集的毛的講話中翻譯過來的（《毛澤東：未名文集》，第22頁）。
【41】 同上，第23頁。
【42】《當代背景》393號，第9～12頁。
【43】 新華社在1956年4月14日宣佈，關於工資改革的全國會議已經提出要增加工資〔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5部分：遠東）；經濟附錄，212號，第17～18頁〕。1956年7月7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說，國務院「在經過長期准備之後」，已經公佈了工資改革的原則（《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331號，第4頁）。這可能是一個暗示，指責計劃工作者們在這個問題上過於謹慎了。
【44】 如果將1956年新就業的工人也包括在內的話，實際增長是13%，毛的講話收在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5部分：遠東）附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第5號，第21～28頁。
【45】 見1956年6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
【46】 關於波茲南暴亂，見津納：《東歐的民族共產主義和民眾騷亂》，第126～142頁。
【47】 陳譯毛選，第75～76頁（我在翻譯中做了一點改動）。
【48】 同上，第77頁。
【49】《共產黨中國：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90頁。
【50】 同上，第235頁。
【51】 陳譯毛選，第71頁。
【52】 奧德麗・多尼森根據多種跡象得出結論，發展核武器的決定是在1956年上半年作出的，也許是在毛講話之後，但肯定是在6月公佈預算之前。我非常感謝多尼森小姐允許我在此參考她尚未發表的論文。
【53】 見哈爾波林：《中國與核彈》，第72頁。
【54】 中國人的態度引自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第105頁。
【55】 引自《彭德懷案件》，第175頁。
【56】 彭德懷參加了1954年1月21日在北京舉行的列寧逝世30週年紀念大會，我在前一年從未發現任何有關彭在中國首都出現的記錄，特別是，他既沒有出席1953年10月1日的慶祝活動，也沒有在同年11月份，一個朝鮮政府代表團訪問中國時露面，因此，他似乎是在1953年12月或次年1月的某一時刻回到北京的。
【57】 見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24頁和120頁。
【58】 見喬菲：《黨和軍隊：中國軍官中的職業化和政治控制，1949—1964年》，第12頁。

【59】 見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 120 ～ 121 頁。
【60】 赫魯曉夫在之後幾年得出了同樣的觀點。關於對赫魯曉夫 1960 年 1 月 14 日講話的詳述，參見科爾克維茲：《蘇聯軍隊和共產黨》，第 150—153 頁。這位蘇聯領導人在講話中宣稱，他渴望更多地依靠核武器，從而削減常規武器，使資源轉向經濟發展。
【61】 見哈爾波林上引書，第 4 章關於中國為什麼在 1954 年發動了「解放台灣」運動的分析，而該運動與當時對外政策總的緩和姿態形成極鮮明的對照。
【62】 關於一份顯示可見國防預算升降的圖表，見哈爾波林和波金斯合著：《共產黨中國與軍備控制》，第 37 頁。
【63】 《人民手冊》(1956 年)，第 163 頁。
【64】 《當代背景》337 號，第 6 頁。
【65】 中國人民解放軍授予軍銜直到 1955 年下半年才實行，這是按照蘇聯模式進行改造的一部分。但全國人大代表都知道劉伯承這樣的人的崇高地位。
【66】 《當代背景》347 號，第 26 頁。
【67】 見麥金托什：《蘇聯外交方針的戰略和策略》，第 107 ～ 111 頁。
【68】 《當代背景》第 347 號，第 29 頁。
【69】 同上，第 30 頁。
【70】 《人民手冊》(1956 年)，第 186 頁。
【71】 同上，第 187 頁。
【72】 《當代背景》347 號，第 30 頁。
【73】 同上。
【74】 同上，第 27 頁。
【75】 《人民手冊》(1956 年)，第 176 頁。
【76】 《當代背景》337 號，第 3 頁。彭德懷好像已願意接受這種意見，即從實行徵兵和削減「龐大的和平時期的常備軍隊」(同上) 中節省一些資金用於經濟建設 (同上，第 4 頁)。但他明確地認為他提出的徵兵議案能夠使使中國人民解放軍自身現代化 (同上，第 3 頁)。劉伯承和葉劍英都極力支持這個徵兵議案，這似乎意味著他們都支持這一議案必將導致的武裝力量的削減，從這一點和上面引用的彭的這些話來看，我懷疑彭對確保軍隊現化化和軍費預算不受侵佔的關心不比他軍隊中的同僚更少。關於一個相反的觀點，見謝蘭莉（音）：《核時代共產黨中國之戰略》，第 36 ～ 43 頁。
【77】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7 頁。
【78】 周恩來在八大作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公開地透露了這一點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26 頁)。毛也提到，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花在「軍政」上的費用比例約有 32% (《毛澤東：未名文集》，第 22 頁)。在陳譯毛選，第 72 頁，「軍政」被譯為「防衛」；但這個詞組還被中國人用作「軍隊和行政」的意思，而且毛的數字和周的觀點一致。由此看來，似乎後一種翻譯是正確的。(在《當代背景》892 號，第 25 頁，「軍政」被譯為「軍隊和政府」。)
【79】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7 頁。
【80】 同上書，第 89 ～ 90 頁。
【81】 在 1955 年，艾森豪威爾當局命令削減軍隊 10 萬人；我推測，這正是毛在 1 月 20 日關於知識分子的中央會議上的講話中所提到的 (《毛澤東思想萬歲 (1969)，第 33 頁)。關於周恩來的評論見《人民中國》增刊，第 4 期，1956 年，第 8 頁。
【82】 同上。
【83】 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 附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第 5 號，1956 年 7 月 5 日，第 5 頁。
【84】 同上，第 14 頁。

【85】 元帥比（總政治部的）這位將軍高出兩個軍階，正如早已指出的那樣，雖然直到 1955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後才開始授銜，但彭德懷、劉伯承、葉劍英等人的地位已是眾所周知了。

【86】 在毛的十大關係講話的原文中（見《毛澤東：未名文集》，第 22 頁），他號召將軍隊和行政開支削減到預算的 30%，鑒於上述費用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僅占 32%，毛的要求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也許原文有誤，應該是 20%，因為周恩來 5 個月以後在八大上作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提到這個數字的百分比是 20%（《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26 頁）。

【87】 見《鄧小平反動言論集》，「他們多麼惡毒！」（北京：批判劉、鄧、陶聯絡站，北京鐵路局紅旗公社，紅衛兵團，1967 年 4 月）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8 號，第 1 頁，引用了鄧小平的話：「每個人都有主觀主義，毛主席也有，甚至當所有的人都不同意他去游泳時（在長江），他還是非去不可。」也許應順便說一下，毛的這次游泳沒有，也未打算使之具有什麼政治意義，這不同於十年後毛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進行那次游泳。毛 1966 年的游泳顯然是有意證明他健康狀況良好，能夠親自處理國家事務，而在 1956 年則不需要作任何這樣的表示。

【88】 1957 年 5 月 17 日的《中國青年報》刊登了描述毛游泳的報道（或許是第一次游泳的週年紀念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58 號，第 6 ～ 9 頁）。這個報道說，毛第一次從武昌到漢口游了二十多公里，用了兩個小時；在 6 月初，毛又從漢陽到武昌游了 12 多公里，這兩次游泳都是順流而下。1956 年，毛視察他的家鄉湖南省的省會長沙時，在湘江也游了泳，這是香港報道的（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484 號，第 13 頁）。毛在青年時代對體育鍛煉就很感興趣，見斯克賴姆（第 152 ～ 160 頁）；毛在冬天也游泳，見《紅星照耀下的中國》第 145 頁。在赫魯曉夫回憶錄（第 467 ～ 470 頁）中，有毛和這位蘇聯前領導人在游泳池邊談話的記載。

【89】 這首寫於 1956 年 5 月的詩是由陳志讓和米微爾・布勞克翻譯的，見陳志讓：《毛和中國革命》，第 346 頁。毛的第二次、第三次游泳穿過長江大橋的橋墩（《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48 號，第 8 頁）。

第六章 解凍在擴展

【1】 《跳樑小丑的黑話》，載《新聞戰線》，第 4 期，1967 年 5 月 13 日，第 4 頁。

【2】 這些指示的日期在新華社英文稿中可以找到，見《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批判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新聞路線》（《紅旗》，第 2 期，1968 年 8 月 25 日），該文收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253 號，第 17 ～ 31 頁，註腳是（12），（13），（16）～（19），（22），（23）；並且在「劉少奇在文學藝術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中也可以找到，見《紅色宣傳兵》，1967 年 5 月 10 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5 號，第 31 ～ 33 頁〕。

【3】 關於劉的指示的來源，除了上一個註腳的兩處外，還包括《劉少奇三次奪取我國新聞界權力的反革命滔天罪行》，載《人大三紅》，1967 年 5 月 11 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1 號，第 28 頁〕；《劉少奇黑線在文藝界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復辟反革命修正主義的 100 條罪行》，載《毛澤東主義戰報》，1967 年 5 月（上旬），第 3 ～ 6 頁；《吳冷西的交待》，載《紅色新華》，第 43 期，1968 年 5 月由帕里斯・張博士翻譯和注釋，編入《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69-1970 年冬季號，第 68 ～ 71 頁。

【4】 《紅旗》，第 2 期，1968 年 8 月 25 日，第 11 頁。這是劉少奇在他 5 月 28 日指示中的用語。當他在 6 月 19 日的指示中重提這個議題時，他用了「官辦」和「民辦」兩個術語。見《毛澤東主義戰報》（見上引文；該引文在這一原始資料中沒有註明日期，但其部分引文轉載在《紅旗》中，注有日期）。毛澤東在 1957 年 4 月也提出同樣激進的建議，當時他提出每個省都應有一份非黨報紙發行，以便同黨報競爭，見前文第 217 頁。

【5】《毛澤東主義戰報》，第 64 期；《紅旗》，見上引文。
【6】這是我對第二個引文的看法，該引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5 號，第 32 頁。
【7】同上，第 32 頁，第一、第二和最後的引文；第 33 頁，第一條引文。
【8】根據吳冷西的說法，劉的聽眾有吳冷西本人（新華社社長）以及他的副手朱穆之，以及胡喬木（《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69-1970 年冬季號，第 68 頁。）
【9】《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5 號，第 31 頁，引文 2 ～ 3。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 60 年代中蘇論戰期間，對於外國攻擊中國的文章，中國人也予以轉載。
【10】同上，最後一條引文。
【11】同上，倒數第二條引文。
【12】《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69-1970 年冬季號，第 69 頁。在劉少奇作指示和十年後吳冷西作交待的這段時間裏，中蘇兩國的關係已發生變化，這使得這位前新華社社長的交待有一些不合邏輯的成分。劉少奇曾反對塔斯社的教條主義，提倡學習西方新聞機構的方法。但在吳冷西作交待時，他卻迫不得已地說，在 1956 年，塔斯社就已變成修正主義，因為它「從西方帝國主義新聞機構中學習了很多經驗」（同上）。
【13】同上。
【14】同上，第 71 頁。這次旅行沒有公佈，但張博士和路透社都肯定，吳冷西在那年訪問過路透社和法新社。
【15】同上，第 71 頁。
【16】根據西德尼・哥魯森在波蘭得到並於 1957 年 6 月 13 日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譯本，毛於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他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講到了這一點。1957 年 6 月，當毛的講話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氣氛中發表時，他作了些修改並刪去了這段話。1957 年 1 月，毛曾坦率地向黨的官員們提出過這個建議：許多人都恨蔣介石，但大多數人不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王八蛋；所以我們必須出版他的著作集，同時也出版孫中山和康有為等人的著作。但他似乎未能使所有的聽眾信服，因為他後來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有一些人反對他的建議。
【17】毛在 1957 年 1 月對地方黨的官員談了要創辦這份報紙的問題並在 3 月 1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建議，准備將這份報紙從 2000 份擴大到 30 萬份〔《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86、95 頁〕。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總結發言，第二次提到這個問題，但 1957 年 3 月 2 日這一日期不准，因為最高國務會議是在 3 月 1 日結束的。當本文作者 1972 年秋訪問中國時，《參考消息》已發行 600 萬份（見麥克法夸爾：《對中國出版界的一次訪問》，載《中國季刊》1973 年 1-3 月，第 148 頁）。對該報詳細的說明見漢瑞・G・斯克瓦茲：《〈參考消息〉：中國官員是多麼瞭解外部世界的？》，載《中國季刊》，1966 年 7-9 月，第 54 ～ 83 頁；尤其是 57 頁（推測該報首次發行的時間是 1956 年）和 78 頁（對該報刊登非共產黨國家的消息的范圍與公開報紙刊登的范圍作了比較，即公開報紙也登些外國消息，但登得較少，而參考消息登的多）。
【18】《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勝利萬歲》，第 6 ～ 9 頁。
【19】《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69-1970 年冬季號，第 69 頁。
【20】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328 號，第 3 頁。
【21】同上，第 3 ～ 4 頁。
【22】《劉少奇三次奪取我國新聞界權力的反革命滔天罪行》，載《人大三紅》，1967 年 5 月 11 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1 號，第 28 ～ 29 頁〕。
【23】同上，第 28 頁。
【24】倫納德：《斯大林之後的克里姆林宮》，第 195 ～ 196 頁，202 ～ 204 頁。
【25】見拉斯基：《匈牙利革命》，第 192 ～ 193 頁。
【26】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附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第 1 部分，1956 年 2 月 7 日，第 42 頁。
【27】同上，第 37 ～ 43 頁。

【28】 同上，第 41 ～ 42 頁。
【29】 見張鼎丞最高檢察長在 1957 年全國人大會上的講話（《當代背景》466 號，第 4 頁）。
【30】 引自《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選輯》(《中國大陸雜志選》653 號，第 38 頁)。據說，劉 2 月份在一位檢察院的官員作工作報告的會上講了話。此處的刪節是小冊子的編輯作的。
【31】 同上，第 41 頁。
【32】 人們將會記得，這個秘密報告是在 2 月 25 日發表的。沒讓外國代表出席這次會議——見 2 月 24 日會議主席的通知，該通知說，秘密會議將由「具有協商權和決定權」的代表們參加或「決定和協商」。倫納德則認為，在西方出版的這個秘密報告的譯文可能是為外國共產黨准備的，經過審查的譯本。這就暗示了，沒有外國代表聽到赫魯曉夫的報告。由於審查譯文的准備工作花費了一點時間，似乎有理由推測，中國人直到 3 月初才知道秘密報告的內容，3 月 3 日，當鄧小平回到北京時，可能帶回了報告的副本。
【33】 柯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法程序，1949-1963 年》，第 11 頁。
【34】 同上，第 12 頁。
【35】 關於這次會，新華社 4 月 7 日的報道，僅僅說已在最近舉行（《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72 號，第 3 ～ 4 頁）。彭真 3 月 6 日的講話，是我能找到的與這次會有關的唯一確切的日期。彭講話的日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披露出來的。
【36】 我未能找到任何陳毅講話的引語。
【37】《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72 號，第 4 頁。
【38】 柯漢上引書，第 11 頁。最高檢察長的講話也無從得到。
【39】「也許，甚至反革命分子自己也知道了他們在 1955 年將扮演的角色，彷彿有某種信號，他們開始在全國的各個角落加緊活動，從而導致 1955 年打擊他們的群眾運動。一年以後，好像又通過某種暗示，成批的反革命分子開始在運動中坦白，以得到黨的寬大處理」(喬治·金伯哥和阿得·斯坦克：《共產黨中國的人民檢察院：權勢蒸蒸日上的機構；1954-1957 年》，載《中國季刊》，1968 年 4-6 月，第 126 頁)。
【40】 如果考慮一下彭真在 1 月份勝利地領導社會主義改造，則對於加入了公私合營的資本家人數的估計是很謹慎的。但也許這個估計是實在的，因為緊接著在 2 月份，陳雲提出要停止這種改造（見前文，第 25 頁）。
【41】 引自「彭真反革命黑話選輯」，載《摧舊戰報》，1967 年 5 月 25 日，第 2 頁。
【42】 見美國新聞處出版的秘密講話原文第 13 頁，倫敦，1956 年 6 月 5 日。
【43】「農民要求監管反革命」，這是一句不太明確的話，但彭真可能是指最近關於吸收反革命分子進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定（見前文第 36 ～ 37 頁）。司法部門的官員可能反對這樣做，認為這是一個有風險的步驟，因為它將使民眾逐漸喪失對反革命的警惕，使農業生產合作社放棄必要的監督。然而，正如我們看到的，還有許多基層幹部和農民不喜歡這個政策。
【44】 在這裏，彭真顯然認為，工商業內部的相互揭發證明敵人已被擊敗，為什麼寬大政策就行不通呢？
【45】 當然，彭真指的是哲學意義上的唯物主義。
【46】 談到這一點時，這本彭真言論集的編者加了這樣一句話：「顯然，在反革命開始投案後，仍有反革命在活動。」
【47】《彭真反革命黑話選輯》，載《摧舊戰報》，1967 年 5 月 27 日，第 3 頁。
【48】《彭真罪行錄》，載《滿江紅》，1967 年 5 月 31 日，第 2 頁。
【49】 這是《滿江紅》編者添加的字句。
【50】 同上。
【51】《彭真在無產階級專政領域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續)，載《政法紅旗》，1967 年 10 月 7 日，第 8 頁，第 50 條（也見第 42 和 57 條）。
【52】 新華社 4 月 26 日消息。〔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 557 號，第 18 ～ 19 頁〕。這個律師是艾爾溫·瓊斯（王室律師、議會議員），

他後來成為 1964 年工黨政府的首席檢查官。這時他同另一位英國律師以及兩名法國律師正在訪問中國。

【53】 例如，全國各地律師事務所的建立，到 8 月初已達 295 個〔見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585 號，第 13 頁〕。也見於司法部長史良 5 月 25 日給國務院的報告〔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565 號，第 12 頁〕。

【54】 金斯伯格和斯坦克（《中國季刊》1968 年 4-6 月）第 101 頁。

【55】 《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選輯》（《中國大陸雜志概覽》653 號，第 36 頁、37 頁、39 頁）。

【56】 同上，第 38 頁（還有一條引語，摘自劉少奇 7 月 7 日的講話，第 40 頁）。

【57】 會議的日期是根據鄧小平在一次公安會議上講話的日期判斷的（見《鄧小平在文化藝術領域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載《紅色宣傳兵》,1967 年 5 月 23 日）。據說鄧是在一次公安工作會議上講話，而彭是在全國省局級公安幹部會議上講話。我認為，為了官員們的方便這兩次會議可能是同時召開的。

【58】 金斯伯格和斯坦克，見上引文。

【59】 《彭真在無產階級專政領域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載《政法紅旗》，1967 年 10 月 17 日，第 8 頁，第 51 條。

【60】 同上，第 52 條。

【61】 見公安部長羅瑞卿的講話，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附錄：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1956 年 6 月 28 日），第 3 號，第 17 ～ 24 頁，特別是 19 ～ 20 頁。

【62】 毛已在他的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指出了這一點（陳譯毛選，第 79 頁）。

【63】 見最高檢察長在 1957 年全國人大會上的講話，《當代背景》466 號，第 4 頁。

【64】 斯萊克：《敵與友：中共歷史上的統一戰線》，第 242 頁。

【65】 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576 號，第 4 ～ 5 頁。

【66】 同上，577 號，第 8 頁；579 號，第 10 ～ 11 頁。

【67】 同上，576 號，第 4 頁。

【68】 同上，第 5 頁。

【69】 1957 年 7 月 18 日《人民日報》披露。在第 276 頁引用和評述了章伯鈞的談話。

【70】 《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這篇小說，在戈德曼所著《共產黨中國的文學分歧》第 179 ～ 180 頁、182 ～ 183 頁、185 頁，以及福克瑪：《中國的文學理論與蘇聯的影響》第 99 ～ 103 頁中作了評述。

【71】 周揚有一句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抨擊，他說把 1942 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會上，毛曾發表關於文藝的著名的講演）看成是新文學藝術的開始是不對的。鑒於魯迅，這位在毛和毛主義者看來是 20 世紀中國文學頂峰的人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已去世 6 年，很難說周揚的話就是如後來認為的那樣是反毛的。見許廣平：《不允許周揚攻擊和誹謗魯迅》，《紅旗》，1966 年第 12 期（《中國大陸雜志選》544 號，第 10 頁）。

【72】 見戈德曼上引書，第 7 章。

【73】 關於對毛和陸定一 5 月講話反應的描述，見同上，第 165 ～ 182 頁；福克瑪上引書，第 90 ～ 108 頁。

【74】 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597 號，第 8 頁。

【75】 例如，有一次，一篇由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高級成員所寫的文章，被播送給台灣他以前的國民黨同僚（見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597 號，第 12 頁。

【76】 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附錄：中國人民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1956 年 2 月 7 日），第 1 號，第 21 ～ 22 頁。

【77】 同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1956 年 7 月 5 日），第 5 號，第 13 頁。

第七章 第一次「躍進」的結束

【1】 毛6月10日回到北京（1956年6月11日《人民日報》）。毛曾在1958年1月南寧會議的一次講話中透露，1956年夏天北戴河的一次會議上確定反對「盲目冒進」，並反映在全國人大的報告中。我推斷這是一次高級別的會議，可能有毛參加，不然它不會在政策方面產生如此深遠和直接的影響。〔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149頁。〕
【2】 《當代背景》392號，第11～12頁。
【3】 《共產黨中國：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29頁。
【4】 1956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當代背景》392號，第12頁）。「冒進」字面的含義是：「盲目前進」。
【5】 同上，社論（《當代背景》392號，第20頁）。
【6】 《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傾向》，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321號，第11～14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將標題翻譯為「反對保守主義和急進主義」。我將標題譯得更長些，以指出即使在一片主要意圖是抑制冒險主義的社論裏，保守主義（作為一種「主義」）還是被認為比急躁傾向具有更嚴重更長期的危險（急躁不是「主義」而是「傾向」）。
【7】 同上，第13頁。
【8】 同上。
【9】 《吳冷西的交待》，《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69-1970年》，第72頁。
【10】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148頁、151～152頁；《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69-1970年》，第72頁。（前一個資料，第152頁，毛說他寫的是「不看」；後一個資料，吳冷西說寫的是「不看了」。這個表示有些令人迷惑，但在出現毛自己的說明以前，帕里斯·張博士已推測出正確的含義（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上述引文，第82頁）。《吳冷西的交待》的譯者在《中國大陸雜誌選》662號，第5頁中，也正確地譯出了「Not read」（不看了）。
【11】 《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69-1970年》，第72頁。看起來，直到1958年1月，毛在南寧會議上提起來，吳才知道這篇社論是怎麼寫的。因此，他揭發劉的唯一理由是這篇社論是由劉批准的。
【12】 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載《紅旗》，1967年第5期。（《北京週報》，1967年4月7日，第15頁）。
【13】 劉的三次交待見《劉少奇選集，1958-1967年》，第357～377頁。他在「交待」中詳細答覆了戚本禹的指責，參見該書第365～368頁。
【14】 《共產黨中國：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24～427頁。
【15】 「56年反冒進，我負有責任，我是檢討了的」，這段話是從周恩來1967年4月6日講話中引證的，我非常感謝西克先生送給我載有這番話的一份牆報原文的副本。不幸的是，當西克先生通過海底電纜將這一牆報從北京拍送到他的報紙《讀賣新聞》後，這段話的影像有些模糊，以致於該報1967年4月14日出現了這樣的報道，暗示周恩來對冒進本身承擔責任而不是對反對冒進承擔責任。
【16】 關於陳雲和毛關於財政上的局限性發生意見衝突，見前文，第60～61頁。
【17】 他在1956年1月未能提高五年計劃的指標，以此表明了他的態度。
【18】 當然，他在全國人大會上首先抨擊冒險主義。
【19】 鄧子恢沒有出席制定十二年綱要的最高國務會議。
【20】 見薄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當代背景》407號，第5～6頁。在文化大革命中，薄被指控參與了反冒進；見《反革命分子薄一波犯下的滔天罪行》，載《井岡山》，1967年1月1日，第14頁。
【21】 見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出處同上，第39頁。
【22】 《當代背景》891號，第118頁。
【23】 《共產黨中國：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18頁。
【24】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321號，第11頁。

【25】 當然，簡要提到了毛在新聞發佈會上講了關於知識分子會議的問題；見前文第 35 頁。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其原文發表在《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8 ～ 34 頁。
【26】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321 號，第 12 頁。另一個例子是試圖掃除文盲。「十二年綱要」提出，在五至七年之內完成，但有些省可在四至五年內，有的縣可在三年內，縣以下甚至可在更短時期內完成。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幹部們利用農民休息時間，甚至在農忙季節，辦掃盲班，其結果是，農民在課堂上打瞌睡。《人民日報》指出：「這些積極分子的熱情是值得讚揚的，但他們的方法是錯誤的。」（同上）
【27】 紅機兵：《中國赫魯曉夫阻撓農具改革運動的罪行必須徹底清算》，載《農業機械技術》，1968 年第 3 期（《中國大陸雜誌選》624 號，第 9 頁）。這份材料沒有指名道姓說出是誰下達這一命令，只是提「以中國赫魯曉夫（指劉少奇）為首的一小撮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沒有指出下達這一命令的精確日期，但似乎是夏末秋初的某個時候。

犁是按開墾過西伯利亞處女地的蘇式犁制做的。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提議，在三至五年內，要生產並推廣使用 600 萬張犁。在 1956 年前半年生產了 140 萬張犁，但只分配出去 10%，並且僅有 5% 被實際應用。問題是，拉犁的牲口沒有足夠的力氣拉著這種犁穿過潮濕的土地（見羅・赫夫海茲：《共產黨中國的農村管理》，載《中國季刊》，1962 年 7-9 月，第 148 頁）。
【28】 沃克：《中國的農業規劃……》，第 63 頁。1956 年中農村問題的官方報告，見鄧子恢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當代背景》393 號，第 25 ～ 27 頁）。
【29】 沃克上引書，第 63 ～ 65 頁。
【30】 同上，第 61 ～ 63 頁。沃克指出，豬的存欄數下降，也是由於飼料缺乏、收購價低以及殺豬稅高所致。
【31】 同上，第 63 頁。
【32】 《戰勝災荒的最重要辦法》，1956 年 9 月 14 日《人民日報》社論（《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384 號，第 5 ～ 6 頁）。
【33】 沃克，第 65 頁。
【34】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382 號，第 12 ～ 26 頁。
【35】 甚至 1 月份向最高國務會議提出這個綱要的農業部長廖魯言，也顯得對綱要喪失了信心；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52 頁。（在引文中只是提到了「廖某某」，但是在語境下農業部長應該指的就是廖魯言。）

附錄一：陸定一對毛澤東百花齊放方針的解釋

【1】 見《陸定一的反動鳴放綱領必須徹底批判》，載 1967 年 8 月 29 日《人民日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19 號，第 1 ～ 8 頁）。
【2】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54 頁。
【3】 1956 年 1 月 26 日《人民日報》。
【4】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54 頁。
【5】 《蘇聯共產黨歷史》，第 501 頁；這段陳述是根據斯大林在 1936 年 11 月 25 日蘇維埃的第八次特別代表大會上作的關於國家憲法草案的報告。見斯大林：《列寧主義》，第 561 ～ 590 頁，特別參見第 563—567 頁。聯繫陸談話的上下文，可以看出來，有一些八大政治決議產生的爭議的預演（見前文，第 119 ～ 121 頁）。但陸並沒犯毛後來所批評的錯誤；他沒有說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矛盾不再是中國的主要矛盾。而且，陸在講話中只談到了在社會主義建立之後，消除剝削階級的問題；而毛的觀點是，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矛盾是基本矛盾。（《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25 頁）
【6】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54 頁。
【7】 同上，第 130 頁。
【8】 同上，第 286 頁。

【9】 同上，第 155 頁。
【10】 同上，第 283 頁。
【11】 同上，第 155 頁。
【12】 同上，第 275 頁。
【13】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19 號，第 2 頁。
【14】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88 頁。
【15】 對陸提出的四點理由的攻擊，是文章中唯一一處認真地對陸講話中有問題部分的攻擊。其它很多簡短的引語，顯然來自別的時期的講話。某些對 5 月 26 日講話的具體指責是毫無根據的。例如，說他只談到合作，根本沒有提批判鬥爭或思想改造（《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19 號，第 6 頁）；實際上，他用了整整的一段談到批判和學習。早些時候他還說：「在某組織機構中，反對胡風和胡適的反動思想的運動沒有進行得很徹底；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還未完成。在所有存在上述情況的單位，我們必須將運動進行下去，不能半途而廢。因為只有將這一運動進行到底，我們才能為將來做好必須要做的許多事情創造有利的條件。」（《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55 頁）上述這段話使得那些對陸的指控——說他攻擊對胡適、胡風的批判——變得毫無意義。（《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19 號，第 7 頁）在同一批判文章中，還指責他曾用魯迅的「阿 Q」來作比喻，去攻擊批判胡風、胡適運動。實際上，他用這個比喻（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59 頁），只是強調在廣大群眾中有必要開展建設性的批評，而且，毛在一個月前，在論述十大關係時運用了同一比喻，他要說明的也是同一個道理！（陳譯毛選，第 80 ～ 81 頁）

誠然，正如有人說的，他對於發動一場運動來反對學術性的《紅樓夢》研究進行過批評，但是，他的言語中暗示，他沒有徹底否定這個運動。他僅僅批評在鬥爭中寫的部分（不是大多數）文章的語氣過於惡毒。（《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55 頁）
【16】 在 1957 年 10 月 13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談到了他的百花方針的講話和一篇只標有「×××」作者的文章。從上下文來看，該文作者必定是陸定一，談到的文章也必定是在本書附錄中討論的這篇。毛對陸的文章並沒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見，相反地，他指出了他的講話同那篇文章的相同點。因此我得出結論，在毛看來這兩篇文章即使有什麼不同，那也是無足輕重的。(《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33 頁）
【17】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19 號，第 6 頁。
【18】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53 ～ 154 頁。
【19】 同上，第 288、289 頁。
【20】 見周鯨文（音）：《風雨十年》，第 163 頁。周原是中國民盟的高級官員，在 1957 年赴香港要求避難。
【21】 同上，第 160 頁。

第二編 中共八大

第八章 毛澤東的地位

【1】 關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的論述，參見倫納德：《斯大林之後的克里姆林宮》，第 194 ～ 209 頁。
【2】 在 1945 年黨章的總綱第二條中，毛澤東思想被描述為中國共產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關於黨員的部分第二條第一款，把學習領會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列為黨員正式職責之一。關於 1945 年黨章和 1956 年黨章的相互比較，參見《當代背景》417 號，第 32—76 頁。
【3】 《彭德懷案件》，第 445 頁。

【4】 參見《檔案材料彙編》(《工農兵》增刊 1967 年 9 月) 其譯文登在《中國大陸雜誌概覽》補遺 27 號，第 35 頁。

【5】 見《劉少奇在黨的建設方面制定和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事記》，載《資料專輯》(《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246 號，第 13 頁)。這些人還負責關於黨章的報告。

【6】 彭德懷對這一時間的暗示是含糊的。他的措詞「開八大時」可以理解為「在八大開幕的時候」，表明這個決定是在劉少奇做政治報告的第一次會議的前夜作出的。但如此遲地做決定似乎不太可能。

【7】 見小冊子《對扒手王光美的三次審判》(《當代背景》848 號，第 17 頁)。

一個曾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參加翻譯主要文件的俄國人告訴我，對劉少奇的報告曾有多次修改稿，大會秘書處收到最後一個修改本是在這個報告發表前僅一兩天。結果，在大會召開前的 72 小時內，這位負責翻譯的俄國人幾乎沒有合眼。關於劉的報告的決議到達譯者手中時，大會大約進行了一半；有一些修改本發得晚一些，但是與政治報告相比，時間還不算太倉促。

【8】 見西克的報告，載 1967 年 4 月 14 日《讀賣新聞》。這個報告是依據一份牆報寫的。該牆報引用了周恩來談及第八次代表大會 1958 年會議的報告和決議的話。在我看來，這個牆報的可信度有兩個大的疑點：它對周的話有引述錯誤，實際上周是指 1956 年的會議。當周在 1967 年 4 月講這話的時候，1956 年的報告正因刪去「毛澤東思想」而在不斷地受到指責，而且這些指責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有改變過。周把他所談到的這個報告和決議說成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就我所知，1958 年的報告和決議一直被這樣指責。到 1958 年，把「毛澤東思想」從政治報告和黨章中刪去已不再是討論的話題了。

第二個疑點是，關於 1958 年政治報告的決議非常短：在 1959 年的《人民手冊》第 17 頁上，僅佔七行半的篇幅。因此，即使時間很倉促，也不可能沒有一點時間去徵求毛的意見。再者，在 1958 年的決議中，也沒有什麼毛可能會反對的東西。另一方面，1956 年的決議比 1958 年的決議長得多——佔了 1957 年《人民手冊》的三頁多——並且是一份更加重要的文件。我們將會看到裏面有一些我們確知的被毛反對的內容。

因此，我們假定周恩來談的是 1956 年的決議，那麼在他的講話中就有一點不夠明確的地方需要加以解釋。周在講話時把政治報告和決議都說成是反對毛的思想的，但他沒有具體提到，只有決議在事前沒有給主席看。周的原話是：「沒有給主席看就在會上宣佈了。」無論怎樣，周用了「宣佈」即公佈、發佈，這個詞暗示不是發表一次講話，而是分發一份報告。還有其它有力的證據表明，在大會之前毛至少看過政治報告。參見前文第 101 頁。

【9】 《劉少奇選集，1958-1967 年》，第 367 頁。

【10】 關於預備會的詳情，見《當代背景》411 號，第 1 ～ 2 頁。

【11】 這段引文出現在大量攻擊陳毅的小報中，本書的這段引文來自小冊子《文革風雲》1967 年第 4 期 (《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35 號，第 14 頁)。由於陳毅在八大前還不是政治局成員，所以他提到的那次批准這個報告的會議，可能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或是代表大會前的中央七中全會的三次會議中的一次。不過如是後者，陳毅肯定應該會說這個報告是由中央批准的。

【12】 《毛澤東思想萬歲》(《當代背景》891 號，第 46 頁)。顯然，劉少奇是毛的提到的「這兩個人」中的一個；另一個，從毛這一講話的前一部分以及毛的支持者的插話看可能指鄧小平。(同上，第 44 ～ 46 頁) 然而，毛的這句話也完全可能不是指鄧而是指彭真，因為彭起草了劉的報告中的政治部分。

【13】 這一點可能還適用於準備這個報告的人。

【14】 形式上，毛重新進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並且接替周恩來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 3 卷，第 23 ～ 24 頁，和《周恩來傳》(科林和克拉克合著)。

【15】 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第 39 頁。

【16】 見劉少奇：《論黨》，第 8 ～ 10 頁。

【17】《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輯，第98頁。
【18】指的是1945年通過的《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93頁。
【19】《第八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第1輯，第98頁。歐邁格曾對我談到，他認為劉的這段話還是在合作化問題上為他自己辯護。邁克爾還提出，第一句話還有意為現在身居要職的「叛徒們」辯護。見下文，第358頁，註釋33、41，有關「叛徒」問題的敘述。
【20】這段話的含義沒有逃過毛的注意：在「文革」中對這段話多次進行批判就可以看出這一點。見有關劉的小冊子：《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選輯》(《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51號，第18頁）及《劉少奇反革命講話》(北京：批判劉一鄧—陶聯絡站;「紅旗公社」，北京鐵路局，紅衛兵團，1967年4月，譯文在《中國大陸雜誌概覽》補遺25號，第2～3頁)。
【21】《論黨》第9頁。
【22】《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輯，第104～105頁。
【23】《論黨》，第8～10頁。
【24】時任黨中央副秘書長的宋任窮在八大上作了有關集體領導的講話。他在講話中由於將「家長式個人領導」和集體領導加以比較而在「文革」期間受到批判。這可以被看作是對毛的一種隱諱的攻擊，但是這似乎又不大可能，因為宋僅僅是負責下級常委的工作。他的講話譯文登在《時代背景》419號，第10～15頁。對他這一段話的批判包含在6頁歷數宋任窮罪行的標題為「堅決打倒東北地區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宋任窮」的文章中（沒註明日期，是由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罷宋團」發表的）第1頁。

宋也許在八大的一次分組會上做會議主持人，這次會上對從黨章上刪除「毛澤東思想」一詞正式達成了協議。見《紅旗通訊》批判他的文章，1968年5月26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201號，第10頁)。
【25】見《毛澤東選集》1961年，第267～268頁。註腳以明顯讚賞的語氣引用了鄧在八大報告中關於這一決定所做的說明。兄弟黨代表可能不瞭解1948年黨中央決議的作者是誰，因為那時毛的著作的有關選集還沒有發行。
【26】《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輯，第192～194頁。
【27】同上，第200頁。
【28】非常有趣的是，蘇聯的理論家L.F.依廖曉夫在蘇共二十二次黨代會上採用了相同的手法維護他的上司赫魯曉夫，說他自己並沒有搞個人崇拜。他的話是這樣講的：「將我們領袖的權威同個人崇拜混為一談是不對的，而且是有害的。」法國蘇聯問題專家，米歇爾·塔特在引用這句話時評論說：「此話的意思是，凡是能提高赫魯曉夫威望和權威的讚揚或別的什麼，就其本身而言並不是壞事。」(見塔特：《克里姆林宮的權力》，第203頁)。

鄧小平的話在「文革」中被用來批判他（我認為是沒有道理的)。但錯誤地對它進行翻譯就會使人相信批判是對的。例如，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8號，第1頁，鄧的這段文章被譯為：「熱愛領袖的表現，其本質是熱愛黨的利益、階級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個人的神化。」這段譯文暗示了鄧在告訴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們，他們對毛的熱愛最好的表達方式是熱愛黨，而不是直接讚揚主席。關於對鄧的其他指責，見附錄二，第149頁。
【29】《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輯，第200～201頁。
【30】同上，第17頁。
【31】同上，第15頁。
【32】同上，第227頁，重點號是我加的。
【33】同上，第216頁。
【34】見《彭真的反革命集團同劉鄧之間的黑線關係》，載《新北大》，1967年6月10日，第4頁，合訂本2。
【35】「未被公佈」的意思是「不當眾公開宣佈的」；但許多黨的幹部肯定是知道「二線」部署的計劃的。

【36】 羅和伊文斯：《逃出紅色中國》，第 221 ～ 222 頁；羅的報道在穆福深著的《百花凋零》一書中得到證實，第 166 頁。
【37】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222 頁。通過比較 1945 年和 1956 年中國共產黨黨章，可以看出，正式的職權範圍是相同的，即負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38】 同上。
【39】 見劉易斯：《共產黨中國的領導層》，第 110 頁。
【40】 《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40 頁。
【41】 此條引文可見於多種「文革」資料中，例如《打倒劉少奇——反革命劉少奇的一生》（北京：北京第四醫院，井岡山戰鬥隊，1967 年 5 月，第 13 頁）
【42】 《資料專集》（《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46 號，第 14 頁）。
【43】 有 23 位代表，主要是級別低些的，沒有表示贊同任何人。也許他們的講話沒有被全文報道。
【44】 見批判宋任窮的文章，《堅決打倒東北地區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宋任窮》第 1 頁。
【45】 雖然並不一定具有同等資歷。
【46】 我沒有把在省裏工作的中央委員計算在內，理由是毛及「文革小組」對北京以外發生的事情的控制小得多。另一方面，在中央，一位被認為價值很高的幹部，如果受到重視的話，就會比較容易地獲得幫助，使自己倖免於難。如原石油部長余秋里，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若把在各省工作的中央委員都計算在內，這種相互關係就不十分鮮明了，但仍然是明顯的。在八大會上提到毛澤東的講話的所有中央委員的 40.9% 在九大再次出現，而沒有提的只有 31.2% 再次出現。
【47】 或者在 1956 年 9 月，或者在 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會議以後。
【48】 在附錄四中，對如何提到毛的情況進行的分析表明，這個問題本身並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第九章 關於自由化的爭論

【1】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7 頁。
【2】 我是根據《人民手冊》的原文得出這一結論的。
【3】 我沒有把在黨代會上對非黨人士的歡迎掌聲——這是毛在其講話結束時要求的——看作就是對統一戰線的鼓掌。很顯然，熱烈的掌聲只不過是禮節的一部分。再者，要想從掌聲中分辨出有多少成分是為非黨人士的，有多少成分是為毛入座的，這是很困難的。但是，毛用這樣的歡迎而不是用鼓舞人心的要求大會代表努力奮鬥的號召來結束他的講話，這一事實是有一定意義的。（他的講話倒數第三段看起來像是一個更自然、更有力的結尾。可以同他在七大開幕式上的講話（見《毛澤東選集》第 3 卷，第 253 頁）作比較。）
【4】 《人民手冊》1957 年，第 9 頁。
【5】 劉在 1956-1957 年，曾在一些場合說中國應向蘇聯學習，為此他在文革期間受到一系列的批判。參見《過去 17 年中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載 1967 年 5 月 6 日《教育革命》（見《聯合研究出版中心》932 號，第 16、25 頁）。然而，毛在他的八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也曾說過話：「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和蘇聯建國初期大體相同的任務。要把一個落後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於學習。要善於向我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要善於向各人民民主國家學習，要善於向世界各兄弟黨學習，要善於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2 頁）不過，在私下裏，毛看起來對蘇聯的看法要負面得多。有一個例子是毛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對蘇聯經濟策略的批評。另一個例子是，毛在 1957 年 3 月對教育部的批評，當時他說：「這是蘇聯的教育部還是中國的教育部？如果是蘇聯的教育部，那麼就把你們的機

構廢除。」(《高等教育領域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載《教學批判》1967年，第2期，第11頁）然而，毛即使這樣說，也沒有要完全拒絕蘇聯經驗的意思，他只是指責不要盲目地照搬。1957年1月，匈牙利事件後，毛在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總結中對各省的幹部說：「還是要學習蘇聯。他們有很多好東西可學。要有選擇地學，先進的，有用的東西一定要學，錯誤的東西也要批判地學。」〔《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84頁〕

【6】 見倫納德：《斯大林之後的克里姆林宮》，第209頁；津納主編：《東歐的民族共產主義和民眾騷亂》，第126～142頁。

【7】 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91頁。

【8】 同上，第148頁。

【9】 見1956年7月24日。《解放軍報》討論這一決定的社論。

【10】 見新華社從西南發回的報道（《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382號，第38頁）。

【11】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輯，第100～101頁。

【12】 同上，第173頁。

【13】 同上，第101頁。

【14】 同上，第102頁。

【15】 同上，第174頁。

【16】 同上，第103頁。

【17】 同上，第73～77頁。

【18】 見《三反分子彭真的檔案材料（1957—1958年）》，載1967年8月8日《東方紅戰報》，第2頁。及《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30頁。此事看來是劉少奇在11月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次會議上提出的，在1957年2月彭真就這個問題作了報告。這個提議可能代表了劉少奇的意圖，即劉要求自己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來監督周的政府機構的活動。這一建議大概因為1957年5-6月中那些事件而沒有得以實現。

【19】 在1956年某時，劉對民主黨派人士發表了講話，指出他支持「長期共存」的方針。因為他相信，民主黨派同中國共產黨相比，在某些方面（應該是經濟發展）能更好地動員一些社會階層。（見邵柏：《駁黨內頭號野心家的「階級合作」理論的幾個基本觀點》，載1967年6月29日《光明日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987號，第2頁）

【20】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輯，第126頁。

【21】 同上，第132頁。

【22】 同上，第181～182頁。

【23】 同上，第186～187頁。

【24】 同上，第166～167頁。

【25】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7～122頁。

【26】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輯，第177頁。

【27】 同上，第178頁。

【28】 同上，第176頁。

【29】 劉少奇：《論黨》，第53頁。

【30】 同上，第53～62頁。

【31】 實際上，「群眾路線」這一短語在1945年的黨章中沒有出現過。

【32】 《當代背景》417號，第35頁。1956年的譯文在第37頁上。

【33】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輯，第176頁。

【34】 《當代背景》417號，第37頁。

【35】 見前文，第141頁。由於一些西方觀察家們認為劉和鄧是同一類型的人，所以這一問題特別重要。如：見路易斯：《領袖、委員和官僚：文革的最後階段中的中國政體》；何炳棣和鄒儻著：《中國在危機中》第1卷，第2冊，第465頁。此書中他把1956年說成是「延安政治委員們沒有分歧的一年，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

【36】《劉少奇選集，1958-1967 年》，第 367 頁。劉做的這一評論意思應該是說，毛直到政治決議快要在會上通過時才看到（至少是通讀）決議的原文；的確，毛若在通過決議前的哪怕 24 小時看到了，他就能對不滿意的段落進行改動。如果這一假定成立，那麼毛對政治決議的審查過遲是由於辦事效率不高還是由於毛對陳伯達的信任（見 121 頁）？
【37】《中國共產黨第八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115 ～ 117 頁。
【38】同上，第 7 頁。
【39】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22 ～ 126 頁。
【40】斯大林：《列寧主義》，第 564 ～ 567 頁。
【41】同上，第 567 頁。
【42】見前文，第 44 ～ 45 頁，及《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48 頁；亦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22—126 頁。生產關係是與生產過程相聯繫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一些人控制了生產資料，並僱傭其他人去進行生產時，這種生產關係是敵對階級的關係。（見亨特：《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第 37 ～ 38 頁）
【43】《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80 ～ 281 頁。
【44】同上，第 276 頁。
【45】毛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含蓄地否定了政治決議中的分析，而他在三中全會上講話則更加明確地否定了這個分析。明確的否定確實是始於反右運動開始以後（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而言，它可能在公開發表前作了修改）。但有確切的證據表明，在反右運動使中國領導人重新強調階級矛盾以前，毛就否定了這個理論公式。參見他 1957 年 4 月在華東局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07 頁。對毛來說，不幸的是，當他終於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優勢地位的時候，他卻覺得，公開修改決議將會使整風連最微小的效果都得不到（參閱前引書第 124 頁）。
【46】《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82 頁。

第十章 第二個五年計劃

【1】《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272 頁。
【2】同上，第 272 ～ 273 頁。
【3】這個詞譯成：「impatience and rashness」（「不耐煩和草率」），同上，第 274 頁；我用的是前面所選擇的譯法（見本書第 101 頁）。
【4】同上。
【5】同上。
【6】同上。
【7】同上，第 274 ～ 275 頁。據後來透露，甚至十二年綱要文件本身也給經濟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據 1956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1441 號，第 25 頁）說，農業發展綱要圖解印了 170 萬冊，其中積壓了 120 萬冊，嚴重地浪費了紙張，影響了其他書籍的出版。社論的標題是《為什麼書籍又缺又濫》。
【8】《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275 頁；參閱本書第 90 頁。
【9】同上，第 276 ～ 277 頁。
【10】同上，第 278 ～ 279 頁。
【11】同上，第 296 頁。
【12】《人民手冊》1957 年，第 75 頁，第 1 欄。
【13】薄提出積累率在國民收入中應不低於或略高於 20%。這與 1955 年的 20.5% 是一致的，但小於 1954 年的 21.6% 和 1956 年的 22.8%。談到實行這一數字的必然結果時，他主張國家預算收入在國民收入（投資的主要來源）的比重，應略高於 30%（1954 年是 32.4%，1955 年是 31.9%，1956 年是 31.5%），國家預算用於基本建設的比重，應略高於 40%（這個數字雖比前幾年有相當的增長，但大大

地低於 1956 年的 46.7%)。(薄一波的講話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45 ～ 62 頁。）薄要削減基本建設投資的提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參閱《打倒「三反」分子、大叛徒、工交戰線的惡霸薄一波》,1967 年 2 月 15 日《東方紅》(《當代背景》878 號，第 6 頁)；參閱《兩條路線鬥爭史》、《農業機械技術》，1968 年第 9 期（《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33 號，第 5 頁)。
【14】《人民手冊》1957 年，第 9 頁。
【15】《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298 ～ 299 頁。
【16】同上，第 299 頁。
【17】農業十二年發展綱要提出了 1967 年的產量指標，而不是產品指標，但這兩者顯然是密切相關的；參閱本書第 28 ～ 29 頁。
【18】《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264 頁。
【19】《人民手冊》1957 年，第 14 頁，第 1 欄；第 37 頁，第 1 欄。
【20】《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264 頁。
【21】同上，第 40 頁。
【22】《人民手冊》1957 年，第 40 頁，第 1 欄；第 59 頁，第 1 欄。
【23】同上，第 41 頁，第 1 欄；第 59 頁，第 1 欄；第 63 頁，第 2 欄。
【24】同上，第 15 頁，第 1 欄。
【25】本書第 88 頁提到的周恩來對 1956 年反冒進問題的自我批評，可能是在 1957 年底或 1958 年初，大躍進已經發動時作的；參閱本書結語部分，預計出版的本書第二卷《大躍進，1958-1962 年》也將談到這個問題。
【26】在 1956 年 12 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劉說：「問題的癥結在於，發展的速度太快了。明年我們將不得不減慢下來。如此高速度的發展將會導致許多問題。」(《兩條路線鬥爭史》關於中國的農機戰線部分；《農業機械技術》1968 年第 9 期；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33 號，第 5 頁)。
【27】1956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報》。
【28】1956 年 9 月 29 日《人民日報》。
【29】同上。
【30】同上。
【31】1956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報》。
【32】1956 年 9 月 20 日《人民日報》。
【33】1956 年 9 月 21 日《人民日報》；張德生所描述的情緒與 1958 年大躍進時的情緒的相似之處，在本書第二卷將更為明顯。
【34】1956 年 9 月 29 日《人民日報》。
【35】1956 年 9 月 21 日《人民日報》。
【36】1956 年 9 月 20 日《人民日報》。
【37】1956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報》。從這個講話來看，周小舟在 1959 年成為大躍進的四個主要批評者之一，這似乎並不令人感到驚奇。本書第二卷將談到這個問題。
【38】1956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報》。
【39】1956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報》。
【40】1956 年 9 月 19 日《人民日報》。
【41】1956 年 9 月 29 日《人民日報》。
【42】同上。
【43】1956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報》。
【44】1956 年 9 月 20 日《人民日報》。
【45】《新華半月刊》，1956 年第 21 期，第 171 頁。
【46】1956 年 9 月 29 日《人民日報》。
【47】1956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報》。
【48】同上。
【49】1956 年 9 月 19 日《人民日報》。
【50】1956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報》。

【51】 1956 年 9 月 21 日《人民日報》。
【52】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77 ～ 78 頁。
【53】 同上，第 310 ～ 312 頁。
【54】 《人民手冊》，1957 年，第 110 頁，第 1 欄。
【55】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51 頁。
【56】 《人民手冊》，1957 年，第 42 頁，第 2 欄。
【57】 同上，第 60 頁，第 1 欄。
【58】 對有關的一些經濟因素的討論，參閱豪著：《中國城市的就業與經濟增長，1949-1957 年》，第 148 ～ 149 頁。
【59】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286 ～ 287 頁。西方國家所找到的毛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的文本中，有毛號召把國防和行政費用逐步從 32% 減少到 30% 的內容（《當代背景》892 號，第 25 頁）；像本書前面所指出的那樣，這一定是印刷上的錯誤。
【60】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232 頁。
【61】 同上，第 2 輯，第 329 頁。
【62】 同上，第 340 頁。
【63】 同上，第 346 頁。
【64】 同上，第 12 頁。
【65】 同上，第 30 頁。
【66】 同上，第 31 頁。
【67】 歐邁格曾對我說，劉的報告中有關國際事務的部分，也有可能是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起草的。
【68】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93 ～ 94 頁；第 2 輯，第 345 ～ 347 頁。
【69】 同上，第 1 輯，第 84 頁。劉和彭德懷在文中使用「加強」這樣的字眼，而計劃決議則用「增強」。這是否有什麼重要的區別還不清楚，因為通常這兩個詞是可以互換的。
【70】 可以想像，劉可能不喜歡和平共處政策帶給周恩來的相當突出的聲望。隨著中國對外友好政策模式的不斷形成，周恩來同時擔任總理和外交部長兩職所享有的聲望，遠遠超過了他在中國孤立時所具有的聲望（同樣，劉強調要分散政府的權力（雖說這是完全合理的，因為毛也極力主張這一點）可能還出於想削弱周的政府機構，以加強黨的機構的地位的目的）。印尼總統蘇加諾為我們提供了周享有更大的聲譽的一個有趣的例證。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後不久訪問中國，在訪華期間的一次講話中說：「每一個偉大的國家都有其偉大的人物，印度有聖雄甘地，蘇聯有列寧，中國有孫中山、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第 602 號，第 15 頁〕一個西方作家於 1957 年上半年訪問中國，花了點精力瞭解中國的情況。在談到中國受人愛戴的英雄時，他提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其他人」。（見卡梅倫所著《中國在微笑》，第 50 頁）。
【71】 有關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概況，參閱《人民手冊》1957 年，第 308 頁。關於由這個新部承擔這一任務的情況（這個部於 1958 年 2 月改名為第二機械工業製造部），參閱多尼索恩著：《中國經濟體制》，第 128 頁。
【72】 參閱《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 30 頁。這份資料沒有提及第三機械工業製造部，只談到成立了一個「國防管理機構」。

第十一章 新的中央領導人

【1】 有關這兩個政治局組成的具體情況，參閱本書附錄六，第 165 頁。
【2】 朱德、彭德懷、林彪。
【3】 羅榮桓、陳毅、劉伯承、賀龍。

【4】 他們是賀龍（第一野戰軍）、劉伯承（第二野戰軍）、陳毅（第三野戰軍）和林彪（第四野戰軍）。
【5】 周恩來、陳雲。
【6】 副總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財政部長李先念、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政治局候補委員）。（薄一波是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不久被任命為副總理的）
【7】 陸定一，中共中央宣傳部長。
【8】 見郭華倫著書第 3 卷第 23 ～ 26 頁；陳志讓：《遵義會議決議》，載《中國季刊》1969 年 10-12 月號，第 20 頁。
【9】 見郭華倫著書，引文同前。
【10】 見郭華倫所著書第 3 卷第 326 ～ 328 頁。
【11】 同上，第 340 頁。
【12】 不清楚的是，鄧的這個職務是從別人手中接管過來，還是到此時才重新設立的。有份材料提出這個職務從 20 年代起就有，但到 40 年代就沒有了；參閱科林和克拉克所著書有關鄧的傳記，第 823 頁。
【13】 據科林和克拉克所著書第 715、716 頁，彭真在 40 年代初和 1949 年至 1952 年兩度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文革期間的一份材料說，彭真在 1950 年（再次？）成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參閱《劉少奇制定和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建黨路線大事記》資料專集，1968 年 11 月，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4 號第 12 頁。
【14】 周恩來很可能是根據毛的提議而提名鄧小平為副總理的，本節將談到毛此舉的原因。同樣的原因可能也適用於 1954 年任命林彪為副總理並排在彭德懷的前面。參閱本章第 3 節。
【15】 上述這些傳記式資料來源於科林和克拉克所著書第 2 卷。如果把鄧的提升歸因於毛的話，那麼對他來說走運的是，1954 年他成為了中共中央秘書長；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步驟，因為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有點處於守勢，如果鄧不是已經基本上做了兩年多總書記的工作的話，他也許不會成為總書記。
【16】 《徹底揭露、批判和清除劉、鄧、彭、薄及其黑走狗在遼寧工交戰線散佈的流毒》，1967 年 7 月 21 日《遼聯戰報》，第 1 頁。唱讚歌的官員是黃火青，他先後任天津和遼寧的第一書記。
【17】 《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選編》，《中國大陸雜誌選》651 號，第 5 頁。
【18】 卡爾遜：《中國的雙星》，第 252 頁。鄧對國際事務的興趣應該是在留法六年期間裏培養起來的。
【19】 《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51 號，第 5 頁。
【20】 見克羅夫特所著書，第 251 頁。
【21】 同上，第 250 頁。
【22】 《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51 號，第 5 頁。這個評述還有一個稍為不同的譯文，這個譯文使周總理看上去對鄧甚至更為恭順。見《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揪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推行者陶鑄》，1967 年 1 月 12 日《革命工人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67 號，第 2 頁〕
【23】 參閱郭華倫所著書第 2 卷第 435、489 ～ 496、497 ～ 502、502 ～ 504、504 ～ 508 頁；羅所著書，第 249 ～ 258 ～ 259 頁；蕭所著書，第 240、242、245 ～ 246 頁；陳所著書：《毛和中國革命》，第 178 頁。
【24】 參閱郭華倫所著書第 2 卷第 493 ～ 497 頁；羅所著書，第 258 ～ 259 頁。
【25】 參閱《揭開鄧小平反革命活動的蓋子》，1967 年 4 月 18 日《新北大》，〔《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32 號，第 6 頁〕；《鄧小平反革命罪惡史》第一冊，1967 年 8 月 10 日《人大三紅》，第 4 頁，第 2 欄。
【26】 參閱《周總理談為什麼必須集中火力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派》，1967 年 11 月 29 日《紅戰報》〔聯合出版中心（華盛頓）檔案，第 44574 號，第 28 頁〕。
【27】 參閱毛 1966 年 10 月 24 日講話時對鄧的評價（《當代背景》892 號，第 38 頁）。
【28】 我是根據我所收集的各種材料作出這個評價的。

【29】 如 321 頁註釋 20 所說明的那樣，劉在 40 年代初成為毛的接班人的內幕仍然是不清楚的。其中的一種可能是，這是他在一場交易中所得到的獎賞。他允諾要把毛樹立成為一個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的理論家（如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所做的那樣）。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在這之前，劉還不是毛的熱心的追隨者。（參閱斯圖爾特・R・施拉姆所著：《毛澤東與劉少奇 1939-1969 年》，載《亞洲評論》1972 年 4 月號，第 278 ～ 281 頁）

據周恩來說，毛直到 1964-1965 年才最後決定不讓劉當接班人（《周總理對劉少奇的批判》，1967 年 10 月 9 日《文革通訊》，《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60 號，第 9 ～ 10 頁）。但是，鑒於毛、劉兩人之間的某些根本分歧（例如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以及劉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反對毛（最近的是合作化的速度問題），毛可能早在 1956 年就想留一個保險。這看起來確是林彪地位上升的背景。林 1954 年 9 月當上排在第二位的副總理，1955 年進入政治局。1956 年 9 月在政治局中僅次於政治局常委，1958 年 5 月任政治局常委——而且是在他很少公開露面以至於人們普遍認為他有病的情況下。鄧小平的提升也可能是出於同一原因，特別是如果林彪的健康狀況太差，難以指望他作可靠接班人的話。

【30】 參閱本書作者寫的《論照片》，《中國季刊》1971 年 4-6 月號。

【31】 這裏所作的比較是根據戴維斯所著《大陸中國的地方黨員，1956-1966》第 67 頁的附錄。

【32】 1954-1955 年饒漱石和高崗一起被清洗。在他被貶黜以前，他與劉少奇有多次十分密切的工作關係。參閱科林和克拉克所著書第 408 ～ 411 頁中有關他的傳記。

【33】 安子文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叛徒」集團中的一員。1936 年他們為了能從監獄中釋放出來而簽署了自首書。他們這樣做是根據當時中共華北局書記劉少奇的命令，因為劉希望由此能給華北局補充一批有經驗的幹部。劉得到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批准。參閱《打倒大叛徒集團的老闆劉少奇》，《紅旗》（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出版）1967 年 3 月 8 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82 號，第 25 ～ 38 頁）。從 1946 年起，安子文是中共中央組織部的負責人；參閱科林和克拉克所著書，第 4 頁。

【34】 參閱《彭真反革命集團與劉鄧的黑關係》，1967 年 6 月 10 日《新北大》，第 4 頁，第 3 欄。

【35】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95 頁。

【36】 同上，第 101 頁。

【37】 同上，第 215 頁。

【38】 同上。

【39】 同上。

【40】 《劉少奇制訂和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建黨路線大事記》，《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46 號，第 12 頁。

【41】 無論鄧小平如何因為毛的支持而充滿信心，他的權力應該還不足以讓他在黨組織內說一不二。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中央領導召集一次會議，討論那些在 30 年代為了從敵人的監獄中釋放出來而公開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的黨員的身份問題（參閱前注第 33）。雖然這些人與劉少奇有關，而且其中包括了當時的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但鄧小平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要為這些人開脫。並且如果這些人中間有些人被開除出黨，鄧甚至就能提拔他的人選。但據說在這次會議中形成的方案使得大部分的「叛徒」沒有受到懲罰。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文化大革命的論戰中，把這個方案的形成主要歸罪於安子文以及在背後指使他的劉少奇。而鄧只是因為召集了這次會議而被批評負有部分責任。這顯示鄧也許沒有對劉少奇和安子文試圖為他們的同志們開脫這件事感到熱衷。（參閱前引書，第 14 頁）參閱《逮捕大叛徒王鶴壽》，1967 年 5 月 6 日《新鋼院》〔《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88 號，第 20 頁〕重要的是，這篇文革時期的文章中，通篇都把惡意的組織活動主要歸結於劉少奇和安子文。即使

是在講述1954年後的事情的時候，文章也沒有對鄧小平做過多指責。這應該意味著在毛看來，鄧的黨組織工作做得不是那麼不好。

據引文說，1957年劉少奇與毛的一個未註明日期的指示唱反調，指示安子文讓那些自首分子重新入黨。毛的指示是，除了那些表現極壞者，其他所有的自首分子都可以寬大處理，但不得重新入黨。這些引文表示，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所爭論的問題，實際上與安子文這樣的人無關，因為他們已經回到黨內許多年。但是，由於毛的指示可能是在40年代或者甚至30年代作出的，因而事情的真相難以進一步澄清。（參閱《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34頁）

【42】 參閱《彭真反革命集團與劉鄧的關係》，1967年6月10日《新北大》，第4頁，第2欄，參閱有關彭真的檔案材料，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概覽》（補遺）27號，第37頁。

【43】《新北大》，引文同前，劉少奇在1966年說，彭真常常被邀請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會議；參閱《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選編》（《中國大陸雜誌選》653號，第15頁）。另一份材料說，在某些時候，彭真「被派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職」，但在什麼時候，和擔任何種職務則沒有公開說明；參閱《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徹底批判劉鄧陶聯絡站」，東方紅公社，中國科技大學，紅代會1967年6月10日，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39號，第18頁）。

【44】 這是一段很奇怪的情節。在高崗倒台以前，政治局委員的排列順序是：毛、劉、周、朱德、陳雲、高崗、康生、林伯渠、董必武、張聞天、彭德懷、彭真。把高崗清除出政治局以後，在這個名單的後面增加了林彪和鄧小平。到1955年秋，彭真移到第7位，排在林伯渠的前面。沒有明顯的理由解釋這一變動。1956年2月28日，彭真第一次被排在康生之前，這個順序在2月29日和3月2日再次出現。

3月13日晚上11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來到波蘭駐華使館，對波蘭領導人貝魯特的逝世表示哀掉。他們這麼晚才來，表明他們是剛剛才聽到消息，並立即趕來的。次日早上，《人民日報》在報道這一午夜訪問時，又把彭真排在康生之後。然而一天以後，《人民日報》不僅把彭真，而且把彭德懷排在康生之前。在隨後的六周裏，康生繼續受到這種怠慢，在各種場合裏都排在彭真、彭德懷、董必武，甚至在張聞天之後。這種排列最後一次出現在5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在新華社5月8日發表的一條報道中，康生又排在前列，居第六位，僅次於陳雲。直到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康生仍保持這個位置。

我們能從上述情況中看到什麼呢？首先很有趣的一點是，當康生僅排在彭真之後時（即2月28日至3月2日），鄧小平正在出席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康生在3月14日《人民日報》上短暫地恢復原來的位置，這是鄧回國後政治局委員的第一次順序排列。是否有可能是彭真（在鄧小平離開期間彭主管書記處工作）利用赫魯曉夫在他秘密講話中譴責秘密警察（北京應該在鄧回國之前就得知了這件事情）這一機會，把自己提升到政治局中與秘密警察活動最為相關的委員之上？（對康生的討論，見148頁）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恢復到一直被公認的政治局委員的排列順序，可能是根據剛從莫斯科回國的鄧小平的命令（鄧可能不瞭解彭真根據蘇聯形勢的運作）。由於貝魯特的逝世突如其來，政治局委員又是在深夜召集起來的，因此政治局委員的排列順序是臨時決定的，鄧和彭真之間沒有多少協商的機會。

假若事情真是如此，那麼在政治局委員排列名單于3月15日見報之前，彭真可能向鄧作了說明。然而，在這個名單中也把彭德懷以及隨後又把其他政治局委員排在康生之前，這就改變了這件事的意義。起初給人們的印象是，彭真（並且只有他一人）被提到康生之前，觀察家們可能會認為，彭真因為在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表現積極而得到了報償。但是，當其他領導人也排到康生之前時，給人們的印象就不是彭真因其功勞而被提升，而是康生由於其錯誤而被降低了地位。彭真因此就不能從這件事中獲得形象上的提升。

在 5 月 1 日以後恢復原來的排列順序，這可能是黨的高級領導人在 4 月底進行討論以後的結果。可能做出了決定，中國不能像波蘭那樣陷入恐慌（波蘭開始開除國家安全官員），降級應該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進行。

無論這一事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看起來在八大前一年，彭真似乎在進行一系列（部分成功的）試圖提高自己地位的嘗試。

【45】 沒有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的原政治局委員還有康生、張聞天（二人地位下降甚於彭真）、林彪（他沒有發言的原因似乎可以用長期患病來解釋）。

【46】 參閱前注第 44。

【47】 文化大革命時期透露的消息說 1945 年到 1946 年期間，彭真在東北與林彪發生衝突，並被調離東北，而且 1954 年彭真為此向中共中央四中全會提交了一份檢討。（參閱《大叛徒、大黨閥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檔案》，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概覽》27 號，第 36 頁）彭真離開東北可能與他批評蘇聯當時在滿洲的行為也有關係（參閱科林和克拉克所著書第 555 頁有關林楓的傳記）。

【48】 《彭真反革命集團與劉鄧之間的黑關係》，1967 年 6 月 10 日《新北大》，第 4 頁，第 3 欄。

【49】 《彭真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1967 年 6 月 10 日《北京日報》，第 8 頁，第 2 欄。

【50】 同上，第 3 欄，據說彭真在 1956 年曾宣稱:「從今以後我不會盲目相信任何人，不管是誰；我要獨立思考。」（同上，第 2 欄）

【51】 《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51 號，第 38 頁。在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中還提到彭真與劉少奇的關係的地方，不勝枚舉。

【52】 參閱科林和克拉克所著書中有關彭的傳記。

【53】 參閱：《彭德懷案件》，第 195 ～ 197 頁。彭似乎沒有理睬毛關於 1951 年 5 月第 5 次戰役的戰略部署。毛的兒子就是在這次戰役中死去的。

【54】 同上，第 198 頁。

【55】 同上，第 199 頁。

【56】 同上，第 217 頁。

【57】 本書第 2 卷將談到這個問題。

【58】 《彭德懷案件》，第 197 頁。

【59】 在政治上明顯失勢的四位政治局委員中，有三位沒有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他們是彭真、康生、張聞天。彭德懷例外，也許是由於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個原因。在地位明顯沒有下降的原政治局委員中，只有林彪一人大概由於健康關係沒有在代表大會上講話。很可能正是由於這個健康問題，負責起草新的中央委員會臨時名單的安子文，建議把林從中央領導中拉下來。參閱：《彭真反革命集團與劉鄧的黑關係》，1967 年 6 月 10 日《新北大》，第 4 頁，第 2 欄。另一份材料把安子文這種很想把林搞倒的說法與對安子文的下述控告聯繫起來：安提議讓薄一波當政治局委員——大概是代替林當政治局正式委員，因為薄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已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參閱《打倒叛徒安子文！砸爛前中央組織部的獨立王國》，《追窮寇》第 4 期，1967 年 5 月 20 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970 號，第 5 頁）。

【60】 參閱前注第 44。

【61】 參閱郭所著書，第 19、25 頁；陳所著論文，載《中國季刊》1969 年 10-12 月號，第 20 ～ 21 頁。

【62】 本書第 2 卷將談到這個問題。

附錄二：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對鄧小平報告的攻擊

【1】 《鄧小平自白書》，第 5 ～ 6 頁。

【2】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192 頁，鄧的自白書中的全部引文都與報告原文有細小的區別，但這沒有改變引文的意思。我所使用的是 1956 年報告中有關章節的正式譯文。

【3】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48、149 頁。
【4】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200 頁。
【5】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45 頁。
【6】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201 頁。
【7】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48 頁。
【8】 鄧所提到的這些段落，也包括在那本批判他的報告的小冊子《何其毒也》之中（《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8 號，第 1 頁）。參閱《鄧小平是蘇修的同路人》，1967 年 7 月 8 日《反修戰報》，第 3 頁，第 1 欄。在後一份材料中引自鄧的報告的引文，被指是鄧在一次「中央會議」上的講話，而且隔開的兩段被合為一段引文。可以想像，後一份材料並沒有搞錯，鄧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就在高級領導人的會議上把報告預講了一次。
【9】 參閱《周總理談為什麼必須集中火力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派》，1967 年 11 月 29 日《紅戰報》（聯合出版中心（華盛頓）檔案，第 44574 號，第 30 頁）。
【10】 《何其毒也》，《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8 號，第 7 頁。
【11】 同上。
【12】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171 頁。
【13】 同上，第 175 頁。
【14】 同上，第 176 頁。
【15】 《中林東方紅》（「中南林學院東方紅」），1967 年 7 月 1 日，第 4 頁，第 3 欄。
【16】 《人民手冊》1957 年，第 26 頁。

附錄三：中國領導層的「一線」、「二線」

【1】 參閱 1966 年 10 月 25 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收入《毛澤東思想萬歲》（《當代背景》891 號，第 75 頁）。
【2】 引自 1966 年 10 月 24 日在「報告會」上的講話（同上，第 71 頁）。
【3】 參閱康庫斯特所著《蘇聯的權力和政治》，第 10 章和倫納德所著《斯大林以後的克里姆林宮》，第 63 ～ 94 頁。中國領導人在馬林科夫的倒台中起過某種作用，這不是不可能的。彭德懷曾受到譴責，說他在 1954 年 9 月討好赫魯曉夫。此外，據說：「由於彭德懷與赫禿的勾結，蘇聯原來打算派馬林科夫率代表團來華（慶祝國慶五週年），後來卻派出了赫魯曉夫為首的代表團」（《彭德懷案件》，第 199 ～ 200 頁）。
【4】 《毛澤東思想萬歲》（《當代背景》891 號，第 71 頁）。
【5】 有可能如同在中國內戰時期一樣，在朝鮮戰爭期間（即多派別時期），作出了一些把中國領導層分散開的應急計劃。毛在提到「國家安全」時所指的，可能就是這種情況（參閱本書第 152 頁）。
【6】 《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40 頁。我之所以引用原文，是因為《當代背景》891 號第 75 頁上關於這句話的譯文是不準確的。第二句的中文原文是：「第一，常委分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提的……」。
【7】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以後，他被提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8】 這篇講話在 1957 年 6 月發表前已作了修改。參閱本書第 5 部分。
【9】 羅與伊文斯所著書，第 221 ～ 222 頁。穆福深（音）所著書第 166 頁的註釋 1，證實了羅的報告。
【10】 參閱《三反分子彭真檔案材料（1957-1958）》，《東方紅報》1967 年 8 月 8 日，第 2 頁，第 2 欄。雖然發表這個材料是為了顯示彭真的反毛行為，但不能完全按其字面意義去接受它。彭真曾全面負責政法事務，不管憲法修改部分是不是他提議的，他大概都會被指派負責憲法修改工作。（劉少奇在 1966 年列舉了彭的職責，但從彭的活動來看，他在 1956 年就已經在承擔這些職責。參閱《劉少奇反動言論》，《中國大陸雜誌概覽》（補遺）25 號，第 33 ～ 34 頁。）
【11】 英譯文見《當代背景》892 號，第 13 頁。

【12】 中共中央關於毛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的決定要求全國幹部群眾像討論六十條那樣，來討論這件事。這表明早先的指示並沒有得到實行。（參閱《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88 頁）

【13】 同上，第 487 ～ 488 頁。

【14】 引自他在 1966 年 10 月 24 日的講話：見《毛澤東思想萬歲》(《當代背景》891 號，第 71 頁）。

【15】 《打倒劉少奇——劉少奇的反革命一生》（北京，北京第四人民醫院井岡山戰鬥兵團翻印，1967 年 5 月），《當代背景》834 號，第 18 頁。

【16】 參閱《新聞戰線的重大政治鬥爭——前中宣部是怎樣為「劉家王朝」吹喇叭的》，《新聞戰線》1967 年 6 月 30 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3 號，第 32 頁）。

【17】 《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選編》（《中國大陸雜誌選》651 號，第 6 頁）。這段引文有一個更簡短的說法載於 1967 年 1 月 12 日《革命工人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67 號，第 2 頁）。

【18】 參閱我著《論照片》，《中國季刊》1971 年 4-5 月號，第 300 ～ 301 頁。

附錄四：提到毛澤東講話的情況

【1】 我十分感謝唐納德・克萊因在準備本附錄方面所給予我的幫助。

附錄五：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對劉少奇報告的攻擊

【1】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15 頁。

【2】 同上，第 37 頁。

【3】 同上，第 82 頁。用這些引文反對劉的例子，參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62 號，第 3 頁；（補遺）173 號，第 4、5 頁；（補遺）180 號，第 12 頁。

【4】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88 頁，用這些話來反對劉的例子，參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73 號，第 4、5 頁。

【5】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37 頁。

【6】 同上，第 30 頁。

【7】 同上，第 72 頁。

【8】 同上，第 83 頁。

【9】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75 頁。

【10】 同上，第 288 頁。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間最常用來攻擊劉的是他在 1956 年 7 月 13 日同外賓的一段講話：「在中國，大規模的鬥爭已經過去。資本家、地主、富農都將進入社會主義。他們難以搞破壞，因為周圍的人都看著他們。」（參閱《劉少奇對人民商場的資產階級實行投降主義的改造路線的罪行》（《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19 號，第 69 頁）。

【11】 這份交代翻印在《保定紅衛兵》1967 年 8 月 5 日，第 3 頁上。

【12】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32 ～ 33 頁。

【13】 參閱鮑大可著：《共產黨中國》，第 132 頁；參閱羅斯托等著：《共產黨中國的前景》，第 78 ～ 80 頁。

【14】 《保定紅衛兵》，引文同上。

【15】 在關於劉的報告的決議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115 頁，著重號為作者所加）。這個論斷的重要意義已在前面作過分析（參閱本書第 119 ～ 121 頁）；這裏關鍵的一點是，劉的報告中並沒有這個論斷。

【16】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33 ～ 36 頁。

【17】 劉這份交代的英譯文（見《劉少奇選集,1958-1967 年》和《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68 年春季版第 77 頁），使得之前對劉的話的錯誤引用顯得更荒唐。這些譯文

用「——」代替了「……」，從而表明正是劉說了「三反」、「五反」運動是國內的主要矛盾。

【18】 劉寫這份交待，是為了回答戚本禹所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中所提出的一系列責難。戚本禹文章的英譯文見《北京週報》1967 年第 15 期，第 5 ～ 15 頁。有趣的是，戚本禹沒有偽造引語然後加罪於劉。他指控劉的這個問題（上文所引劉的自白中的幾段話正是對此作出的回答）不過是：「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同上，第 15 頁）

第三編 整風運動

第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的影響

【1】 對 1942-1944 年整風運動的分析，參閱康普頓《毛的中國：黨的整風文獻，1942-1944》的序言。

【2】 整風的中文全稱是「整頓作風」，通常省略為「整風」。

【3】 參閱 1962 年 9 月毛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英譯文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68-1969 年冬季號，第 88 ～ 89 頁；參閱他在 1962 年 1 月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英譯文見聯合出版研究中心（華盛頓）檔案 50792 號（《毛主席文選》，第二部分，第 48 頁）。

【4】 扎戈里亞所著書第 55 ～ 56 頁描述了這個遭遇事件，他的材料來自劉易斯。劉易斯女士和她的丈夫，《紐約時報》的西德基・哥魯森，當時是駐華沙記者。

中國報刊沒有報道米高揚離開中國的消息，這一疏漏是頗具意味的。米高揚在 9 月 17 日的大會上講了話，但是沒有出席中共在 9 月 21 日為兄弟黨代表團舉行的招待會，他想必就是在這期間離開的。但塔斯社的報道則說他在 9 月 24 日回到莫斯科〔《世界廣播概要》（第一部分：蘇聯）764 號，1965 年 9 月，第 27 頁〕。因為與米高揚一道的還有與他一同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副團長、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來自烏茲別克的穆希金諾夫，所以米高揚可能在回國途中到位於蘇聯中亞的幾個共和國參觀。看來同米高揚一起離開中國的不僅有穆希金諾夫，而且還有代表團中所有從蘇聯來的成員，因為在 9 月 21 日招待會上代表蘇聯方面致詞的是蘇聯駐華大使尤金。他在蘇聯代表團的 6 名成員中，僅排在第五位。

米高揚必定對他在中國所受的待遇感到特別生氣，因為他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時，曾稱毛是「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且對中國尋找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和方法表示讚揚（《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14、15 頁）。

周恩來看來在 10 月 1 日再次向仍在北京的蘇共代表團剩餘成員提出了斯大林問題（參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64 頁）。

【5】 參閱扎戈里亞所著書，關於哥穆爾卡復職公報的原文，參閱津納所著書第 187 頁。

【6】 同上，第 196 頁；倫納德所著書，第 222 頁。羅科索夫斯基是波蘭人，但於 1919 年參加蘇俄紅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蘇聯最傑出的指揮員之一。戰後他是駐波蘭蘇軍的司令，1949 年正式轉入波蘭軍隊。他成為波蘭國防部長、總司令、副總理、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委員（參閱 S・V・尤特其著:《俄羅斯凡人簡傳》，第 461 頁）。

【7】 關於蘇波會談公報，哥穆爾卡的講話以及全會的決議的原文，參閱津納所著書，第 196 ～ 257 頁。蘇聯代表團包括「自由主義分子」米高揚和「斯大林分子」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參閱倫納德所著書第 223 頁；關於 10 月 23 日事件的文件記錄，參閱拉托基所著書，第 47 ～ 57 頁。

【8】 中國方面在 1963 年發表的《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中披露，1956 年 10 月劉曾同蘇聯領導人會談（參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64 頁）。在 10 月份頭三個星期裏，劉幾乎每天都在北京露面。10 月 22 日清晨，劉在北京機場送走了印度國會代表團 (1956 年 10 月 23 日《人民日報》)。當天晚上，他沒有出席毛為歡迎來訪的巴基斯坦總理舉行的招待會（同上）。直到 11 月 6 日為止，報界也沒有報道他參加北京任何集會的消息。看來很可能的是，在送別印度國會代表團後，劉乘飛機赴莫斯科。

如周在 10 月 1 日所做的那樣，劉也用此機會提出斯大林問題，批評蘇聯領導人對斯大林沒有全面的分析、缺乏自我批評、事先沒有同兄弟黨商量。隨著東歐的局勢出現危機，劉以一種（「我們早就告訴過你們的」）姿態強調了中共對斯大林問題的正確方針。（劉和周對蘇聯領導人談話的簡短引語，參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64 頁。）

【9】 同上。這份材料只是引述了毛對蘇共處理斯大林問題的批評，但是召見蘇聯大使似乎不可能僅僅為了讓他再聽聽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因為當時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中國的立場都是十分清楚的。由於北京與布達佩斯之間的時差，毛也不大可能談到匈牙利的局勢。布達佩斯的示威遊行是從下午 3 點開始的，直到下午 10 點 30 分才發生暴亂，這時北京時間已是 10 月 24 日（參閱拉斯基：《匈牙利革命》，第 48、53 頁）。

【10】 參閱扎戈里亞所著書，第 56 ～ 57 頁。在《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文中，中國方面說：「蘇共領導調動了軍隊，企圖用武力壓服波蘭同志，犯了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我們）堅決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做法。」（《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69 頁）

【11】 中國後來聲稱：「我們堅決主張採取正確的原則處理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問題，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堅決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做法……當時，蘇共領導採納了我們的建議，在 1956 年 10 月 30 日由蘇聯政府發表了《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檢討了他們過去在處理兄弟國家關係方面的一些錯誤」（同上，第 69 ～ 70 頁）。

【12】 蘇聯和中國的聲明都載入津納所著書，第 485 ～ 495 頁。

【13】 中國方面在 11 月 1 日發表的政府聲明中，指責「大國沙文主義」，在此即是指蘇聯的控制。聲明把波蘭和匈牙利人民在最近的「事件」中要求加強民主、獨立、平等和提高生活水平說成是「完全正當的」。然而，意味深長的是，聲明滿意地指出，波蘭人民意識到有反革命分子要推翻共產主義制度、破壞共產主義集團的團結的危險，但沒有提到匈牙利（同上，第 494 ～ 495 頁）。

顯然，甚至在納吉總理於 11 月 1 日晚宣佈中立並退出華沙條約以前，中國已經看到匈牙利的局勢可能比波蘭還要難以控制。（納吉在 10 月 31 日把他的意圖通告了當時正在布達佩斯的米高揚。參閱布熱諾金斯基著：《蘇聯集團：團結與分裂》，第 228 頁）據一位前匈牙利外交官說，中國駐布達佩斯大使對情況十分瞭解，似乎已預見到局勢的發展並向北京發出了預告。他不贊成米高揚與納吉談判撤出蘇軍的問題，可能正是根據他的建議，中國方面迫使蘇聯鎮壓叛亂（參閱詹羅斯·拉德萬伊所著：《匈牙利革命與百花齊放運動》，《中國季刊》1970 年 7-9 月號，第 121 ～ 123 頁）。

在匈牙利事件以後不久，鄧小平告訴了一個西方作家：「至於中國人民，他們十分不滿的是，當帝國主義用飛機把反革命分子運回匈牙利的時候，蘇聯卻遲疑不進行干預」（克羅夫特所著《紅地毯通向中國》，第 254 頁）。後來中國公開聲稱，他們不僅支持進行干涉，而且實際上在蘇聯領導人「準備採取投降主義的政策，企圖把社會主義的匈牙利拋棄給反革命」（《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69 頁）的時候，他們一直堅持這種主張。關於中國對匈牙利叛亂的報道和評論，參閱《關於匈牙利的報道：讓中國公眾瞭解的匈牙利革命》。

然而，像 A・M・哈爾彭指出的那樣，10 月 30 日蘇聯發表的聲明（中國 11 月 1 日的聲明稱它是「正確的」）說，如果匈牙利要求的話，蘇聯政府同意把

蘇軍撤出布達佩斯；還說，蘇聯政府願意同匈牙利和其他華沙條約成員國談判駐紮蘇軍的問題（哈爾彭所著書，第5章）。如果中國在11月1日的聲明中認為這是「正當的」，那麼很可能只是在納吉宣佈中立以後，中國才最後改變看法。雅克·萊韋斯克博士的研究結果證實了這一點。新華社在發表11月1日中國的聲明3小時以後，對此作出了一個更正：在暗示不贊成蘇聯對1948-1949年的南斯拉夫問題、1956年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處理的文句後，刪去「匈牙利」三字。萊韋斯克指出，這個突然的改動，必定是由於收到了納吉政府打算退出華沙條約的情報引起的，這個情報是在納吉政府作出公開聲明之前送給所有駐社會主義國家的大使館的（參閱雅克·萊韋斯克著：《中蘇衝突與東歐》，第45～47頁；我感謝施拉姆使我注意到萊韋斯克博士的研究成果）。中國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是，納吉的聲明本身是對更多的蘇軍開進匈牙利的反應。更多蘇軍開進匈牙利的行動是與蘇聯的聲明不相符的，這個行動表明，進行干涉的決定是在10月30日晚到31日早晨這段時間作出的（拉德萬伊所著文章，見《中國季刊》1970年7-9月號，第123頁）。對中國聲明所作的更正也表明，不管中國駐布達佩斯大使對情況多麼瞭解，北京的新聞機構起初是懷著友好的態度來看待匈牙利局勢的。（參閱《跳樑小丑的黑話》，《新聞戰線》1967年5月13日，第4頁，第2欄。）

【14】 參閱倫納德所著書，第228頁。本書作者於1957年4月為倫敦《每日電訊報》採訪英國共產黨的一次特別會議時，親眼看到了英共所受到的影響。這次會議透露，在近34000名黨員中，已有超過五分之一的黨員退黨。

【15】 這個報告載入津納所著書，第516～541頁。直到11月16日這個報告才公開發表。

【16】 同上，第515頁。

【17】 二中全會公報載入《人民手冊》1957年，第147～148頁。

【18】 鐵托的講話直到全會結束後才發表。

【19】 據全會公報說，除了170名正式和候補中央委員中的149人外，還有147名中央和地方黨的官員出席了會議。

【20】 引自《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紀念列寧誕辰的社論《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英譯文見《北京週報》第17期，1970年4月24日，第5～15頁。引文見第6頁。

【21】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64～65頁。在文章的這一段，中國提到了一個與這個問題有關的日期，但不屬於這裏所談的那個時期。他們提到，1957年11月，中共中央向蘇共中央提出了一個文件：《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提綱》。這個文件的英譯文出處同上，第105～108頁。

【22】 同上。

【23】 劉敘述了中共關於怎樣實行同國民黨成立聯合政府，多次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政策，然而國民黨卻仍然要求發動內戰。劉在一開頭就指出了這些事件給人們的教訓：「反動派常常自己選擇走向滅亡的道路。」（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據近年來北京出版的《漢英時事用語詞彙》第53頁，「常常」可以譯作「always」或「often」。有意思的是，官方的翻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輯，第17頁）選擇了「often」。這表明，劉承認反動派可能有時不選擇「走向滅亡的道路」，即不會迫使共產黨訴諸武力。實際上，甚至後來在中共中央的《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提綱》裏，中國也沒有完全排除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只是在60年代的論戰中，中國才完全否定和平過渡的可能性。

實際上，劉的報告的這部分也可以從相反的方面去理解。它聽起來常常使人覺得是在對中共對國民黨實行和平政策的行為進行辯護。如果那些對劉在抗戰勝利後提倡「『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參閱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北京週報》1967年4月7日，第15頁）的指控有什麼道理的話，那麼劉可能是在借此機會來為和平政策的一些失敗而辯解。例如他指出，有些地方是可以和平解放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輯，第18頁）。

針對戚的指責，劉在為自己辯護時說，他作出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指示，是與中央當時的立場一致的。（參閱他的第三份交代，英譯文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68 年春季版，第 76 ～ 77 頁）劉夫人聲稱，她丈夫勇敢地承擔了對此事的責任，但不能僅僅歸咎於他。（《當代背景》848 號，第 12 頁）這可能是真的，但不排除最初是劉在中共中央內提倡採取這項政策的可能性。例如有意思的是，在內戰後期，傳到北京的一些消息說，劉支持斯大林的方針，即中共對取得決定性勝利不能操之過急，而是要繼續開展游擊戰爭，延長美國對國民黨的毫無作用的援助，以消耗美國的實力。周恩來看來主張相反的立場，認為奪取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的時機已經成熟（參閱菲茨杰拉德著：《中國的革命》，第 102 ～ 105 頁）。

這些消息如果是真的話，也並不表明劉仍然贊成走和平道路，當時（1948 年 7 月）這條道路已是沒有可能實現的。但它們卻表明，劉對於最後打倒國民黨的迫切性這一點不以為然；這種看法符合之前的那種想法，即與其武力奪取，不如採取幾乎是十拿九穩的緩慢的和平過渡的方式。

【24】 英譯文收入《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57 ～ 272 頁。

【25】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69 頁。

【26】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62。

【27】 同上。

【28】 同上，第 260 頁。其他的基本教訓是：共產黨的存在、工業國有化、農業合作化、發展計劃經濟、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29】 同上，第 258 頁。

【30】 同上，早在 1941 年，劉少奇就承認在共產黨內，領導和被領導之間可能會有矛盾（參閱施拉姆著：《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 93 ～ 95 頁）。

【31】 參閱赫魯曉夫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丹尼爾・施沃爾的談話摘錄，載麥克法夸爾著：《百花齊放……》，第 306 頁；參閱本書結語部分。

【32】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65 頁。

【33】 同上。

【34】 同上，第 257 頁。

【35】 許多紅衛兵小報都登載了這篇講話，其日期也各不相同，包括 1 月 2 日、12 日和 27 日。

【36】 《鄧小平反動言論記錄》，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8 號，第 25 頁。

【37】 同上。

【38】 《鄧小平是蘇修的同路人》，1967 年 7 月 8 日《反修戰報》，第 2 頁，第 3 欄。

【39】 《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黑話記錄》，1967 年 6 月 14 日《進軍報》，第 3 頁，第 2 欄。鄧的評價無疑是根據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伍修權的電文而作出的。伍是中共一位老資格的官員，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入選中央委員會（參閱《伍修權叛黨叛國的不可抵賴的罪證》，1967 年 4 月 13 日《紅衛戰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07 號，第 6 頁）。可能同樣是根據這些報告，劉少奇在 1956 年 6 月 17 日對一個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團說，沒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大概他指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要向南斯拉夫學習。（參閱《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選編》，《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52 號，第 1 頁）；〔參閱《劉少奇關於文藝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紅色宣傳兵》，1967 年 5 月 10 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5 號，第 32 頁〕；（參閱《劉少奇執行投降主義路線的罪行》，《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19 號，第 74 頁）。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樣一些觀點在中國領導人中間不普遍存在。

【40】 《鄧小平在文藝領域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紅色宣傳兵》，1967 年 5 月 23 日第 4 頁，第 2 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報道說，鄧為了攻擊毛，在這篇講話中說中國有個人崇拜。但用來證明這一指控的引語是沒有說服力的：「在討論過程中，一些人認為中國沒有犯這個錯誤（即個人崇拜）是不錯的。實際上，我們犯過不少錯誤……」看來很明顯，鄧談的是中國的其他錯誤，而不是個人

崇拜，很可能他接著舉了一些錯誤的例子，但被紅衛兵編輯刪掉了。〔《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8 號，第 6 頁〕鄧在自白書中也引用了這些話以證明自己過去所犯的罪行，但正如他引用的這個文件中的其他話一樣，給人們的印象是，他只不過是在重複他知道別人正用來反對他的那些話（參閱《鄧小平檢討書》，第 6 頁；參閱本書第 150 頁）。

【41】《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8 號，第 6 頁。

【42】《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451 號，第 31 頁。

【43】《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454 號，第 30 ～ 33 頁。公報只是說：「兩個代表團都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是由建設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聯繫在一起的……社會主義的共同利益，把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波蘭人民共和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緊密地團結起來。」（第 32 頁）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中國談到蘇聯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而不是社會主義集團的領導，因為他們考慮到世界各國共產黨中間的不滿情緒（《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69 ～ 271 頁）。但鄧小平在清華的講話清楚表明，他們仍然認為蘇聯是社會主義集團中的領導。

【44】同上，第 32 頁。

【45】中匈公報確實提到蘇聯是社會主義集團的領導（《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455 號，第 29 號）。

【46】《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64 頁。

【47】《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456 號，第 38 頁。如果公報是改由中國起草的話，他們大概會用「對抗性矛盾」代替「基本矛盾」，用「非對抗性矛盾」代替「錯誤和缺點」。

第十三章 一場整風運動成為共識

【1】例如參閱《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606、608、610、613、615 號中的報道。

【2】河北；《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608 號。

【3】黑龍江；《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606 號。

【4】河南：《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615 號。

【5】例如參閱 1956 年 10 月 9 日《人民日報》社論。

【6】同上，1956 年 10 月 16 日社論。同樣，非黨人士也被鼓勵去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10 月中旬為他們成立了一所社會主義學院。〔《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606 號。〕

【7】《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613 號。這篇文章被認為十分重要，以至於載入《毛澤東思想萬歲》（參閱《當代背景》891 號，第 22 頁）。

【8】《人民手冊》1957 年，第 147 ～ 148 頁。

【9】引自麥克法夸爾的《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今日世界》1957 年 8 月號，第 340 頁。

【10】《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57 頁。據周鯨文（音）說，1956 年冬，毛邀請一批高級幹部和民主黨派的領導人開會（也許是 12 月 8 日的全國工商聯會議），他在會上說：「在過去幾年裏，群眾、幹部搞運動很緊張，我們應當給他們一個喘息的機會。他們也應當有機會表達他們對政府和黨的工作的意見。我想我們大家都能從聽取他們的意見中得到好處。」（周著：《風雨十年》，第 162 頁）

【11】在 1959 年同來訪的匈牙利總理秘密會談時，毛強調了 1956-1957 年間，東歐和中國發生的事件之間的密切聯繫（參閱拉德萬伊所著文章，《中國季刊》，1970 年 7-9 月號，第 127 頁）。

【12】《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選編》，《中國大陸雜誌選》652 號，第 20 頁；《徹底揭露劉少奇在政法工作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載於《政法公社》1967 年 8 月 3 日。劉還主張許多工作可以由非黨人士去做；參閱《毛澤東思想照妖

鏡下的兩個赫魯曉夫》，載於《斗批改》，1967 年 5 月 15 日（《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2 號，第 21 頁）。

【13】《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 31 ～ 32 頁。

【14】毛在他的兩次講話中一再提到這個問題，表明他的聽眾對這個問題感到多麼大的憂慮〔參閱《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74、75、76、79、87 頁〕。毛說，共產黨不害怕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卻害怕學生和農民，這是前所未有的。當毛談到有一個縣 3 萬人起來鬧事，打倒一個鄉政府，並赦免地主時，他的聽眾可能並不覺得是一種恥辱；當毛說到，那使中共的錯誤導致幾個省發生暴亂、首都的大街上出現風潮，也並非一切都完蛋時（第 87 頁），他們可能不感到放心。

【15】1967 年 6 月 14 日《進軍報》，第 2 頁，第 2 欄。

【16】同上；《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8 號，第 2 頁（後一個材料來源指明在清華講話的時間是 1957 年 11 月 12 日，但我猜測，這是紅衛兵在編輯這本鄧的言論集時出現的印刷錯誤）。鄧在講到這一部分時，應該是在聯繫匈牙利和波蘭的情況。參見《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67 ～ 268 頁。

【17】1967 年 5 月 23 日《紅色宣傳兵》，第 4 頁，第 2 欄。

【18】《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65 ～ 267 頁。毛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承認，「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在我國一部分知識分子有些動盪……」（同上，第 281 頁）

【19】這篇文章的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07 號，第 17 ～ 19 頁。

【20】關於隨後的爭論情況，參閱 1957 年 4 月 4 日的《人民日報》文章:《陳其通等「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發表以後》。

【21】陳其通等人顯然事先就意識到人們對這些意見的支持程度，這也一定使他們鼓起勇氣寫出自己的看法。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否得到彭真暗地裏的支持。彭後來表明，他不贊成毛的自由化方針。

【22】英譯文見《當代背景》891 號，第 23 頁。

【23】《詩刊》於 1 月 28 日首次發行。在《詩刊》上發表的毛的 18 首詩中，有 10 首迄今沒有發表過或流傳範圍不廣的詩，轉載於 1 月 29 日和 30 日《人民日報》的最後一版上。雖然這個版面是發表詩歌作品的正當版面，但《人民日報》對這個無疑是重大的文藝事件的處理，調子是很低的。我們將會看到，後來這家報紙就其沒能在 4 月 10 日以前批判陳其通等人而不得不作自我批評。假如沒有及時批判陳等人，是表明對他們的觀點有所同情的話，那麼這家報紙在發表毛的詩歌時的做法，就意味著要貶低其重要性，從而減小其影響。

【24】參閱戈德曼：《共產黨中國的文學分歧》，第 182—183 頁。作者指出，批判王蒙與批判杜丁采夫是同時發生的。

【25】既然周在亞洲和西歐進行的是正式國事訪問，他也應該對人大常委會作個正式報告。無疑，對他來說，在政協會議上作報告是方便的，因為這次政協會議是他回國後召開的第一個重要的全國性會議。但是，作為政協的一位副主席，為什麼彭沒有這樣做？或者說，為什麼人大常委會就不能先聽彭的報告呢？

【26】1957 年 2 月 8 日《人民日報》。

【27】2 月 8 日，星期五晚上，毛和其他領導人在北京接見了西藏青年代表團（見 1957 年 2 月《人民日報》）。他（以及鄧小平）可能是在星期六早晨離開首都去迎接周的。星期六下午劉少奇在北京，但是此後他也可能和他的同事們在一起。

如果在這個時候確實召開了一個高級會議，有許多理由表明地點應該是杭州。4 月 25 日，周恩來在杭州對一些蘇聯客人說，1957 年他曾來過此地兩次（見 1957 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報》，引文見本書「百花齊放運動……」，第 31 頁）。但是，1957 年周到杭州的公開記錄只有一次，那是在 3 月 21 日，當時他前去歡迎捷克總理西羅基訪問那座城市。另外那次沒有宣佈的那次杭州之行，很可能就是在他從昆明銷聲匿跡之後。

確認杭州為會址的第二個原因是：毛歷來喜歡去這個風景區並在那裏辦公。據文革中的消息說，「解放以來的 17 年中，毛主席在杭州召開了許多重要會議，眾多的重要文件也在那裏起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230 號，第 1 頁）；這些情況是在揭露浙江省委領導人在杭州毛的住處安竊聽器一事才得知道的，《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 ～ 4 頁。例如，據稱毛 1957 年 4 月初正在杭州。（《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45 號，第 2 ～ 4 頁）

【28】《當代背景》439 號，第 4 頁。

【29】同上，第 7 頁。

【30】《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57 頁。

【31】值得注意的是，周在政協的講話中有一段是詳述他個人對匈牙利問題的看法，但在涉及到暴亂時沒有提到帝國主義者的顛覆，僅僅提到了「反革命分子進行的武裝暴亂」（《當代背景》439 號，第 5 頁）。只是在後來談到集團內部的關係時，周才提到「帝國主義者在匈牙利策劃了反革命暴亂」（同上，第 5、8 頁）。法國總理富爾於 1957 年 5 月訪問中國並會見了毛和周。他發現毛和周都「避免對匈牙利事件表達看法」（富爾，第 16 頁）。

【32】1957 年 4 月 1 日《人民日報》。

【33】同上。

【34】同上。

【35】甚至早在 1956 年 12 月，毛就已經提出帝國主義干涉只起了次要作用，在 12 月 8 日與商界人士的一次秘密談話中，他說：「匈牙利事件證明，在那個國家裏隱藏著很多的反革命分子，幾個月以前他們就已在布達佩斯建立了反革命的司令部，他們還與國外有著陰謀聯繫」。（《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66 頁）1 月，在對黨內幹部講話時，（在這種場合他應該是更加坦率的）他尖銳地批評了前匈牙利黨的領導人格羅•艾爾諾執行了過分嚴厲的政策（同上，第 74 頁）。

【36】「將要進行」，同上，1957 年 3 月 5 日。陸定一的文章對於確定作出提前決定的時間是很關鍵的，它顯示將整風運動提前開展的決定是在周回國和作了報告之後做出的。陸的文章是以引用毛在 1942 年發動整風運動時作的兩個報告開始的，這兩個報告分別作於 1942 年 2 月 1 日和 8 日（《毛澤東選集》第 3 卷，第 35 ～ 68 頁）；由於中國人通常都很講究按確切日期進行週年紀念活動，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直到 1957 年 2 月 8 日，人們還沒有認為有必要寫一篇重要的週年紀念文章，因為這時他們還以為到下一次開展整風運動還有一年的時間。這一看法與下面的事實是相符的，即毛與周在 2 月 9 日前不可能見過面。作出決定的最晚日期可能是 3 月 4 日，陸的文章的付印日；但是人們可以假定，決定是在 2 月 27 日毛作關於內部矛盾的講話之前作出的。

第十四章 毛分析人民內部矛盾

【1】關於這個講話有一個問題：沒有公開發表的講話原文。當講話公開發表時已經作被了修訂和增補（見 1957 年 6 月 9 日《人民日報》；正式譯本的複製件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75 ～ 294 頁）。講話錄音（似乎是完全版）只在全國極小的範圍內播放（見羅和伊文斯：《逃出紅色中國》，第 218 ～ 212 頁）。其次是待遇更低一點的人聽過關於這個錄音的記錄的傳達，而且是經過了刪節的（同上，第 223 頁）。聽過錄音的羅認為，即使是這個刪改過的稿子也比最終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本坦率得多。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上述兩個文本中的引文都只是一些摘錄，它們是西德基•哥魯森在華沙得到的，並於 1957 年 6 月 13 日發表在《紐約時報》上。同時可參見哈里森•薩斯伯裏（5 月 19 日）和德魯•米德爾頓（5 月 29 日）在同一報紙上發表的文章。

我假設，毛講話中有關理論的那一節，即對人民內部矛盾的分析，在各個文本中沒有多大的變化，因為，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有必要對其進行刪改修訂時，類似的思想早已出現在 1957 年 4 月的《人民日報》社論之中。

講話的其他 11 節是：肅反問題；農業合作化問題；工商業者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少數民族問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關於少數人鬧事問題；壞事能否變成好事；關於節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2】《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75 ～ 276 頁。

【3】同上，第 276 頁。

【4】同上，第 278、291 ～ 292 頁。

【5】同上，第 279 頁。甚至在公開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本中，毛仍傾向於周關於人民內部矛盾是匈牙利暴亂的主要原因的看法，而不贊成彭真關於外部顛覆是主要原因的看法。文中有一處他認為國外勢力、甚至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只起了輔助的作用，他寫道：「匈牙利的一部分群眾受了國內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騙，錯誤地用暴力行為來對付人民政府，結果使得國家和人民都吃了虧。」（第 277 頁）在講話的另一處，他認為反革命分子起了較大的作用，但他同時又清楚地指出，他認為人民內部矛盾才是決定性的，因為正是這一矛盾為反革命提供了機會。毛說：「匈牙利事件所表現的那種範圍相當寬廣的對抗行動，是因為有內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緣故。這是一種特殊的也是暫時的現象。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動派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離間，興風作浪，企圖實現他們的陰謀。匈牙利事件的這種教訓，值得大家注意。」（第 279 頁）蘇聯扶持的匈牙利新領導認為，在引發事件的原因中國際帝國主義「扮演了主要的和決定性的角色」。中共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曾贊同這一觀點。而毛的上述分析卻從原來贊同的立場上倒退了（同上，第 257 頁）。《再論……》指責帝國主義應負主要責任的話引自一篇匈牙利的文件，這一點是意味深長的。很可能，在周恩來出訪之前，中國人並不想自己提出這樣的看法。

在《紐約時報》記者於 1957 年 6 月 13 日在華沙得到的講話文本中，絲毫未提到帝國主義所起的作用。據說毛在回答關於匈牙利的問題時是這樣說的：「匈牙利黨之所以軟弱無力是因為它採用壓制而不是說服的辦法。它的這一弱點在 10 月悲劇中顯露出來，當時在大約幾天的時間裏，黨幾乎消失了。依靠蘇聯的力量是必要的，不這樣的話，分裂瓦解很可能從黨內發展到全國。當然，由於形勢的發展使蘇聯不得不進行干涉，這是令人遺憾的。」但是，據一位曾聽過毛講話原始錄音的中國難民的記憶，毛說過這樣的話：「由於匈牙利共產黨長期領導不得力，使帝國主義者得以歪曲形勢，並利用人民合理的不滿，以圖推翻社會主義的政權。」（見羅和伊文斯：《逃出紅色中國》，第 220 頁）

【6】《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75 頁。

【7】同上，第 278 頁。

【8】同上，第 280 ～ 281 頁。

【9】同上，第 281 頁。

【10】在談到知識分子問題時，毛指出：「我國的艱苦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盡可能多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同上，第 286 頁）。

【11】引自麥克法夸爾：《百花……》，第 19 頁。

【12】見羅和伊文斯上引書，第 222 頁。羅大約在 1957 年 4 月中旬曾聽過毛講話錄音的全文。

【13】這個講話一直到 1965 年 4 月，即 8 年之後，才公開發表。參見毛：《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註釋。因此，就再沒有必要對鼓勵大膽說話作謹慎的限制；但在 1957 年 6 月矛盾問題的講話發表之前曾不得不將這種限制補充進去，以證明在當年下半年發動反右運動是有道理的。而且，毛決定在 1965 年發表他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看來正是為了鼓勵在次年對中國共產黨開展直言不諱的批判而給予合法支持。但為了使其與《人民內部矛盾》講話一致，似乎也確實對某些內容作了一些改變。見下文附錄七。

【14】羅伯特・羅相信毛澤東是真心的（羅和伊文斯上引書，第 222 頁）。

【15】 毛的聽眾包括 380 名黨的幹部和大約 100 名非黨人士（見毛：《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 29 頁）。
【16】 同上，第 14 頁。
【17】 參見前注 10。
【18】 毛：《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 15—16 頁。
【19】 同上，第 16 頁。
【20】 同上，第 20 ～ 21 頁。
【21】 同上，第 21 頁。
【22】 同上，第 22 頁。
【23】 同上，第 18 頁。
【24】 同上。
【25】 同上，第 19 頁。
【26】 同上，第 12 ～ 13 頁。
【27】 見 1957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報》：《紀念整風運動 15 週年》。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為強調黨內整風的性質，陸定一自始至終稱毛為「同志」而未稱「主席」。當然，他用「同志」這個稱謂並沒有什麼錯誤，可是，鑒於毛有意把黨內整風與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聯繫起來，用「主席」的頭銜提醒讀者毛既是黨的主席又是國家（屬於全體人民）的主席恐怕是更恰當的。
【31】 同上。
【32】 甚至有有可能的是，毛之所以決定在宣傳工作會議即將結束時到會講話，是為了抵銷陸定一文章的影響。
【33】 毛：《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 12 ～ 13 頁。
【34】 參見 1 月《中國青年》的文章。該文也明確地指出中國共產黨已就整風問題作出決定（見上文，第 177 ～ 178 頁）。
【35】 毛的斷言似乎表明中央委員會已經同意在 1957 年發動整風運動。他這樣講，至少應該是得到了劉的贊同的。但是，也有可能的是，毛的這段話是在許多年之後，在出版前才加進去的，而加上這段話的理由是，他發動整風運動最終確實是得到了全黨的批准的。
【36】 毛：《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 25 ～ 26 頁。陸定一在其關於整風的文章中也簡短地肯定了百花齊放的方針。
【37】 1957 年 3 月 12 日《人民日報》間接地表達了對百花齊放方針的支持態度。一位負責文藝界的高級宣傳官員林默涵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有保留地對王蒙的一篇引起爭議的短篇小說表示了贊同。見戈德曼：《共產黨中國的文學分歧》，第 191 頁。
【38】 羅伯特・羅說，他在 4 月曾與上海市黨的高級幹部們一起聽過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講話錄音（見羅和伊文斯上引書，第 218 頁）。
【39】 引自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將新聞戰線的革命進行到底——徹底批判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新聞路線》，1968 年 9 月 1、2、3 日，發自新華社（《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253 號，第 23 頁）。很顯然，毛澤東費了很大的勁，通過分小組會見參加宣傳會議的代表，力圖使他們相信他的觀點是正確的。3 月 6 日，他出席了有 9 個省市的宣傳、文化和教育部門的領導人參加的座談會（同上，第 131 頁）；3 月 7 日，他與 7 個省市教育部門的領導人談話（《毛主席教育語錄》，北京電氣工程學院「東方紅公社」1967 年 7 月編印，第 13 ～ 14 頁）；3 月 10 日他又在一個專門為記者和出版工作者舉行的招待會上發表談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253 號，第 30 頁）。在經過這一系列活動之後，毛的觀點卻未在新聞界引起重視，這一定使毛感到特別惱怒。
【40】 有人認為，雖然已經決定了發動整風的日期，但是鄧拓由於受到「後台老闆們」（文革中的稱謂）的支持，卻敢於置之不理。但是，如果真是這樣，在註釋 39

引用的文章就一定會指出這些後台老闆是誰，並且也不會提出這位毛主義者的指責完全是針對鄧拓的。在文革中，負責宣傳的官員如陸定一、胡喬木也都受到了攻擊，泛泛地指責他們沒有宣傳毛 1957 年發表的兩篇講話。但就我所見，並沒有人提出過，是他們命令鄧拓不要在《人民日報》上討論毛的觀點意見。## 此處缺一出處信息。

【41】 同樣根據上一條註釋所講的原因，彭真似乎也不大可能利用他在書記處的重要地位命令鄧拓不要發表關於毛講話的社論。如果他曾這樣做的話，註釋 39 引用過的那篇文章就完全沒有理由在他已被公開批判和受到清洗二年半之後不提出這一點。

【42】 《人民日報》先前對毛的講話甚至連起碼的響應都沒有，這當然進一步地證明了鄧拓的態度。

【43】 這個會直到 4 月 18 日新華社作了報道才為人所知（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1 號，第 1 ～ 4 頁）。

【44】 同時召開這樣的會似乎不大可能是純粹的巧合，特別是因為其他的省都沒有在 3 月召開宣傳工作會議。在中國，與省之間的聯繫很重要；1930–1940 年代期間，彭真曾在晉察冀根據地工作，他一直對他家鄉所在的省極為關注。

【45】 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45 號，第 2 ～ 4 頁。

【46】 除了周的許多次講話（這表明是他的職責所在）外，引人注目的是，當《光明日報》總編儲安平決定尖銳地批評共產黨壟斷權力的時候，他的這些意義是對著毛和周而非毛和劉的，雖然劉對黨務負有更大的責任。大概儲是有意把周的名字與毛聯在一起，因為他知道周更可能以同情的態度聽取批評者的意見。

【47】 周在杭州已為人所知，因為捷克總理到達這座城市時他曾去迎接（見 1957 年 3 月 22 日《人民日報》）。但是，從外交禮節上看，周沒有必要專程前往杭州去招待他的捷克同行。在捷克總理訪問杭州時毛未露面，但不能因此就斷定毛不在這座城市裏。毛已在北京招待了威廉・西羅基，從而做了作為國家首腦他需要做的事，如果毛希望給予他特別待遇的話，他可以再次出面招待他，但是，正如下文將要提到的，與一個月後接待波蘭總理時不同，毛在北京有意給了捷總理以規格略低的接待。

【48】 毛：《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 28 頁。

【49】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人民日報》關於山西省委宣傳工作會議的報道沒有提到省委第一書記參加會議，但是在彭真退讓之後（見上文第 206 頁），該報發表了一篇關於山西省宣傳工作會議的長文，特別突出了省委第一書記的作用（見 1957 年 4 月 25 日《人民日報》）。

【50】 3 月，鄧小平和朱德視察了西安。見 1957 年 4 月 30 日《陝西日報》。4 月 24 日周恩來在杭州作了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開展整風的報告（見麥克法夸爾：《百花……》，第 31 頁）。

【51】 《當代背景》834 號，第 16 頁。文革期間對劉的一次批判中，說他曾模仿戰國時的政治家蘇秦周遊各地。蘇秦正是通過周遊列國，遊說諸侯撈取了「政治資本」。但是，究竟是劉自己將他的下訪與蘇的周遊作了比較，還是這一比較僅是詆毀者強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從指責本身難以看清。見《劉自傳補遺》，1967 年 5 月 13 日《井岡山》〔聯合出版研究中心（華盛頓）檔案 41858 號，第 186 頁〕。

【52】 《中國大陸雜誌概覽》599 號，第 28 頁。

【53】 《聯合研究院院刊》，1967 年 7 月 21 日，第 6 期，第 86 頁。

【54】 《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 32 頁，另外一個資料指出 5 月劉少奇在湖南，但這恐怕是搞錯了。見《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 31 頁。

【55】 1957 年 4 月 23 日《南方日報》。

【56】 1957 年 6 月 12 日《長江日報》。

【57】 劉在這一場合講話的部分內容見《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四集，第 63 ～ 71 頁。

【58】 見《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53 號，第 36 頁。（在之後一頁給了 4 月 8 號的日期，這一天劉肯定是在廣州）假設 4 月 28 號的日期是正確的，這就表明劉沒有在

他南巡的路上訪問河北，而是從北京直接到了河南。這就使得劉在 2 月 27 號還在北京更有可能，因為他在河南的第一次為人所知的演講是在 3 月 5 號。（見附錄 7）

【59】《當代背景》834 號，第 16 頁。據說，劉對各省的訪問從 3 月一直持續到 5 月，這是不準確的。在對上海市幹部講話時，劉提到他已去了 5 個省（見《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四集，第 63 頁）。鑒於他在 3 月 5 日到達河南，有可能 2 月底時他正在河北造訪（2 月中旬時沒有關於他在北京的報道）。但是考慮到北京與河北鄰近，這不應成為劉沒參加 2 月 27 日最高國務會議的理由（見附錄八）。

【60】《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四集，第 63 ～ 71 頁。很明顯，這一文本雖然較長，但它僅是摘錄，因為文中僅有第一節，沒有後面的章節。

【61】關於劉在河南講話的引文見《當代背景》834 號，第 16 頁；中文的版本見 1967 年 4 月 16 日《教育革命》第 2 頁《劉少奇反對毛主席教育路線 50 例》；上海的版本見《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四集，第 65 ～ 66 頁。

【62】見《聯合研究院院刊》，1967 年 7 月 21 日，第 6 期，第 85、86 頁；《中國大陸雜誌概覽》599 號，第 28 ～ 30 頁；1967 年 5 月上旬《毛澤東主義戰報》第 4 頁；《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 100 例》。

【63】豪：《中國城市的就業與經濟增長，1949-1957 年），第 124 頁。

【64】《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91 頁。

【65】見麥克法夸爾《百花……》，第 22 頁中引用的路透社記者大衛・切普的報道。

【66】毛給周的信見《毛主席教育語錄》第 16 ～ 17 頁。事實上，在 1957 年初毛曾對其他聽眾提過同樣的建議：見《毛主席教育語錄》第 16 頁號外兩條語錄。中小學和大學的政治教育情況見《教育革命》編輯部文章：《17 年教育戰線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1967 年 5 月 6 日《教育革命》。

【67】1969 年《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94、100 頁。

【68】聯合出版研究中心（華盛頓）檔案 41889 號，第 58 頁。

【69】見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經濟補遺，第 12 ～ 13 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441 號，第 33 ～ 36 頁。

【70】劉和彭真等人的態度大概已反映在 1956 年 7 月 12 日《人民日報》關於波茲南工人鬧事的社論裏。這個社論首先強調的是敵特的挑撥，其次才提到群眾中被特務利用的不滿情緒。

【71】見休斯和魯德的《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第 52 ～ 56 頁；沃克：《中國農業計劃》，第 678 頁。

【72】見新華社的報道，《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18 號，第 39 頁。不知這是劉講話的那個幹部會議還是另外召開的一個會議。

【73】同上。

【74】在劉去過的 5 個省裏似乎只有廣東宣傳了劉的訪問。看來這並不是偶然的，特別是考慮到廣東的領導在整風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75】劉 3 月在河南談到了分配問題（1967 年 7 月 3 日，《燎原戰報》，第 3 頁第 2 欄），4 月又在上海談到這個問題（《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66 頁），5 月在北京（同上，第 95 頁）的一個場合，劉說，「新建立的生產關係鞏固之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將主要表現在分配問題上」（有關這個演講的詳細情況和日期見第 368 頁）。

【76】《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95 頁。劉肯定想的是 1956 年幹部工資提高了 30% ～ 40% 這一情況。1956 年 12 月 7 日《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這些錯誤再不糾正，將對黨與群眾的團結造成不利的影響（見《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經濟補遺 245 號，第 20 頁）。

【77】《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96 頁。

【78】 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一節裏毛似乎在暗示這一思想（《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87 ～ 288 頁）。在 1957 年 6 月從華沙得到的毛講話的文本中，毛說：「眾所周知，給予三個工人的工資至少須滿足五個人的需要，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最好的解決辦法看來就是把工作分給大家做，使每個人都得到工作和報酬……」（引自麥克法夸爾：《百花……》，第 277 頁）。

【79】 《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97 頁。劉在上海較早的一次講話中說，最大的矛盾表現在分配關係上（同上，第 66 頁），劉談到了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他說這種矛盾僅僅是諸種矛盾中的又一種矛盾。（同上，第 67 頁）

【80】 根據「文本」的材料，在匈牙利事件後不久，劉就開始強調分配問題的重要性。見 1968 年 5 月 27 日《人民日報》：《徹底批判中國赫魯曉夫「三會一團」反革命修正主義工運路線》。1 月毛在省委書記會議上提出，「有糧就有一切」，並且特別指出，掌握了充足的糧食就會減輕罷工問題的嚴重性（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78 頁）。

第十五章 發動整風運動

【1】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18 號，第 40 頁。

【2】 1957 年 3 月 24 日《人民日報》：《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在此前不久費到了全國許多地方，在此基礎上他寫出了這篇文章。

【3】 4 月 1 日《人民日報》社論討論了毛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談到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中國共產黨是否已使農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落在了工人的後面，《人民日報》像毛一樣，對此持否定的態度。

4 月 6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引用了毛在宣傳工作會議講話中所說的教育者必須先受教育的話，在此，該報再次選用毛言談中那些有利於黨的話，強調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而不是改進黨的工作作風。而且，毛的原意被歪曲了，社論中講的知識分子主要是指非黨人士，但毛卻沒有把他們單劃出來的意思。恰恰相反，他曾這樣說過：「知識分子也要改造，不僅那些基本立場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說所有的人，我們這些人也在內。」（毛：《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 8 頁）當時參加宣傳工作會議的人五分之四都是黨內的高級宣傳和文化幹部（同上，第 29 頁，註釋 1，如同已指出的，出席會議的有 380 多名黨內幹部和 100 多名黨外人士。參加會議的確切人數各種資料說法不同——但 4 月 13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超過 800 人——但是，重要的問題不在這裏，而在黨與非黨參加者的比例）。

【4】 毛對華東局的講話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00 ～ 109 頁。他承認自己缺少群眾基礎的話見第 105 頁。他關於「鬧事促進會」的講話見第 103 頁。

1957 年 7 月，毛在上海的一次講話中提到，在此之前 3 月下旬的時候，他曾在上海作過另一次講話（同上，第 109 頁）。由於文章來源不大可能把這另一次講話與上文提到毛對華東局的講話在時間和地點上都混淆起來，除非得到新的證據，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毛在 3 個星期中對上海的同志講了兩次話。這充分表明了他與後者的緊密聯繫。

後來，毛曾指責宣傳部門對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宣傳不力（我推測，這主要是針對胡喬木的）。毛宣稱只要得到 10% 的支持他就很高興了——但這是發生在事情已結束之後（同上，第 150 ～ 151 頁）。

【5】 對周揚的反感與懼怕，從 1957 年 5 月知識分子提的許多批評意見中可以看到。見麥克法夸爾：《百花……》，第 175、177 ～ 178 頁。周揚是唯一表示公開支持毛的中宣部高級官員，他有點出乎意外的行為也許是因為毛支持他在幕後同丁玲和其他黨內作家所作的鬥爭。1957 年 1 月，毛曾建議把公開批判作為最好

的辦法來對付丁玲等人（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76 頁)。關於周揚和丁玲之間的幕後鬥爭，參見戈德曼，207 ～ 216 頁。

【6】 我們將會看到，周揚採訪記的發表並不是這一時期上海走在北京前面的最後一個例子。確實值得注意的是，一位高級黨的官員對陳其通一夥人的首次攻擊竟是出現在上海的報紙上。這並不是上海和《文匯報》最後一次為毛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正是《文匯報》在 1965 年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關於周揚採訪記的重要性的描述，參見戈德曼，190 ～ 191 頁。

【7】 見 1957 年 4 月 10 日《人民日報》《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8】 同上。

【9】 同上。在這篇社論的前面部分，作者有些無力地提到，《人民日報》登了陳遼和茅盾寫的批評文章和報社寫的關於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在全國範圍內引起爭論的內容摘要（直到 4 月 4 日才付印）等，試圖以此說明，雖然《人民日報》嚴重地落後了，但一直還是站在正確路線上的。

【10】 這些社論是:《怎樣對待人民內部的矛盾》(4 月 13 日)、《從團結的願望出發》(4 月 17 日)、《工商業者要繼續改造、積極工作》(4 月 22 日)、《全黨必須認真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4 月 23 日)、《從各民主黨派的會議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4 月 26 日)。

【11】 我在這裏用的是《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131 號，第 12 頁上的社論的譯文。

【12】 同上，第 5 頁。

【13】 1968 年 2 月 10 日《工人造反報》文章 :《批判陳丕顯的五次假檢討》。陳丕顯被描述為只懂得欺壓人民的人物。

【14】 1966 年彭真被打倒後，劉少奇告訴一群非黨人士說，這位前市長的主要錯誤是嚴重的「宗派情緒」(《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51 號，第 39 頁)。考慮到劉的聽眾的成份，人們必然得出結論：劉的發言的意思之一顯然是在說彭不喜歡非黨人士。

【15】 《反黨篡軍分子賀龍的滔天罪行》之一，載 1967 年 1 月 28 日《體育戰線》。

【16】 見科林和克拉克所著《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中彭的傳記。

【17】 斯坦因 :《紅色中國的挑戰》，第 119 頁。

【18】 1968 年 5 月 15 日《文匯報》文章 :《打倒國民黨大黨閥彭真》。

【19】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的滔天罪行……》(《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39 號，第 16 頁)。相關的引文是 :「說我沒有能力做理論工作，這不是事實。但是中央的許多工作總得有人去做。」

【20】 同上，第 3 頁。

【21】 這是安子文的看法。1957 年起安任中央組織部長。見 1967 年 5 月 20 日《追窮寇》上的文章 :《打倒大叛徒安子文！砸爛舊中組部的獨立王國！》。

【22】 1967 年 10 月 17 日《政法紅旗》第 5 頁。

【23】 參見麥克法夸爾 :《百花……》，第 26 ～ 27 頁。

【24】 為什麼在這時發表關於山西會議的報告，原因並不清楚。這是鄧拓給彭真的一個暗示，表示他不能再保護他多久了？還是彭真要求發表的，以次作為緩兵之計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彭真退讓之後，一個報告被發表了，終於透露山西第一書記是主持了會議的。

【25】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6 號，第 9 ～ 10 頁。

【26】 同上，第 3 頁。

【27】 上海、天津同北京一樣，都具有與省政府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城市。

【28】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6 號，第 9 ～ 10 頁。

【29】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3 號，第 21 ～ 22 頁。毛派康生去天津，是讓那裏的黨組織就範嗎？天津離北京很近，那裏的黨委大概對首都的各種趨向很敏感。

【30】 這一新華通訊社電訊可以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18 號，第 39 ～ 40 頁中找到。有趣的是，《廣州日報》的讀者直到 4 月 23 日才看到廣東會議的第一次完整報道。

【31】 這個時候《北京日報》的出版方針也是有趣的。4 月 14 日，它像其它省的報紙一樣，也轉載了《人民日報》關於矛盾講話的第一篇社論（4 月 13 日發表）。同時，《北京日報》發表了關於北京黨組織如何安排傳達毛對萬人大會講話的報道。這個報道也許要暗示讀者，北京黨組織已經預料到《人民日報》要發表社論。4 月 18 日的《北京日報》可能給人以同樣的印象。它同時發表了北京第一次宣傳會議的報道與《人民日報》第二篇關於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的社論（4 月 17 日發表）。4 月 20 日，北京市第二次宣傳工作會議召開。當天的《北京日報》發表了新華社關於上海和天津會議（表明那兩個城市的第一書記的作用）的報道，還發表了中央機關關於學習毛的講話的一篇文章。

【32】 鄧小平 4 月 14 日回到北京，陪同毛和其他高級領導人接見幾個代表團；在此之前，有一個多月沒有報道說他在首都。14 日下午劉少奇在這個場合沒有露面，可能他是當天晚上回來的，甚至可能是在 15 日上午回來的，因為伏羅希洛夫下午 3 點才到達北京。

【33】 第一次會議的與會者超過 1400 人（《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1 號，第 1 頁）；第二次會議的參加者是 2800 人（《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17 號，第 5 頁）。

【34】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摘編》（北京：新人大公社和中國人民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1967 年 5 月），第 14 ～ 15 頁。

【35】 不清楚彭真的講話為什麼沒有在 4 月 21 日的報紙上報道。發表他的講話要經過毛的批准嗎？這確實是有可能的，如果彭真由於不滿而利用講話的機會批評毛。文化大革命的一份材料批判彭說過的話：「有些人說：『15 年間，文藝界被教條主義統治著；既沒有產生好的作品也沒有出現優秀作家』。15 年就是毛主席發表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的 15 年。在這一期間果真既沒有產生好的作品又沒有出現優秀的作家嗎？沒有。將來會有嗎？你們可以討論。但我既不想作任何預言，也不想作任何評論。」（《中國大陸雜誌選》639 號，第 1 頁）

【36】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18 號，第 4 頁。

【37】 同上，第 2 頁。

【38】 《人民日報》的報道指出，江蘇、浙江和河北對 4 月 13 日社論作出了反應（參見《人民日報》4 月 22 日〈關於江蘇的報道〉和 4 月 25 日對這些省的報道）；江西和四川對 4 月 17 日社論作出了反應（參見 4 月 23 日〈關於江西的報道〉和 4 月 25 日的報道）。

【39】 參見 1957 年 4 月 24 日山東報紙《大眾日報》所載省委書記夏征農的報告的第四點；再參見 4 月 28 日《江西日報》所刊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的報告（這篇報告據說是 4 月 29 號作的）楊說，中央已發出了關於學習和貫徹毛的論矛盾的講話的指示。這個指示可能是指整風指示的第二部分（參見《人民手冊》1958 年，第 29 頁）。

【40】 1957 年 4 月 24 日《大眾日報》。

【41】 1957 年 4 月 27 日《江西日報》。這個通知的題目顯然是模仿了中央指示的題目。

【42】 1957 年 4 月 25 日《人民日報》。

【43】 1957 年 4 月 28 日《安徽日報》。

【44】 內蒙古和新疆明顯地只是讓人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它們兩地的人民代表大會（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相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已在最近結束的會議上討論了矛盾問題（1957 年 4 月 27 日《人民日報》）。江西和山東的省委領導人也關切地證明了他們已經卓有成效地按中央所希望的那樣去做了。江西的通知的題目中使用「繼續」這個詞便是一個標誌。在山東，省委書記夏征農竭力告訴他的聽眾，省委領導已經在考慮如何推進對毛的報告的學習、宣傳和貫徹的問題，這個會議正是為了把省委常委的決定通知給幹部而召開的。事實是，直到當時還只有省委常委這麼一小部分人考慮這個問題，這是一個有損形象的承

認；另外一點是夏征農表示省委常委已經採取步驟來宣傳毛澤東的講話，——比如將要在5月底召開黨員和非黨群眾的一個宣傳大會！(1957年4月24日《大眾日報》)

【45】 1957年4月27日和5月5日《江西日報》。江西的通知標明日期為4月23日，但到4月27日才發表。

【46】 學習的指示4月26日作出，4月27日發表於《南方日報》；整風指示5月15日作出，5月20日發表於《南方日報》。

【47】 這篇文章部分內容在麥克法夸爾的《百花……》中翻譯出來，此書第27～28頁。

【48】 參見《反黨知識分子翦伯讚的真面目》，《紅旗》1966年第15期（《中國大陸雜誌概覽》556號，第5～6頁）。在這篇文章中，指責翦和費孝通煽動資產階級右派發動進攻；再參見《毛主席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紅色批判者》1967年6月16日，第2頁第2欄。這篇文章說，毛《1957年夏季的形勢》一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翦的回答。

【49】 周揚在毛為驅散春寒進行的顯然是不成功的努力中助了一臂之力，他召集了一系列的會議，試圖促使春暖的到來（參見姚文元《批判反革命兩面派分子周揚》，《紅旗》1967年第1期（《中國大陸雜誌概覽》559號，第11頁））。

【50】 參見麥克法夸爾：《百花……》，第29～30頁。鄧初民關於四條標準的提議清楚地表明，在毛的矛盾講話的原稿中沒有講到批評的標準問題。

【51】 劉於4月22日在上海接見了伏羅希洛夫，並似乎一直陪同他，直到這位蘇維埃部長會議主席4月25日上午離開為止。4月27日，劉對上海幹部作了一個重要講話，在此期間他似乎不大可能閃電般地回過北京。如果他4月26日在北京的話，他一定會迎接緬甸高級議員的到來。這是全國人大的客人，而劉是全國人大的委員長；可是，他4月28日才接見這位緬甸議員。

彭真4月25日在杭州陪同伏羅希洛夫，4月28日同伏羅希洛夫一起到了廣州，並於4月29日同他一同回到北京。在這個關鍵時刻，彭離開北京是令人奇怪的。所有其他陪同伏羅希洛夫訪問全國各處的重要官員——朱德（在東北）、劉少奇（在上海）、周恩來（在杭州）——都是政治局常委。如果鄧小平在北京忙於監督整風指示的起草的話，還有陳雲可以陪同伏羅希洛夫去廣州，保持一位高級領導人陪同這位蘇聯領導人。（陳看來在一段時期裏在北京的外交禮節上只起相對較小的作用。）

此外，還有一些更多的理由來說明彭為何應留在北京。由於五一節即將來臨，他的主要副手又剛從重病中恢復（從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報》在一個提到北京領導人參加體力勞動的報道中透露），人們會認為首都的市長和第一書記將親自監督慶祝活動的準備工作。由於蘇聯領導人的到來，五一的慶祝活動就顯得更為重要。不管怎麼說，彭真不習慣於作一個陪同官員，他幾乎每天都需要在首都履行外交禮儀。（由於劉和彭此時同時外出，緬甸的首席議員只好由一位非共產黨員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來歡迎了；彭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本應該在場。）也許更重要的是，如果黨中央書記處準備開始制訂整風指示的話，那麼第二書記彭真難道不希望參加起草，以便保證指示盡可能地同劉少奇和他自己的觀點相吻合嗎？可能起草指示的決定是在彭離開北京去杭州之後作出的；或者，彭也許公開希望自己不參加整風運動的準備工作。

【52】 參見《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661號，第19頁。4月30日黨委再次開會研究整風指示。

【53】 「右派」馬哲民發表於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報》的坦白（譯按：題為《我要重新做人》）中說了最高國務會議的會期。在毛對他在這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所講的話作廣泛的論述時，他的話似乎是防禦性的，強調了他講話中關於敦促資產階級忠於無產階級的那一段話。（參見他在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 第136、138～140頁。毛1958年1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同上，第158頁。再參見第278頁）。

【54】 這個指示的新華社英譯文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3 號，第 40 ～ 42 頁；這段引語出自第 40 頁。
【55】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3 號，第 40 頁。
【56】 參見毛的《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 3 卷，第 35 ～ 36 頁。這篇文章排列的順序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當時與官僚主義等同）。在八大和宣傳工作會議上，毛列的三大錯誤的順序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他在八屆二中全會講話中將它們排列成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奇怪的是，在公開發表的關於矛盾講話的文本裏，沒有像上面那樣點明三大錯誤，儘管毛澤東把官僚主義作為引起人民騷亂的主要原因（參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其分析》，第 291 頁）。
【57】 參見《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四輯，第 65 頁。除了已經引證的關於強調官僚主義或主觀主義重要性的觀點外，還應指出，毛一直把詞語的順序看作是政治態度的主要標誌。1959 年，提到對大躍進的批評時毛說：「例如他們說：『有失有得』。把『得』放在後邊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麥克法夸爾《論照片》一文中已引用論述，《中國季刊》1971 年 4-6 月，第 291 頁）。
【58】 參見《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4 輯，第 65 ～ 69 頁。劉在對官僚主義的簡短論述中說，他也為官僚主義大傷腦筋——我就有不少官僚主義（第 67 頁）。劉也許打算說明，他自己承認這一點，就可以強調官僚主義的普遍存在；事實上，這也許在聽眾眼中減低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會認為，劉不大可能整頓自己的作風。
【59】 同上，第 67 頁。
【60】 同上，第 65 頁。
【61】 從文革資料中劉的講話的其他部分摘下來的幾條引語可以看出，他在籠統地論斷矛盾之後，話題轉到一些具體的人民內部矛盾（見上文，第 196 ～ 199 頁），例如工農之間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矛盾，見 1967 年 2 月 1 日和 8 日《井岡山》所刊文章：《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思想言論 100 例》；同上，1967 年 1 月 1 日第 3 頁，《看劉少奇的兇惡嘴臉》；1967 年 8 月 20 日《人民日報》文章：《徹底批判反動的階級鬥爭熄滅論——駁斥中國赫魯曉夫 1957 年在上海黨員和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62】 麥克法夸爾：《百花……》，第 31 頁。
【63】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3 號，第 41 頁。
【64】 《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4 輯，第 71 頁。1 月，鄧小平在天津講話中表示反對在人民和黨內開展大民主（見上文，第 178 頁）。
【65】 文革中，劉由於在這一講話中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而受到批判。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38 號，第 5 ～ 11 頁引用過的文章。但是，正如劉在八大的講話所遭到的批判一樣，這些批評似乎也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劉並沒有如他的批評者所說的那樣過激，而且劉也絕沒有超出當時毛所能夠接受的範圍。
【66】 1957 年 3 月 3 日《人民日報》。
【67】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3 號，第 42 頁。
【68】 雖然這一指示註明的日期是 4 月 27 日，但是在 4 月 30 日以前它並沒有普遍地下發到全黨，許多省的反應為此提供了證據。陝西省委 4 月 30 日才接到指示，省委書記們立即開會研究如何加以貫徹執行。次日晨 8 點召開了省委會，討論書記們提出的計劃【1957 年 5 月 1 日北京電台的廣播，見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661 號，第 19 頁）。江西省委直到 5 月 2 日才開會討論這一指示（1957 年 5 月 5 日《江西日報》）。然而，中央國家機關於 4 月 28 日搶先發動了整風，這一行動表明，在首都，很多幹部一定早已聽到了風聲。
【69】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5 號，第 1 ～ 6 頁。
【70】 能說明 5 月 2 日社論重點的是這樣一個例子：整風指示說，「又因為黨已經在全國範圍內處在執政的地位，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有許多同志就容易採取

單純的行政命令的辦法去處理問題」，但社論卻僅僅提到，不少同志傾向於靠發佈行政命令這樣的簡單方法來解決問題。

【71】《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5 號，第 2 頁。

【72】同上。

【73】這段引文摘自《紐約時報》記者在華沙得到的《正處講話》文本，見麥克法夸爾第 270 頁。

【74】《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5 號，第 1 頁。

【75】同上，第 3 頁。

【76】同上。

【77】《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3 號，第 40 頁。

【78】《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3 號，第 3 頁。

【79】同上，第 1 ～ 2 頁。劉在上海的講話支持八大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看法，但是，他並未指出是生產關係落後還是生產力落後，從而模糊了毛的觀點與八大決議之間的分歧（見《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4 集，第 66 頁）。

【80】同上，第 3 頁。

【81】《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3 號，第 40 頁。

【82】《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3 號，第 5 頁。

【83】這些年裏，胡喬木在新聞出版界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吳冷西的交待中可以看出來。參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2 卷第 4 號第 65 ～ 66 頁、68 頁、72 頁、74 ～ 75 頁、79 頁。

【84】同上，第 65 ～ 70 頁、72 頁、76 ～ 77 頁。

【8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06 頁。

第十六章 鳴放

【1】有些主要的批評意見轉引自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與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355 ～ 357 頁。

【2】我一直未能找到任何關於人大機關召開整風座談會的報告，而只有關於國務院 5 月份整風活動的經常性報告。

【3】這三個問題分別在下文的三節裏加以討論。

【4】5 月 5 日《人民日報》轉載了上海《解放日報》的社論，題目是：《只能放，不能「收」》。這篇社論 4 月 21 日就出現在《解放日報》上了，《人民日報》過了這麼久還轉載這篇文章，表明那些支持整風的人認為，把這篇社論中的思想由黨報傳之於全國是很重要的。5 月 12 日，《人民日報》又轉載了 5 月 9 日《解放日報》的社論《好得很，還是糟得很？》。這篇社論的目的在於緩和許多黨員的緊張情緒，他們因前些時候在座談會上受到黨外人士的猛烈批評而感到感到不滿。

【5】這些座談會上的批評意見的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43 號，第 2 ～ 37 頁和 1550 號，第 2 ～ 28 頁。

【6】參見 1957 年 5 月 6 日《進軍報》第 3 版第 2 欄和《周揚反革命修正主義講話集》(《中國大陸報刊概覽》646 號，第 7 頁)。在這一摘自講話集第 7 ～ 8 頁的大段引文中，周揚承認只有黨員才有實權，而其中那些當官的都擺出一副官架子。然而，他的講話裏並沒有什麼黨員像「特務」和「木頭腦袋」一類的話，但姚文元卻指責周在講話中這樣說過（見姚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載 1967 年第 1 期《紅旗》，《中國大陸雜誌選》559 號，第 11 頁）。這一大段引文是用來揭露周揚的罪惡的，但卻略去了周對黨的幹部惡毒攻擊的話，這是難以理解的。很可能，周揚僅僅承認，批評者用那樣的語言來描繪某些黨員也許是正確的，這與整風指示中承認某些黨員有國民黨的工作作風相比，也並不為過。

不管這段話的原文到底怎樣，姚引用的周另一段講話肯定是誤解了原意。姚譴責周揚說：「他（指周）說那些宣稱要殺戍百萬共產黨人的人『不一定就是

反革命』。」(《中國大陸雜誌選》559 號，第 12 頁)〔譯文我已稍加修改〕事實上，如同我在書中引用的周的講話所表明的，周揚只是作了一般的表態，並不包含對一切反革命言論都可任其放縱的意思，更沒有表示他對這種反革命言論將聽之任之。(姚文元引用的關於殺共產黨的這句話幾乎可以肯定是在周揚的這次講話之後才出現的。見 1957 年 5 月 31 日《人民日報》報道的葛佩琦的講話；這篇報道沒有明確指出這一反革命言論出現的時間，但看來很可能是在 5 月 13 日以後）非常有趣的是，當周揚在一般表態中承認黨在文化領域中領導不得力時，他卻似乎已把他自己領導的文學領域排除在外了！(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46 號，第 7 頁）

【7】 由毛親自起草（這一點是後來在文革期間透露的）的 1957 年 7 月 1 日的社論透露了黨內有一個關於這個問題的指示。(見兩報一刊社論：「把新聞戰線的偉大革命進行到底——批判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新聞路線」，1968 年 9 月 1 日新華社電訊稿，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253 號，第 17—31 頁。）引自七一社論的毛的這段話登在第 22 頁上。根據下列證據，我推測毛同意給開展毫無限制的批評定一個月的期限是被迫的；4 月初，他告訴上海市委，共產黨要硬著頭皮讓人罵幾個月〔《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01 頁〕；但是，鑒於 5 至 6 月已經發生的情況，在上海的另一次講話中，他提出，「我們的」政策一直是要讓黨經受幾個星期的磨練（同上，第 113 頁)。合乎邏輯的假設是，毛關於開展批評時間的改變是在劉少奇等人的提議下作出的。劉等擔心，如果黨一直對批評保持沉默達幾個月之久，就可能嚴重挫傷黨員的士氣。1958 年 4 月毛解釋說，對這一指示保密是想看看基層幹部在受到攻擊時能否保持鎮靜(同上，第 185 頁)。

【8】 1957 年 5 月 26 日《人民日報》。

【9】 同上。

【10】 見 1957 年 6 月 14 日《人民日報》姚文元就各報刊如何對待這句話所作的分析。

【11】 1957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報》。

【12】 利尼・戈德曼在《北京大學的整風運動：1957 年 5-6 月》一文中肯定了這些討論會對校園內事態的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見《中國季刊》1962 年 10-12 月，第 134 頁)。當時作者正在北大學習。

【13】 見 1957 年 5 月 26 日《光明日報》關於「民主牆」的報道，轉引自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與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132 ～ 133 頁；1957 年 5 月 27 日《文匯報》的報道，轉引自《百花齊放與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134 頁。

【14】 戈德曼：《共產黨中國的文學分歧》，第 141 頁。

【15】 同上，第 143 ～ 148 頁。

【16】 同上，第 148 ～ 149 頁。

【17】 同上書第 141 頁概述了「民主廣場」的民主氣氛，可以使人聯想到倫敦海德公園（的演講角)。林希翎 5 月 23 日的講話轉引自杜林的《共產黨中國：學生反對派的政治》第 23 ～ 29 頁。5 月 30 日林在她自己的學校所作的演講轉引自同一本書，第 30 ～ 42 頁。《人民日報》後來對她的講話也作了詳細的報道（見本書第 140 ～ 141 頁)。

【18】 杜林上引書，第 24 頁。

【19】 同上，第 27 頁。

【20】 同上，第 28 頁。

【21】 見《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 33 頁。這份材料引用這些講話是要表明劉想要壓制那時已經開始的反右鬥爭。事實上，那時反右鬥爭還沒有開始，劉的目標恰恰是要促其盡快開始而不是限制它。

【22】 杜林上引書，第 28 頁。

【23】 6 月 1 日，南京大學的學生舉行遊行並在省黨報《新華日報》社外張貼大字報，要求解釋:《文匯報》已經報道了發生在北大的「民主高潮」，為什麼《新華日報》卻一直不予報道（麥克法夸爾上引書，第 154 頁)。儘管林希翎抱怨新聞封鎖，

《中國青年報》稍後卻指出，她的「右派」言論在一個時期內在全國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中十分盛行。麥克法夸爾上引書，第 140 頁。

【24】 麥克法夸爾上引書，第 141 ～ 143 頁。

【25】 林希翎在 5 月 23 日的講話中說：「我不怕這樣講話。我的朋友不斷地告誡我：『你這個小鬼，有一天我們都要到監獄裏去找你，要到監獄裏為你送飯。』雖然這是在開玩笑，但確實有這種可能。如果你們不歡迎我，我可以走。但是既然我已經來了，我就不怕危險。如果我被投入監獄，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杜林上引書，第 28 頁）。毛 1957 年 10 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林小姐當前正在人民大學掃地，並且說她屬於那一類應被剝奪選舉權的人。毛還嘲笑林小姐自稱 21 歲而事實上已經 28 歲。

【26】 戈德曼上引文。《中國季刊》1962 年 10-12 月號，第 149 頁。

【27】 這次代表大會於 5 月 25 日下午結束，也就是北京大學出現了「民主牆」一周之後，以及林希翎小姐在「民主廣場」發表具有挑釁性的講話一兩天後。

【28】 根據戈德曼的說法，大字報只在 5 月 22 日貼於北大。

【29】 參見那一天路透社駐北京記者戴維・奇帕的報道。（麥克法夸爾上引書，第 134 ～ 135）

【30】 利尼・戈德曼上引文，第 149 頁。

【31】 同上。

【32】 參見麥克法夸爾上引書，第 193 頁。裴多菲俱樂部以 19 世紀匈牙利一位詩人命名，形成於 1956 年 3 月，是勞動青年聯盟組織中的一個研討問題的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的成員激烈地批評拉克西政權的罪行和錯誤，這對最終在匈牙利釀成叛亂起了很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參見瓦利：《匈牙利的分裂和騷亂》一書，第 220 頁。

【33】 戈德曼上引文，第 228 頁。

【34】 五四運動是以北京的一次學生抗議活動而得名，這個活動反對（1919 年凡爾賽和平會議上）將德國以前在中國的租借地讓與日本。中國許多城市中的愛國者紛紛響應北京學生的抗議示威活動，並掀起了抵制日貨運動。「五四運動」這一術語後來用於泛指本世紀 10 年代和 20 年代的知識分子的騷動，當時進步的中國人擯棄儒家學說和熱切考察外國的思想和學說，以尋找復興中華、驅逐帝國主義之途徑。（參見周策縱著《五四運動》）

【35】 參見他於 1957 年 4 月 25 日在杭州同蘇聯高級官員的談話（麥克法夸爾上引書，第 31 頁）。

【36】 富爾：《狡詐之人與遲鈍之人》，第 29 頁。

【37】 引自麥克法夸爾上引書，第 168 ～ 169 頁。

【38】 同上，第 170 頁。

【39】 同上，第 169 頁。

【40】 同上，第 170 頁。

【41】 參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97 號，第 21 ～ 34 頁。

【42】 麥克法夸爾上引書，第 170 頁。

【43】 值得注意的是，章伯鈞和其他出席 6 月 6 日會議的「右派分子」不是人大常委會委員，他們可能不知道劉的警告。司法部長史良和中國民主同盟秘書長胡愈之這兩位與會者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可能參加了 5 月 25 日的人大常委會。但是，如果他們確實參加了這次會議，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向其他 6 月 6 日會議的與會者透露了劉少奇在這一場合說了什麼。胡愈之（據說中途離開會議）和史良後來都沒有被打成「右派」。

【44】 參見《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 31 頁。

【45】 參見羅對全國人大的檢討，1957 年 7 月 16 日《人民日報》。

【46】 麥克法夸爾上引書，第 145 ～ 153、264 頁。

【47】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41 號，第 10、11 頁。被派去管理學生的新副校長中有北大的陸平，1960 年他晉陞為校長。1966 年，歷史車輪轉了一整圈。當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學生作為紅衛兵動員起來時，陸平是第一批被趕下台的官員

之一。當我 1972 年秋天訪問北大時，我聽說陸平在北大自己的農場裏進行體力勞動。

【48】 參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10 號，第 28 ～ 30 頁。

【49】 1959 年 2 月，毛在一次省委書記會議透露了這一段情況。同時，他對林希翎所代表的威脅嗤之以鼻。新華社的機密報道載於《內部參考》。參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72 頁。

【50】 關於毛在 5、6 月份發生的一些事件前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參見同上書第 369 頁，第 14 條注；關於毛在這些事件後的態度，參見 1957 年 10 月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他在這個講話中說，即使把人民政權的死敵估計為總人口的 2%，即 1200 萬人，這些敵人也構不成什麼威脅，因為他們分散於全國各地〔參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30 頁〕。關於毛滿不在乎的許多其他的講話可在《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 中毛澤東 1957 年的講話中找出。

【51】 毛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駁斥關於《人民日報》第一篇反攻的社論(《這是為什麼?》) 發表得過早的觀點。他認為，如果這篇社論推遲發表，那麼左派的一部分就會被瓦解〔《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07 頁〕。關於士氣問題的詳述，參見上引書第 249 頁。毛澤東感到整風運動不斷升級會造成自己的被動，這一點在他 1957 年 10 月最高國務會議上抨擊右派的講話中可以看得出來。他在這個會議上指出，他從沒有提倡大鳴大放——這是右派的發明〔《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33 頁〕。

【52】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891 號，第 24 頁 (翻譯時稍有變動)；再參見本書第 392 頁，第 1 條注。

【53】 1957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關於這篇社論是由毛澤東起草的問題，參見本書第 289 ～ 291 頁。姚文元在 1957 年 6 月 14 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特別指出了《文匯報》的一大錯誤是沒有給毛澤東對青年團代表的警告以應有的強調；警告的大意是，所有違背社會主義的言行都是錯誤的。毛澤東對此必定火冒三丈，因為由於《文匯報》集中揭露中國共產黨的缺點，它很受學生的歡迎。(參見麥克法夸爾上引書，第 154 頁) 由於新聞報刊在毛澤東自己的發展中起的作用，他應該對報紙的影響十分敏感。參見斯諾《西行漫記》第 147 頁。

【54】 參見《光明日報》的自我批評。《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85 號，第 7 ～ 24 頁，尤其第 7 ～ 8 頁的翻譯。

【55】 參見總編輯儲安平對全國人大的檢討 (在麥克法夸爾的書中的摘錄，第 285 ～ 286 頁)。

【56】 關於羅隆基通過浦女士與《文匯報》的聯繫，參見關於新聞記者工作座談會的報道 (譯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66 號，第 43 ～ 47 頁)，並參見羅隆基在全國人大會上的檢討，1957 年 7 月 16 日《人民日報》。浦熙修是彭德懷元帥夫人浦安修的姐姐。參見《中國大陸雜誌選》27 號，第 21 頁。

【57】 (和風細雨這一短語) 可能在他的矛盾講話中用過；但肯定在他 3 月 1 日的總結中用過〔參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93 頁〕。他也在宣傳工作會議講話中用過這一短語 (參見《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第 372 頁；奇怪的是，後來官方對毛澤東《在宣傳會議上的講話》的英譯本第 13 頁，把這句話譯成了比較粗俗的「我們一定不要太粗暴」)。天津市委第一書記黃火青說，市委在 1957 年 1 月和 2 月檢查思想工作和實際工作時，曾使用「和風細雨」的方法，以響應 1956 年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的號召 (黃火青：《認真克服領導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1957 年 4 月 28 日《人民日報》)。這似乎說明，毛澤東在二中全會作總結時創造了這個短語。然而，我發現這個短語最早是由鄧小平在 1957 年 1 月使用的。參見《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摘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紅代會三紅揪劉鄧大軍第一支隊，1967 年 4 月)，第 19 頁。

【58】 整風指示嚴格限制大規模鬥爭會，引文同上，第 212 頁。毛澤東對「大民主」的論述參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92 ～ 93 頁。在同一段中，他把

「和風細雨」等同於小民主，劉少奇 1957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講話時也這樣認為（《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4 輯，第 68 頁）。劉少奇關於「大民主」的論述參見上書第 178 頁。

【59】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95 頁。我判斷毛澤東帶有半幽默口吻，但也只是半幽默！關於毛澤東早前說過資產階級一直是比較被溫和對待的，參見上引書第 92 ～ 93 頁，《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第 372 頁及 185 頁。

【60】 理查德・所羅門正確地讓人們注意到引用劉少奇的話的重要意義；儘管這不是他所說的「在這一時期關於整風運動的官方文件中，唯一的一次引用劉的話」。劉少奇的話還被 5 月 3 日《人民日報》社論所引用，這篇社論論述的體力勞動問題，下面還將加以討論。但是，所羅門認為，引用了劉的話使一篇全篇帶有威脅性的社論中出現一點調和的語氣，他的這一看法則難以令人置信。事實是，有一篇社論專門論述「和風細雨」的方法，而且還是一篇很長的社論，這本身就是一種調和的姿態。所羅門說社論用了劉少奇的話作結語，由於這一錯誤，他未能注意到上面引文中的話所包含的、自然帶來的保證，即自從毛澤東成為全黨的領袖以後，始終正確地對待了錯誤（參見所羅門：《毛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第 307 ～ 308 頁）。

【61】 1957 年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

【62】 同樣有趣的是，《新觀察》雜誌 1957 年 5 月 16 日第 10 期第 11 頁，上方只刊登了一張由中國領導人陪同的伏羅希洛夫的照片，下方是一篇文章介紹他在中國的旅行。這張照片上有彭真和陶鑄陪同伏羅希洛夫。還登這樣的照片是很奇怪的。在同樣情況下，一張在上海拍的照片必然是這位蘇聯主席與劉少奇、林彪元帥和劉伯承元帥、宋慶齡（孫中山夫人）、公安部長羅瑞卿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合影，所有這些人都到機場迎接了他（1957 年 4 月 23 日《人民日報》）。廣州照片的選擇是否一種暗示，提醒黨的官員注意北京和廣東黨之間將達成某種政治協定？

【63】 《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4 輯，第 95 頁。這一輯似乎包括劉少奇對楊獻珍的全部指示（第 94 ～ 98 頁），題目是《劉少奇關於高級黨校學員如何進行整風的談話記錄》，也可能有一處刪節（第 98 頁）。劉少奇談話的日期和聽者的身份在這個材料中沒有寫明。但是，這些問題在《中國大陸雜誌選》651 號第 29 頁中得到澄清，這部書從講話中引用了另一段話。試比較這一頁第 4 段劉的引語，與《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4 輯第 94 頁倒數第 2 段；二者的內容不盡相符，但我認為這是編輯在《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51 號刊登這個小冊子的譯文時進行壓縮的結果。

【64】 陶鑄的講話是在 4 月 17 日，其第一、二部分在 1957 年 5 月 4 日《南方日報》上發表。

【65】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3 號，第 42 頁。

【66】 社論譯文被編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8 號，第 1 ～ 4 頁。

【67】 同上，第 3 頁。

【68】 同上，第 4 頁。

【69】 同上。

【70】 這些照片是毛澤東的支持者強行迫使發表的嗎？它們無疑暗示了彭真與北京鄰近的省市高級官員是隔絕的。

【71】 1957 年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

【72】 摘自《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38 號第 16 頁譯文。給人的印象是除了正式同意這項政策，彭真還想強調他之前對政策的抵抗並不是由於他本人的無能。

【73】 1957 年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沒有提供河南和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參加體力勞動的日期。

【74】 在春收和春播期間，有 7 萬廣東幹部參加體力勞動，但他們似乎並不是整風指示中所指的那種領導幹部（參見 1957 年 5 月 6 日《南方日報》）。

【75】 新華社 1957 年 5 月 14 日電訊，《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38 號，第 19 ～ 20 頁。

【76】 值得注意的是，廣東省委發出關於體力勞動的指示是在發表整風計劃前；後者5月15日作出，發表於1957年5月20日《南方日報》。
【77】 有一定體力者。
【78】 《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665號，第13～15頁有這個指示的譯文。
【79】 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報》。劉少奇在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開幕那天會議休息時說了這句話。重要的是，《人民日報》的報道顯示，參與體力勞動是劉少奇和圍著他的一些代表討論的唯一話題。這也許是由於這一指示正是在這一天發表的；但關於毛澤東在相同情況下同代表的談話的報道卻沒有提到他也趁機強調了這一指示的意義。
【80】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1538期，第14～16頁對這篇社論的翻譯，在這一點上是讓人誤解的。它譯的是：「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只要體力上適於這樣的勞動並能抽出一部分時間，就會幫助形成新的社會風氣……」這段話暗示，社論提出了兩項條件。事實上，這段話應當譯作：「而只要凡是能夠從事體力勞動的領導人員，抽出一部分時間參加體力勞動，形成一種新的社會風氣……」
【81】 5月整個一月裏，《南方日報》都沒有刊登陶鑄參加體力勞動的照片和頭版報道。陶鑄對體力勞動的固執牴觸可以由一個阿爾巴尼亞高級代表團的訪問看出。代表團5月15日抵達廣州，並由陶鑄於16日招待。在《南方日報》關於這一歡迎盛會的報道旁邊，另一篇報道說，阿爾巴尼亞人在從武漢飛往廣州的途中讀到了中共中央關於體力勞動的指示，他們到了廣州後，就要求參加一些體力勞動。他們16日參加了體力勞動，但只由市長朱光陪同，陶鑄則沒有陪同。陶鑄時年51歲，因此甚至按廣東規定的年齡條件也不能免於參加體力勞動。此時和後來，他都沒有表示身體有任何不適宜勞動的情況。
【82】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23號，第42頁。
【83】 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報》。
【84】 《廢棄「庸人政治」》，同上。鄧拓使用了卜無忌的筆名：「預見無迷信」。這篇本應被放在報紙背面不顯眼的地方的文章的作者身份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才公開（參見《鄧拓選集》第220頁）。
【85】 廣東省委關於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指示，在整風運動發動前，於4月26日發出（《南方日報》4月27日發表），但並沒有規定要在6月開始學習。這家報紙5月2日關於廣東省委討論整風問題的一則新聞，沒有提到打算於6月開始學習。換言之，似乎可以肯定，17日修改的計劃正是15日起草的那個計劃。
【86】 1957年5月27日《人民日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47號，第18～20頁）。
【87】 1957年5月30日《人民日報》。
【88】 1957年6月5日《人民日報》。
【89】 關於「三反五反」運動的現場紀實，參見魯姆《北京，1950-1953年》第12章。魯姆小姐在中國度過了大部分孩童時期，是英國外交官考林・克勞爾爵士的妻子，生於美國。克勞爾爵士50年代初在駐北京使館供職。
【90】 1957年6月4日《人民日報》。
【91】 同上。
【92】 同上。
【93】 同上。
【94】 同上。
【95】 同上。
【96】 同上。
【97】 同上。
【98】 社論可能是在支持整風的領導人的壓力之下予以轉載的。如果是這樣的話，《人民日報》設法用來自江蘇的報道削弱它的影響。
【99】 1957年6月5日《人民日報》。
【100】 同上。
【101】 同上。

【102】同上。
【103】1957年6月11日《人民日報》。
【104】《整風不能誤了生產》。使用「不能」這個詞是有趣的，它意味著社論作者可以宣稱自己只是在要求整風是一個不能損害生產的過程（如同國務院6月3日指示所強調的）。但是，社論的內容清楚地表明，對「不能」必須理解為「不能允許」。
【105】同上，1957年6月12日。
【106】同上。
【107】同上。
【108】《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4輯，第94頁。日期問題參見本書第386頁，注63。有一個資料認為，這一條日期為5月1日(《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33頁)，但其他兩個材料認為日期是5月7日。(參見《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31頁，《中國大陸雜誌選》652號第3～4頁。後一個材料引用的最後一句話完全脫離了上下文，以便歪曲劉少奇的意思。材料中引用說，「……當你到了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你可以買到你所需要的任何東西」。按照《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4輯上更完整的譯文，劉少奇實際上說：「當蘇聯同志到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來到中國時，他們感到最有意思的是能買到任何東西」。這句話是批評蘇聯經濟時說的。)
【109】《中國大陸雜誌概覽》651號，第29頁。值得注意的是，在劉少奇大約此時作的三篇重要講話正文的幾個現有部分（對上海幹部的講話，對楊獻珍的講話以及對北京地質學院畢業班的講話）中，幾乎沒有提到毛澤東或者他關於矛盾的講話。
【110】《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4輯，第94頁。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同志之間的矛盾被列為人民內部許多矛盾中的一個矛盾（參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58頁）。劉少奇所謂群眾對幹部的批評，是指對部長、省長、廠長等的批評（同上，第97頁），即對政府官員的批評，而不是對黨員幹部的批評。當然，這種區分在他的八大講話中已出現過了（參見上書第115頁）。並且，他似乎認為這種批評是針對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而不是在正式的會議上鼓勵群眾批評他的領導。
【111】《劉少奇選集，1945-1957年》，第418頁。這篇講話的準確日期當不得知，但在十年後地質學院紅衛兵組織批判這篇講話的文章中說，劉少奇在此講話「一個月前」作了上海講話（4月27日），並說這篇講話是在「毛澤東發表矛盾講話（2月27日）不到三個月後」發表的（《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934號，第447頁）。這些說法顯示，劉在地質學院的講話是在5月27日前一周。通過我在正文中所引劉少奇話語的尖刻性來判斷，他也許是在對北京院校日益高漲的批評聲浪作出反應。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可能是在5月22日和5月24日之間作出講話的。北大的第一張大字報直到5月19日才貼出來，而批評鋪天蓋地而來是在那之後的一兩天。由於劉在地質學院的講話沒有對學生提出任何警告（毛澤東於5月25日發出這種警告），似乎有可能劉是在5月25日前發表的講話。（有一種可能性是：講話甚至是在5月19日之前作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材料引用了劉少奇的最初登載於1957年5月19日《中國青年報》上的一句話，這句話反映了地質學院講話的思想，儘管與那次講話中的任何一句都不完全一致；參考《中國大陸雜誌選》653號，第3頁，《劉少奇選集，1945-1957年》，第423頁）
【112】與劉少奇在4月27日的上海講話不同，他在這篇講話的許多段中論述了官僚主義問題。但正如在所引的那次講話中所表現的，他似乎是在不滿地進行辯護。甚至有可能是學生迫使他談論這個問題的，因為他在講話中有一處這樣說：「你們不是剛剛提到了官僚主義嗎？」(《劉少奇選集，1945-1957年》第420頁)。
【113】1957年5月8日《人民日報》。朱德強調學習和工作。在這個月晚些時候召開的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學習和工作成為對青年的兩個主要指令。但

似乎奇怪的是，他對一群正在整風領導機關工作的青年人講話時，根本沒有提到整風。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這次青年團代表大會發出的祝賀信也強調學習和工作（還有第3條要求，團結），但他也談到必須向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鬥爭。

【114】關於林彪的健康問題，參見本書第357頁，注29。陳毅在1957年4月28日和8月1日《人民日報》文章中透露了他的病況。

【115】1957年4月28日《人民日報》。這篇文章發表的時間十分接近於整風運動的開始，這對毛澤東是很合適的；也許它不是一種巧合。

【116】1957年5月30日《人民日報》。

【117】《中國青年》第10期，1957年5月16日出版，第3～4頁。

【118】同上，第4頁。

【119】同上，第3頁。

【120】1957年4月23日《人民日報》。

【121】1957年5月21日《人民日報》。

【122】杜林：《共產黨中國：學生反對派的政治》，第40頁。在這一方面，人們也許注意到，董必武至少主持了他所在單位的批評會，公安部長羅瑞卿沒被提到參加他部裏的整風討論（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報》）。

【123】參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564頁。書中指出，1934年當毛澤東在政治上面臨全面受辱的危險時，董必武對保護毛澤東起了重要作用。

【124】賀龍元帥陪同周總理訪問東歐，也許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與周相似的觀點。

【125】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李富春的說法是：「我們過去在基本建設工作中出現的一切缺點和錯誤，有些固然是由於我們沒有經驗，有些是和我們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分不開的。」李富春沒有重複國務院指示中對二者作的對比，即與沒有經驗「相聯繫」的錯誤與不良工作作風「造成」的錯誤之間的對比，但另一方面，他不像《人民日報》社論那樣強調缺乏經驗（參見本書第236～237頁）。李富春與薄一波到陝西和四川視察期間，於5月16日在重慶作了一個論述基本建設的重要講話。根據5月18日的《人民日報》，李富春著重論述了勤儉建國的問題，但也稍帶提到整風問題。

【126】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

【127】1957年5月3日《人民日報》。

【128】《當代背景》464號，第22、24頁。

【129】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載《人民中國》1957年7月16日，第16期，第39頁。

【130】要對1957年中期生產問題作深入的瞭解，參見李先念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的講話（《世界廣播概要》遠東卷，附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第3期，1957年7月9日，第1～22頁）。

【131】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報》。

【132】同上。

【133】郭芮：「整風檢查從什麼地方入手？」1957年5月9日《人民日報》。

【134】1957年5月18日《人民日報》。

【135】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

【136】1957年7月2日《人民日報》。

【137】參見《當代背景》878號，第19頁。

【138】1957年4月30日《人民日報》。

【139】1957年5月3日《人民日報》。

【140】《當代背景》467號，第1～6頁。

【141】1956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沒有制定在政治局中進行表決的條文，蘇聯共產黨章程也是如此。然而，似乎在蘇共主席團中表決是的確進行的；1957年夏，曾報道當赫魯曉夫同「反黨集團」作鬥爭時，他受到了「暫時的形式上的多數」的反對（康庫斯特：《蘇聯的權力和政治》，第311頁）。1973年中，勃列日涅夫對美國記者說，主席團很少表決，一般經過長時間討論之後，總能一致地

作出自己的決定。參見夏皮羅的報道「在談話的前夕，勃列日涅夫變得喋喋不休」，1973年6月16-17日《世界先驅論壇》。

【142】 引自所羅門：《毛的革命和中國政治文化》，第316頁。

附錄七：1957年2月27日劉少奇在哪裏？

【1】 正如在第374頁注58里論證的那樣，劉很可能直接從北京到了河南，並在此次各省巡視的最後才視察河北。如果他在河南的3月5日講話標誌著視察那個省份的開始的話，那麼，2月27日他一定還在北京。

【2】 林小姐透露，據她所知，毛澤東本人在批判胡風中起了主要作用，但在當時一般群眾並不知道這個情況（參見杜林：《共產黨中國：學生反對派的政治》，第38頁）。毛為批判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所搜集的材料寫了前言，但直到毛的文章和講話集出版，這情況才披露出來（見《當代背景》891號，第19～21頁）。

【3】 杜林：《共產黨中國：學生反對派的政治》，第25～26頁。

【4】 利尼・戈德曼在《中國季刊》1962年10-12月號第141～142頁。引用此話。戈德曼先生當時在北大學習，他說林小姐聲稱出席最高國務會議的中共成員有80%離開會場，這大概是不可能的．從杜林的書中所引用林小姐所說原話看，這一定是不對的。

【5】 將這次最高國務會議的照片和1956年1月25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的照片（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報》）或者同中共八大開幕式及1957年全國人大的照片，（分別見1956年9月16日，1957年6月27日《人民日報》）作比較。在後三個場合裏，坐在主席台前排以後各排人是可以看清楚的。在1956年1月25日最高國務會議的照片上，在前排以後就座的人難以辨認清楚，不過刊登在《人民畫報》1956年2月號第5頁上的相同場合的一張更好的照片，彌補了這一不足。（附帶說一句，1956年最高國務會議的那張照片，清楚地證明鄧子恢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可能是因為他不贊成農業十二年發展綱要，也可能由於他在合作化方面遭受了挫折而受到冷遇。）《人民畫報》沒有刊登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報告時的任何照片。

【6】 指按其地位應該坐在前排的人。例如，在《人民日報》的照片上，賀龍坐在副總理行列的最末一個。副總理們在前排都有座位，然而，這裏只有他的位置，因為地位比他高的二位副總理林彪和彭德懷沒有出席。林伯渠和羅榮桓如果出席也應在前排中，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們坐在一起。而他們沒有在前排露面，只能說明他們沒有到會。

【7】 這一時期林極少公開露面。然而他在4月22日同劉少奇在上海機場迎接了伏羅希洛夫主席（4月23日《人民日報》）。朱德從這年年初起就一直沒在首都出現過。據報道，2月6日他在廣州（1957年2月25日香港《文匯報》），3月中旬是在家鄉四川省的成都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西羅基的（1957年3月16日《人民日報》）。也許這位70高齡的元帥是為了躲避北京的嚴寒，不過這也不能成為阻止一位首腦人物為了聽取毛的一次重要報告而短暫地返回北京的理由。

【8】 關於對此類證據如何評價問題展開的充分討論，請參見麥克法夸爾的文章，載《中國季刊》1971年4-6月號，第289～307頁。

附錄八：各省負責人對整風的態度

【1】 潘復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參見泰偉斯：《省級領導人的清洗，1957—1958年》，載《中國季刊》1966年7-9月號。然而，河南是省委第一書記表示不歡迎整風的省份之一（見下）。

【2】 正如表裏說明的，未能得到對兩個地區（廣西和天津）的報道；而第三個地區（西藏）不在運動的範圍之內。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於1958年。

【3】 安徽、黑龍江、河北、湖北、吉林、貴州、遼寧、山東、山西、新疆、青海。

【4】 這個例外是貴州省，所以如此，是因為報道採取了採訪第一書記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新聞發佈。
【5】 福建、雲南、上海。
【6】 湖南、江西。
【7】 浙江、河南、內蒙古、甘肅、江蘇、廣東、山西、四川、北京。（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可能病了，見 257 頁注 14）
【8】 這些例外是北京、河南，也許還有江蘇（見 257 頁注 15）。
【9】 如表所示，我發現這 27 個省級單位的報道中，只有 14 個涉及體力勞動問題。由於這是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中央專門指示的中心議題，因此，近半數省委書記們沒有向全國公眾保證執行這一政策，表明存在著廣泛的不滿情緒。
【10】 河南和廣東。
【11】 湖南。

第四篇 反右運動

第十七章 關於矛盾問題講話的公開發表

【1】 《事情正在起變化》，《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15 頁。根據同一出處中的另一段話，這篇文章的寫作日期應是五月中旬。我猜想日期應是 5 月 19 或 20 號。如上所述（224 頁），毛在文章中對記者的態度顯示了很大的擔心。這可能來自他所看到的關於 16-18 日在京召開的記者論壇（鄧拓是講話人之一）的報道。見麥克法夸爾，《百花運動・・・》，63 頁。不清楚《事情正在起變化》是一篇備忘錄，講話，還是幾個隨意評論。《毛主席教育語錄》中的引文顯示《毛澤東思想萬歲》中的文本是不全的。
【2】 《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15 頁。
【3】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89—290 頁。
【4】 《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15 頁。
【5】 《毛主席教育語錄》，第 25 ～ 26 頁。
【6】 1957 年 5 月 26 日《人民日報》。又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48 號，第 10 ～ 12 頁。
【7】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53 號，第 13 ～ 16 頁。
【8】 《光明日報》曾向 9 個城市派出記者，專門召集徵求意見的座談會。見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40 ～ 59、64 ～ 68 頁。儲安平以向毛和周恩來提意見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批評，認為關鍵的問題在於，黨認為它應該在各個方面均居統治地位。（同上書，第 51 ～ 53 頁）
【9】 見《本報工作人員在民革、民盟座談會上揭露章伯鈞、儲安平等共謀篡改〈光明日報〉方向》，載 1957 年 6 月 21 日《光明日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66 號，第 24 頁）。
【10】 見《在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章伯鈞承認他與羅隆基結盟》，新華社 1957 年 7 月 3 日電（《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71 號，第 22 頁）。
【11】 是《文匯報》駐北京記者站（負責人是浦熙修）對北大校園騷亂做出了一篇的重要早期報道（見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的知識分子》: 第 134 頁）。
【12】 何女士已 80 高齡，是孫中山最親密的同事之一廖仲愷的遺孀，廖在 1925 年孫逝世後不過幾個月就被暗殺。其子廖承志在八大上再度當選中共中央委員。
【13】 題為《工人說話了》。
【14】 同上。
【15】 《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15 頁。
【16】 「這不是立場問題嗎？」1957 年 7 月 14 日《人民日報》。
【17】 《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第 355 頁。

【18】 這篇報道是駐華沙記者西德基・格魯森寫的。更早一些有關這篇報告的報道刊登在5月19日和29日的《紐約時報》上，但其大部分內容在中國均已是公開信息。

【19】 兩種版本的摘要均見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的知識分子》，第265～277頁。對原文的改動，下面還將討論。華沙版本的可靠性有一個情況證明，即它包括了一段話，說已決定出版蔣介石文集。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在1957年4月17日的講話裏（發表在5月4日《南方日報》上），已經透露了這一決定。他對此中緣由的說明和華沙版本相同，即需要瞭解敵人（參見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的知識分子》，第276頁）。

【20】 《人民日報》於1957年6月15日轉載了上海《解放日報》的社論。

【21】 羅伯特・羅和漢普瑞・伊文斯：《逃出紅色中國》，第220頁。

【22】 杜林：《共產黨中國：學生反對派的政治》，第38頁。

【23】 同上書，第62頁。兩位學生並沒有詳細說明他們的數字是根據毛的講話得出，但是有理由假定他們確是如此。

【24】 羅和伊文斯：《逃出紅色中國》，第220頁。理查德・L・沃克《共產主義下的中國：第一個五年》第219頁稱數字超過1400萬。

【25】 羅和伊文斯：《逃出紅色中國》，第221頁。有關中國人和西藏人在西藏東部的衝突的持續報道於1956年春季和夏季傳到外界。1956年8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劉格平對意共記者說，這些報道是誇大的，並已是大為延遲的消息。這次叛亂開始於2月下旬，地點是四川東部的甘孜自治州，該州系藏族與其他民族雜居的地方（新華社1956年8月7日）。西藏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如此緊張，使得毛在1957年2月的講話裏估計當時在印度訪問的達賴喇嘛可能留在那裏，或申請到美國避難〔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87頁〕。毛有理由感到焦慮；尼赫魯對達賴喇嘛進行了一番說服工作才使得他回去（見理查森《西藏及其歷史》第203頁）。

【26】 那是使人確信在原文中沒有這些標準的一個論據。其餘已在上面論及（見第209頁、262～266頁）。羅伯特・羅聽過實況錄音，他說錄音裏也沒有這六條標準（羅和伊文斯：《逃出紅色中國》，第251頁）。

【27】 《共產黨中國：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88頁。

【28】 同上。

【29】 同上書，第275頁。

【30】 同上書，第289頁。

【31】 同上書，第289～290頁。

【32】 毛只以便宴款待西羅基總理（1957年3月10日《人民日報》）。而對西倫凱維茲主席，他則設宴招待（1957年4月9日《人民日報》）。毛和西羅基在一起的照片只發表過一次，而且還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團同東道主合影留念的場面（1957年3月10日《人民日報》）；而對西倫凱維茲，毛不僅和他及代表團全體成員合影（1957年4月9日），而且還發表過一張和他在宴席間的談話的照片（和西倫凱維茲夫人及周恩來，同上）和次日他出席了這位波蘭部長會議主席的答謝宴會的照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報》）。在關於波蘭人訪問情況的報道中，提到毛和西倫凱維茲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交談（1957年4月9日《人民日報》）；但沒有報道毛對同西羅基總理的談話表現出同樣持久的興趣（1957年3月10日《人民日報》）。

【33】 見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年》，第64～65頁。在西倫凱維茲訪問結束時簽署的中波聯合聲明中，沒有像周恩來1月訪問華沙期間簽署的聯合聲明那樣，聲稱蘇聯是集團的領導。記住下面一點很重要：毛的第六條標準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當1957年秋毛赴莫斯科時，他已完全確信不承認蘇聯的領導地位是有損於集團的，這導致他同波蘭及南斯拉夫代表團的爭論。由於毛的干預，最後公告承認了蘇聯的領導地位，而南斯拉夫代表團拒絕在上面簽字（同上書，第146～147頁）。1958年上半年，中國開始與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爭論。換句話說，在1957年夏季，否認蘇聯的

領導地位成了修正主義的標誌。但這並非因為中國到了這時才意識到強調蘇聯領導地位的重要性。而是因為中國在 5 月到 6 月初的經歷使他們明白，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對修正主義寬容下去了。於是，他們對波蘭對蘇聯領導地位的立場的態度有所轉變。很難想像毛原來的講話就包含對修正主義危險性的估計。譴責修正主義是最主要危險的同樣的話，插入了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但它與上下文很不和諧。

【34】 參見羅和伊文斯：《逃出紅色中國》，第 251 ～ 252 頁。
【35】 杜切爾：《蘇聯、中國與西方》，第 104 頁；毛的講話的章節標明日期是從 1957 年 6 月開始的。
【36】 史華慈：《共產主義與中國：變化中的意識形態》，第 115 頁；這句話的日期為 1957 年 7-8 月。
【37】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89 頁。
【38】 同上書，第 291 ～ 292 頁。
【39】 同上書，第 282 頁。
【40】 同上書，第 291 頁。
【41】 同上書，第 288 ～ 291 頁。

第十八章 毛被與右派聯繫到了一起 彭真的復仇

【1】 按照鄧小平在八大上的說法，中共有 1070 萬黨員（《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輯，第 209 頁）。相當大比例的人大概聽到過毛講話的某種文本。
【2】 《彭真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載 1967 年 6 月 10 日《北京日報》，第 8 版，第一欄。
【3】 同上。翌年，彭指出劉少奇是這一提法的提出者。（參見《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摘編》第 3 頁）
【4】 《三反分子彭真罪證材料》，載 1967 年 8 月 8 日《東方紅報》，第 2 版，第 2 欄。
【5】 劉仁是 1948 年勸說吳晗離開北平，投奔解放區的三個共產黨幹部之一。參見聯合研究院編：《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 717 頁，有關吳晗的傳記。
【6】 見小斯蒂芬• 烏哈利:《文化革命和對「三家村」的批判》,《中國季刊》1966 年 7-9 月號，第 149 ～ 161 頁。
【7】 像吳晗這樣的黨外高級幹部竟會對毛的講話內容一無所知，這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以吳晗的重要身份，他完全有資格出席 2 月 27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但他也可能因病未能參加（1957 年 6 月 19 日吳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他近日病了）。
【8】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82 頁。
【9】 1957 年 5 月 23 日《人民日報》。
【10】 同上。
【11】 1957 年 6 月 11 日《人民日報》。這家報紙於 6 月 10 日發了一條簡短的消息，報道吳晗於 6 月 9 日在中國人民大學一次討論會上的發言。此後，該報還採訪了吳晗。
【12】 1957 年 6 月 19 日《人民日報》。
【13】 1957 年 6 月 26 日《人民日報》。
【14】 1957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報》。這篇文章是一長篇摘要，原文刊登在兩天前的《工人日報》上，文章是由羅隆基負責的部裏 13 名工作人員寫的。文章使用的措詞是「指出」而不是「提出」，這個事實表明，說毛和羅的建議之間有什麼不同之處，根據是多麼的不足。
【15】 1957 年 6 月 27 日《人民日報》。
【16】 參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44 頁，該文尖銳地指責羅的提議正受到台灣、香港和美國的支持。據科恩說，對毛的建議獲得了某方的反應，不過它只是省級單位，而且是在反右運動之前（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事訴訟程序（1949-1963 年）》導言，第 41 頁）。

【17】 一位全國人大代表說明過他是如何在全國人代會會議前提交他的發言稿的，這想必具有典型性。參見《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附錄：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第 6 號，1957 年 7 月 18 日，第 20 頁。
【18】 1957 年 5 月 19 日《人民日報》。
【19】 1957 年 5 月 26 日《人民日報》。
【20】 1957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報》。
【21】 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人民中國》增刊，1957 年 7 月 16 日，第 39 頁。
【22】 同上，第 36 頁。
【23】 見奧克森伯格：《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制定》第 10 章。
【24】 張在統戰部座談會 3 月 21 日會議上提出他的建議，見 1957 年 5 月 22 日《人民日報》。
【25】 見《紅旗》、《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建設》1967 年 11 月號，增刊，第 8 頁。當然，劉也建議設立全國人大八個常設委員會。
【26】 如上所說，劉少奇在 1956 年間說過，他之所以贊同「長期共存」，是因為他相信民主黨派能比共產黨更好地動員社會的某些人士（應該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 此處有出處信息未翻譯。
【27】 1957 年 7 月 15 日《人民日報》。
【28】 將蘇共二十大稱之為一個「主要的災難」，我當然指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在這次大會上，赫魯曉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由此引起共產黨世界的諸多動盪，並被中國方面視為一個極大的錯誤。
【29】 1957 年 7 月 7 日《人民日報》。
【30】 1957 年 7 月 18 日《人民日報》；「不可能執行」原文為「兌不了現」。
【31】 見農工民主黨領導人嚴信民的講話；1957 年 7 月 3 日《人民日報》。
【32】 在這篇講話的正式公佈文本中，周和董必武的名字是放在括號裏的，因此可以很容易被刪去，而不至於損害其他觀點（同上）。
【33】 參見關於中國民主同盟中央 7 月 3 日整風座談會的報道，題為《費孝通歷數羅隆基的陰謀手法，邵慈雲揭露羅隆基的卑劣行為》（同上，1957 年 7 月 4 日）。在 1957 年 10 月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在 6 月初他曾與費孝通談話，勸他和他在全國的朋友們回心轉意（《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36 頁）。鑒於毛的舉動，很難肯定費影射主席和周恩來的動機是什麼；可能積極參加反右運動的官員們沒有給他留下任何選擇餘地。不論對此如何解釋，毛始終宣稱，費和像他這樣的人不應被送去勞動改造（同上，第 134 ～ 135 頁）。
【34】 1957 年 7 月 11 日《人民日報》。
【35】 章伯鈞是農工民主黨主席，同時也是中國民主同盟的領導成員。胡愈之只是民盟的一位成員；參見他的傳記，（聯合研究院：《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 293 ～ 295 頁）。在 1957 年初儲安平接任之前，胡還是《光明日報》主編；可以想像他對章伯鈞有不滿情緒，因為章在主編易人中間看來起了主要作用。
【36】 那些在講話和文章中插進損害毛的材料的右派分子和非黨人士可能是很想這樣做的，如果他們察覺到是毛讓他們垮台的話——無論是設下陷阱，還是（這種可能性更大）鼓勵他們大膽發言，但後來在憤怒的黨的幹部面前又無法保護他們。許多人就是這樣做的。
【37】 1957 年 6 月 4 日《人民日報》。
【38】 1957 年 7 月 7 日《人民日報》，吳晗還說，章和羅同意在民盟中央的工作公告裏印上這樣一段斷章取義的引文。
【39】 《章伯鈞在鐵道學院點火》，1957 年 7 月 11 日《人民日報》。
【40】 見馬哲民講話原文，1957 年 7 月 18 日《人民日報》。
【41】 毛在後來談到這場爭論時，提到在 4 月 30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他曾試圖教育資產階級，但是章和羅不聽，他們只是對在學校取消黨委制感興趣；毛並沒有說他們誤解了他的意思〔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158 頁。毛在 4 月初關於這個問題的評論，見同上書，第 108 頁〕。

【42】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引用《人民日報》社論(該報 1957 年 7 月 1 日)。
【43】 毛還為《人民日報》起草了 6 月 14 日批判《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的文章(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披露出來的)。這篇短文以評論姚文元的文章的形式出現,在那篇文章裏,姚批評了《文匯報》對毛 5 月 25 日的警告(「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都是錯誤的」)的態度;姚指出上海黨報《解放日報》給它以極為重要的地位。8 年之後,姚以文化革命的意識形態先鋒面目出現。是否就是這一次,姚初次得到毛的注意?
【44】 1957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報》社論。毛後來為反右運動中激烈的鬥爭會辯護說這是右派自找的:右派自己在 5、6 月間挑起「大」鳴「大」放;無論在毛百花齊放的講話裏,還是在其論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裏,毛從未提倡「大」鳴「大」放。〔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133 頁〕。
【45】 《斬斷周揚伸向科技界的黑爪》,1966 年 8 月 4 日《解放日報》。
【46】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80 頁。
【47】 同上書,第 288 頁。
【48】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72 號,第 24 頁。
【49】 見《鄧小平反革命言論錄》,《他們多壞!》〔《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58 號,第 5 頁〕。
【50】 據報道,7 月 6 日,毛在上海會見了一位來訪的印度尼西亞貴賓(1957 年 7 月 8 日《人民日報》)。
【51】 1957 年 7 月 9 日《人民日報》。毛並非想對北京的知識分子完全置之不理。7 月 14 日,曾經支持他整風的 3 個人(周恩來、康生、周揚)會見近 200 位作家和藝術家;不過,這種場合無法完全排除反對整風的人——周揚的上級陸定一也參加了。4 位領導人都講了話,隨後與到會的人共進晚餐(《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 ~ 73 號,第 7 頁)。人們一定會推測,這次會議和批判丁玲等老作家有關,這種批判已經開始,並且不久後將公開披露出來(見戈德曼:《共產黨中國的文學分歧》,第 207 ~ 242 頁;福克瑪:《中國的文學理論和蘇聯的影響》,第 151 ~ 185 頁)。不過,作主報告的周恩來無疑是企圖為調整整風運動的方向作辯護的。
【52】 毛講話的原文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109 ~ 122 頁。這個本子標明的講話日期為 7 月 8 日。但我推測,這是該書在日期方面經常出現的錯誤中的一個(如該書說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是在 1957 年 2 月 29 日,但是 1957 年不是閏年,這是個顯而易見的錯誤;見同上書第 133、137 頁)。
【53】 有關發表這幅照片意義的完全不同的解釋,見所羅門:《毛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第 320 ~ 322 頁;對所羅門的解釋的批評,見我的《論照片》,載《中國季刊》1971 年 4-6 月號,第 38 頁。
【54】 參見《鄧小平召集的一次黑會的內幕》,1967 年 5 月 13 日《新聞戰線》第 3 頁。其中說鄧小平在 3 日或 4 日的一次會上宣佈了這一改變。
【55】 同上。文章批評鄧小平沒有譴責鄧拓。吳冷西在交待中說,起初他只負責排版;鄧拓似乎繼續履行他先前的大部分職責。按照吳的說法,鄧拓的去職,應該是由於毛堅持這樣做,不過很顯然,毛無法使他受辱。估計是劉少奇和彭真制止了此事。其結果是,在鄧拓讓位於吳冷西的那次會議上,有一種頗為禮貌的氣氛;鄧小平還不但沒有批評鄧拓,反而還稱讚了他(見上書;《中國的法律與政府》第 2 卷第 4 號,第 73 ~ 74 頁;及《鄧小平反毛澤東思想言行一百例》,井岡山,1967 年 3 月 8 日)。
【56】 章伯鈞是交通部部長,羅隆基是森林工業部部長,章乃器是糧食部部長。
【57】 關於他的秘書的揭發,參見《新華半月刊》1957 年第 19 期,第 24 頁。
【58】 同上。7 月 10 日,據稱劉少奇說,右派在其罪行沒有結論之前,應當受到信任(《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 33 頁)。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鬥爭中標準的做法,這表明劉應該對遲遲不做結論而感到惱火。

【59】 1958 年 1 月 31 日，在下一屆全國人大召開前夕，毛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的決定，將這 3 人正式撤職（由周總理和國務院提議）。〔參見《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補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第 1 號，1958 年 2 月 6 日。〕人們用不著去假想，部長們還能繼續履行他們的職責，好像什麼事也不曾發生；但在 1957 年 7 月中旬未採取正式撤職的辦法，卻是極為異乎尋常的。

【60】 見《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黑話錄》，載 1967 年 6 月 4 日《進軍報》。此書稱會議日期為 1958 年，不過鄧在這次會上講話的簡短引文卻清楚地表明這個日期一定搞錯了。

【61】 見 7 月 11 日高教部民盟支部整風會議情況匯報，題為《曾昭掄開始交代同章羅聯盟的關係》，1957 年 7 月 14 日《人民日報》。

【62】 見沃克：《中國農業規劃：社會主義成分與私有成分（1956-1962 年）》，第 59 ～ 70 頁。

【63】 值得注意的是，陳銘樞也許有充分的理由責備毛。1933 年，陳曾經是發動反對蔣介石的福建事變的領導者（參見聯合研究院《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 92 頁中他的傳記）。這些叛逆者曾向江西蘇區的中國共產黨人尋求支持，但儘管蘇維埃政府早些時候已同福建革命人民政府訂立了一個協定，他們沒有派兵支援，蔣介石鎮壓了這次反叛。當時，毛在蘇維埃政府中的權力是有限的，但他還是運用其影響反對給福建的「叛逆者」以援助（見施拉姆：《毛澤東》，第 172 ～ 175 頁）。陳銘樞很可能因此對他有怨意。按照周鯨文的說法，由於 1953 年一次會議上發生的事情，毛同樣有理由不喜歡陳銘樞（見周鯨文：《風雨十年》，第 254 ～ 257 頁）。

鑒於陳批評毛喜歡接近非黨人士中諂媚的人，9 年後的一件事是很有意思的。毛曾公開承認他有「許多右派朋友」（《當代背景》891 號，第 72 頁）；他列舉的人物中周谷城和張基春（音）不是 1957 年的那類右派——他們在反右運動中沒有受到衝擊——不過在政治上，他們確是在中國共產黨之右的。

陳銘樞的某些批評使毛惱火，這可以由 1958 年 1 月他在兩次提到這些批評來證明。在這兩個場合，他承認陳的批評是屬實的，但又為陳所批評的行為作解釋（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47、155 ～ 156 頁）。

【64】 陳也引用了毛給《詩刊》編輯部的信，以顯示毛不喜歡舊體詩。發表這一評論時，《人民日報》也許有些諷刺意味；從黨的觀點出發，毛的信以及他的詩詞的發表，會提高古典文學的地位，向正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捍衛者潑冷水（同上書，第 179—180 頁）。

【65】 《劉賓雁是資產階級右派在黨內的代言人》，載 1957 年 7 月 20 日《人民日報》。

【66】 劉賓雁對毛也有所批評。他引述毛的話說「團代會毛主席說開得好，群眾說開得不好，我說開得不好。」（同上）。

【67】 《曾昭掄開始交代同章羅聯盟的關係》，同上，1957 年 7 月 14 日。在 1965 年 1 月成為高教部長的蔣南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責為與北京黨組織裏的「三家村」有牽連（見聯合研究院《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 137 頁）。

【68】 見黃藥眠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的自我批評，1957 年 7 月 19 日《人民日報》。

【69】 《李萬春在京劇界興風作浪，妄想重溫日偽時期的舊夢》，1957 年 7 月 24 日《人民日報》。

【70】 1957 年 7 月 17 日《人民日報》。

【71】 顯然這樣修改涉及一個語義方面的問題。如果說剝削階級已被消滅，那麼就只有被剝削階級存在，而由於階級這一概念只有在兩個以上的階級存在時才有意義，因此也就意味著階級已經消滅了（這個問題在 30 年代的蘇聯也同樣被提出過。對它的討論，參見亨特：《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第 202 ～ 208 頁）。不過，要中國資產階級所瞭解的是，只有那些官僚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他們是與蔣介石直接有牽連的集團），才會作為階級被消滅。民族資產階級、一般地主和富農作為階級繼續存在，即使已經剝奪了他們的剝削部分，使之成為非剝削者，並成為人民的一員，還是會被進行階級鬥爭，只不過是以一種修改過的、用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實際上，對陸定一文章的修改使正統

的理論更接近於毛的意思（見上書，第 119—121 頁）。雖然毛偏離了蘇聯的正統（撇開他相信矛盾始終存在這一點不談）以便為他的整黨意圖服務，但他的對手會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和他是一致的，以便對知識分子進行威脅（這一點是他們的目的，似乎可以從《人民日報》的社論上看出：《人民日報》已於 1957 年 5 月 2 日的社論中對他們的立場作了理論上的修正；見上書第 215 ～ 216 頁）。

【72】《堅決維護黨對科學工作的領導權》，1957 年 7 月 17 日《人民日報》。

【73】蘇聯的清洗於 7 月 3 日晚公諸於世。中共通過電報得到消息；鄧小平在為了公佈鄧拓被吳冷西取代的消息而召開的記者招待會開始時，手持這份電報，當即宣讀了它的內容。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樣（注 54），搞不清這次會議究竟是 7 月 3 日召開的，還是 4 日召開的。

【74】歐邁格指出，一些中央和省的高級幹部在這些日子裏沒有露面（見奧克森伯格：《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制定》，第 11 章注 6）。

【75】根據 1957 年 9 月 23 日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上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手冊》1958 年，第 33 頁）。在《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343 頁上的譯文略有錯誤。該譯文的意思是，它可能是一次有幾個省負責人參加的高級幹部會議。但原文措辭表明，這次會議和 1955 年 7 月 31 日毛為加快合作化而召集的各省負責人會議更為相似。

【76】7 月 20 日至 8 月 6 日召開的會議上，烏蘭夫在閉會前一天作總結報告。可以推想，他應該參加了早些時候召開的會議。8 月 4 日周到會講話，8 月 5 日，他和毛接見了代表團。8 月 2 日，當毛接見一位緬甸貴賓時，周也和毛在一起（見 1957 年 8 月 5 日《青島日報》）。

【77】當時，彭真是另外一位兼任省市領導職務的政治局委員。

【78】與此相對照，陳伯達在 1955 年 10 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作關於合作化的報告時，卻把毛 7 月 31 日講話稱作「指示」，並向他的聽眾說，各省負責人會議是中共中央召開的（《人民手冊》1956 年，第 92 頁），儘管證據表明這次會議和講話都是毛發起的。鄧的報告見《人民手冊》1958 年，第 33 頁。

【79】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125 頁；「完成」一詞見第 123 頁。

【80】同上書，第 123 頁。

【81】現在可以得到這次講話的三個版本：(1)《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16 頁（《當代背景》891 號，第 25 頁）；並見陳志讓：《毛論文集：文選和書目》第 56 頁。第二個版本刪去了「用」這個詞，同 1968 年 10 月 14 日《紅旗》上發表的相同段落作比較就可以發現這一點（第 8 ～ 9 頁）。(2)《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91 號，第 21 頁。(3)《文藝紅旗》第 5 期，1967 年 5 月 30 日，第 3 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00 號，第 18 頁）。在最後這個版本上，註明講話是在青島會議上作的；另外兩個版本只是簡單地標明 1957 年 7 月。在其他地方也可能找到這個講話的一些段落，但這些都已包括在以上三個來源中了。

【82】《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16 頁。

【83】在上海對知識界的講話〔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18 頁〕。

【84】《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91 號，第 21 頁。

【85】《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00 號，第 18 頁。

【86】很可能該講話的其他部分（這些部分對西方仍無法得到）的話也被引用過，但這些不能確定哪些話是該講話中的。

【87】參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91 號，第 21 頁的第一段。

【88】《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16 頁。

【89】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206 ～ 207 頁。

【90】「決不讓黨內右派分子腐蝕黨的肌體。公然反對黨對右派分子的反擊，許良英的靈魂浸透了右派思想」，1957 年 7 月 29 日《人民日報》。許良英看來似乎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人員。

【91】《許良英李德齊是黨的叛徒》，1957 年 8 月 3 日《人民日報》。這個報告重複了中共中央發生分歧的說法，但沒有點出劉少奇或彭真的名字。

【92】 汪精衛是國民黨左派人物，1927 年與蔣介石不和，但是最終還是和蔣共同反對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汪精衛成為敵人統治下的傀儡政權的首腦。

【93】 1957 年 8 月 7 日《人民日報》，轉載於《新華半月刊》1957 年第 17 期，第 144 頁。1927 年 4 月 12 日，蔣介石在上海突然同共產黨人翻臉，大規模屠殺共產黨人，使本來就岌岌可危的國共合作破裂。這一天對周恩來有特殊的意義，他是這座城市中共產黨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見伊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 11 章）。7 月 15 日，國民黨勒令國民黨內的所有共產黨員，必須脫離中共黨籍，否則將受到嚴厲制裁（同上書，第 269 頁）。我對 4 月 15 日這天的含義不大清楚。

【94】 1957 年 8 月 7 日《人民日報》。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位領導人。從 1921 年至 1927 年擔任黨的總書記。他被指責造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災難性結果。

【95】 同上。

【96】 彭講話的全文沒有被發表過，但是關於講話的長篇報道見上書，其中也許包括了他試圖強調的要點。

【97】 見彭所列舉的北京工作中缺點的第 3 項及第 5 項。同上，與 7 月 28 日社論不同，彭使用了與毛略有不同的措辭強調反右運動的嚴肅性。毛說「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社會主義革命」，彭則說「偉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彭也許想強調鬥爭，或者就是想說得與毛越不同越好。

【98】 這次講話的簡短摘要刊登在《新華半月刊》1957 年第 18 期第 137 ～ 142 頁。

【99】 同上，第 142 頁。

【100】 試將上書同《文藝紅旗》1967 年 5 月 30 日刊登的毛講話，或《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09 號第 20 頁及該書 4000 號第 18 頁刊登的相同段落的譯文作比較。

【101】 見上書第 287 頁，並參見《新華半月刊》1957 年第 18 期第 138 頁。柯版本唯一的一處不同是不太重要的，即將該段第 7 個字的「要」變為「想」。

【102】《新華半月刊》1957 年第 18 期第 138 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09 號裏的譯本，刪去了倒數第 2 句。

【103】《新華半月刊》1957 年第 18 期，第 138 頁。無論柯還是彭都沒有單獨提黨內的右派；這也許是因為他們的聽眾大都是非黨人士。

第十九章 妥協

【1】 這些是官方對農業生產總值增長率的估計；某些西方人士（如劉和葉）的估計更低，1956 年為 3%，1957 年為 0.5%。見珀金斯：《共產黨中國的市場控制與計劃》，第 81 頁注 64。對合作農業體制的瓦解的討論，見沃克：《中國農業規劃》，第 72 ～ 73 頁。

【2】 1956 年棉花產量減少 5%，棉布產量在 1957 年減少 12.5%。見沃克：《中國農業規劃》，第 72 頁。

【3】 同上書，第 71 頁。

【4】 從 1952 年到 1956 年，人口每年增長超過 2%（見約翰・S・愛爾德：《大陸中國的人口增長與分佈》，載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大陸中國經濟概覽》，第 353 頁）。

【5】 1956 年，糧食收購減少了 39 億斤，而國內市場的銷售則增加了 127 億斤。1957 年，銷售量繼續增長，收購量繼續下降（見《人民日報》社論《糧食問題和思想問題》，該報 1957 年 8 月 5 日）。

【6】 一些幹部被指責為個人主義者（同上）。

【7】 同上。

【8】 毛與著名黨外人士梁漱溟就這個問題的一次爭論的情況，見周鯨文：《風雨十年》，第 254 ～ 257 頁。

【9】 見《請看劉少奇的醜惡面目！》，載《井岡山》，1967 年 2 月 1 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62 號，第 3 頁）。

【10】《關於我國農民收入情況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載 1957 年 5 月 5 日《人民日報》。據譚震林說：「從 1956 年秋收以來，不少同志卻提出了『農民生活還很苦』，似乎黨和政府只注意了改善城市職工的生活，而對農民生活的改善卻沒有認真的注意。甚至有的同志對『共產黨進了城市，忘了鄉村』之類的說法也隨聲附和。」文章發表的日期——整風開始以前——以及提到「同志們」，都清楚地表明文章是針對黨內成員而不是對非黨人士的批評者，儘管後者之中也有某些人持這種看法。

【11】《政府工作報告》，英譯文見 1957 年 7 月 16 日，《人民中國》，第 23 頁。

【12】《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經濟附錄，280 號，第 5 ～ 6 頁。

【13】《在農村中大放大鳴大爭》，1957 年 8 月 10 日《人民日報》。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自由放任態度也許是毛在他青島講話裏稱為自由主義的表現之一。8 月 7 日還有一篇社論，題為《農業合作社不該做投機買賣》，批評農業合作社非法套購國家的糧食，然後到黑市上倒賣。黨的基層幹部據說對這類行為不聞不問，因為他們覺得不這樣做就是對農民不公。

【14】同上。

【15】同上。

【16】《糧食銷量是能夠減少的》，見 8 月 12 日《人民日報》；《分清糧食問題的大是大非》，見 8 月 15 日；《自由市場要嚴格控制》見 8 月 18 日；《吃糧要有計劃》，見 8 月 28 日；《在豐收地區多購一些糧食》，見 8 月 30 日；《城市用糧必須努力減少》，見 9 月 2 日。

【17】見傅高義：《共產主義下的廣州》，第 209 頁。沒有中央的指示，廣東應該是不會發表這些數字的。

【18】對這次運動的探討，以及它的可能的目的是如何被破壞的，見奧克森伯格：《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制訂》第 11 章，第 30 ～ 32 頁。

【19】許多幹部缺乏遠見，擔心鳴放可能適於高級政府機構和教育部門，但不會下到農村去實行。官方的回答是，這表明了對黨的領導力量和群眾的聰明才智缺乏信心（1957 年 8 月 10 日《人民日報》）。也許幹部們知道農民甚至會比資產階級極右派更加無視對爭論的限制，因而他們擔心一旦鳴放起來，將會難以控制。沒有這場運動，不滿的農民已經給他們許多麻煩事了。（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以前廣東農村的情況，見傅高義：《共產主義下的廣州》，第 204 ～ 205 頁）

【20】譯文見《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經濟附錄，281 號，第 6 ～ 8 頁。

【21】見傅高義：《共產主義下的廣州》，第 204 ～ 205 頁。

【22】在對第二年布匹定量供應辦法作決定的過程中，商業部選擇了在城鄉之間更公平的辦法，減少城市居民的優厚條件，並承認這已引起了不滿（1957 年 8 月 20 日《人民日報》）。

【23】這個指示公佈於 8 月 10 日，薄的講話發表於 8 月 11 日。後者的英譯文見《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經濟附錄，280 號，第 1 ～ 4 頁。

【24】見奧克森伯格：《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制定》第 11 章，第 2 ～ 3 頁。

【25】《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經濟附錄，280 號，第 2 頁。

【26】同上，第 4 頁。

【27】見馬里恩・R・拉森：《共產主義下的中國農業》，見美國國會經濟聯合委員會：《大陸中國經濟概覽》第 236 ～ 237 頁。

【28】《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經濟附錄，280 號，第 3 頁，原料來源有限是由於 1956 年的自然災難。

【29】奧克森伯格（《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制定》第 11 章，第 2 頁）指出，1957 年 7 月 24 日《人民日報》社論是將執行毛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的第一個徵候。

【30】《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85 ～ 286 頁。

【31】同上。

【32】《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191 號，第 21 頁。

【33】 同上。毛對知識分子失望的程度可從他斷言知識分子最愚蠢，羅隆基（也許還有像他一樣的人）比文盲還無知這一點看出〔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 第 119、132 頁〕。
【34】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00 號，第 18 頁。
【35】 見倫納德：《斯大林之後的克里姆林宮》，第 251 ～ 253 頁；大規模地批判蘇聯作家始於 1957 年 5 月。
【36】 1957 年 5 月 21 日《紐約時報》。
【37】 1957 年 5 月 24 日《紐約時報》。
【38】 1957 年 5 月 21 日《紐約時報》。
【39】 1957 年 5 月 24 日《紐約時報》。
【40】 1957 年 5 月 25 日《每日電訊》。
【41】 1957 年 5 月 27 日《紐約時報》。
【42】 1957 年 5 月 25 日《每日電訊》。
【43】 1957 年 5 月 25 日《紐約時報》。
【44】 1957 年 5 月 26 日《紐約先驅論壇》(歐洲版)。
【45】 1957 年 5 月 26 日、27 日和 29 日《紐約時報》。
【46】 1957 年 5 月 30 日《紐約時報》。
【47】 1957 年 6 月 2 日《紐約時報》。
【48】 1957 年 5 月 25 日《人民日報》。
【49】 1957 年 5 月 28 日《人民日報》。
【50】 《政府工作報告》，載 1957 年 7 月 16 日《人民中國》，第 38 頁。
【51】 欣頓（《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第 265 頁）指出，在這次動亂之後，共產黨人沒有立即停止向國民黨人提議和解。其中一例是 6 月蔣介石的一位前侍衛官的廣播講話。他向蔣的兒子蔣經國呼籲，敦請他力勸其父擺脫美國控制，同共產黨人第三次合作〔《世界廣播概要》(第五部分：遠東) 675 號，第 4 頁〕。
【52】 社論的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04 號，第 6 ～ 9 頁。請用第 7 頁第 4 至 6 段同《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191 號第 21 頁的第 1 段(摘自青島會議文件) 相比較，並同《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00 號，第 18 頁第 2 段的摘要對比一下。
【53】 毛：《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 13 頁。
【54】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04 號，第 8 頁。
【55】 同上，第 9 頁（在英譯本的倒數第 2 段）。
【56】 同上。在 8 月 23 日的一篇關於生產節約運動的社論裏，又有一些在語義上攻擊毛的觀點的話。《人民日報》承認整風運動有助於這場運動，但它恢復了 5 月之前對「三害」的順序，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
【57】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98 號，第 1 ～ 3 頁。
【58】 同上，1599 號，第 1 ～ 4 頁。
【59】 同上，1604 號，第 6 頁。
【60】 同上，1599 頁，第 2 頁。
【61】 1957 年 9 月 5 日《人民日報》社論《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多數》。
【62】 同上。
【63】 參見 9 月 5 日社論第 6 段後半段，及前引青島會議文件(見 287 頁)的一段話。
【64】 見台北發表的文本第 1 章第 13 條(刊登在 1970 年 10 月 5 日《香港時報》上)。這篇文章與 1957 年的原本，有一個地方不同，形容政治氣候的詞句中「自由」一詞被刪去了。不過，這也有可能是香港時報社的一個過失，因為這個詞在紐約中國新聞社提供的英譯本中依然存在(《中國背景》第 2 冊 71 ～ 81，1970 年 10 月 4 日)。
【65】 《嚴肅處理黨內右派分子》，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16 號，第 1 ～ 3 頁。
【66】 《接受教訓，增強黨性》，1957 年 9 月 11 日《人民日報》。
【67】 《為什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1957 年 9 月 15 日《人民日報》。
【68】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15 號，第 6 頁。

【69】 對立雙方謀求達成妥協的方法，還有一個例子，即9月3日柯慶施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總結報告。這個總結報告和他在8月中旬的講話不同，他把資產階級右派同帝國主義、蔣介石聯繫起來；這倒和彭真在8月初的講話很一致。
【70】 同上。
【71】 《中國大陸雜誌選》653號，第37頁。
【72】 《在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16號，第10～14頁。
【73】 同上書，第14頁。
【74】 同上書，第10頁。
【75】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91號，第21頁。
【76】 《共產黨中國：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343頁。與社論及劉不同，鄧只是在引用了毛的措辭使用了該詞。
【77】 《劉少奇選集，1947-1957年》，第449頁。
【78】 安子文:《駁斥右派分子對幹部政策的攻擊》，1957年9月20日《中國青年報》。
【79】 這篇文章之所以在青年報上發表，可能是因為在有知識、有抱負的青年人中間對強調品行和資歷方面的做法最為不滿。
【80】 安引用了毛關於幹部政策的重要性，劉反對過分強調品行和資歷，和周批駁黨有宗派主義的說法（也意味著他批駁黨在幹部政策上有宗派主義的說法）的講話。安子文選擇的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引文是很聰明的。劉通常被視為黨的辯護人，他不僅注意品行和資歷，而且注意能力；周是主張對非黨人士採取信任的寬容做法（因為社會建設需要他們的人），他被安描述為代表黨批駁黨不夠信任非黨人士的人。
【81】 在最高領導層終於確認毛號召加速合作化的正確性以後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於1955年秋舉行，除中央委員以外還有388人列席會議。與此相比，發動了對高崗的批判的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只有52位中委以外的人士列席。而1959年彭德懷批評毛以及大躍進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僅有14位中委以外的人到會。
【82】 這次全會的公報，見《人民手冊》1958年，第182頁；鄧報告的中文本，見同上書第33～34頁；英譯文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343～363頁。報告共分八個部分：運動的總體情況；關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關於農村；關於工人階級；關於少數民族；關於軍隊；關於黨和團；改進工作，爭取全勝。陳雲作了關於改進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問題和農業增產問題的報告，周作了關於工資問題的報告。毛的講話（或部分講話）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122～126頁。在這裏我不再論及它，因為其主要之點已在上面說過，見第119～121頁和第285～289頁。
【83】 《共產黨中國：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345頁。鄧稱反右鬥爭為「當前的任務」（第347頁）。
【84】 同上書，第345頁。運動的第一階段當然是5-6月的鳴放。
【85】 鄧列舉的順序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同上書，第355頁），「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第361頁），「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同上），和「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第358頁）（這是正確的）。
【86】 同上書，第344頁。
【87】 同上書，第343頁；參見前面第286頁，在那裏我已經提出，鄧的謹慎措辭表明，毛的青島會議講話並沒有立即贏得高層領導的一致同意而作為高層對運動的集體評價。
【88】 參見鄧講話第3段的前3句（同上書，343頁），同毛講話摘要的第1段前4句相對照（《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91號第21頁）。後者的簡短引語見第287頁。
【89】 鄧《不能繼續前進》（《人民手冊》1958年，第33頁）；柯《不能前進》（《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8期，第141頁）。（彭真在8月14日講話裏以更加悲觀一些的詞句描述了形勢，並說，如果在這場爭論中不能贏得勝利的話，社會主義

就搞不成功（《新華半月刊》1957 年第 17 期，第 144 頁）。不像毛、柯和鄧那樣，彭沒有提到 1956 年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從而強調了陰暗面；想必彭的目的是強調反右鬥爭的急迫性。彭的估計和 7 月 28 日《人民日報》社論比較接近，社論在說到如果爭論失利時，使用了社會主義就「沒有希望」這個詞。）

【90】 比較鄧講話第 4 段（《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343 頁），和毛的青島會議講話摘要的第 5 段，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191 號，第 21 頁。

【91】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343 ～ 344 頁。

【92】 同上書，第 344 頁。

【93】 同上。

【94】 鄧講話中區分了在人民中兩種不同的整風，另見《新華半月刊》1957 年第 18 期，第 141 頁，最後一段，也可參見柯的講話中最後一段的倒數第 2 句，與第 308 頁上引自鄧報告的段落相對照。

【95】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09 號，第 19 頁。

【96】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344 頁。柯的溫和態度無疑反映了他在上海不得不和許多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打交道的情況。他的講話中的其他部分也體現出，他既要緊跟毛，同時也要因地而異地採取溫和態度，由此產生了分析上的矛盾，而這種矛盾並沒有被術語方面的嫻熟技巧緩和了。在一處，為了強調右派分子論點的軟弱，他說：「工商界和知識界的絕大多數是經得起當前的考驗的，證明好的是大多數，不好的是極少數。在他們中間，大多數是樂於接受無產階級領導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儘管他們的程度有不同。」（《新華半月刊》1957 年第 18 期，第 141 頁。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但就在這段話之後一點，柯慶施又幾乎原文不動地重複了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很不樂觀的論點：「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贊成這場革命，不贊成無產階級領導，他們中間的右派分子想同我們較量。一旦這場較量結束，他們必將失敗。」（同上。參見《紅色批判者》1967 年 6 月 16 日）

柯將自己避免自相矛盾的方法是，在討論全國形勢時，柯接受了毛將大多數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的態度來分析的辦法。在討論上海各界（例如工、商、知識界）人員的大多數態度時，他又持有樂觀態度（樂觀主義又用「傾向」一詞來限定）。當然，這樣耍弄語義的不足之處是，上海的資本家在全國的資產階級中占很大比重，因此在現實中這兩個分析都成立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97】 對比鄧講話，《人民手冊》1958 年，第 35 頁，及《毛主席論文藝語錄》第 107 頁。鄧這段話（《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347 頁第 5 段）的正式譯文提到走中間道路的人已經決定站到無產階級一邊，而毛講話的類似一段文字（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191 號，第 21 頁），提到了這些人未來將作出這決定。正式譯本似乎是錯的，因為，如下面將要討論的，鄧清楚地預見到取得基本勝利是在不遠的將來。

【98】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345、347 頁。

【99】 「現在右派是打垮了」；《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16 頁。

【100】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191 號，第 21 頁。

【101】 這段關於「只好讓他們把他們的反動觀點帶到棺材裏去」的話是從毛在青島會議上的講話上摘抄的。

【102】 《共產黨中國：1955-1957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348 頁。

【103】 參見同上書第 348 頁第 4 段（鄧），《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00 號第 18 頁（毛），以及 1609 號第 20 頁第 4 段（柯慶施）。

【104】 《共產黨中國：1955-1957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348 頁。

【105】 同上書，第 349 頁。

【106】 鄧也強調了幹部參加體力勞動的重要性（同上書，第 355 頁）。

結論

【1】 《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 32 ～ 33 頁。

【2】 見「工作方法六十條」的第 60 條，《當代背景》892 號，第 13 頁；這個文件的原文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後才能看到。1958 年 1 月 31 日，毛在六十條前面加了導言。在第 60 條裏，清楚地表明該工作方法已經與中央和各省許多領導人進行過討論，這說明此事已傳達幾個月了。該條說到政治局已同意了這工作方法，但沒有說中央全體會議已討論過。這也許說明，這個工作方法沒有向三中全會提出，不過我推測劉一定在文件向下級幹部傳達前很久就已經知道了這個文件。一個材料說它確實是向三中全會提出過的（見《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 33 頁）。不過，這也不能肯定，因為這一說法是在列舉劉在 1958 年的一系列活動中提到的。

【3】 傅高義暗示，陶的去職可能是想要平息地方主義情緒，這種情緒在廣東一直很強烈；陶是個湖南人，他的後任是廣東人。但是，如果這個理由成立，陶早在 1956 年 8 月就應當去職了（正如傅高義清楚地說明的，那是陶正處於守勢），而不應該是在 1957 年 8 月，因為此刻黨已經指示反對地方主義（見傅高義:《共產主義下的廣州》第 199、211 ～ 216 頁）。

【4】 《劉、鄧、陶結盟由來已久——陶是怎樣從高饒事件中逃脫的》，載 1967 年 4 月 10 日《批陶戰報》。

【5】 1962 年 7 月，陶自己檢討說，過去沒有完全支持毛；但他似乎沒有提到他犯錯誤的是哪段時期（見傅高義：《共產主義下的廣州》，第 301 頁）。

【6】 見艾克斯坦：《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第 50 頁。

【7】 休斯和盧亞德：《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1949-1958 年》，第 56 頁。

【8】 《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4 輯，第 96 頁。

【9】 見赤德遜、羅文哈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35 ～ 38 頁；這篇關於「中蘇經濟關係」的沒有署名的文章是沃納・克拉特博士寫的。

【10】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80 ～ 181 頁。周恩來曾經估計，高級知識分子的總數為 10 萬人，全部知識分子的人數為 380 萬（見本卷，第 34 頁）。無疑並非所有的右派都是知識分子，但是整風運動採取的方式說明，絕大多數右派都是知識分子。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右派中有 1/3 的人是小學教師〔《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07、215 頁〕。

【11】 1967 年 6 月 15 日《東方紅戰報》第 7 頁。

【12】 倫納德：《斯大林之後的克里姆林宮》，第 235 ～ 241 頁。

【13】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352 頁。

【14】 據我所知，還有另一個跡象說明，黨的領導層想要堅持新的黨章，並在第一次會議之後的一年裏召開八大二次會議；見三中全會不久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41 頁〕。但結果第二次會議直到 1958 年 5 月才舉行。

【15】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352 頁。

【16】 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講話裏透露：「毛主席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希望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不要像民主革命時期那樣付出大的代價。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問主席，他是否是指 1956 年的反冒進。他回答說不是這個意思，並且接著說，冒進僅僅是一個小問題。」見《周總理在接見工交財留農林口各部委及國務院直屬機關群眾代表時的講話》（未註明出版單位）。

【17】 在 1956-1957 年冬季危機時，陳雲堅持財政、信貸、物資三者平衡的原則（見《北京公社》1967 年 1 月 28 日）。「平衡」的觀點同大躍進的精神大相逕庭，對此將在本書第 2 卷中討論。毛在 1959 年的一次講話裏，意思似乎是在 1956 年到 1957 年期間，周恩來和陳雲是他在經濟政策上的兩位主要對手（見《彭德懷案件》第 20、25 頁）。

【18】 見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第二版），第 195 ～ 210 頁。並見本書第 2 卷。
【19】 見麥克法夸爾：《共產黨中國的黨內爭論》，載《太平洋事務》1958 年 12 月號，第 332 頁。並見本書第 2 卷。
【20】 見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運動和中國知識分子》，第 32 頁。
【21】 同上書，第 306 頁。
【22】 尤其在波蘭：同上書，第 28、302 頁。
【23】 見麥克法夸爾：《中美關係，1949-1971 年》第 104 ～ 105 ＝ 116 ～ 127 頁。
【24】 同上書，第 134 ～ 142 頁。
【25】 哈爾波林認為，中國新聞界報道這次洲際導彈試驗表明，北京已經估計到了這件事。但是他認為中國報道國際地球物理年這件事是他們不相信蘇聯會首先發射人造地球衛星的證據（哈爾波林：《中國和原子彈》第 5 章）。
【26】 見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 407 ～ 408 頁。在毛為《人民日報》寫的 7 月 1 日批評《文匯報》的社論裏說，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27】 在動身去莫斯科之前，毛流露出對波蘭發展前途的擔憂。在波蘭，對知識分子週刊 Po Prostu 的壓制，使得 10 月初學生們鬧起事來。毛似乎感到禁止該報紙發行是個錯誤，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批評波蘭人未能解決好反革命、右派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問題。見毛 10 月 13 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135 頁）；關於這一時期波蘭新聞問題的情況，見《集權國家的報紙》（蘇黎世：國際出版公司，1959 年）中關於波蘭的那一章。

對書目和方法的說明

本書資料主要來源分屬於兩個極為不同的類型。首先是 1956 年至 1957 年間公開發表的材料，像講話、社論、報紙上的文章等等。這些都反映出中國人當時對事件的看法。這些材料僅從表面上就提供了許多情況，但只要對中國領導人傳遞信息的手法有所瞭解，我們時常還會從中得到更多的內情。中國領導人正是通過這種手法把更多的信息傳遞給更為老於世故的官僚機構成員的。這些方法通常被稱為「奧秘傳播」或「伊索寓言式的語言」。它包括：字或詞按某種特殊順序排列，強調一項政策的某個方面而略去另一方面，援引歷史上的事件來指當前的某一政治準則[1]，發表精心選擇的照片以顯示政治上的位置，[2] 還有諸如此類的其他許多手法。這裏我不想討論如何分析公開的信息以求得潛在的含義的問題；在其他場合，人們曾詳盡探討了「克里姆林宮學」，凡在本卷裏運用了克里姆林宮學研究方法的地方，我都詳盡地加以闡發。[3]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國領導層也使用「克里姆林宮學」。1959 年毛在談到對「大躍進」的批評時說了如下一段話：

> 這些人不提冒進，但他們卻有反冒進的味道。譬如，他們講「有失有得」。將「得」放在後面，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4]

資料的第二個主要來源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版的，但是與 1956 年和 1957 年有關。這一來源包含了各種各樣的材料，不過由於其發表的主要緣由是要敗壞像劉少奇這樣的被打倒的「修正主義」領導人的名譽，所以使用起來要特別小心。這類材料中許多都是從受批判的領導人過去的講話和文章中節錄下來的，並和毛的語錄相對照，以表明正誤之所在。一些「異端」的言論是引自當時就公開發表的講話，從而有可能對照核實一下它們是否被曲解或被斷章取義了。對人們第一次

看到的講話，也就是引自迄今為止尚未公開的文件，那麼問題顯然就更棘手了。如果對原意的準確性沒有什麼懷疑，我在腳注裏對這些話的解釋詳加討論。文化大革命期間對照引用「異端」的和「正統」的話，是要證明這些罪人一貫是壞的，毛則是一貫的「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例如，常常把劉在 1956-1957 年間的言論不公正地與前後相距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毛的言論對照起來。遇到這類情況，我得找雙方在同一時期的言論相對照。

文化大革命期間披露的材料中，較為有價值的是那種從迄今未公開的講話或文章中選出全文刊載或大部摘錄的材料，這些材料主要是毛的，也有劉的。這些毛的講話和文章是極重要的，我想是值得把它們連同已有的譯本在本註釋裏列出來，這樣會比讓它們分散在書目和腳注裏好些。

文化大革命中披露內情的全部材料幾乎都是由為數眾多的紅衛兵組織發表的，這些組織在 1966-1967 年間曾遍佈整個中國。其中一些是在紅衛兵小報上定期發表的；還有一些則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許多引語和某些文章是重複發表的，從這一跡象來判斷，估計這些材料是由隸屬「文革小組」的某個專門機構預先準備好提供給紅衛兵的。大批材料已被譯成英文，收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各種出版物中，但也有許多未經翻譯。我認為在本註釋中沒有必要分別列出註釋中引用的全部紅衛兵小報的名稱，因為美國國外廣播新聞中心編的《特別備忘錄：紅衛兵出版物目錄及說明》已經提供了極為詳盡的目錄。大批紅衛兵的材料能在多大的範圍內迫使人們改變對先前事件的看法呢？這就要看材料所涉及的時代了。如果涉及的是 60 年代，中國領導人只公開發表過極少的重要文告，這些新材料就能補充許多東西。至於本卷涉及的這個時期，當時公開發表了大量的材料[5]。現在所得到的這些極為有意思的補充文件、引語及消息，總的來說，能肯定人們以前對 1956-1957 年所得的總的印象。例如，引自劉少奇 1957 年 5 月 25 日講話的一段極為重要的言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披露的〔見 221 頁（英

文版）——譯者〕，它證實了這樣一種揣測：正由於大學校園的騷亂才迫使整風運動草草收場。在整風問題上，劉少奇、彭真與毛澤東意見相左，這在 1957 年就已為人所知，雖然這場爭論的激烈程度只是在回過頭去看時才愈見清楚[6]。新材料的價值正在於，它使人們對過去所講述的事件的情況瞭解得更清晰，而且更加充滿自信地講述這些事件。

毛澤東主要著作、文章及語錄彙編

《毛主席教育語錄》北京：紅代會，北京電機學校，東方紅公社，1967 年 7 月。

《毛主席論文藝語錄》上海戲劇學院「革命路」編輯部，未注日期。

《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北京：文物出版社 1964 年 4 月第 2 版。英譯文見陳志讓：《毛與中國革命》，牛津大學出版社 1965 年版。

《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勝利萬歲》北京：北京電影製片廠革命造反聯絡總部，1967 年 7 月。

《毛主席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批判》（內部文件，注意保存）未注出版者和出版日期。《中國法律與政府》1968-1969 年冬季版將這本書幾乎全文翻譯刊載了。只有一個文件除外，這就是彭德懷的《我的意見書》。來源於另外渠道的該文譯本刊登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32 號，1 ～ 5 頁。這本彙編的某些文件的譯本，也同時來源於其他渠道，見《彭德懷案件》（香港：聯合研究院，1968 年）。

《毛主席文選》未注出版者和出版日期。這卷書被全文翻譯刊登在《出版物聯合研究中心》49826 號（1970 年 2 月 12 日）和 50792 號（1970 年 6 月 23 日）上。

《毛主席語錄》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1966 年第 2 版。這本「小紅書」的官方譯本叫《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北京：外文出版社 1966 年版。

《毛澤東，基本戰術》紐約：普萊格，1966 年版。本書由施拉姆譯出，收入了毛從 1938 年起寫的、迄今鮮為人知的論述游擊戰爭的著作。

《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 4 月。毛的合作化講話（1955 年 7 月 31 日）和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1957 年 2 月 27 日）都選進去了。譯本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哈佛大學出版社，1962 年）。毛的宣傳會議講話（1957 年 5 月 12 日）譯本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北京：外文出版社 1966 年。

毛澤東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北京：人民出版社，3 卷本，1956 年。這本書包括毛寫的一篇重要的序言和若干編者按語，並出版了一卷節選本，這個節選本被譯成英文，書名為《Socialist Upsurge in China's Countryside》（北京：外文出版社，1957 年）。這本書的一些文章還被譯出，刊載在《當代北京》338 號上，序言的官方譯本刊載於《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117 ～ 119 頁。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4 卷本，1960 年。這些卷是 1949 年以前時期毛的材料的主要來源，英譯本題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北京：外文出版社，1 ～ 3 卷，1965 年；第 4 卷，1966 年）。

《毛澤東思想萬歲！》未注出版者和出版日期。這本重要的彙編被全文譯出刊載於《當代背景》891 號上。一些文件還譯載於陳志讓主編的《毛：偉大的生平評介》（新澤西州，普林梯斯·霍爾公司，1969 年。）和他主編的《毛的文獻：文選和篇目提要》（牛津大學出版社，1970 年）。

《毛澤東思想萬歲》未註明出版者，1967 年見下一條。

《毛澤東思想萬歲》未註明出版者，1969 年。1973 年夏季，台北國際關係學院將這本書和上面那本書製成照片透印版發行。顯然，它們最初在中國國內印行時數量很有限。兩本書都是真實可靠的，而且是來自人民共和國有關當代事件的最為重要的原始文件。長達 700 餘頁的 1969 年版本具有更突出的價值，內容上包括了迄今尚未公開的大量講話和文章，時間上則包括了 50 年代中期直至 60 年代後期。本書大量地引用了這些講話和文章。1967 年版本包含了 1959-1961 年的材料；其中一些已見於別處，但是 1959 年初毛在鄭州會議上的一系列講話則是我們前所未聞的。為了嚴格地區分上述三本標題相同的書，我這樣來稱呼它們：《毛澤東思想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

《毛澤東：未名文集》未註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這是又一部重要的彙編，譯文見《當代背景》892 號；一些文件還被翻譯收入了陳志讓的兩本書裏。

施拉姆著：《毛澤東政治思想》（哈蒙斯沃斯：企鵝叢書，修正版，1969）本書包括了 1917 年到 60 年代中期毛的文章的譯文，並有評注。

《最高指示》未註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這個彙編被全文翻譯刊載在《當代背景》897 號上。

註釋：

【1】 文化大革命是由批判劇作家吳晗為先導的，他被指控為借一部描寫 16 世紀明朝的一位官員的劇本來批評毛。這種借古諷今的手法並不限於中國，甚至也不限於共產黨集團。1970 年 7 月 2 日，倫敦《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西班牙憑一條標題給編輯定罪》的報道，其中這樣寫道：「西班牙法庭今天判決一家雜誌的編輯入獄 5 個月，並處以 300 英鎊的罰款，理由是因為一條『大不敬』的標題。……頁首標題為『司法大臣賣官鬻爵』，指的是一篇有關 19 世紀西班牙歷史上的一件醜聞的文章。在星期四的審訊會上，起訴律師指控說，這個編輯發表這樣一條標題，是想敗壞現任司法部長的聲望和名譽。……在這個審訊會上，辯護律師聲稱，這位編輯沒有犯法，而那個標題只不過是新聞界慣用的一種手法罷了，那是一句只求吊人胃口不求確切的話，無非是想把讀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文章裏來。」

【2】 見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論照片》，《中國季刊》1971 年 4-6 月號，第 289 ～ 307 頁。

【3】 對克里姆林宮學的充分討論，見拉什：《赫魯曉夫的崛起》，附錄二，「奧秘傳播在蘇聯政治中的作用」；康庫斯特：《蘇聯的權力與政治》，第三章，「證據問題」；扎戈里亞：《中蘇衝突》，「對方法的說明」；對這種方法的現代評論，見拉奎烏爾：《革命的命運》，180 ～ 182 頁。當然，我並不是要說「克里姆林宮學」沒有誤入歧途的危險；同樣一個材料完全可能有極為不同的解釋。這類例子可見邁克爾亞荷達：《克里姆林宮學與中國的戰略論戰，1965-1966 年》，《中國季刊》，1972 年 1-3 月號，第 32 ～ 75 頁；唐納德・扎戈里亞和尤里・雷阿年對這篇文章的答覆，見《中國季刊》1972 年 4-6 月號；亞荷達的進一步說明見《中國季刊》1972 年 7-9 月號。

【4】 引自麥克法夸爾：《論照片》，《中國季刊》1971 年 4-6 月號，291 頁。

【5】 50 年代後半期的官方公開活動要比 60 年代前半期多得多。從 1956 年到 1959 年，有 9 次中央全會；而 1959 年 8 月至 1966 年 8 月僅召開兩次。

【6】 如果讀者受好奇心驅使，極想把本卷中作者對 1956-1957 年的看法與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前對該時期的看法加以對照的話，請看「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人的『整風運動』」，《當代世界》，1957 年 8 月；「批評與反批評：『整風』運動的影響」，同上，1957 年 11 月；「共產黨中國的黨內爭論」，刊《太平洋事務》，1958 年 12 月；《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知識分子》中「幻覺的破滅」一節，以及介紹各種文獻的部分。

書目

編註：由於外文人名及地名的漢語譯文在華語界無法統一和規範化，使用參考書目時請參照英文原文。

B

鮑大可：《共產黨中國：初創時代，1949-1955 年》紐約：普拉格公司，1984 年。

——鮑大可主編：《實踐中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69 年。

詹姆士·伯特倫：《重返中國》倫敦：海因曼公司 1957 年。

包華德主編：《中華民國人物傳記辭典》第 1 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7 年。

澤畢戈紐·K·布熱津斯基：《蘇聯集團：團結與分裂》紐約：普拉格公司，修訂版，1961 年。

C

尼格·卡梅倫：《中國在微笑》倫敦：赫奇遜公司，1958 年。

伊文思·F·卡爾遜：《中國的雙星》紐約：都德 - 米德公司

E·H·卡爾：《蘇俄史》第二卷：《布爾什維克革命 1917-1923 年》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952 年。第四卷：《權力真空 1923-1924 年》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960 年。《彭德懷案件 1959-1968 年》香港：聯合研究院，1968 年。

張書成（音）：《共產黨中國決策的方式和程序，1955-1962 年：三個事例的研究》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論文（未發表）。

趙國春（音）：《中國共產黨的農業政策》倫敦：亞洲出版社，1960 年。

萊昂內爾·馬克斯·查辛：《共產黨征服中國》倫敦：威登菲爾德公司，1966 年。

陳志讓：《毛和中國革命》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5 年。

——陳志讓主編：《毛澤東》新澤西州：普林梯斯·霍爾公司，1969 年。

——《毛論文集：文選及書目》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70 年。

陳潤：《中國經濟統計》愛丁堡大學出版社，1967 年。

——陳潤和沃爾特·蓋倫森：《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經濟》芝加哥：愛爾丁公司，1969 年。

陳錫恩：《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香港大學出版社，1960 年。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要地》紐約：普拉格公司 1963 年。

《中國共產黨人物傳記詞典》台北：國際關係學院，第 1 卷，1970 年。

周鯨文：《風雨十年》紐約：霍爾特，賴因哈特，溫斯喬公司，1960 年。

周策縱：《五四運動》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0 年。

杰羅姆·A·科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事審判程序 1949-1963 年：導言》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8 年。

《共產黨中國：政策文件及分析》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2 年。

博伊德·康普頓：《毛的中國：黨的整風文獻》西亞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52 年。

羅伯特·康庫斯特：《蘇聯的權力和政治》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961 年。

邁克爾·克羅夫特：《紅地毯通向中國》倫敦：朗曼公司，1958 年。

大衛·克魯克和伊沙貝爾·克魯克：《十里店——一個中國鄉村的變革》倫敦：羅特勒基公司，1959 年。

D

艾薩克·杜切爾：《蘇聯，中國與西方》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70 年。

奧德裏·多尼索恩：《中國經濟體制》倫敦：艾倫與昂溫公司，1967 年。

丹尼斯·丁·杜林：《共產黨中國：學生反對派的政治》加利福尼亞州斯坦福特：胡佛研究院，1964 年。

E

亞歷山大·艾克斯坦：《共產黨中國的經濟增長及對外貿易：對美國政策的影響》紐約：麥克格勞·希爾公司為外交事務委員會出版，1966 年。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北京：外文出版社，3 卷本，1956 年。

卡爾·埃斯克倫德：《紅色官員》倫敦：阿爾文·雷德曼公司，1959 年。

F

梅樂·范索德：《如何統治俄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3 年。

埃德加·富爾：《狡詐之人與遲鈍之人》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958 年。

C·P·菲茨杰拉德：《中國的革命》倫敦：克雷塞特出版社，1952 年。

D·W·福克瑪：《中國的文學理論與蘇聯的影響，1956-1960 年》海牙：摩吞公司，1965 年。

G

約翰·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8 年。

——《中蘇論戰之概觀：對最近爭論的摘要和評論，1963-1967 年》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8 年。

戈德曼：《共產黨中國的文學分歧》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7 年。

羅伯特·蓋蘭：《藍蟻》倫敦：塞克和沃布戈公司，1957 年。

H

摩爾頓·哈爾波林：《中國和原子彈》倫敦：帕·麥爾公司，1965 年。

——摩爾頓·哈爾波林和德懷特·H·波金斯：《共產黨中國與軍備控制》馬薩諸塞州：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1965 年。

A·M·哈爾彭：《戰後世界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紐約：外交關係委員會。（未發表）

哈羅德·欣頓：《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波士頓：豪頓－米佛林公司，1966 年。

威廉·欣頓：《翻身》紐約：月評社，1966 年。

《蘇聯共產黨歷史》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60 年。

查理斯托佛·豪：《中國城市的就業與經濟增長，1949-1957 年》劍橋大學出版社，1971 年。

蕭祚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權力關係，1930-1934 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61 年。

謝蘭莉（音）：《核時代共產黨中國之戰略》紐約：普林梯斯－霍爾公司，1962 年。

許芥煜：《周恩來：中國的卓越人物》紐約：達堡戴－安柯公司，1965 年。

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倫敦：勞倫斯和威沙爾特公司，1951 年。

G · F · 赫德遜，羅文哈爾 · 理查德，羅德里克 · 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紐約：普拉格公司，1961 年。

T · J · 休斯，D · E · T · 盧亞德：《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1949-1958 年）》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59 年。

R · N · 卡瑞 · 亨特：《共產主義的理想與實踐》倫敦：布樂斯公司，修訂版，1957 年。

I

哈羅德 · R · 伊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修訂版，1951 年。

J

《人民手冊（1956 年）》；《人民手冊（1957 年）》；《人民手冊（1958 年）》北京：大公報出版社，1956，1957，1958 年。

埃麗斯· 喬菲：《黨與軍隊：中國軍官中的職業化和政治控制：（1949-1964 年）》馬薩諸塞：哈佛東亞研究中心，1965 年。

K

吉奧吉 · 麥克吐南 · 卡欣：《亞非會議：1955 年 4 月印度尼西亞的萬隆》伊薩卡：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56 年。

唐納德 · W · 科林，安尼 · B · 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 年》馬薩諸塞：哈佛大學出版社，2 卷本，1971 年。

米哈伊爾 · A · 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蒙特利爾：國際出版者代理人，1964 年。

荷曼 · 科爾克維茲：《蘇聯軍隊和共產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67 年。

《赫魯曉夫回憶錄》倫敦：德烏茲公司，1971 年。

郭華倫：《中共史論》台北：國際關係學院出版社，3 卷本。

L

沃爾特 · Z · 拉克爾：《革命之命運》倫敦：威登菲爾德和尼科公司，1967 年。

梅爾文 · J · 拉斯基：《匈牙利革命》倫敦：塞科和華爾堡公司，1957 年。

沃爾夫岡 · 倫納德：《斯大林之後的克里姆林宮》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2 年。

雅克 · 萊韋斯克：《中蘇衝突與東歐》蒙特利爾：蒙特利爾大學出版社，1970 年。

約翰 · 韋爾遜 · 劉易斯：《共產黨中國的領導層》伊薩卡：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63 年。

李祁：《共產黨中國術語指南》伯克利：中國研究中心，中國術語研究第 5 號，1958 年 12 月。

李卓敏：《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59 年。

劉少奇：（一些主要資料來源）

《劉少奇選集，1945-1957 年》和《劉少奇選集，1958-1967 年》。香港：聯合研究院，1969 年和 1968 年。

《打倒劉少奇——反革命分子劉少奇的一生》北京：北京市第四醫院井岡山戰鬥隊，1967 年 5 月；英譯文見「當代背景」834 頁。

《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未註明出版地。「只爭朝夕」戰鬥隊和「我自巋然不動」戰鬥隊 1967 年 5 月 30 日。

《論黨》北京：外文出版社，1954 年。

《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北京：北京礦院東方紅「換新天」紅衛兵代表大會，1967 年 5 月。

《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選編》天津：「誓與劉鄧陶血戰到底」聯絡站、南

開大學八·一八紅色造反團，1967 年 4 月；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51 ～ 653 頁。

《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北京：北京化工學院毛澤東思想宣傳員，1967 年 4 月 10 日。

羅伯特·羅，漢普瑞·伊文斯：《逃出紅色中國》倫敦：邁克爾·約瑟夫公司，1963 年。

庫爾特·倫敦主編：《分裂的世界中的新國家》紐約：普拉格公司，1963 年。

彼得·盧姆：《北京（1950-1953 年）》倫敦：黑爾公司，1958 年。

M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主編：《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知識分子》紐約：普拉格公司，1960 年。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中美關係（1949-1971 年）》紐約：普拉格公司；迪文頓·阿伯特：大衛和查爾斯公司，1972 年。

J · M · 麥金托什：《蘇聯外交方針的戰略和策略》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2 年。

毛，毛主席，毛澤東：參見「對書目和方法的說明」。

穆福深（音）：《百花凋零》倫敦：海涅曼公司，1962 年。

O

歐邁格：《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制定：群眾性大興水利運動情況（1957-1958 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未出版）

P

德懷特·珀金斯：《共產黨中國的市場控制與計劃》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6 年。

何炳棣和鄒讜：《中國在危機中》芝加哥大學出版社，3 卷本，1968 年。《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 年。

R

埃德溫·O·賴肖爾，約翰·K·費爾班克：《東亞：偉大的傳統》倫敦：艾倫和昂溫公司，1962 年。

《有關匈牙利的報告：向中國公眾展示的匈牙利革命》香港，1957 年。

H · E · 理查森：《西藏及其歷史》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2 年。

W · W · 羅斯托等：《共產黨中國的前景》馬薩諸塞州劍橋：馬薩諸塞理工學院出版社；紐約：懷利公司，1959 年。

約翰·E·魯：《處在反對派地位的毛澤東，1927-1935 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2 年。

邁倫·拉什：《赫魯曉夫的崛起》華盛頓：公共事務出版社，1958 年。

S

倫納德·夏皮羅：《蘇聯共產黨》倫敦：艾爾和斯波蒂斯伍德公司，1960 年。

彼得·施密特：《中國新貌》倫敦：哈拉普公司，1958 年。

斯圖爾特·R·施拉姆：《毛澤東》哈蒙茲沃爾斯：企鵝圖書出版公司，1966 年；修訂版，1967 年。

——《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倫敦：佩爾－馬爾公司，1963 年；哈蒙茲沃爾斯：企鵝圖書出版公司，1966 年；修訂版，1967 年。

佛朗茲·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修訂版，1968 年。

史華慈：《共產主義與中國：變化中的意識形態》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8 年。

蕭瑜：《毛澤東和我曾是乞丐》倫敦：哈欽森公司，1961 年。

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下的中國》(西行漫記) 倫敦：戈蘭茲公司，1937 年。

——《大河彼岸》紐約：蘭頓出版社，1961 年。(修訂版：《今日的紅色中國：大河彼岸》哈蒙茲沃爾斯：企鵝圖書出版社，1970 年)。

理查德·所羅門：《毛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1 年。

約瑟夫·斯大林：《列寧主義》倫敦：勞倫斯和威沙爾特公司，1942 年。

根瑟·斯坦：《紅色中國的挑戰》倫敦：皮勞特公司，1945 年。

T

S·H·彼得·唐：《今日共產黨中國》紐約：普拉格公司，1958 年。

米歇爾·塔特：《克里姆林宮的權力》倫敦：科林公司，1969 年。

泰偉斯：《中國大陸的黨的地方幹部（1955-1966 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1967 年。

王酊（音）：《鄧拓選集》香港：明報社，1969 年。

U

美國國會經濟聯合委員會：《大陸中國經濟概覽》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美國政府印刷局，1967 年。

S·V·厄特辛：《俄國常用簡明百科全書》倫敦：鄧特公司，1961 年。

V

弗蘭克·A·瓦利：《匈牙利的分裂和騷亂》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1 年。

萊曼·P·范·斯萊克：《敵與友：中共歷史上的統一戰線》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7 年。

傅高義：《共產主義下的廣州》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9 年。

W

肯尼思·R·沃克：《中國農業規劃：社會主義成分與私有成分（1956-1962 年）》倫敦：卡斯公司，1965 年。

理查德·L·沃克：《共產主義下的中國：第一個五年》倫敦：艾倫和昂溫公司，1956 年。

《共產黨中國名人錄》香港：聯合研究院，修訂版，2 卷本，1969 年。

Z

唐納德·S·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62 年。

保羅·E 津納主編：《東歐的民族共產主義和民眾騷亂》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56 年。